中国军事通史第八卷

两晋南北朝军事史

目　录

第八卷　两晋南北朝军事史

第一编　两晋军事

第二编　十六国军事

第三编　南朝军事

第四编　北朝军事

第五编　军事思想、战争谋略及名将事略

书末附图：

绪 论

在两晋南北朝324年（265～589年）中，只有西晋37年（280～316年）的短暂统一，从东晋（317～420年）建国开始，处于南北政权对立时期。南方东晋灭亡后，继之而起的是宋、齐、梁、陈4个朝代（420～589年）。北方先经五胡十六国（317～439年），当北魏统一北方约96年（439～534年）后，又处于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对立时期（534～577年），至周武帝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北方再度统一。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代周，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全国复归统一。

从西晋建立到隋的统一，在中国大地上先后共建立过30个政权。这种局面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门阀政治；二是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在30个政权中，由高门士族和各少数民族贵族建立的共26个政权，占总政权数的87%。从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发展变化看，两晋基本上是门阀政治，从刘宋开始，士族走向衰落，到陈代士族完全没落，南方豪强酋帅兴起，这是两晋南朝在政治上的大变化。北方十六国前期民族矛盾较为严重，民族融合十分缓慢，十六国后期民族融合才有所发展，北魏统一后民族融合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特别是魏孝文帝（471～499年在位）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经过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后，代北地区豪强酋帅兴起，并建立北齐、北周政权，北周灭北齐后民族融合才接近完成，因而由汉人隋文帝杨坚代周灭陈，实现全国的统一。北方在长期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中，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北朝后期民族融合完成后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它为隋、唐帝国的兴盛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阶段由于长期南北分裂，南方王朝不断更迭，北方民族关系复杂，在长时期内政权林立，因而充满着动乱和战争。当时

军事活动异常频繁，根据粗略的统计，在324年中共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争有400余次。从战争的性质看有三种类型：主要的是各政权之间的兼并战争；其次是各政权内部统治阶级之间的内战；再次是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战争。分裂和战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时代特征，尤其是十六国和北朝大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同汉族政权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主要靠军事征服进行统治，因而其武装力量极为强盛，军队数目非常之多。同汉族政权相比较，此点表现得更为明显。曹操统一了北方，朝廷征战的常备兵力大约有30万人。西晋朝廷军队的总数，大体上沿袭曹魏时期的规模而略有增加。十六国前赵主要统治关中地区，朝廷常备兵力近30万人。后赵灭前赵后极盛时，朝廷常备兵力当在50万人左右①。前燕仅统治关东地区，朝廷常备兵力有40余万人。南燕仅统治今山东地区大部分，朝廷常备兵力竟达42.3万人。前秦统一北方后，朝廷有常备兵力60余万人。北魏前期朝廷常备兵力最多时也达60余万人。十六国和北魏少数民族政权的朝廷常备兵力，比相应的汉族政权的朝廷常备兵力，大约要高出一倍以上。再从魏、晋南征兵力同十六国、北魏南征或其他征战兵力相比较，十六国一些政权和北魏注重军事征服的特征就显得更为清楚。曹操征吴率军约16万人，加上荆州刘琮投降的军队，其总兵力也只有24万人左右②；西晋伐吴东西6路大军，其总兵力也不过20万人③。东晋咸康六年（340年），后赵石季龙将讨慕容皝，诏司、冀等7州“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④。东晋咸康八年（342年），石季龙准备征伐东晋、前凉、前燕，诏徐、兖

---

① 冉魏承袭后赵武力，征战有30余万军队，再加上后赵东宫卫士10万，以及被冉闵屠杀的“羯士”和其他少数族兵士以10万计，共约50万，当不为过。

② 《三国志·吴书》卷九《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③ 《晋书》卷三《武帝纪》卷四十二《王濬传》。

④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等11州三丁发二，五丁发三，州军齐集，其中仅造甲制船者就有67万人①。东晋建元二年（344年），石季龙将伐东晋，“诸州兵至者百余万”②，只因太史令赵揽密言大时不利，才暂停军。东晋升平二年（358年），前燕慕容儁欲攻秦、晋，乃诏州郡校阅户口，“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③。由于刘贵极谏，“乃改为三五占兵”，于次年（359年）冬州郡兵齐集邺城。前燕全境240余万户，以“三五占兵”推算，平均两户一丁，当有120万人，平均三户一丁，也有80万人。后赵将伐东晋所集兵力，仅州兵即为魏、晋南征兵力的5～6倍；前燕欲攻东晋所集州郡兵力，亦为魏、晋南征兵力的4～6倍以上。像后赵、前燕如此大规模地在全境征兵，其征发丁壮的比例及集兵数量，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像石季龙东征西伐，仅州兵就征集160余万人，其穷兵黩武，尤为典型。前秦苻坚伐晋，东西3路大军近100万人，仅中路军就有60余万，其总兵力为魏晋南征兵力的5～6倍，其中路军兵力约为魏晋南征兵力的3倍以上。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分5路大军反攻刘宋，“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④。这里所谓“百万”为虚夸数，其实际兵力当在40至50万之间，为魏晋南征总兵力的2～3倍⑤。显然，后赵、前燕、前秦和北魏在征战中动用如此多的军队，乃是突出其军事征服的威慑力量。十六国和北魏政权的建立者，在实行军事征服和统治时，对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皆承袭其游牧经济时期青壮年男子全部为兵的传统，而且有的政权对汉族人民也大量征兵，所以其军事力量如此强大，与之相对立的汉族政权不能不相应地加强军事实力，从而决定了当

①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按：《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成帝咸康八年十二月条认为造甲制船者皆为州兵，是正确的。

②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④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十月。

⑤ 参见《魏书》卷五十三《李孝伯传》，卷一百零五《天象志三》。

时战争规模很大。由于众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形成的军事统治，长期南北分裂割据，战乱频繁，战争规模宏大等所形成的特殊历史条件，使得各类政权的军制、主要兵种、战争形式和战略战术等都呈现出时代的特色。

这个时期军制的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晋南朝、十六国、北朝3个时期来叙述。两晋南朝为汉族封建政权，其军制历代沿袭，大同小异。在我国的封建专制时代，军权统于政权，政权统于皇权，所以皇权至上，这是历史的常态。两晋南朝由于高门士族掌权，有时重臣执掌国命，致使皇权受到了削弱、除少数皇帝（如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尚能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外，多数皇帝反而成了权臣手中的傀儡，所以这一时期的军事机构变化无常，常因人而异，军制混杂。两晋南朝的主要军队大致分为两大类，即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一部分担任京师卫戍，称为禁卫军，一部分屯驻京城附近的要冲之地，以保卫京城或受命出征。外军是中央军驻守在地方要镇的，由当地都督府统领，所以两晋南朝的主要军队通常称中外诸军。在军事统御方面，一般由尚书省所属五兵曹主管军队的日常工作，同时设中领军统领京城的禁卫军，设中护军统率京城外宿卫军，使之相互制约，直归皇帝统御。东晋以后中领军统属内军，指京城内外的卫戍部队；中护军统率外军，指属中央军驻守在各地区的部分。南朝基本上沿袭此制。由于南朝士族走向衰落，寒人兴起，君主利用寒人掌机要，专设制局监或外监军事机构，以侵夺中领军和中护军的权势。两晋南朝常由权臣执政，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代表皇帝统御全国军队。当个别皇帝能掌握实权时，都督中外诸军事虽统御全国军队，但仍由皇帝下诏、尚书下符调动指挥中外各军。当皇帝无能时，大权落入权臣之手，或恢复丞相以统领军政，或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录尚书事以掌握全国军政大权，而把皇帝架空。东晋多次权臣专政，南朝各代篡夺皇位，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实现的。

两晋南朝地方军事制度的特点，是军政合一的都督和刺史领兵制。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鉴于曹魏因皇室孤立而灭亡的

教训，在称帝后不久，便大行封建制，分封了皇室宗王 27 个。宗王可依封国的大小，分别设置数量不等的军队，特别是任命宗王为都督一方的军事长官，让他们掌握国家外军的兵权，目的在于拱卫皇室，称为宗王出镇制。这种军制虽带来西晋末八王之乱的严重后果，但以后除东晋皇室衰微外，南朝仍在不同程度上沿袭此制，这成为南朝宗王起兵夺取皇位或叛乱的根源。关于地方军政体制，西晋初年，已有一些都督兼任州刺史。太康三年（282年），晋廷曾一度罢州郡兵，实行刺史不领兵，军民分治的政策。晋惠帝时又实行军民兼治，随着都督兼任刺史的普遍化，形成了东晋南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刺史领兵制，宗室或门阀大族大多以州刺史兼都督一州乃至数州的军权。他们所统领的军队，一部分是属于国家中央军的外军，另一部分是州郡兵。东晋以后个别方镇掌握的军队数量很大，从而"阻兵仗势，足以建命"，以致有时形成方镇起兵叛乱的局面。

十六国的军事制度，呈现出复杂的情况，既有对魏晋制度的承袭，又保留了少数民族的一些传统制度。而且在各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前期同后期的制度，也发生了不少变化。总的说来，前期的诸胡政权和每一个胡族政权的初期，大都实行胡汉分治政策，在政权组织上一国设置两套班子，分府办公，各行其是，总统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这种组织形式表现在军事统御系统上，就是单于台和都督中外诸军事并设，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二者逐渐合而为一。由于各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或者说文化起点不同，由分治到合治的转化进程也不尽一致，但总的趋势是由分治到合治。在实行胡汉分治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也是最高军事统帅，同时又保留了大单于的称号，以表示他们仍是少数民族的最高首领。上述政权组织形式，在诸胡政权建国的初期，是比较普遍的。此后，随着各民族学习汉制进度的加快，他们的政权组织及军事指挥系统便开始发生变化。以军事领导系统来说，各国差不多都设置了都督中外诸军事，为皇帝之下的最高军事统帅。另外，还设置了许多不同品级的将军，分统中

外诸军。在少数民族政权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都督中军和都督数州诸军事等高级统军将领，一般要由本民族、特别是皇族宗室子弟担任。也有个别学习汉制进度较快的政权，任命汉族官员担任高级军职。如前秦苻坚就曾以汉人王猛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但这毕竟是特例，而非常制。

十六国的外军，也是中央军的派出部队，由中央委派到各地的持节都督或镇将统领。十六国时期，在州一级政权中，大体上仿照两晋之制，实行军政长官互兼的制度，任命驻在各军事要地的统军将领，兼任所在州的刺史，或给州刺史加上持节都督的职称，兼统军事。有的既是少数民族首领，又是当地的军政长官。从制度上说，他们所统属的军队除州郡兵外，一部分属于中央军驻在地方上的外军，但实际上由于担任地方军职者，非皇室子弟，即创业元勋，或是带兵投靠的少数民族首领，他们往往视所统的军队为私人武装，或者招兵买马，筑城修堡，扩展个人势力，不听从中央的调遣，甚至闹独立性。这种制度，实是造成诸胡政权经常发生分裂的重要因素。

北魏的军队体制，由中兵、镇戍兵、州郡兵三部分组成。中兵又称台军，是北魏军队的主力。北魏前期，中兵多为鲜卑部落兵，当时向四处征战的主要是中兵。中兵的主要任务是戍卫京师、出征作战，但有时也戍卫地方要镇。北魏中兵的数量很大，前期动辄十几万甚至数十万人出征，大都属于中兵部队。北魏中兵领导体制，前后期有所不同。在前期，北魏主要是部落兵制，中兵的指挥权归皇帝直接掌握，下设八部大人制，实为部落联盟最高军政领导机构。孝文帝改制后，中兵的领导体制仿效汉制，设领军将军一人，总统中兵。领军将军权势极大，史称“总握禁旅，兵皆属之”①。此外，在京师四方设置关津，以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各领中兵镇守，另设护军将军统率四中郎将，以捍卫京师。北魏中期以后，尚书省设五兵尚书，专管中外军的日常工作。北魏

---

① 《魏书》卷十六《京兆王黎传附子叉传》。

皇权强大，虽设都督中外诸军事，但不像两晋南朝那样集军权于一身，所以不曾出现权臣任此职威胁到皇权的现象。

为了防御北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北魏在北疆和西北疆设置镇戍，派兵镇守，后来镇戍又设置于南部边界，这些守兵即是镇戍兵。镇戍兵的主要任务是戍边守土，战时也配合中兵征战。镇设镇将，戍设戍主，统率镇戍兵，镇将的地位相当于州刺史，戍主则常由郡太守兼任。各镇戍领兵数不等，一般说来，一镇有兵三五千人。州郡兵即州郡属下的兵，主要是为防范人民的反抗，维持地方治安而设置。北魏早在道武帝时期（386～408年在位），就曾明令"诸州各置都尉以领兵"①。

东魏北齐兵制，大体上沿袭北魏。只是在高欢执政时期，实行夷、汉分兵制。高欢起事之初，主要依靠六镇鲜卑兵，后来又接管北魏"六坊"鲜卑兵的主要部分。高欢基本上实行的是以鲜卑人当兵打仗，汉人务农纳粮服杂役的作法。虽有少数汉人兵，但与鲜卑兵分开，单立一军，由汉人将领统率。高欢曾在丞相府设骑兵曹、外兵曹，统率中军和外军。高洋代魏称帝后，将丞相府下属诸司合并尚书省，只留下骑兵、外兵二曹，改立为省，命亲信将领任二省长官，掌管兵事，直归皇帝统御。北齐时，挑选鲜卑兵中勇力超群者组成军队，号称"百保鲜卑"，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两晋南朝的兵役制度，主要实行的是世兵制，或称军户制。由于当时门阀士族和地方豪强势力强大，他们在战乱中不断地扩充各类依附人口，侵占国家领民。为了保证兵士的来源，从三国各政权开始，便把一部分民户强制变为军户，他们不入郡县民籍，另立军籍，归各军府管辖。三国时，各政权军户都相当多，如魏文帝曹丕一次欲徙冀州军户10万户到河南，因有人反对只徙5万户。曹魏军户皆为西晋所承袭。西晋统一后，有人建议一次徙军户4万户到平阳以北，防止匈奴人的叛乱。东晋政权偏安江南，军

---

① 《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户减少，只好把各种罪犯充当军户。南朝刘宋时沈庆之伐蛮，前后共俘蛮人20余万，并为“营户”，也即军户。十六国政权基本上为部落兵制，本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男子多数为兵，组成强大的骑兵集团。有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时间较长的，也偶尔实行征兵制。北魏建国之初，主要实行部落兵制，后来也逐步实行镇户、府户即军户制。六镇兵民多是军户，经起义死亡流散之后，还有20余万。直到北周武帝时，还移并州军户4万户于关中。这个时期无论两晋南朝和北朝，都曾间行征兵制和募兵制，但世兵制始终是一种主要兵役制，这种兵制是为适应当时的战乱而设置的。军户子弟世代为兵，兵民分离，兵士一般是终身服兵役，父兄死亡，子弟替代。他们除战时打仗外，平时还要服各种苦役，因而兵士身份地位低贱；加之战争的摧残，南朝后期世兵制逐渐衰落，募兵制兴盛起来。

西魏北周实行的是宇文泰建立的不同于魏齐的府兵制。府兵制采取拓跋氏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①。这是说，统兵官不论是汉人或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兵士亦从主帅改姓。又仿照拓跋氏早期八部大人制立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在此之前已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总领军队大权，另一柱国大将军为北魏宗室元欣，仅挂虚名，没有实权，所以实际领兵官是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各柱国大将军领兵8000，总兵力近5万人。府兵仍由宇文泰统领。早期府兵包括鲜卑兵、关陇军户、“关陇豪右”所领乡兵，没有一般民户子弟。府兵另立军籍，不编入民籍，不负担赋役，平时半月宿卫，半月训练，轮流服役，战时出征。府兵制加强了官兵关系，提高了兵士的身份地位，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兵士的战斗力。北周武帝时，为扩大兵源，将府兵征召对象扩大至上等民户，后又扩展到一般民户。因为府兵可以免除赋役，人们纷纷应召，因

---

①《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而府兵人数急剧上升。至北周灭齐时，已拥有府兵 20 万人。隋文帝灭陈时，府兵已激增至 50 万人。北周府兵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军制，为以后隋唐所沿袭，而且是唐帝国前期强盛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个时期战争的特点，同军队的类型、南北地理条件和气候是紧密相关的。由于长期南北对峙，东晋南朝立国江南，利用南方河流湖泊纵横的特点，大力发展水军。当时是我国历史上水军大发展时期，在战争中常使用舟师数万或十余万。而且由于南方军队作战总是离不开江河湖泊，因而即使步兵一般也具有水军乘船战斗的技术。实际上南方水军和步兵是不可分的，水军登陆即成步兵，步兵上船便为水师，这类事例在战争中常见。东晋南朝的主力军队虽有步、水、骑等兵种，但以步、水军为主，骑兵数量较少。水军的发展离不开各种战船和战舰，当时南方水军，所用各类大小战舰，种类繁多。而战舰既需要载重量大，所装兵士多，又需要船身高，能控制制高点；还要求机动性强，便于向敌人冲锋。因此，这一时期既有载重量大和船身高的楼船，以及载重量大和冲击力强的艨冲大舰，也有灵活轻便的各类快船小舰，在水战中相互配合，形成水战船舰编制中的完整系统。西晋准备伐吴时，命令益州刺史王濬大造楼船，方 120 步，能载 2000 名兵士。船上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道出门，其上能驰马往来。东晋末义军首领卢循等率水军沿长江而下，将士 10 余万，舳舻上千只，其中芙蓉舰千余艘，楼船百余只，“新作八艚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二丈”①。刘裕为与之抗衡，也“大治水军，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②。南朝后期，楼船的高度又有所增加。如梁末陆纳在湘州所造的青龙舰、白虎舰，舰高 15 丈，外用牛皮蒙舰身，以挡敌人的攻击。艨冲也是水军中的主要大型战舰之一，远望如山，可以

---

①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初学记》卷二十五《舟》十一引萧方等《三十国春秋》；《艺文类聚》卷七十一《舟》。

②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冲没敌军小舰，在水战中屡显威风。艨冲小舰则是水战中常用的冲锋舰。刘裕伐后秦，王镇恶率水军逆渭水而上，乘艨冲小舰，行船兵士皆在舰内，“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皆惊以为神”①。用于作战的各类小型船舰，据记载有斥候、先登、赤马舟、艋冲、飞云船、飞鸟船、苍隼船等等②。斥候用于侦察敌情虚实，先登为水军前锋舰，以先登陷敌阵故名。艋冲用于冲击敌舰。赤马舟，其体赤色，疾如奔马。金翅、飞云、飞鸟皆形容其快速如飞，为冲锋型快速小舰。还有鶬舸战船，两边有八十棹，是棹最多的战舰，所以“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③。

东晋初年杜弢起义水军中，新出现一种“桔槔”机械，打没官军“（船）舰二十余艘，人皆投水”④。南朝时桔槔发展为一种“拍”，常用于水战。拍即是利用杠杆原理，以拍击敌方船舰的一种战斗机械。据杜佑《通典·兵典·楼船》条记载，拍乃是一种抛车，是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块的远程发射武器，其威力很大。在南朝史籍中记大型战舰装置“拍车”时，有的就直接记为“抛车”⑤。南朝时期比较高大的船舰上，普遍装置进攻性武器“拍”，使水战船舰进攻能力大为加强。如梁末徐世谱善水战，率水军拒侯景，乃造大舰、楼船、拍舰、火舫，以益军势。他在与景军决定性战役的赤亭湖之战中，“大败景军，生擒景将任约”⑥。陈初，侯瑱与王琳战于芜湖，“施拍纵火”⑦。同时章昭达“乘平虏大舰，中流而进，先锋发拍中于贼舰”⑧。章昭达平周迪、陈宝应于闽中，平欧阳纥于岭南，皆“装舻造拍”，大破敌军。此外，侯安都征留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安帝义熙十三年八月。

② 《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九《舟》引《晋令》。

③ 《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

④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舟部·舰》。

⑤ 《陈书》卷十一《黄法氍传》；《南史》卷六十六《黄法氍传》。

⑥ 《陈书》卷十三《徐世谱传》。

⑦ 《陈书》卷九《侯瑱传》。

⑧ 《陈书》卷十一《章昭达传》。

异，异退岭谷间，安都因其山陇之势为堰，“起楼舰与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①。淳于量等平华皎，“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②。南朝水师中大批“拍舰”的出现，以及“拍车”进攻型机械在战争中被普遍使用，乃是水军发展的一种重要标志，而且“拍舰”作为水师战舰的主要装备，一直保留到宋代。

由于东晋南朝水军大发展，当时南方造船业非常发达，无论朝廷或民间的造船工匠都相当多。有时出于战争的需要，可在短时期内突击造船，以达到突然袭击敌军的目的。如东晋末徐道覆义军在始兴准备北伐时，用原先保存的木材，尽力造船，只用了十多天时间，舟舰大备，义军10万，在湘江、赣水及长江中下游，曾大败东晋水军。刘裕为消灭义军，也是在短期内便装建成重楼大舰，组成一支强大的水军，最后将义军消灭。前者为民间造船工匠装建，后者则为官府工匠装成。隋灭陈后，南方曾一度混乱，隋朝廷为镇压南方叛乱，曾下令禁止“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③。并将民间造船三丈以上的，全部没入官府。由此可见，南方民间和官府造船业之盛况，造船业的兴盛乃是水军发展的基础。

东晋南朝以步兵和水军为主力部队，虽然在北方平原野战中难于同十六国北朝的骑兵抗衡，但可以充分利用步兵攻守城镇，以及水军在江河湖泊中作战的优势，加上步、水、骑等军联合作战的战略战术，以进行北伐或对抗十六国北朝骑兵的南进。

十六国北朝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它们都属于游牧民族，骑马善射为其所长，因而这个时期是我国古代骑兵大发展阶段。骑兵发展的基础是畜牧业经济，十六国和北魏畜牧业经济都很发达，北魏先后有规模宏大的4个官办畜牧场，经常储备战马数十万匹，

---

① 《陈书》卷八《侯安都传》。

② 《陈书》卷二十《华皎传》。

③ 《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以备军国之用①。十六国政权之间的战争，动辄有骑兵数万或十几万，最多时达数十万。前赵中央兵力近30万，后赵中央兵力50余万，主要由骑兵组成。前秦苻坚伐东晋，率“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②，骑兵占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为步兵的二分之一。北魏拓跋珪和拓跋焘平定中原时，常动用骑兵十几万，最多时达到40万左右。一个北方政权骑兵如此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骑兵大发展的另一个特点，乃是重装甲骑兵的出现。所谓重装甲骑兵，就是人和马都披铁甲的骑兵，当时称“甲骑”或“铁骑”。这种骑兵具有较强的防护力和集团冲击力，在对没有装甲的轻骑或步兵作正面突击时，具有相当大的威力。据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证明，人的甲胄在春秋战国以前就有了。马的防护装备，在汉代才有皮革制的“当胸”，汉末正式出现了马铠。如袁曹官渡之战时，袁绍有马铠300具，曹操不足10具，可见当时马铠还很稀少。但只隔10年之后，曹操与马超战于潼关时，曹军已有铁骑5000了。十六国北朝马铠有较大的发展，当时称为具装铠，已在骑兵部队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记载，在十六国北朝的战争中，铁骑常常成千上万，甚至有数万用于战场。如石勒在襄国保卫战中，大败鲜卑段疾六眷，击溃其骑兵5万，“枕尸三十余里，获铠马五千匹”③。这里铁骑数为骑兵总数的十分之一。刘琨遣箕澹率军10余万讨石勒，澹大败，率千余人逃走，石勒获其铠马万匹，铠马数占总兵力的十分之一④。前秦苻坚派吕光定西域，率步骑7万，铁骑5000，铁骑数占总兵力的十四分之一。苻坚南伐，在让晋军渡过淝水时曾说：“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⑤。当时苻坚骄横，这个铁骑数有所夸大，但至少表明秦军中铁骑为数不少。东晋桓石虔战败前秦名将梁成，俘获其马数百匹，有具装马铠300领。桓伊在淝水

---

① 参阅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载《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

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③④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⑤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之战中，缴获前秦马的具装铠 100 领，步铠 500 领。从以上两种数字比较看，前秦战马配具装铠的比例是相当高的。十六国后期南燕有步卒 37 万，“铁骑五万三千”①，铁骑数占总兵力的八分之一。刘裕伐南燕，燕军 9 万之众抵御，其中有“铁骑万余”②，铁骑数约占总兵力的九分之一。当时后秦姚兴扬言“当遣铁骑十万”③，以助南燕。此虽威慑之词，不足为据，但也反映后秦军队中铁骑不少。西秦鲜卑乞伏乾归时，共有军队约 7 万人，全为骑兵，有“铁马六万匹”④，足见其骑兵几乎全为铁骑，这大概属于特例。

铁骑在兵种中虽特具优越性，但其最大的弱点在于人和马匹的负担过重，降低了骑兵特有的快速性和机动力。因而从当时的战例来看，一方面是发挥铁骑在阵地战关键时刻以正面冲锋和侧击作用；另一方面是利用轻骑兵的优势，轻骑兵机动灵活，既具有冲击力，又能随机变换队形，还能快速远程袭击敌人。北朝常用轻骑兵远程袭击的战法，乘敌不备予以歼灭。当时轻骑兵远征，常备“兼马”，或称“马皆有副”⑤，即每个兵士有正马和副马两匹，在长途奔袭中两匹马互换，可一直保持进军的高速度，而且在军粮缺乏之时，还可杀副马以充饥。十六国北朝的骑兵，无论在数量和装备质量上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骑兵作战的特点有两条：一是行动快速；二是冲击力很强。这对于以步兵为主的汉族封建政权来说，显然具有绝对的优势，所谓“以步击骑，终无捷理”，或说：“我步彼骑，其势不敌”⑥。十六国匈奴刘渊和羯人石勒就是靠骑兵摧毁西晋中央军和地方军，从而建立起前赵和后赵政权的。北

---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八《慕容超载记》；《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③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④ 《晋书》卷一百二十五《乞伏乾归载记》；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

⑤ 《魏书》卷二十四《张衮传》、卷七十四《尔朱荣传》、卷四上《世祖纪》上；《周书》卷十九《杨忠传》。

⑥ 《魏书》卷三十《安同传附颉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魏政权也是靠强大的骑兵集团的快速性和冲击力，在野战中横扫华北平原和关中盆地，无可抗御地统一了中原地区。但在攻城略地和守卫疆土方面，显然步兵占有优势，所以无论十六国和北朝，各族统治者在建立政权的后期，便开始发展步兵，一般是建立步骑混合，而以骑兵为主的合成部队，作为国家政权的主力军队。

关于东晋南朝同十六国北朝之间的战争形势，当时人论述颇多。他们认为“与贼水陆异势，（军队）便习不同”①；又说：“夫地势有便习，用兵有短长，胡负骏足，而平原悉车骑之地，南习水斗，江湖固舟檝之乡”②，这是指南北军队各有优势和劣势。在北方平原作战，以骑兵占优势，南方水、步军处于劣势；在南方水乡征战，则水、步军占优势，而北方骑兵处于劣势。再者，北方骑兵行军快速，冲击力强，故长于野战，短于守城；而南方水、步兵则善于攻城和守城，却短于野战。战争的目的不仅是在野战中取胜，还有攻城掠地扩大疆土，也即攻城守土问题。所以从战争整体看，南北军队所便习，各占其半。例如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魏间的战争，开始时刘宋利用夏季河渠水涨之机大举北伐，北魏处于守御和退却地位。当入秋以后，魏主拓跋焘统率号称百万大军反攻时，宋军败退，魏军连过宋境青（治东阳）、冀（治历城）、兖（治瑕丘）、徐（治彭城）、豫（治寿阳）、南兖（治广陵）六州之地，一直打到长江北岸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瓜埠），但无强大水军，很难越过长江天堑，而且后面有刘宋六座州治坚城未破，随时有可能腹背受敌。正由于六州首府和其他一些重要军镇据守，所以魏军除对宋境进行破坏外，无法占领六州土地，而且在攻城中“死伤过半”，损失严重，最后只能退师，实际上寸土未得。魏主拓跋焘在攻刘宋徐州州府彭城（今江苏徐州）时，使尚书李孝伯与刘宋徐州刺史刘骏、长史张畅遥相对话时曾说：“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

① 《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

②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史臣曰》。

城耳"①。李孝伯指出的北方骑兵长于野战，南方步兵善于守城，以及北人"恃马"，南人"恃城"的特点，正好表明南北双方步兵和骑兵各有优劣。东晋南朝政权为了防止十六国北朝骑兵的南侵，特在长江以北的一些重要州郡治所修筑套城，即内外两道城墙，还在外城以外加筑马面，形成三道防线，以对付十六国北朝的骑兵②。

由于南北地形各异，军队便习不同，加之北方少数民族耐寒恶热，南方汉人耐热恶寒，所以东晋南朝每次北伐，总是利用夏季河渠水盛之机，既可利用水师开道，由江、淮而进颍、泗、汴、济水而入黄河，又可利用水道运输军粮物资，并发挥步、水、骑联合作战的优势。北方政权反攻或南伐，却总是在秋冬之际，秋凉马肥便于骑兵进攻，且入冬后河水结冰，不利南方舟师，而利于北方骑兵部队过河冲击。

以上是就南北双方军队所长和地形、气候等特点的客观条件来讲的，这些因素在战争胜败中，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战争的胜败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因而在实际战斗中，指挥者除了根据敌我双方各方面的形势，以扬长避短外，主要靠运用奇谋妙算，充分利用其他因素去击败对方。如淝水之战谢玄等以 8 万步、水军在野战中击败苻秦以骑兵为主的 30 余万大军。刘裕北伐南燕和后秦，都是以步、水军为主的军队，在野战中打败以骑兵为主的军队，而且有时是少数击败多数。萧梁名将陈庆之率 8000 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北伐，在野战中击败数倍、甚至 10 倍于己的以骑兵为主的北魏军队，横扫河洛，攻克洛阳。当然反过来也一样，如北周于谨灭江陵梁政权，又是北方以骑兵为主的军队，渡过汉水，在南方击败梁元帝以水、步军为主的军队，攻破江陵。再如陈宣帝时，周将王轨在淮河下游水流纵横之地，大败陈将吴明彻，陈军主帅被俘，损失精卒 3 万余，这也是北方以骑兵为主的周军，击

---

① 《魏书》卷五十三《李孝伯传》。

② 参阅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载《齐鲁学刊》1987 年第 4 期。

败南方以步、水军为主的陈军。这类战例，在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之间的战争中，并非偶见。至于当时南北方各军事集团之间皆以水、步军对阵，或皆以骑兵对阵，敌对双方统帅在战略战术指挥上的正确与否，对于战争的胜败尤为重要，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起关键作用，这是为无数战例所证明了的。

关于反映这个时期战略战术的军事思想和谋略，应是军事史的灵魂，我们在叙述战争过程中，注意探索其胜败原因，从而揭示每次作战反映的军事谋略和战术。同时又在专节军事思想和谋略中，除了论述5位主要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外，还以16次著名战例，从4个方面揭示出军事家们在历次作战中，善于根据战场上错综复杂的变化形势，巧妙地运用审时度势、因势决策、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奇正相兼、应变出奇、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等一系列军事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当时杰出的军事家们，不仅为古代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还有所创造和发挥。可以说，他们为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借鉴。

军事史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防（古代多称边防）、军制、武器装备和后勤供应、战争、军事思想和谋略等，其中战争应是军事史的核心。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与阶级之间、各政治集团之间、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为实现各自的政治、经济等目的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因而战争的胜负是敌对双方政治及与其紧密相关的经济、军事、外交和人才群体素质等诸因素总较量的结果。实际上，任何时代的军事，同该时代的诸多历史领域息息相关。因此，我们在撰写两晋南北朝军事史时，不是单纯地就军事论军事，而是力图站在时代的高度，也即从晋到隋特定的客观历史条件出发，去深刻地揭示军事史所包容的丰富内涵和特征，并由此去把握这个时期军事史的整体概况和规律，从而真实地反映出在我国军事史长河中，本阶段军事史发展的轨迹。但由于我们水平以及其他条件的限制，在写作过程中对上述理解和要求，究竟是否做到以及做到了什么程度，敬候专家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第一编

两晋军事

第一章　两晋的政治和经济概况

第一节　西晋的短暂统一

一、“高平陵事件”和司马氏专政

曹魏嘉平元年（249 年）正月，世家大族出身的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件”，一举控制了曹魏政权。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东）人，家世二千石高官。东汉建安六年（201 年），以本郡上计掾入仕，后任曹操丞相府文学掾，经迁升至相府主簿。曹操封魏王后，司马懿任魏王太子中庶子，深为太子曹丕所信任。曹丕代汉后，司马懿官至抚军将军、录尚书事，权势渐重。曹丕率军亲征，常令司马懿留守，“内镇百姓，外供军资”①。曹丕死，司马懿与曹真、陈群等人同受遗诏，辅佐魏明帝曹睿。明帝在位时，司马懿平定蜀降将孟达的叛乱，攻灭割据辽东的公孙氏，成功地遏制住蜀相诸葛亮的大举北伐，从而威望急剧上升，官至太尉。魏景初三年（239 年），魏齐王曹芳即帝位，司马懿升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

① 《晋书》卷一《宣帝纪》。

尚书事，与大将军曹爽同受明帝遗诏辅政。

由于司马懿的权势威望对魏廷造成威胁，大将军曹爽在齐王曹芳即位不久，便奏请曹芳迁升司马懿为太傅，使之失去实权。至正始八年（247 年），司马懿遂称病不出，以麻痹曹爽，而暗中预作准备，等待机会再起。

嘉平元年（249 年）正月，曹爽及其弟曹羲、曹训等陪同魏齐王曹芳去拜谒距洛阳 90 里的魏明帝高平陵。司马懿乘机利用其长子中护军司马师手中的兵权，会同太尉蒋济等人发动军事政变。他命司马师率兵屯卫洛阳司马门（皇宫外门），自己列阵于宫阙之下，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事；使其接统曹爽所领营兵，以太仆王观为行中领军，接管曹羲所领中领军营兵，又命人据武库，分发将士兵器，完全控制了洛阳。然后，司马懿命令关闭洛阳诸城门，断绝内外联系，自己与蒋济率兵出屯洛水浮桥，命人上奏齐王曹芳，数说曹爽兄弟罪过，请求将其罢免。曹爽无能，猝然遇此事变，彷徨无计，不知所为，最终未能采纳大司农桓范挟天子、召外兵与司马懿对抗的建议，而同意放弃职权，向司马懿俯首投降，自称："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①。

曹爽兄弟随曹芳回到洛阳，司马懿立刻将他们软禁起来。不久，司马懿以反叛罪杀曹爽兄弟及其党羽何晏、丁谧、邓飏、桓范等人，完全掌握了朝政大权。

嘉平三年（251 年），司马懿又先后逼太尉王凌饮药死，赐曹魏宗室楚王曹彪死，并将曹魏诸王尽置于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专派官员监视，不许互相交往，曹氏宗室势力进一步削弱，魏廷遂出现司马氏专权的局面。同年司马懿病死，其长子司马师出任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继续掌握军政大权。

---

①《晋书》卷一《宣帝纪》。

二、西晋政权的建立

司马氏的专权，引起忠于曹魏势力的强烈反抗，由此展开了一场司马氏与亲曹魏势力的长时期的激烈角逐。魏正元元年（254年）二月，司马师一举杀害中书令李丰、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太常夏侯玄、冗从仆射刘贤、黄门监苏铄等人，皆夷三族，以剪除拥曹派势力。同时废曹芳，另立魏文帝孙曹髦为帝。司马师进号大都督、假黄钺，剑履上殿，权势更重。

次年正月，魏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矫传太后诏令，列数司马师专权罪状，移檄诸州郡，起兵反叛。司马师亲率中军步骑十余万东征，很快击败毌丘俭、文钦军，俭兵败被杀，文钦南奔孙吴。司马师还许昌因病重而死，其弟司马昭代任其位，仍保持司马氏专权的局面。

甘露二年（257年），镇东大将军诸葛诞杀扬州刺史乐綝，起兵与司马昭对抗。司马昭挟持魏主曹髦及太后一同征讨诸葛诞，至次年二月，司马昭攻下扬州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杀诸葛诞，平定叛乱。至此，被称作“淮南三叛”的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三次反抗司马氏专权的变乱，先后被平定。

景元元年（260年），司马昭被进为相国，封晋公，加九锡。魏主曹髦见权势日去，不胜其忿，欲作拼死一搏，率亲信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亲信成济杀死。于是司马昭杀成济以掩人耳目，另立曹操孙曹奂为帝。至此，司马氏在与曹氏势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完全控制了朝政大权，取代曹魏的形势已日趋明朗。

泰始元年（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继位为相国、晋王。同年十二月，曹奂禅让帝位于司马炎，曹魏灭亡。司马炎称帝后，改国号为晋，改年号为泰始（265～274年），以洛阳为都城，史称西晋，司马炎是为晋武帝。

晋武帝建立西晋后，于咸宁五年（279年）乘吴国暴君孙皓倒行逆施，政治极度黑暗之时，举大军攻灭吴国，统一了全国，结

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但由于晋武帝治国政策的失误以及其他历史条件，西晋只短暂地统一了 37 年，以后出现了更长时期的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的战乱时期。

第二节　西晋治国方针的失误及其灭亡

一、优容士族的占田荫户制

西晋的建立者司马氏是河内温县的世家大族，其代魏称帝是在当时各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实现的。因而西晋建立后，在治国方针上实行的是优容士族的政策，这一政策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占田荫户制。

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和户调式包括以下内容：

男子一人占田 70 亩，女子 30 亩。丁男（男女年 16 至 60 岁为正丁）课田 50 亩，丁女 20 亩。次丁男（男女年 15 以下至 13 岁，61 至 65 岁为次丁）课田 25 亩，次丁女不课。每亩课田交纳税谷约 8 升。

凡是丁男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 3 匹、绵 3 斤。次丁男及丁女立户的，交纳半数。边郡民户交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远者交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纳賨布，每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士族官僚有权按官品高低占田：一品官可占田 50 顷（每顷 100 亩），以下至九品官每品递减 5 顷，九品官可占田 10 顷。从占田数目上看，士族官僚的占田大大超过平民百姓。实际上，上述规定士族官僚所占有土地的限额，乃是西晋王朝依照官品重新给予他们的土地，而不是他们私有土地的限额①。占田法是优容士族官僚的一项制度。

① 参阅朱大渭《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西晋的荫户制是与占田法相辅相成的另一项优容士族的制度，所荫人户可以免除国家赋役租调，归士族官僚所役使。按荫户制规定，士族官僚可以依官品高低荫庇亲属，少者三世，多至九族。宗室、国宾、圣贤后裔及士人子孙，也可同样荫庇亲属。此外，士族高门还可以荫庇衣食客及佃客。六品官以上，可以荫庇衣食客三人；七品、八品可荫庇二人；九品及侍从武士等可荫庇一人。一、二品官可荫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各一户。客户受主人地租剥削，一般纳对半开的分成制地租。

占田荫户制，从法律上保证了士族高门占有大批土地和各类私附人口的合法性，而对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的限制作用都很微弱，因而它是一项从根本上保护士族官僚经济利益的制度。

二、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

九品中正制和门阀制度，是西晋王朝在政治上优容士族官僚的一项措施。九品中正制肇始于曹魏初期，是通过评定人才优劣来选拔官吏的选举制度。它的具体办法是在各州郡设置大中正或中正，负责考察本州郡的士人，综合他们的家世门资和德才，评定出"品"与"状"，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吏部选官时，便可根据士人的品位授与相应的官职。其中大中正和中正一职，由本地区在中央任职的官员担任。九品中正制推行初期，尚能综合家世与德才定品，但后来由于中正一职皆由士族高门充任，从而在评品时使高品全为士族所把持。到西晋时，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在政治上垄断高官显职的工具。

晋武帝一方面实行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的特权，另一方面

---

① 《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对于曹魏时期的世家大族尽力笼络，以求得他们的支持，以便巩固自己的统治。因而曹魏的故旧大臣、名门望族，在西晋时多数继续得到重用，并享有各种封建特权。晋武帝推行上述统治政策的结果，使西晋朝开始形成门阀政治。

曹魏以来的士族高门，在西晋优容士族的政策下，累世居于高位，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①，从而也就出现了高居庶族地主及一般士族之上的第一流门阀士族。他们有着种种封建特权，在政治上累世居于高位，有权有势；在经济上享有占田荫户等优待，经济来源丰裕；在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耻于与庶族寒门通婚和来往。总之，他们是高居于百姓及统治阶级中下层之上的特权阶层，晋廷以保护和加深其特权为目的的治国政策，便称为门阀政治。由于门阀士族坐享各种封建特权，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缺乏实际才干，追求斗富享乐，穷奢极欲，因而他们很快便在安逸奢侈的生活环境中腐化了。高门士族掌权的西晋朝廷，也随着其生活腐化，政治也趋向腐败。

三、宗王出镇与“八王之乱”

西晋初年，晋武帝君臣认为曹魏之所以失国，是因为没有分封诸王，宗室衰弱的结果。因而晋武帝即位之初，立即分封宗室二十七王，同时又以宗王出任重要州镇的都督，以巩固司马氏政权。由于王国在晋初没有真正建立，而且王国的军队很少，所以司马氏控制地方的力量主要在于出镇方面的宗王都督。泰始年间（265～274年）担任都督的宗王有：汝阴王司马骏、太原王司马瓌先后都督豫州；扶风王司马亮都督雍、凉；琅邪王司马伷都督兖州；汝阴王司马骏都督扬州②。上述诸州都是当时军事重镇，宗王出任这些地方的

① 《晋书》卷九十二《文苑·王沈传》。

② 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都督，对于当时巩固司马氏的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晋咸宁三年（277年），西晋朝廷使诸王就国，并使出任都督的宗王移封就镇，这时宗王出镇的大体情况如下：

汝南王司马亮（改封）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豫州诸军事；

赵王司马伦为都督邺城军事；

太原王司马辅为监并州诸军事；

琅邪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

扶风王司马骏都督雍州诸军事。

此后，西晋王朝继续推行以宗王出任都督的军事政策。西晋王朝使宗王出镇的做法，本意是想以此巩固晋室统治，但后来却适得其反，出镇方面的宗王都督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且居于重要的地理位置，从而争权夺位，挑起兵祸，直接引发了“八王之乱”。

西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晋惠帝是个白痴，皇太后之父杨骏以太傅辅政。惠帝皇后贾南风不满杨骏专权，于元康元年（291年）春与楚王司马玮合谋，杀杨骏及其弟杨珧、杨济，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随后，朝廷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皆录尚书事，共执朝政。同年夏，贾南风为专朝政，矫诏使司马玮杀掉司马亮和卫瓘，随即又以擅杀大臣罪杀司马玮，终于将朝政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西晋宗室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便由此开始。

“八王之乱”中的八王，是指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

元康六年（296年），赵王司马伦入京师任车骑将军、太子太保，他谄事贾后，深受信任，被委任为右军将军，执掌禁军。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废惠帝太子司马遹，接着又将他杀掉。赵王司马伦利用禁军将士对贾后杀害太子的不满情绪，杀贾后及其亲信大臣张华、裴頠等人，自任使持节、大都督、都中外诸军事、相国，独揽大权。次年正月，司马伦又废掉惠帝，自己称帝。

司马伦称帝引起其他宗王不满，永宁元年（301年）三月，齐

王司马冏、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四月，司马伦军屡败，其右卫将军王舆联合广陵公司马漼举兵杀孙秀等，迎惠帝复位。惠帝复位后，尽杀司马伦父子和党羽，以司马冏为大司马、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共同辅政。这次作战历时60余日，战斗死者近10万人。

时过不久，因皇位继承人选问题，成都王司马颖、长沙王司马乂、河间王司马颙、齐王司马冏之间又发生矛盾。太安元年（302年）十二月，司马颖、司马颙、司马乂等各自起兵，同会京师洛阳，以讨伐司马冏。司马冏失败被杀，同党皆夷三族，死者2000余人。司马乂任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掌朝政。

太安二年（303年）八月，司马颙与司马颖又联合起兵讨司马乂，双方参战总兵力达30余万人，在洛阳城外展开激战，结果司马乂战败，退回洛阳固守。次年正月，司空、东海王司马越与禁军将领联合拘执司马乂，置金墉城。司马颙部属张方捉乂，以火烤烧致死。司马颖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居于自己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遥控朝政。司马颙任太宰，仍居所镇之地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永兴元年（304年）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又奉惠帝亲征司马颖，结果被颖大将石超大败，惠帝被俘至邺城。司马颙将张方乘机进入洛阳。八月，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司马腾进兵攻破邺城，司马颖挟惠帝败逃洛阳。十一月，张方劫持惠帝及司马颖至长安。诏司马颖以成都王还第，太宰司马颙与司空司马越共辅帝室。

永兴二年（305年），司马越起兵进攻司马颙，次年攻入长安。越以诏书征颙为司徒就道，南阳王模遣将梁臣杀颙于新安。此前，司马颙派司马颖往邺城镇守，范阳王司马虓长史刘舆捕杀颖及其二子。于是司马越任太傅、录尚书事，独揽大权。历时16年其中激战7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宣告结束。

四、西晋在内乱中灭亡

“八王之乱”使西晋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为削弱，从根本上动摇了统治基础。同时在宗王混战中，有的拉拢少数民族武装参加混战，使得各少数民族贵族武装扩大，并乘机进入中原窥伺皇位，西晋王朝很快便在内乱与外患中灭亡了。

光熙元年（306年）十一月，晋惠帝被执政的司马越毒死，其弟司马炽继立，是为晋怀帝。

永嘉二年（308年），早已拥兵起事的匈奴贵族刘渊称帝，建国号为汉，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当时起兵的羯人石勒、汉人王弥等都归附刘渊，共同向西晋政府发动连续不断的进攻。永嘉四年（310年）十一月，司马越在石勒等军的巨大压力下，被迫放弃洛阳，率精兵4万向东南撤退，企图返回自己的镇地豫州自保，朝中王公大臣随行者甚众。次年三月，司马越行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忧惧病死。襄阳王司马范、太尉王衍续统其众。这支军队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时，被石勒大军追及，石勒纵骑兵围而射之，晋军互相践踏，王公将士死者10余万人。至此，西晋仅存的主力军也被消灭。不久，出奔东海王司马越之丧的世子司马毗，以及宗室四十八王尽被石勒消灭。六月，刘渊族侄刘曜与王弥、石勒等军攻陷洛阳，将晋怀帝俘至平阳。至此，西晋王朝已名存实亡。

建兴元年（313年）二月，晋怀帝在平阳遇害。在长安的晋雍州刺史麴允等人，拥立秦王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刘曜率大军攻破长安，俘愍帝至平阳，西晋灭亡。

第三节　东晋的内乱及其被取代

一、东晋的建立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觐的儿子，15 岁时袭封琅邪王。西晋末，东海王司马越北上参与诸王争斗，将其军事重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交由睿镇守。不久，司马越又迁升他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使其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为自己退守江南预作准备。

司马睿和当时著名大族琅邪王氏关系密切，他移镇建邺后，得到了以王导、王敦为首的北方士族高门的全力支持，由此也受到本来持观望态度的江东士族高门的拥护。东晋王朝正是在南北世家大族的拥戴下建立起来的。

建武元年（317 年）二月，晋愍帝被刘曜俘虏的消息传至建邺。三月，司马睿称晋王，改元建武，定宗庙社稷于建康（建邺避晋愍帝司马邺之讳改）。次年二月，晋愍帝死讯传至建康，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定都建康，改元太兴（318～321 年），史称东晋。

二、王、庾、桓、谢轮流执政

东晋政权是在南北门阀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当时士族制度已经发展到顶峰，东晋朝廷实行的是典型的门阀政治，朝政为几家大士族轮流掌管。从南北门阀大族的地位来说，北方门阀大族在东晋政权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而江东门阀大族却处于次要地位，其权势远逊于北方门阀大族。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出现了北方士族王、庾、桓、谢四家轮流执掌朝政的局面。

东晋初期的政治格局，是琅邪王氏与皇室司马氏共执朝政，即当时所谓的“王与马，共天下”。在晋元帝建立东晋的过程中，琅邪

王氏的代表人物王导、王敦等人起了重要作用,因而东晋建立后,晋元帝使王导以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辅政,以王敦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加荆州刺史,总统建康上游诸军事。王氏兄弟一内一外,完全控制了东晋军政大权。晋元帝徒有皇帝之名,以至在元旦朝会时,竟欲请王导同登御座,共受群臣拜贺。由于王氏权势逼人,与晋廷矛盾逐渐激化。于是晋元帝信用丹阳尹刘隗、尚书令刁协等人,对王导逐渐疏远。太兴四年(321 年),晋元帝任命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属安徽),丹阳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今江苏淮阴西南)。两地驻军皆以讨胡为名义,实际上是为防御王敦作的布置。

王敦对此不能忍受,于永昌元年(322 年)以诛奸臣刘隗为名,自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进攻建康。王敦不久便攻入建康,杀戴渊、周顗等人,刘隗逃往北方。晋廷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王敦仍回武昌遥控朝政。晋元帝忧愤而死,其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晋元帝迫于王氏权盛,临死仍只好遗诏令王导辅政。当时王敦居武昌遥控朝政,王导任尚书令、司徒辅政,王氏其他子弟亦都身居要职。如王敦兄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其从弟王舒为荆州刺史,王彬为江州刺史,王邃为徐州刺史。后王敦又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王氏势力达到极盛。

太宁二年(324 年),王敦身患重病,晋明帝乘机下诏讨伐王敦。王敦起兵与明帝对抗,命王含为统帅,率军进攻建康。王含军至建康,被中军司马曹浑等军击败。王敦闻知败讯,随即病死。明帝尽诛王敦一党,王敦之乱宣告结束。王敦虽已败亡,但王氏势力却未因此而衰。王敦叛乱平定后,明帝仍以王导居中辅政,并由司徒进位为太保,王氏子弟王舒、王彬等仍居显职。王氏专制朝政的局面在东晋维持了 20 余年之久,直至庾氏兴起后,王氏在政治上方退居庾氏之后。

庾氏指颍川与帝室联姻的一房，它是兴于魏晋之间的世家大族，西晋末年战乱时避乱江南。东晋明帝时，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庾亮，以明帝皇后之兄的身份，受到重用，任职中书监，与王导共执朝政。自王敦失败后，庾氏势力渐盛。咸和七年（332 年），庾亮迁任都督江、荆、益、豫、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镇武昌。庾亮虽居外镇，仍遥控朝政，手握强兵，雄踞京师上流，当时为文武百官所趋附，庾氏势力显对王氏构成威胁。居于建康的王导，在遇到西风时，常用扇遮尘，并不平地说："元规（庾亮字）尘污人"①。武昌在建康之西，王导以此喻指庾亮势力逼人。咸康五年（339 年），王导病死，晋廷大权尽入庾氏之手。咸康六年，庾亮病死，其弟庾翼代任其职，仍镇武昌。永和元年（345 年），庾翼也因病死去，桓氏势力崛起，庾氏随之衰落。

桓氏是谯国(治今安徽亳州)高门，西晋末年过江。桓氏代表人物桓彝被当时尚未称帝的司马睿辟为掾属，后居名臣之列②。桓彝之子桓温才干过人，是明帝女南康公主驸马。庾翼死后，桓温出任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永和二年(346 年)，桓温出兵灭亡割据巴蜀的成汉，威望渐重。随后，桓温又先后于永和十年(354 年)、永和十二年、兴宁元年(363 年)三次北伐，主要目的是以军事胜利树立威望，伺机篡夺东晋政权。桓温的前两次北伐战功显赫，由此官至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扬州牧，大权独揽。咸安元年(371 年)，桓温为进一步立威，废掉废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为帝，即简文帝。次年，简文帝死，临终遗诏桓温依王导故事摄政。桓温本以为简文帝将禅位于己，对仅让他摄政大为不满，上疏请求加九锡，准备篡晋。当时桓温已重病在身，居中执政的谢安、王坦之等故意拖延，迟迟不予作答。宁康元年(373 年)七月，桓温病死，司马氏得以保住了帝位。桓温死后，桓氏势力大减，但不曾完全衰落，

---

①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

② 《晋书》卷六《明帝纪》："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

其弟桓冲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3州诸军事，扬、豫2州刺史；桓豁为征西将军，督荆、扬、雍、交、广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桓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谢氏是陈郡高门，西晋末年避乱江南。建元二年(344年)，谢氏代表人物谢尚出任南中郎将、后督豫州四郡军事，领江州刺史。不久转任西中郎将、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谢氏势力逐渐崛起。谢尚从弟谢安被桓温辟为司马，后拜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显职，权势渐重。桓温临终前欲篡晋祚，只因谢安和王坦之等在朝中主持事务，多方拖延阻止，才保住了东晋王朝。桓温死后，谢安迁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后总理中书省事，执掌朝政。后又加领扬州刺史，迁中书监、录尚书事。太元八年(383年)，谢安遣从子谢玄与子谢琰统东晋精卒北府兵在淝水大破前秦苻坚30余万大军。晋廷进安太保，都督扬、江、荆等15州军事，加黄钺。谢安虽控制了朝政大权，但因其权势过重，受到朝廷猜忌。太元十年(385年)，他被迫请求北征，出居广陵(今江苏扬州)，当年死去。东晋王室司马道子出任扬州刺史、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控制了朝政，谢氏掌权的局面遂告结束。但这时离东晋灭亡，已经为时不远了。

三、偏安一隅和宽容士族的传统国策

东晋是典型的门阀政治，这就决定其治国所实行的必然是偏安一隅不图进取，以及优容宽惠士族的政策。

纵观东晋一朝，执政者大多满足于偏安的局面，治国举措唯在自保。晋室南渡初期，晋元帝忙于稳定东晋统治，无力北顾。此后，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各派势力争权夺利，根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没有谋求恢复中原的长远规划。即便有个别人真心从事北伐，因受各种牵制很难成功。再如桓温北伐，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以图代晋。在这种动机下，自然也不可能全力进行北伐。同时北方士族大批南渡后，经过多年的掠夺与

经营，大多在南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过着腐化享乐的奢侈生活，不再想通过艰苦的奋斗，回归故园。如高门王羲之就曾主张“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①。因此，东晋各代执政者，基本上奉行的是偏安江南的国策。

南北士族地主在东晋朝廷的纵容下，广占田园山泽。史称：“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②。南方士族地主世居江南，历来势力强大，在孙吴统治时已经是“势利倾于邦国，储积富于公室”③。东晋政权当然不会触犯他们的利益。侨居士族为了扩大土地和劳动人手，到处“求田问舍”。因而南北士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人手。如王导一次即得到皇帝赐给的建康近郊良田 80 余顷。王羲之的田业分布在会稽、吴兴等地，谢安的田业分布在会稽、吴兴、琅邪各处。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④。南北士族不仅占有大片良田山泽，而且占有大量的劳动人手，并得到朝廷法律的认可。东晋政权为了优裕士族，沿袭曹魏以来赐客、复客和荫户的传统，实行给客制度，其规定：官品第一、第二可占有佃客 40 户，以下每品递减 5 户，至官品第九者可占 5 户，佃客所收获的粮食与主人“量分”，其户籍附于主人家籍之上，不负担国家赋役。此外，士族还可按官品占有典计、衣食客等人户，待遇与佃客相同。实际上，由于士族有荫客荫亲属的特权，所以他们占有的各类私附人口，远远超过上述数字。如王彪之为会稽内史，在任 8 年，大力搜括豪强隐匿人口，得 3 万余户，相当于全郡总民数的五分之一，由此可见士族私附人口的数量之多。

政治特权是经济特权的保障。东晋用人因袭西晋九品中正制，高门士族大多世代居于显位，垄断高官美职。东晋最高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高门士族手中，他们欺压百姓，胡作非为，全不受法

---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②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③ 《抱朴子·外篇》卷三十四《吴失》。

④ 《宋书》卷五十八《谢弘微传》。

律约束。因而东晋政治腐败，赋役繁苛。当时人评论东晋政治腐败说："竟无一功可论，一事可记，忠言嘉谟弃而莫用，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①。这是士族门阀极端腐朽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

四、东晋的内乱及其被取代

东晋在王、庾、桓、谢四大家族轮流执政以后，朝政大权落入当时在位的孝武帝之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手中。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晋安帝"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②。他是个白痴，大权落入以太傅辅政的司马道子手中。司马道子残暴昏庸，贪财奢侈，"官以贿迁，政刑谬乱"③。于是东晋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政治形势急剧恶化。

隆安元年（397年），南兖州刺史王恭、荆州刺史殷仲堪不满司马道子引用太原士族王国宝排抑异己的做法，以诛王国宝为名起兵进攻建康。司马道子无力抵御，被迫杀掉王国宝，使王恭退兵。次年，王恭又起兵进攻建康，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广州刺史桓玄等皆起兵响应。司马道子使其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率兵讨伐。司马元显诱说王恭前锋、北府兵名将刘牢之倒戈，击败王恭，又对桓玄等人施分化利诱策略，暂时平息了这场变乱。桓玄与殷仲堪、杨佺期等人结成同盟，占据长江中游地区，刘牢之代王恭为兖州刺史，控制长江下游地区，朝廷直接控制的只有会稽、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南）、永嘉（治今浙江温州）、东阳（治今浙江金华）、新安（治今浙江淳安西北）、吴（治今江苏苏州）、义兴（治今江苏宜兴）等东土诸郡。本来东土诸郡为南北士族聚居之地，当地人民所受压迫剥削极为沉重，而这时

---

①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② 《晋书》卷十《安帝纪》。

③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国家财政负担几乎全部压在这一地区的百姓身上，浙东地区成为各类社会矛盾的焦点。当时统治阶级之间进行的内战，使得阶级矛盾激化起来，一场动摇东晋统治的人民起义，终于在浙东地区爆发了。

隆安三年（399年）十月，掌握朝廷大权的司马元显为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征发东土诸郡本为奴隶后被放免为佃客的人为兵。以这次征兵令为导火线，直接引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人民起义，义军给予东晋政权以沉重打击。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北府兵低级将领出身的刘裕逐渐窃据了东晋大权。

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完全控制了东晋朝政的刘裕逼迫晋恭帝司马德文禅让帝位，自己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建元永初（420～422年），刘裕是为宋武帝。腐败的东晋王朝，终于被刘宋所取代。

第二章　两晋的军制

第一节　中央和地方军事领导体制

一、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曹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西晋。西晋建立后，晋武帝司马炎以皇帝身份亲自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直接领导和指挥全国军队。同时，晋武帝另设尚书省为全国行政中枢，协助他掌理军政事务。此时的尚书省六曹尚书，没有主管兵事的尚书，但尚书诸曹郎中有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等曹郎，主管兵事日常工作。西晋灭吴后，晋武帝在尚书省六曹尚书中设置五兵尚书一职，其下再设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别兵、都兵、骑兵等曹郎，主管全国军政事务。此后直至东晋，五兵尚书历朝沿置，成为两晋主管全国军事日常事务的国家军事领导机关①。

中书省也是两晋历朝沿置的官署，由于它接近君主的特殊身份，对于军国大事的谋划、决策常可参预，因此也可视其为皇帝身边的军事决策机构。

晋武帝代魏称帝后，为优宠高门大族，设置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等八公。八公中的太尉、大司马、大将军，都是汉魏时期掌管全国军政事务的高级武官，此后直至东晋，历朝大体都设有此类职衔。一般情况下，两晋期间这一类职衔常为虚职，地位虽高，却未必握有军政大权。但有时亦有实权，如西晋贾充，就曾以太尉身份出任大都督，总统灭吴大军。及至东晋，更

---

①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常有权臣以此类职衔兼都督中外诸军事操纵朝政。

两晋时期，设有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任此职者，有权指挥全国军队，职权甚重。西晋初年，晋武帝曾以宗室司马孚任此职。八王之乱时，宗室诸王先后出任此职控制朝政。东晋时，任此职者大多为权臣。

西晋设中领军，资望高者为领军将军，统率京城内禁军。又设中护军，资望高者为护军将军，统率驻守在京城外的禁军。如贾充转中护军，“统城外诸军”①。司马允领中护军，仍统率“宿卫将士”②。东晋初年温峤说：“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屯田）”③。似护军仍统京城外宿卫军。大约至东晋后期，中领军专管京城内外宿卫军；中护军管中央驻守在地方要镇的军队，故称统外军。

两晋中央各级军事领导机构，都要按照君主的诏令行事，即便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从名义上也是代替皇帝行使军事权力。至东晋时，门阀轮替执政，权臣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凭借其掌握中外军事大权，独掌朝政，皇帝反而变为傀儡。东晋权臣多次叛乱，都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

二、地方军事领导机构

两晋的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主要是都督及州郡军政系统。西晋建立后，沿袭曹魏旧制，在辖区内设置都督，及至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吴后，又将都督制推行至江南。晋室南迁后，亦在辖区各地设置都督。魏晋时，有的都督已兼刺史，既统军又治民。太康三年（282年），晋廷曾一度罢州郡兵，实行刺史不领兵，军民分治的政策。晋惠帝时又实行军民兼治的政策，以后都督兼刺史普遍化，

---

①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② 《晋书》卷六十四《淮南忠壮王允传》。

③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

形成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刺史领兵制①。两晋时期，都督所督地区少者一州，多者数州，东晋时甚至有督十余州者。任都督者皆兼刺史，主管一方军政，为所督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都督虽要听命于朝廷，但其军事实权很大。据《宋书·百官志》记载："晋世则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由此可见，两晋持节都督府是极为重要的地方军事机构。

两晋另一地方军事领导机构是州郡行政系统。

两晋的州郡地方行政机构，设有州郡兵，归所属州郡长官统辖。因此，州郡行政系统也是一级地方军事领导机构。由于两晋州郡兵数目有限，作用也远逊于其他部分的军队，州郡行政系统的地位大大低于都督府。州郡系统中，具体掌管军队是州刺史和郡太守。州刺史与郡太守之下，还有协助其掌管军事的各种僚属。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州郡常被归入有关都督统辖之下，其州郡兵属该都督统率，这时该州郡行政系统的军事领导机构的作用便更加减弱了。

第二节　两晋军队体制

晋代的军队主要由中军、外军两部分组成，另有所占比重很小的州郡兵。

一、中　军

中军，指驻扎于京师地区的中央直属军队。西晋的中军分为驻于京城之内的宿卫军及驻于城外拱卫京师的牙门军两部分②。

---

① 《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

② 参阅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载《读史集》。

西晋的中央宿卫军以六军为主，另外又有四军、六校、二营等建制。

所谓六军，即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六将军所领军队。领军将军又称中领军将军，本为曹魏旧官，总统宿卫诸军。晋武帝称帝后，改中领军为中军将军，仍统宿卫诸军。《晋书·羊祜传》记载说："（羊祜）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所以同书《职官志》中领军将军条云："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卫等营，即领军之任也。"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改中军将军为北军中候①。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年），又改为中领军将军。此后及于东晋，此任或称北军中候，或称领军将军，变换无恒②，但其职权基本不变。西晋领军将军除统帅中央宿卫诸军外，自己也领有营兵，参与京师宿卫。但到东晋时，领军将军"不复别置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③。护军将军亦为曹魏旧官，职掌武官选举，兼为宿卫诸军统帅，但其地位稍低于领军将军。西晋建立后，晋武帝仍设护军将军一职掌管宿卫。此后直至东晋，护军将军都领有营兵，宿卫京师。左卫、右卫二将军所统是晋代宿卫军的中坚，为宿卫诸军中最重要而又最亲近皇帝者。左、右二卫是由晋武帝的父亲司马昭在曹魏任相国时的相府中卫军蜕变而来。《宋书·百官志》记载说："晋文帝（司马昭）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武帝初，分中卫置左右卫将军，以羊琇为左卫，赵序为右卫"。左、右二卫将军各领营兵，职掌宫廷宿卫，他们二人要轮流值宿宫廷。左、右二卫将军之下的宫廷宿卫兵，有前驱、由基、强弩三部司马。左卫，熊渠武贲；右卫，佽飞武贲。又置羽林、上骑、异力、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等多种名目。骁骑、游击二将军，本为汉代的

---

①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②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③ 《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

杂号将军，曹魏时始入宿卫军之列。西晋建立后，保留骁骑、游击二将军之职，使其各领营兵，职掌京师宿卫。以上六军，是晋代宿卫中军的主力。

所谓四军，指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四将军所统军队。曹魏时曾有左军将军一职。晋武帝称帝后，又先后置前军、右军、后军三将军，合称四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四将军各统营兵，职掌京师宿卫。《晋书·郭默传》云："右军主禁兵。"其他三军职掌应同于右军。晋惠帝时外戚大臣杨骏辅政，自任前军将军，又以其党刘豫任左军将军，其甥张劭任中护军。因此《晋书·杨骏传》说："骏又多树亲党，皆领禁兵。"四军将军府皆置于京师之内①。

所谓六校，指汉代以来的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五校尉及晋代新设置的翊军校尉营。晋武帝称帝后，保留汉魏传统的五校尉，并于太康元年(280年)设置翊军校尉一职。史载："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濬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为营"②。六校尉各领营兵，职掌京师宿卫。据《职官要录》说："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案晋官。晋承汉制，以为宿卫官，各领千兵"③。《晋书·职官志》也说："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六校尉府皆在京城之内，史称："五营校尉、前后左右将军府，皆在城中"④。翊军校尉既班同五校尉，则亦应驻于城内。

二营，即积弩、积射。积弩、积射二将军为西晋始设。史称："晋太康十年立积弩、积射营，各二千五百人，并以将军领之"⑤。《宋书·百官志下》记载此事说："晋太康十年，立射营、弩营，置

---

①④ 《文选》卷十六《潘安仁〈闲居赋〉》"其西则有元戎禁营"句注引陆机《洛阳记》。

②③ 见《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二《职官部》翊军校尉条引王隐《晋书》。又《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云："濬至京都……拜濬辅国大将军，领步兵校尉。旧校唯五，置此营自濬始也"。此处前云步兵校尉，后又谓"旧校唯五"。显系有误，当以王隐《晋书》为准。

⑤ 《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二《职官部》三十七积弩将军条。

积射、强弩将军主之”。可见此二营是晋武帝为加强宿卫兵的实力而增设。《宋书》称积弩将军为强弩将军，但《晋书·孟观传》载孟观“迁积弩将军，封上谷郡公”。大概是同一官职的不同称呼。

上述诸军为晋代的宿卫中军，其中以六军为主力，而又以左、右二卫最为重要而亲近皇帝，领军将军则为宿卫中军之统帅①。西晋的宿卫中军兵力雄厚，从上引史料看，六校各领千人，积弩、积射二营各领二千五百人，而四军也是各领千人。此外，作为宿卫诸军主力的六军，其兵力当多于四军、六校。因此西晋宿卫军的总兵力有数万之众。西晋赵王司马伦作乱时，自任相国，“增相府兵为二万人，与宿卫同”②。这里谓宿卫兵为二万人，是指与相府相对而言，故所指应为宫廷宿卫兵，而不包括京师之内不负担宫廷宿卫的其他宿卫兵。所以《晋书·刘琨传》云：“（司马伦）以琨为冠军、假节，与孙秀子会率宿卫兵三万距成都王颖”。此处所说宿卫兵 3 万，则不仅是指宫廷宿卫兵，而是包括京师之内的宿卫兵。西晋的宿卫兵不仅数量多，战斗力也非常之强。西晋初年，关中氐帅齐万年起义，众至数十万，诸军相继溃败。于是晋廷派积弩将军孟观出讨。孟观“所领宿卫兵，皆矫捷勇悍，并统关中士卒，身当矢石，大战十数，皆破之，生擒万年，威慑氐羌”③。又八王之乱时，河间王司马颙命都督张方率精卒七万进攻洛阳。长沙王司马乂率“中军左右卫击之，方众大败，死者五千余人”④。西晋的宿卫中军数量众多，战斗力强，可以说是西晋军队中的精锐。

此外，西晋时太子东宫亦设有宿卫兵。晋武帝代魏，太子东宫始置宿卫兵，设太子中卫率一职统带，负责东宫宿卫。泰始五年（269 年），又分为左、右二卫率，使其各领一军。晋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又增置前、后二卫率。后成都王司马颖为皇太弟，又置中

---

① 参阅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载《读史集》。

② 《晋书》卷五十九《赵王司马伦传》。

③ 《晋书》卷六十《孟观传》。

④ 《晋书》卷五十九《河间王司马颙传》。

卫率，加上左、右、前、后四卫率，是为太子五卫率。太子五卫率各掌一军，职典东宫宿卫。由于太子的储君身份，东宫宿卫兵的兵力也比较雄厚。愍怀太子时，东宫宿卫兵多达万人。

中军的另一部分是驻扎在京城之外的牙门军。

西晋初年，京师洛阳聚集了大量的精锐部队。这种现象是在曹魏末年专权的司马氏为加强自己的军权及实力而聚强兵于京师的结果。早在司马昭任相国时，就曾以亲信中护军贾充"统城外诸军"①。后司马炎在代魏称帝的前夕，又"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②。既须四护军统领，可见当时城外军队之多。西晋初年，晋武帝检阅中军，"以三十六军兵簿令（司马）柬料校之"③。可知当时京师共有三十六军。这三十六军除去宿卫兵外，皆为驻扎在京师城外之军。城外诸军称为牙门军。《晋书·荀顗传》记云："寻加侍中，迁太尉、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牙门军的职责是驻扎在京城附近，拱卫京师。

由宿卫军和牙门军组成的中军是西晋军队的主力。其兵力雄厚，战斗力强。中军总兵力的数量史无明文记载，但从魏晋间的几次出兵看，总数当在十万以上。如曹魏末年，司马氏出讨叛将毌丘俭、文钦，"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④。中军的职责是平时宿卫及拱卫京师，战时出征作战。

西晋后期出现连续不断的战乱，司马氏"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⑤，强大的中军损失殆尽。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时，中军势力很弱。

东晋建立后，中军的体制及官职大体如西晋，仅其中六校中的翊军校尉被废⑥，但中军的整体实力已大不如前。由于东晋局促

---

①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②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③ 《晋书》卷六十四《秦献王司马柬传》。

④ 《晋书》卷二《景帝纪》。

⑤ 《晋书》卷五《史臣曰》引干宝《晋纪·总论》。

⑥ 见《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太子翊军校尉条。

于东南一隅，人力物力有限，中军力量始终不强，当时虽设有大体如西晋中军的一套编制，但各位宿卫将领手下的兵员有限，有时甚至处于有官无兵的状态。如东晋王敦之乱时，京师建康“宿卫寡弱”①。当时朝议军国要务，前将军温峤曾建议“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又说：“三省军校无兵者……粗计闲剧，随事减之”②。可见当时四军、五校等宿卫将领不少是有将无兵。又据《晋书·刘超传》载，刘超在成帝朝任射声校尉，“时军校无兵，义兴人多义随超，因统其众以宿卫，号为‘君子营’”。东晋哀帝时，于朧将右军、前军、后军将军及五校三将等官废置③。及至东晋简文帝时，吏部尚书王彪之上疏云：“宿卫之重，二卫任之，其次骁骑、左军各有所领，无兵军校皆应罢废”④。可见东晋建立50余年后，宿卫中军的状况仍没有什么改变。由此知东晋宿卫中军除二卫等重要军营外，大部分已形同虚设。东晋中军兵力寡弱，其总兵力的数量，据王敦之乱时，丞相王导写信给叛将王含说：“导所统六军，石头万五千人，宫内后苑二万人，护军屯金城六千人”⑤。依此，则有宿卫将士四万余人，但王导此信意在劝降，必有所夸大之处，不全是实数。从东晋几次出兵及平定叛将皆依赖方镇等情况看，东晋中军的总兵力大约不过二三万人。由于东晋中军兵力微弱，形成君权衰弱，所以多次出现方镇起兵向阙，或权臣专政的局面。

二、外 军

外军是与中军相对而言，系指驻于京师之外而分布全国各地的军队。两晋的外军包括都督领有的军队、王国兵及州郡兵等。

---

①②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

③ 《晋书》卷八《哀帝纪》。

④ 《晋书》卷七十六《王廙传附王彪之传》。

⑤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都督所领军队是外军的主要部分。都督制肇始于曹魏，《宋书·百官志》记载说："持节都督，无定员……建安中，魏武帝为相，始遣大将军督军。二十一年，征孙权还，夏侯惇督二十六军是也。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始置都督诸州军事，或领刺史"。据上述记载，魏武帝曹操遣大将军督军是为都督的起源，而至黄初二年，都督制已经正式定型①。西晋建立后，沿曹魏旧制，仍在全国实行都督制。据考证，早在代魏之前，司马氏先已作好布置，分派子弟出任几个重要地区的都督。至司马炎代魏后，于泰始元年（265年）大封诸王，并使他们继续出任重要地区的都督。当时借以巩固司马氏政权的军事力量，除了洛阳的中军以外，就是依靠以宗王及亲信掌握的都督所领军队。

西晋时，主要的都督区有如下8个：

关中都督，镇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

幽州都督，镇蓟城（今北京西南）；

荆州都督，镇襄阳（今湖北襄樊）；

沔北都督，镇宛城（今河南南阳）；

豫州都督，镇许昌（今河南许昌东）；

冀州都督，原称都督邺城守，镇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后改称冀州都督，镇信都（今河北冀州）；

青徐都督，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

扬州都督，镇寿春（今安徽寿县）。

上述8都督区中的关中、豫州、冀州、青徐，乃是曹魏末年即由司马氏子弟出任都督的地区。

西晋都督受君命出镇一方，并要随时接受朝廷的征调和指挥，其所统军队在性质上属于由朝廷调遣驻扎在地方要镇的中央军。都督在官职地位及权限上分为三等。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西晋初期，有的都督兼任所督之地的州刺史。至太康三年（282年），晋武帝曾

① 参阅唐长孺《西晋分封与诸王出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一度罢州郡兵，实行刺史不领兵，军民分治的政策。所以《南齐书·百官志》说："晋太康中，都督知军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则单为刺史。"西晋末都督兼任刺史普遍化，因而都督成为一方的军政长官，其权势更重。司马氏宗室之间发生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就是在都督制基础上发生的，诸王混战中的主要人物，却正是都督豫州的齐王司马冏、都督冀州的成都王司马颖、都督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和都督青徐的东海王司马越。这场混战，导致了西晋王朝的崩溃，司马氏旨在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措施，结果却走向了反面。

八王之乱后，晋武帝太康年间实行的都督治军、刺史治民的政策被打破，这时的都督兼任刺史成为通例，"盖有不治军之刺史，而无不治民之都督"①。他们既掌一方军事，又治一方百姓，成为所督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除此以外，这时的都督区获得发展，已遍及全国。西晋都督所督地区少则一州，多则数州，尤其八王之乱后，有多达六州者，如西晋东海王司马越就曾都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领兖州牧。都督所领军队的数量不见于明确记载，但一般估计，当有数万之众。如八王之乱时，都督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举兵向阙，令其将张方"领精卒七万向洛"②。又成都王司马颖进兵讨伐赵王司马伦时，有"众二十余万"③。这其中虽有征集而来的其他地区的军队，但他自己原有军队自应不在少数。而齐王司马冏在移檄天下后，有"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④。上述几位都督领有的军队都比较多，大约是宗室都督的缘故。非宗室的一般都督，其所领军队似也应以万计。由此可知，全国除中军之外的外军，多达数十万之众。

八王之乱后，中央集权大为削弱。而与此同时，都督集一地

---

① 参阅《历代职官表》卷五十。

② 《晋书》卷五十九《河间王颙传》。

③ 《晋书》卷五十九《成都王颖传》。

④ 《晋书》卷五十九《齐王冏传》。

军政大权于一身，方镇势力急剧膨胀，中央对都督已无法控制，都督制发展成为中央政府的对立物。

东晋时期，沿西晋末年之制，都督遍设于辖区之内。东晋都督的名称、职权大体同于西晋，但由于东晋中央集权衰弱，各主要军镇地区的都督势力更大。由于东晋是门阀政治，都督制成为门阀士族与司马氏相对抗的工具，重要地区的都督常为门阀大族所把持。这时的都督军队名为国家的外军，实则已成为地方军队，有时甚至成为都督的私人武装。

东晋立国江南，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都，号称“江左大镇”的扬州成为东晋王朝的根本所在。与此同时，江南另外一些重镇便成为东晋主要的都督区。这些重镇主要有荆州、江州、徐州、豫州、益州等。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是与扬州并重的大镇，所谓“江左大镇，莫过荆、扬”①。荆州居于京师建康上游，故其地位更加重要，是东晋最重要的都督区之一。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为晋惠帝时分扬州十郡之地设，也素为江南重镇。《历代职官表》说：“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谷帛所资皆出于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②。而更重要的是，江州也居于京师建康的上游，是强镇荆州与扬州的缓冲地带。所谓“国之南藩，要害之地”③。徐州，先治广陵（今江苏扬州），后治京口（今江苏镇江）④。由于京口地处建康东北，故徐州都督又称北府。西晋末年以来，这一带是北来流民聚居之地，民风强悍，是强兵之所聚的地方。此外，它毗邻京师，是建康的东北面屏障，也是东晋最重要的都督区之一。豫州，自咸和四年（329 年）成立以来，先后以芜湖（今属安徽）、寿

---

① 《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

② 《历代职官表》卷五十。

③ 《晋书》卷八十一《刘胤传》。

④ 此处谓徐州，实际上徐、兖、青三州常如一体，任徐州刺史者，常都督青、兖、徐三州军事，有时或加领兖州刺史。

春（今安徽寿县）、历阳（今安徽和县）等地为治。豫州地处建康上游，是扼逼京师咽喉的要地。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地处长江上游，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自西晋以来便被视为重镇。除上述数镇外，东晋境内的各个地区，大都设有都督。

东晋时期，重要的都督区大多为大族权臣所掌握。如王敦曾在东晋初年任江州牧，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同时，王氏兄弟也各据重镇。此后的庾亮也曾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庾亮死后，弟庾翼代督江、荆六州诸军事，任荆州刺史。此后桓温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梁等四州诸军事，随后加督至八州。他在荆州，"虽有君臣之迹，亦相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①。桓温死后，桓氏子弟仍盘踞荆州，因而《晋书·桓石民传》说："桓氏世莅西土"。著名的北府徐州，也先后为王氏、谢氏等大族所控制。

东晋都督所拥有的军队随其大小强弱而各有不同，如以上所述的强镇兵力都很雄厚，而一般都督所领军队则比之相差甚远。东晋强镇的都督一般都拥有军队数万。如王敦作乱时，曾使其将钱凤等人"率众三万向京师"②。桓温太和四年（369 年）北伐时，有步骑 5 万。而这并不是他们麾下的全部军队。又如东晋著名的徐州北府兵，至秦晋淝水之战时，有精锐士卒 8 万，成为东晋战胜前秦大军的主力。北府兵是东晋中后期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它的趋向常能左右国家的政局，在此略作些介绍。西晋末年，北方流民大批南下，不少人居于广陵（今江苏扬州）、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由于这些流民"人多劲悍"，使这一带成为强兵所聚之地。东晋权臣桓温就认为"京口酒可饮，兵可用"③。桓温死后，大族谢安执政，为了加强拱卫京师建康的军事力量，并外御强秦，于太元二年（377 年）派其侄儿谢玄出任兖州刺史，筹建新军。谢

①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②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③ 《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附郗超传》。

玄到职后，立即招募劲勇，组织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由于京口位于建康之东北，号称北府，因此这支军队称为“北府兵”。北府兵的早期，由于谢氏忠于朝廷，所以它成为维护东晋政权的军事支柱。但后期另一大族王恭控制了北府兵后，由于他与中央政权发生矛盾，便依据手中军事实力起兵反叛。及至东晋后期，北府将领刘裕控制了北府兵后，更是借此篡晋自立。

总之，由于都督手中拥有众多的军队，而东晋中央政权军事力量寡弱，根本无力与之对抗。当司马氏与方镇势力相安无事时，都督军队可以起到维护东晋政权的作用，但当双方发生矛盾时，都督完全有条件举兵向阙，因此终东晋一代，多次出现方镇叛乱、权臣专政的局面。

王国兵也是两晋外军的一部分。西晋建立后大封诸王，同时规定王国可以置军。《宋书·百官志下》说：“（晋）大国又置上军、中军、下军三将军；次国上军将军、下军将军各一人；小国上军而已”。《晋书·职官志》又说：“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根据上述记载知道，西晋王国分为大、次、小三种，大国可置上中下三军，共 5000 人，次国可置上下二军，共 3000 人，小国仅置上军，兵 2000 人。西晋分封是在泰始元年（265 年），但当时诸王并未就国，因此也就无从置军。及至咸宁三年（277 年）诸王就国后，王国置军才成为现实。东晋时期，诸王亦有国兵，但由于东晋政权整个军事实力的衰弱，王国兵当已远逊于西晋时期。

州郡兵是外军的另一部分。西晋太康三年（282 年），晋武帝曾下诏罢州郡兵。但据唐长孺先生考证，这一作法实行了不足 10 年，即晋惠帝元康（291 年）年间后便遭到破坏，而且开始时也是“无事者罢其兵”，有事则不罢①。所以两晋时期，各州郡大体皆设有州郡兵。如西晋冯统任汝南太守，在伐吴之役时，“以郡兵随王

---

① 参见唐长孺《魏晋州郡兵的设置和废罢》，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濬入秣陵”①。西晋初，马隆请求自募勇士，公卿大臣认为：“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②。西晋末年，张寔也曾“命讨虏将军陈安、故太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韩）璞等前驱”③，东赴国难。各州郡兵归所属刺史、太守统带，平时维护社会治安，保证封建统治秩序，有战事时接受朝廷或所属都督调遣，出征作战。州郡兵的数量不大，在两晋外军中不占主导地位。

第三节 兵役制度

两晋的兵役制度沿曹魏旧法，仍以世兵制、募兵制、征兵制并行于世。

一、世兵制

三国时期盛行的世兵制，仍是两晋的主要兵役制度。三国世兵制的主要特征是：兵民分离，兵士单立户籍，与普通民户相区别，谓之“士籍”、“兵籍”、“军籍”等。兵户世代相袭为兵，兵户身份低贱，没有人身自由，不经放免不能改变其兵户身份④。司马氏代魏后，全盘继承了曹魏固有的世兵制，同时获得了魏、蜀、吴三国所拥有的全部兵户，这是西晋世兵制得以实行的基础。曹魏灭蜀时，蜀后主刘禅遣人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⑤。这里将民户与将士、吏分别列数，其中所

---

① 《晋书》卷三十九《冯紞传》。

② 《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③ 《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附张寔传》。

④ 参阅陈玉屏《曹魏两晋兵户身份的卑贱化》，载《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⑤ 《三国志·蜀书》卷三《后主传》注引《蜀记》。

谓将士便是兵户。后西晋灭吴，吴国图籍上记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① 等数，这里与民户分列的“兵二十三万”也是兵户。这就是说，魏、蜀、吴三国的兵户都成为西晋的世兵。两晋时期的中、外军的主要兵源，便是世兵。

西晋世兵，仍是兵民分离，另立户籍，世代相袭为兵，而且地位卑贱。如《晋书·王尼传》云：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阳”，为“护军府军士”。当时有人请求河南功曹甄述、洛阳令曹摅解除王尼的兵籍，但“以制旨所及”，未允。又据《晋书·张华传附刘卞传》记载，刘卞为“兵家子”，他的兄长“为太子长兵”。后其兄死，“兵例须代”，于是功曹命他代替其兄充兵。

在世兵制下，由于军队的主要来源是兵户的适龄壮丁，所以要保证世兵的数量，就要尽可能多地征调兵家的丁口。如西晋咸宁五年(279 年)晋武帝伐吴诏说:“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②。从上述诏书可以看出，兵户家男丁多者要有三人充兵，而且年龄期限也非常苛刻。但实际情况比此更甚，有时充兵者包括“单丁之家”③。年龄限制也常超过上述规定，如晋武帝在平吴之后，曾“诏诸士卒年六十以上罢归于家”④。说明世兵有年过 60 尚充役者。东晋时，甚至中军护军营中，也有“老落笃癃，不堪从役”⑤ 者。上述情况也说明，世兵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同时也显示着世兵数量的减少。

西晋建立以来，世兵数量的日益减少，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持续不断的战争造成了世兵的大量减耗。晋武帝灭吴

---

① 《三国志·吴书》卷三《三嗣主传》注引《晋阳秋》。

② 《全晋文》卷五《武帝伐吴诏》。

③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④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⑤ 《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职官部三八》中护军条引王羲之《临护军教》。

之战虽是一次成功的作战，但如此规模的战争带来的将士伤亡必然是巨大的。此后在八王之乱中，诸王之间的大规模混战，更使世兵损失惨重。及至西晋末年，太尉王衍率晋主力军10余万人南撤，被羯人石勒全部歼灭。到东晋时，也是内外战乱不断，这都给世兵造成了巨大损耗。《晋书·陶璜传》记其在太康年间上疏说："臣所统之卒本七千余人，南土温湿，多有气毒，加累年征讨，死亡减耗，其见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当时陶璜为交州刺史，在此之前交州并没有大规模的作战，其世兵的减少基本上属于自然损耗，但其数目仍是惊人的。另外，兵户的逃亡是世兵数量减少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世兵身受各种苦役，加之地位卑贱，两晋期间士兵逃亡现象始终十分严重。早在西晋初年，兵士"亡逃窜于林莽，系执幽于囹圄"①。东晋时兵士逃亡更加严重。《世说新语·政事篇》云："谢公（谓谢安）时，兵厮逋亡，多近窜南圹下诸舫中。"当时王羲之在给谢尚的信中也说："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②。世兵减少的再一原因，是士族官僚对世兵的分割。两晋时期，朝廷为尊崇褒扬大臣，常授与兵士供其役使，当时称为"给兵"。各级官僚接受"给兵"的增多，便是世兵数量的减少。官僚对世兵分割的另一途径是所谓"送故"。东晋人范宁上疏论时政时曾说："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于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牵引无端，以相充补。若是功勋之臣，则已享裂土之祚，岂应封外复置吏兵乎！谓送故之格宜为节

---

① 《文馆辞林》卷六十六，晋武帝《壬辰谪见大赦诏》。

② 《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制，以三年为断”①。从范宁上疏来看，当时送故对于世兵的分割极为严重，而且由于世兵的减少，当时已采用“枉服良人”、“牵引无端”的办法来补充世兵了。

为了弥补世兵兵源不足的现象，晋廷统治者常采用发奴隶、僮客等充作兵户的办法。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 年），便曾“发奴助兵，号为四部司马”②。东晋太兴四年（321 年），晋元帝也曾下诏“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③。后庾翼北伐，也是“发所统六州奴及车牛驴马，百姓嗟怨”④。但发奴为兵毕竟有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世兵日益减少的问题。

总之，从西晋以至东晋，世兵数量在不断地减少，且呈现着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世兵的兵源面临着严重危机。晋廷为解决世兵不足的问题，并满足战争及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采用了募兵与征兵的办法。

二、募 兵 制

招募勇力充兵，是传统的集兵方式，两晋时期仍以此为补充兵员的手段。

西晋建立之初，中外军数量众多，兵员充足，募兵不很多。《晋书·马隆传》曾记载，西晋灭吴之战前晋廷为征讨凉州叛羌而募兵一事。当时羌人作乱，司马督马隆自请出征，但“请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率之鼓行而西。”被晋武帝批准。马隆募兵“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立标简试”。在此严格条件下，“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由于此次募兵战斗力强，不久即将羌人叛乱平定。但当时朝臣中曾有人反对此事，认为“六军既众，州

---

① 《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范宁传》。

② 《晋书》卷四《惠帝纪》。

③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④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附庾翼传》。

郡兵多，但当用之，不宜横设赏募以乱常典”。可见西晋初募兵还不是很常见的作法，故受到朝臣的反对。但随后就有益州刺史王濬的“受中制募兵”①。如此看来，募兵还要经过皇帝的批准。西晋末年张昌起义，也曾“盗得幢麾，诈言台遣其募人讨流”②。正是因为经中央批准方可募兵，所以张昌起义，才以此发动群众。西晋末年，募兵逐渐增多。八王之乱时，幽州刺史王浚“拥众挟两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③。由此知当时三王都在募兵。又青州刺史苟晞在战败后，也曾“单骑奔高平，收邸阁，募得数千人”④。东晋时期，募兵之事更为普遍。如祖逖北伐，晋元帝只“给千人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使自招募”，后“得二千余人而后进”⑤。又如沈劲自请北上助守洛阳，晋廷“以劲补冠军长史，令自募壮士，得千余人，以助祐击贼”⑥。东晋著名的北府兵，也全是招募而来。《晋书·刘牢之传》说：“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由于募兵有一定的要求标准，所招募的兵士，大多富有技艺，勇猛强壮，因此其战斗力比较强。所以终两晋之世，募兵制遂成为一种重要的集兵方式。

三、征兵制

征兵就是征发民丁充兵，这是自汉代以来传统的集兵方式。

---

①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武帝泰始八年夏。

② 《晋书》卷一百《张昌传》。

③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惠帝永兴元年七月。

④ 《晋书》卷六十一《苟晞传》。

⑤ 《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⑥ 《晋书》卷八十九《忠义·沈劲传》。

征发民丁充兵，早在晋武帝时就已出现。西晋初，段灼为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己未诏书》”，征发民丁。他认为：“晋人自可差简丁强，如法调取；至于羌胡，非恩意告谕，则无欲度金城、河西者也”①。西晋末年，益州流民起义，晋廷“壬午诏书发（荆州）武勇以赴益土，号曰‘壬午兵’”②。由于荆州人不愿远行，结果导致张昌起义。惠帝太安二年（303年），也曾令“一品已下不从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从役”③。东晋时，也常征发民丁充兵。如晋孝武帝时，前秦军队进逼襄阳，晋廷“诏（谢）玄发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谦游军淮泗，以为形援”④。又晋安帝时，晋廷“以益州所统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汉中，益州未肯承遣”⑤。此后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为抵御桓玄、殷仲堪等叛乱，也曾“发京邑士庶数万人，据石头以距之”⑥。

在征兵制下，所征发的民丁没有经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战斗力不是很强。而且征兵一般不是朝廷常制，仅在有战事时临时征发，因而征兵在晋代兵役制中不占主要地位。

综观两晋的兵役制度，占主要地位的仍是世兵制。募兵制和征兵制最初只是以辅助的方式而出现，但随着世兵数量的缩减及其地位低贱所带来的战斗力日益低下，募兵与征兵的作用逐渐明显，而其中由于募兵军事素质较高，战斗力较强等特点，其作用更为突出。

---

① 《晋书》卷四十八《段灼传》。

② 《晋书》卷一百《张昌传》。

③ 《晋书》卷四《惠帝纪》。

④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⑤ 《晋书》卷八十四《殷仲堪传》。

⑥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传附子司马元显传》。

第四节　兵种及军队编制和训练

一、兵　种

两晋时期，军队主要由步兵、骑兵及水军组成。

步兵，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数量在军队中的比重最大。骑兵行动疾速，冲击力强，是古代最富战斗力的兵种。西晋初年，全国中外军队在60万以上，绝大部分由步兵与骑兵组成。① 步兵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骑兵虽然数量不及步兵多，但因其突出的战斗力，在军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行军、作战，常以步骑配合，协同出征。如曹魏末年司马师执政，曾"统中军步骑十余万"讨伐毌丘俭。又西晋灭吴之前，晋武帝曾命司马望"统中军二万、骑三千据淮北"②，以监视吴军。平吴之战时，贾充为大都督，朝廷给其"羽葆、鼓吹缇幢、兵万人、骑二千"③。西晋时，骑兵数量相对较多，所以步、骑配合的比例大约在十比二三之间，当时晋廷所给予大臣的兵卒，也常以步骑搭配。如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④。宗室司马泰在杨骏被诛后，"领骏营，加侍中，给步兵二千五百人，骑五百匹。泰固辞，乃给千兵百骑"⑤。宗室梁王司马肜、北海王司马寔都曾被给予"千兵百骑"⑥。西晋末年大乱之后，中外军将士损失惨重。东晋在江南立国，军事实

---

① 《晋书》卷二《文帝纪》云："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此指曹魏灭蜀、吴前兵力，如再加上收容蜀、吴之军30余万，减去战争伤亡，总兵数应多于60万。

② 《晋书》卷三十七《安平献王司马孚传附子司马望传》。

③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④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⑤ 《晋书》卷三十七《高密文献王司马泰传》。

⑥ 《晋书》卷三十八各本传。

力比西晋大为减弱，加上失去了北方东北、西北等产马地区，骑兵的数量比西晋大为减少。当时亦常以步骑混同作战，如桓温北伐，“统步骑四万发江陵”①。庾亮平定郭默之乱，“率将军路永、毛宝、赵胤、匡术、刘仕等步骑二万，会太尉陶侃俱讨破之”②。可见骑兵在东晋时仍是一主要兵种。但东晋朝廷赐与大臣的兵卒，却很难再见有骑兵的事例，这不仅说明东晋中军数量的减少，同时也表明东晋骑兵数量很少。

水军也是两晋军队的重要兵种，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东晋时期的水军要比西晋时强大。

西晋之初，便有水军。同时由于当时军事形势的需要，也很重视水军的建设。曹魏时期，为进军江南消灭孙吴，便曾着力建设水军，曹操、曹丕都曾亲自训练水军。晋武帝代魏后，西晋自然继承了曹魏水军。随后，晋武帝为了消灭吴国，统一天下，更是大力扩建水军。泰始八年(272 年)，晋武帝密谋伐吴，命令益州刺史王濬在辖地修治战船器仗，训练水师。经过 7 年时间，王濬在灭吴前夕建成了一支强大的水师，其水师中的“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船上“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史称王濬所建水师，“舟棹之盛，自古未有”③。后来的灭吴战争，王濬统率这支拥有七八万之众的水师，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直取吴国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灭吴后，西晋收降了吴国的水军，实力更为增强。尽管拥有强大的水军，但由于西晋的统治中心在北方，西晋末年的战争也大多在北方进行，因而其水军在当时的战争中未能发挥重要作用。

东晋立国江南，而江南的地理环境是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水运发达，而且晋廷又以长江为京师建康的防御屏障，因此，东晋水军比西晋更为发达。东晋军队出征作战，更多的是以舟师水军

---

①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②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

③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为主力。如王敦作乱，“遣其兄含及钱凤、周抚、邓岳等水陆五万，至于南岸”①。此后平定苏峻之战，“征西大将军陶侃、平南将军温峤、护军将军庾亮、平北将军魏该舟军四万，次于蔡洲”②。此后，晋廷平定桓玄之乱，也是以水军在长江峥嵘洲（在今湖北鄂州东长江中）大败“楼船器械甚盛”的桓玄水军，奠定最后胜利的基础③。后来刘裕为镇压以水师见长的卢循义军，大建水师，所修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④。他终于凭借这支水师扑灭了义军。

二、军队的编制和训练

晋代军队的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前述宿卫诸将领所统，便各为一军。所以晋武帝曾“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⑤。西晋初年，晋武帝检阅中军，曾“以三十六军兵簿令（司马）柬料校之”⑥。一军所统兵力的多少，史籍有不同记载。《晋书·职官志》云：“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据陶氏《职官要录》也谓屯骑校尉等五校“各领千兵”⑦。而《太平御览·职官部》三七又谓积弩、积射二将军营“各二千五百人”。可见晋代宿卫诸军大部分为千人之军，但也有2500人之军。当时王国所置各军的兵力也各不相同。据史籍记载：晋代诸王国分为大、次、小三种，大国置上、中、下三军，上下军各1500人，中军2000人；次国置上下二军，各1500人；小国仅置上军一军，兵2000人。从以上情况看，晋代的军拥有兵力的数量各不相同，

---

① 《晋书》卷六《明帝纪》。

② 《晋书》卷七《成帝纪》。

③ 见《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④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⑤ 《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

⑥ 《晋书》卷六十四《秦献王司马柬传》。

⑦ 《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二《职官部》四十屯骑校尉条引。

有1000人、1500人、2000人、2500人等军。

队是晋代军队的另一基本单位，置于军之下。《晋书·舆服志》记中朝大驾卤簿云："……次骑十队，队各五十匹。将一人，持幢一人，䂨一人，并骑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并骑在后。……郎簿十队，队各五十人。绛袍将一人，骑、䂨、角各一人，在前。督战、伯长各一人，步，在后。"根据上述记载，晋代军队无论步、骑，军以下皆以队为基本单位，每队有兵五十人。队的首领称队主，统带全队。如东晋时，豫州刺史谢万受命北征，矜豪傲物，"未尝抚众"，其兄谢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①。从上引《中朝大驾卤簿》来看，军与队似不是直接隶属关系，之间还有一级单位。因为骑队、郎簿皆以10队为单位，而每10队又各有将领一人统带，很可能即是后来南北朝军队军、幢、队系列中的幢主。

晋代军队编制，在队之下应还有什、伍一类的传统建制。《通典·兵典》二引《魏武步战令》说："伍中有不进者，伍长杀之；伍长有不进者，什长杀之；什长有不进者，督伯杀之"。这里说明曹魏军队中有什、伍的建制。晋代军制直接继承曹魏军制，而且军中也设置督战伯长（即都伯），应该有什、伍这两级建制。此外，督战伯长似为百人之主，如果其为正常建制，那么晋代军队中什、伍之上，还有伯长这一级单位。

两晋军队的训练，是提高其战斗力的必要手段。两晋期间，统治者也比较重视军队的训练。据记载：西晋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三年、太康四年、六年冬，晋武帝皆亲临宣武观，观看众军演习，只是不亲自指挥。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作雁羽仗"。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郊之场，故其地因名斗场"②。从上述记载可知，晋初时极为注意军队的训练，晋武帝曾先后六次亲临宣武观，观看中军训练。西晋

---

① 《晋书》卷七十九《谢万传》。

②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晋书》卷二十一《礼志》下与此略同。

中军每次训练规模相当宏大，不仅中军要全体参加，而且时间要延续七八天之久。如《晋书·秦献王司马柬传》记载："武帝尝幸宣武场，以三十六军兵簿令柬料校之，柬一省便擿脱谬。"可见中军三十六军都要参加训练。又《晋书·武帝纪》记几次大阅诸军时说："（泰始九年）十一月丁酉，临宣武观大阅诸军，甲辰乃罢"。"（咸宁元年）十一月癸亥，大阅于宣武观，至于己巳"。"（太康四年）十二月庚午，大阅于宣武观"。"（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大阅于宣武观，旬日而罢"。从上述记载看，泰始九年（273年）的训练，是从丁酉至甲辰，历时八天。咸宁元年（275年）是从癸亥至己巳，历时七天。太康六年（285年）是历时十天。在训练中，诸军大约除演习列队阵法外，还要进行实战演习，所以晋成帝咸和（326～334）年间训练内外诸军后，其地被称为"斗场"。从中央军队的训练来说，大约晋武帝时比较重视，因而训练次数比较多。晋惠帝时先是承平日久，疏于训练，后是内乱不断，无暇顾及。及至东晋，元帝、成帝曾举行过军队的训练，但大约在成帝以后，中央军队的集中训练不再进行。

据《宋书·礼志》一记载，东晋的方镇都督常常进行军事训练，这也是东晋外军力量强大的表现之一。实际上西晋时期，各地都督等外军，也常进行军事训练。如西晋初年，羊祜任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便曾在任内"缮甲训卒，广为戎备"①。与此同时，王濬也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境内大力训练水军。唐彬在西晋初任监幽州诸军、领护乌丸校尉、右将军时，也在镇地"训卒利兵，广农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国命"②。东晋时，有"中兴名将"之称的周访为荆州刺史时，常"务农训卒"，"练兵简卒，欲宣力中原"③。

综上所述，两晋期间中外军的训练，大体在冬季经常不断地进

---

①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② 《晋书》卷四十二《唐彬传》。

③ 《晋书》卷五十八《周访传》。

行，这对于提高将士的军事素质，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富有重要意义。

第五节　武器装备及后勤供应

一、武器装备

两晋军队中所用的兵器，可以分为进攻与防御两大类，进攻的兵器有弓、弩、刀、剑、矛、戟等，防御的有盾牌、铠甲等。

弓、弩是军队中的传统兵器，由于它可以远程发射，杀伤力较强，始终是军队中的重要兵器。两晋时期，军队中仍以弓、弩为主要兵器。西晋宿卫中军专设有积射、积弩二营，各领将士2500人，从营之名称上看，此二营皆为持弓、弩而善射之士。西晋初马隆自请讨伐羌人，经晋武帝批准募兵，其招募标准是“限腰引弩三十六钧、弓四钧”①。《晋令》说：“弓弩士习射者给竹弓角弓，皆二人一张”②。羊祜上表请求伐吴时说：“（吴）劲弩长弓不如中国，长矛楯戟不如中国，马骑凌厉又不如中国。”在这里，羊祜列举了己方在兵器上的优势，而将弓、弩放在首要地位，说明弓、弩在晋代军队中是极为重要的兵器。当时弩有大小不同的形制，如《晋书·舆服志》列述《中朝大驾卤簿》时说：“但以神弩二十张夹道，至后部鼓吹，其五张神弩置一将，左右各二将”。此处所谓神弩看来是非同一般的大弩，故五张神弩须专设将领一员掌管。此外，上述史料中又有“细弩一行”、“次弓矢，次弩”一类的记载，说明当时既有“神弩”一类大弩，又有“细弩”一类小型弩，另有正常规格的弩，可见弩的种类较多。

刀、剑是历代都在使用的传统常用兵器，两晋时期自不例外，也是军队中的常用兵器。上述《中朝大驾卤簿》中，有“刀楯在

---

① 《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七《兵部七八》弓条引《晋令》。

内”的记载。《晋书·王如传》记王如为除去王敦从弟王棱，便请“剑舞为欢”，结果乘机杀掉王棱。说明刀、剑在晋代军队中仍是常用兵器。

矛、戟也是两晋军队中的主要兵器。前述羊祜伐吴表中就有“（吴）长矛楯戟不如中国”的说法，这说明矛、戟与弓、弩一样为晋代最主要的兵器。戟是汉魏以来十分流行的兵器。像曹操年少时曾私入中常侍张让家，被发现后，“乃舞手戟，逾垣而出”①。当时猛将吕布、典韦等也皆以戟为兵器。晋代在军队战斗中，戟仍被常用。晋人裴楷有知人之鉴，曾评价钟会说：“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②。祖逖北伐时，流人坞主樊雅遣人入祖逖营，“拔戟楯大呼，向逖。逖军人夜不知何贼多少，皆欲散走”③。东晋陶侃曾给朝廷上表说：“伏惟武库倾荡，宿卫有阙，辄简选其差可者奉献金铃大戟五十张”④。当时用的戟有很多种类，常用的有长戟、大戟等名目。矛，又称矟，《释名·释兵》说：“矛长丈八者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矛，体长锋锐，是两军对阵中十分得力的兵器。两晋时期，矛在军队战斗中常见，所以羊祜认为晋军以“长矛楯戟”为长。又西晋时，“诸王中尉及诸军皆典兵，以备不虞，乃有着战衣木履持长矛者”⑤。足见矛为当时军队常用的兵器。

盾牌、铠甲、头盔是晋代军队中常用的防卫器具。盾牌是秦汉以来就一直使用的传统防卫器具。据《中朝大驾卤簿》记载，晋代盾牌有细盾、九尺盾、大戟盾等多种。又据《陶公故事》云：“臣侃奉献金华大羌楯五十幡、青绫金华楯五十幡”。可见当时盾

---

①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戟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② 《晋书》卷三十五《裴秀传附裴楷传》。

③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二《兵部八三》戟上引王隐《晋书》。

④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戟下引陶侃表。

⑤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矛条引《晋太康起居注》。

牌有多种名称①，各种类型的盾牌大约是以其大小与作用划分的。

铠甲也是晋代军队中常用的防卫器具。如西晋初年马隆征讨羌人时，“贼负铁铠，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无所留碍，贼咸以为神”②。东晋庾翼《与燕王书》说：“今致襦铠一领，兜鍪一副”③。同书又说：“邓百山昔送犀皮两当铠一领，虽不能精好，复是异物，故复致之”④。东晋桓伊任江州刺史时，“有马步铠六百领”。他死前留给朝廷的表章中说：“谨奉输马具装百具，步铠五百领”⑤。从上述记载，当时铠甲有铁铠、犀铠、襦铠等多种。当时除了将士佩戴铠甲外，战马也有披甲的。上述桓伊所上的“马具装”，即是战马所用的铁甲，这种马具装可以防护战马除耳、目、口、鼻及四肢、尾巴以外的一切部位。

头盔，当时称为兜鍪，是将士在战斗中防护头部的用具。两晋时期，步骑将士在战斗中，皆要佩戴兜鍪。所以《晋令》说：“军列营，步骑士以下皆着兜鍪”⑥。

二、后勤供应

两晋时期的后勤供应主要包括两部分，即兵器和粮食的供应。

晋代军队所用兵器由国家统一制造，统一管理，统一发放使用。西晋时，少府之下设有左、右、中尚方，各置令、丞一人，“并掌造军器”⑦。东晋南渡，则只置一尚方。尚方如同东汉之考工令，所造军器主要为“兵器弓弩刀铠之属”⑧。此外，当时还有东冶、南冶等机构，设有东冶令、南冶令等主管官吏，“掌工徒鼓铸，

---

①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三《兵部八四》矛条引。

② 《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③④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兵部八七》甲下引庾翼《与燕王书》。

⑤ 《晋书》卷八十一《桓宣传附桓伊传》。

⑥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兵部八七》兜鍪条引《晋令》。

⑦⑧ 《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

隶卫尉”①。东冶、南冶等归诸卿之一的卫尉管辖，西晋时，卫尉“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塘及冶塘二冶，皆属扬州，不属卫尉”②。上述诸冶也皆为冶炼军器之所。东晋时，北方诸冶尽失，只剩下南方梅塘、冶塘二冶。另据《宋书·百官志上》记刘宋时“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置丞，多是吴所置。”这可能是两晋沿袭孙吴，而传至刘宋。东晋时，诸冶隶属少府，卫尉被废。此外，两晋时期诸州郡亦有制造军器之所。东晋孝武帝便曾“诏淮南所获俘虏付诸作部者一皆散遣”③。这里所谓“作部”当是指诸州制造军器之所。中央及地方州郡的军器制造，都受国家统一管理，严禁私铸。据《孙盛奏事》说："诸违令私作铠一领、角弩力七石以上一张、戟十枚以上，皆弃市”④。可见晋代对私造军器的惩处，是非常严格的。

军器制造完毕，要存入武库保管。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便因为武库焚毁，“新作武库，大调兵器”⑤。两晋皆在中央设有武库，武库置武库令为主管长官，隶属卫尉。卫尉掌管武库，责任重大。西晋时，孙旂为卫尉，因武库焚毁，“坐武库火，免”⑥。武库是历代都极为重视的处所，其内不仅储藏国家全部的军器，还保存有各种宝物，因而其“封闭甚密”⑦。《晋书·五行志下》云："武库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宝藏也，屋宇邃密”。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武库大火，“张华疑有乱，先固守，然后救灾，是以累代异宝，王莽头，孔子履，汉高断白蛇剑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⑧。武库存贮军器异宝众多。所以西晋杜预任度支尚书，“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

①② 《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

③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

④ 《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三《兵部》八十四引。

⑤ 《晋书》卷五《惠帝纪》。

⑥ 《晋书》卷六十《孙旂传》。

⑦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⑧ 《宋书》卷三十二《五行志三》。

所不有也"①。军器平时存于武库，有战事时则经下诏批准后，由将领临时领取。西晋初年马隆进讨羌人之前，去武库领取军器，"请自至武库选杖。武库令与隆忿争"，御史中丞奏劾马隆。马隆向晋武帝陈述说："臣当亡命战场，以报所受，武库令乃以魏时朽杖见给，不可复用，非陛下使臣灭贼意也。"晋武帝听后从其请，"又给其三年军资"②。由于武库十分重要，当时凡叛乱皆欲先占领武库。赵王司马伦起事时，其亲信孙秀曾暗中"开神武门下观阅器械"③。齐王司马冏在京师图谋不轨，也是"辄取武库秘杖"④。

两晋除中央武库之外，地方州郡也存有军器，其来源一部分由地方作部制造，除上交部分外存于当地以备用，另一部分则应为中央发给之军器。地方上军器的掌管，由当地主管长官负责。如东晋荆州刺史陶侃在病重离职时，"军资、器仗、牛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仓库，自加管钥，以付王愆期，然后登舟"⑤。又会稽内史周札在王敦叛军进攻会稽时，"卒闻兵至，率麾下数百人出拒之，兵散见杀。札性贪财好色，惟以产业为务。兵至之日，库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犹惜不与，以敝者给之"⑥。地方上的军器平时由主管长官保管，须使用时一般听从中央调拨，但有紧急战事时，地方长官也可以动用军器。西晋刘舆投靠东海王司马越时，开始被猜疑，但他"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⑦。及至商讨军国大事时，旁人不知所对，刘舆"便屈指筹计，所发兵仗处所，粮廪转运，事无凝滞。于是太傅（司马越）遂委仗之"⑧。这里反映了地方上存有兵仗器械，而

---

①《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②《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

③《晋书》卷六十《孙旂传》。

④《晋书》卷五十九《齐王司马冏传》。

⑤《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⑥《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周札传》。

⑦《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附刘舆传》。

⑧《世说新语》中卷下《赏誉》"太傅有三才"条注引《晋阳秋》。

且也说明这些兵仗器械要归中央统一调拨。

总之，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晋廷对于兵器的生产、保管与使用，控制极为严格。平时武器存于中央和地方武库之中，有战事时一般由中央统一发放使用。

粮食供应是两晋后勤供应的另一主要部分。军粮充足与否关系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并常决定战争的胜败，故两晋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军队的粮食供应。两晋尚书省六曹尚书中皆设度支尚书，度支尚书下又设有度支曹郎。度支尚书的职责是"专掌军国支计"①，全国军队的粮食供应皆由其负责。西晋时，晋武帝将大举伐吴，特地以张华为度支尚书，他"乃量计运漕，决定庙算"②。又杜预任度支尚书时，"内以利人，外以救边，备物致用以济当时之益者五十余条"③。两晋时期，粮食存于全国各地，需要时则由中央从全国征用。上述刘舆列举之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西晋时，成都王司马颖曾"乞差发郡县车，一时运河北邸阁米十五万斛，以振阳翟饥人"④。东晋淝水之战前，朝廷以"荆州水旱饥荒，又(桓)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⑤。后来朱序任兖、青二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表求运江州米十万斛、布五千匹以资军费，诏从之"⑥。

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运送军粮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东晋穆帝时，吏部郎江逌上疏曾说："今者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⑦。当时由于"频有大军，粮运不

---

① 《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户部尚书条。

②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③ 《太平御览》卷二百一十七《职官部一五》度支尚书条引《晋书》。

④ 《晋书》卷五十九《成都王司马颖传》。

⑤ 《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附桓冲传》。

⑥ 《晋书》卷八十一《朱序传》。

⑦ 《晋书》卷八十三《江逌传》。

继，制王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①。由于粮运艰辛，东晋时"征役及运（役）死亡叛散不反者众"②。战争后勤供应的军粮运送，对于百姓确实是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尽管粮运很艰辛，但在战争中迟滞军粮者常要处以重刑。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年)，督运令史淳于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军法戮之"③。其子为其鸣冤时说："（淳于）伯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赇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以来，运遭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④。从上述记载看，虽同是督运军粮，但有屯戍军用及征战军用的不同。凡供应征战军队的军粮，必须按时运到，如有迟误要处以极刑，而供应屯戍军的军粮迟误者，则罪当不致处死。

由于粮运的艰难，两晋时期，也常以军队屯垦的方式解决军粮问题。实际上早在西晋初年，羊祜在荆州即曾将"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储"⑤。与此同时，杜预上疏也说："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⑥。可见当时豫州也有军屯。东晋初年，晋元帝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其非宿卫要任，皆宜赴农，使军各自佃作，即以为廪"⑦。后温峤也曾建议"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⑧。史称其"议奏，多纳之"⑨。两晋都曾实行过军屯，但军屯只能解决部分军粮问题，如遇有路途遥远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仍要长途跋涉转运粮食以充军用。

---

①⑥⑦《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②《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

③④《宋书》卷三十二《五行志三》。

⑤《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⑧⑨《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

第三章　西晋灭吴之战

第一节　战前的形势

一、孙吴政权的危机

孙吴政权晚期，统治集团内部因皇位继承出现的矛盾激化，终于酿成一场政治危机。孙权太子孙登病死后，立孙登弟孙和为太子，同时封孙和弟孙霸为鲁王。孙霸素来深受孙权宠爱，遂有夺孙和太子位之心。朝中文武百官各有所附，成为拥孙和与拥孙霸两大派。孙权怕身后由此出现动乱，又废孙和，逼迫孙霸自杀，另立少子孙亮为太子。

吴神凤元年（252年），孙权病死，年仅9岁的孙亮即位，大将军诸葛恪辅理朝政，孙吴政治开始出现动乱。吴建兴二年（253年），宗室孙峻利用诸葛恪伐魏无功声望大减之机，杀掉诸葛恪，自己以丞相代诸葛恪辅理朝政。吴太平元年（256年），孙峻死，其从弟孙綝代孙峻辅政。永安元年（258年）九月，吴主孙亮不满孙綝专权独断，与卫将军全尚等人谋诛孙綝，孙綝出兵进攻全尚，又杀其同谋刘丞，随即废孙亮为会稽王，另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当年十二月，孙休设计杀掉孙綝，亲握朝政。

元兴元年（264年），孙休病死。当时蜀国被魏攻灭，而吴交阯郡吏吕兴反叛，国内恐惧，国人都希望立一年长之君，以应付多事之秋。于是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等人迎立孙和之子孙晧为帝。孙晧是三国时期有名的暴君，贪恋酒色，猜忌刻薄，滥施刑罚，杀戮无辜。他即位当年，便将拥立他的濮阳兴、张布二人杀掉。以后孙休皇后朱氏、孙休二子以及大臣王蕃等皆被其残酷

杀害。孙晧好酒，每宴会群臣，皆令其尽醉，并设监酒司过之吏，大臣稍有缺失，便被举奏，轻者施罚，重者加以威刑。又截水源流入宫，宫女有不合意者，立即杀掉用水冲走。并设剥人面皮、凿人眼睛之刑，有人横目逆视他的，便施用此刑。孙晧前后滥杀及施酷刑者，不可胜数。吴国朝野上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不谋夕”①。孙晧还黜远正直朝臣，而信用奸佞幸臣，他所宠信的岑昏“好兴功役，众所患苦”②。由于孙晧的倒行逆施，吴国“上下离心，莫为晧尽力”③，朝廷君臣之间离心离德，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孙吴大臣薛莹在追述孙吴灭亡原因时曾说：“（孙）晧之君吴也，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大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危亡之衅，实由于此”④。

吴国政治上的危机，导致了军事防卫的松弛懈怠。长江中上游的西陵（西陵峡口，今湖北宜昌东南）、建平（今重庆巫山）2 地，是吴国西侧屏障，所谓“国之西门”⑤。吴建衡二年（270 年），名将陆抗都督西陵等地诸军事，曾请求增加精兵 3 万巩固西陵的防守，防备晋军自上游顺流东下，以保障吴国西侧大门的安全。但孙晧沉湎于酒色享乐，自认为有长江天险可恃，不予理睬。后晋益州刺史王濬在上游修造舟舰，准备伐吴，大量木屑自上流漂下。吴建平太守吾彦见到，测知晋军将以水师顺流来攻，请求增加建平的防备，也未被孙晧重视。吴凤凰三年（274 年），主持长江中上游防务的陆抗去世，孙吴失去熟谙军事的统帅，防务力量更加削弱。

二、西晋灭吴的准备

早在司马氏代魏之前，司马昭就制定了“宜先取蜀，三年之

---

①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志·孙晧传》《评曰》。

②③ 《三国志》卷四十八《吴志·孙晧传》。

④ 《三国志》卷五十三《吴志·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

⑤ 《三国志》卷五十八《吴志·陆逊传附子陆抗传》。

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①，以灭亡吴国的战略方针。

晋武帝代魏后，继续执行司马昭这一方针，并采纳魏太尉邓艾“宜厚刘禅以致孙休，安士民以来远人”②的怀柔政策，封刘禅子孙及群臣等50余人为侯爵，褒奖蜀名臣诸葛亮父子，并任用诸葛亮之孙诸葛京为官。又叙用蜀大臣蒋琬、费祎等人的子孙流徙中原者入朝任职，以“慰巴蜀之心”而“倾吴人之望”③，以求起到对吴人的政治攻心作用。

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为加强与吴对峙的东南方面的军事力量，并为了有利于日后的对吴用兵，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今湖北襄樊）；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今山东淄博临淄北）；东莞王、尚书右仆射司马伷为镇东大将军，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

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与镇守襄阳的羊祜暗中谋划伐吴之计。羊祜认为灭吴一定要凭借上游之势，请求使本该入朝任职的益州刺史王濬留任，命他在蜀地修造舟舰，整治水军，以备将来顺流而下直取吴地。晋武帝从其请，遂任命王濬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如故。后王濬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修治战舰，训练士卒，组织成一支强大水师，在灭吴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晋咸宁二年（276年），羊祜上疏晋武帝，分析当时形势，请求立即伐吴，并具体陈述了灭吴的用兵方略。晋武帝深以为是，但因当时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鲜卑树机能起兵反晋，其势甚盛，晋廷须分出兵力应付，加上朝中大臣贾充等人反对伐吴，羊祜之议被暂时搁置。次年三月，晋军攻灭树机能后，为伐吴消除了内部隐患。

羊祜是坚决主张灭吴，实现统一的一位很有政治远见的人物。

---

①《晋书》卷二《文帝纪》。

②《三国志》卷二十八《魏志·邓艾传》。

③《晋书》卷九十一《儒林·文立传》。

他镇守荆州多年，与吴直接相临，平时“缮甲训卒，广为戎备”①。在与吴人的关系上，他采取对吴人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开布大信，（吴人）降者欲去皆听之”②。他平时游猎，止于晋地，若有禽兽先为吴人射中而为晋军所得者，皆送还吴人。行军或入吴境，如割用其谷，必以绢帛偿还其值。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③。羊祜又巧施计谋，使吴人罢置离襄阳七百余里的石城守备，由此晋军减去巡逻士卒的一半，用以垦田，大获其利，几年后粮食有十年之储。这一切，也为灭吴作了充分的准备。

西晋泰始（265～274年）至咸宁（275～279年）年间，灭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大体就绪。而吴国方面，则政治极端腐败，兵民怨叛，灭吴的实际行动便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二节 西晋灭吴之战

一、西晋灭吴的密谋

西晋灭吴实际上预谋于晋武帝泰始五年（269年）部署东南军事时，泰始八年晋武帝与羊祜暗中筹划此事，遂有留王濬于蜀地修治水军之举。但晋廷正式明确密谋伐吴，却是从咸宁二年（276年）羊祜上疏开始的。羊祜在上疏中提出了灭吴的战略谋议。羊祜首先分析了晋一定能灭吴的依据后，针对吴所仗恃之长江天险，说：“凡以险阻得存者，谓所敌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轻重不齐，强弱异势，则智士不能谋，而险阻不可保也”。他以吴与蜀相比较，并参以敌我形势说：“今江淮之难，不过剑阁；山川之险，不过岷汉；孙皓之暴，侈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今不于此平吴，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寻干戈，经历盛衰，不可长久，宜当时定，以一四海。”

---

①②③《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接着，羊祜又根据晋、吴军事形势提出具体的作战方略："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平南将军胡奋）、豫州（豫州刺史王戎），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向秣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随后，羊祜又分析吴人内部情况说："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忌，名臣重将不复自信，是以孙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犹怀去就，兵临之际，必有应者，终不能齐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如此，军不逾时，克可必矣。"①

羊祜此疏，从敌我双方经济、政治和军事诸因素出发，全面论证了晋必灭吴的道理，其中所规划的具体用兵方略，在后来的灭吴战争中全部被晋武帝所采纳。

晋咸宁四年（278 年）正月，羊祜因病入朝，又向晋武帝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以羊祜患病，不宜经常入朝，使中书令张华就羊祜问其筹策。羊祜说："吴人虐政已甚，可不战而克……如舍之，若孙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虽百万之众，长江未可而越也，将为后患乎！"②张华对羊祜的筹策深表赞同。不久，羊祜去世，临终前举荐与其谋议相合的杜预代任其职。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代羊祜镇襄阳。杜预在朝臣中力主伐吴，到职后继续对吴人实行离间分化的策略，为伐吴作准备工作。

咸宁五年（279 年）八月，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请求伐吴，疏曰："孙皓荒淫凶逆，荆扬贤愚莫不嗟怨。且观时运，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变难预。令皓卒死，更立贤主，文武各得其所，则强敌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又臣年已七十，死亡无日。三者一乖，则难图也，诚愿陛下无失事机"③。晋武帝览疏后，决意即刻

---

①②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③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伐吴。但朝廷重臣贾充、荀勖仍固谏不可进兵。此时正遇安东将军王浑表奏孙皓将派军北上，边戍皆戒严以待，于是朝中更议第二年出师。杜预闻听延缓进军，又上表奏请立即出师，说："自闰月（当年闰七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不久，杜预再次上疏说："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伐吴）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①。杜预此表送呈时，晋武帝正与张华弈棋，张华趁机进言："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②。晋武帝这才下决心立即进兵伐吴，以张华为度支尚书，使主管漕运军粮等事。贾充、荀勖等人仍力争不可用兵，晋武帝大怒，贾充等人免冠谢罪，不敢再言。至此，西晋伐吴的谋议才最后确定。

二、六路水陆大军联合作战取得的胜利

晋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晋武帝分派六路大军，水陆齐发，大举伐吴。其六路大军部署如下：

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直趋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

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向江西（长江下游北岸）方向进军；

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自安城（豫州治，今河南汝南东南）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

---

①②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平南将军胡奋自新野（今属河南）向夏口（今湖北武汉）进军；

镇南大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直趋江陵（今属湖北荆沙）；

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自巴蜀浮江东下，直趋建业（今江苏南京）。

西晋六路大军，水陆共20余万，为了统一指挥，命太尉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冠军将军杨济为其副，率中军镇襄阳，节度诸军。贾充又力陈伐吴不利，且自言衰老，不肯受任。晋武帝下诏说："君不行，吾便自出"①。贾充才勉强受命，出镇襄阳。与此同时，晋武帝又命令王濬所统水师，至建平（今重庆巫山）时受杜预指挥，到建业时，受王浑指挥，以便号令统一，水陆协同作战。

综观晋廷进军部署，实即羊祜咸宁二年提出的战略设想的具体实施。其中王濬之水师，便是羊祜所提出的"梁、益之兵水陆俱下"；杜预之众，便是"荆、楚之众进临江陵"；胡奋、王浑二军，便是"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司马伷、王浑二军，便是"徐、扬、青、兖并向秣陵"。从整个战略部署说，是多路出击，水陆齐发，分别以六路大军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进攻，使吴军首尾不能相顾。这也正是羊祜所指出的"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而后来的战况，正是"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使吴国一败涂地，土崩瓦解。

晋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晋各路大军攻入吴地，灭吴战争拉开序幕。杜预陈兵于江陵一线，遣参军樊显等和襄阳太守周奇率兵沿江西上，连克吴地城戍；又遣牙门将周旨等率奇兵800，乘夜渡江，袭取吴地乐乡（今湖北松滋东），以策应沿江东进的王濬水军。周旨等人多张设旗帜，在附近的巴山上点火震骇吴军。吴军都督孙歆惊恐不安，乐乡吴人出降者万余口。孙歆出军与王濬军交战，兵败还城，伏兵于外的周旨等趁乱尾随而入，生擒孙歆

①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而还。杜预军于二月十七日攻克江陵。与此同时，平南将军胡奋攻克江安（今湖北公安）；王浑军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进军，克吴寻阳（治今江西九江）、濑乡诸城，俘获吴武威将军周兴等多员将领；司马伷军向涂中推进，使琅邪相刘弘等率军直逼长江。晋军由北向南推进的五路大军，皆进展顺利。

晋西路军王濬、唐彬所统水军于太康元年正月自成都东进。王濬在益州经营7年，练成了一支强大的水师。王濬所造战船，大者“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①。史称其水师“舟棹之盛，自古未有”②。王濬与唐彬进军之时，有水陆军共7万人，沿江东下，声势甚盛。二月初一，王濬、唐彬军攻克吴丹阳（今湖北秭归东），生俘吴丹阳监盛纪，随后向西陵（今湖北宜昌东南）进军。吴人在江中险要之处设置铁锁，“横断江路”③，又在江中暗置铁锥长丈余，以阻挡晋军水师。由于羊祜获吴间谍，早知此军情。王濬命人作大筏数十个，方百余步，缚草为人，披甲持杖立于筏上，然后命善泅水者驾筏先行，筏遇铁锥，便将其拔出带走。濬军又作火炬，长十余丈，粗数十围，上灌以麻油，置于船前，遇铁锁，便点燃火炬，顷刻之间，便将铁锁融化断裂，战船畅通无阻。二月初三，王濬军攻克西陵，生俘吴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璩、宜都太守虞忠。二月初五，王濬军又攻克荆门（在西陵与夷道之间）、夷道（今湖北枝城）二城，斩吴监军陆晏。二月初八，王濬再克乐乡，斩吴水军都督陆景。晋西路军王濬部沿路破关斩将，兵锋锐不可挡。

杜预攻克江陵后，自沅、湘二水以南，至于交、广（今岭南一带），吴之州郡皆望风而降，奉送印绶。杜预持节称诏抚慰吴人，共斩杀及生俘吴都督、监军14人，牙门将、郡守120余人。晋军声威大震。

---

①②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③ 《晋书》卷五十七《吾彦传》。

这时，晋武帝根据晋军进展及各部兵力分布情况，下诏调整部署：命王濬与唐彬率军继续沿江东下，“扫除巴丘（今湖南岳阳），与胡奋、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顺流长骛，直造秣陵（即建业）”①。命杜预南下，镇抚零陵（治今湖南永州）、桂阳（治今湖南郴州）、衡阳（治今湖南湘潭西）3郡，同时分兵1万人给王濬、7000人给唐彬。命胡奋在平定夏口后，分兵7000人补充王濬军。王戎在平定武昌后，分兵6000人补充唐彬军。大都督贾充移镇项城（今河南沈丘），总统各路军队。晋武帝的新部署，显然在于发挥王濬水军的作用，以便渡江及对抗吴之水师。

晋各路大军依晋武帝诏令而行，王濬军继续顺流而下，先克夏口，随后在王戎所遣参军罗尚、刘乔二军协助下，克武昌。吴江夏太守刘朗等率军投降。

王濬攻克武昌后，贾充再次阻挠灭吴大计，他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②。中书监荀勖也附和其意。晋武帝不从，说：“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③。并坚持继续进军。杜预知贾充上表请求退军后，“驰表固争，言平吴在旦夕”。于是晋军各部继续向前，直逼建业。

太康元年（280年）二月，当王浑军向横江方面进展顺利之时，吴主孙晧命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率众3万渡江迎战。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北采石矶），沈莹建议先在此地等候晋水军东下，与之决战，以免渡江北上一战失败，大局不可收拾。张悌认为吴国大势已去，众人皆知，如坐待晋水师到来，军心惊骇不可复整，不如渡江迎战，如战败则为国而死，如战胜则可乘胜前进，于是渡江北上。

三月，张悌等军济江与晋军接战。王浑命司马孙畴、扬州刺史

---

① 《晋书》卷三《武帝纪》。

② 《晋书》卷四十《贾充传》。

③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周浚率兵进击，在版桥（今安徽和县境内）大败吴军，临阵斩张悌、孙震、沈莹及吴军7800余人，仅诸葛靓率数百人逃回江南。吴军经此大败，全国上下震动，已呈瓦解之势。此时，司马伷在令琅邪相刘弘进逼长江之时，又派王恒率军渡过长江，直趋建业。王恒在江南连破吴军，斩首俘获达五万余人。吴国上下更加惶恐。

此时，扬州别驾何恽说刺史周浚应乘势迅速渡江，攻占建业。浚善其谋，转告王浑。但王浑拘泥于晋武帝诏令，不肯见机行事，说："受诏但令江北抗衡吴军，不使轻进……今者违命，胜不足多，若其不胜，为罪已重。且诏令龙骧（指王濬）受我节度，但当具君舟楫，一时俱济耳"①。

在王浑贻误战机的同时，王濬军已从武昌顺流疾趋建业。濬军"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②，孙晧遣游击将军张象率水军万人抵抗晋军，吴军望风而降。这时，吴将陶濬请求率舟师2万，乘大船以战，足以抵御晋军，但吴军将士在出战的头一天，尽皆散亡逃走。王濬军经三山（今江苏南京西南）直入建业。王浑以晋武帝早有成命为由，请王濬驻军论事，王濬不肯失去快速灭吴的良机，回答说："风利，不得泊也"③。径自挥师疾进。当初王濬军至西陵时，将依晋武帝之命受杜预指挥，但深通军机的杜预遗书说："足下既摧其西藩，便当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④。他鼓励王濬抓住战机，建功立业。反观王浑在用兵韬略及将才风度上，比杜预差之甚远。

孙晧见晋三路大军逼近建业，从薛莹、胡冲等人之议，分遣使者向王浑、王濬、司马伷乞降。吴使者先将玺绶送于司马伷。王濬进展神速，三月十五日，其军"戎卒八万，方舟百里"⑤，攻入建业。孙晧面缚舆榇，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吴国灭亡。濬收其图

---

① 《晋书》卷六十一《周浚传》。

②⑤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

③④ 《晋书》卷四十二《王濬传》。

籍，有州4，郡43，户52.3万，兵23万。

西晋灭吴之战是一场成功的水陆联合作战，晋武帝、羊祜、杜预、王濬等人在长达数千里的战场上，创就了一场空前的水陆联合，多路齐进一举灭吴的战争范例。西晋从司马昭提出“水陆并进”的战略设想后，经羊祜丰富和发挥，杜预、张华、王濬等人坚持，最后晋武帝力排众议付诸实施，终于实现了一举灭吴的战略目的。西晋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主要是准备充分，谋划周密切实，发动战争的时机选择适当。在指挥上充分利用王濬强大水军克敌，配以陆军助攻。另外，晋武帝不顾大部分朝臣的阻挠，果断明决；杜预、王濬等人临战不拘泥于命令，善于抓住战机，西晋君臣对吴国采用分化瓦解的怀柔政策，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些都是晋军取胜的重要因素。吴国方面战前无充分的准备，临战无正确的谋略，张悌舍舟就陆，渡江北上与晋军决战，这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加之吴国政治腐败，军无斗志，所以各地守军望风而降，这些是晋军迅速取胜的外部条件。

第四章　西晋末年的流民战争和刘渊的起兵

第一节　流民的发生及大起义的酝酿

一、汉魏之际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内移及分布

东汉至魏晋之间，原先居住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边境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地向内地迁移，与汉人杂错而居，内移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故史称“五胡”。

最早内移的是匈奴。匈奴为游牧民族，本居于蒙古草原之上。东汉初年，匈奴分为南北，北匈奴西迁远遁，南匈奴依附东汉，初居于五原塞（今内蒙古包头西北），后迁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是为匈奴内移之始。后鲜卑崛起，尽占匈奴故地，南匈奴被迫继续内移，最后到达今晋陕北部，建王廷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三国时，曹操以南匈奴久处内地，繁衍生息，势力渐大，便分其为五部，每部置帅，后改称都尉，并选派汉人任司马对其进行监视。当时五部匈奴的分布情况是：左部都尉统万余落，居故兹氏县（今山西临汾南）；右部都尉统 6000 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东南）；南部都尉统 3000 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隰县）；北部都尉统 4000 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统 6000 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西晋初年，塞外匈奴又多次大量内迁，人数少者数千，多者数万乃至 10 余万，他们大多为部落聚居，分布在塞内今晋陕北部一带。

鲜卑也是一个游牧民族，原居于匈奴以北的蒙古草原东部。匈

奴分为南北后，鲜卑入居匈奴故地，势力渐盛。东汉时期，鲜卑凭其兵利马疾，不断侵扰汉地。从公元2世纪50年代檀石槐统部时起，鲜卑开始从塞上分三部向内地方向迁移。其中部大人慕容氏与东部大人宇文氏及辽西段氏，向辽水流域一带发展；其西部大人拓跋氏先向中部推进，后向今内蒙古一带发展；拓跋氏的支属秃发氏留居河西走廊，与鲜卑另支乞伏氏一起，向中原的西北部今陕甘一带发展。总的说来，魏晋时期入居中原的鲜卑人并不多，共有“数万散居人间”①。

羯人在族属上属于西域种族②。魏晋时期，羯人大体与入塞匈奴居于同一区域，其来历大约是该部落曾臣附于匈奴部落，而与之同时移居塞内的。

氐人自西汉以来，分布于今陇西、甘肃一带，汉武帝曾设立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西)，以加强对氐人的控制。三国时期，曹操前后迁徙武都氐5万余落，出居扶风(治今陕西兴平东南)、天水(治今甘肃甘谷东南)一带。后武都氐王杨僕率部落附魏，也居于天水郡界。至西晋初年，氐人居住于天水、扶风、京兆(治今陕西西安)等关中一带。氐人有自己的语言，但也通汉语，从事农耕和畜牧业，虽接受汉族政权统治，但其居住区仍保存一部分部落组织。

羌人是居住于青海草原的一支游牧民族。东汉朝廷曾不断发起对羌族的进攻，将收服的羌人迁徙于天水、扶风、安定（郡治今甘肃镇原南）等地。同时，羌人也不断反抗，对东汉政权进行有力的回击。所谓“羌患”，成为东汉政权最为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魏晋时期，羌人分布在关中冯翊（治今陕西大荔）、北地（治今陕西耀县)、新平（治今陕西彬县)、安定（治今甘肃镇原南）等地。羌人与氐人一样，有的还保留有自己的部落组织。

此外，在今四川嘉陵江上游一带，自古以来居住着少数民族“巴人”。汉代，朝廷使巴人交纳“賨钱”，巴人呼赋为“賨”，故又有

---

①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② 参阅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214页。

“賨人”之称。賨人以罗、朴、昝、鄂、度、夕、龚等7姓为主，由于賨人作战勇猛，战时常持一板楯，故又称“板楯七姓”。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发賨人为兵，賨人信奉张鲁之五斗米道，许多人迁居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依附张鲁。三国时期，曹操攻破汉中，板楯七姓夷王率部众归降。后曹操留部将夏侯渊守汉中，被刘备击杀，曹操遂将汉中賨人5万余迁徙至略阳（治今天水东北）、天水一带居住。由于其地本为氐人居住，故此股賨人又有“巴氐”之称。

西晋时期，内迁的少数民族虽散居于各地，但以关中地区为最多。当时人江统曾说：“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①，可见关中是少数民族的集中聚居地。

二、西晋推行的阶级和民族压迫政策

内迁各少数民族大都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阶段，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他们一般都还保留着部落组织，也有个别经济文化比较进步的族属部落松散，虽还保留着部落贵族的名义，但实际上已成为西晋的编户农民。因此，内迁各少数族，大都受着西晋王朝阶级的与民族的双重压迫和剥削。

从阶级关系看，各少数族的一般成员都是被统治阶级，他们受着西晋王朝的封建剥削。其中沦为西晋编户农民的部落成员，要负担如同汉人编户一样的租调赋役。而保留着部落组织的，也要“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②。同时，还规定“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③。以上是西晋户调式中对少数民族征收的赋调，表面上看并不很重，但各地统治者并不完全按规定行事，他们“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尝啗利，妄加讨戮”④，任意欺压各少数民族人民。此外，各少

① 《晋书》卷五十六《江统传》。

②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④ 《晋书》卷五十二《阮种传》。

数民族人民还要负担兵役，尤其在西晋八王之乱时，统治者竞相引诱少数族参加混战。像司马腾、司马颖等军队中，都有鲜卑、匈奴、羯等少数族人为兵。

魏晋士族官僚还常以少数族人民充当佃客及奴婢。如魏末太原（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诸部“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①。此外，汉族统治者还常掠卖少数族人为奴婢，如石勒，就曾被司马腾部将张隆两胡一枷，卖给在平人师懽家为奴。由于少数族受着西晋统治者的沉重剥削与压迫，所以匈奴贵族刘宣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②。就少数族下层人民来说，其所受的实际上是阶级的与民族的双重压迫。各少数族的上层贵族虽被晋廷封以官爵，但他们不满足于“无复尺土之业”③的虚号，同西晋统治者也存在矛盾。他们常想利用各少数族人民的仇恨心理和反抗情绪，与西晋政权兵戎相见，企图扩充自己势力，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三、流民的形成与西晋王朝的对策

西晋八王之乱长达 16 年，其中从永康元年（300 年）至光熙元年（306 年），爆发了长达 7 年之久的诸王大混战。长期的战乱给北方各族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加上当时连年不断的水旱蝗灾，各族人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被迫背井离乡，四出逃亡，从而在北方出现了大规模流亡迁徙的流民浪潮。

流民迁徙浪潮，从元康八年（298 年）开始大规模出现。当时较大的流民队伍有秦（治今甘肃甘谷东）、雍（治今陕西西安西北）二州各族流民数万家、10 余万口，流入梁（治今陕西汉中）、益（治今四川成都）二州，另有 4 万余人流入宛县（今河南南阳）。梁、益二州的流民入荆州（治今湖北荆沙江陵）者 10 余万

---

① 《晋书》卷九十三《王恂传》。

②③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

户，散在荆、湘（治今湖南长沙）者4万余户。并州（治今山西太原南）流民2万余户，流入冀（治今河北冀州）、豫（治今河南淮阳）2州。冀州流民流入兖州（治今山东郓城西北）的5万余人。冀、并、兖等州流民入辽西郡（治今河北卢龙东）的也有数万户。此外，北方流民渡淮或渡江南下及零星迁徙者，更是不计其数。当时全国流徙人口的总数将近30余万户，100余万口，约占西晋全国人口数的十二分之一。

流民的生活十分悲惨，他们“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①。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显然晋廷如何对待流民问题，将成为其能否继续维持统治的关键。腐朽的西晋统治者，不仅没有能妥善解决流民问题，反而采取了限期强迫流民返回故地的强制手段，结果直接引发了流民大起义。

秦、雍流民进入梁、益二州后，益州刺史赵廞想利用流民的力量，乘朝政混乱而割据巴蜀，便对流民加以笼络，“乃倾仓廪，振施流人，以收众心”②。并拉拢流民领袖李特、李流兄弟，“厚遇之，以为爪牙”③。赵廞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后与流人集团发生矛盾，杀害李流，随之被李特击败，为其部下杀死。赵廞叛乱时，晋廷任命罗尚为平西将军、益州刺史，率7000余人入蜀。罗尚贪残好杀，迫害广大流民。同时，晋廷又下诏书，命流亡梁、益的秦、雍流民返回故乡。罗尚催逼流人，限七月以前必须上路还乡。当时流民分散于梁、益各地，为人作佣工度日，而且秋粮未熟，“流人无以为行资”④。李特等人屡次请求宽限时日，到秋收以后再动身上路，益州广汉太守辛冉不仅不答应，反而“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⑤，并向罗尚建议乘流民迁移之机，设关卡夺取其财物。在西晋王朝及地方官吏的残酷迫害下，流民纷

---

①《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

②③④⑤《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纷投奔李特，一场流民起义即将爆发。

四、各族流民大起义的序幕

各族流民大起义的序幕，是由略阳賨人李特、李流兄弟拉开的。秦、雍流民10余万中，有不少賨人与氐人在内，李特便是略阳賨人的领袖人物。在流民徙往梁、益的过程中，李特与任、杨、阎、赵、上官等6郡（属秦、雍的略阳、天水、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大姓，成为流民队伍的首领。李特兄弟沿路对流人疾病穷困者，“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心”①。当罗尚、辛冉催逼流民返乡时，流民“人人愁怨，不知所为”②，纷纷逃奔李特。李特在绵竹（今四川绵竹东南）安置大营，招集流民，建立武装。永宁元年（301年）十月，李特分设两个大营，自己据北营，令其弟李流据东营。李特再次派人请求罗尚宽限返乡日期，罗尚假意答应，而暗中调遣军队，阴谋将流民武装一网打尽。李特对罗尚的允诺并未轻信，缮甲厉兵，严阵以待。在李特使者回去不久，罗尚及其部属便调动步骑3万对李特发动袭击，李特率军反击，大败晋军。接着，流民共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其弟流为行镇东大将军，正式举起反晋义旗。

李特举义后，进兵屡败晋军，攻占广汉（今四川射洪南），迅速向成都推进。罗尚多次被义军打败，向朝廷请援。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司马颙遣督护衙博进攻李特，驻于梓潼（今属四川），又以张征为广汉太守，驻于德阳（治今四川遂宁南）。罗尚也派督护张龟率军屯于繁城（今四川新都），准备三路夹攻李特。李特趁其立足未稳，分派诸将向晋军主动发起进攻，使李荡北击衙博，自率大军还击张龟。李荡等大败衙博，攻占梓潼，接着又攻占巴西（治今四川阆中）。李特军也大败张龟军，挥师再攻据守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八年九月。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

德阳的张征。这时，李荡军回援李特，两军合攻张征，临阵斩张征，义军取得重大胜利。李特在进军之时，派李骧等据守毗桥（今四川新都南），阻击罗尚派军增援，李骧等大败罗尚军，罗尚龟缩孤城成都固守。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大将军、大都督，改年号为建初。

太安二年（303 年）正月，李特率军进逼成都，蜀郡太守徐俭投降，李特进驻少城。罗尚退保太城，势孤力弱，求和以为缓兵之计。成都附近的地主坞堡，也纷纷表示愿归附李特。李特因胜而骄，麻痹大意，不肯听从李流“聚兵自守，以备不虞”① 的正确建议，将义军将士分散至各坞堡就食。这时，晋廷派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率水军 3 万援救罗尚。李特派兵扼守德阳，抵御晋军。各坞堡与罗尚秘密勾结，里应外合向义军发动进攻。义军仓促应战失利，李特率军退往新繁（今四川新都）。罗尚军引还，李特率军追击，两军激烈搏斗，转战 30 余里，义军大败，李特等义军统帅临阵战死。

李特死后，义军推举李流为首领，称大将军、益州牧，驻守绵竹大营。不久，李流慑于晋军兵势，准备投降。这时，李特之子李雄将计就计，乘李流与晋军接洽投降，晋军放松警惕时发动袭击，大破晋军。此后，李流病死，李雄继任其职，统领义军。李雄接掌大任后，屡破晋军。他采取苦肉计，将朴泰“鞭之出血”②，让他向罗尚诈降，说义军首领李雄与李骧“饥饿孤危，日斗争相咎”③，如晋军偷袭，他充当内应，一举可消灭义军。罗尚信以为真，双方约定以火光为号，罗尚倾巢而出，李骧在道中设下埋伏，当火光出现后，义军伏兵四出，罗尚军大败。义军连夜追歼残敌，直到成都城下。义军扮成官军，进入少城后，罗尚方知受骗，赶

---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惠帝太安二年正月。

② 《太平御览》卷二百九十二《兵部・用间》；《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

③ 《华阳国志》卷八《大同志》。

紧退保太城。闰十二月，义军向固守太城的罗尚发动总攻，罗尚弃城潜逃，义军攻占成都，全据巴蜀。

李雄占领益州后，设置百官，改立年号，定都成都，建立起封建割据政权，其流民起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第二节　长江中下游的农民战争

在巴蜀李特起义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接连爆发了张昌、石冰、王如、杜弢领导的3次起义。

晋太安二年（303年）正月，西晋朝廷命令荆州刺史宗岱率水军3万入蜀镇压李特起义军。随后，朝廷又颁下壬午诏书，强征荆州武勇以为其后继。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诏书催督甚急，“所经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县官皆躬出驱逐”①。武勇在地方官驱逐之下，“展转不远，辄复屯聚”②。五月，平氏县（今河南桐柏）县吏张昌聚集数千人，在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北）的石岩山举起义旗。在江夏就食的流民，以及逃避戍役的武勇，多归附张昌麾下。

江夏太守弓钦派兵镇压，被张昌义军击败。张昌随即进军江夏郡治安陆县城，再次大败晋军，弓钦逃跑，义军占领江夏。张昌攻占江夏后，拥立山都县（今湖北谷城东南）县吏丘沈为天子，又改丘沈名为刘尼，自称汉刘氏之后。自己改名李辰，任相国。张昌起义后，得到江、沔（汉水古称为沔水）百姓的热烈响应，一月之间，众至3万。义军皆头戴红巾，上插羽毛，作战非常勇敢。

张昌起义后，晋镇南将军、新野王司马歆派兵镇压失利，遂向朝廷告急。晋廷以屯骑校尉刘乔为豫州刺史，驻兵汝南（治今河南息县）；以宁朔将军刘弘为荆州刺史，与前将军赵骧进屯宛城

---

① 《晋书》卷一百《张昌传》。

② 《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惠帝太安二年五月。

(今河南南阳)帮助平南将军羊伊守城，以阻止义军北进。当时北面汝南和襄阳两处驻有西晋重兵，对义军形成威胁。张昌以将军黄林为大都督，领兵 2 万北攻汝南不利，改攻弋阳（治今河南潢川），弋阳太守梁桓不敢出战，闭门固守。张昌又派将军马武南进，攻克武昌，杀武昌太守刘根。随后，张昌亲率大军北攻西晋重镇襄阳。义军在樊城一战，杀晋新野王司马歆。义军进军宛城，大败赵骧军，杀晋平南将军羊伊及南阳太守刘彬。张昌义军继续北上，又多次击败荆州刺史刘弘军。义军一路勇挫强敌，屡战屡胜，晋军望风奔逃。

张昌在北进的同时，分派大军向东、南两路进军。义军将领陈真等率兵南下，连克长沙、湘东、零陵、豫章诸郡。义军另一将领石冰挥师东进，攻破江（治今江西南昌）、扬（治今江苏南京）2 州，大败扬州刺史陈徽，尽占二州之地。石冰进据扬州，设置郡守县令统领扬州各地。不久，临淮（今江苏盱眙）人封云起兵响应张昌，攻占徐州（今属江苏）。至此，西晋荆、江、扬、徐、豫 5 州，皆被义军攻占。张昌义军在短短几个月时间，犹如疾风暴雨，横扫西晋 5 州之地，取得巨大的胜利。

晋廷对张昌义军的神速进展，惶恐不安，增派大军围剿。荆州刺史刘弘派司马陶侃等人率军往竟陵（今湖北钟祥）进攻张昌。豫州刺史刘乔派将军李杨等人进攻义军大本营江夏。由于众寡不敌，义军战败，张昌于永安元年（304 年）秋被俘，英勇牺牲。与此同时，扬州地区的大族地主周玘、贺循等人联合向石冰等起义军发动进攻，晋廷命右将军陈敏与之协同作战。石冰义军也因寡不敌众失败。石冰在兵败后北上投奔封云，后 2 人一起被叛徒杀害。张昌、石冰领导的大起义宣告失败。

张昌起义失败不久，在宛县又爆发了王如领导的流民起义。王如出身州武吏，本为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人。在西晋流民大迁徙时，王如与关中的一部分流民迁徙至宛县。西晋统治者强迫各地流民返回故乡，但当时关中荒残，民不聊生，流民不愿归去。晋征南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派兵遣送流民，而且“促期令

发”①，从而激起了流民的反抗情绪。王如乘机起义反晋。晋永嘉四年（310年）九月，王如集聚流民中的勇壮之士，乘夜向山简、杜蕤军队发动袭击，取得胜利。杜蕤整军再战，又在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被义军击败。流民首领新平（治今陕西彬县）人庞实、冯翊人严嶷、京兆人侯脱等纷纷起兵响应，攻打郡县，诛杀守令长，义军人数发展到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2州牧。随后，义军北破襄城（今属河南），南逼襄阳，山简被迫退守夏口（今湖北武汉）。

这时，在北方起义的石勒义军南下，屯据宛县之北山。侯脱当时屯军于宛县，王如驻军于穰县（今河南邓州），二人素有嫌怨。王如与石勒结为兄弟，劝石勒攻打侯脱。石勒遂起兵攻宛县，斩侯脱。另一义军将领严嶷投降石勒，被送往平阳（今山西临汾）。王如为争地盘，进攻石勒，被勒击败，实力大损。不久，王如由于缺乏粮食，加上部下互相争斗，向晋军将领王敦投降，后被敦所杀。义军余部李运等于晋建兴元年（313年）转战至汉中（今属陕西），被晋将晋邈镇压，起义最终失败。

在王如起义失败后不久，即永嘉五年（311年）正月，荆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地区又爆发了杜弢领导的巴蜀流民起义。

在西晋末流民浪潮中，巴蜀有10多万流民迁徙至荆、湘一带，他们备受荆、湘二州官吏及当地豪强地主的歧视和压迫，饱尝艰辛，“并怀怨恨”②，终于爆发了以杜弢为首的大起义。

永嘉五年正月，巴蜀流民李骧在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集聚流民起兵，杀县令，进军南平（治今湖北公安）。南平太守应詹击败义军。荆州刺史王澄又派兵进剿，袭杀李骧，将起义流民8000余人沉于长江之中，并将其妻子充作军赏。王澄的血腥屠杀，激起流民更大的怨恨，蜀人杜畴、蹇抚等领导流民再次起兵反抗。这

---

① 《晋书》卷一百《王如传》。

② 《晋书》卷一百《杜弢传》。

时湘州刺史荀眺认为巴蜀流民皆欲造反，图谋“尽诛流民”①。巴蜀流民闻听此讯怒不可遏，“四五万家一时俱反”②，共推杜弢为首领。

杜弢是蜀郡成都人，以才学著称，被益州举为秀才。李特起义时，杜弢避乱南平，被太守应詹任为醴陵令。巴蜀流民起义后，因杜弢在蜀人中享有声望，被推举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 2 州牧、平难将军、湘州刺史。义军进军攻破湘州州治长沙，俘虏湘州刺史荀眺。晋广州刺史郭讷、荆州刺史王澄分派军队进剿义军，皆被义军击败。义军南破零陵（治今湖南永州）、桂阳（治今湖南郴州），东攻武昌（治今湖北鄂州），先后杀掉长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鉴、衡阳内史滕育以及代荀眺为湘州刺史的郭察等西晋地方官吏。王澄因作战不力，被撤去荆州刺史职务，改以周顗为荆州刺史，进剿义军。

周顗到荆州后，在义军的强大压力下，处境维艰。司马睿又派征南将军、扬州刺史王敦与周顗共同镇压义军。王敦坐镇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命陶侃、周访等向义军发动进攻。义军集中兵力进攻荆州，围困周顗于浔水（今湖北黄梅西南），陶侃进兵救援，周顗脱身至豫章，司马睿以陶侃代周顗为荆州刺史。陶侃与义军长期激战，在一次水战中，义军将领王真大败侃军，“侃欲投水”③自杀，被其都督王棱苏救逃。

西晋建兴三年（315 年）二月，王敦、陶侃、甘卓等人合军进攻杜弢义军，两军展开激烈战斗，义军将士损失严重。在困难形势下，杜弢向晋廷求降。司马睿接受杜弢之请，派人受降，并宣布大赦。但晋军为邀功请赏，仍不断袭击义军。杜弢大怒，杀掉受降使者，继续与官军对抗。义军随后攻破豫章（治今江西南昌）、庐陵（治今江西吉水北）、南康（治今江西于都）等地，但

---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纪七》怀帝永嘉五年正月。

② 《晋书》卷四十三《王澄传》。

③ 《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八《舟部·叙舟》引王隐《晋书》。

因寡不敌众，渐渐走向衰势。同年八月，杜弢派将领王真率精兵3000，袭击武昌，被陶侃军击败。这时义军内部分裂，杜弢杀部将张奕引起众将惊恐，不少人投降官军。不久，王真投降陶侃，长沙被官军攻陷。杜弢出逃，不知所终。杜弢义军极盛时发展到10余万人，在江、湘等地坚持斗争达5年之久后，也终于失败。

第三节　石勒领导的冀州起义

西晋末年，以京城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是遭受战乱最为严重的地区，故该区域内各族人民所受的摧残也最为严重。自元康九年（299年）至建兴四年（316年）西晋灭亡的19年中，黄河中下游各族人民进行了多次起义斗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石勒领导的冀州起义。

石勒，羯人，其父为部落小帅。石勒生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14岁时，曾随族人至洛阳经商，后回家务农。石勒健壮雄武，代父统领部落，很受族人爱戴。晋惠帝末年，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饥荒，石勒逃亡外出，受尽苦难，后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掠为奴隶，卖于茌平（今属山东）师懽家为耕奴。师懽见石勒相貌不凡，放免他为佃客。不久石勒又被官军捕囚，他借机逃脱，招聚王阳等8人为“群盗”，随后郭敖等10人又参加进去，号称“十八骑”。十八骑中包括汉、匈奴、羯、乌桓、西域胡等各族下层人民。石勒等人以牧帅汲桑为首领，活动于赤龙、騄骥等苑囿一带。

西晋永兴二年（305年）七月，石勒与汲桑等数百人奔赴起兵为成都王司马颖报仇的公师藩。至永嘉元年（307年）四月，石勒与汲桑率手下牧奴攻打郡县，招集山泽流民发动起义。汲桑自称大将军，以石勒为扫虏将军，四处攻略郡县。当年五月，义军进军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临阵杀新蔡王司马腾，占领邺城。接着，义军进军兖州（治今山东郓城西北）。当时出镇许昌（今河南许昌东）的晋东海王司马越闻知大惊，派将军苟晞、王谠等率军

迎击义军，两军相持于平原（今属山东）、阳平（治今河北大名东）间。东海王司马越见官军不能取胜，亲率大军屯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支援苟晞。义军与晋苟晞等军在东武阳（今山东莘县境）展开激战，义军大败，汲桑逃回原先所在的牧苑，后被晋军杀掉。石勒在义军兵败后投奔建立汉政权的匈奴贵族刘渊。刘渊以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此后，石勒利用与刘渊联合反晋的有利条件，在冀州（今属河北）继续开创起义事业。

永嘉二年（308年）九月，石勒与另一义军领袖王弥攻打邺城。同年十一月，他又与刘灵等人攻略魏郡（治今河南临彰）、顿丘（治今河北清丰南）等地，坞堡望风归降者50余座。石勒严明军纪，任命原垒主为将军，挑选壮丁5万为军士，于是“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①。永嘉三年（309年）四月，石勒率军攻克冀州坞堡百余座，起义队伍发展到10余万人，声势很盛。石勒具有政治远见，注意搜罗汉族士人，以赵郡（治今河北高邑西）人张宾为谋主。张宾为石勒出谋划策，成为其得力助手。同年七月，石勒与刘聪等进军上党（治今山西潞城北），一度攻占壶关（在今山西黎城东北太行山口），后与晋军战失利，退屯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十一月，石勒攻信都（今河北冀州），杀冀州刺史王斌，随之又大败晋王堪、裴宪等军。

永嘉四年一月，石勒进军攻占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二月，攻打鄄城（今山东鄄城北），击杀兖州刺史袁孚，又进军仓垣（今开封西北），杀晋车骑将军王堪。随后，石勒北渡黄河，攻打冀州诸郡县，百姓投奔石勒者9万余人。五月，石勒攻破汲郡（治今河南卫辉）、怀县（治今河南武陟西南）、武德（今河南武陟东）等地，声威大振。于是“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②。石勒为避开刘曜、王弥军，独立行动，转头挥师南下，连攻宛县（今河南南阳）、襄城（今属河南）等地，兵锋直指襄阳（治今湖北襄樊），沿途又攻陷壁垒30余座。不久，石勒因军粮不济，士

①②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卒多疾疫，从张宾之计，由江夏（治今湖北云梦）北上进军汝南（治今河南息县）、新蔡（今属河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等地，杀晋新蔡王司马确等，并一举攻占许昌。

永嘉五年（311年）四月，石勒抓住战机，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南）围歼太尉王衍率领的晋主力军10余万，晋军全部被歼。不久，出洛阳奔东海王司马越丧的王妃，以及司马越世子司马毗和同行的宗室48王，全部被石勒消灭。至此，西晋的主力军及宗室诸王被石勒消灭殆尽。同年夏天，石勒率军西进，与刘聪、王弥等军共同攻克洛阳，俘晋怀帝，西晋王朝已名存实亡。石勒的不断胜利，引起王弥的嫉恨，王弥与部将曹嶷密谋消灭石勒。勒将计就计，表面不露声，设宴诱杀王弥"而并其众"。①

石勒吞并王弥后，势力更盛。永嘉六年（312年）春，南下屯军于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造船积谷，准备渡江攻打建邺（今江苏南京）。镇守江东的琅邪王司马睿以纪瞻为统帅，率军3万进屯寿春（今安徽寿县），抵御石勒。当时连续大雨，三月不停，石勒军粮不足，兼时疫流行，遂采纳张宾提出的北上攻占邺城，经营河北，进而平定天下的战略主张，回师北渡黄河，进逼邺城。因邺城久攻不克，又从张宾建议，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南）。

此后，石勒以襄国为根据地，派诸将四出攻战，冀州郡县壁垒纷纷归顺。永嘉六年（312年）末，幽州刺史王浚派督护王昌与鲜卑段疾六眷等率5万大军进围襄国，准备一举消灭石勒，结果被石勒击败。石勒在襄国保卫战胜利后，继续消灭西晋各地方势力。同年十二月，攻打信都，杀冀州刺史王象。次年，攻占邺城，杀青州刺史李恽，冀州郡县相继平定。

石勒进据襄国后，向统一关东地区及建立割据政权的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同时，其流民起义的性质也开始发生转变，当石勒建立赵国，即皇帝位后，赵政权便成为封建割据政权了。

---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纪》上。

第四节　刘渊建国及灭晋之战

一、刘渊于平阳称帝建汉

刘渊，字元海，是匈奴贵族。他的祖父於扶罗，是南匈奴单于，父亲刘豹，是左贤王。西晋太康（280～289 年）末年，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率部落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以刘渊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匈奴军事。晋永兴元年（304 年），刘渊接受匈奴贵族左贤王刘宣等人的建议，起兵反晋，自称大单于，建王廷于离石（今属山西）。刘渊举事，受到各族人民拥护，在 20 天内，队伍发展至 5 万人。不久，刘渊为取得汉人的支持，自称汉后，改称汉王，迁都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

并州刺史司马腾派军进剿，被刘渊军击败，司马腾惶恐不安，率并州 2 万余户逃往山东。刘渊随后派兵连下太原（今山西太原南）、泫氏（今山西高平）、屯留（今山西屯留北）、长子（今属山西）、中都（今山西平遥）、蒲坂（今山西永济）、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地。当义军首领石勒、王弥归附刘渊后，其势更盛，成为北方各族人民反晋斗争的盟主。晋永嘉二年（308 年），刘渊改称皇帝，建都平阳，国号汉。

刘渊等匈奴贵族在北方起兵反晋，有利于当时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因而在客观上具有积极和进步意义。但他们起兵的目的是恢复匈奴帝国的统治，从战争性质上说，与石勒等人领导的起义有根本的区别。

永嘉三年（309 年）夏，晋左积弩将军朱诞投奔刘渊，劝其乘虚进军洛阳。刘渊遂以朱诞为前锋，命大将刘景率军进攻洛阳。刘景攻克黎阳（今河南滑县东），败晋将王湛于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八月，刘渊遣其子刘聪与王弥再攻洛阳，刘聪、王弥大败晋军，进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北），后中晋弘农太守垣延诈降计，

兵败退回。当年冬天，刘渊又遣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 5 万进攻洛阳，并使大将呼延翼率步卒为后继。刘聪等进军直抵洛阳城下，晋东海王司马越分派将士固守。不久，刘聪等军粮草不继，洛阳一时难以攻克，被迫还师。前汉军三次进攻洛阳，都未能攻克。

永嘉四年七月刘渊病死，太子刘和立。不久，刘渊第四子刘聪杀刘和自立。

二、刘曜、王弥、石勒攻灭西晋之战

刘聪即汉主位后，为孤立西晋京师洛阳，命族弟刘曜与王弥等人率兵 4 万，绕过洛阳，周旋于梁（治今河南商丘南）、陈（今河南淮阳）、汝（古水名，在今河南境内）、颍（古水名，在今河南境内）之间，攻陷垒壁百余座。与此同时，石勒义军也纵横中原，攻克郡县壁垒，消灭西晋各地方政权。永嘉五年（311 年）四月，石勒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歼灭晋军主力 10 余万后，晋王朝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永嘉五年五月，刘聪遣大将呼延晏率军 2.7 万进军洛阳，沿路连败晋军 12 战，杀晋军 3 万余人。汉军刘曜、王弥、石勒等皆率众会晏军，围攻洛阳。六月，联军各部攻入洛阳，刘曜将晋怀帝俘往平阳后杀死。至此，西晋政权实际上已经灭亡。

永嘉六年九月，雍州刺史贾疋、豫州刺史阎鼎、始平太守麴允等在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拥立秦王司马邺为皇太子，建立尚书行台。次年四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麴允等人拥立司马邺即帝位，是为晋愍帝。

晋建兴三年（315 年）九月，汉主刘聪派刘曜进兵长安，晋愍帝以麴允为大都督，率军抵抗。十月，刘曜攻陷冯翊（治今陕西大荔），转攻上郡（治今陕西绥德东）。麴允驻军灵武（今陕西咸阳东），兵力寡弱，不敢与刘曜接战。晋愍帝以长安危急，向驻于上邽（今甘肃天水）的南阳王司马保求救兵，保推延不肯发兵。麴

允想护送愍帝投奔司马保，尚书仆射索𬘭认为，如果让司马保控制愍帝，他“必逞其私志”，麴允乃止。此后长安形势更加危急，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百官饥饿，采野生谷物为生。

建兴四年（316年）七月，刘曜进攻北地郡（治今陕西耀县），麴允率步骑3万救援。刘曜派兵绕城点火，烟雾蔽日，使人假传消息于麴允军说：“郡城已陷，往无及也！”① 于是麴允手下将士惊惧溃散，刘曜大败晋军，攻占北地。刘曜进兵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渭水以北晋军不战自溃。八月，刘曜逼近长安。九月，刘曜攻克长安外城。麴允、索𬘭等退保长安内城固守，内外隔绝，“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② 十一月，晋愍帝使人送表出降，刘曜掳送晋愍帝于平阳，西晋灭亡。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晋纪十一》愍帝建兴四年七月。

② 《晋书》卷五《晋愍帝纪》。

第五章　东晋统治集团之间的内战

第一节　东晋政权的内部矛盾及斗争

一、“王与马共天下”所反映的王权与高门间的矛盾

晋元帝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得到了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南北门阀大族的支持，而王氏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而晋元帝即位后，对王氏尽力优宠，王导内掌朝政，王敦外握兵权，当时遂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

这种政治局面，既反映了高门士族与司马氏共执朝政的政治格局，同时也包含了高门与司马氏皇室之间的对立，也即高门士族与皇权之间的矛盾。这种政治形势的出现，乃是由于高门大族力量足以左右朝政，也即门阀制度发展到极盛时期的必然结果。司马氏皇室在西晋末的战乱中受到严重打击，晋元帝以极其微弱的力量渡江，靠南北士族高门建立起东晋朝，因而历来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东晋朝极其衰弱。史称：“（东晋皇帝）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①。皇室司马氏对这种屈辱的地位不能容忍，因而皇室在利用士族力量的同时，也必定要试图加以限制，以便保护和提高皇权的地位。高门大族在取得了与皇室分享权力的利益后，对于皇室限制削弱其权力，不仅不能接受，他们中个别具有政治野心的人物，甚至要觊觎皇位，想取而代之。因此，东晋朝士族与皇室在互相利用，共

---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执朝政的同时，二者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激化时，便发展为一幕幕争权夺利的内战。

二、南北士族间的矛盾与荆、扬之争

南北士族虽然共同支持司马睿建立了东晋政权，但他们在东晋政权中所处的地位却截然不同，北方士族占着主要地位，南方士族处于次要地位。南方士族是当地人，对此当然不满，因此从东晋政权刚一建立，南北士族之间就出现了尖锐的矛盾。

西晋末年，北方士族“随晋渡江者百家”①。这些北方士族因其侨居南方，又称“侨姓士族”。侨姓士族在东晋王朝大都身居高位，朝政大权被其掌握，因而东晋政局上出现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北方高门士族轮流执掌朝政的局面。南方士族又称“吴姓士族”，以顾、陆、朱、张为首。他们在支持司马睿建立政权中也出了大力，但名位却远比不上北方士族，有少数人虽身居高位，也是徒具虚名，没有多大实权。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北方士族压抑的地位。史称当时中原“亡官失守之士避乱来者，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②。因而在东晋初年，就爆发了以义兴（今江苏宜兴）周氏为首的武装反抗斗争。当战乱平息后，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吴人所宗，故不穷治，抚之如旧”③。

此外，北方士族的南渡，都带着各自的宗族、乡里、宾客、部曲。这样众多的人口聚集江南，必然要占有大量的土地才能为生，势必会严重地妨碍南方士族的经济利益，这就造成了南北士族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矛盾。所以后来北方士族的土地庄园，一般都建筑在当时本地士族力量相对薄弱的一些地区，如会稽（治今

---

① 《北齐书》卷四十五《文苑·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自注。

②③ 《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周勰传》。

浙江绍兴）一带，有的则深入今福建一带建立庄园，或新开辟山林川泽，这样以便缓和与南方士族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

东晋的经济军事中心，主要是在荆（治今湖北荆沙江陵）、扬（治今江苏南京）二州。史称“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①。东晋王朝利用扬州的经济军事形势，以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建立了朝廷。而处于扬州上游的荆州，凭其经济、地理、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对于朝廷所在地的扬州，常可造成威胁。每当镇守荆州的镇将有不臣之心时，荆、扬二州就会出现对立的局面。唐杜佑曾论荆州形势说：“荆楚风俗，略同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通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②。这里从荆州所处的地位，论及“荆、扬之争”。

东晋朝荆、扬之争，实际上是地方势力与朝廷的矛盾，以及士族高门与皇权的对抗激化所引起的争斗。因此，皇权的强弱，实即皇室权势以及支撑朝廷的军事、经济实力的强弱，乃是一个关键问题。而东晋一朝，皇权衰落，高门执政，权臣跋扈；扬州地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又远不能压倒荆州，因而东晋一代就连续不断地演出了一幕幕“荆、扬之争”的闹剧。

第二节　王敦之乱的发生及其败亡

王敦字处仲，是琅邪王氏的头面人物。西晋末年，他出任扬州刺史，与族弟王导“同心翼戴”③琅邪王司马睿。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后，以王氏之功，封王敦为大将军、侍中、江州刺史，后加荆州刺史。

东晋初年，王敦族弟王导以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

---

① 《宋书》卷五十四《史臣曰》。

② 《通典》卷一八三《州郡典》。

③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中书监居朝廷中枢辅政，王敦以大将军、荆州刺史总统建康上游军事。兄弟二人一内一外，完全控制了东晋军政大权。晋元帝徒有帝王之名，而无号令天下之实。

晋元帝对王氏兄弟的专权，非常不满，当东晋政权稳定后，他开始任用丹杨尹刘隗、尚书令刁协等人，对王导稍事疏远。东晋太兴四年（321 年），晋元帝又“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①。元帝扩充军事力量，主要在于对付王敦。同时晋元帝以尚书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 6 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属安徽）；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 4 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淮阴西南），所征发的兵卒即配与 2 人统带。这两支军队皆以讨胡为名，实际上是对付王敦的。

王敦在扶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后，既有拥立大功，又手握强兵，专任建康上游诸军事，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②。他见晋元帝针对王氏的防御举措，大为不满，上表请诛刘隗，并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进攻建康。

永昌元年（322 年）正月，王敦率大军自武昌（今湖北鄂州）顺流而下。与此同时，王敦党羽龙骧将军沈充起兵响应王敦，自义兴（治今江苏宜兴南）北进，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军至芜湖（今属安徽），又上表罪状尚书令刁协。晋元帝览表大怒，下令讨伐王敦，急调戴若思、刘隗入卫京师。

王敦起兵之时，曾约镇守襄阳（今湖北襄樊）的梁州刺史甘卓一同起兵东下，甘卓允诺。同时，王敦又派人游说湘州刺史、谯王司马丞，请他做自己的军司。司马丞不肯应召，反与零陵太守尹奉等人起兵讨伐王敦。司马丞又使人劝说甘卓，起兵袭击武昌。甘卓虽响应王敦，但不曾进兵，意在观望。这时他便从司马丞之请，与巴东监军柳纯、南平太守夏侯承等 10 余人传檄远近，起兵

---

① 《晋书》卷六《元帝纪》。

②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讨伐王敦。甘卓又遣人约会广州刺史陶侃共同起兵。王敦闻知司马丞、甘卓等人起兵，一方面，派人向甘卓解释己意，请甘卓还军襄阳；另一方面，遣将魏乂、李恒率甲卒2万进攻驻守长沙（今属湖南）的司马丞。

当年二月，戴若思与刘隗相继入卫京师建康。戴若思、刁协等人劝元帝尽诛王氏，元帝未许。当时王导与其宗族20余人每日至宫省待罪，尚书仆射周顗尽力为王导开脱罪责，由于王导在政治态度上确是拥护东晋王朝的，因而获免。三月，王敦军将至建康，元帝部署军事迎敌，以王导为前锋大都督，加戴若思骠骑将军；以征虏将军周札为右将军、都督石头诸军事，镇守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清凉山，为建康军事要塞）；以刘隗军镇守金城（在建康东北江上洲中）；又以甘卓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梁二州诸军事，荆州牧；陶侃加领江州刺史，使各自率兵袭王敦之后。

王敦军至石头城，欲攻刘隗，其将杜弘认为刘隗手下死士众多，不易攻克。而周札待部下寡恩，兵卒不为其用，不如先攻石头城。王敦从之，进攻石头，周札果然开门接纳王敦入城，王敦占领石头城。晋元帝命刁协、刘隗、戴若思等军反攻石头城，王导、周顗等人亦皆进兵，三路进攻王敦，并皆大败而回。刁协、刘隗等败逃入宫，晋元帝给二人配备人马，命其自寻生路。刁协年老，不便骑乘，逃离建康后被部下所杀，刘隗逃奔后赵。

王敦大获全胜后，拥兵石头城，不去朝见元帝，并纵兵劫掠。皇宫卫士奔散，晋元帝身边只有安东将军刘超一人和侍中两人随侍左右。元帝无可奈何，遣人对王敦说："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当归于琅邪，以避贤路"①。随后又令公卿百官到石头城去见王敦，同时大赦天下，宣告王敦等无罪，并以王敦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食邑万户。王敦假让不受。

---

①《晋书》卷六《元帝纪》。

与此同时，沈充自义兴北上攻陷吴国（治今江苏苏州）。魏乂、李恒攻破长沙，司马丞被槛车送往武昌，路上被王敦派人杀死。甘卓起兵后，屯于猪口（今湖北仙桃北），迟疑不进，王敦攻入建康后，急以尚书台驺虞幡止甘卓之军。因此，司马丞、甘卓皆未起到牵制王敦叛军的作用。

王敦得逞以后，将周顗、戴若思二人杀掉，加王导尚书令，任命其兄王廙为荆州刺史。随后，王敦仍率军回镇武昌，遥控朝政。

当年闰十一月，晋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

晋太宁元年（323年）三月，王敦欲谋篡晋，暗示朝廷征己入朝。明帝征敦入朝，加黄钺，奏事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已非臣子之礼。不久，王敦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自此以后，王敦“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①。他以自己兄弟及从兄弟王含、王舒等分督领各大州军事和刺史，以沈充、钱凤等人为谋主，诸葛瑶等人为爪牙，培植亲信，诛杀异己，准备篡位。次年正月，王敦以会稽内史周札一族势力强盛，诬以谋反罪，尽灭其族，为自己篡晋预作准备。

晋明帝即位后，深以王敦为患，但因王敦势力强大，未敢轻举妄动。太宁元年（323年），晋明帝为树立外援以对付王敦，任命辅国将军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王敦畏忌，表郗鉴为尚书令。明帝只得征郗鉴入朝。郗鉴入朝后，明帝遂与他密谋讨伐王敦之事。太宁二年五月，王敦病重，矫诏拜其养子王应为武卫将军，兄王含为骠骑大将军，又与沈充、钱凤谋划后事，决定乘其在世时，起兵夺取帝位。王敦的左司马温峤请王敦任命自己为丹杨尹，乘赴任之机将王敦反意告知明帝，明帝决定即刻讨伐王敦。

太宁二年（324年）六月，明帝为免除众人惧王敦之心，先诈称王敦已死，下诏讨伐王敦余党，并作如下军事部署：加司徒王

---

①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导大都督、假节、领扬州刺史；以丹杨尹温峤为中垒将军，与右将军卞敦镇守石头；以光禄勋应詹为护军将军、假节、督朱雀桥（建康正南朱雀门之浮桥）南诸军事；以尚书令郗鉴行卫将军，都督从驾诸军事；以中书监庾亮领左卫将军；尚书卞壶行中军将军，征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约、兖州刺史刘遐、临淮太守苏峻、广陵太守陶瞻等还卫京师。明帝自己出屯于中堂（建康台城宜阳门外），亲自总统诸军。

王敦见诏大怒，但其病势沉重，已不能带兵，便以王含为元帅，督率钱凤、邓岳、周抚等军共水陆5万人，向建康进发。七月初，王含等军进至建康，屯于秦淮河南岸，京师人心惶惶，温峤于朱雀桥拒敌，两军隔水相峙。当时有人认为台城小而不甚坚固，王含兵力甚众，应乘叛军立脚未稳与之决战。郗鉴力谏，他认为王含等人号令不一，抄掠百姓，人自为守，敌势必不能久，应待机破贼，不应侥幸决胜负于一战。明帝采纳，出屯南皇堂，准备相机破敌。七月初二夜，明帝招募壮士，遣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左卫参军陈嵩等人率领甲卒共千人，乘夜渡水袭击。次日天亮，大败王含军于越城（在秦淮河南），阵斩其前锋将何康。王敦闻王含等军败，愤惋而死。王敦死党沈充自吴地率万余人与王含军会合。充司马顾飏献策说："今若决破栅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舰之势，极水军之用，此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锐，并东南众军之力，十道俱进，众寡过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转祸为福，因败为成，召钱凤计事，因斩之以降，下策也"①。沈充皆不用。

这时，东晋临淮太守苏峻、兖州刺史刘遐等率精兵万余人入援京师。这支军队为部曲和北方流民组成，战斗力很强。明帝连夜接见，慰劳赏赐，以其立即投入战斗。沈充、钱凤见苏峻等军新到，密谋认为："北军新到，未堪攻战，击之必克"②。他们乘夜

---

① 《晋书》卷九十八《王敦传》。

②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渡过秦淮河，向晋军进攻。护军将军应詹、建威将军赵胤等接战不利，沈充、钱凤等人攻至建康南门宣阳门外。这时，刘遐、苏峻率军自秦淮河南岸横击，大破沈充、钱凤2军，死者3000人。随后，刘遐又在建康附近的青溪大破沈充。

太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王含等军见大势已去，烧营夜遁。次日，明帝还宫，大赦天下，唯独王敦一党不赦。此后，明帝遣中书监庾亮督苏峻等向吴兴方向追赶沈充；命丹杨尹温峤督刘遐等追王含、钱凤。王含逃奔荆州，被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江中，沈充、钱凤皆被人杀死。至此，前后持续3年之久的王敦之乱，被彻底平定。

第三节　陶侃等平定苏峻叛乱之战

晋明帝平定王敦之乱后，为了加强晋廷军政实力，削弱上流军事实力，先后对重要方镇人选作了较大的调整。以护军将军应詹为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江州刺史；以征南大将军陶侃为征西大将军，都督荆、湘、雍、梁4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以尚书令郗鉴为车骑将军，都督青、兖2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原兖州刺史刘遐为监淮北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淮太守苏峻为历阳内史。

太宁三年（325年）闰八月，晋明帝因病死去，年仅5岁的太子司马衍即位，是为晋成帝。九月，明帝皇后庾太后临朝称制，以其兄中书令庾亮与司徒王导共同辅佐朝政，但实际上形成外戚庾亮专权的局面。王导执政，以“宽和得众”①。庾亮掌权后，却“任法裁物，颇以此失人心”②。且明帝遗诏褒进大臣，而陶侃及豫州刺史祖约不在其列，二人怀疑庾亮删改遗诏，曾出微言。庾亮惧其为乱，便使丹杨尹温峤代应詹为江州刺史，镇守武昌（今湖

①②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

北鄂州），以为外援。十月，南顿王司马宗谋废执政，庾亮杀司马宗，废其兄太尉司马羕。司马宗是宗室近支，司马羕是宗室元老，曾为明帝师傅，众情以庾亮剪除宗室，欲独专朝政，遂生怨恨之心。庾亮的专权和举措，引起东晋政治上的不安，并由此引发了苏峻之乱。

苏峻，长广掖县（今山东莱州）人，曾任郡主簿。西晋末年，苏峻纠合流民数千家，结垒自保。当时“豪杰所在屯聚，而（苏）峻最强”①。东晋初年，晋元帝假苏峻为安集将军。后苏峻率流民渡海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元帝以苏峻为鹰扬将军，后因功迁至兰陵相。王敦初次起兵时，元帝诏令苏峻进讨王敦，苏峻迟疑不进。及至元帝军败，苏峻退保盱眙，后被任为临淮内史（治今江苏盱眙东北）。王敦再次作乱时，苏峻应诏入援京师，大破沈充、钱凤等人，进位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内史。苏峻自平王敦之乱后，威望渐著，在历阳（治今安徽和县）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借以保护江北。但苏峻自负其众，有轻朝廷之心，潜有异志，招纳流亡之人，部众日盛。

庾亮诛杀司马宗时，其党羽卞咸被杀，咸之兄卞阐逃奔苏峻，苏峻将其隐匿。庾亮以朝廷命令苏峻交出卞阐，苏峻不肯。庾亮认为苏峻必将为乱，准备征召苏峻入朝任职，以削其兵权。当时王导等朝臣皆认为苏峻一定不会应召，力谏庾亮不要轻启祸端。但庾亮认为苏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日征之，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②。遂不顾众人劝阻，征苏峻入朝为大司农，令其弟苏逸代统其众。苏峻本知为朝廷所不容，遂拒不应召，暗与豫州刺史祖约联络，决定起兵反晋。祖约本来怨恨庾亮，与苏峻一拍即合，相约以讨庾亮为名，共同起兵。

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十一月，祖约命其侄祖涣、女婿许柳率兵与苏峻会合。十二月，苏峻遣部将韩晃、张健等进袭姑孰

---

①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② 《晋书》卷七十《卞壸传》。

（今安徽当涂），向慈湖（在姑孰北）逼近。东晋朝廷宣布京师戒严，假庾亮节，任都督征讨诸军事；以左卫将军赵胤为历阳太守；命左将军司马流率军屯慈湖拒守；以射声校尉刘超为左卫将军，侍中褚翜典掌征讨军事。庾亮又使弟庾翼领数百人备守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清凉山，为建康军事要塞）。韩晃、张健军攻破于湖（今安徽当涂南），接着又在慈湖大败左将军司马流军，并杀流。这时东晋宣城内史桓彝起兵入援建康，进屯芜湖（今属安徽）。韩晃进兵击败桓彝，乘势进攻宣城（今安徽宣州）。桓彝退保广德（今安徽广德西南）。

当苏峻拒不应召之时，江州刺史温峤曾请求入援京师，庾亮不同意，回信说："吾忧西陲（指荆州刺史陶侃）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在今安徽望江东南）一步也"①。温峤只得按兵不动。苏峻军发动进攻后，温峤起兵进屯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以督护王愆期、西阳太守邓岳、鄱阳太守纪睦为前锋，率舟师入援建康。兖州刺史郗鉴亦遣广陵相刘矩率军赴援，荆州刺史陶侃则遣督护龚登率军受温峤调度，一同入援京师建康。

咸和三年（328年）正月，苏峻亲率祖涣、许柳等万余人，乘风自横江（今安徽和县西南）渡过长江，从陵口（在今安徽当涂东北）进军，在战斗中屡败晋军。2月，苏峻进军至蒋陵覆舟山（在今江苏南京东北）。这时有人劝庾亮说："（苏）峻知石头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杨（治今江苏南京）南道步来；宜伏兵邀之，可一战擒也"②。庾亮不从。后苏峻果然从小丹杨进军，庾亮悔之不及。东晋朝廷以尚书令卞壸为都督大桁（建康正南门外之浮桥）东诸军事、假节。卞壸率赵胤、郭默等军与苏峻大战于西陵（在陵口以西），卞壸等军大败，死伤千余人。苏峻乘胜进军，因风纵火，乘胜猛攻，卞壸等率诸军竭力抵抗，不能取胜。于是卞壸、丹杨尹羊曼、黄门侍郎周导、庐江太守陶瞻等并皆战死，苏

---

①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

② 《资治通鉴》卷九十四《晋纪十六》成帝咸和三年正月。

峻攻入京城建康。庾亮率军将于台城宣阳门内列阵抵抗，兵士皆逃散，与赵胤等逃奔寻阳，苏峻攻陷建康台城（宫城），直入成帝御殿之下。宫省侍卫四散，苏峻军攻入后宫，掳掠宫女，驱役百官，哀号之声，震动内外。苏峻矫诏大赦天下，唯庾亮兄弟不赦。峻自任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又以祖约为侍中、太尉、尚书令。并“改易官司，置其亲党，朝廷政事一皆由之”①。

庾亮素为温峤所重，当他败逃寻阳后，仍分与兵众，并奉他为统帅。温峤、庾亮等谋划起兵讨伐苏峻，互推对方为盟主。温峤之弟温充建议推举位重兵强的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陶侃为盟主，二人同意。温峤说服本与庾亮存有嫌怨的陶侃出任盟主，共同起兵讨伐苏峻。咸和三年四月，温峤、庾亮移文告诸征镇，陈列苏峻、祖约罪状，与陶侃从寻阳、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分别起兵。五月，陶侃率军至寻阳与温峤等军会合，联兵东下，共有舟师 4 万，旌旗 700 余里，进至蔡洲（今江苏江宁西南江中）。

苏峻闻知温峤、陶侃等大军逼近，自姑孰还拒石头城，将成帝迁入石头城，以便挟天子以抗诸军。苏峻命尚书张闿权督东军，司徒王导密令以太后诏谕三吴起兵勤王。于是吴兴太守虞谭、吴国内史蔡谟、前义兴太守顾众等皆举兵讨峻。当时，陶侃军屯于查浦（在长江南岸当秦淮河口），温峤军屯于沙门浦。诸军初至石头，便欲决战。陶侃认为敌方盛，难与争锋，宜缓以计破之。苏峻军以步、骑兵为主，精锐善战，而联军多水军，不善陆战。陶侃用部将李根计，依白石（在石头城东北）筑垒，使庾亮率 2000 人据守。苏峻步骑万余人分从四面攻白石垒，形势万分危急，庾亮激励士卒奋勇死守，峻军最终未能陷垒而退。这时，苏峻将韩晃攻陷泾县（今安徽泾县西北），杀起兵赴援的宣城内史桓彝。苏峻别将管商、张健、弘徽等与虞谭、王舒等联军交战，亦胜多败少。陶侃、温峤等与苏峻相持于白石，无所进展，而苏峻进军东西抄掠，多所擒获，兵势日盛。形势对联军很不利，“义众沮衄，

①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人怀异计”①。

同年七月，与苏峻联合起兵的豫州刺史祖约被后赵石聪击败，部众溃散，逃奔历阳。苏峻心腹路永、匡术等人以祖约兵败，怕大事难成，劝苏峻尽诛王导等大臣，任用亲信。苏峻敬重王导，未肯下手。九月，王导使人说服路永归顺，导携二子及路永出奔白石。

联军与苏峻相持数月，军粮乏绝，唯靠陶侃以荆州粮米接济。陶侃对此不满，怒对温峤说："使君（指温峤）前云不忧无将士，惟得老仆（指自己）为主耳。今数战皆北，良将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虏，仓廪当备不虞，若复无食，仆便欲西归，更思良算"②。温峤回答说："（苏）峻、（祖）约小竖，为海内所患，今日之举，决在一战。峻勇而无谋，藉骄胜之势，自谓无前，今挑之战，可一鼓而擒也……今之事势，义无旋踵，骑猛兽，安可中下哉！公若违众独反，人心必沮。沮众败事，义旗将回指于公矣"③。温峤义正辞严，陶侃无以为对。温峤前锋毛宝又力劝陶侃，并说："贼亦畏死，非皆勇健"④，苏峻必能平定。毛宝请率兵上岸以断贼军粮道，陶侃从之。毛宝果然烧苏峻句容（今属江苏）、姑孰两地粮草辎重而还。

当陶侃、温峤进兵建康之时，兖州刺史郗鉴、后将军郭默等都举兵响应，后王舒、虞潭等军败于苏峻，陶侃便使郗鉴与郭默还镇京口（今江苏镇江）。郗鉴回京口后，立大业等 3 座堡垒以拒苏峻，使郭默据守大业垒（今江苏丹阳北）。九月，苏峻将韩晃急攻大业，郭默恐惧，留将士坚守，自己暗中从南门出外避祸。陶侃闻大业垒形势危急，欲派兵救大业。长史殷羡认为，叛军步卒锐利，如救大业失利，则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头，峻军如回救，大业之围自解。陶侃依计而行，贼军果然撤大业之围，以回救石头⑤。接着，陶侃督军向石头方向进攻。温峤与庾亮、赵胤等率精

①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②③ 《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

④ 《晋书》卷八十一《毛宝传》。

⑤ 《晋书》卷六十六《陶侃传》。

锐士卒1万自白石垒誓师南进，向苏峻军发起反击。苏峻率8000人迎战，先使其子苏硕与部将匡孝率数十骑冲击赵胤，赵胤败走。苏峻见匡孝取胜，说："孝能破贼，我更不如乎"！①遂弃大军于后，自率数骑突击联军，未能攻入，回马欲奔白木陂（在陵口东），陶侃牙门将彭世、李千等投矛击刺，苏峻中矛落马，被义军杀死。苏峻既死，联军群情激奋，皆呼万岁，叛军大溃，军事形势向有利于联军方面发生突变。

苏峻司马任化等人继立苏峻之弟苏逸为主，闭石头城固守。韩晃闻苏峻死，率军赴石头；弘徽、管商等军接连被联军击败，管商投降庾亮。咸和四年（329年）正月，光禄大夫陆晔等人说服匡术投降，台城归入联军手中。陶侃使毛宝守南城，邓岳守西城。苏逸、韩晃等猛攻台城，毛宝率将士固守。与此同时，赵胤遣部将甘苗进攻历阳祖约，祖约畏惧，乘夜逃奔后赵，其将牵腾率众出降，义军克寻阳。

同年二月，陶侃、温峤等联军齐攻石头城，建威长史滕含率锐卒大破苏逸军。温峤等各军选募精锐将士进攻贼军，苏硕率骁勇数百渡过秦淮河来战，联军将士奋勇向前，阵斩苏硕。韩晃等军闻硕败，弃守去曲阿投奔张健，城门狭窄，溃兵蜂拥而去，互相践踏，死者数以万计。联军攻占石头城后，乘胜进军，击平叛军各路党羽，苏峻之乱终于被平定。

第四节　王恭与司马道子之间的内战

东晋淝水之战后，名相谢安身遭猜忌，出镇广陵，不久病死，朝廷大权落入会稽王司马道子手中。

司马道子是孝武帝司马曜的同母弟，很受其母李太妃的喜爱。谢安死后，司马道子以骠骑将军、开府，领扬州刺史、录尚书事、

---

①《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总揽朝政。司马道子得志后，信用亲幸小人，横暴专恣，“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佛教，“用度奢侈，下不堪命”①。于是左卫领营将军许荣、中书郎范宁等纷纷上书论朝政之失，孝武帝由此渐对司马道子不满。司马道子既深为李太妃喜爱，又常常恃宠不守礼敬。孝武帝因李太妃的缘故，不便对司马道子加以废黜，便任用自己亲信，以王皇后之兄王恭为兖州刺史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太子中庶子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出镇江陵（今属湖北荆州）、尚书右仆射王珣为尚书左仆射，用他们来抑制司马道子的权势。孝武帝的这些措施，为后来东晋的内乱埋下了祸根。

太元二十一年（396 年），孝武帝死，太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安帝是个白痴，“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②。司马道子权势更重，为了与王恭等人对抗，他任用太原大族王国宝为尚书左仆射，起用王国宝从弟王绪等人。王国宝用事，“谋弱方镇，内外骚动”③。于是王恭遣使与殷仲堪及桓温之子南郡公桓玄联系，密谋起兵。殷仲堪得书后，认为自己远离建康，而王恭与建康近在咫尺，不用自己真正进兵，因而假意顺从，却并没有诚意起兵。王恭得到殷仲堪首肯后大喜，于隆安元年（397 年）四月在京口起兵，上表请诛王国宝、王绪等人。司马道子恐惧，杀掉王国宝、王绪等人，请求王恭退兵。王恭一时失去口实，只好暂时退兵。

当时王恭威震内外，虽然退兵，司马道子仍甚为惧怕，引用谯王司马尚之为心腹，以谋对策。司马尚之劝道子说：“藩伯强盛，宰相权轻，宜密树置，以自藩卫”④。道子深以为是，遂任其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军事，以戒备王恭，并与司马尚之日夜谋划，商量对付方镇之策。

---

①④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② 《晋书》卷十《安帝纪》。

③ 《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豫州刺史庾楷对王愉以江州刺史督其州四郡不满，便遣其子庾鸿去见王恭，称说司马尚之兄弟弄权，甚于王国宝，请早除之。王恭本来忌恨司马尚之，遂与庾楷合谋起兵。于是王恭派人与殷仲堪、桓玄联系，殷、桓皆同意举兵，并共推王恭为盟主，约期一同起事。

隆安二年（398年）七月，王恭、殷仲堪、庾楷、桓玄等一同举兵，上表请求讨王愉及司马尚之兄弟。殷仲堪自江陵发兵，以南郡相杨佺期率舟师5000为前锋，又以5000兵马资助广州刺史桓玄，使其继杨佺期之后，自己亲率大军2万继进。八月，杨佺期、桓玄等军至湓口（今江西九江），江州刺史王愉逃奔临川（今属江西）。桓玄派兵追赶，将其抓获。

东晋朝廷闻知方镇起兵，上下忧惧，宣布京城建康内外戒严，以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遣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率兵进讨王恭，司马尚之率兵迎战庾楷。

九月初十，司马尚之在牛渚（在今安徽当涂西北长江边）大败庾楷，庾楷逃奔桓玄。司马道子随即以司马尚之为豫州刺史，又以其弟司马恢之为丹杨尹、司马允之为吴国内史、司马休之为襄城太守，各拥兵马，以卫京师。当时桓玄与杨佺期进至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攻击司马尚之等军，司马恢之所领水军全军覆没，司马尚之战败退走，桓、杨等军逼近建康。

当王恭起兵与朝廷对抗时，其司马刘牢之曾劝王恭不要屡次举兵向阙，王恭不听。刘牢之本为北府名将，身经百战，但王恭自以门第高贵，平时对刘牢之不够礼敬，刘牢之心怀不满。王恭起兵后，司马元显便派庐江太守高素游说刘牢之，劝他反叛王恭，归顺朝廷，并许事成之后，将王恭的位号转授于他。于是刘牢之与其子刘敬宣密谋，决定除掉王恭。王恭的参军何澹之侦知其谋，告诉王恭。王恭认为何澹之挟私诬告，不肯相信，反而当众拜刘牢之为兄，并将精兵利甲全部配与他，命其率帐下督颜延等人为前锋，进屯竹里（今江苏句容北），准备进攻建康。刘牢之率军至竹里后，杀掉颜延降晋，派其子刘敬宣及其女婿东莞太守高雅之

袭击王恭。王恭正在京口城外曜兵时，刘敬宣率轻骑突袭，恭措手不足，手下将士溃散，准备退入城中，而高雅之已将城门关闭，王恭与其弟王履单骑逃奔曲阿（今江苏丹阳）。曲阿人殷确是王恭的故吏，将王恭藏在舟船之中，准备送他投奔桓玄。王恭在途中被人告发，被抓送建康。不久桓玄等军进至建康，司马道子恐有变，遂将王恭杀掉。王恭兄弟子侄及其党羽皆被杀。刘牢之接替王恭之任，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镇京口。

此时，桓玄、杨佺期等军进至石头（今江苏南京西），殷仲堪军也进至芜湖。正在竹里的司马元显火速返回建康，遣丹杨尹王恺、鄱阳太守桓放之、新蔡内史何嗣等，征发京师士庶数万人，据守石头。桓玄、杨佺期等闻知王恭已死，三军失色，皆无斗志。于是桓、杨 2 人上表为王恭理冤，请求杀掉刘牢之。这时刘牢之率北府兵驰援京师，驻屯新亭（今江苏南京西南）。杨佺期、桓玄等人大惧，回军退至蔡洲（今江苏江宁西南江中）。

当时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数万大军驻在建康附近，朝廷不知其虚实，上下忧惧。桓玄从兄桓修建议朝廷许桓玄、杨佺期以重利，使其倒戈，则仲堪势孤，大军压境的威胁便可解除。司马道子采纳。晋廷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降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并下诏令殷仲堪回军。仲堪恼怒被降职，命桓玄、佺期急速进军。桓玄等喜得职位，想乘势归顺朝廷，犹豫不决。殷仲堪闻知杨佺期等欲接受朝廷任命，心中慌乱，立即从芜湖南归。他临行宣示桓玄等军，如不随他回归荆州，将杀其家口。桓玄、杨佺期等只好回军追赶殷仲堪，在寻阳与之会合。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人遂于寻阳结盟，奉桓玄为盟主，皆不受朝廷诏命，并请为王恭理冤，诛杀刘牢之、司马尚之等。晋廷惧再起祸端，复殷仲堪荆州刺史位，优诏慰谕，以求和解。于是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各还本镇。

至此，王恭与司马道子之间的内战宣告结束，晋廷求得了暂时的安定。

第五节　桓玄攻破建康之战及其败亡

王恭之乱平息后，东晋朝廷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但朝廷与地方方镇的矛盾与对抗，却并没有消除，因而时隔不久，又爆发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嗣父爵为南郡公。隆安二年（398年），朝廷任命桓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假节，广州刺史，桓玄接受任命却不赴职。后参与王恭之乱，事平后被任为江州刺史。

桓玄虽与荆州刺史殷仲堪、雍州刺史杨佺期一同起兵响应王恭之乱，但他与殷、杨二人都有矛盾。桓玄为当时高门子弟，在荆州闲居时以强豪放纵，士庶畏惧他甚于刺史殷仲堪。殷仲堪之亲党曾劝其杀掉桓玄，但仲堪看重桓玄的人才名望，不仅没有杀他，反而深相交结。当桓玄在寻阳被推为盟主后，更加自矜高傲。殷仲堪见桓玄日渐跋扈，心中不满，便与杨佺期联姻，以便对抗桓玄。杨佺期为人也很骄傲强悍，自认为是华夏贵胄（其远祖为东汉名臣杨震），江东无人可比。但桓玄视他为寒士，常以此压抑他，杨佺期对桓玄也极为不满，常有杀桓玄之心。殷仲堪以杨佺期及其兄弟骁勇过人，恐除掉桓玄后反受杨氏兄弟之害，因此对佺期欲害玄常加劝阻。桓玄知杨佺期对己有二心，加之他本想消灭殷、杨二人以扩充势力，遂屯驻夏口（今湖北武汉），以待时机。晋廷乘机加桓玄都督荆州四郡军事，以加深方镇之间的矛盾，减轻对朝廷的压力。

隆安三年（399年），桓玄深知仲堪不善军事，乘荆州发生水灾之机，西上攻打殷仲堪。桓玄一路进展顺利，很快攻至江陵（今属湖北荆沙）。殷仲堪见形势危急，向杨佺期求救。佺期知江陵军粮断绝，请仲堪至雍州与他共守襄阳（今湖北襄樊）。殷仲堪不肯弃州而走，谎称自己有办法筹集军粮。于是杨佺期率步骑8000援救江陵，但到江陵后，殷仲堪只以饭食供应其军。杨佺期大怒，不见殷仲堪，径自与桓玄交战。桓玄合军迎战，大败杨佺

期，佺期单骑逃奔襄阳，被桓玄军追上杀死。殷仲堪闻听杨佺期死，率数百人出逃，也被桓玄追及杀掉。至此，殷、杨二军及其荆、江二州都被桓玄吞并。

桓玄吞并荆、江2州后，身任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江等8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假节，领江州刺史，完全控制了建康上游地区。荆楚本是桓氏世居之地，故旧甚多，桓玄借以“树用腹心，兵马日盛”①，渐有不臣之心。

隆安五年（401年），孙恩义军逼近建康，桓玄上疏请求讨伐农民军，而实际想乘机自图大事，被晋廷阻止。桓玄以其兄桓伟为江州刺史，镇夏口；以司马刁畅为辅国将军，督8郡军事，镇襄阳；以大将冯该等戍守湓口（今江西九江）。当时朝廷征召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桓玄皆抗命不予放行。桓玄认为天命归己，便屡次上言祥瑞之兆以为己应。他又写信给司马道子说，王恭当年受冤及朝廷用人之弊，流露出对晋廷的强烈不满和威胁口吻。晋廷掌权者司马元显十分恐惧。谋士张法顺认为，桓玄占有荆楚上流之地，桓氏“世在西藩，人或为用”，而朝廷所控制限于“三吴（指会稽、吴、吴兴三郡）”，其地又“编户饥馑，公私不瞻”，桓玄早晚会起兵作乱。他建议司马元显乘桓玄“始据荆州，人情未辑”② 之时，使刘牢之为前锋，发兵讨伐，可以一举而定。司马元显甚以为是。恰好此时武昌太守庾楷恐桓玄起兵不成，延祸于己，密使人与司马元显联系，愿作内应。司马元显大喜，便派人与刘牢之联系，准备进兵。

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朝廷以司马元显为征讨大都督、都督18州诸军事，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司马尚之为后部，发兵进攻桓玄。

桓玄本以为扬州发生饥荒，孙恩起义未灭，朝廷一定不会对己用兵，及至听说朝廷发兵，甚为恐惧，想保江陵以对敌。长史

---

① 《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②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传》。

卞范之认为晋廷"若兵临近畿，示以威赏，则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①他建议桓玄主动进兵迎敌。桓玄从其计，遂留其兄桓伟守江陵，自率大军东下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北），移檄建康，罪状元显。司马元显见到桓玄檄文，心中恐惧，下船后不敢即刻进军。桓玄自江陵发兵时，对兴兵犯阙心存疑虑，恐大事不成。及过寻阳，未见朝廷军队，心中甚喜，其士气大振。这时庾楷暗投朝廷之事败露，被桓玄拘执。

同年二月，桓玄军至姑孰（今安徽当涂），派冯该等分兵攻打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大败豫州刺史司马尚之、襄城太守司马休之等军。晋军前锋刘牢之素对元显不满，惧自己一旦平定桓玄，不为司马元显所容，想借桓玄之手除掉元显，自己再乘机对付桓玄。由于刘牢之心怀多种疑虑，虽为前锋，却犹豫观望，不肯进击。桓玄请刘牢之的族舅何穆游说牢之归顺自己。刘牢之权衡利弊，决定投降桓玄。三月初一，刘牢之不顾其外甥何无忌与参军刘裕的劝阻，派其子刘敬宣向桓玄请降。桓玄接受刘牢之投降，随即进军新亭（今江苏南京西南）。司马元显见桓玄逼近，退守国子府。三月初三日，司马元显陈兵于建康宣阳门外，军中相惊，传桓玄军已至城南浮桥，晋军溃散，桓玄军攻入建康。司马元显逃入相府，被桓玄军抓住，后与司马尚之、庾楷等人一起被杀。

桓玄进入建康后，以朝廷名义总百揆，任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加假黄钺，任命桓修领徐、兖2州刺史、桓伟为荆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仆射、卞范之为丹杨尹。桓玄为夺刘牢之兵权，在他归降后，即改任他为征东将军、会稽内史。刘牢之欲据江北与桓玄对抗，部下因其反复无常皆不从，刘牢之被逼自尽而死。桓玄以其弟桓修坐镇京口，控制北府兵权。

元兴二年（403年）十二月，桓玄认为时机成熟，逼迫晋安帝禅让帝位，自己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

---

①《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桓玄自篡位后，对于东晋腐败政治没有革新举措，反而“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①。

晋元兴三年（404 年）二月，北府兵旧将刘裕联合北府兵中下级军官何无忌、魏咏之、檀凭之等 27 人结盟起兵，讨伐桓玄。二月二十八日，刘裕、何无忌等人在京口起事，杀徐、兖 2 州刺史桓修。同日，刘毅、孟昶等于广陵（今江苏扬州）起事，杀桓修之弟、青州刺史桓弘；诸葛长民杀刁逵，据历阳。刘毅等人渡江至京口，与刘裕军会合。众人推刘裕为盟主，总督徐州事，以孟昶为长史，以京口为基地。刘裕等人起事后，传檄远近，声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平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安帝于寻阳，镇北参军王元德率部曲保据石头。刘裕留孟昶留守京口，自率徐、兖二州之众将士 1000 余人进攻建康。

三月初一，刘裕进至江乘（今江苏句容东北），大败桓玄军，阵斩其骁将关甫之，随即进军罗落桥（在建康东北），又大败桓玄军，阵斩皇甫敷。桓玄闻知刘裕逼近建康，命桓谦、卞范之等率众 2 万分屯于东陵（在建康西）、覆舟山（在建康西北），抵御刘裕。刘裕进至覆舟山东，使人在山上张设旗帜以为疑兵，然后率军分数道而进，与敌决战。桓谦军将士多为北府兵，素来畏服刘裕，没有斗志。裕挥军因风火攻，身先士卒，将士皆殊死战，呼声动天地，桓谦军一时溃散。刘裕逼近建康。桓玄闻楚军败，率其子侄与亲信数千人乘船南逃。

三月初三，刘裕进入建康，派刘毅、刘道规等率军追赶桓玄。司徒王谧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 8 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主持朝政。四月，晋安帝被桓玄挟持至江陵，刘裕遂迎奉武陵王司马遵为大将军，总理朝政。

何无忌、刘道规等军于桑落洲（在今江西九江西北）大败桓玄将庾稚祖、何澹之部，攻克寻阳（今江西九江西）。桓玄回至江

---

①《晋书》卷九十九《桓玄传》。

陵后，大建水师，又聚集起一支2万人的水军，“楼船器械甚盛”，挟持安帝东下与刘裕军交战。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孟怀玉等人，自寻阳西上迎击桓玄。五月，两军相遇于峥嵘洲（在今湖北鄂州东长江中），当时刘毅等军不足万人，而桓玄有众数万，众惧欲退军。道规以为不可，说：“彼众我寡，强弱异势，今若畏懦不进，必为所乘，……玄虽窃为雄豪，内实恇怯，加之已经奔败，众无固心，决机两阵，将雄者克，不在众也”①。道规挥军先进，众军从之。桓玄虽率军东下，但为防不测，常备轻舟于战船之侧，以便失败时逃跑，因而其军士气低落，没有斗志。而义军将士作战奋勇，个个争先，峥嵘洲一战，玄军大溃，玄挟持安帝退回江陵。

桓玄自从建康失败后，怕人心浮动，法令不行，轻于杀戮，将士心生离怨。峥嵘洲之战时，大将殷仲文投奔刘毅军。当桓玄败回江陵后，大将冯该请求再战，桓玄不许，想投奔梁州刺史桓希。但人情离叛，号令不行，他乘马去城西时，左右将士竟从暗中砍玄，未中。桓玄仅能上船，左右分散，惟卞范之在侧。不久，益州刺史毛璩的侄子毛修之诱桓玄进入蜀地，毛璩的从孙毛祐之和参军费恬、督护冯迁等率人伏击，将桓玄杀掉。

桓玄离开江陵后，荆州别驾王康产迎安帝入南郡（治今湖北荆沙江陵）府舍，南郡太守王腾之率文武侍卫。当年闰五月，桓玄族侄桓振与桓谦等乘刘毅等未及时进军之机，率军袭取江陵，杀王康产等又将安帝控制在手中。此后，刘毅率军与桓氏势力继续攻战于寻阳、江陵一带。直至义熙元年（405年）三月，建威将军孟怀肃袭破江陵，杀桓振，安帝被接回建康复位，桓玄之乱才宣告结束。

刘裕以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徐青2州刺史之职，居京口遥控朝政。桓玄之乱以后，东晋王朝虽然重建，但已名存实亡，15年后，司马氏的帝位，终于被在平定桓玄之乱中掌握军政大权的刘裕所取代。

---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三《晋纪十三》安帝元兴三年四月。

第六章　东晋的北伐战争

第一节　东晋前期的南北形势

西晋建兴四年（316 年），晋愍帝被汉国刘曜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后，次年被杀。晋琅邪王司马睿于同年称帝，在江南建立东晋政权，从此历史进入南北分裂时期。

东晋政权是在南北士族的支持下建立的，它所实行的是典型的门阀政治，即士族与皇室共同掌握朝政。尽管东晋朝一贯宽纵士族，但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仍存在着复杂而又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贯彻东晋朝始终。当时皇权与士族之间，侨姓士族与吴姓士族之间，侨姓士族内部之间，不断地明争暗斗，互相倾轧，甚至兵戎相见。这是东晋朝在政治上的显著特点。东晋前期这一政治特点反映在南北关系上，便是满足于偏安一隅，不图进取。因为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各股势力热衷于在东晋新政权中获得权势，在经济上得到更多的利益，并想长期保持既得的利益，只要北方胡族政权不造成直接威胁，他们绝不会冒风险去谋求北伐，收复国土的。另一方面，上述情况所造成的东晋政治的不稳定性，也迫使东晋最高统治者着眼于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根本无暇北顾。

此外，东晋前期立国未稳，朝廷所能控制的人力、物力都很有限，而且消耗于内战中。同时东晋所实行的宽容门阀士族的政策，恰恰不利于扩充朝廷的人力、物力，所以从经济和军事实力上说，东晋政权在前期和中期，实际上也没有力量进行北伐。但当时的各类人物出于各种目的，还是勉强进行了几次北伐战争，这些北伐战争由于上述经济的和政治的主要因素，其结果收效甚微。

从晋室南渡到东晋太和五年（370 年），北方一直处于混乱之

中。当时先后存在的少数族政权有匈奴贵族刘氏建立的前赵（304～329年）、羯人石勒建立的后赵（328～351年）、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352～370年）、氐人苻氏建立的前秦（351～394年）、賨人李氏在长江上游建立的成汉（303～347年）。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北方，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最初是前赵对广大中原地区的军事征服，继而是后赵在中原地区的四处征伐，前后赵之间的互相征战，随之又是前燕慕容氏的入主中原，与后赵残余势力的混战，最后是前秦势力的崛起与前燕的互相征战，直至前秦灭前燕，北方才出现了短暂的统一。

在北方的长期混战局面下，广大各族人民在战乱、灾荒和疫疾的摧残下，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尤其是汉族人民，在少数族贵族的民族仇杀政策下，更是苦不堪言。他们除了大量流向南方或边远地区外，为了求得生存，常聚众结垒以自保，因而北方出现了无数的坞堡。像后赵石勒一次军事征服中，就曾"陷冀州郡县堡垒百余"①。坞堡既是经济单位，又是军事单位，少者数百家，多者数千家。史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②。这些坞堡以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与少数族政权相对抗。如当时著名的坞堡首领魏该、李矩、郭默等都曾与前赵、后赵的军队作战，并曾取得过不少的胜利。他们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压迫，曾起过抵御作用，对其军事力量也有所牵制。

东晋前中期，北方民族矛盾较为突出，汉族人民渴望东晋政权北伐，加之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混战，以及汉族人民在结垒自保下坚持斗争。如果东晋政权内部团结，实行改革措施，以支持北伐战争，是有条件获得突出的北伐成果的。但东晋政权士族高门当政，既不能团结对外，又不能实行政治改革，而且彼此争权夺利，内战不已，除祖逖外，其他人进行北伐，都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因此，东晋前中期的北伐战争，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② 《晋书》卷一百《苏峻传》。

乃是必然的。

第二节　东晋前期的北伐战争

东晋前期的北伐战争，主要包括祖逖、庾亮兄弟、殷浩、桓温等人的几次北伐战争。

祖逖的北伐是在东晋初创时期。西晋末年大乱时，祖逖率亲党数百家南下到达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淮阴西南）。晋琅邪王司马睿任命祖逖为徐州刺史，后又征任为军谘祭酒，徙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祖逖不肯苟安于江南，以西晋倾覆，"常怀振复之志"。他向司马睿请求北伐说：今北方"遗黎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①。司马睿忙于建立东晋政权，无心北伐，便任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发给他"千人廪，布三千匹"②，不给甲仗，也不给士卒，命他自行招募组织军队。

西晋建兴元年(313年)，祖逖率故旧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③，声色壮烈，群情激奋。逖驻屯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制造兵器，收募士卒，组织起一支2000余人的军队。祖逖进据太丘，向谯国（治今安徽亳州）进军。流人坞主樊雅等在谯国不受晋命，逖联合蓬陂坞主陈川，击败樊雅，遂克谯国。祖逖在战乱中所获男女，"皆令归本，军无私焉"。陈川反叛附石勒，逖率众伐川，石季龙领兵5万救川，逖出奇兵以击之，季龙大败，徙陈川还襄国。石勒、桃豹等阻击逖军，为逖所败逃遁，祖逖进镇雍丘（今河南杞县）。石勒又遣精骑万人以拒逖，复为逖军所破，勒镇戍归附者甚多。当时北方各据一方的坞堡武装相互攻击，祖逖使人和解，示以祸福，遂受逖节度，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④。祖逖非常俭约，劝课

---

①②③④《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①，百姓喜悦。祖逖对接近胡族政权的坞主，“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坞主感戴他，“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②。祖逖以此常建奇功。石勒见祖逖力量日渐壮大，“不敢窥兵河南”③，便遣使请求互市通商。祖逖不予理睬，而听其互市，收利十倍，“公私丰赡，士马日滋”④。由于祖逖的北伐得到北方人民的拥护，他采取团结各种地方势力，共同对付少数民族政权的军队，常出奇制胜，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正当祖逖准备“推锋越河，扫清冀、朔”之时，晋廷内部内战即将爆发，朝廷派戴若思任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幽、冀6州诸军事，司州刺史，以防备王敦。这样，祖逖在军事行动上要受戴若思的掣肘。祖逖“虑有内难，大功不遂”，因而“感激发病”⑤。东晋大兴四年（321年），祖逖在雍丘病卒。不久东晋内乱爆发，祖逖收复的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又被后赵等军攻占。此次北伐的成果，因东晋内部争权夺利而化为乌有。

祖逖之后，有庾亮、庾翼兄弟的北伐。庾亮字元规，其妹为晋明帝皇后，成帝时以帝舅身份与名臣王导共执朝政，酿成苏峻之乱。庾亮后任都督江、荆、豫、益、梁、雍6州诸军事，领江、荆、豫3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州）。晋咸和八年（333年），后赵主石勒死，庾亮开始谋划北伐之事。他将自己豫州刺史一职授与辅国将军毛宝，使他与西阳太守樊峻率精兵1万，戍守邾城（今湖北黄州西北）；又以陶称为南中郎将、江夏相，率兵5000人入沔（即汉水）中；以其弟庾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镇江陵（今属湖北荆沙）；以武昌太守陈嚣为梁州刺史，趋子午谷（古代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又遣偏师进攻成汉。咸康五年（339年），晋军俘成汉荆州刺史李闳、巴郡太守黄植，送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庾亮准备率大军10万移镇襄阳（今湖北襄樊）的石头城，为诸军声援。临行，庾亮上疏陈北伐之策。晋廷下诏审议，大

---

①②③④⑤《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臣多反对。当年九月，后赵主石虎派大将夔安、张貉等南进，攻陷邾城，毛宝、樊峻突围赴江溺死，北伐之计遂被搁置。次年，庾亮忧郁发病死。庾亮死后，其弟庾翼出任都督江、荆、司、雍、梁、益6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代庾亮镇守武昌。庾翼才干胜过其兄，常以“灭胡平蜀为己任”。① 建元元年（343年），庾翼上疏请求北伐，但除其兄庾冰和桓温等人支持外，朝臣大多反对。庾翼锐意北伐，不顾朝廷阻止，违诏而行，率军进驻襄阳。当时庾翼有将士4万，军至襄阳后，大会僚佐，陈兵誓众，准备北进。晋廷在此形势之下，任命庾冰为都督江、荆、宁、益、梁、交、广7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镇武昌，以为庾翼后援。但庾翼未及大举进兵，康帝司马岳和庾冰于第二年（344年）相继死去，于是庾翼还镇夏口（今湖北武汉），“缮修军器，大佃积谷，欲图后举”②。穆帝永和元年（345年）七月，庾翼因病死去，北伐之志终未能竟。

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后赵主石虎初死，其国内大乱。征北大将军褚裒请求北伐，朝廷以其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兖、青、扬、豫5州诸军事，率军3万北上。褚裒进军彭城（今江苏徐州），“河朔士庶归降者日以千计”，北伐形势很好。但褚裒非将帅之才，派军与后赵南讨大都督李农接战，一战而败，便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当时后赵遗户20余万渡河，准备归顺东晋，因没有晋军接应，死亡殆尽。褚裒于当年惭恨而死。

褚裒败后，朝廷又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5州诸军事，进军北伐。永和八年（352年），殷浩以淮南太守陈逵、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开江西疁田千余顷，以为军储”③。永和九年，殷浩率7万大军自寿春（今安徽寿县）进军北伐，以归降的羌人酋长姚襄为前锋。军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姚襄倒戈进攻殷浩，殷浩本非将才，丢弃辎重而逃，士卒死伤万余人。殷浩北伐又告失败。

---

①② 《晋书》卷七十三《庾亮传附庾翼传》。

③ 《晋书》卷七十七《殷浩传》。

东晋前期北伐比较有成效的，是桓温的前两次北伐。

桓温，字元子，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为东晋大族，父桓彝，曾任宣城内史。桓温娶晋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累迁至徐州刺史。庾翼死后，桓温任都督荆梁等4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雄略有才干，志在恢复中原中建功，提高自己的威望。永和二年（346年）十一月，桓温乘巴蜀成汉政权衰弱之机，从江陵沿江西上，亲率步军直趋成都（今属四川）。次年三月，成汉主李势兵败出降，桓温灭成汉凯旋。平蜀之后，桓温进位征西大将军，位望渐高。

后赵主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桓温上表请求北伐。但东晋朝廷恐桓温一旦北伐成功，会专制朝政，不许其北伐。桓温愤愤不平，渐有不臣之心，所统“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①。当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又进督司州，权势更重，朝廷再也不能阻止桓温北伐了。

桓温的第一次北伐是在永和十年（354年），进攻目标是前秦。二月，桓温率步骑4万自江陵进兵北伐，由水路自襄阳入均口（在今湖北丹江口西，古均水入汉水的水口），然后自淅川（今河南淅川东）以步骑直趋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又命梁州刺史出子午道，合攻前秦。

桓温北伐进展顺利，别将所率偏师攻克上洛（今陕西商州），生擒前秦荆州刺史郭敬，接着又攻克青泥（今陕西蓝田南）。前秦主苻健遣太子苻苌率苻雄、苻菁等军共5万，屯于峣柳愁思堆（今陕西蓝田东南）抵御晋军。四月，桓温进至蓝田（今属陕西），大破前秦骁将苻生等，抵达霸上（今陕西西安东）。苻苌等退屯长安城南，苻健以老弱兵卒6000固守长安小城，又遣精兵3万为游军骚扰晋军。

桓温驻军霸上，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关中人民“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

---

①《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军'"①。桓温北伐，本拟依靠关中麦熟时，"取以为军资"②。但苻健"芟苗清野"③，桓温野无所获，军粮发生危机。加之前秦大将苻雄与温战于白鹿原，晋军不利，死者万余人。同时司马勋也在子午谷被前秦军击败。桓温于六月收取关中"三千余口而还"④，第一次北伐无功而返。

永和十二年（356 年），羌族酋长姚襄入居许昌（今河南许昌东），随后进攻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当年三月，朝廷以桓温为征讨大都督，进讨姚襄。此即桓温的第二次北伐。桓温遣督护高武屯据鲁阳（今河南鲁山），辅国将军戴施屯于黄河之上，率舟师以逼许、洛，又请徐、豫兵从淮、泗入黄河配合作战，自率大军自江陵继进。八月，桓温军至伊水，姚襄据水北迎战。桓温结阵向前，亲披铠甲督桓冲等奋力死战，大败姚襄于伊水之北，姚襄将士死者数千人，姚襄本人逃往平阳（今山西临汾）。桓温进入洛阳，迁徙降人 3000 余家于江、汉之间，表镇西将军谢尚为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以谢尚未至，留颍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河南太守戴施戍守洛阳，自率大军还师。

桓温攻克洛阳后，上表请求还都洛阳。东晋君臣但求偏安江南，无意收复失地，皆不同意迁都，但惧桓温权势，无人敢言。扬州刺史王述深知桓温心思，认为桓温实际"欲以虚声威朝廷，非事实也，但从之，自无所至"⑤。于是朝廷诏答桓温，"诸所处分，委之高算"⑥，有关迁都事宜请他筹划办理。当时晋军虽占领洛阳，并无条件迁都，桓温之言，实为虚张声势，后迁都之事果然作罢。桓温第二次北伐收复了旧京洛阳，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东晋君臣包括桓温在内，都没有认真北伐收复失地的诚心，而是各有所图，因而没能利用控制洛阳的有利局面，去图谋恢复大计。当桓温退军之后，司、豫、青、兖数州复陷于北方政权。

桓温两次北伐后，加任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假

---

①②③④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⑤⑥ 《晋书》卷七十五《王述传》。

黄钺，权势威望更重。桓温早有不臣之心，这时想“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①，以取代东晋，于是又发动第三次北伐。这次北伐，其进攻目标指向前燕。

太和四年（369 年）四月，桓温以“京口酒可饮，兵可用”②，兼领徐（治今江苏镇江）、兖（治今江苏扬州）2 州刺史，以便控制徐、兖 2 州兵权。随后亲率桓冲、袁真等步骑 5 万自镇地姑孰（今安徽当涂）北伐。大军途经金城（今江苏句容北），桓温见自己当年为琅邪太守所栽柳树皆已长大，慨然叹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③ 攀枝执条，泫然泪下。于是过淮、泗，与僚属登楼船远眺中原，又感叹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④当时天旱，水道不通，桓温乃凿钜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300 里，引汶水（今名大汶河，在山东西部）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以下称清水）以通舟运。六月，桓温进至金乡（今属山东），随即率舟师自清水入黄河，“舳舻数百里”，浩荡北进。临行，参军郗超建议说：“清水入河，难以通运。若寇不战，运道又绝，因敌为资，复无所得，此危道也。不若尽举见众直趋邺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风逃溃，北归辽、碣。若能出战，则事可立决。若欲城邺而守之，则当此盛夏，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矣”。他接着又陈述第二个作战方案：若“明公以此计轻锐，胜负难必，欲务持重，则莫若顿兵河、济，控引漕运，俟资储充备，至来夏乃进兵”⑤。郗超最后说：“舍此二策而连军北上，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以日月相引，渐及秋冬，水更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于时所忧，

---

①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

② 《晋书》卷六十七《郗鉴传附郗超传》。

③④ 《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按《晋书》本传和《资治通鉴》谓金城泣柳及登楼船远眺之事为第二次北伐时事，皆误。刘盼遂、程炎震先生考辨此事为太和四年第三次北伐时事，甚是。详见《世说新语笺疏》第 115 页《言语篇》及第 834 页《轻诋篇》。

⑤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四年六月。

非独无食而已"①。郗超所提出的急攻邺城（前燕都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与缓攻以待来年的两个作战方案，都是切实可行的。但桓温认为一策太冒险，二策太缓，均没有采纳。他命建威将军檀玄从陆路攻下燕之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以邓遐、朱序为前锋，水陆并进。

前燕主慕容暐闻知晋军来攻，以其下邳王慕容厉为征讨大都督，率步骑2万至黄墟（今河南杞县东南）抵御晋军。檀玄率军前进，大败慕容厉。与此同时，邓遐、朱序在林渚（今河南郑州东北）击败燕军将领傅颜。慕容暐又遣东安王慕容臧率军抵御晋军，不能敌。慕容暐遣使向前秦求救。七月，桓温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北伐形势甚好。

慕容暐听说晋军已至枋头，惊慌失措，想逃回和龙（今辽宁朝阳）。这时，深具谋略而素受猜忌的燕吴王慕容垂，请求率兵以拒温，如其不胜，再退和龙。慕容暐以慕容垂为南讨大都督，率范阳王慕容德等5万兵众再战晋军。慕容垂受命后，派尚书郎悉罗腾率军迎击桓温，杀其向导段思及后赵降将李述，晋军士气受挫。此外，慕容垂又遣慕容德等率骑兵1.5万据守石门（在今河南荥阳北），以切断桓温回归的水路。桓温进军之初，曾命豫州刺史袁真进军荥阳（今河南荥阳北），打通石门，引黄河水入汴渠（在今河南郑州、开封地区），以作退军之路。但袁真未能打开石门，及至慕容德军至石门，晋军退路被阻。燕豫州刺史李邽率骑兵5000断晋军粮道，晋军形势严峻。

九月，桓温与燕军数次交战不利，粮草竭绝，又闻知前秦助燕援兵将至，遂焚烧战船，丢弃辎重，从陆路由东燕（今河南延津东北）经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退军。晋军步行700余里，退至襄邑（今河南睢县西）。当桓温初退兵时，燕军将士争欲追赶，慕容垂劝阻说："温初退惶恐，必严设警备，简精锐为后拒，击之未必得志，不如缓之。彼幸吾未至，必昼夜急趋，俟其士众力尽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

气衰，然后击之，无不克也”①。垂亲率8000骑兵蹑行其后，数日后，桓温果然命部下兼道而行，慕容垂命令燕军急速追赶，在襄邑追上晋军，当时慕容德已率精锐骑兵4000伏于襄邑附近，与慕容垂夹击晋军，晋军大败，被杀3万余人。桓温逃至谯县（今安徽亳州），又被前秦将领苟池伏击，死者亦数以万计。桓温第三次北伐，遂以惨败告终。

桓温北伐之所以没有成功，除了军事指挥上迟疑不进，贻误战机外，更深的还是政治上的原因。前燕大臣在论桓温这次北伐时，申胤指出：“以温今日声势，似能有为，然在吾观之，必无成功。何则？晋室衰弱，温专制其国，晋之朝臣未必皆与之同心。故温之得志，众所不愿也，必将乖阻以败其事”。他接着又说：“（桓）温骄而恃众，怯于应变。大众深入，值可乘之会，反而逍遥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胜；若粮廪愆悬，情见势屈，必不战自败”②。这段议论，既指出了桓温与晋廷之间的矛盾，朝臣不愿意他北伐取胜，又指出了桓温北伐战略上的失误，不能抓住战机，企图“坐取全胜”，扬名立威，以便回师篡夺东晋政权，这些正是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三节　东晋后期的南北形势

东晋后期，政治军事形势比之前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最大变化是士族阶层开始走向衰落，庶族阶层相应地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东晋末期的农民起义狠狠地打击了东晋的高门士族，而寒门庶族的代表人物刘裕乘机掌握了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寒门庶族较之腐朽的士族富有生气，因而刘裕集团的崛起给东晋的政治带来了生机。比如刘裕当政后，抑制士族豪强势力，打击贪官污

---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四年九月。

②《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二《晋纪二十四》海西公太和四年八月。

吏，调整阶级关系，整理人口户籍，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加强朝廷集权等，这些都是针对东晋门阀政治流弊而采取的措施。刘裕的一系列革新，使东晋后期的政治，比起前期来确有很大起色。

从军事上说，东晋以来荆、扬二地的军事力量，大体上分别掌握在方镇与朝廷士族当权派手中，而举足轻重的北府兵权则一直掌握在士族手中。东晋王朝实际上一直未能真正控制北府兵权。刘裕集团主要由北府兵的中下级军官组成，他们执掌了中央政权，便自然地将北府兵权控制在中央政权之下。同时，刘裕集团在消灭桓玄势力的同时，又控制了荆州的军事力量。尤其在刘裕吞并另一北府名将荆州刺史刘毅后，更将荆州收归自己掌握之中。因此，东晋后期刘裕掌权时，荆、扬二州以及北府兵这几股军事力量都由朝廷所控制，这在东晋门阀政治下是前所未有的。这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增强了东晋王朝对外作战的军事力量。此外，刘裕集团多为军人出身，有着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刘裕本人便是一个极为出色的军事家。因而东晋后期晋廷在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上，都远远超过前期和中期。

东晋后期的北方，出现了空前混乱分裂的局面。东晋太和五年（370 年），前秦王朝消灭前燕统一北方，曾一度结束了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但在东晋太元八年（383 年）的淝水之战后，前秦王朝兵败覆亡，各少数族贵族纷纷乘机起事，重建自己的政权，北方又出现了政权林立的分裂割据局面。

当时今河北、山东及山西地区，分布着由鲜卑慕容氏先后建立的后燕、西燕和南燕 3 国，在辽西地区则有冯跋建立的北燕。今陕西及甘肃东部加上内蒙古的伊克昭盟，先后存在着羌族姚氏建立的后秦、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大夏和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今青海乐都、西宁一带及甘肃的河西走廊，先后出现过汉人李氏建立的西凉，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以及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

这些割据政权中，以慕容垂建立的后燕和姚苌建立的后秦为最强。后燕建于东晋太元九年（384 年），以中山（今河北定州）为

都，占有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曾灭掉西燕等国，是当时中原地区割据政权中最强大的一个。后秦也建于东晋太元九年，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占有今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南等省的部分地区。后秦也是当时割据政权中较为强大的一个政权，曾攻占东晋控制的洛阳地区。

在北方诸割据政权中，与东晋直接接壤的，东面是南燕，西面是后秦。因而东晋后期的北伐目标主要便是南燕和后秦。当时北方各政权之间的互相征战，使其军事实力不断削弱，为东晋北伐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第四节　刘裕灭南燕之战

（参见附图1）

刘裕在平定桓玄之乱后，以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南徐、南兖二州刺史等职镇守京口，遥控朝政。义熙四年（408年），刘裕入朝加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掌握了东晋大权。他为扩大东晋领土，以及增加个人威望，为取代晋室扫清道路，发动了北伐南燕之战。

南燕慕容德在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建立，定都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占有青、兖地区（今山东一带），南与东晋接壤。义熙五年（409年）二月，燕主慕容超先后派遣骑兵攻略东晋宿豫（今属江苏）、济南（治今山东济南）等地，生俘晋阳平（治今江苏盱眙东）太守刘千载、济阴（治今江苏盱眙西）太守徐阮、济南太守赵元等人，俘走东晋百姓3500余口。

同年三月，刘裕上表北伐，以丹阳尹孟昶留守建康。四月，刘裕率舟师自建康进发，沿淮水入泗水（淮水下游第一大支流）。五月，刘裕大军进抵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留下船舰辎重，从陆路经琅邪（今山东临沂）北进。所过之处，皆筑城垒留兵把守，以防敌军切断运路。

南燕主慕容超闻知晋军来攻，集朝臣商议军谋。尚书公孙五

楼献计说："吴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大岘山，即今沂山，上有穆陵关），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南燕将）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①。慕容超对其上、中二策皆不肯纳，认为晋军纵使过大岘山而来，燕军可凭借"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徐以精骑践之"②，击败晋军。慕容镇提出："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贻窘逼"③。慕容超均不予采纳。

晋军北伐之前，曾有人分析敌情，认为南燕或据大岘之险，或坚守广固，割掉麦苗，坚壁清野，晋军将面临险境。刘裕胸有成竹地说："鲜卑贪，不及远计，进利克获，退惜粟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今属山东），退守广固。我一得入岘，则人无退心，驱必死之众，向怀贰之虏，何忧不克。彼不能清野固守，为诸君保之"④。燕军的战略部署，果不出刘裕所料。五月，刘裕率军不战而过大岘，喜形于色，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六月，进抵东莞（今山东莒县）。

慕容超在晋军未至东莞时，遣公孙五楼及左军将军段晖、辅国将军贺赖卢等 6 将率步骑 5 万据守临朐，这时闻晋军临近，又亲率 4 万军队赶至临朐。慕容超为了切断晋军的水源，命公孙五楼率骑兵进据离临朐四十里的巨蔑水。公孙五楼急驰巨蔑水，被早已到那里的晋军前锋孟龙符击败，返回临朐。刘裕命令众军步进，以战车 4000 辆分为左右两翼，双车并行，缓缓而进，车上皆张设布幔以防弓矢，步兵夹在战车之间，另以骑兵为游军，负责掩护警戒。晋军进至距临朐数里之处时，慕容超派铁骑万余前来迎战，刘裕命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齐力击之，双方

①②③《晋书》卷一百二十八《慕容超载记》。

④《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激战过午，未分胜败。参军胡藩向刘裕献计，认为南燕悉众来战，其后方临朐必然空虚，请以奇兵偷袭临朐。刘裕依计而行，遣谘议参军檀韶与胡藩等军轻骑奔袭临朐。临朐防守空虚，被檀韶等人一举攻克，南燕辎重尽为晋军所获。慕容超大惧，奔往城南段晖军。刘裕得知檀韶等已克临朐，大军奋击，南燕军大败，段晖等 10 余名将领被杀，慕容超率残众逃回广固。

刘裕乘胜追击，直抵广固城下，一举攻克广固大城（外城）。慕容超在晋军猛攻之下，退守小城（内城），使尚书郎张纲向后秦求救，后又继派尚书令韩范再往后秦求救。刘裕命将士设长围巩固大城防守，围高 3 丈，外穿 3 重壕堑。晋军以南燕当地粮谷为食，停止江、淮等地转输军粮。刘裕“抚纳降附”，“援才授爵，因而任之”①，从政治上分化瓦解敌人。

七月，南燕大将垣遵、垣苗兄弟逾城投降刘裕。这时有人告诉晋军，要想攻克广固小城，必须用张纲所造的攻城器具。张纲从长安返回，泰山太守申宣执送晋军，裕命张纲登楼车绕城大嚷，称大夏国大败后秦，后秦无兵可救。城中燕军听说，惊恐不安。北方人民执戈送粮，投奔裕军的每日以千数。慕容超请割地求和，刘裕不许。后秦主姚兴见南燕使者后，即派人对刘裕说：“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②。刘裕知道后秦乃虚张声势，便对来使说：你告诉姚兴，我平定燕国之后，息甲三年，当出兵平定关、洛。如姚兴自送死，便可速来。

十月，张纲攻城器具制造完毕，“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这时投降东晋的南燕尚书张俊劝刘裕说：“燕人所恃者，谓韩范必能致秦师也，今得范以示之，燕必降矣”③。刘裕遂命人招降韩范，韩范向后秦求救兵未能成功，遂投降刘裕。刘裕示韩范循城绕行，城中燕军人情离沮，没有斗志。

---

①②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五《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五年九月。

次年正月，燕将贺赖卢、公孙五楼等掘地道出战晋军，兵败退回。刘裕挥军猛攻，城中燕军出降者络绎不绝。二月，南燕尚书悦寿开城门迎纳晋军入城，刘裕攻占广固小城。慕容超与数十骑出逃，被晋军俘获，刘裕以其不降，将他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灭亡。

刘裕攻灭南燕之战，谋略周密，深知敌情。在战术上采用步、骑、车 3 个兵种协同作战，有力地遏制了南燕强大铁骑的冲击。在战争谋略上，临敌出奇制胜，袭击敌后方，并用政治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南燕主慕容超骄傲轻敌，摒弃守险拒敌，以及出大岘用骑兵野战歼敌的正确谋略，纵敌入境。两军大战时，没有周密的战略部署，不善于寻找战机，发挥骑兵优势，一旦失利，便消极地退守孤城，这些都是燕军失败而亡国的重要原因。

第五节　刘裕灭后秦之战

（参见附图 2、3、4）

刘裕灭掉南燕后，本欲乘胜平定后秦，因当时正值卢循义军进逼建康，刘裕只好回军救援京师。刘裕先扑灭了卢循、徐道覆的起义，接着又先后攻灭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鲁宗之等反对势力。义熙九年（413 年），刘裕命益州刺史朱龄石率兵入蜀，消灭了割据蜀地的谯纵。刘裕在晋廷的权势，更加巩固，为平定后秦，更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义熙十二年（416 年），后秦主姚兴死，诸子争夺皇位，后虽由姚泓继承了帝位，但政治混乱，内部矛盾尖锐，刘裕决定乘机北伐，消灭后秦。

同年八月，刘裕率大军自建康进军北伐，分派诸将，5 道并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率军直趋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命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率步军自寿阳（今安徽寿县）渡淮、淝向许（今河南许昌东）、洛（洛阳，今河南洛阳

东）方向进军；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率军向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在今河南荥阳北），自汴水入黄河；冀州刺史王仲德总督前锋诸军，同时率水军开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入黄河。刘裕亲率大军进驻彭城（今江苏徐州），统一调度诸军，以便相机行事。刘裕上述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以前锋诸军水陆并进，合击攻取洛阳，同时以沈田子军为偏师，牵制关中（古称函谷关以西地区为关中）后秦军队来援，待洛阳得手后，刘裕再率大军北上洛阳，会合诸军攻取关中。基于以上战略方针，刘裕曾告诫王镇恶等军，"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①。

九月，刘裕进抵彭城。东晋各路前锋进展顺利，所向克捷。王镇恶、檀道济军连克新蔡（今属河南）、项城（今河南沈丘）、许昌（今河南许昌东）、漆丘（今河南商丘北）等地。沈林子、刘遵考军由汴入河，攻占仓垣（今河南开封北）。朱超石、胡藩军顺利进抵阳城一带。王仲德军开通巨野泽进入黄河，逼近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北魏滑台守将尉建畏惧，弃城而逃，晋军占领滑台。北魏明元帝拓跋嗣遣大将叔孙建、公孙表率兵渡河，质问晋军侵夺滑台缘由。王仲德命人讲明尉建主动放弃，晋军才进入滑台的。刘裕向北魏解释，晋军只想假道伐秦，对北魏无恶意。于是北魏筑垒河上，严阵戒备。

十月，晋军又攻克阳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进至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后秦洛阳守将姚洸见晋军临近，向长安求救。后秦主姚泓派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3000、武卫将军姚益男率步卒1万救援洛阳，又令并州牧姚懿屯兵陕津（在今河南陕县），以为声援。后秦援军未至之前，秦将赵玄劝姚洸收缩诸戍之兵，固守金墉城（在当时洛阳西北隅，今河南洛阳东），以待援兵。但姚洸司马姚禹等人暗与晋军檀道济私通，极力劝姚洸出战。姚洸派赵玄率精兵千余人南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广武将军石元讳

① 《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

东戍巩城（今河南巩义西南），抵御晋军。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军自成皋等地长驱直进，石元讳军行至半途，闻晋军已到，退回洛阳。赵玄与晋军战于柏谷坞，兵败战死。檀道济军直抵洛阳，姚洸出降。晋军占领洛阳，俘获秦降卒4000余人，檀道济将其全部释放，秦民感悦，归服者甚众。后秦援军闻洛阳已破，停止前进。

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刘裕以其子刘义隆为徐州刺史，留守彭城，亲率大军从彭城西进。此时，后秦发生内乱，姚泓君臣内外交困，一片慌乱。刘裕进军之初，曾令前锋各军攻克洛阳后，等待各军齐会一同西进。王镇恶、檀道济见后秦发生内乱，有机可乘，遂于同年二月自洛阳分兵西进。一路由王镇恶统率，进军渑池（今河南渑池西），攻占蠡城（今河南灵宝北），直抵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北）。另一路由檀道济、沈林子统带，自陕县（今属河南）渡过黄河，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未能克，遂回师南下，与王镇恶合力进攻潼关。

后秦平息内乱后，闻晋军来攻潼关，姚泓以东平公姚绍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督率武卫将军姚鸾等步骑5万守潼关。三月，檀道济等军进至潼关，姚绍引兵出战，檀道济、沈林子率战士奋勇向前，大破姚绍，斩获数以千计，乘胜攻破潼关。姚绍退守定城（在潼关西30里），依险拒守。姚绍以晋军孤军深入，兵少粮寡，命姚鸾率军断晋军粮道。沈林子率精兵袭击姚鸾军营，杀姚鸾及其将士数千人。姚绍又遣大将姚瓒屯驻黄河之上断晋军水路，又被沈林子击败，退还定城。王镇恶等军未等后续大军，便乘胜克取潼关，与秦军相持于潼关以西一线，军粮渐至枯竭，军心摇动，有人提议弃辎重回师与大军会合。沈林子闻听大怒，按剑说："相公（指刘裕）志清六合，今许、洛已定，关右将平，事之济否，系于前锋。奈何沮乘胜之气，弃垂成之功乎！且大军尚远，贼众方盛，虽欲求还，岂可得乎！"① 田子坚定地表示，将独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安帝义熙十三年三月。

军而进。此时，王镇恶一面向刘裕大军求援，一面亲自到附近地区筹集军粮，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①。晋军上下人心方安。

刘裕自彭城北进，三月抵达黄河，准备溯河西上，便派人向北魏请求借路。北魏明元帝恐刘裕北上攻魏，遣司徒长孙嵩为督山东诸军事，又遣大将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率步骑10万屯驻黄河北岸，监视晋军。刘裕借路没有结果，便以左将军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自率大军入河西上。北岸魏军以数千骑兵随晋军沿黄河西行，晋军南岸拉纤兵士有被激流冲至北岸者，皆被魏军杀伤。刘裕派军上北岸攻击，魏军立即退走，当晋军退后，魏军复来。四月，刘裕派白直队主丁旿率700人及战车百乘，抢渡北岸，在距水百余步处布下弧形的却月阵，两头抱河，每辆战车设置7名持杖士卒，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率2000兵士，在丁旿布阵完毕上岸接应，并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加设20名士卒，在车辕上张设盾牌。魏军见晋军在北岸立营，依仗人多四面围攻。长孙嵩率骑兵3万助战，一起猛攻北岸晋营。朱超石以大弩猛射，并选善射者以箭集束发射，魏军愈战愈多，弓弩不能制。朱超石又命将士用所携带的千余张矛，截断为三、四尺长短，用大锤击尖利以杀敌，一根断矛洞穿敌数人，魏军不能抵挡，一时奔溃，晋军阵斩阿薄干。超石率宁朔将军胡藩等追击，大破魏军，斩获千计。晋军终于沿黄河顺利西进，四月下旬到达洛阳。五月，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建议北魏派兵截断晋军退路。明元帝问计于谋臣崔浩，崔浩认为刘裕一定会平定后秦，他回师后将会篡位，而关中必不能守，最终会为北魏所有，劝明元帝静观其变。明元帝从其计，但仍派长孙嵩、叔孙建等各率精兵监视晋军，准备在晋军西进后，伺机南侵。

七月，刘裕抵达陕县。此时，沈田子、傅弘之等率偏师千余人，从潼关之南西进，已顺利地进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秦守戍将领皆弃城逃跑，田子军进屯青泥关（在今陕西商州西北）。

---

①《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

八月，姚泓见晋军逼近长安，决定亲率步骑数万至青泥，意欲先消灭沈田子军，无后顾之忧后，再率大军东出与刘裕大军决战。当时刘裕已派沈林子率军增援沈田子而尚未到达，沈田子当机立断，乘秦军初至，营垒未立，遂以千人之众迎战，激励士卒，奋勇向前，遂以寡击众，大破秦军，斩首万余级，姚泓逃还灞上（今西安东）。沈田子与沈林子两军会合，继续前进，关中郡县多降于田子。

刘裕在八月初到达潼关，除派沈林子增援沈田子，令两人合军由青泥侧击长安外，又以朱超石为河东太守，率军北渡黄河进攻蒲坂，自己率主力自潼关直趋长安。朱超石军被后秦军击败，退回潼关。晋军南北两翼一胜一败，使战势变得复杂起来。这时王镇恶请求出奇兵自黄河溯渭水而上，进攻长安。刘裕从之。当时后秦香城（今陕西大荔东）守将姚难率军西撤，王镇恶随后追击，秦镇北将军姚强与姚难合军屯于泾水之上抵御晋军。王镇恶命将毛德祖进击，大破秦军，姚强战死，姚难逃奔长安。秦东平公姚瓒屯驻定城，见战局不利，退守郑城（今陕西华县），刘裕挥军西进。

后秦聚集在长安附近的军队有数万人，姚泓回至长安后，分派诸将，紧急布置防务，令姚丕守渭桥（在长安城北）、胡翼度屯石积（在长安城东北）、姚瓒屯灞水之东、姚洸屯于沣水之西，自己率军屯于逍遥园。又令姚裕、庞统屯兵宫中，使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以加强防守，稳定人心。

王镇恶率水军自溯渭水而上，令将士乘坐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舱内，后秦人见船无人驾驶而自行，惊以为神。八月下旬，王镇恶水军抵达渭桥，令将士饱餐之后，便弃船登岸。转眼间船舰随渭水洪波而去。王镇恶激励将士说："卿诸人并家在江南，此是长安北门外，去家万里，而舫乘衣粮，并已逐流去，岂复有求生之计邪！唯宜死战，可以立大功，不然，则无遗类矣"①。他身先士卒，率军奋勇向前，大破姚丕军。姚泓率兵来救，遇姚丕败兵自相践踏，不战自溃，姚泓单骑逃回宫中。王镇恶自平朔门（长

① 《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

安北门）进入长安。姚谮乘夜率诸军来与姚泓会合，晋军已将长安城门防务部署好，姚谮军不得入，众皆惊散。八月二十四日，姚泓被迫出降，不久姚谮亦投降晋军，皆被刘裕所杀，后秦灭亡。

刘裕北伐灭后秦之战，在战略上始终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大军至潼关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裕对原来的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使正兵和奇兵的任务发生了颠倒，变成了以正兵牵制敌人，而以偏师、奇兵入武关、进渭水，对敌进行突然袭击。这种战法，正符合《孙子兵法》一书中所说“以正合，以奇胜”的用兵原则。刘裕在指挥战争中，善于因势利导，变化莫测，从而使敌人陷入被动，晋军终于取得了胜利。刘裕本欲留驻长安，经略西北。但诸将领“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①。加之刘裕与桓温有相同的一面，即北伐成功后，伺机取代东晋称帝。恰好当时由于他留下掌握朝政的尚书左仆射刘穆之突然病故，政权有旁落的危险。刘裕便决定东归，以12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长安。以王修为安西长史、王镇恶为安西司马、沈田子与毛德祖为安西中兵参军，率兵一万辅佐刘义真镇守关中。

刘裕在同年十二月率军东归，临行之前，关中父老流泪挽留说：“残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②但刘裕灭后秦目的已达到，他决定回江南夺取皇位，不顾百姓的请留，依旧自洛阳入黄河，经汴水南归建康。

由于留居长安的王镇恶与沈田子、傅弘之等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并互相残杀，到东晋义熙十四年（418年）十一月，长安被大夏军攻占，关中地区得而复失，这次北伐的成果又丧失殆尽。但由于刘裕两次北伐所取得的胜利，东晋领土扩展到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因而从刘裕代晋到刘宋元嘉之末，约40余年内，是东晋南朝统辖区域最大，以及国力最强盛的时期。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安帝义熙十三年十一月。

第七章　东晋末年的农民战争

第一节　东晋的腐败统治及社会矛盾的加剧

一、东晋末年政治的黑暗腐败

东晋是门阀士族执政的顶峰时期，高门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垄断高官显位的特权；在经济上有广占良田沃土、山川湖泽，以及合法占有供其役使各类劳动人手的特权；在法律上有减免处罚的所谓“八议”的特权，从而使高门士族成为封建统治最上层的一个特殊贵族等级。东晋王朝对士族官僚实行的种种优待，必然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之上。士族的特权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另一面，便是自耕农的小土地所有制的萎缩，也即自耕农这一阶层的衰落。自耕农是东晋王朝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由于他们不断的破产，国家编户不断缩减，他们身上所负担的赋税徭役也就愈来愈重。

东晋初年，大体沿袭西晋课田制度，“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斛同石）”①，平均每亩八升。至太元二年（377年），晋孝武帝改按田亩征租为按人口收租，“王公以下，口税三斛”②。太元八年（383年），“又增税米，口五石”③。不按土地而按人口征收田租，显然有利于拥有大量土地的士族官僚，而对自耕农来说，

---

① 《初学记》卷二十七引《晋故事》。

②③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则大大加重了负担。东晋的户调按户征收，每年大约征布四匹。田租、户调是国家的正税。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临时征发的苛捐杂税，东晋农民的赋税负担十分沉重。

徭役对农民的摧残更甚。东晋仍以16岁为全丁，13至15岁为半丁，全丁服全役，半丁服半役。按照朝廷的规定是“男丁，每岁不过二十日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①。从制度上看，徭役并不很重，但实际上朝廷并不按制度规定征发。农民负担的徭役远远超过朝廷的规定，如庾和在升平年间（357～361年）为丹阳尹，一次就“表除众役六十余事”，未除的当不在少数。因而农民常常“残形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②。可见徭役直接摧残劳动力，破坏农民生产尤甚。

自耕农之外，东晋的佃客、部曲等封建依附人口处于更加悲惨的境地。他们虽然不负担国家的赋税徭役，但失去人身自由，要遭受所属主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东晋在淝水之战后，朝政大权落入皇室司马道子手中。当时孝武帝在位，他“溺于酒色，殆为长夜之饮”③。司马道子残暴昏庸，执政后“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④。太元二十一年（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司马德宗即位，是为晋安帝。安帝是个白痴，朝政大权尽入司马道子之手，政治更加腐败黑暗。隆安元年（397年），青、兖2州刺史王恭以诛司马道子的亲信王国宝等人为名起兵，迫使司马道子杀王国宝。隆安二年，王恭再次起兵，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等都起兵响应。司马道子之子司马元显虽然施计使王恭部将刘牢之反戈，平息了叛乱。但这次叛乱的方镇各据一方，东晋政令所行只限于今江浙一带，也即会稽（治今浙江绍兴）、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南）、永嘉（治今浙江温州）、东阳（治今浙江金华）、新

---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晋书》卷七十五《范汪传附范宁传》。

③ 《晋书》卷九《晋孝武帝纪》。

④ 《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安(治今浙江淳安西北)、吴(治今江苏苏州)、义兴(治今江苏宜兴)等8郡。这些地区本为南北士族麇集之地,百姓所受压迫剥削本来沉重,而这时东晋朝廷的财政及徭役负担几乎全部压在他们头上,使其处境更为艰难。因此,浙东地区成为东晋末年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一场人民起义斗争正是在这里爆发的。

二、五斗米道的广泛传播

五斗米道,又称天师道,始创于东汉。五斗米道与太平道是早期道教中两个最大的教派。东汉末年,当太平道发动黄巾起义时,五斗米道也在巴蜀地区举行了武装斗争。魏晋之际,五斗米道传入江南,开始在民间广泛传播。东晋葛洪以儒学入五斗米道,对五斗米道进行了一番改革,使其蜕变为封建地主阶级也可信奉和利用的宗教。此后,五斗米道逐渐在士族官僚中传播。当时如琅邪王氏、孙氏、高平郗氏、吴郡杜氏、会稽孙氏、陈郡殷氏、丹阳葛氏、许氏、陶氏、东海鲍氏、吴兴沈氏等都为五斗米道世家。这样,下层群众信奉五斗米道原始教义,并以此作为发动起义的组织纽带,更具备了有利的条件。

晋孝武帝(373～396年在位)时,钱唐人杜子恭为三吴(指会稽、吴、吴兴)五斗米道之道首。琅邪孙氏"世奉五斗米道"①。孙恩之叔父孙泰,曾师事子恭。杜子恭死后,孙泰继为三吴地区道首。孙泰信徒甚众,三吴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求福庆"②。孙泰成为宗教领袖后,开始利用五斗米道宣传组织群众,积蓄力量,准备伺机起事。当王恭叛乱时,孙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③。东晋朝廷惧怕孙泰为乱,遂于隆安二年(398年)冬,诱杀孙泰及其六子。其侄孙恩逃亡海上,"聚合亡命得百余人,志欲

---

①②③《晋书》卷一百《孙恩传》。

复仇”①，这就埋下了起义的火种。

第二节　孙恩起义

一、孙恩起义的爆发

司马元显平息王恭之乱后，实际上掌握了东晋朝政大权。司马道子终日嗜酒昏醉，其子司马元显乘机夺其父权，将扬州刺史一职据为已有。元显虽大权在握，但当时桓玄与殷仲堪等结盟于寻阳（今江西九江西），控制建康上游地区。在王恭之乱中倒戈归向朝廷的刘牢之坐镇京口（今江苏镇江），控制长江下游及江北一带。司马元显对方镇拥兵自重，如芒刺在背，时刻担心着方镇举兵反叛，而要解除这种威胁，最根本的是要组建一支自己控制的具有实战能力的军队。

隆安三年（399年）十月，司马元显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征发东土三吴诸郡原为奴隶被放免为佃客的人充兵，号称“乐属”。由于当时兵士身份低贱，战乱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难，加之地方官吏征发免奴为客者充兵时，常常滥发编户农民，因而当征兵令下达后，“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②。因此，终于由征兵引发了孙恩起义。

当年十月，孙恩利用佃客及编户农民对征兵令的忿怨，以及人心骚动的有利时机，率领徒众数百人从海上登陆，攻打上虞（今属浙江），杀上虞县令，转而进攻山阴（今浙江绍兴）。孙恩的起兵受到百姓的热烈响应，转瞬间起义军发展到4万人。十一月初二日，孙恩一举攻克山阴，杀会稽内史王凝之。义军得到当地

---

①《晋书》卷一百《孙恩传》。

②《晋书》卷六十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

百姓的衷心拥护，史称“会稽大小莫不翼戴”①。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发展成为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二、孙恩义军的三次攻晋战争

孙恩攻克上虞、山阴2城后，东土地区“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②。各地义军相继向会稽集中，山阴成为东土农民起义的中心。孙恩首义，众望所归，成为东土诸郡义军的领袖，他自称“征东将军”，号义军将士为“长生人”。

孙恩义军四处出击，纵横于东土地区，他们攻杀东晋郡县守令，焚烧官府，攻占郡县。东晋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等政府官员，皆被义军杀死。吴国内史桓廉、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等弃郡而逃。义军迅速控制了东土大部分地区，设置官署，建立起临时政权机构。在孙恩义军声势的影响下，东晋京师建康附近的百姓也纷纷起兵响应，“畿内诸县，处处蜂起”③。

义军的迅速发展，引起东晋朝廷的恐慌，晋廷以北府名将徐州刺史谢琰为兼督吴兴、义兴军事，与辅国将军刘牢之进剿义军。谢琰是名相谢安之子，曾任北府兵将领参加过淝水之战。刘牢之是北府名将，所率北府兵“百战百胜”，有很强的战斗力。

孙恩在攻占东土诸郡过程中，交战敌手是“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的郡县兵，因而所至战无不胜。孙恩因此而产生骄傲轻敌情绪，认为“天下无复事矣，当与诸君朝服而至建康”④。以孙恩领导的骄兵，在谢琰、刘牢之指挥的北府劲旅的攻击下，义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

---

① 《太平广记》卷三百二十三引《志怪录》。

②③④ 《晋书》卷一百《孙恩传》。

隆安三年十二月，谢琰攻陷义军控制的义兴（治今江苏宜兴），杀义军所置太守许允之。随后，谢琰又攻占吴兴（今浙江湖州）。刘牢之进军吴郡（治今江苏苏州），谢琰派部将高素率军与刘牢之协同作战。两人共同攻克会稽，杀义军设置的吴郡太守陆瓌、吴兴太守丘尪、余姚令沈穆夫等人。孙恩义军在官军的连续进攻之下，战势不利，被迫向海岛撤退。孙恩的第一次攻晋，虽在初期取得了巨大胜利，终因孙恩的麻痹轻敌而遭致失败。

孙恩退入海岛后，刘牢之还镇京口，谢琰被任为会稽内史，都督会稽、临海、东阳、永嘉、新安等5郡诸军事，戍守海边，以防义军再度登陆。

孙恩义军第一次登陆，虽遭失败，但主力并未损失，经过休整后，于隆安四年(400年)四月，乘谢琰猝不及防，又从海上登陆，发动突然袭击，攻破上虞，进至邢浦(今浙江绍兴北)。谢琰闻讯，急调参军刘宣之阻击义军，义军有意麻痹敌军，主动退回海岛以示弱，数日后，义军再次登陆，攻入邢浦。这时，谢琰部下以义军势盛，建议"宜持严备"，列置水军，分兵设伏以抵御义军。谢琰经第一次战胜义军后，狂妄骄横，不肯听从。五月三十日，谢琰军在山阴附近与义军相遇，琰军尚未早餐，谢琰大言不惭地说："要当先灭此寇而后食也"①。两军交战之地河湖密布，"塘路迮狭"，官军只能鱼贯而行。义军在战舰之中，万箭齐发，官军前后失去联系，中箭者人仰马翻，大败溃散。谢琰及其二子谢肇、谢峻皆被义军杀死。琰前锋广武将军桓宝，也临阵被杀，孙恩义军再次攻占山阴。

谢琰兵败身死的消息传到建康，朝廷震动，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等北府兵将领至东土进攻义军。义军给予迎头痛击，在余姚大败高雅之部，敌军"死者什七八"②。晋廷又以刘牢之为镇北将军、都督会稽五郡诸军事，进剿义军。孙恩为保存实力，退守浃口（今浙江宁波镇海南甬江入

---

①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琰传》。

② 《晋书》卷二十五《天文志》三。

海处）。

隆安五年（401年）二月，孙恩率义军从浃口进军，攻打句章（今浙江宁波南）。刘牢之部将刘裕领兵据守，义军围攻数十日，城不能克，复归浃口。三月，义军转攻海盐（今属浙江），刘裕又在海盐筑城固守。义军与刘裕军展开激战，晋军虽惨遭失败，但义军未能攻下海盐，只好转攻沪渎（今上海青浦）。五月，义军攻克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及官军4000余人。此时，义军为摆脱刘牢之和刘裕的晋军主力，进行战略大转移，利用水师优势，以10万大军分乘战船千艘，浮海进攻东晋重镇京口（今江苏镇江），兵锋直指东晋京师建康。

京口是建康东面门户，义军兵锋所指，正是敌之要害。朝廷闻义军来攻，宣布京城“内外戒严”，布阵列守，并急调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入援京师。六月一日，孙恩所率水师进至丹徒（今属江苏），京师震动。这时司马尚之还在途中，刘牢之远在山阴，其他晋军惧义军声势，不敢进兵。只有刘裕率北府兵一部倍道兼行，驰援建康，差不多与义军同时到达蒜山（今江苏丹徒西）。义军当时有10万之众，而刘裕所统兵力不多，又因步行远来疲惫，在力量对比上，显然义军处于优势地位。于是义军与晋军在蒜山附近展开战斗，义军主力攻破敌人要害后，弃刘裕军不顾，乘船直趋建康。但由于义军所乘楼船高大，又逆风而行，速度缓慢。当义军水师抵达白石（今江苏南京北），司马尚之军已先期赶到。与此同时，刘牢之也率北府兵援救建康，京都的防卫力量逐渐增强。孙恩乘官军分散，“欲掩不备”的战略目标，没有能够实现。

根据当时军情，孙恩放弃攻打建康的计划，将义军分为两部，主力由自己亲自率领，从海上进至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东，当时为海岛）；另一偏师由义军首领卢循率领，进攻广陵（今江苏扬州）。不久，卢循消灭官军3000余人后，至郁洲与孙恩会师。当年八月，刘裕等人率官军追赶义军至郁洲。两军激战，义军失败，损失严重。孙恩率军南下，刘裕继续尾随追击。由于长时间航行在海上，数万名兵士得不到休整，给养也得不到补充，战斗力大

为削弱。十一月，义军在沪渎、海盐等地连续登陆都没有成功。加上当时义军“饥馑疾疫，死者太半”。孙恩又被迫退回海岛。

元兴元年(402年)三月，孙恩乘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火并之机，率义军再次登陆，进攻临海(治今浙江临海东南)，发动第三次攻晋战争。由于此次攻晋与上次仅相差3个月时间，义军大败之后元气未复，义军战斗力不强，因而攻打临海未下，反被临海太守辛景击败。义军连遭重创，濒临绝境。孙恩见大势已去，不肯做官军俘虏，于临海投海自尽，义军将士随孙恩一同投水而死者数百人。孙恩义军自开始起义的数十万人，于沿海转战南北，战斗牺牲，及疾疫死亡，最后只剩下数千人。孙恩的三次攻晋战争，虽曾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最终仍在东晋北府兵劲旅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

第三节　卢循、徐道覆分兵北征

一、卢循进军广州

卢循是孙恩的妹夫，随孙恩一同起义。孙恩死后，义军余众推举卢循为义军首领，循自称征虏将军。

元兴元年（402年）五月，卢循率义军进击东阳（治今浙江金华），北府将领刘裕率兵抵御，义军与战不利，转而攻占永嘉（治今浙江温州）。当时执政的桓玄忙于巩固自己地位，为安定东土，委任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虽然受职，却仍与朝廷为敌，“寇暴不已”①。次年正月，卢循派其妹夫徐道覆率兵再攻东阳，又被刘裕击败，义军转移至晋安（治今福建福州）。刘裕率官军追至晋安，卢循为了摆脱刘裕的追击，保存义军实力再图发展，决定作战略大转移，从东土向广州（今属广东）进军。

元兴二年（403年）冬，卢循、徐道覆率义军浮海南下。次年

---

①《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六月，义军抵达番禺（州治今广东广州）。晋广州刺史吴隐之闭门固守。义军围攻番禺百余日，官军支持不住，部众溃散，义军攻占番禺，活捉吴隐之。此时分兵进攻始兴（治今广东韶关西南）的徐道覆，也攻占始兴，活捉始兴相阮腆之。卢循自摄广州州事，自称“平南将军”，在郡县设置地方官吏，在广州地区重建农民政权。

卢循在广州重建政权后，满足于苟安岭南一隅，派遣使者向东晋朝廷称臣进贡，请晋廷承认自己的地位名号。当时执掌朝政的刘裕为稳定局面，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暂时接受卢循的要求，授他以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等职。卢循欣然受职，将反晋大计置于脑后。

徐道覆与卢循完全不同。他深知东晋朝廷不会长期容忍义军居于广州。他以始兴为基地，整训队伍，筹集物资，准备在适当时机再向晋廷发动攻击。徐道覆为加强义军力量，联络在当地聚居的少数族人，以便获得他们在人力和物力上的支持。同时，徐道覆施用巧计，购买大批造船木料，藏在民间，为将来的扩建水师作了充分准备。

二、卢循、徐道覆分兵北征及其失败

晋义熙五年（409年），刘裕亲率大军北上进攻南燕（都广固，今山东青州）。刘裕北伐的消息传到广州，徐道覆认为，晋廷与义军势不两立，应乘建康防卫空虚之机，直捣建康。他便派人请求出兵，卢循不许。义熙六年正月，徐道覆亲往广州，劝说卢循进军北伐。他向卢循陈说时机难得、必须立即起兵北伐的理由后，坚决表示：“君若不同，便当率始兴之众直指寻阳”①。卢循心中极不愿北伐，但对徐道覆的主张，“无以夺其计”②，只得勉强同意进兵。

当年二月，卢循、徐道覆分义军为东、西两路，东路军由徐

①② 《晋书》卷一百《卢循传》。

道覆统带，西路军由卢循统率，皆由水路长驱北进。

由于徐道覆早有准备，义军利用藏于民间的木材装造大型战舰，舰上楼高十二丈，“舟舰大盛”①。徐道覆率领这支强大水师沿赣水而下，攻破南康（治今江西赣州市）、庐陵（治今江西吉水北）等郡，直逼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与此同时，卢循所率西路军连破桂阳（治今湖南郴县）、湘东（治今湖南衡阳）、长沙（今属湖南）等郡，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准备向江陵（今属湖北荆沙）进军。

三月，晋江州刺史何无忌自寻阳（治今江西九江西）率大兵南下，至豫章阻击徐道覆军。何无忌的参军殷阐认为，北伐军多是身经百战的义军旧部，或是新参加的始兴溪子，战斗力非常强。他建议“且留屯豫章，征兵城守，分军石头。彼若围城，攻守者百倍，告我而下，畏吾蹑其背。比尔相持数十日，荆、豫兵可以大至而合战，亦未晚也”。② 何无忌不肯采纳，率水师与义军在赣水之上决战。徐道覆在战前布置数百强弩手埋伏在岸边，待敌水师靠近时，立刻百弩齐发。何无忌军遭此突然袭击，队形大乱。徐道覆乘势指挥义军大型战舰乘风猛冲敌军。官军所乘皆为小型战船，在义军大舰冲击下，官军惊慌失措，全线溃败。义军大获全胜，阵斩何无忌，攻占江州（治今江西九江）。

义军大败何无忌后，乘胜前进，朝廷震骇。四月初三，晋卫将军、豫州刺史刘毅自率水师2万由姑孰（今安徽当涂）溯江而上，再次阻截义军。道覆见刘毅倾师来攻，认为这是与官军决战的大好机会，送书给卢循说：“毅兵众甚盛，成败事系之于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无复事矣。根本既定，不忧上面不平也”③。卢循听从了徐道覆集中优势兵力以歼敌的建议，立即从巴陵东进与徐道覆合师，两军“戎卒十万，舳舻千计”④，连旗而下，

① 《晋书》卷八十五《何无忌传》。

② 《建康实录》卷十一《高祖武皇帝》。

③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④ 《晋书》卷一百《卢循传》。

声势浩大。五月七日，义军与刘毅水军在桑落洲（在今江西九江东北）展开大战，义军两路重兵夹击，再次大获全胜。刘毅全军覆没，丢掉全部船只辎重，仅率几百名残兵步行逃回。卢循、徐道覆联军，乘胜继续向建康进军。

当时东晋的军事支柱主要是北府兵，而刘裕、刘毅、何无忌是北府兵中实力雄厚的3个主要将领。刘毅、何无忌接连大败于义军，支撑东晋局面的只剩下刘裕一人。当卢循、徐道覆分兵北征时，已灭掉南燕的刘裕急速从北方返回，先率精锐从陆路赶回建康。建康当时一片混乱，刘裕所率军队经长期征战，又兼远程赶回，已属疲惫之师，战斗力大为减弱。尚书左仆射孟昶等人建议迁都，以避义军兵锋。刘裕反对迁都，认为朝廷“一旦迁动，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延日月耳。今兵士虽少，自足以一战”①。他主张以现有兵力拼死抵抗。孟昶见迁都不成，迎战很难取胜，绝望自杀。

当义军屡胜之后，士气大振，有“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②。显然处于优势地位。义军只要意志坚决，指挥正确，很有可能一举攻下建康，推翻东晋政权。但卢循在此关键时刻，得知刘裕回救建康的消息，心中恐慌，从而产生动摇，不想继续进军，准备回师寻阳，攻取江陵，割据荆、江二州与朝廷抗衡。徐道覆坚决反对卢循的退却主张，力主乘胜进军。两人争论多日，卢循才接受徐道覆的正确意见，决定立即进军建康。但是大好战机却已在这数日之间失去，刘裕正是在义军延误战机之时，征调和募集军队，部署建康的防卫，严阵以待义军。

在此紧急关头，刘裕一方面大开赏募，征召募兵，并急调青州刺史诸葛长民、兖州刺史刘藩、并州刺史刘道怜等率军入卫建康。另一方面，刘裕自己移屯石头（在今江苏南京清凉山），加固建康防御工事，保证援军到来之前建康的安全。

五月十四日，义军进至淮口（秦淮河入江口，在今江苏南京

---

①②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西北)。徐道覆认为建康兵力寡弱，义军应从新亭（今南京南）至白石（今南京北）一线齐头并进，分道强攻，敌人一定会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义军便可突破敌军防线，直捣建康城。因而他建议卢循“焚舟而上，数道攻之”①。徐道覆所计划的战略方案，是直接攻敌要害的正确作战方针，敌人最害怕义军全力进攻建康。刘裕登石头城瞭望军情，当见义军向新亭方向移动时，以为义军要向建康大举进攻，甚为惊恐，及见义军回泊蔡洲（在今南京西长江中），又转忧为喜。卢循对徐道覆的建议不肯接受，也不允许徐道覆独自进兵，严令其停泊蔡洲待命。他对徐道覆说：“大军未至，孟昶便望风自裁，大势言之，自当计日溃乱。今决胜负于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杀伤士卒，不如按兵待之”②。卢循在战机成熟时，不敢与敌人决战，而是想等待敌人不战自乱后，义军再发动进攻，后来战局发展证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一种幻想。

东晋各路援军陆续开至建康，分屯建康各战略要点，刘裕又在建康外围修筑城垒，布置将士严阵以待，并分派建康宿卫部队加强建康城内外的防卫。卢循在刘裕完成军事部署后，不见敌军溃散，才勉强同意进攻。但他不敢与官军陆战，而派战舰十余艘强攻石头栅。石头栅是刘裕布防的重点，义军久攻不克，回泊蔡洲。刘裕乘夜派兵扎缚大筏，乘风进攻义军水师，义军大舰漂没，水师损失严重。卢循见水师不能取胜，决定从南岸登陆进攻。他为了转移敌军注意力，命老弱士卒佯攻白石，而以义军主力在南岸登陆。刘裕率刘毅等军至白石拒守。义军主力乘机在查浦（在今南京西南长江南岸）发动火攻，登陆与敌展开步战，击溃官军徐赤特部，进屯丹阳，分兵出击金城（在今南京北）、姑孰等县。刘裕得知中计，立即率军自白石返回，命参军褚叔度、朱龄石率兵千余人渡过秦淮河，向义军发动反击。两军接战，由于朱龄石所领多为鲜卑铁骑，大马长枪，冲击力强，义军与战不利，被迫

---

① 《晋书》卷一百《卢循传》。

②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退兵。

至此，义军由于指挥上的失误，在建康附近的军事行动一无所获，师疲将老，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退却，由主动优势的地位转向被动劣势。而刘裕军却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由被动劣势转为主动优势。七月初十，卢循决定停止进攻建康的计划，退守寻阳再图大举，于是留下义军将领范崇民率将士 5000、高舰百余艘戍南陵（今属安徽），自率主力部队向寻阳方向退却。

刘裕军转入反攻后，为彻底消灭义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先派庾悦为江州刺史，率军往豫章；虞丘进为鄱阳太守，率军往鄱阳（治今江西波阳北）；又派建威将军孙处率 3000 人自海道进攻番禺，截断义军的归路。当义军撤退后，他又命令各路军队尾随追击。另外，刘裕为了与义军水师对抗，又大建水师，所修皆“大舰重楼，高者十余丈”①，从此晋军在水军方面也取得了压倒义军的优势。

此后几个月内，义军先后败于鄱阳、破冢（在今湖北荆沙江陵东南）、南陵等地。同年十二月，卢循、徐道覆率将士数万在雷池（在今安徽望江东）与刘裕亲自率领的官军水师展开激战，官军使用火攻，义军又未能取胜，伤亡万余人。在战局对义军非常不利的形势下，卢、徐二人决定分率义军向广州撤退。

义熙七年（411 年）二月，徐道覆率军退回始兴。官军随即向义军发动进攻，始兴失守，徐道覆战死。

同年三月，卢循所率义军 3000 余人退至番禺。这时，番禺已被刘裕先行派来的孙处占领。义军攻城 20 余日未能克，转头攻占合浦（今广西合浦东北），进逼交州州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天德江北岸），晋交州刺史杜慧度率军拒守。当年六月二十五日，卢循义军与官军展开激战，官军发射火箭燃烧义军战船，义军大败，卢循中箭后投水自尽。轰轰烈烈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失败了。

---

①《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第四节　东晋末年农民战争的历史影响

一、农民军对东晋政权的沉重打击

从东晋隆安三年（399 年）十月孙恩聚众起义，到义熙七年（411 年）六月卢循最后失败，东晋末年的农民起义战争持续了近 12 年之久，他们以强大的水师纵横于我国东部沿海及江南长江、赣水、湘水等几大水系与众多的河流湖泊之间，两次近逼东晋都城建康，给了东晋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虽然这次起义最终归于失败，但它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经过东晋末年农民战争给晋廷的巨大打击，可以说东晋政权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从孙恩首义开始，农民军便攻打东晋各州郡县等地方政权，捕杀士族官僚及地方官吏，动摇和摧毁了东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农民军在 12 年的征战中，足迹遍及扬、江、豫、荆、湘、交、广等州，这些地区是东晋王朝的主要统治区域。农民军所过之处，东晋设置的一些州郡县政权被农民军摧毁，地方官吏被镇压。农民军对士族官僚和地方官吏的严厉镇压，无疑是对东晋封建统治集团实力的削弱。农民军转战的东土地区，乃是高门士族集聚之地，义军的矛头主要针对腐朽的士族势力，不仅在政治军事上打击他们，而且在经济上没收其财富，解放其奴婢佃客，削弱其经济势力，使士族一蹶不振。

其次，农民军在军事上给了东晋政权以致命的打击。东晋王朝的统治是以其军事实力作为支柱，当孙恩初起时，东晋东土诸郡的军队被起义军消灭殆尽。后来北府兵名将谢琰、何无忌、刘毅 3 人统率的北府兵精锐，皆为义军所消灭，并临阵斩谢琰、何无忌。此外，农民军转战各地，也大量地消耗了各地军事力量。由于东晋王朝的军事力量被义军消灭殆尽，只留下刘裕培植的北府兵势力，当他专断朝政以至代晋自立时，晋廷已没有相应的军事

力量来与之抗衡，只好拱手交出政权。

二、庶族地主开始登上政治历史舞台

从魏晋之际，高门士族掌握最高统治权后，直到东晋末年，农民战争才开辟了庶族地主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新局面。

东晋是典型的士族当政，高门士族有着各种政治经济特权，而庶族地主既无封建特权，在政治上又处于士族的从属地位。东晋末年的农民战争，对于这种政治格局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一方面，农民军给予王、谢为首的中央士族当权派以沉重的打击，使原来由士族所掌握的北府兵权转入庶族出身的刘裕手中；另一方面，农民战争又促使东晋士族内部矛盾激化而爆发了内战，荆州刺史桓玄起兵攻入建康，建立了楚政权。以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人为代表的庶族地主势力，起兵反抗桓玄，结果刘裕等人尽灭桓氏一党，从而庶族地主进入了东晋最高封建统治集团，打破了士族垄断朝政的局面。如果没有晋末农民战争削弱士族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刘裕等庶族集团不可能进入最高统治层，这是显而易见的。

晋末农民战争以后，士族的北府兵权被庶族地主夺去，此后，整个南朝掌握兵权的将帅，大都出身寒门庶族。从刘宋政权开始，朝廷的机要政务也大多由寒人庶族掌握。典型的门阀政治结束后，从晋末宋初开始，新兴庶族参与最高政权，从而带来了加强皇权、打击士族豪强、革新政治、减轻赋役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使南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①。

---

① 参考朱大渭《孙恩徐道覆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载《历史论丛》第一辑。

第二编

十六国军事

第八章 十六国兴亡大势

第一节 十六国政权的兴亡

一、十六国前期各政权的兴亡

“十六国”政权，乃是指从賨人李氏建立的成汉（306 年），以及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国（308 年）开始，到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439 年）这 130 余年间，各少数民族上层和汉族官僚阶层在北方建立的众多割据政权。由于这些政权多为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所建立，故又称“五胡十六国”。但实际上建国者不全是五胡，也有汉人；所建政权也不止 16 个，所谓“五胡”和“十六国”皆是概称。

十六国中最早建国的是成汉和汉国（后称前赵）。

成汉为賨人李氏所建。李特、李雄发动流民起义后，得到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地区人民的拥护，推翻了当地的封建政权。西晋永兴元年（304 年）十月，李雄称成都王，改元建兴，设置百官。西晋光熙元年（306 年），李雄称帝，国号成。李雄建立政权后，所实行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策，实际上变成了封建政权。成政权至李寿为帝时改称汉，史称成汉。成汉存在了 44 年，至东晋永和

三年（347 年），被东晋权臣桓温所灭。

汉（前赵）政权为匈奴贵族刘渊所建。刘渊利用西晋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大好形势，起兵反晋。西晋建武元年（304 年），刘渊称汉王，建廷左国城。永嘉二年（308 年），刘渊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国号汉。刘渊从起兵开始，虽然代表匈奴贵族的利益，但他建立的汉国，作为当时反晋的盟主，在推翻西晋黑暗统治中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东晋大兴元年（318 年），汉主刘曜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汉（前赵）王朝强盛时，占有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前赵于东晋咸和四年（329 年），被后赵所灭，立国凡 26 年。

后赵为羯人石勒所建。石勒作为冀州地区流民起义的领袖，在推翻西晋腐败政权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东晋大兴二年（319 年），石勒称大单于、赵王。咸和五年（330 年），改称皇帝，所建政权史称后赵。石勒在建立政权过程中，其流民起义的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当他作为皇帝推行各项封建的政治经济政策时，其政权也就变为封建政权了。石勒在称帝前一年，攻灭前赵，占有除辽东慕容氏、河西张氏所据地区之外的全部中原地区。后赵于东晋永和六年（350 年）为冉魏所灭，立国凡 31 年。

前燕为鲜卑慕容氏所建。慕容氏本居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后移居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北。西晋元康四年（294 年），酋长慕容廆率部移居大棘城（今辽宁义县西）一带，开始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仿照西晋建立政治法律制度，“法制同于上国”①。西晋末年大乱，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收留前去避难的中原流民，并任用其中的汉族士人，势力渐盛。慕容廆死后，其三子慕容皝继位。慕容皝于东晋咸康三年（337 年）称燕王，后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慕容皝在位期间，攻破夫余、高句丽，灭鲜卑宇文部，又曾大破后赵大军 20 余万，使燕成为辽西的一个强国。慕容皝死后，其子慕容儁继位。慕容儁于东晋永和八年（352 年）出兵攻灭

---

① 《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廆载记》。

冉魏，自称皇帝，以蓟城（今北京西南）为都，后又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前燕。前燕兴盛时，占有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广大地区，与当时的前秦各占据了黄河流域东西各一半。前燕在慕容儁死后政治日渐衰乱，于东晋太和五年（370年）被前秦所灭，立国凡34年。

前凉为汉人张氏所建。西晋末年大乱时，凉州刺史张轨于凉州（治今甘肃武威）自保，接纳中原避难人士，并对朝廷按时朝贡，不亏臣节，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后张氏世守凉州。东晋永和二年（346年），张轨曾孙张重华称凉州牧、假凉王，史称前凉。前凉于东晋太元元年（376年）灭于前秦。

前秦为氐族苻氏所建。苻氏世为氐族部落小帅，居于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北）。西晋末年，苻洪被氐人推为首领，先后归附前、后赵，后赵主石虎曾以苻洪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使之处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后赵灭亡后，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苻洪不久被人毒死，其子苻健续统其众，自枋头回归关中。东晋永和七年（351年），苻健自称大秦天王、大单于，次年改称皇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史称前秦。苻健死后，其子苻生继位。不久，苻健之侄苻坚杀苻生自立，掌握了前秦政权。苻健和苻坚在位时，都很注意政治革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苻坚任用汉人王猛，打击氐族贵族顽固势力，使前秦政治日渐清明，成为当时北方与前燕对峙的西部强国。东晋太和五年（370年），苻坚派王猛率大军6万进攻前燕，秦军所向克捷，于同年十一月攻破燕都邺城，俘前燕主慕容暐，灭掉前燕。随后，前秦又先后灭掉前凉及代国，于东晋太元元年（376年）统一了北方。太元八年（383年），前秦主苻坚集中数十万大军南进，准备一举灭掉东晋，统一全国，在淝水（在今安徽寿县东）被晋军一举击溃。苻坚兵败逃回，前秦政权逐渐瓦解。到太元十九年（394年），前秦残存下来的政权，最后被后秦消灭。前秦从苻健自称大秦天王至灭亡，立国凡44年。

二、十六国后期各政权的兴亡

淝水之战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从淝水之战结束到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439 年）之间，北方共出现了各族上层分子所建立的割据政权 13 个，这一时期可视作十六国的后期。

最先建立的政权是后燕。后燕的建立者是前燕贵族慕容垂。慕容垂是前燕主慕容儁的叔叔，在前燕受封为吴王，曾率燕军在枋头大败东晋桓温，声望甚重，后遭辅政的慕容评猜忌，逃奔前秦。慕容垂在前秦历任冠军将军、京兆尹等职，“所在征伐，皆有大功”①。淝水之战中，前秦诸军皆败，唯慕容垂所统得以保全，苻坚逃奔慕容垂军，慕容垂护送苻坚返回长安。军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慕容垂决定乘机脱离苻坚，谋求独立发展，便向苻坚请求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去祭扫陵墓。慕容垂到邺城后，与前秦决裂，联合鲜卑、丁零等少数族军队，连败秦军。东晋太元九年（384 年）垂称燕王，至太元十一年在中山（今河北定州）称帝，即以中山为都，国号燕，史称后燕。后燕强盛时，占有今山东、河北及河南、山西大部的广大地区，是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最强盛的一个王朝。后燕于东晋义熙三年（407 年）灭于北燕，立国凡 24 年。

除后燕外，当时以燕为国号建立政权的，还有西燕、南燕、北燕 3 个王朝。

西燕也为慕容氏所建。东晋太元九年（384 年），前燕慕容儁子慕容泓起兵，称济北王。慕容泓不久被杀，其弟慕容冲继位，并于次年称帝。不久慕容冲又被杀。直至太元十一年（386 年），慕容永被推举为这一支鲜卑武装的首领。慕容永于同年称帝，以长子（今山西长子西）为都，占有今河南、山西部分地区。从慕容

---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三《慕容垂载记》。

泓至慕容永立国，史称西燕。西燕于太元十九年（394 年）被后燕灭掉，立国凡 11 年。

南燕为后燕主慕容垂之弟慕容德所建。东晋隆安元年（397 年），后燕被北魏断为两半，慕容德当时镇守邺城，为避魏军兵势，携邺城军民迁往滑台（今河南滑县东），称燕王。隆安三年（399 年），慕容德称帝，迁都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史称南燕。南燕占有今山东大部地区，于东晋义熙六年（410 年）被东晋刘裕灭掉，立国凡 13 年。

北燕为汉人冯跋所建。东晋义熙五年（409 年），后燕权臣冯跋代燕自立，以龙城（今辽宁朝阳）为都，仍以燕为国号，史称北燕。北魏太延二年（436 年），北燕主冯弘慑于北魏兵威，率众投奔高丽，北燕亡，立国凡 31 年。

淝水之战后，关中地区出现了后秦和大夏两个政权。

后秦为羌人姚氏所建。羌人部落贵族姚苌曾在前秦为将，屡立战功。淝水战后，姚苌趁前秦势力衰弱之机，于东晋太元九年（384 年）称秦王。太元十一年（386 年），姚苌称帝，以长安为都，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后秦是十六国后期比较强大的一个政权，势力强盛时占有今陕西及河南、山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部分辖域的广大地区。后秦于东晋义熙十三年（417 年）被东晋权臣刘裕所灭，立国凡 34 年。

大夏为匈奴赫连勃勃所建。赫连勃勃曾臣服于后秦，率部为后秦镇守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东晋义熙三年（407 年），赫连勃勃自称大夏天王，以统万（今陕西靖边东北）为都，国号夏。大夏于北魏神䴥四年（431 年）灭于吐谷浑，立国凡 25 年。

河西走廊地区在淝水战后相继出现了西秦、后凉、北凉、南凉、西凉等政权。

西秦为鲜卑乞伏国仁所建。乞伏鲜卑世居陇西，曾归附前秦。淝水战后，酋长乞伏国仁聚集部众，组织起一支 10 余万人的武装，逐渐脱离前秦的控制。东晋太元十年（385 年），乞伏国仁自称大都督、大单于，领秦、河 2 州牧。太元十九年（394 年），乞伏国

仁之弟乞伏乾归称秦王，以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为都，国号秦，史称西秦。西秦占有今甘肃、青海、陕西所辖的部分地区，于北魏神䴥四年（431 年）被大夏灭掉，立国凡 46 年。

后凉为氐人吕光所建。吕光，略阳（治今甘肃天水东北）人，其父吕婆楼，仕前秦官至太尉。前秦主苻坚在平定中原后，意欲将势力向西域扩展，遂以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使其率将士 7 万、铁骑 5 千，进军西域。吕光进至西域的龟兹城（今新疆库车），西域 30 余国相继降附，苻坚又以他为使持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吕光平定西域后，“有留焉之志”，但手下众将士皆请东还，于是他率军返回。军至半途，前秦淝水战败的消息传来，吕光进兵击败阻其归途的前秦凉州刺史梁熙，攻占凉州治所姑臧（今甘肃武威），自领凉州刺史。东晋太元十年（385 年），苻坚死，吕光自称大都督、凉州牧、酒泉公。太元二十一年（396 年），吕光自称大凉天王，以姑臧为都，史称后凉。后凉于东晋元兴二年（403 年）投降后秦，国灭，立国凡 18 年。

北凉为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所建。卢水胡族属匈奴，沮渠蒙逊的伯父沮渠罗仇统部时依附于后凉吕光。东晋隆安元年（397 年），沮渠罗仇被吕光杀死，沮渠蒙逊聚合卢水胡诸部起兵与后凉对抗，后推举汉人段业为主，称凉王，都张掖（治今甘肃张掖西北）。东晋隆安五年（401 年），沮渠蒙逊杀段业自立，称张掖公。东晋义熙八年（412 年），沮渠蒙逊称河西王，迁都姑臧，史称北凉。北凉于北魏太延五年（439 年）灭于北魏，立国凡 43 年。

南凉为河西鲜卑秃发乌孤氏所建。“秃发”是“拓跋”的异译，汉魏之间，拓跋氏的一支自塞北迁居河西，即秃发鲜卑。东晋隆安元年（397 年），秃发鲜卑的酋长秃发乌孤自称大单于、西平王，以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东）为都，建立割据政权。东晋元兴二年（402 年）秃发傉檀统部时，迁都乐都（今属青海），改称凉王，史称南凉。南凉于东晋义熙十年（414 年）灭于西秦，立国凡 18 年。

西凉为汉人李暠所建。李暠为陇西大族，曾在北凉任效谷县

令、敦煌太守等官。东晋隆安四年（400年），李暠自称凉公，在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建立割据政权，后又以酒泉（今属甘肃）为都，史称西凉。西凉于刘宋永初二年（421年）被北凉消灭，立国凡22年。

第二节　十六国的政治、经济和民族关系

一、十六国的政治

十六国各政权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仅十余年，立国都不很长。各政权所占地区也大小各异，有的占有整个北方地区，有的仅居不足一州之地。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十六国各政权的政治状况也大不相同，一些立国时间短，占地面积小的政权，匆匆十几年，说不上有什么作为，政治上无可称述之处。另外一些立国时间较长，占地面积大，因而对历史也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政权，在政治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也颇有可称述之处。因此，这里以几个较大的割据政权为主，对其政治状况作一简要介绍。

从统治方式上说，十六国各政权主要采用胡、汉分治，或沿用汉制两种办法进行统治。

胡汉分治以前，后赵最为典型。匈奴汉国在刘聪任国主时，灭掉西晋，占领了广大中原地区。随后，刘聪在其统治区内“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①。这里所设立的司隶、内史，便是专门用来统治汉人的，而所谓的“各领户二十余万”，则都是汉族百姓。与此同时，刘聪又在大单于之下设“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②。单于左右辅及都尉，是专门用来统治各少数民族的，所谓六夷，即

①②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指匈奴、羯、鲜卑、氐、羌、巴人6个少数族，另一种说法是有乌桓而没有巴人。立两套官吏班子，分别统治汉族和各少数族，这就是所谓的胡汉分治。在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下，国主以皇帝的身份为最高统治者。此外，由于少数族的传统，在皇帝之下又设大单于一职。大单于地位权势极高，仅次于皇帝而高居于百官之上，并常掌握重兵，一般由皇太子或其他亲近宗室成员担任。如刘聪在即位前，就曾任大单于，其即位后，又以其子刘粲为大单于。在十六国各少数政权中，大单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位。在胡汉分制的方式下，各政权除大单于、左右司隶、单于左右辅外，也设有其他官位。如刘聪就曾设置太尉、相国、太师、大司马等7公，并设有各种名号的武官。后赵石勒时，也采用胡汉分治的统治方式，并为提高本族地位，规定称羯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使羯人高出汉人一等。

沿用汉制即沿袭汉族传统的统治方法，这在十六国各政权中有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完全沿用汉制，这以賨人建立的成汉和汉人建立的前凉等政权最为典型。如成汉，李雄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在成都（今属四川）称成都王后，采用的是传统汉制。又前凉本为晋凉州刺史张轨之治地，至其曾孙张重华时称凉州牧、假凉王。张氏建立的前凉，沿袭的也完全是汉制。

十六国中另外一些政权，虽然也大体沿用汉制，但由于其少数民族的传统，又有其自己的一些特点。这类政权以前燕、前秦、后秦等为代表。这些政权的建立者都是各少数族的贵族，他们在起事称帝王之初，都同时自称大单于，以证明自己是这一民族的最高首领。在建立政权后，他们在政治制度上大体沿用汉制。如依汉制设立百官，地方上以州郡长官治理百姓。虽然他们曾一度保留大单于这一名号，并使其仅处于国主之下，有极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势，但其设置都未能保持很长时间。如前燕慕容廆在起事之初，即自称鲜卑大单于，后其子慕容皝于咸康三年（337年）称燕王，并接受东晋授与其“单于”的封号，慕容皝之子慕容儁

也是身兼大单于、燕王两种名号。前秦苻健起事之初，也是自称大单于、大秦天王，及至其于永和八年（352年）称帝时，将大单于名号授与其子苻苌。后秦姚苌起事之初，自称大单于、万年秦王，但他即帝位后，即废除大单于这一名号。上述几个政权所设大单于名号都未超过3世，前燕在慕容儁后、前秦在苻苌后、后秦在姚苌后，便不再设置大单于。这一类政权虽曾一度设置大单于，但未能长期保持下去，这是由于建立这些政权的少数族，比那些实行胡汉分治的少数族学习汉制程度要广，因而实行汉制比较顺利。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在政治上一般以自己部族的少数贵族组成统治集团，以自己部族的部民为统治基础及主要的军事力量，用以统治和压迫其他各族人民。其中有些政权也吸收汉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来维持和加强其统治。大体说来，除前秦、后秦等几个政权的某些时期外，各政权在政治上没有远见，缺乏有效的执政措施，因而也无建树可述。在这方面稍有作为的是后赵主石勒、前秦主苻坚、后秦主姚兴诸人。

后赵主石勒出身于下层，在位时比较留心政治。他在取得司（治今河南洛阳）、冀（治今河北临漳西南）、幽（治今北京西南）等州后，曾“阅实人户”①，实行固定数额的征收田租户调的办法，改变了以前大肆掠夺百姓的作法。他在夺取中原的过程中，注意吸收汉族士人参预政权，并一度采用魏晋的九品官人法，实行选举制度。此外，他在国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吏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②。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③。石勒还常“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④。石勒比较重视农业生产，他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兴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

---

①②③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①。他自己也亲自巡行州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②。石勒励精图治，他曾“令远近牧守宣告属城，诸所欲言，靡有隐讳，使知区区之朝虚渴傥言也”③。并下诏说“有疑难大事，八坐及委丞郎赍诣东堂，诠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有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勿避寒暑昏夜也”④。

苻坚在位时，重用汉人王猛，实行打击氐族贵族势力，加强前秦中央集权的政策，其结果大见成效，“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⑤。此后，苻坚又在王猛的辅佐下，推行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兴办学校等措施。如他曾“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⑥。他又“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⑦。苻坚曾数次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史称他执政期间，“留心儒学”，“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⑧。

姚兴在位期间，也勤于政事，实行了不少改革措施。他在用人方面，以其叔父姚绪、姚硕德掌军事，以汉人尹纬为谋主，并广泛招揽人才。史称他“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⑨。他还曾进行法律上的建设，“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谳

①②③④《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⑤《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晋纪二十二》穆帝升平三年八月。

⑥⑦⑧《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⑨《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之廷尉”①。当时“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姚兴自己也常“临谘议堂听决疑狱，于时号无冤滞”②。姚兴也很注意提倡儒学及佛学。当时“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③。姚兴“每于听政之暇，引（姜）龛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④。由于他的大力提倡，当时“学者咸劝，儒风盛焉”⑤。天竺人鸠摩罗什，是著名佛教大师。姚兴将他迎至京师长安，亲自听他讲说佛经，并使他翻译佛经300余卷，亲自参加新旧佛经的考校。在姚兴的提倡下，后秦的佛教也很兴盛，“事佛者十室而九矣”⑥。此外，姚兴还曾下令，各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⑦。姚兴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所以在他执政时期，后秦是当时北方最为强盛的政权。

二、十六国的经济

从整体上看，十六国时期是我国中古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这一时期，南北对立，北方各政权之间战乱不已。由此带来的人民流散，人口锐减，农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战争对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巨大消耗等等，是造成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凋敝和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建立十六国政权的各少数族贵族集团，在开创基业的过程中，常横征暴敛，或烧杀抢掠，各政权循环不已地重复这一过程，因而使十六国长时期社会生产无法在整体上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某些政权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为富国强兵以征服其他政权，也常在其统治区内实行与民休息、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因而在十六国某些区域或某一时期内，社会经济也曾得到过局部的恢复和发展，这在一些政权的个别君主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①②③④⑤⑥⑦《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后赵石勒开创基业之初，为满足军队需要，大肆掠夺百姓的粮食，“时人谓之‘胡蝗’”①。同时，他在转战北方与各股势力的争斗中，为消灭敌对势力，其破坏性极大。但石勒在定都襄国后，便开始注意恢复农业生产。他在攻占司、冀2州后，便以“司冀渐宁，人始租赋”②。及至占领幽州后，又“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③。这是采用魏晋以来的封建剥削方式，以固定的户调田租来代替以前的横征暴敛，对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是有好处的。同时，石勒还大力劝课农桑，派遣使者循行州郡，“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④。石勒自己在循行州郡时，特引见勤于耕作的百姓，赐与谷帛，以示鼓励。此外，石勒为节省粮食，还采取了禁止酿酒的措施。他曾“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⑤。由于石勒的上述措施，后赵统治区内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其从子石虎当政时，曾“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⑥。当时有如此丰富的粮储，显然是农业生产得到恢复的结果。

前燕前期，也比较重视农业生产。慕容廆曾说：“稼穑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⑦。到其子慕容皝时，更是“躬行郡县，劝课农桑”⑧。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慕容皝曾将自己的园苑全部赐与流亡至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地区的百姓耕种。并以国家的耕牛贷与他们使用。史称他曾“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⑨。后他又采纳记室参军封裕的建议，对于“不能自存”的

---

①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②③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⑤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⑥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⑦ 《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廆载记》。

⑧⑨ 《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全无资产"的贫苦百姓，"各赐牧牛一头"①。对于"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②。也就是说，百姓使用官牛者不再采用公家收其十分之八的作法，而是依魏晋旧法按六四或五五分成。同时，慕容皝还提倡兴修水利，命令"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陆之势"③。此外，他还曾"以久旱，丐百姓田租"④。由于他实行上述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因而前燕境内前期的社会生产，曾一度得到发展。

前秦苻坚在位期间，也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的一个时期。苻坚在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兴修水利等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建树。东晋升平元年（357年），苻坚即位，他在推行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同时，实行了许多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史称他即位后，"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不久，他在登龙门时，"丐所过田租之半"，又以"是秋大旱"，"减膳彻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在灭前燕后，苻坚又下令，"诸因乱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以此鼓励人们归乡务农。为了抵御关中地区的干旱，他在境内推广区种法，"课百姓区种"。并"以关中水旱不时，……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同时，苻坚还提倡节俭。他"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官、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以上这些措施，对于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极为有利，因而在苻坚执政期间，"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⑤。由此可见，前秦境内社会经济不仅得到了很大的

---

①②③④ 《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⑤ 以上引文皆见《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恢复，而且还有一定的发展。

三、十六国的民族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各少数民族由互相争斗进而融合的时期，十六国时期作为这一全过程的一个阶段，也具有这一鲜明的特色。但由于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还很深，因此在这个时期的民族关系中民族斗争很突出，民族间的融合尚处于初步的渐进过程。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分由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建立。这些少数族大多以本族贵族及部落成员为主要依靠力量，开创基业，建立政权。随后，便以本族成员为统治势力，压迫和奴役汉族及其他少数族成员。在十六国前期，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前赵的前身匈奴汉国建立之初，刘渊便利用匈奴部民对于西晋王朝的民族仇恨及阶级仇恨，所谓“晋为无道，奴隶御我”①，以此激发部民起兵反晋。他知道自己起兵后，“晋人未必同我”②，所以他对于汉人采取烧杀掳掠的政策。当时广大汉族百姓纷纷结聚一处，建立坞堡自卫，便是刘渊这一政策的结果。匈奴刘氏建立前赵政权后，更是对汉族百姓实行残酷的奴役政策。刘聪在位时，实行胡汉分治，由于汉人不堪奴役，司隶部汉民逃离的有二十余万众。建立后赵的羯人石勒，在开始四处转战中，也是大肆杀戮汉人，他的侄儿石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③。石勒在建立政权后，虽然采用拉拢汉族士人的作法，以汉人张宾为谋主，并“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④；“不许侮易衣冠华族”⑤。但他同时又规定称呼本族羯人为“国人”，不许称“胡”，其政治地位比其他

---

①②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④⑤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族要高。在这种民族政策下，所谓不许欺侮“衣冠华族”，实际上很难作到，如后赵的汉族官员却曾被羯人白昼抢劫，而普通老百姓所受的奴役则可想而知了。石勒的继任者石虎，更是一个残酷压迫汉族和其他少数族百姓的暴君，他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当时一位沙门吴进称“胡运将衰，晋运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①。石虎竟然发京都邺城“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②。结果遇大雨暴风，“死者数万人”③。后来后赵瓦解，汉人冉闵亲率部众“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④。这一民族仇杀事件，正是由于后赵所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而引起的。

十六国前期，前秦主苻坚是一位能够实行较为和缓的民族政策的君主。苻坚执政，大胆任用汉族士大夫，对于被他征服的各少数族政权的贵族，则都给予优待重用。他认为“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⑤。他比较平等地看待各族，主张各族应和睦相处，都是国家臣民。但由于他所推行的民族政策，没有重视当时民族矛盾还比较尖锐这一现实，对少数族首领阴谋搞分裂缺乏警惕，从而使其民族政策未能成功。正是苻坚对于民族矛盾的尖锐没有清醒的认识，成为他在淝水之战中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前秦政权也因此而土崩瓦解了。

十六国后期，各政权中民族仇杀的事件已比较少见，但各政权大体上仍实行着以本族贵族及部民为统治基础，拉拢汉族士人大族为其所用，实行压迫和奴役汉族及其他少数族百姓的政策。东晋末年刘裕北伐，进攻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⑥。刘裕进攻后秦乏粮时，“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⑦。而

---

①②③④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

⑤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⑥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⑦ 《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

当他灭亡后秦欲从关中回朝时，当地父老流泪挽留，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①汉族百姓的上述行为，乃是南燕、后秦统治者对汉族及其他少数族百姓的奴役政策所引起的强烈反应。不过，在十六国130余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民族矛盾和斗争，各族人民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换来的是各民族的了解和融合，最终出现了中古汉族的新生。

---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晋纪四十》安帝义熙十三年十一月。

第九章　十六国的军制

第一节　中央和地方军事领导指挥系统

十六国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时期，各政权立国时间长短不一，其政治、军事形势也各不相同，有些政权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政治军事制度。因此，这里仅以几个建立时间较长统辖区域较大的政权为主，来叙述当时军事领导机关的一般情况。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在军事制度上，一般都继承魏、西晋以来的汉族制度，但由于其少数族的特点，其中又有对自己民族传统制度的保留。此点反映在军事领导机关上，就是它一方面沿袭魏晋旧制，一方面又保留了大单于等胡制。

一、大单于和左右辅等胡制军事领导机关

十六国各少数族贵族在起兵举事及称王建国的过程中，一般都依少数族的传统，自称“大单于”，以表示自己为这一少数族的最高首领。如匈奴汉国的开国君主刘渊在起兵时，即自称大单于。此后后赵石勒、前燕慕容廆、慕容皝、前秦苻健、后秦姚苌等都自称大单于。这里的大单于，是该少数族的最高首领，同时也是最高军事统帅，率领由本族部落兵组成的军队四处征战，开创基业。随着政权的正式建立，刘渊、石勒等人或称帝或称王，成为一国君主。此时则常以皇太子、皇子等亲信宗室出任大单于，实行胡、汉分治。如刘渊在称帝后，以其子刘聪为大单于。石勒称王后，也以其子石弘为大单于。有一些学习汉制较多的政权，在一、二代君主以后，便不再设置大单于一职，而仿魏晋实行汉制。

如前秦、后秦等都是如此。

各少数族政权中，军队成员主要来自少数族，大单于实即最高军事统帅。故最高统治者起事时要自称大单于，建立政权后仍要以皇太子及皇子等亲信宗室担任大单于。大单于系统的办事机构为单于台，其属下的高级官员有单于左右辅、单于元辅、左右贤王等。以大单于为首的单于台，既负责统治各少数族人民，也主掌军队及征战诸事，握有实际军政大权，是胡、汉分治政权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如刘渊称帝时，以其子刘聪为大单于，“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①。由于大单于权势极重，后赵石勒称帝时，以其子石弘为大单于。而其侄儿石虎“自以勋高一时，谓勒即位之后，大单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②，为此愤愤不平。各政权任大单于者，常加以各种汉制高官名号。刘渊曾以刘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③。刘聪曾以其子刘粲为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④。石勒以其子石弘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⑤。由于大单于握有军政实权，因而当皇太子未能兼任大单于时，常受担任大单于的其他皇子的威胁。如刘渊的太子刘和，便因为其四弟大单于刘聪握十万大军，而使刘和成为“寄坐”⑥。但大单于虽然权力极大，却仍要听命于君主，是君主之下权势威重的高级军政官员。

二、都督中外诸军事等汉制军事领导机关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在建国后，一般都仿照汉制设置百官，其

①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附刘和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
④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⑤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
⑥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附刘和载记》。

中掌管军事的官员的设置，大都沿袭魏晋旧制。魏晋时统兵的官职，各少数族政权大体上都予以设置。

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始设于曹魏，任此职者有权指挥全国军队，实为君主以下的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权力极大。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族政权大都设置此职，其职权略同于魏晋。刘渊时，刘宣任"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丞相，右贤王"①，"军国内外靡不专之"②。刘聪即位时，"封其子粲为河内王，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③。后前赵刘曜、刘岳都曾先后出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后赵石勒称王时，以其子石弘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石弘即位，以石邃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石虎在位时，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④。后赵又有监中外诸军事的官职。石虎死后，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张豺辅佐新主石世，他"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司隶校尉，为己之副"⑤。可见监中外诸军事一职为后赵所创设，是都督中外诸军事之副职。前秦时，宗室子弟苻雄、苻融、苻法、苻晖等都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此外，备受前秦主苻坚信任的汉人王猛也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职同于魏晋，职权很重，有权指挥全国军队。因此，刘宣在刘渊朝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时，则"军国内外靡不专之"。后赵石闵任都督中外诸军事时，史称他"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⑥。由于都督中外诸军事总统内外兵权，职权甚重，各政权大多以宗室子弟出任此职。前秦时，汉人王猛虽曾任此职，乃是特例，而非常制。总之，十六国各政权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一套办事机构，成为各政权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有权调动指挥全国军队。当然，他们也在各政权君主的统御之下，听命于君主，其军事行动要向君主负责。

---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晋纪八》怀帝永嘉二年十一月。

②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附刘宣传》。

③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④⑤⑥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

十六国各政权大多仿魏晋旧制设置太尉、大司马等传统高级武官。任此职者常兼任大单于、都督中外诸军事等高级武职，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权所在是源于其兼任的大单于、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但有时未任此职者，亦掌有实际军权，如前燕时，军权即握于大司马之手。前燕主慕容暐在位时，慕容恪任大司马掌握兵权，后其患病，“深虑暐政不在己，慕容评性多猜忌，大司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便对乐安王慕容臧说：“吴王（指慕容垂）天资英杰，经略超时。司马职统兵权，不可以失人，吾终之后，必以授之。若以亲疏次第，不以授汝，当以授（慕容）冲。汝等虽才识明敏，然未堪多难，国家安危，实在于此。不可昧利忘忧，以致大悔也”①。从慕容恪所言可知，前燕的大司马是掌握军权的最高武官，而且这一职位是由宗室来担任的，其原则一般是以宗室的亲疏次第选任。在这种情况下，大司马及其办事机构则成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

此外，魏晋以来成为行政中枢的尚书台，多为少数族政权所沿袭设置，而其中执掌兵事的五兵尚书一职，也成为一些政权的军事领导机关。后赵石虎在位时，以尚书左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史称他“专总兵要”②。其他一些政权也设有掌管军事的尚书，但名称不尽一致。如后燕即称七兵尚书，慕容熙在位时，太后丁氏曾“与兄子七兵尚书（丁）信谋废（慕容）熙”③。另有一些称为兵部尚书，如北凉、西秦、后燕时都设有兵部尚书。又后秦姚兴时，兵部郎边熙“上陈军令烦苛，宜遵简约”④。后姚兴因秃发傉檀献马3000匹，欲以其为凉州刺史。凉州人对姚兴说：“苟以马供军国，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⑤可见后秦也设有主管兵事的尚书，有战事需征调战马时，须尚书下符征集。

---

① 以上见《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熙载记》。

④⑤ 《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大都仿照魏晋旧制设置各种名号的将军，与魏晋稍有不同的是，这些将军都非虚衔，而是真正统兵的将领。前赵刘聪大定百官时，即“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①。除沿袭魏晋旧有的将军名号外，当时还创设了不少新的将军号。如后赵，统领中军的有沿袭魏晋的中领军、左右卫将军等，又有其所创设的都督中军事、都督禁卫诸军事等职。石勒便曾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②，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③。此外，各政权设置传统的车骑将军、骠骑将军、龙骧将军，及新创设的各种名号将军数甚多，分别统领军队。

三、都督与州郡地方军事领导机关

十六国各政权的军队如同魏晋，也有中外军的区别。外军包括都督所领及州郡所有军队，统带外军的都督及州郡长官则成为地方军事领导机关。

十六国的各个政权大体都沿袭魏晋旧制，在地方上设置都督，掌管一方军政。刘渊时，曾以王弥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 6 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刘曜也曾以仇池杨难敌为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 6 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宁、南秦 3 州牧。前燕时，慕容儁曾以慕容评为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 10 州河南诸军事，以慕容强为都督荆、徐 2 州缘淮诸军事。慕容暐时，也曾以慕容垂为“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

①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③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下。

凉、秦等十州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①。前秦苻坚也曾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以郭庆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扬武将军、幽州刺史，镇蓟”②。又曾“以其中垒梁成为南中郎将、都督荆扬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配兵一万镇襄阳”③。十六国各政权设置于各地的都督，既沿袭魏晋旧制，如同魏晋都督一样兼任刺史，其职权也应与魏晋大体相同，既掌军事又理民事，是雄踞一方的军政长官。

十六国各政权赖以统治人民的行政建置，大体上仍然是州郡等系统，州郡一般都设有州郡兵，由州刺史、郡守统带。后赵各州领有大量州兵。石勒时，“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临深遣司马管光率州军讨之”④。石虎时，“将讨三方，诸州兵至者百余万”⑤。又前秦时，苻坚曾命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邺率冀州兵三万为前锋”⑥，进讨叛将苻洛。从上述记载看，十六国时期州郡领有军队的数量很大，他们平时戍卫地方，维护治安，有战事时则出兵作战。

第二节　军队体制及兵种

一、军 队 体 制

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军队体制大体同于魏晋，分为中军与外军两部分。

中军是十六国各政权军队中的主力，平时驻于京都内外，负责宿卫宫廷及保卫京都，有战事时出征作战。各政权的中军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驻于京都之内，宿卫宫廷，一部分驻于京都

---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②③⑥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④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⑤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近郊，拱卫京师。但不论哪一部分中军，出征作战都是其主要任务。

各政权统领中军宿卫宫廷的有各种名号的将军。前赵时，刘曜曾以刘胤为“永安王，署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①。这是由刘胤总统宿卫诸军。刘聪在位时，太师卢志鼓动皇太弟刘乂作乱时曾说：“四卫精兵不减五千，余营诸王年齿尚幼，可夺而取之”②。所谓“四卫”，也是宿卫中军的名号。前赵宿卫中军实力雄厚，刘曜派遣刘岳进攻石生，一次就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卫精卒一万”③。后赵的中军有“禁兵”、“禁卫诸军”、“宿卫精卒”等称呼④，其中的“宿卫精卒”当是职掌宿卫宫廷的中军。后赵宿卫中军将领有中领军、卫将军、左右卫将军、左右戎昭、曜武将军等。石勒时，以世子石弘“领中领军”，“寻署卫将军”⑤。石虎时，曾置“左右戎昭、曜武将军，位在左右卫上”⑥。前秦统领宿卫中军的将领有左右卫、四禁、四军、武卫等名号，宿卫中军战士则有羽林等称呼。苻坚时，宗室苻双、苻柳反叛，苻坚“遣后禁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等讨双”⑦。后又“遣其武卫王鉴、宁朔吕光等率中外精锐以讨之，左卫苻雅、左禁窦冲率羽林骑七千继发”⑧。苻坚曾诏令“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⑨。

十六国各政权的宿卫中军，还包括太子东宫兵，由于太子的储君身份，各政权君主都配与东宫重兵，因而东宫兵实力非常雄

---

①③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④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载石勒以其世子石弘“镇邺，配禁兵万人”。同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载石虎妻不许石遵探望病中的石虎，使其在“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又同卷记石虎死后，刘氏“使张举等统宿卫精卒，”围攻逃亡在外的司空李农。

⑤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附石弘载记》。

⑥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⑦⑧⑨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厚。如后赵时，太子东宫置有重兵，并设太子四卫率统领东宫兵。石虎时又在东宫“置左右统将军，位在四率上”①。后赵的东宫兵数量在10万以上，而且战斗力极强，皆为精锐士卒。石虎在位时，一次就将撤夺诸公的“余兵五万，悉配东宫”②。后太子石宣失宠被杀，其“东宫卫士十余万人皆谪戍凉州”③。东宫卫士因此作乱，他们“皆多力善射，一当十余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④。后石虎屡次征调精兵，经反复征战，才将其扑灭。其他政权也大体如此，皆设有东宫兵，只是兵力不等。

宿卫部分之外的中军驻于京都附近，职责是拱卫京都。刘渊时，大司马、大单于、录尚书事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⑤。其所率便是拱卫京都的中军。后赵石勒时，命世子石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⑥。石虎晚期，其妻刘氏不许石遵探望病中的石虎，使其在“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⑦。上述所谓的“禁兵”，当是中军中不预宿卫宫廷的部分。

十六国时，除去大单于、都督中外诸军事等总统中外军的官职之外，总领整个中军的统帅有各种各样的称呼，各政权不尽相同。前赵时，未见总统中军的明确官称。刘和即位时，卫尉西昌王刘锐和宗正呼延攸曾劝他说：“先帝（指刘渊）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为寄座耳。此之祸难，未可测也，愿陛下早为之所”⑧。可见当时中军的统领大权在刘氏宗王手中。后赵时，统领中军的有中领军，又有都督中军事、都督禁卫诸军事等，已见前述。需要指出的是，后赵统领中军的，也主要是宗室子弟。前秦时，统领中军的有中军将军、中军大将军等。

---

①②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④⑦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

⑤⑧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附刘和载记》。

⑥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上。

各政权的中军大体皆由本族人组成，是从建立政权以前本族的部落兵过渡而来，其数量众多，实力强大。像刘渊初起时，数月之间，已有“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①。后至刘曜时，一次出征，即有“戎卒二十八万五千”②，这其中主要即是中军。后赵时，仅东宫卫士即有10余万。石虎时，“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③。这里的“邺城旧军”全是中军，其数量应占多部分。石虎太子石宣祭祀山川，随后游猎，其所统“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④，也全是中军。前燕慕容暐时，与前秦开战，有“中外精卒四十余万”⑤。前秦苻坚南攻东晋时，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⑥，其中主力都是中军。

十六国各政权的中军有宿卫宫廷、拱卫京都的职责，但由于当时各政权之间争战不已，征战频仍，因而中军的主要职责是出征作战。实际上当时各政权出兵作战，皆以中军为主力。前赵刘曜时，派兵攻打晋雍州刺史杨曼，“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⑦。后他派刘岳进攻洛阳，配以“宿卫精卒一万”⑧。石虎进攻前赵关中地区，刘曜也是“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⑨。后赵、前燕、前秦等也皆以中军充任征战主力。后赵石勒时，曾派遣石虎“统中外精卒四万讨徐龛”，又曾令其“统中外步骑四万讨曹嶷”⑩。前燕、前秦也大致如此，已见前述。

外军是各政权军队中的另一部分，它主要包括都督所领军队，以及州郡所有军队。

十六国各政权大体都仿照魏晋旧制设置都督，任都督者，手

---

①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

②⑦⑧⑨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④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

⑤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⑥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⑩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握强兵镇守地方，主管一方军政。如刘渊时，以“王弥为侍中，都督青、徐、兖、豫、荆、扬六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青州牧”①。前燕慕容暐时，以慕容垂为都督荆、扬等十州军事，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前秦苻坚时，以其中垒梁成为南中郎将，都督荆、扬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配兵一万，镇襄阳。各地方重镇都督所领的军队，一部分是由中央军分驻于京都之外的，故称外军。十六国时期，各政权中央集权强大，所以其军队虽有中、外军的分别，但外军的性质是中央直属军队，不像两晋那样成为具有地方色彩的军队。十六国时期的都督皆由各政权君主任命，并配以中军出镇地方，其君主一般对于都督能够有效的控制，其军队仍属中央统一调遣指挥。像上述前燕慕容垂、前秦梁成都由其中央政权任命，并配以军队出镇地方。前秦苻坚淝水战败至洛阳时，曾“遣骁骑石越率卒三千戍邺，骠骑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镇军毛当戍洛阳”②。这里虽然不是配与都督的军队，但以中军配与将领出戍地方，在性质上与都督出镇一样。其中提到以羽林兵出戍并州，羽林属于宿卫中军，这说明当时前秦兵败之后兵力寡弱，直接派中军出镇地方，这一事实同时表明外军为中央直属军队的性质。

十六国各政权大体都以州郡这一传统行政建制，对各地区实行统治，在一般情况下，州郡都置有军队，这些军队也属于外军。依照魏晋传统，州郡兵属于地方军，平时维护地方治安，保证封建秩序，战时则要接受朝廷调遣，出征作战。后赵时，各州领有大量州兵。石勒在位时，秦州刺史临深曾“遣司马管光率州军”③讨伐反叛的秦州休屠王羌。石勒与刘曜在洛阳决战时，曾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④。石虎时，因“羌薄句大犹保险未宾，遣其子章武王斌率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

---

①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纪九》怀帝永嘉三年三月。

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③④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兵以讨之"①。后石虎"将讨三方，诸州兵至者百余万"②。前燕慕容暐时，东晋桓温北伐前燕，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③。前秦苻坚时，宗室苻洛反叛。苻坚"遣其左将军窦冲及吕光率步骑四万讨，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邺，率冀州兵三万为前锋，以苻融为大都督，授之节度"④。从上述记载可知，各少数族政权都设有州兵，而且数量非常之大。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如此多的州兵，在其性质上应与魏晋时期的州郡兵似有所不同。如果仅仅在平时维持社会秩序，或偶尔出征作战，似没有必要在各州设置如此多的州兵。大概由于当时战事太多的缘故，各州领有大批军队以备中央战时征调，故这时州兵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出征作战而非维持社会治安了，这应是十六国州郡兵的特殊性质。

二、兵种

十六国各政权的军队，主要由骑兵与步兵组成，另有数量很少的水军。

十六国各少数族政权，皆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建，骑射弓马是其所长，因而十六国各政权的骑兵都非常发达，是其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和主力兵种。各政权在创建之初，都以其本族部落成员为基本军事力量，其本族的部落兵大都是骑兵。此后随着各个政权的建立，它们都拥有了一支强大的骑兵，其中前赵、后赵、前燕及以后的诸燕、前秦、大夏等政权的骑兵尤为突出。各政权出兵作战，一般以精锐骑兵担任主力，有时步骑混同出征，仍以骑兵为主力。刘渊建立的汉国（前赵），起事时依靠的是五部匈奴，时有"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这里所谓以一当十，恐怕正是因为骑兵弓马娴熟，冲击力强的缘故。后来刘渊曾"遣（刘）聪、

---

①②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④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王）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①。刘聪在位时，曾“遣其平西赵染、安西刘雅率骑二万攻南阳王模于长安，（刘）粲、（刘）曜率大众继之”②。后晋愍帝在长安，刘聪以赵染为前锋大都督、安南大将军，“以精骑五千配之而进”③，会同诸军进攻长安。刘曜在位，曾“使其将刘岳等率骑一万，迎父及弟晖丧于太原”④。后赵骑兵也很强大，常以步骑协同作战。如石勒曾命石虎“统中外步骑四万讨曹嶷”⑤。石虎也曾“统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⑥。后赵瓦解后，冉闵建立冉魏，有“戎卒三十余万”⑦，其中有大量的精锐骑兵，所以冉闵与以铁骑著称的前燕交战，连败其 10 阵。慕容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⑧。从中可窥见后赵骑兵的风采。前燕为鲜卑人所建，骑兵也很发达。前燕建立之初，后赵石虎率“戎卒数十万，四面进攻”⑨，慕容皝使其子慕容恪等“率骑二千，晨出击之”，石虎“诸军惊扰，弃甲而遁”⑩。慕容恪乘胜追击，斩获 3 万余级。后慕容恪又以精骑 7000 设伏，大败后赵将麻秋，可见前燕骑兵的战斗力很强。前燕出征也常以步骑协同作战，如慕容儁时即曾“遣其抚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熙等率步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混北”⑪。前燕与前秦决战时，有中外精卒三十余万，当是步骑参杂，其主力兵种是骑兵。前燕为鲜卑游牧民族所建，又处于产马的辽东地区，而且收容了不少其他游牧民族的人口、马匹。如慕容儁时，大破丁零敕勒，一次即“俘斩十余万级，获马十三万

---

①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

②③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④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⑤⑥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⑦⑧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

⑨⑩ 《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⑪ 《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匹，牛羊亿数万”①。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3.5万降于前燕，必然带有众多的马匹。前燕所辖充裕的游牧人口及马匹，使其有条件组成一支数量众多的精锐骑兵。及至由前燕派生出的南燕时，仍以骑兵著称，而且有“铁骑五万三千”。当慕容钟进兵青州时，曾传檄说：“都督元戎一十二万，皆乌丸突骑，三河猛士”②。东晋末年刘裕北伐南燕时，南燕主慕容超不肯出兵据守险阻大岘，称其有“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铁骑践之，此成擒也”③。慕容超所仗恃的，仍是铁骑。前秦也有强大的骑兵，出征时也以步骑协同作战。淝水之战前，前秦拥有“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④，约占全部军队的近二分之一。匈奴族人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也是骑兵非常发达的政权。赫连勃勃起事前，姚兴以其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⑤。后赫连勃勃截夺河西鲜卑杜屺献与姚兴的马匹8000匹，率部下游牧部民3万余骑起事，建立大夏。赫连勃勃不断发展，建成一支精锐骑兵。他外出征战大体以骑兵充任。他曾“率骑二万”讨伐南凉秃发傉檀，“率骑三万”攻打后秦将杨佛嵩，“率骑四万袭上邽”⑥。赫连勃勃起事之初，众将都认为应攻占一地据守以为根本。赫连勃勃不肯听从，说：“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⑦。所谓“云骑风驰”指大夏的骑兵，而且赫连勃勃善于利用骑兵的优势。

骑兵是古老的传统兵种，其特点是速度快，冲击力强，骑兵这一兵种在十六国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使用。前述后赵冉闵

---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二十八《慕容超载记》。

④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⑤⑥⑦ 《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

飞骑作战，“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勇猛冲锋的战情，很好地体现了当时骑兵的风采。前赵时期，陈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骑将，史称他“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鞬服，左右驰射而走”①。显然，十六国时期的骑兵其战斗力确实非常之强。

步兵也是十六国各政权军队的主要部分，它也是历代军队的基本组成部分。十六国各政权都有步兵，其数量一般要多于骑兵，但它在军队中的作用地位却要逊于骑兵。各少数族政权在起事之初，其军队主要由其本族部落兵组成，基本上都是骑兵。但随着其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不断地招收了不少汉人及其他族的成员组成步兵。如刘渊起事后，“远人归附者数万”②。刘聪时，“遣（刘）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③。前赵将曹嶷进攻晋地，“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④。后赵石勒在发展势力过程中，也攻陷不少坞堡。前、后赵所收降的这些人口，其中青壮年大都成为他们的兵士。如石勒，一次就在坞堡中“简强壮五万为军士”⑤。这些坞堡的人口大多数都是汉人，他们被编入军队后，一般便担任步兵，因而前后赵都有不少步兵。刘渊曾“大发卒，遣（刘）聪、（王）弥与刘曜、刘景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⑥。后赵也常以步骑协同出征，石虎将讨三方所征集的州兵百余万，大部分也当是汉人步兵。前燕慕容儁曾“令州郡校阅见丁，精核隐漏，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⑦。后因大臣反对，改为“三五占兵”，这说明前燕拥有不少步兵。前秦淝水之战时，有精卒60余

---

①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②⑥ 《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

③④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⑤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⑦ 《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万，骑兵占其中的 27 万，剩下的 30 余万皆是步兵。总之，十六国各政权拥有数量众多的步兵，而且大多以汉人担任，其在军队中的作用主要是攻城守土。

十六国中的某些政权也拥有水军，但其数量很少，作用及地位也远低于骑、步兵。如后赵石虎在位时，曾“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①。这是后赵以步、骑、水军协同出征的事例。石虎还曾令“青船千艘”②，以支援先期渡海戍于海岛的曹伏所领青州将士。当石虎意欲南进时，“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③，结果“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而一”④。前秦苻坚准备伐晋时，也曾在益州组建水军，命“蜀汉之军顺流而下”⑤，以形成“东西万里，水陆并进”⑥之势。这些都说明后赵、前秦皆拥有水军，在扩大其势力范围时，并曾着力于水军的建设。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其水军势力甚微，而且水军的组建，带有实行某种临时征战任务的短暂性质。

第三节　兵役制度与后勤供应

一、兵 役 制 度

十六国几个较大政权都拥有十分雄厚的兵力。根据史籍记载，前赵的军队在 30 万人以上，后赵军队大约近 50 万人，前燕有军队 40 余万人，前秦强盛时则有军队近百万人。各政权如此强大的兵力，是由多种来源构成的，其中既有各少数族的本族部落兵，也有通过征兵制及募兵制招来的各族兵士。

各政权起事之初，依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本族部落兵；但由

---

①②③④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⑤⑥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于本族部落民毕竟有限，随着各族势力的发展，其他少数族的部落民也成为其将士的一个来源。刘渊起事时，以五部匈奴为基本力量，但他同时也注意招降其他少数族民。石勒在刘渊麾下任将时，就曾说降“胡部大张訇督、冯莫突等”数千部众。刘渊将其编入石勒麾下，“署訇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①。后来石勒又招降乌丸张伏利度所领部众，刘渊又“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②。前赵刘曜也曾“发氐、羌之众，屯于秦州”③。后赵石勒也在起事后招纳少数民族部族，他曾“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④。前燕慕容皝时，先后击灭鲜卑段辽和宇文归，一次即迁徙宇文氏“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⑤。慕容儁时，也曾大破丁零敕勒，俘获人口马匹甚众。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三万五千降于儁”⑥。前秦时，更是收降了许多少数民族部族，以至于“鲜卑、羌、羯，布诸畿甸”；“鲜卑、羌、羯攒聚如林”⑦。此外，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也收纳了不少汉人为兵。如前赵、后赵在中原的征战过程中，攻陷及收降了不少坞堡垒壁，这些坞堡垒壁中的不少汉人青壮年都被充兵。

各族部落兵及其他部族和汉人组成的军队，在各少数族创建政权后，逐渐转为常备兵。各族常备兵虽有一些汉人，但以少数族成员为其主体。这是因为各政权皆以本部族成员为主要依靠力量，同时少数族成员善于骑射，可以组成战斗力很强的骑兵。各政权的常备兵，一般没有服役期限，是终身为兵。前赵刘曜时，其“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⑧，可知其是终身为兵。后赵末年石虎死，石遵率军攻打邺城，权臣张豺率众准备迎敌，“耆旧羯

①②④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③⑧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⑤ 《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⑥ 《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⑦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士皆曰：‘天子儿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豺城戍也’。逾城而出，豺斩之不能止”①。耆旧羯人仍在服兵役，应该也是终身为兵的结果。十六国各政权的常备兵要终身为兵，这一点类似于魏晋的世兵制。但各政权既以本族部落民充作常备军队，并作为其统治基础，其身份地位与魏晋时的世兵显著不同，既非世袭，而又具有部落兵地位较高的特点。

为扩大兵员以适应频繁的战争需要，十六国各政权也采用了传统的征兵制。征兵就是征发郡县百姓充兵，十六国时期，征发的对象主要是汉人。后赵石虎时，将讨伐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等州五丁取三，四丁取二，以充兵役。前燕慕容儁时，为进攻东晋并向西发展势力，下令州郡“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为兵。后因大臣刘贵上疏极谏，乃改为五丁抽二，三丁抽一为兵，齐集邺城②。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前，早已“下书悉发诸州公私马，人十丁遣一丁”③。上述征发的对象都是各地州郡的百姓，他们大都是汉人，被征发来后都是充当步兵。这种征发的兵，不属于常备军，在一般情况下，战事结束后即遣散回乡。

募兵也是十六国时期常用的集兵方式。前赵刘曜时，曾“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以随，以充折冲之任”④。后赵石虎时，“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⑤。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也曾招募有勇力者为兵，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⑥，结果“良家子至者三万余骑”⑦。从上述材料可知，募兵是有一定条件的，应募者必须是弓马娴熟，武艺出众者。唯其如此，所以募兵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有勇力和武艺者一经应募，即

---

①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

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③⑥⑦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④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⑤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成为职业兵，一般不会在战事后退役。

二、后 勤 供 应

十六国时期，军队的后勤供应主要是军器和粮食的供应。

十六国时期的军队，所用的兵器仍是弓、弩、刀、剑、矛、戟及铠甲、盾牌之类。由于这一时期骑兵发达，长刀、长矛似比以前使用要多，有所谓“七尺大刀、丈八蛇矛”①，“双刃矛”②之类。同时，这一时期不仅人披铠甲，马的铠甲使用也较为普遍。当时有“铠马”或“铁骑”的称呼，即是全身佩戴防御铠甲的战马。如石勒击败鲜卑段就六眷时，就曾“获铠马五千匹”③。后秦姚兴时，大破西秦乞伏乾归，“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④。十六国时期，各政权争斗不已，战争频繁，各政权统治者必然要重视军器的制造。但由于各政权存在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其军器的制造、贮存、发放使用等似没有像魏晋那样形成一整套规范的制度。从史籍记载看，当时各政权的军器制造机构，有的规模不小，有的处在一种根据战争需要临时制造的状态。后赵石虎时，“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⑤。这是石虎准备大兴兵众，临时赶造兵器。后赵虽有修造兵器的“丰国、渑池二冶，”并“徙刑徒配之，权救时务”⑥，但其规模很小。大夏赫连勃勃时，“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练刚刀，号曰‘大夏龙雀’……凡杀

---

①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附冉闵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 《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⑤⑥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①。看来，大夏修造兵器的规模很可观。十六国政权修造军器的记载较少，但揆之当时形势，各政权修造军器是势所必然的事。如苻坚淝水之战前，“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②，其兵仗当然主要是修造而来。后燕慕容熙时，冯跋等人以慕容熙为政暴虐，“推慕容云为主，发尚方徒五千余人闭门距守”③。尚方自晋以来即“掌造军器”④，结合后燕尚方有刑徒5000之众来看，其尚方仍是修造军器之所。十六国政权也实行着武库收藏军器的制度。如前赵刘聪时，其“武库陷入地一丈五尺”⑤。后秦时，姚兴病重，“使姚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敛曼嵬收（姚）弼第中甲杖，内之武库”⑥。大约当时各政权的军器，也是造好后置于武库贮存，需要时发放使用。由于当时战事频繁，各方镇也储有军器，如前秦苻坚以梁成为南中郎将、都督荆扬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配兵一万镇襄阳，以征南府器杖给之”⑦。这里征南府器杖，显然是方镇武库保存的兵器。十六国各方镇储存的军器，大约也是由中央统一调拨投入使用。

此外，当时战马也是极其重要的军资。各政权有战事时，常采用征用百姓马匹的办法。后赵石虎时，为满足战争需要，“乃禁畜私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余匹以入于公”⑧。后“又取州郡吏马一万四千余匹，以配曜武关将，马主皆复一年”⑨。后秦姚兴时，凉州百姓反对以马三千匹、羊三万头的代价，将凉州交与秃发傉檀掌管，曾说：“苟以马供军国，直须尚书一符，三千余家

---

① 《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③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熙载记》。

④ 《宋书》卷二十九《百官志》上。

⑤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⑥ 《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下。

⑦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⑧⑨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户输一匹，朝下夕办"①。看来，十六国政权征用马匹，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情。有些政权还开辟牧场，设置牧官，以保证军国用马。如石虎就曾"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②。此称牧官，不应是仅仅牧牛，应包括战马在内。而称朔州牧官，大约其他适宜畜牧的边州，也设置畜牧业官员，以供应军国戎马所需。

军粮是十六国军队后勤供应的另一主要内容。各政权初起之时，没有可靠的粮食供应途径，一般皆以掠掳满足军队的粮食需要。如后赵石勒起事之初，即以掠掳百姓粮食为食，他曾"分遣诸将，收掠野谷"。若"采掠无所得获"，便至"军中大饥，士众相食"。有时他攻破或收降坞堡垒壁，便使其供应粮食③。由于石勒大肆掠夺百姓粮食，当时被称为"胡蝗"④。当各少数族相继成立政权后，大体都先后实行了固定的封建租调制度，以保证其政权及军队的粮食供应。如石勒在政权初具规模后，以"司冀渐宁，人始租赋"。后又"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⑤。后赵以较低的固定租调，代替无限制的横征暴敛，对百姓剥削大为减轻，同时也保证了后赵的军粮供应。石虎在位时，粮食已有相当的储备。他"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余皆储之水次"⑥。在此基础上，石虎曾命"运谷三百万斛"⑦，供戍于海岛的渡辽将军曹伏；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屯田于海滨"⑧。后又"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⑨。这些说明后赵的军粮，较前有了充足的保障。前赵似乎也实行了固定的租调制度。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刘曜因夜梦神人，祭祀天地山川，并"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⑩。前燕、前秦等政权，也都实

---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

②⑥⑦⑧⑨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③⑤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⑩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行了固定的租调制度。前燕慕容皝及前秦苻坚二人，尤其注意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前燕、前秦的社会生产都曾一度得到恢复，从而保证了大量军队的粮食供应。前秦四处征战，基本上没有军粮不足之忧。苻丕大军南进围攻襄阳时，迫于苻坚严令准备急攻。苟苌劝谏说："今以十倍之众，积粟如山"①。秦军远攻襄阳，军粮堆积如山，可见其军粮供应之充足。各政权的军粮供应一般由国家负责，如前秦王猛率军进攻前燕，苻坚送行时说："已敕运漕相继，但忧贼，不烦后虑也"②。前秦还设有度支尚书一职，西晋度支尚书的职责是"量计运漕，决定庙算"③。沿袭晋制而设的前秦度支尚书，其职责应同于西晋，即负责军国的粮食供应。前述后赵的军粮输送，也都是由国家负责供应。十六国时期，军粮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做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像后赵石虎废太子石宣时，使东宫谪卒万余人戍守凉州，及至雍城，雍州刺史张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④。这是由士卒自己携粮出征。更有甚者，也是石虎在位时，为准备进攻东晋，令"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各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⑤。这是令从军的士卒，自己筹办军资。此令一下，"百姓穷窘，鬻子以充军制，犹不能赴，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发无已"⑥。虽然这是准备大战的临时征发，但它对于百姓的残害很深。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④ 《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

⑤⑥ 《晋书》卷一百零六《石季龙载记》上。

第十章　石勒统一北方的战争

第一节　石勒建立以襄国为中心的战略基地

石勒领导流民起义的后期，即永嘉六年（312年）春从葛陂（今河南新蔡西北）北上后，有一个战略大转变。当时张宾向石勒提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流寇式的作战，必须选择邺城或襄国作为战略基地；发展生产，广积粮储；尊匈奴贵族刘聪的汉国为盟主；军事斗争的主要锋芒应对准幽州王浚、并州刘琨，从而平定关东，以图霸王之业。张宾所提出的战略和政略方针，包括建立政权和经济、军事、外交各项明确的任务，但其基本点在于消灭王浚和刘琨两大割据势力，以完成统一关东的大业。石勒正是在这个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作战的胜利，只用了4年时间便控制了关东地区，并进而消灭前赵，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同时，石勒领导的流民斗争，正是在这最后数年建立政权并完成北方统一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为封建割据势力的。

永嘉六年（312年）七月，石勒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一方面，遣使去平阳，向汉主刘聪上表解释进据襄国的举动，以消除其猜忌。刘聪任命石勒为都督冀、幽、并、营4州诸军事、冀州牧。另一方面，石勒派诸将四方出征，冀州郡县壁垒纷纷归降，向襄国运送粮谷。

同年十二月，晋幽州刺史王浚命督护王昌及辽西鲜卑段疾陆眷兄弟等人率5万大军进攻襄国。石勒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先坚守不出，示敌以弱，然后在北城墙暗凿突门20余道，待机出其不意地发动突然袭击，直冲强敌段末波营，生擒段疾陆眷之弟段

末波。石勒将末波放还，与鲜卑段氏讲和修好，从而使鲜卑段氏脱离王浚，削弱了王浚的军事实力。

石勒在襄国保卫战取得胜利后，继续平定冀州各郡县。他在稳定和扩大以襄国为中心的统治后，进一步消灭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的军事斗争，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西晋建兴二年（314年），石勒设计奇袭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杀幽州刺史王浚，占据幽州。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石勒向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进军，围攻乐平（今山西昔阳）太守韩据。并州刺史刘琨与鲜卑拓跋猗卢率大军赴援，命箕澹率步骑2万为前锋。石勒依险设伏，大败敌军。并州长史李弘率部众归降石勒，刘琨走投无路，投奔鲜卑段匹䃅。至此，石勒又控制并州大部分地区。

当西晋朝廷和地方的统治势力基本被消灭后，北方反晋斗争的任务已经完成。石勒在占据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强大后，便公开与汉国决裂。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设置百官，以襄国为都，史称后赵。

石勒在建国前后，先后派兵大破复占幽州的鲜卑段氏，攻灭青州曹嶷，统一了关东地区。最后与前赵在洛阳决战中，大败前赵军，活捉前赵主刘曜。石勒终于消灭了前赵，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第二节　轻骑奇袭幽州之战

一、王浚割据幽州

王浚，字彭祖，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人，是当时著名的士家大族。西晋八王之乱时，王浚任职宁朔将军、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他“拥众挟两端，遏绝檄书”，不肯发兵援助京师，以此招致成都王司马颖的不满。及至司马颖控制西晋大权后，便

密令幽州刺史和演杀掉王浚。和演领命后，与乌丸单于审登谋划，假意约请王浚至蓟城（今北京西南）南清泉水上游玩，准备在会面时除掉王浚。恰巧其时天降暴雨，兵器淋湿，约会未能实现。审登认为事情未成是由于天助王浚，便将和演之谋告诉王浚。王浚随即起兵，与审登围攻和演，和演被迫投降，被王浚杀掉。王浚自任幽州刺史，营造大批军械，召鲜卑务勿尘，合胡、汉士众2万人，进军连败司马颖军，一度攻占邺城，声势渐盛，从此占据幽州。晋惠帝时，任命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晋怀帝时，又任他为司空，领乌丸校尉。

永嘉六年（312年）王浚派兵攻打石勒失败后，认为自己可以代晋称帝，遂诡称受晋帝诏令承制用事，布告天下，设置公卿百官，准备成就帝业。当时并州刺史刘琨处于汉国攻击之下，各地避乱人士皆归附王浚，其势力日渐强盛。但王浚为政苛暴，手下将吏又极为贪残，“并广占山泽，引水灌田”，又“调发殷烦，下不堪命”①。加上王浚准备篡晋称帝，更使得“士人愤怨，内外无亲”，而他“以矜豪日甚，不亲为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灾蝗，士卒衰弱”②。幽州在王浚的黑暗统治下，上下离心，渐渐由盛而衰。石勒趁此机会除去王浚，正当其时。

二、石勒奇袭幽州的谋略

石勒在永嘉六年（312年）攻占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后，四出征战，冀州郡县壁垒纷纷归附，势力进一步发展。同年底，石勒又击败了王浚派来的5万大军，取得了襄国保卫战的胜利。随后，石勒派遣诸将出击，相继平定了山东各郡县。至此，石勒开始将消灭王浚、吞并幽州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张宾劝石勒假意归附王浚，遣使以卑辞厚礼奉其为主，以观其动静。石勒遣舍人王

①② 《晋书》卷三十九《王沉传附王浚传》。

子春等人携带珍宝奉表推王浚为天子，表中称王浚为“州乡贵望、四海所宗”，劝其“应天顺时，践登皇祚”①，并说自己“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②。王浚当时正欲拉拢各类势力，以逞其私欲，见信大喜，立即封王子春等人为列侯，并遣使者回报。石勒为了麻痹王浚，“命匿劲卒精甲，虚府羸师以示之”，并假意诚惶诚恐，“北面拜使而受浚书”③。与此同时，王浚司马游统反叛，遣使投降石勒，石勒斩其使，将此事报告王浚，以示忠诚。王浚对此深信不疑。其使者回幽州后，也向王浚报告石勒力量寡弱，忠心拥戴王浚，没有二心。从此王浚对勒更加放心，丝毫不为戒备。

石勒麻痹王浚的目的达到后，开始谋划袭击王浚之事。当时并州刘琨及鲜卑、乌桓都有相当大的力量，石勒意欲进兵幽州而怕这三股势力为患，因而迟疑未发。这时张宾进言说：“彭祖（指王浚）之据幽州，唯仗三部，今皆离叛，还为寇仇，此则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饥俭，人皆蔬食，众叛亲离，甲旅寡弱，此则内无强兵以御我也。若大军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将军便能悬军千里以征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④。石勒听完张宾的分析，大喜说：“吾所不了，右侯（指张宾）已了，复何疑哉！”⑤，石勒决定即刻进兵，远道奔袭幽州。

三、破幽州杀王浚

西晋建兴二年（314年）二月，石勒率轻骑日夜兼程，奔袭幽州。军至柏人（今河北隆尧西），石勒遣使奉笺书于刘琨，自称罪过深重，请求讨伐王浚以自效。刘琨素来忌恨王浚，便传檄诸州

---

①②③④⑤《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郡，说石勒“知命思愆”[1]，允许他的请求。三月，石勒军至易水（在今河北易县附近），王浚督护孙纬急报王浚，并准备率军迎敌，被游统禁止。当时幽州诸将佐皆请求出兵迎击石勒，王浚不许，大怒说：“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2]”命设酒宴迎接石勒，诸将不敢再言。石勒清晨赶到蓟城（在今北京西南隅），恐怕城内设有伏兵，先驱赶牛羊数千头入城，声言上礼，实际是使牛羊填街塞巷，使敌兵不得发。石勒率军入城后，直奔王浚官署，王浚外出迎接，被勒军执以见勒。石勒责备王浚手握强兵，不救天子，“专任奸暴，杀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3]等罪行。王浚无言可答。石勒将王浚押往襄国杀掉，以晋尚书刘翰为宁朔将军、行幽州刺史，镇守蓟城，又设置幽州守宰而还。

石勒千里奇袭，智取王浚，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从此，幽州被石勒所控制。

第三节　统一并、冀、青州之战

一、击败并州刘琨

石勒在消灭王浚势力，攻占幽州后，开始把进攻矛头指向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刘琨。

并州刺史刘琨在石勒攻灭王浚后，知道石勒并无降意，心中恐惧，上书朝廷说：“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臣孑然与寇为伍……进退维谷，首尾狼狈。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驰寇庭”[4]。西晋建兴四年（316 年），鲜卑拓跋部落猗卢父子相攻，国中大乱，先在拓跋部落充当质子的刘琨子刘遵与

①②③《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

信义将军箕澹等率猗卢所属部众3万家及马牛羊10万投归刘琨，于是刘琨实力大增。

建兴四年七月，石勒乘并州境内出现蝗灾之时，派其将石越率骑兵2万出屯并州，招纳流民20万户。石勒与青州刺史曹嶷相结交好，以除后顾之忧。十一月，石勒进兵乐平（今山西昔阳），发动了对并州的进攻。乐平太守韩据向刘琨求救。刘琨新得部众，想乘其锐气进攻石勒。他不听箕澹等人的劝谏，命箕澹率步骑2万为前锋救乐平，自率大军为后继。

石勒闻刘琨大军前来，准备迎敌。这时有人劝石勒深沟高垒以避强敌之锐气，石勒说："（箕）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犬羊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亡之道"①。石勒下令迎敌，以大将孔苌为前锋都督，三军有后出者斩首。又设疑兵于山上，设置二道埋伏，然后自率轻骑出阵诱敌。石勒刚与箕澹接战，便佯败退走。箕澹纵兵追赶，勒军二道伏兵齐出，前后夹击，大败箕澹，获其铠马万匹。箕澹逃奔代郡（治今山西蔚县西南），韩据投奔刘琨。箕澹既败，并州长史李弘献州投降石勒。刘琨进退失据，投奔控制幽州（治今北京西南）的鲜卑段匹磾。石勒将乐平等地民户迁于襄国，设置并州守宰后还师。

二、破鲜卑段氏

石勒在攻灭王浚后，以晋尚书刘翰为幽州刺史，镇蓟城。但刘翰随之即投归鲜卑段氏，因而段匹磾得据幽州。

石勒在平定并州后，遣孔苌向幽州进军。建兴四年（316年）十二月，孔苌于代郡攻杀箕澹，随后进军辽西（治今辽宁义县

---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西）。当时北方各地流民数万户在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①，孔苌进兵攻打，久而不能平定。于是石勒听从张宾的建议，命孔苌撤兵，另派合适人选担任当地地方官，不久流民武装尽皆平定。

东晋建武元年（317年）春，投奔幽州的刘琨与段匹磾歃血盟誓，相约拥戴晋室，派遣长史温峤奉盟文及表章至建康（今江苏南京），劝晋琅邪王司马睿即帝位。七月，段匹磾推举刘琨为大都督，进屯固安（今属河北），准备进攻石勒，并传檄其兄段疾陆眷及叔父段涉复辰、弟段末柸等共讨石勒。段疾陆眷等耻于遵从段匹磾号令，各引军而还，段匹磾、刘琨也只好撤回蓟城。诸段之间因此出现芥蒂。

东晋太兴元年（318年），段疾陆眷死，段匹磾自蓟回辽西奔丧。当时段疾陆眷子年幼，其辽西公爵位被传予段涉复辰，因而段末柸声称段匹磾前来是为篡位。段匹磾至右北平（治今河北丰润东南），段涉复辰发兵堵截。这时段末柸乘虚而入，杀段涉复辰及其子弟党羽，自称单于，又进兵击败段匹磾，段匹磾退回蓟城。段匹磾回辽西之时，刘琨之子刘群同行，兵败时，刘群落入段末柸手中。段末柸想利用刘琨消灭段匹磾，便命刘群写密信派人送给刘琨，许刘琨以幽州刺史，请他里应外合攻击段匹磾。不料送信人被段匹磾的游骑抓获，匹磾将刘琨及其子侄尽皆杀掉。段匹磾杀刘琨后，幽州汉人不附段氏，日渐离散，匹磾不能自保，又被段末柸攻击，遂率兵往乐陵（属今山东）依附曾在王浚手下任乐陵太守的邵续。石勒将石越在盐山（今属河北）邀击段匹磾，大败其军，段匹磾还保蓟城。

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将孔苌进攻幽州诸郡，尽皆攻克。段匹磾士众饥困离散，移保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于路被鲜卑拓跋郁律击败，段匹磾弃妻子投奔邵续。次年正月，石勒派其子石虎率兵围攻厌次，孔苌部连破邵续别营11座。二月，石虎乘邵续出击时断其归路，生擒邵续送往襄国。段匹磾与弟段文鸯及邵续子邵缉等固守厌次。太兴四年（321年）三月，石勒再遣石虎统军进攻厌次，孔苌攻段匹磾统内诸城，尽皆攻克，段文鸯出城交战，被石

---

①《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虎军活捉。段匹磾见大势已去，与邵缉等出城投降。石勒平定段氏后，拜段匹磾为冠军将军、邵续为从事中郎、段文鸯为左中郎将，又将其所属流民3万余户散置田间务农，置守宰统领抚恤。至此，石勒攻破鲜卑段氏，并、冀、幽3州皆为石勒所控制。

三、攻灭青州曹嶷

曹嶷本为王弥部将，曾任其左长史。晋永嘉五年（311年），王弥与汉国始安王刘曜攻破洛阳后，遂表曹嶷为镇东将军，使其带兵5000还据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临淄北）。后王弥被石勒杀掉，曹嶷遂占据青州，自领青州刺史，有众10余万，“密有王全齐之心”①，成为当时北方的一股割据势力。石勒平定并州刘琨后，曹嶷心中恐惧，遣使归附石勒。石勒当时忙于进攻鲜卑段氏，许其请，以曹嶷为青州牧，封琅邪公。石勒在大破段匹磾后，曹嶷又遣使贡献方物，请与石勒划黄河为界，保持友好关系。

东晋太宁元年（323年），石勒在平定幽、并、冀3州后，派其子中山王石虎率步骑4万进军青州。石虎军至青州，各地郡县纷纷归降，石虎长趋直至曹嶷驻守的广固（今山东青州西）。曹嶷见大势已去，出城投降。石虎将曹嶷送至襄国杀掉，青州平定。

当石勒占据了冀、幽、并、青4州广大地区后，其势力迅速扩展，在北方形成与前赵对峙的局面。

第四节　洛阳决战统一北方

一、决战前的北方形势

石勒在平定冀、幽、并、青4州后，于东晋太兴二年（319

---

① 《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

年）与前赵公开决裂，自己称赵王，以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为都，建立政权，史称后赵。此后北方出现了以前赵和后赵两个强大政权相对峙的政治格局。

石勒在称赵王前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石勒除实行与前赵一样的胡汉分治外，更加注意对汉族士人的利用。石勒在转战冀州之时，即曾立“君子营”以安置中原的“衣冠人物”，又以汉族士人张宾为谋主，对他言听计从，使之总理朝政。汉族士人在石勒的开国事业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针对当时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石勒还明令“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①。后来石勒还采用了魏晋时期的九品官人法，为汉族士人入仕提供条件，这不仅使后赵得到了汉族士人的支持，也使后赵扩大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在经济上，石勒实行了整顿户籍、劝课农桑、定额征收编户齐民田租户调等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早在西晋建兴二年（314 年），石勒就“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②。称赵王后，石勒还常“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③，因而后赵统治区内的农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由于石勒实行的上述措施，使后赵国力渐强。在平定青州曹嶷以后，石勒无论在所控制的区域上，还是在国力上，都已超过前赵，完全具备了和前赵决战以争天下的实力。

匈奴刘氏政权在建兴四年（316 年）攻破长安灭亡西晋政权后，曾一度成为中原广大地区的共主。在此前后，中原地区的石勒、王弥等多股势力，都曾一度臣服于汉国的统治，这是匈奴刘氏政权的全盛期。但随着中原地区军事形势的发展，北方出现多股地方割据势力，像石勒先后控制了冀、幽、并等州，曹嶷控制了青州地区。自刘曜改国号为赵，迁都长安后，匈奴刘氏政权真

---

①③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②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正能控制的地区只有关中和并州南部等地。而且在其控制区四周，尚有成汉、前凉、仇池杨氏等割据政权，前赵主刘曜曾亲率大军进攻前凉、仇池杨氏，但都没能真正消灭这些政权。前赵历代统治者大都荒淫无道，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也不重视发展生产，因而其国势日益衰落。然而前赵政权还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刘曜进攻前凉时，有“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①。

石勒在消灭曹嶷平定青州后，成为北方的强国。他志在统一北方，与前赵的决战势不可免。而前赵曾一度是中原共主，对迅速崛起的石勒十分忌恨，也想消灭石勒，以恢复前赵对中原的统治，二者之间终于爆发了关乎决定各自成败的洛阳之战。

二、大战的序幕——新安及河东之战

东晋太宁二年（324 年）正月，后赵司州刺史石生进兵攻打前赵新安（今属河南），斩前赵河南太守尹平，掠取人口 5000 户而归。接着，石勒又命石生进攻东晋据守的许昌（今河南许昌东）、颍川（治今河南禹州）等地。石生进攻阳翟（今河南禹州），被晋将郭诵击败，退守康城（在阳翟境内）。后赵汲郡内史石聪闻知石生兵败，急驰往救，进攻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皆破之。石生进兵屯据洛阳，攻略河南郡县。太宁三年（325 年）五月，李矩、郭默因数次败于后赵军，又缺乏军粮，遂遣使投降前赵。前赵主刘曜命中山王刘岳率军直趋孟津（在今河南孟津东北），镇东将军呼延谟率军自崤县、渑池（今河南渑池西南）一带东进，准备与李矩、郭默会合一同进攻石生。刘岳攻克后赵孟津关戍，进围洛阳金墉城（洛阳西北角之小城），石生率兵固守。后赵中山公石虎率步骑 4 万自成皋关（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而进，

①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救援石生，与刘岳大战于洛阳城西。刘岳战败，身中流矢，退保石梁关（在今河南洛阳东，洛河之北）。石虎在石梁关四周修筑堑壕木栅，隔绝刘岳的内外交通，又进兵击败前赵另军呼延谟部，阵斩呼延谟。刘曜亲率大军救援刘岳，石虎率骑兵 3 万迎敌。刘曜驻屯金谷（今河南洛阳西北），其军夜间无故自惊，士卒奔溃，刘曜退归长安。同年六月，石虎攻破石梁关，生擒刘岳以下将佐 80 余人，前赵士卒被坑杀 9000 余人。与此同时，郭默被后赵石聪击败，单身逃往江南。李矩也率众南归，死于半途之中。于是河南司、豫、徐、兖 4 州又为后赵所有，后赵与东晋遂以淮水为界。

东晋咸和三年（328 年）七月，石勒派遣石虎率军 4 万自轵关（在今河南济源西北，为入并州要道）西进，向前赵河东（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地区发动进攻。后赵军进入河东，前赵诸县起而响应者 50 余县，石虎率军进攻蒲阪（今山西永济西）。刘曜闻知后赵来攻，遣河间王刘述征发氐羌部众屯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以备前凉及仇池杨氏，自率中外精锐水陆诸军自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北）北渡黄河，救援蒲阪。石虎闻刘曜亲率大军前来，恐惧退兵，刘曜率兵追击。八月，刘曜在高候（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追上石虎，大破其军，斩后赵将石瞻，后赵军陈尸 200 余里，损失资仗以亿计，石虎逃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后赵军在河东之战中遂以失败告终。

刘曜反击取得胜利后，率军自大阳（在今山西平陆西南）渡过黄河，向洛阳石生发动进攻，决千金堨（在今河南洛阳北）水灌洛阳金墉城。与此同时，刘曜分遣诸将攻打后赵汲郡（治今河南卫辉西南）、河内（治今河南沁阳）等地，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投降前赵。前赵大军来攻，后赵京师襄国（今河北邢台）大震，石勒决定率军救援。前、后赵之间的洛阳决战由此展开。

三、洛阳决战刘曜被俘

石勒闻知刘曜围攻洛阳，准备亲率大军援救洛阳。后赵谋士郭敖、程遐等人劝谏石勒说："刘曜乘胜雄盛，难与争锋，金墉粮丰，攻之未可卒拔。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不可亲动，动无万全，大业去矣"①。石勒大怒，叱退二人，转与前记室参军徐光商量说："刘曜乘高候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也。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谓来进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②徐光回答说："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悬军三时，亡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望旌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今此机会，所谓天授，授而弗应，祸之攸集"③。石勒闻之大喜，命令中外戒严，有再敢劝谏阻止出兵者斩。

东晋咸和三年（328年）十一月，石勒命攻占东晋寿春（今安徽寿县）的石堪、石聪、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率所部会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命石虎率部自朝歌进据石门（在荥阳北）。石勒自率步骑4万自襄国直趋洛阳。石勒在进军途中对徐光说："曜盛兵成皋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④。同年十二月，后赵诸军集于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共有步卒6万，骑兵27000。石勒兵至成皋，闻知没有前赵守军，大喜，举手指天加额称庆说："天也！"⑤急速命令诸军卷甲衔枚分头从小路疾进，出于巩县（今河南巩义西）、訾城（今河南巩义西南）之间。

刘曜顿兵洛阳城下，不抚将士，专与身边幸臣饮酒赌博，左右有进谏者，刘曜认为是妖言，立即将他们斩首。及至闻知石虎军进据石门，又知石勒亲率大军渡河而来，才开始商议增兵戍守

---

①②③④⑤《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荥阳、黄马关（在成皋附近，黄河南岸）。不久，前赵的洛水哨所生擒后赵前锋羯兵，刘曜亲自审讯，得知石勒亲率大军前来，军势甚盛，心中惊慌。刘曜连忙撤洛阳之围，集中所有部队在洛阳城西列阵，南北达10余里，共有将士10万余人。

石勒军至洛阳，遥见前赵列阵于洛阳西，大喜，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①石勒率步骑4万进入洛阳，指挥诸军，命石虎率步兵3万自城北向城西，攻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等各率精骑8000自城西向北，攻击前赵前锋；自己亲率主力出洛阳阊阖门（洛阳西侧北边门）夹击刘曜中军。

刘曜酗酒成性，临战之前饮酒数斗，乘马将出又饮酒斗余，至西阳门（洛阳西侧中间门），指挥中军进入平地。石堪乘机率精骑猛冲敌阵，前赵阵势大乱，将士溃散，石勒、石虎等各自率军夹击前赵中军，前赵军大败。刘曜昏醉奔退，马陷于石渠之中，坠于冰上，身受10余创，被石堪活捉。前赵将士溃乱，被后赵军杀死5万余人。石堪捉住刘曜后，石勒下令停止追击，说："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②。石勒擒刘曜凯旋，洛阳决战遂以前赵大败而结束。

四、北方的短暂统一

石勒回到襄国后，命刘曜给其太子刘熙写信，使其归降。刘曜却告诉刘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③。石勒看后大怒，不久将刘曜杀掉。

前赵大败之后，国内人心惶惶。东晋咸和四年（329年）正月，刘熙与南阳王刘胤等率百官西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前赵诸征镇皆弃守而从之，于是关中大乱。前赵将军蒋英、辛恕等拥众数十

---

①② 《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③ 《晋书》卷一百零三《刘曜载记》。

万占据长安，遣使向后赵投降，石勒命石生率洛阳守军进据长安。同年八月，刘胤率军数万自上邽反攻长安，关中陇东（治今宁夏固原东南）等7郡胡汉各族皆起兵响应。石生率所部婴城固守，石勒派遣石虎率骑兵2万救援长安。九月，石虎在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大败刘胤，斩杀刘胤将士5000余人。刘胤逃奔上邽，石虎乘胜追击，前赵士卒枕尸千里，上邽守军溃散。石虎攻克上邽，生擒刘熙、刘胤及其王公卿士以下3000余人，全部处死，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共9000余人于襄国，前赵亡。

石虎攻占上邽后，转而进攻河西集木且羌，俘获数万，秦陇地区皆被后赵平定。前凉张骏闻知恐惧，遣使向后赵称藩，贡献方物。氐王蒲洪、羌酋姚弋仲也相继投降后赵，石虎表蒲洪为监六夷军事，姚弋仲为六夷左都督，迁氐、羌15万落于司、冀2州。至此，当时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皆为后赵所控制，石勒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咸和五年（330年）九月，石勒即帝位，改元建平，大赦天下。后赵完成北方的统一后，占有南至淮水、北至代北、东至大海、西至河西的广大地区，成为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唯一北方强国。然而后赵统一北方的局面，并没能保持多久。石勒称帝3年后病死，太子石弘即位。手握后赵实权的石虎不久废石弘自立，并将都城迁至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石虎是十六国时期出名的暴君，他在位期间的倒行逆施，使后赵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东晋永和五年（349年），后赵政权随着石虎的死去而灭亡，北方重又陷入分裂混乱的局面。

第十一章　苻坚统一北方的战争

第一节　氐族苻氏建立前秦

一、苻健据长安建国

氐族苻氏，居于略阳临渭（今甘肃天水东北），世为部落小帅。西晋末年，苻氏代表人物苻洪被略阳氐人推为盟主，组织起一支氐人武装。前赵刘曜在长安称帝，苻洪率部众归顺，被封为归义侯。后赵势力兴起，苻洪又率众归降后赵主石虎，被封为冠军将军，并被“委以西方之事”①。东晋咸和八年（333年），石虎徙关中豪杰及羌戎于关东，以苻洪为龙骧将军、流民都督，居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东晋永和五年（349年），石虎病死，诸子争位，后赵陷入混乱。苻洪当时有部众10余万，遂遣使向东晋请降，东晋任其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州郡公。永和七年（351年），苻洪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准备回师关中，成就霸业。但就在这时，石虎降将麻秋趁酒宴之机毒杀苻洪，苻洪子苻健杀麻秋，代统其统。

苻健继位后，遵从父亲遗命，决定西入关中谋求发展。为了求得东晋支持，苻健去掉秦王称号，改用东晋所封爵位，并遣使赴东晋报丧。当时京兆人杜洪占据长安，苻健为了麻痹杜洪，使自己西进顺利，在枋头修缮宫室，并命令部众种植麦子，以表示自己没有西进的意图。就在杜洪毫无戒备之时，苻健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雍州刺史，率领全部部众于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二《苻洪载记》。

架浮桥渡河西进。苻健命其弟苻雄率步骑5000为前锋直趋潼关(在今陕西潼关西),又命兄子苻菁自轵关(在今河南济源西北)入河东(今山西西南部),自率大军继苻雄而进。杜洪闻知苻健来攻,派大将张先至潼关截击苻军,苻健进军大败张先,继续前进。杜洪尽起关中之兵来战,苻健分兵命苻雄进攻渭北地区,自己率军大败杜洪,生擒张先。这时另路军苻菁也进展顺利,杜洪各处守军望风而降,苻健进军攻占长安。接着,苻健自称天王、大单于,设置百官,以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永和八年(352年),苻健称帝,国号秦,史称前秦。苻健称帝后,陆续消灭关中地区的割据势力,控制了关陇地区。东晋永和十年(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大军4万北伐,苻健分派众将御敌,又实行“收麦清野以待之”① 的政策,终于大败晋军。巩固了建立不久的政权。

苻健在政权稳定后,在长安城中修置来宾馆,以招徕远人,又与百姓约法三章,轻徭薄赋,关心政事,崇尚儒学,优礼耆老,关中地区的政治形势较前稳定。

二、苻坚代苻生自立为君

东晋永和十一年(355年),苻健病死,其子苻生继其位。苻生为苻健的第三子,性格刚愎自用,即位后荒淫无道,任情杀戮,使得前秦朝野“人情危骇,道路以目”②。东晋升平元年(357年),苻雄之子苻坚杀苻生自立为帝。

苻坚,字永固,是十六国时期杰出的少数族统治者。苻坚即位后,重用汉人王猛及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优秀人材,大张旗鼓地改革政治。他先后实行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豪强势力,劝课农桑,与民休息,兴办学校等一系列措施,使前秦政权迅速强大起来,且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二《苻健载记》。

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二《苻生载记》。

政治清明，经济发展。随后，苻坚开始了他统一北方的战争。

第二节 攻灭前燕的潞川之战

一、鲜卑慕容氏的兴起及建国

慕容氏是鲜卑的一支，曹魏初年入居辽西（治今辽宁义县西），后从司马懿讨伐公孙氏有功，其酋长慕容莫护跋被封为率义王，慕容氏始建国于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南）之北，后迁居辽东（治今辽宁辽阳）北部。西晋初年，慕容莫护跋之曾孙慕容廆统部，屡犯西晋边境，后慕容廆遣使归顺晋廷，被封为鲜卑都督。晋元康四年（294年），慕容廆率部移居大棘城，教部众以农桑之法，开始定居的农业生活，同时仿晋制建立制度，所谓"法制同于上国"①。西晋永嘉（307～313年）初年，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东晋初，慕容廆遣使劝进，被晋元帝授予龙骧将军、大单于。当时中原大乱，人口流亡，慕容廆"刑政修明，虚怀引统，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②。中原百姓士人大量避难辽西后，慕容廆设置侨州郡，任用汉族士人为官，兴办儒学，发展农业，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扩充自己实力的措施，为前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东晋咸和八年（333年），慕容廆死，其子慕容皝继其位。晋咸康三年（337年），慕容皝称燕王，咸康七年，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慕容皝在位期间，先后攻破夫余、高句丽，攻灭鲜卑宇文部，大败后赵军。同时，慕容皝实行与其父一样的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措施，其势力急剧发展，成为辽西强国。东晋永和四年（348年），慕容皝死，其子慕容儁继位。慕容儁即位时，后赵已渐至衰乱。永和六年（350年），慕容儁集中精兵20万南下，连败后赵军，攻占蓟城（今北京西南），随即迁都于此。同年，慕容

①② 《晋书》卷一百零八《慕容廆载记》。

儁经过多次攻战，消灭代后赵称帝的冉闵，攻占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顺利进据中原。东晋永和八年（352年），慕容儁称帝，国号燕，史称前燕。

二、前燕与前秦的东西对峙

前燕攻灭冉闵后，占有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辽宁、内蒙古等广大地区，其中黄河流域除前秦占有的关中外，全部为前燕所有。当时的中国北方形成前燕、前秦东西对峙的局面。慕容儁控制中原后，准备进而灭掉东晋和前秦，一举统一天下。东晋升平二年（358年），慕容儁命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覆隐漏”①，每户可留丁口一人，其余尽数征发为兵，想征集士卒150万，成就统一大业。后因怕百姓“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改为“三五占兵”②，亦即家有三丁者抽一人充兵，有五丁者抽二人充兵，并下令于次年冬天在京师邺城集合。但慕容儁未及兴师，便于升平四年（360年）病死。慕容儁死后，其子慕容暐继位，年仅11岁。慕容皝第四子、太原王慕容恪以太宰、录尚书事辅理朝政，慕容皝之弟、上庸王慕容评以太傅“副赞朝政”。

慕容恪是前燕难得的政治军事人才，他执政后，“虚襟待物，谘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谨肃，进止有常度，虽执权政，每事必谘之于评”③。他不仅平定了勋旧慕舆根的叛乱，稳定了慕容暐年幼即位的动荡政治局面，而且曾一度攻占东晋洛阳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荥阳、许昌等地。慕容恪执政期间，是前燕政权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

与此同时，前秦政权也处于上升发展时期。前秦主苻坚重用汉人王猛，推行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劝课农桑、兴办学校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慕容儁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附慕容恪传》。

等措施，使得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前秦成为与前燕东西对峙的强有力的对手，苻坚又素有统一天下之志，二者之间的战争势不可免。

东晋太和元年（366年），慕容恪病死，前燕形势发生逆转。慕容恪死后，“性多猜忌”① 的慕容评继之辅政。慕容恪临终，曾向慕容暐及慕容评推荐文武兼资的吴王慕容垂，请以他为大司马职掌兵权，以对抗秦、晋。但慕容评执政后，不肯重用慕容垂，而以慕容暐之弟慕容冲任大司马。东晋太和四年（369年），东晋桓温率大军北伐，企图乘慕容恪初死之机，收复被前燕攻占的河南失地。慕容暐、慕容评君臣本无才略，见晋军一路连胜，恐慌异常，意欲北逃龙城。这时慕容垂请求率师抵御晋军，慕容暐遂以他为南讨大都督，率军5万迎敌。同时，慕容暐又遣使向前秦求救，并许割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以西之地，请求前秦出兵相助。苻坚遣其将苟池率军2万东出声援，苻坚此举“外为赴援，内实观隙，有兼并之志矣”②。慕容垂采用断敌退路的战略，在襄邑（今河南睢县西）大败晋军，晋军将士伤亡3万余人。慕容垂的襄邑大捷，虽然挽救了前燕的危机，但他自己却因威名大振而受到慕容评更深的猜忌，慕容评加紧筹划，准备杀掉慕容垂。慕容垂无法自全，遂与世子慕容令投奔前秦。

苻坚早有攻灭前燕之心，慕容恪死后，因畏惧慕容垂的威名而未敢贸然用兵，这时见慕容垂来降，大喜过望，以其为冠军将军、宾都侯，礼遇甚重。至此，秦、燕之间的对峙局面出现了有利于前秦一方的转变。

三、潞川之战

慕容恪死后，前燕政治渐趋衰乱。燕主慕容暐穷奢极欲，他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后宫四千有余，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绮縠罗纨，岁增常调，戎器弗营，奢玩是务”①。执政者慕容评则是“政以贿成，官非才举”，使得“群下切齿焉”②。就在前燕发生统治危机的情况下，前秦发动了对前燕的进攻。

东晋太和四年（369年）十二月，前秦主苻坚以前燕未如约割让虎牢以西之地为由，命王猛与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等率步骑3万进攻洛阳。燕主慕容暐闻讯，命乐安王慕容臧率精兵10万赴援。王猛命梁成率兵万人迎击慕容臧，两军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的石门遭遇，慕容臧兵败，于是两军相持于石门一线。燕洛州刺史慕容筑在王猛劝降之下，举城归降，前秦攻占洛阳。随后，梁成再次大败慕容臧，慕容臧退守新乐（今河南新乡一带）。王猛留邓羌镇守洛阳，率军凯旋。前秦攻取可以沿黄河东进北上的战略要地洛阳，为后来的潞川之战打下了基础。

太和五年（370年）四月，苻坚以王猛为统帅，使其率杨安等将领率步骑6万，再次东进伐燕。苻坚亲送王猛于霸水（在今陕西西安东），说：“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从壶关（今属山西）、上党出潞川（今山西东南部浊漳河），此捷济之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于邺相见。已敕运漕相继，但忧贼，不烦后虑也”③。王猛豪迈地回答说：“臣虽不武，望克不淹时。但愿速敕有司，部置鲜卑之所”④。随即挥师东进。本年七月，王猛率军围攻燕之壶关，大将杨安另率一军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从前秦用兵方略上看，是兵分两路，以主力沿黄河自洛阳渡河北上攻敌之上党，一旦占此要地，便可直趋燕都邺城；另以偏师攻敌晋阳，其战略意图是掩护主力，保证其侧翼安全，也是为了牵制敌晋阳守军，使其不能南救上党。此外，利用渭水、黄河通运，保证大军补给。

八月，慕容暐命慕容评率精兵30万援救壶关、晋阳。不久，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③④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王猛攻克壶关，生擒前燕上党太守慕容越，秦军所至，前燕郡县望风而降。杨安攻晋阳，一时未能克。九月，王猛留屯骑校尉苟苌守壶关，亲率大军助杨安会攻晋阳。秦军挖掘地道，秦将张蚝率壮士数百人潜入城中，大呼斩关，引纳秦军入城，王猛、杨安终于攻克晋阳。当时前燕慕容评畏惧王猛，迟疑不进，大军屯于潞川。十月，王猛留将军毛当戍守晋阳，亲率大军进至潞川与慕容评相持。

慕容评以王猛"悬军远入，利在速战，议以持久制之"，坚守不肯出战。评"性贪鄙，鄣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①。王猛见燕军不肯出战，便派将领郭庆率骑兵5000，乘夜从小路偷袭燕军背后，傍山点火，烧其辎重，大火见于邺城之中。慕容暐见火光恐惧，催慕容评出战。慕容评被迫向秦军求战，王猛知慕容评卖水鬻薪，将士没有斗志，决定应战。十月二十三日，王猛集合将士誓师出战，临行慷慨陈辞，激励将士奋勇向前，秦军战士人人奋勇，"破釜弃粮，大呼竞进"②。两军对阵，王猛见燕军人多势众，勉励勇将邓羌说："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③。邓羌请以司隶一职为破敌之赏，王猛因己之权力所限，应以安定太守，万户侯，邓羌不悦而退。及至与燕军接战，邓羌不肯向前。王猛亲至邓羌帐中，许其所请。邓羌随即与张蚝、徐成等将跨马横矛，突入敌阵，"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④。两军战至正午，秦军大败燕军，俘斩5万有余，乘胜追击，又俘斩10万，慕容评单骑逃回。潞川之战遂以秦军大胜而告终。

四、王猛乘胜灭前燕

王猛在潞川大败燕军后，乘胜进军，挥师直逼燕都邺城。在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②③④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指挥大军围攻邺城的同时，王猛上表苻坚报捷。同年十一月，苻坚留大将李威辅太子苻宏镇守长安，以弟苻融镇守洛阳，亲率精锐 10 万赶往邺城相助。

苻坚到达邺城后，与王猛合军一同猛攻邺城，同时派邓羌进攻燕之信都（今河北冀州）。这时，原为慕容评军后继、屯于元城（今河北大名东）沙亭的燕宜都王慕容桓率部逃奔龙城。十一月初七日夜，前燕散骑侍郎徐蔚等人率夫余、高句丽及上党守兵质子 500 人开城迎纳秦军。燕主慕容暐与慕容评、慕容臧等数十骑逃出邺城，意欲北奔龙城。苻坚遣郭庆率军追赶，将慕容暐抓回。慕容评逃奔高句丽，高句丽将其缚送于秦。慕容桓不久被追往龙城的郭庆部将朱嶷擒杀。慕容暐被捉回后，苻坚令其回宫率文武百官出降，慕容暐遵令，前燕灭亡。前燕境内州郡守及 6 夷渠帅尽降于秦，秦共得郡 157、户 246 万，人口 99 万。前秦灭亡前燕后，其势力达到极盛，成为北方的唯一强国，统一北方已是时间问题。

第三节　前秦统一北方

一、兼并仇池杨氏

苻坚灭亡前燕后，为继续实现其统一天下的抱负，开始对当时北方残存的仇池杨氏、代国、前凉等割据政权发动兼并战争，他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仇池杨氏。

杨氏是略阳氐人的一支，世居陇右，为氐族大姓。汉魏之间杨驹统部时始徙居仇池山（以山有仇池得名，又称百倾山，在今甘肃西和南）。杨驹以后，杨氏又有出名酋长杨千万，曾受魏封为百顷氐王。后传至杨飞龙时，势力渐盛，晋武帝以其为征西将军，使还居略阳（治今甘肃天水东北）。杨飞龙无子，以外甥令狐氏为子，名杨戊搜。晋元康六年（296 年），杨戊搜避关中战乱，率部落 4000 家，还保仇池山，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西晋末年大乱

后，杨氏保于仇池，曾先后依附成汉、东晋、后赵。东晋穆帝永和三年（347年），仇池杨初受晋封为使持节、征南将军、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此后，杨氏名义上一直附于东晋。东晋升平四年（360年），仇池杨世统其部。前秦势力兴起时，杨世曾归降苻坚，苻坚以其为平南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但不久杨世又转投东晋。东晋太和五年（370年），杨世死，其子杨纂继其位。杨纂即位后与苻坚彻底决裂，遣使归顺东晋。杨世之弟杨统骁勇得将士之心，起兵武都（今属甘肃），与杨纂争位相攻。

太和六年(371年)三月，苻坚派遣西县侯苻雅、大将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7万，进伐仇池杨氏，并伺机向巴蜀地区扩展势力。四月，苻雅率军进至鹫峡(在仇池山北)，杨纂率兵5万迎击秦军。东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卜靖率千余骑兵援助杨纂。苻雅与杨纂大战于峡谷之中，杨纂大败，将士死者十之三四，郭宝等晋军也被苻雅消灭，杨纂率残众奔回仇池。苻雅乘胜进军，杨统率武都士众投降。这时，仇池将领杨他派其子杨硕暗中归降苻雅，请做秦军的内应夹攻杨纂，杨纂恐惧，自缚出降。苻雅将杨纂送往京师长安。苻坚任命杨统为平远将军、南秦州刺史，又加杨安都督，使其督镇仇池。至此，前秦将仇池杨氏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二、前秦灭代

代国为鲜卑拓跋氏所建。拓跋氏为鲜卑的一支，曹魏时，拓跋力微，统部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有骑射战士20余万，日渐强盛。西晋末年拓跋猗卢统部时，有战士40余万，成为塞上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拓跋猗卢因助晋并州刺史刘琨抗击匈奴刘氏、羯人石氏，受晋封为代公，后进升代王。东晋咸康四年(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他“始置百官，分掌众职”①，代

---

①《魏书》卷一《序纪》。

国始有正式的国家规模，后定盛乐为都。东晋太元元年（376 年），拓跋什翼犍进攻居于塞北的匈奴刘卫辰。刘卫辰迫于代国的压力，向前秦求救，苻坚决定立即出兵趁机灭亡代国。

同年十月，苻坚以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 10 万进讨代国，并使后将军俱难、镇军将军邓羌、尚书赵迁、李柔、前将军朱肜、前禁将军张蚝、右禁将军郭庆等率步骑 20 万东出和龙（今辽宁朝阳）、西出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与苻洛会于代国王庭，对拓跋什翼犍形成三面夹攻的形势。拓跋什翼犍派遣白部、独孤部迎敌，二部大败而回。拓跋什翼犍又遣南部大人刘库仁率骑兵 10 万出战，与秦军大战于盛乐西南的石子岭，代军再次大败。拓跋什翼犍当时身患重病，众臣无人能领兵退敌，遂率国人逃奔阴山之北。代国大败之后，臣附部族高车等尽皆反叛，四处抄掠，代国部众无法畜牧，拓跋什翼犍又北撤至漠南。

在前秦军的打击之下，代国内部生变。当初，拓跋什翼犍曾以国家之半授其弟拓跋孤，拓跋孤死后，其子拓跋斤“失职怀怨，欲伺隙为乱”①。他见代国大败之后，国主拓跋什翼犍又重病在身，便对拓跋什翼犍的庶长子拓跋寔君说：“帝将立慕容后所生（寔君非慕容后所生），而惧汝为变，欲先杀汝，是以倾日以来，诸子戎服，夜持兵仗，绕汝庐舍，伺便将发，吾愍而相告”②。当时秦、代二军相持，代军中夜间警戒颇严，诸皇子亲自持械巡逻。拓跋寔君见到后，认为拓跋斤所言为真，遂起兵杀拓跋什翼犍及诸皇子。拓跋氏诸皇子的妻子及宫人连夜投奔秦军，告知此事。秦将李柔、张蚝率军进逼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拓跋部众离散，国内大乱。秦军攻占云中，生擒拓跋寔君及拓跋斤，后将二人送往长安杀掉，前秦遂灭代国。苻坚为了更好地控制拓跋氏，欲将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迁往长安。代臣燕凤一再劝谏苻坚，他声称代国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匈奴刘卫辰狡猾多变，都不可托以

---

①② 《魏书》卷十五《拓跋寔君传》。

重任，应当分代国部众为二部，令二人分统一部，而其二人素有深仇，都不敢先行生事发难，这是御边的良策。因而应先留拓跋珪于代地，待其成人后立为代主，前秦对代则将有存亡继绝之大德，代人感恩，将永远不会叛秦。苻坚听后以为是，遂分代国部众为东、西二部，令刘库仁、刘卫辰分别统摄，代地也为前秦所控制。

三、降服前凉

张天锡是前凉最后一个君主，东晋兴宁元年（363 年）杀张玄靓自立。张天锡即位时，前凉因长年的王位之争已日渐衰落，而此时的前秦却正处于强盛时期，因而前凉被前秦所降服，乃是大势所趋。

早在东晋太和二年（367 年），前秦主苻坚曾遣王猛率军援助前凉叛将李俨，大破张天锡军，斩获甚众。及至前秦先后攻灭前燕、仇池杨氏后，苻坚为了“以德怀远，且跨威河右”①，便于东晋咸安元年（371 年）将王猛所俘获的前凉将阴据及甲士 5000 人全部送还前凉，并使王猛给张天锡书信，劝他归顺。张天锡畏惧前秦威势，谢罪称臣，归顺前秦，苻坚以他为骠骑大将军、凉州刺史、西平公。同年十二月，苻坚以河州刺史李辩领兴晋太守，还镇枹罕（今甘肃临夏东北），并将凉州治所徙至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以加强对张天锡的控制。张天锡闻之大惧，遂暗中与东晋结盟，相约夹攻前秦。但此后东晋多事，无暇外顾，夹攻前秦之事未能实行。

东晋太元元年（376 年）五月，苻坚派遣武卫将军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苌等率骑兵 13 万，以张天锡“虽称藩受位，然臣道未纯”② 为名，进攻前凉。又以秦州刺史苟

---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元年五月。

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各自率领本州将士为其后继。同时苻坚还命尚书郎阎负、梁殊随军先行，下诏征召张天锡入朝。

七月，阎负、梁殊进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宣苻坚之诏。张天锡杀掉阎、梁二人，遣龙骧将军马建率兵2万迎战。八月，前秦梁熙、王统等军自清石津（黄河渡口，在今甘肃兰州西北）渡过黄河，攻占凉将梁粲镇守的河会城（在湟水入黄河处）；苟苌自石城津（黄河渡口，在今甘肃兰州西北）渡过黄河，与梁熙合军攻占凉缠缩城（约在今甘肃兰州西北一带）。凉将马建恐惧，自杨非（今甘肃永登西）退保清塞（在杨非西北）。于是张天锡又遣征东将军常据率兵3万，与马建合军于洪池岭（在今甘肃武威南）列阵迎击秦军，自己亲率中军3万出屯金昌城（约在今甘肃临夏西北）。苟苌见凉军增兵，命姚苌率甲士3000为前锋，急攻马建、常据。马建自料难以与秦军抗衡，率军万人投降。秦军猛攻常据，凉军大败，常据临阵自杀，苟苌率军进入清塞。张天锡又遣司兵赵充哲率兵5万迎战，再次大败而回。张天锡惊惶失措，奔回姑臧，遣使奉表请降。苟苌进军姑臧，张天锡自缚出降，苟苌将其送往长安，前凉灭亡。

九月，苻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守姑臧，迁徙豪右7000余户于关中，进一步稳定了凉州的局势。至此，苻坚消灭了北方的又一个割据政权。

苻坚在先后灭亡了仇池杨氏、前凉张氏、代国拓跋氏以后，完全统一了北方，成为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强大政权。

第十二章　秦晋淝水之战

第一节　前秦统一北方后的南北形势

一、谢安当政后东晋政局的稳定

谢安是东晋四大高门王、庾、桓、谢中陈郡（治今河南淮阳）谢氏的代表人物，东晋宁康元年（373年）权臣桓温死后，他逐步晋升为中书监、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等职掌朝政。谢安当政前后，史称："强敌寇境，边书续至，梁、益不守，樊、邓陷没"①，正是"疆场多虞"②的多事之秋。谢安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当时东晋内忧外患的政治军事形势有清醒的认识，为了外御强秦，内除奸乱，实行了"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的国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谢安当政后，与王坦之、王彪之合作，坚决抵制桓温欲移晋鼎的野心，使其觊觎皇位的企图未能得逞。同时，谢安与各大族首领推诚相待，大力协调他们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共同维护司马氏皇室的权力，从而保证了江东政局的稳定。桓温经营荆州地区长达29年，掌握晋廷军政大权已11年，因而谢安取得反对其篡位斗争的胜利，是极其艰巨的。谢安联合朝臣对桓氏家族的专权，采取硬顶、软磨、讽谏等策略，最终使桓氏家族严重威胁晋廷的局面彻底消除，在此长过程中，没有使晋廷、谢王与桓氏家族之间的矛盾激化，避免了内战的发生，这些都是谢安所采取

---

①②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的斗争策略的灵活巧妙所收到的成效①。东晋太元二年（377 年）秋，荆州刺史桓豁卒，荆州重镇，兵力“割天下之半”②，谢安此时本有权安插谢氏家族人员或亲信，但他为协调各大族之间的关系，能顾全大局，以桓温弟桓冲领荆州刺史，以冲子嗣为江州刺史，以皇后父王蕴领徐州刺史，以谢玄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使长江中下游的方伯大权，分由桓、谢、王三家大族掌握，使得朝廷与方镇之间，上下团结和睦。

谢安深知治国之本，在于进用贤才，他先后选拔了徐邈、范宁、谢玄、桓伊等一大批文武贤才，在军政方面均起了显著作用。谢安实行节俭治国的方针，改革赋税制度，减低官俸，省烦费，裁冗员，停止一切非军国事要的差役和费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及时组建北府兵团，以内消奸乱，外御强秦。北府兵组建一年半后，即太元四年（379 年）春发生的淮南大战，北府兵以 5 万之众，击败秦军 10 余万，使秦军士气受挫，晋军备受鼓舞。

谢安当政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使东晋朝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史称“君臣辑睦，内外同心”③；“百姓乐业，谷帛殷阜”④，这就为东晋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可靠的前提条件。

二、王猛为前秦设计的治国方略

王猛，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南）人，是当时北方汉族士人中的杰出人才。苻坚即位前就同王猛相识，与之交谈十分投机，即位后便以王猛为中书侍郎，待之甚重，王猛从此成为苻坚的主要

① 参阅朱大渭《论政治家军事家谢安的功业》，载《谢太傅安石纪念论文集》。

② 《晋书》卷七十六《王彪之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七年十月。

④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谋士。

王猛充任前秦谋主期间，尽心辅佐苻坚，苻坚也对他言听计从，君臣二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政治上，王猛以“治乱邦以法”为出发点，雷厉风行地推行法制，打击豪强权贵。他执政“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①。在经济上，实行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针。在统治区内兴修水利，实行区种法，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前秦境内出现了“田畴修辟，帑藏充盈”②的景象。在文化上，实行推崇儒学、广兴学校的方针。苻坚执政之暇，常常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依其优劣定品第。此外，苻坚还实行了禁奢侈、与民休息等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

由于王猛为前秦创设了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治国方略，前秦在数年间便取得了巨大发展，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国力增强。前秦最终能灭亡前燕、仇池杨氏、前凉、代国等割据政权而统一北方，正是建立在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才得以实现的。

东晋宁康三年（375 年），王猛病死。临终，苻坚亲临问候，并问以后事。王猛回答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③。这里，王猛又给前秦设计了以后的治国方略。这一方略的主要内容是：第一，与东晋保持友善的睦邻关系，不要轻易攻晋，以免前秦出现危机。第二，着力稳定自己内部，对当时暂时归顺的鲜卑族、羌族等要留有戒心，并要想办法慢慢解决这些问题，保证国家的安定。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及后来形势的发展，都证明了王猛临终提出的方略是正确的。

王猛提出的治国方略是以当时的历史现实为基础的。首先，关于“不以晋为图”。由于东晋“正朔相承”的地位，以及北方汉人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③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王猛传》。

不肯与东晋为敌的实际情况，前秦只能暂时与东晋修好，着力于巩固内部，只有待内部各种矛盾得以解决，政权彻底稳固以后，才能考虑解决东晋问题。如果贸然攻晋，反而会促成东晋内部团结起来，一致对付以胡人为首的前秦政权。而且北方汉人仍以东晋司马氏为正统所在，不肯与其为敌，因而前秦不可能达到目的。其次，前秦虽然兼并了北方的割据政权，但其统一是纯粹的军事征服，在当时民族矛盾还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一些暂时归附它的少数族尚怀有二心，他们时刻都在谋求脱离前秦而独立发展，因而前秦的统一是很不巩固的。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苻坚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巩固内部，排除异己力量，缓和民族矛盾，待前秦政权真正巩固后，再谋求向外发展。然而，王猛提出的这一正确方略，未能被苻坚采用。王猛死后不久，苻坚就发动了对东晋的进攻，最终导致了前秦政权的覆灭。

第二节　淝水战前双方的战略决策及军事部署

一、襄阳、彭城争夺战

前秦主苻坚在统一北方后，意欲乘其累胜之势一举灭亡东晋，统一全国，遂于东晋太元三年（378 年）调遣大军，向东晋发动进攻。

当年二月，苻坚遣尚书令苻丕率武卫将军苟苌、尚书慕容暐等步骑 7 万进攻晋之襄阳（今湖北襄樊），使荆州刺史杨安率军为前锋；同时使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 1 万出鲁阳关（在今河南鲁山西南），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率众 5 万出南乡（今湖北丹江口东南），领军将军苟池等与强弩将军王显率劲卒 4 万出武当（今湖北丹江口西北），与苻丕会攻襄阳。

四月，前秦各路大军抵达沔水（今陕西、湖北之汉江）以北。东晋襄阳守将梁州刺史朱序认为前秦军没有舟船无法渡过沔水，

不以为备。前秦石越军浮乘战马渡过沔水，逼近襄阳。朱序猝然无备，全力固守中城（内城），石越军乘机攻陷襄阳外城，缴获船只百余艘供北岸秦军渡河。前秦大军渡过沔水后，苻丕亲督诸军围攻襄阳。东晋荆州刺史桓冲时镇上明（今湖北松滋东北），拥众7万，因惧秦军势大，不敢北上救援，仅遥相声援而已。当秦军进逼襄阳之时，朱序之母韩氏亲自登城巡视，认为城西北角将会被敌攻破，于是亲领百余名婢女及城中妇女在西北角内斜筑城墙20余丈。及至秦军围攻襄阳，果然在西北角攻入，众将士退至新城固守。前秦大军急攻襄阳未能克，苟苌劝苻丕说："吾众十倍于敌，糗粮山积，但稍迁汉、沔之民于许、洛，塞其运道，绝其援兵，譬如网中之禽，何患不获，而多杀将士，急求成功哉！"① 苻丕以为是，遂停止对襄阳的急攻。与此同时，慕容垂军攻克晋南阳（今属河南），生擒晋南阳太守郑裔，进至襄阳与苻丕会师。

七月，前秦兖州刺史彭超上疏苻坚，请求率兵攻打仅率数千将士戍守彭城（今江苏徐州）的晋沛郡太守戴逯，并请苻坚再派"重将讨淮南诸城"②，以对东晋形成东西夹攻之势。苻坚从之，令彭超进攻彭城，又遣后将军俱难率右将军毛当、右禁将军毛盛、陵江将军邵保等步骑7万进攻晋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八月，彭超向彭城发动进攻。晋廷遣右将军毛武生率军5万出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与秦军相持于淮南一线。同时，秦梁州刺史韦钟进军魏兴（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围攻晋魏兴太守吉挹。

苻丕围困襄阳至十二月，城未能攻下。前秦御史中丞李柔弹劾苻丕师老无功，请征召其回京师问罪。苻坚不许，认为苻丕虽师出多日无功，但不宜半途而返，应使其将功赎罪，遂遣黄门郎韦华持节至襄阳，催促苻丕进军破城。苻坚赐苻丕剑说："来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复持面见吾也"③。东晋太元四年（379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四《晋纪二十六》孝武帝太元三年二月。

②③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年）正月，苻丕接到苻坚诏书，恐惧万分，连忙命诸军急攻襄阳中城。与此同时，晋廷遣冠军将军、南郡相刘波率军8000援救襄阳，刘波畏惧秦军，迟疑不敢进。朱序守城期间，常伺隙出战，屡破前秦军，渐生麻痹之心，守备松懈。二月，晋襄阳督护李伯护暗中与前秦联系，愿作内应助秦军破城。苻丕与李伯护约期进兵，遂破襄阳，生俘朱序送往长安。苻坚以朱序能忠心守臣节，任为度支尚书，以李伯护不忠故主，将其杀掉。至此，秦晋襄阳争夺战以前秦胜利而告终，苻坚以中垒将军梁成为荆州刺史，配兵1万，镇守襄阳。四月，韦钟攻占魏兴。

当秦兖州刺史彭超向彭城发动进攻之时，秦俱难等军也向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发动进攻。到太元四年二月，晋兖州刺史谢玄率东莞太守高衡、后军将军何谦等军万余人往救彭城，进至泗口（古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淮阴西南）。彭超进围彭城之时，将辎重留于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谢玄为调动秦军以救出彭城被困晋军，便声称将遣何谦等人进攻留城。彭超闻之，回军保护辎重。何谦等军急驰彭城，救出晋沛郡太守戴逯及其所率将士，放弃彭城南撤，秦军遂占彭城。彭超进占彭城后，留治中徐褒守城，南进攻晋盱眙。与此同时，俱难攻陷淮阴，留邵保守城，与彭超会师南进。四月，秦将毛当、王显率军2万自襄阳东进，会同彭超、俱难共向淮南进军。五月，秦军攻占盱眙，生擒晋高密内史毛璪之，随即以6万大军进围三阿（今江苏扬州西北）的晋幽州刺史田洛军，秦军前锋距广陵不足百里。东晋京师建康震动，沿江列守。晋廷遣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进驻涂中（今安徽、江苏滁河流域），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司马昙等率军4万屯于堂邑（今江苏六合北），以备不虞。晋廷命谢玄自广陵往救三阿。谢玄率军西进，俱难遣都颜率骑兵迎击谢玄，谢玄将何谦阵斩都颜，大败其军。俱难、彭超整军来战，又被谢玄击败，退保盱眙。六月，谢玄与田洛合军5万进攻盱眙，秦军再败，退屯淮阴。谢玄遣何谦等人率舟师乘潮而上，焚烧秦军所架的淮桥，再次大败秦军，阵斩秦将邵保，俱难、彭超退至淮北。谢玄挥军乘胜追击，在君山

（今盱眙北 6 里）大破秦军，俱难、彭超仅以身免，狼狈北逃，秦军退至彭城。晋军夺回淮阴等军事要地后，稳定了淮水地区的局势。谢玄大捷之后，主动撤回广陵。于是，苻坚以毛当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以王显为扬州刺史，镇下邳。至此，秦晋淮南争夺战遂告结束。

如果说前秦在江汉地区的襄阳争夺战取得了胜利的话，那么前秦在淮水以南的争夺战，实际上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秦军虽然占据了军事要地彭城，为将来的南进创造了条件，但战争后期连遭败绩，损失大量精兵，邵保、都颜等将领战死，彭超、俱难逃回后，被苻坚问罪，结果彭超自杀，俱难被免为庶人。淮南之战，东晋北府兵初露锋芒，以 5 万之众大败前秦 10 余万大军，且屡战屡胜，使前秦军士气受挫，相反使晋军士气大振，因而这次战役可以看作是淝水之战的前奏。

二、前秦的战争准备及战略进攻计划

苻坚素有统一天下之志，实际上其对晋战争准备，自消灭前燕后即已开始。除相继攻灭仇池杨氏、前凉张氏、代国拓跋氏外，他还于东晋宁康元年（373 年）派遣益州刺史王统、前禁将军毛当等率大军从东晋手中夺取了汉中（治今陕西汉中东）及蜀地，形成从长江上游顺流而下威胁东晋的有利局面。攻克东晋襄阳、彭城两大军事要地以后，苻坚又在次年内平息了幽州刺史苻洛的叛乱。在稳定了内部以后，苻坚开始全力进行对东晋的战前准备。

东晋太元七年（382 年）四月，苻坚改任其弟车骑大将军苻融为征南大将军，为将来的对晋战争预作准备。同年八月，苻坚又以堂侄苻朗为都督青、徐、兖 3 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同时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梓潼 2 郡太守，并密授机宜，命其于蜀地备办舟师，准备顺流东下进攻东晋。

同年十月，苻坚集群臣商议伐晋之事，他自己主张立刻出兵伐晋，并认为前秦有精兵97万，定可一战灭亡东晋。前秦诸臣中除少数人附和苻坚同意伐晋外，绝大多数人反对伐晋。尚书左仆射权翼、太子左卫率石越等人认为，东晋朝廷上下同心，政治清明，又倚有长江之险，非可图之国，应该养兵积谷，静待时机。朝议久议不决而罢。苻坚又私下与苻融商议此事，苻融也认为东晋君主休明，朝臣用命，而前秦军"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①，不可伐晋。苻坚听后大怒，认为我"有众百万，资仗如山"②，伐晋是"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③，坚持伐晋。苻融流着泪劝苻坚说："吴（指东晋）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指王猛）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④。苻融在这里，用鲜卑、羌、羯等族将会有异志，以及不惜用王猛遗言来劝谏苻坚，苻坚仍一无所纳。苻融的话是有根据的，鲜卑慕容垂和羌人姚苌都别有用心地劝苻坚进兵伐晋，目的是给自己谋求发展创造机会。后苻坚宠信的高僧道安，太子苻宏等人都劝谏苻坚不要轻易进兵伐晋，苻坚不听，一意孤行，决定大举攻晋。

次年七月，苻坚下诏伐晋，命令百姓每十丁出一人充兵，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艺骁勇者，富豪人家有才干的，都拜为羽林郎，又下令各州郡的全部公私马匹充军用。苻坚征集戎卒60余万，骑兵27万，号称百万大军，向东晋发起总攻击。八月，苻坚部署诸军，分路南进：以苻融督率秦将张蚝、苻方、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等步骑25万为前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幽、冀2州之兵自彭城南下，为东路军；苻坚亲率主力为中路，自长安经项城（今河南沈丘）继苻融之后进趋寿阳；龙骧将军姚苌督率梁、益2州军队为西路军，自蜀地沿长江而下。苻坚的战略部署是分东、

---

①②③④《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中、西3路进攻，而以江淮方面的中路军为其主攻方向，配备强大兵力，秦军一旦在淮南战场上取得胜利，全歼晋军主力后，将会达到3路齐进，会攻东晋京师建康的战略目的。

三、东晋的战略防御决策及部署

东晋面对前秦军队的汹汹来势，定下了分为淮南和荆州两个方面抵抗秦军的防御决策，而根据前秦中路配以重兵的特点，又以淮南为防御的重点。

同年九月，晋廷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讨大都督；徐、兖2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率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北府骁将刘牢之等8万余人赶赴淮南，沿淮水一线抵御秦军；又遣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5000自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沿淮河西进，增援寿阳。执政的中书监、录尚书事、都督扬、豫、徐、兖、青5州诸军事谢安镇建康，居中调度。淮南是东晋京师北面屏障，只有保住淮南，东晋才能依托长江天险抵御强大的敌人。谢玄所统北府兵8万是东晋主力，其主要任务是阻止前秦前锋部队向淮南推进。

荆州方面，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桓冲一直采取的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① 的防御方针，即全力扼守长江南岸，阻止秦军顺流而下，同时在江北牵制秦军。为此，他将荆州州治迁往江南的上明（今湖北松滋西）。淝水战前，桓冲在荆州方面的兵力部署是，以冠军将军桓石虔镇南平（治今湖北公安东南），冠军将军刘波镇江陵，襄城太守桓石民镇夏口（今湖北武汉），自己镇上明居中调度。太元八年五月，桓冲在秦军未进攻之前，曾亲率大军攻秦之襄阳，同时命刘波进攻沔水北诸城，又命别将攻敌筑阳（今湖北谷城北）等地，但均因在前秦军队南下救助的形势下无功而返。前

① 《晋书》卷七十四《桓彝传附桓冲传》。

秦准备3路大军进攻时，桓冲有水陆军10万，防守以荆州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这对于保证京师建康上游的安全，乃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节　淝水之战的序战——洛涧之战

（参见附图6）

一、战争经过

东晋太元八年（383年）九月，苻坚自率中路大军抵达项城（今河南沈丘），苻融所率前锋进至颍口（颍水入淮之处，在今安徽颍上东），遂向寿阳（今安徽寿县）发动进攻。十月十八日，苻融攻占寿阳，俘东晋守将平虏将军徐元喜。寿阳是淮水两岸的水陆交通枢纽，北控汝（今汝河）、颍（今颍河）、淮诸水道，南扼经淝水（淮河支流，经寿阳东南流向）、巢湖而通长江的水路。秦军控制寿阳，北可沟通北方，南可经水路直逼历阳（今安徽和县），威胁建康（今江苏南京），东可入淮河而达广陵（今江苏扬州），从江北直接威胁建康，因而寿阳是南北必争的战略要地。苻融攻下寿阳后，任命其参军郭褒为淮南太守，并立即派遣前卫将军梁成率王显等将领共5万人进据洛涧（即今安徽淮南、长丰东之高塘湖），并在洛口（洛涧入淮之口）设木栅横截淮水，阻止晋军西救寿阳。东晋派去增援寿阳的胡彬于途中闻知寿阳失守，便不再前进，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西南，在寿阳西北的淮水北岸）。苻融分军围攻硖石。

在苻融攻占寿阳的同时，秦前锋军慕容垂等在江汉地区也获得进展，攻占东晋郧城（今湖北安陆）。

东晋主将谢石、谢玄率桓伊、谢琰、刘牢之等水陆8万进至洛涧以东25里处，闻知梁成已据洛涧，遂止军不进，准备迎击秦军。

胡彬被困硖石，军粮将尽，遣使向谢石求援，称："今贼盛粮尽，恐不见大军"①。不想秘信被秦军截获，苻融见信后立即派人告诉苻坚说："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掎禽贼帅"②。苻坚得报大喜，遂留大军于项城，亲率轻骑 8000 驰赴寿阳。同时，苻坚命东晋降将朱序去晋营招降谢石，意欲不战而胜。朱序本是被迫降秦，他到晋营后反而为谢石献计说："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已夺气，可遂破也"③。谢石闻知苻坚亲至寿阳，心中恐惧，想不战而使前秦师老兵疲。谢琰力劝谢石采纳朱序的建议，谢石从之，决定乘秦军全部未集之机，消灭其前锋。

十一月，谢玄依计派遣北府勇将广陵相刘牢之率精锐 5000 出击。刘牢之率军西进，到距洛涧 10 里时，出奇兵乘夜强渡洛涧，挥军奋勇冲杀，梁成猝不及防，秦军大乱，晋军临阵斩梁成及其弟梁云，大败秦军。刘牢之随之分兵占据要津渡口，断绝敌之退路。秦军步骑溃乱，争赴淮水，被杀被俘者 1.5 万人，军械辎重尽被晋军缴获，前秦将梁他、梁悌等人被晋军俘虏。洛涧之战遂以东晋大胜而告终。洛涧之战，晋军以 5000 人击败了 10 倍于己的强大敌人，并缴获了大量军械，是一次关键性的重大胜利。洛涧之胜，极大地鼓舞了晋军将士的士气，坚定了谢石等统帅的破敌信心，为后来的淝水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前秦则因此役丧失了沿淮水对晋军实行封锁的有利局面，梁成军几乎全军覆灭，挫伤了军队的士气，对后来的决战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二、双方作战指导的得失

在洛涧之战中苻融作为秦军前锋主帅，在攻占淮南重镇寿阳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五《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十月。

后立即派兵东据洛涧，封锁淮水，既确保寿阳，又阻止晋军主力前进，显然是正确的措施。但他派军围攻困守硖石的胡彬晋军，甚至后来将其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却是一个作战上的失误。因为胡彬不过 5000 人固守孤城，不会对秦军造成真正威胁，而秦军的战略目标是消灭晋军主力。苻融如果在梁成东进后，自率大军继进，便会给晋军造成更大压力，使其无机可乘，同时在梁成军失败时也可及时援助。但苻融先是坐镇寿阳，没有积极进取的意图，后又把注意力放在胡彬偏师方面，在作战指导上犯了胸无全局、缺乏战略眼光的错误。苻坚亲至寿阳后，也没有从战争全局周密部署，而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意欲不战而胜，派遣朱序劝降，反而将己方的弱点暴露给对方，这是前秦方面更大的失误。此外，苻坚和苻融对于秦晋两军对阵时的作战谋略，显然没有明确的全盘筹划，当先锋部队梁成遭到反击及失败时，始终未见秦军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一方面，是晋军突然反击出其不意的效果，另一方面，说明秦军在用兵上缺乏灵活机动的应变能力。

从东晋方面看，当前秦大军来势凶猛，直趋洛涧时，东晋以微弱兵力，只能坚守以待时机，谢石等人于洛涧以东 25 里立营坚守，后发制人，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当前秦梁成孤军突出，使秦军苻融主力与梁成前锋脱节，并经东晋旧将朱序献上破敌之计后，谢石、谢玄等人当机立断，立刻调整作战方针，抓住敌人破绽，派奇兵乘夜袭击洛涧，收到了攻敌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东晋北府兵洛涧作战首战告捷，为淝水之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第四节　淝水决战

一、谢玄诱敌　苻坚中计

东晋太元八年(383 年)十一月，晋军取得洛涧之战的胜利后，谢石、谢玄等率军水陆并进，直逼淝水东岸，军容甚整。苻坚登

寿阳城瞭望，见晋军部伍严整、将士士气高昂，见附近的八公山（在今安徽寿县东北2.5千米处）上草木摇动，皆以为是晋军，回头对苻融说："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① 这时苻坚心中始产生畏惧之情。

谢石率军逼近淝水，秦军骠骑张蚝渡过淝水迎战，小败晋军。于是谢玄、谢琰率精兵数万，严阵以待，张蚝退过淝水，临淝水列阵。秦晋两军夹淝水布阵，大战一触即发。

秦军沿淝水列守，晋军无法渡河，而双方力量对比的众寡悬殊，又不允许晋军旷日持久地与前秦进行消耗战。谢玄决定利用苻坚求胜心切，以计调动敌军后退，寻找战机，发动突然袭击，一举击溃秦军。于是谢玄遣使向苻融说："君悬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②" 秦军诸将对谢玄的诱敌之法，都认为"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③。但苻坚及苻融却不愿以数十万大军居于"不欲战"的被动地位，决定同意退后一步使晋军渡河，以便将计就计，"使之（晋军）半渡，我以铁骑蹙而杀之，蔑（无）不胜矣！"④但后来事实证明，这只是苻坚不切实际的一种幻想。

二、秦军大溃　草木皆兵

苻坚接受谢玄的请求后，下令沿淝水列阵的秦军稍向后退。但秦军一退，阵势大乱，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立即率精兵乘势渡河，猛攻秦军。朱序见秦军阵势混乱，在阵后高声大呼："秦兵败矣！"⑤秦军将士信以为真，四散奔逃，更加失去控制。苻融骑马略阵，想制止军队溃散，战马跌倒，被晋军杀死。秦军大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③④⑤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五《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十一月。

败，自相践踏而死者，蔽野塞川。逃出战场的秦军惊慌失措，闻听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军杀到，昼夜不敢歇息，一路风餐露宿，加以饥饿困冻，死者十之七八。苻坚身中流矢，单骑逃回淮北。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直至青冈（在今安徽寿县西北）。接着，晋军收复寿阳，俘获苻坚所用云母车、仪服、器械、军资、珍宝等堆积如山，获牛马驴骡骆驼十万余头。至此，历时 4 个月的淝水之战，以东晋的胜利而告结束。

第五节　淝水之战晋胜秦败的原因及其后果

一、晋胜秦败的主要原因

淝水之战，前秦拥有四倍于敌（仅指前线参战兵力）的大军，是主动进攻的一方；东晋兵力远比敌人弱小，本来属于防御的一方。战争最后的结果却是处于劣势的东晋一方取得了胜利，这种结局出现是由许多主客观因素促成的。

前秦方面的失败是战略上骄傲轻敌，以及作战指导上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

淝水之战前，前秦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成功地统一了广大北方地区。苻坚被这些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心要乘所谓“累捷之威”和“有众百万，资仗如山”的军事优势，一举消灭东晋，实现他“混一六合，以济苍生”① 的统一大志。他认为东晋不过是“垂亡之寇”②，不堪一击，甚至在战前就宣称，克捷之日，任命晋孝武帝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在京师长安为其预修宅第以待之。然而苻坚这些美好的愿望，都是建立在对主客观形势的错误估计之上的。从前秦内部说，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虽然苻坚凭借军事征服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其统治区内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各少数族贵族虽然慑于前秦的军事压力暂时归附，但他们都在寻找机会脱离前秦控制，而谋求独立发展。另一方面，前秦虽然在军事上多次战胜敌人，但正是这种“累捷之威”，使前秦最高统治者产生骄傲轻敌的思想，而其部众又存在着“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①的致命弱点。从东晋方面说，当时名相谢安在位，“君臣和睦，上下同心”②，正是东晋朝政治稳定的时期。东晋北府兵多为北方流民集团组成，他们面对前秦的入侵，必然因国破家亡，同仇敌忾，士气高涨，从而战斗力很强。此外，东晋被北方汉人视为正统所在，前秦汉人将士不愿与东晋作战，其士气和战斗力必然低落。但苻坚由于屡胜而骄，麻痹轻敌，不能清醒地认识主客观的实际情况，并听不进臣下的正确意见，贸然对晋用兵，终于导致了失败。

同时，前秦在战略指挥上，也犯有严重失误。其一，在战争之初，已占领了蜀地、襄阳、彭城等军事要地，苻坚的计划是分东、中、西 3 路齐进，突破长江，会攻东晋京师建康。但当晋军北上阻击中路军时，苻坚求胜心切，过早地同晋军在淝水决战，因而淝水之战实际投入的军队只是中路军，没有充分利用 3 路进军的优势；其二，苻融所统领的前锋 27 万人，兵力配备前后脱节，而且兵力分散，缺乏互相配合接应，直接导致了洛涧之战梁成 5 万大军的被歼；其三，当两军严阵以待时，苻坚中谢玄之计，令秦军后撤，这是作战指挥上的最大失策，使秦军由后撤而奔逃溃散；其四，苻坚决定在淝水同晋军决战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而对整个战争的谋略，以及战略战术的部署，均没有周密的安排，所以战争的结局必然是失败。

东晋在淝水之战中的胜利，同样是由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从主观上说，淝水之战前谢安实行镇之以静的政策，成功地协调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加上当时南北方民族矛盾的尖锐，广大南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方人民在大敌当前拥护汉族政权，并积极支持和参与抵御前秦进攻的斗争，是东晋取胜的最重要条件。其次，谢安执政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使东晋政权“财丰国富”①，这在人力物力上保证了晋军反击前秦进攻的胜利。东晋在军事上经过多年的经营，谢玄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组成了号称百战百胜的北府兵。北府兵的来源大都为北来侨民，他们对北方少数族贵族统治怀有切齿之根，因而北府将士士气高昂，作战勇敢，成为淝水之战东晋取胜在军事上的保证。而前秦方面，主骄兵疲，临战无周密谋略，战略指挥又失误，其领导集团对伐晋意见不一，少数民族将领希望前秦失败自谋发展，这些为东晋取胜提供了客观条件。同时，东晋谢安、谢玄在战略指挥上善于利用己方之长，击敌之短，面对前秦的强大压力沉着镇静，采取了确保淮南、依托长江天险的方针，以保证京师建康的安全；以荆州重兵巩固长江中游的防卫，控制江汉地区，以保证长江下游江淮地区的西侧不受威胁，使北府兵全力对付前秦前锋部队。谢石、谢玄临战指挥上，先是采取守势，观敌动静，在朱序报告敌情，发现敌之弱点后，立即调整战略方针，改防守为进攻，并出奇兵发动突然袭击，取得了洛涧初战的胜利。在淝水决战时，谢玄又行诱兵之计，捕获战机，使秦军自乱阵脚，而后晋军发动猛攻，这些表现了晋军统帅随机应变，出奇制胜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取得了淝水之战的彻底胜利。

二、淝水之战的后果

淝水之战后，晋军乘胜反攻。太元九年（384年）正月，北府名将刘牢之攻克前秦占领的谯城（今安徽亳州），荆州刺史桓冲派遣上庸太守郭宝攻占前秦魏兴（治今陕西安康西）、上庸（治今湖

---

① 《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北竹山西)、新城(治今湖北房县)3郡。不久，晋军又攻占襄阳、鲁阳(治今河南鲁山)。与此同时，晋梁州刺史杨亮率军5万进攻蜀地。次年2月，蜀郡太守任权攻克成都，斩秦益州刺史李平，蜀地重新归晋。江淮方面刘牢之自攻占谯城后，于当年九月再占鄄城(今属山东)。此前，谢玄于八月攻克彭城。黄河以南诸城的前秦守军，望风而降，东晋淝水战前丢失的地区全部收复，而且晋军还乘机向北扩展。

苻坚带伤逃回淮北后，所统军队大都溃散，只有慕容垂所领3万余人全师而退，苻坚在其护送下到达洛阳。太元八年(383年)年底，苻坚回到长安。淝水之败造成了前秦政权的总崩溃，各少数族贵族集团纷纷拥众起事，先是慕容垂设法离开苻坚，在今河北一带取得发展，建立起后燕政权。接着，另一鲜卑贵族慕容泓聚集鲜卑部众起事，连败秦军，后其弟慕容冲代领部众围攻长安，这一股势力后来建立了西燕政权。羌人贵族姚苌则乘苻坚派他镇压慕容泓之机，在渭北地区称秦王，后攻占长安，在关中地区建立起后秦政权。太元十年(385年)五月，苻坚在慕容冲的重兵围攻下带妻儿逃出长安。七月，苻坚在五将山(今陕西岐山西北)被姚苌抓住杀掉，妻子儿女自杀。苻坚留守长安的太子苻宏逃往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后投奔东晋。苻宏逃走以后，苻坚的庶长子苻丕、族孙苻登等相继称帝，使前秦政权又维持了近10年。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苻登子苻崇被西秦乞伏乾归杀掉，前秦灭亡。前秦淝水战败后，北方再度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除上述政权外，这一时期的割据政权还有关东地区(古称函谷关以东地区为关东，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的南燕、北燕、北魏，关中地区(古称函谷关以西地区为关中)的大夏，河西走廊地区的西秦、后凉、北凉、南凉、西凉等。

第十三章　后燕北魏的参合陂之战

第一节　北魏的复国和后燕的建立

一、拓跋氏复国及开拓疆土

代国被前秦消灭后，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先流寓于鲜卑部落联盟中的独孤部，后又转至贺兰部。前秦淝水之战失败后，拓跋珪纠合旧部，于登国元年（386年）正月，在牛川（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恢复代国。同年四月，拓跋珪改称魏王，史称北魏。

拓跋珪建立北魏后，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为其政治中心，开始向四周开拓疆土，发展自己的势力。苻坚灭代国后，曾分代国部落为东西两部，以别部大人刘库仁和刘卫辰统领。因此拓跋珪复国后，首先要消灭这两股势力，以便恢复对原部落联盟的统治权。登国二年（387年）五月，拓跋珪求得后燕慕容垂的帮助，进攻继领东部的刘库仁之子刘显，在马邑（今山西朔州）大破其军，刘显南投西燕慕容永，拓跋珪尽收其部落。登国六年（391年），拓跋珪进军讨伐西部大人刘卫辰。同年十一月，拓跋珪先以五、六千人利用车阵大破前来进犯的刘卫辰子刘直力鞮八、九万人，随即进兵攻入刘卫辰部落驻地，刘卫辰父子逃跑，拓跋珪分遣诸将以轻骑追击。结果刘卫辰被部下杀死，刘直力鞮被北魏将军伊谓活捉，刘卫辰少子刘屈丐逃奔薛干部。拓跋珪尽收其部落。获名马30余万匹，牛羊400余万头。至此，拓跋珪恢复了对早先拓跋部落联盟的统治权。

在消灭刘显与刘卫辰的同时，拓跋珪又先后向当时北方的游

牧民族柔然、高车、库莫奚等部发动进攻，数次击败其部落，多次俘获牲畜10余万，并兼并其部众，其势力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当时北疆的唯一强国。

二、后燕的建国

淝水之战后，鲜卑贵族慕容垂全军而退，护送苻坚西还长安。军至渑池（今河南渑池西），慕容垂请求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去祭扫陵墓，并安抚河北各夷族，以张扬国威。慕容垂此举的真实意图，是想寻机脱离苻坚的控制，在广阔的中原地区去谋求独立发展，争取恢复鲜卑慕容氏的政权。苻坚对此毫无察觉，不仅批准其请，而且遣其将李蛮、闵亮、尹图等率兵3000相送。

当时苻坚之子苻丕镇守邺城。慕容垂至邺城后，正好赶上丁零人翟斌聚众起事，攻打洛阳。于是苻丕给慕容垂配兵2000，使其攻打丁零翟斌，并遣其将苻飞龙率氐人骑兵1000为其副手。慕容垂领命而行，到河内（治今河南武陟西南）便杀掉苻飞龙及氐兵，并招募勇士，聚集起一支3万人的军队，开始其“外假秦声，内规兴复”① 的事业。翟斌闻知慕容垂起兵，奉慕容垂为盟主，并率众与慕容垂会师。慕容垂率兵进至洛阳，前秦守将苻晖闭门拒守。慕容垂于是与众将商议行止说：“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以制天下”②。众将皆以为是，慕容垂遂率师东进。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正月，慕容垂军至荥阳（今河南荥阳西南），这时他已有军队20余万，便打出自己旗号，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随后，慕容垂率军北渡黄河，向邺城进军。正月二十六日，慕容垂军至邺城，向邺城发起攻击。二十八日，慕容垂军攻占外城，苻丕退守内城，于是中原各州郡县纷纷归附慕容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三《慕容垂载记》。

垂。二月，慕容垂攻邺城一时不能克，便分遣老弱至肥乡（今属河北）筑新兴城以置辎重，又截漳水灌邺城。

这时翟斌想求得尚书令一职，慕容垂不肯答允。于是翟斌与苻丕暗中联络，准备里应外合对付慕容垂。事泄，慕容垂杀翟斌。翟斌侄儿翟真率其部众北往邯郸（今属河北），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进兵击破其军。同年八月，翟真自邯郸北逃，慕容垂遣太原王慕容楷率军追击，翟真大败慕容楷军，北屯中山（治今河北定州）。慕容垂认为丁零是心腹大患，苻丕邺城又一时难以攻破，遂移师新城（指前所修新兴城），防备丁零。于是慕容垂遣其子慕容农进兵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北）、平原（今山东平原南）一带，征督租赋，并相机进攻丁零。同年十一月，慕容农自信都（今河北冀州）西进，大破翟真从兄翟辽，翟辽退无极（今河北无极西），农再破其军，翟辽单骑逃奔翟真。东晋太元十年（385 年）二月，慕容农进兵中山击破翟真，翟真固营坚守。当慕容垂移营新城时，苻丕并未退走，反而遣使向东晋求救。慕容垂回军再围邺城。太元十年四月，东晋刘牢之军以救苻丕为名，进至邺城，慕容垂接战大败，撤围返回新城。刘牢之贪功冒进，疾进 200 里追击慕容垂。晋军至五桥泽（今河北临漳北）遭慕容垂伏击，大败，刘牢之单骑逃走，得苻丕接应，才幸免于难。由于当时“燕、秦相持经年，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①。苻丕放弃邺城，南徙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就晋谷”②，晋军暂时控制邺城。

东晋太元十年四月，慕容垂北进中山，准备以中山为都。翟真闻慕容垂北来，迁营于行唐（今河北行唐北）。翟真司马鲜于乞起兵杀翟真，尽诛翟氏，自立为赵王。不久丁零部众攻杀鲜于乞，立翟真从弟翟成为主，翟辽逃奔黎阳（今河南浚县东）。慕容垂军至中山，翟成长史鲜于得杀翟成投降。慕容垂进入行唐，将翟成余众全部杀掉。至此，丁零势力被慕容垂消灭。同年八月，苻丕自邺城率部众西奔晋阳（今山西太原），慕容垂占据邺城。于是整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六《晋纪》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

个河北地区被慕容垂势力所控制。

太元十一年（386年）正月，慕容垂在中山即帝位，都中山、国号燕，史称后燕。后燕强盛时，占有今山东、河北及河南、山西大部的广大地区，是当时中原地区最强大的一个国家。

第二节　参合陂之战双方的战略目标

一、慕容垂与拓跋珪的反目为仇

拓跋珪在塞北崛起的时候，后燕也正处于强盛期，两国之间势不可免地要出现矛盾。

由于拓跋氏与慕容氏世为婚姻，北魏与后燕本来关系甚好，拓跋珪在攻灭刘显、刘卫辰及开拓疆土的战争中，曾屡次得到后燕的帮助。但拓跋珪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慕容垂的猜忌，而拓跋珪雄心勃勃，也意欲吞并后燕，使魏国成为北方的强大国家。在这种形势下两者之间的战争是必不可免的。

北魏登国三年（388年）八月，拓跋珪暗有谋后燕之心，遣九原公拓跋仪出使后燕观察动静。拓跋仪回来告诉拓跋珪说："垂死乃可图，今则未可"①。拓跋珪问其缘故，拓跋仪说："垂年已暮，其子宝弱而无威，谋不能决。慕容德（慕容垂之弟）自负才气，非弱主之臣。衅将内起，是可计之"②。拓跋珪深以为是。登国五年（390年），北魏与后燕合军大破贺兰、纥突邻、纥奚等部落，拓跋珪遣秦王拓跋觚报使于燕。至次年，后燕扣留拓跋觚不许归，要求北魏贡献良马。拓跋珪闻之大怒，遂与后燕绝交，转与西燕慕容永通好。

北魏登国八年（393年），后燕慕容垂发大军进攻西燕，一路进展顺利。西燕主慕容永向北魏求救，拓跋珪既已与后燕绝交，遂

①② 《魏书》卷十五《秦明王拓跋翰传附子拓跋仪传》。

从其请，遣陈留公拓跋虔、将军庾岳率骑兵5万东渡黄河救西燕。以后西燕为后燕所灭，北魏和后燕之间嫌怨更深，终成仇敌。

二、后燕的谋略与进兵计划

登国九年（394年），后燕灭西燕后，转过头来全力对付北魏。登国十年（395年）四月，拓跋珪率军侵逼依附后燕的诸少数族部落，后燕主慕容垂决定即刻进兵伐魏。同年五月，慕容垂遣其子慕容宝、辽西王慕容农、赵王慕容麟等率军8万自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进兵北上，又以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率步骑1.8万为其后继。后燕的用兵谋略是想集中强大兵力，一举灭亡当时国力还不强大的北魏，以便消除后患。在慕容垂看来，北魏虽有很大发展，但还不是自己的对手，由于他已年老体衰，想乘自己在世时解决北魏问题。然而慕容垂犯了轻敌的错误，他所任命的主帅慕容宝"弱而无威，谋不能决"。而对手拓跋珪足智多谋，善于用兵，远非慕容宝所能敌。因而后燕散骑常侍高湖曾劝谏慕容垂不要仓猝进兵，但慕容垂未能采纳，终于导致失败。

三、拓跋珪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

北魏闻知后燕大军来攻，拓跋珪君臣商议对策，左长史张衮献计说："燕狃于滑台、长子之捷（灭西燕之役），竭国之资力而来，有轻我之心，宜羸形以骄之，乃可克也"①。拓跋珪从其计，决定采取避敌锋锐，以骄其心，然后伺机反击以消灭敌军的策略。登国十年七月，拓跋珪将部落人口牲畜全部迁徙于黄河以西千余里之外，以避慕容宝大军。同时派人向后秦姚兴请求救兵，并选拔精锐士卒，准备时机到来反击燕军。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八《晋纪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七月。

第三节 魏军千里奇袭的参合陂之战

一、后燕盲目进军师老而返

后燕慕容宝自北魏登国十年（395 年）五月率军北进后，七月到达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这时北魏已将部落牲畜远徙黄河以西千里之外，燕军收降北魏别部部落 3 万余家，收穄（穈）田百余万斛，随后进军临河，造船准备渡黄河进攻魏军。九月，慕容宝修造舟船完毕，但在率军将渡之时，暴风骤起，将其渡船数十艘刮往黄河南岸。这时拓跋珪已经开始筹划反击燕军，率军返回逼近黄河。当时魏军俘获后燕甲士 300 余人，拓跋珪将其全部放回，以收买人心。

当慕容宝自中山（今河北定州）进军时，慕容垂已身患疾病，等他军至五原后，数月不知慕容垂的消息。拓跋珪派人伏于中山至五原的道路之上，凡有后燕通信使者，便抓捕起来，然后命令这些使者临河对燕军叫喊："若（你）父已死，何不早归"①，以动摇后燕军心。慕容宝等人闻听后，果然心情忧恐，全军将士人心浮动。到同年十月，燕军已北征近半年，师老兵疲一无所获，又听说慕容垂已经病死，只好退军。十月二十五日，慕容宝命令烧掉船只，乘夜撤军。由于当时河水尚未封冻，慕容宝认为魏军无法渡河，便不派斥候，仓惶回军。

二、拓跋珪千里奇袭一战成功

拓跋珪在后燕大军进攻时，将部落牲畜远徙黄河以西千余里之处，自己在黄河以南地区训练军队，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出击，一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八《晋纪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八月。

举消灭敌军。登国十年九月，拓跋珪亲率大军逼近黄河，“连旌沿河东西千里有余”①。当拓跋珪诡称慕容垂已死，燕军军心动摇仓惶还师时，拓跋珪立即调遣诸将分头进军，准备向燕军展开猛烈反击。

拓跋珪遣陈留公拓跋虔率骑兵 5 万屯于东面，以断绝燕军左侧退路；东平公拓跋仪率骑兵 5 万屯于黄河以北，以乘燕军之后；略阳公拓跋遵率骑兵 7 万屯于燕军之南，断其回归中山之路。十月底，当慕容宝烧船夜遁后，拓跋珪率军追赶。十一月初三日，拓跋珪乘天寒黄河结冰之机，率大军渡过黄河，留下辎重大兵，亲率轻骑 2 万急追燕军。魏军昼夜兼行，十一月初九傍晚，于参合陂（在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西追上燕军。

慕容宝率军至参合陂，僧人支昙猛劝慕容宝悉心防卫，以备魏军袭击。慕容宝初时不肯听从，后经支昙猛一再陈请，司徒慕容德也劝其采纳，慕容宝才命慕容麟率骑兵 3 万居后以备魏，自率大军屯于参合陂东。慕容麟与宝有隙，纵骑兵游猎，未能设防准备。慕容宝又从术士靳安之言，遣骑兵侦候魏军。但慕容宝带兵无方，军无节度，将士不肯为其尽心，侦候骑兵出行 10 余里后，便解鞍宿营，未能探知北魏大军将要追到。

十一月初九夜，拓跋珪分派诸将列阵，成犄角之势。魏军将士衔枚潜行，暗中调动，燕军丝毫未觉。初十清晨，魏军齐进，登山自高而下直逼燕营。慕容宝正要率军东行，回头见魏军漫山遍野杀来，燕军将士自相惊扰，阵势大乱，四处奔溃。拓跋珪挥军直进，燕军大败，人马死伤者数以万计。这时魏略阳公拓跋遵纵兵迎头截击，于是燕军四五万人全部放下武器，束手就擒。燕军损失惨重，慕容宝等人单马奔逃，仅以身免。鲁阳王慕容倭奴、桂林王慕容道成等王公文武将吏数千人被俘，损失器甲、辎重、军资等以 10 余万计。参合陂之战，终以北魏大胜而告终。

---

① 《魏书》卷二《太祖纪》。

三、参合陂之战的影响

参合陂之战产生的历史影响，一是后燕一蹶不振，以后走向灭亡；其二是北魏从此成为北方强国。

参合陂之战，后燕军队的精锐大都丧失，近10万大军得以生还者不过千余人。后燕元气大伤。慕容宝耻于参合陂之败，屡次请求慕容垂起兵再攻北魏。于是慕容垂命镇守龙城（今辽宁朝阳）的高阳王慕容隆和镇守蓟城（今北京西南）的长乐公慕容盛各自领当地精兵集结中山，准备再度伐魏。北魏登国十一年（396年）三月，慕容垂留范阳王慕容德镇守中山，自率大军秘密北进，翻越青岭（在今河北涞源附近），凿山开道，直指北魏政治中心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进至猎岭（在今山西代县东北）。当时魏陈留公拓跋虔镇守平城（今山西大同），不知燕军兵至，未曾设备，燕军一举攻克平城，收拓跋虔部众3万余人。慕容垂经过参合陂，见去年燕军战败之地积骸如山，设礼祭奠，军中死者父兄尽皆大哭，声震山谷。慕容垂本已年老多病，这时悲愤惭愧，发病吐血，燕军还师。同年四月，慕容垂死于回师途中。慕容垂是后燕政权中的杰出人才，其子慕容宝才质平庸，“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己”①，远比不上其父慕容垂。后燕先经参合陂大败精锐尽失，大伤元气，既而失去杰出的领袖人物，从此日渐衰落，终至一蹶不振，至北魏天赐四年（407年）被北燕所灭。

与后燕相反，北魏以参合陂之战大败强国后燕为契机，国势迅速获得发展，终于成为北方强国。

北魏经过参合陂之战，击败了当时中原最强大的国家后燕，证明了自己的实力。魏王拓跋珪增强了信心，更加坚定地要实现吞并后燕的战略设想。其次，北魏在胜利中获取了重大的物质利益，

---

①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

缴获了器甲、辎重、军资财物10余万，增加了北魏的经济实力。再次，北魏还在俘虏的后燕文武大臣中得到了汉族士人贾彝、贾闰、晁崇等，他们在北魏政权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第四，北魏参合陂一战，将后燕军精锐消灭大半，极大地削弱了后燕实力，从此在与后燕的力量对比中处于主动地位。

拓跋珪在慕容垂死去的同年八月，便亲率40万大军向后燕的幽、并2州进军。九月，攻占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随后东出井陉关（在今河北井陉西），向今河北地区发展。到同年底，除去中山、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信都（今河北冀州）3城外，已尽占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以东的后燕故地。到北魏皇始三年（398年）正月，拓跋珪终于最后攻克邺城，全据今山西、河北地区，成为当时北方东部的唯一强国，北魏对北方的统一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编

南朝军事

第十四章　南朝各代的更替

第一节　刘宋

一、刘裕的代晋及改革

东晋末年，北府兵低级将领刘裕在平定桓玄之乱中异军突起，逐渐掌握了朝政大权，以后称帝代晋，建立了南朝第一个朝代——刘宋王朝。

刘裕，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据传为汉宗室之后，其祖先于西晋末避乱南渡，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刘裕早年从军，为北府兵著名将领刘牢之部将，曾因战功升任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等职。东晋元兴元年（402年），荆州刺史桓玄起兵叛乱，攻入京城建康，逼夺刘牢之兵权。牢之自尽，刘裕与北府兵将领何无忌等还居京口。元兴三年（404年），刘裕联合何无忌、刘毅等人举义，讨伐篡晋自立的桓玄。次年，刘裕等人平定桓玄之乱，重扶被桓玄废掉的司马德宗为帝（晋安帝）。刘裕以功升任使持节，都督荆、扬、徐、兖等16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兖2州刺史，掌握了北府兵权，并还镇京口。东晋义熙四年（408年）刘裕入朝，出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等职，又控制了朝廷大权。此后，刘裕亲率大军北伐，先后灭掉南燕、后

秦，又派兵攻灭割据益州的谯纵，不仅重新占领了长江上游梁、益等州，而且收复了黄河以南、淮水以北、汉水上游以及关中等大片地区，其间还消灭了由广州北伐的徐道覆、卢循农民起义军。当时，刘裕威望达到极点，先后任大将军、中外大都督、扬州牧等职。义熙十二年（416年），又进位相国、封宋公，次年进爵为宋王。与此同时，刘裕相继剪除与己同时起兵的北府兵将领刘毅、诸葛长民等人，清除异己力量，为自己代晋称帝扫清了道路。

元熙二年（420年）六月，晋安帝见大势已去，遂将帝位禅让于刘裕，东晋灭亡。刘裕登上帝位后，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从此历史进入了南朝时期。

刘裕谥号宋武帝，是南朝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称帝前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首先，刘裕针对当时“朝廷承东晋乱政，百司纵弛”① 的现象，大力整顿朝政。他以身作则，严明法制。左卫将军褚粲、游击将军司马秀役使宫人，被刘裕免去官职。余姚大族虞亮违禁藏匿人口千余人，被刘裕处死。于是百官肃然奉职，东晋腐败政治得到整顿。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刘裕在中央增置禁军，在地方上限制州郡兵数目，并规定像荆州、南徐州等形胜之地，只能由皇室宗王出镇。其次，刘裕为了增加国家领民，以扩大赋役征发范围，依照东晋旧法，严格实行“土断”，整理户籍，使众多的北方侨民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服役纳税。刘裕又先后禁止豪强霸占山林川泽，并减免租赋和各种杂税，放免兵户，鼓励流亡人口还本乡务农。刘裕所实行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为刘宋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宋文帝时期的“元嘉之治”

刘宋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死，17岁的太子刘义符即位，

① 《宋书》卷一《宋武帝纪》上。

是为宋少帝。景平二年（424年），辅政的司空徐羡之、中书监傅亮、领军将军谢晦等人废少帝，改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宋文帝也是南朝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即位后不久便诛权臣徐羡之、傅亮，又进兵消灭占据荆州的谢晦，将朝政大权收归己有。随后，宋文帝在刘裕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政治清明和经济发展的措施。他曾多次派遣使者巡行州郡，考察刺史守相治绩，惩治贪官污吏；多次下诏减免百姓赋税徭役，禁止豪强私占山林川泽，剥削百姓；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推行奖励农耕、兴修水利、赈济灾荒等劝课农桑的政策。由于实施了上述一系列改革措施，刘宋初期的政治经济状况，比起东晋来有很大的改善，加上其时战乱较少，社会处于相对安定时期，南方的社会生产得到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个经济繁荣的“小康”局面。史称宋文帝在位期间，“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时可免”。① 又说，当时“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② 由于宋文帝年号为元嘉（424—453年），所以这一时期被旧史家誉之为“元嘉之治”。

三、刘宋的皇统之争及其衰败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与北魏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最后以失败结束，社会经济受到一定的破坏，国力大为削弱。随后，刘宋王朝又陷入不断的内乱之中，皇室骨肉相残，宗室诸王争夺皇位，互相攻伐，政治日益腐败，各种矛盾迅速激化，刘宋王朝的“小康”局面遂告结束。

---

① 《宋书》卷九十二《良吏传序》。

② 《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传史臣曰》。

刘宋的内乱，是从文帝太子刘劭弑父自立开始的。元嘉三十年（453年），宋文帝欲废太子刘劭，事泄，刘劭率所领东宫兵杀文帝，自己即帝位。于是，文帝第三子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起兵讨伐刘劭，不久攻破建康，杀刘劭及其四子、文帝第二子始兴王刘濬及其三子，自立为帝，是为宋孝武帝。此后，刘宋宗室诸王之间骨肉相残的事情不断发生。孝武帝即位后，不愿让其叔父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居于上游重镇，召其入朝。义宣不肯奉召，举兵进攻建康，被孝武帝击败，义宣及其诸子全部被杀。随后，孝武帝又先后杀掉自己的4个弟弟。大明八年（464年），孝武帝死，继立的前废帝刘子业，在位不到二年，杀叔祖刘义恭等多人。泰始元年（465年），宋明帝刘彧即位。同时，江州刺史、孝武帝第三子晋安王刘子勋在长史邓琬的策划下，自称皇帝。于是，刘宋爆发了一场以明帝为首的文帝诸子，与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诸子之间的大规模内战。结果，宋明帝军取得胜利，刘子勋及孝武帝其余10余子皆被明帝杀掉。明帝在位期间，还将自己的5个兄弟杀掉4个。泰豫元年（472年），明帝病死，其子刘昱继立为帝。元徽二年（474年），明帝唯一没被杀的弟弟、桂阳王刘休范在江州刺史任内举兵反叛，进攻建康。右卫将军萧道成设计杀掉休范，击破叛军，后废帝刘昱的帝位才得以保全。但这时的刘宋王朝，已在连续不断的内战中急剧地走向衰亡。不久，掌握了禁军大权的中领军萧道成仿效刘裕，代宋称帝，刘宋灭亡。刘宋一朝历8帝，凡59年。

第二节 南齐

一、萧道成代宋

刘宋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的中领军萧道成，逼宋顺帝刘准禅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齐，史

称南齐，萧道成是为齐高帝。

萧道成，原籍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人，据传为汉名相萧何第二十四世孙，其祖先于东晋初避乱江南，居于侨置的南兰陵郡（治所在今江苏常州西北）。道成之父萧承之，以刘裕继母萧氏远支的外戚身份入仕，曾任南泰山太守、右军将军等官职。道成早年从军，以军功历任后军将军、右军将军等职。明帝时征讨薛安都等叛军有功，升任南兖州刺史，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泰始七年（471 年），道成被征入朝，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次年，明帝死，道成升为右卫将军，从此步入朝廷中枢机构，参掌朝政。元徽二年（474 年），江州刺史刘休范反叛，举兵进攻建康，其势甚盛，朝廷上下惊恐不安。道成镇定自若，从容筹划退敌之策。他采取避敌锐气的策略，坚守建康城诸要害之地，并亲自率兵出屯新亭（今江苏南京南，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垒，为建康军事交通要地），当敌兵锋。道成又暗使宁朔将军黄回、张敬儿以诈降计斩刘休范，致使叛军瓦解。道成乘势率军奋战，终于击破叛军。道成遂以全建康之功，升任中领军，掌握了禁军大权。升明元年（477 年），萧道成使人杀后废帝刘昱，改立其弟安成王刘准为帝。于是，道成升任侍中、司空、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荆州刺史沈攸之、司徒袁粲、尚书令刘秉等人见道成权势日增，已成取代刘宋之势，图谋除掉道成。当年十二月，沈攸之于荆州起兵进攻建康。袁粲、刘秉等策划于朝堂，以图响应攸之，事泄，2 人皆被道成所杀。次年正月，沈攸之兵败自杀。3 个政敌既除，萧道成又进位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傅、领扬州牧，代晋称帝时机完全成熟。升明三年（479 年）三月，道成进位相国，总理朝攻，以十郡封为齐公。四月，进爵为齐王。不久，宋顺帝禅位于道成，重演了刘裕代晋称帝的一幕。

二、南齐的政治

齐高帝萧道成以军功起家，在军中近 30 余年，有一定的统治

经验，也颇有改革之志，曾说："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①。他即位前后，曾实行过一些改革措施，如规定17条禁令，严禁生活奢侈；禁止宗室诸王营立屯邸，封略山湖；减免百姓赋税，安抚流民还乡生产，赈济灾荒；实行土断以整顿户籍等等。这些措施对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建元四年(482年)三月，齐高帝死，其子萧赜继立，是为齐武帝。武帝也曾实行一些如劝课农桑、减免百姓赋役等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政策。因而齐初比起宋末来，政治形势较为安定，社会经济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南齐的政局不稳定，政治非常黑暗。永明十一年(493年)，武帝死，皇太孙萧昭业继帝位，南齐王朝从此陷入王室内部争权夺利、骨肉相残、互相征战的内乱之中。南齐后期统治者穷奢极欲，吏治腐败，各级官吏大都贪财如命，竞以搜刮百姓、聚敛钱财为能事。同时，对百姓横征暴敛，苛捐杂税繁多，各级官吏千方百计地增加百姓的赋税负担。当时的赋税按户等征收，地方官吏往往扩大计资范围来提高百姓的户等，百姓桑长一尺、田增一亩、屋上加瓦，都要增税。此外，还有很多杂税，如口钱、塘丁钱、酒租、盐税等等。更有甚者，谢朏任吴兴太守时，以鸡蛋交与百姓，命按期每个鸡蛋交鸡一只，竟收鸡数千只。由于上述诸种原因，南齐政治黑暗腐败，战乱迭起，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因而萧齐是南朝的一个短命王朝，很快就灭亡了。

三、南齐的内乱及灭亡

南齐的内乱是从武帝死后开始的。永明十一年(493年)七月，武帝死，由于太子萧长懋先于武帝而死，皇太孙萧昭业继立为帝。武帝临终命次子萧子良及兄子萧鸾辅政。萧子良在武帝诸子中才干出众，曾历任地方官吏，富有统治经验，又喜好文学，与当时

① 《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

名士沈约等八人号称“八友”，素具名望。萧昭业深忌叔父子良之声望，处处提防，子良忧惧病死，朝政大权落入萧鸾手中。萧鸾于隆昌元年（494年）废杀萧昭业，立昭业弟昭文为帝，随即杀昭文自立，是为齐明帝。明帝即位后，大杀高、武二帝子孙，高帝19子、武帝23子，被他诛杀殆尽，仅高帝次子萧嶷一人有后代传世。永泰元年（498年），明帝死，子萧宝卷即位。宝卷少时“便好弄，不喜书学”①，为帝后更加胡作非为，荒淫残暴，残杀宗室，诛戮大臣。当时的辅政大臣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等六人，号称“六贵”，相继被他杀掉。朝臣离心离德，人人自危。永元元年（499年）十一月，江州刺史陈显达于寻阳（今江西九江西）举兵反叛，进攻建康，兵败被杀。不久，豫州刺史裴叔业因屡遭朝廷疑忌，投降北魏。接着，萧宝卷派去讨伐裴叔业的平西将军崔慧景于广陵（今江苏扬州）倒戈，奉南徐、兖2州刺史、明帝第三子萧宝玄为主，回兵进攻建康。永元二年（500年）三月，齐宗室豫州刺史萧懿起兵救援京师，击破叛军，杀崔慧景、萧宝玄。萧懿虽因功升任尚书令，很快便被萧宝卷杀死。萧宝卷为除去后患，命巴西太守刘山阳率兵与荆州军合兵一处，袭取萧懿之弟、雍州刺史萧衍。萧衍闻知，暗中联络掌握实权的荆州长史萧颖胄，使其攻杀刘山阳，二人共同拥立荆州刺史、明帝第八子南康王萧宝融为帝，进讨萧宝卷。永元三年（501年）三月，萧宝融于江陵（今属湖北荆沙）称帝，以萧衍为尚书左仆射、加征东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假黄钺；以萧颖胄为尚书令、行荆州刺史。萧衍旋即进军建康。十二月，萧宝卷被禁军杀死，萧衍攻占建康。中兴二年（502年）三月，和帝萧宝融自江陵归建康，至姑孰（今安徽当涂），禅让帝位于萧衍。南齐一朝历7帝，凡23年。

① 《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

第三节　萧梁

一、萧衍代齐

萧齐中兴二年(502年)四月，萧衍在南齐的内乱中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梁，史称萧梁，萧衍是为梁武帝。

萧衍本为南齐宗室，其父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在齐高帝夺取刘宋政权的过程中，萧顺之曾“参预佐命”，因功历任侍中、卫尉、领军将军、丹阳尹等要职。萧衍文武兼资，博学多才，长于筹略，颇为时人所重。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徕文士，萧衍也身居其内，为子良“八友”之一。萧衍早年以宗室入仕，隆昌元年（494年）出任宁朔将军，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明帝永泰元年（498年），萧衍升任使持节、都督雍梁南秦北秦等州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永元元年（499年），萧宝卷即位，萧衍认为朝廷昏乱，萧齐必亡，劝其兄萧懿预作准备，夺取天下，萧懿不以为然。于是萧衍在驻地襄阳（今湖北襄樊）暗造器械，又多伐竹木沉于溪水之中，以待造船之用。次年冬，萧懿被杀，萧衍遂招募人马，举兵起事，共得甲士万余人、战马千余匹、战船3000艘，又出溪中所沉竹木修造战船。永元三年（501年）三月，萧衍与荆州长史萧颖胄拥立南康王在江陵称帝后，萧颖胄留守江陵，萧衍率大军向建康推进。同年七月，萧衍于加湖（今湖北黄陂东南）大败萧宝卷援军吴子阳等十三军，攻占郢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随后进军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八月，江州刺史陈伯之投降，萧衍大军顺流而下，直逼建康。十二月，城中禁军倒戈，杀萧宝卷，送首级于萧衍。萧衍攻占建康后，进位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齐廷军政大权。中兴二年（502年）正月，萧衍进位相国，总理朝政，以十郡封梁公，不久又进爵为王。三月，萧宝融禅帝位

于萧衍，南齐遂被萧梁取代。

二、梁武帝的治国方针及政策

梁武帝萧衍即位之后，有感于宋、齐两朝宗室内乱，以致王朝更迭频繁，首先着手解决如何巩固自己统治的问题。由于宋、齐两朝皆亡于宗室骨肉相残的内乱之中，因而梁武帝很注意协调宗室诸王之间的关系，并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关系。他不像宋、齐两朝某些皇帝那样大杀骨肉，而是尽力安抚、优容宗室子弟。另外，他尽力扩大统治集团的基础，除给予高门士族更多的政治经济特权外，也给新起的庶族寒门更多的入仕机会，并同样给他们以安抚和优容，希图以此来保证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这种治国方针，决定了梁武帝必然要实行优容贵族官僚，而残酷压迫剥削百姓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即位之初，颇能励精图治。史称他“勤于政务，孜孜无怠”①。他也曾实行一些如劝课农桑、禁止豪强封占山泽、减免赋调、倡导文化学术事业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当时北方北魏政权日见衰败，无力南侵，南北政权之间战争较少，南方处于相对安定时期。因而梁武帝在位期间，南方出现一个比较稳定的逸安时代。因此旧史家褒美梁武帝的前期统治说:“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②。

由于梁武帝奉行的是优容贵族官僚和压榨百姓的方针，所以梁代前期的繁荣安定，实际上是一种表面现象。到了后期，梁政权已经是危机四伏。贵族官僚贪赃枉法，胡作非为，全不受法律约束。临川王萧宏（武帝六弟）聚敛财物，有钱 3 亿余万，其他布、绢、丝等物盈库。武帝知道后不仅不责怪，反而称赞他会理

---

①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

② 《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史臣曰。

家。梁代官场贪污成风，穷苦百姓在梁政权的重重盘剥下，以致出现“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① 的悲惨状况。由于梁武帝在法律上“急于黎庶，缓于权贵”②，即对士族权贵优容，对百姓实行严刑峻法。至梁代后期，“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抵文者比室，陷辟者接门，囹圄随满，夕散朝聚”③，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到了梁晚期，政治更加腐败。梁武帝大肆佞佛，自己曾三次舍身奉佛，然后花费大量钱财赎回。在梁武帝的倡导下，佛教大兴，僧徒猛增，国家财富和人口大量流入佛门，国家的赋役征发深受影响，从而使各种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梁最高统治层高门士族极端腐朽，全无治理国家的能力，所以等到太清二年（548 年）侯景之乱一起，梁王朝的统治便土崩瓦解了。

三、侯景之乱和南朝政治、经济实力的削弱

太清元年（547 年），东魏丞相高欢病笃，其子高澄召“拥众十万，专制河南”④ 的东魏司徒、河南道大行台侯景入朝。久怀叛乱的侯景“虑及于祸”，遂起兵反叛。但这件事却没有对东魏造成危害，反而给南方的萧梁带来了一场深重的灾难。

侯景叛东魏后，先投降西魏，但西魏丞相宇文泰并不相信侯景，于是侯景转而投降南方的萧梁。梁武帝听说侯景来降，认为这正是统一中原的大好时机，遂不顾群臣的反对，接纳侯景，并封其为大将军、河南王，命其率兵北伐。同时命自己的侄儿萧渊明率大军攻打彭城（今江苏徐州），夹攻东魏。不久，梁军被东魏打败，萧渊明被俘，侯景逃至梁境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见

① 《南史》卷五十五《邓元起传附罗研传》。

② 《隋书》卷二十五《刑法志》。

③ 《文苑英华》卷七百五十四引何之元《梁典·总论》。

④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侄儿被俘，便接受东魏的讲和要求，准备以侯景交换萧渊明。侯景走投无路，遂于太清二年（548年）八月在寿阳举兵叛梁。十月，侯景在临贺王萧正德的暗中接应下渡过长江，围攻建康。次年三月，侯景军攻破台城，困死梁武帝，以太子萧纲为傀儡皇帝，自己掌握了梁廷实权。萧梁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承圣元年（552年），侯景在梁湘东王萧绎大将王僧辩和新崛起的江州刺史陈霸先的联合进攻下，弃建康出逃，在海上被梁将羊侃之子羊鹍杀死，侯景之乱遂告结束。从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至他出逃被杀，侯景之乱历时近4年之久。

当侯景围攻台城之时，出任诸方镇的梁武帝子孙诸王曾各率大军来救，但实际上他们却各自心怀叵测，拥兵观望，不肯全力援救建康。台城陷落之后，诸王遂各准备伺机称帝。承圣元年，梁武帝第八子、益州刺史萧纪首先在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称帝。当年十一月，梁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萧绎在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即帝位，是为梁元帝。次年，萧纪率兵东下，被萧绎军攻灭，萧纪所据梁、益2州被北方的西魏乘机攻占。这时，梁武帝之孙、雍州刺史萧詧欲同萧绎对抗，举襄阳（雍州州治，今湖北襄樊）投靠西魏，请求西魏出兵攻打萧绎。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攻陷江陵，俘杀梁元帝，立萧詧为帝，仍以江陵为都城。与此同时，王僧辩、陈霸先于建康拥立萧绎之子萧方智为帝，是为敬帝。太平二年（557年），梁敬帝禅位于陈霸先，萧梁灭亡。萧梁一朝历4帝，凡55年。南方经过侯景之乱，社会经济破坏严重，不仅都城建康、名城江陵等地遭到空前的浩劫，比较富庶的浙东地区也因战乱受到很大破坏。侯景兵锋所及，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江南地区人口死亡流散，农业生产荒废，南朝的政治经济实力大为削弱。此外，侯景之乱后，梁、益2州及襄阳、江陵等军事要冲，都被西魏军占领或控制；长江下游江淮之间的广大地区则为东魏北齐所占领。南朝区域大为缩小。因而侯景之乱后，南朝政治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北强南弱的形势已成定局。

第四节　陈

一、陈霸先代梁

太平二年（557年）十月，梁朝傀儡皇帝梁敬帝萧方智，将帝位禅让于掌握朝廷实权的陈霸先。陈霸先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陈，是为陈武帝。

陈霸先，原籍颍川（治今河南禹州），据传为汉名士陈寔之后，其祖先于西晋末年避乱南渡，居于吴兴郡（治今浙江湖州），遂为吴兴长城（今浙江长兴）人。陈霸先家世寒微，以小官吏入仕，后在广州刺史萧映手下为中直兵参军，因功升任振远将军、西江督护、高要（今属广东）太守、督7郡诸军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作乱，陈霸先杀掉与侯景暗中勾结的广州刺史元景仲，自始兴郡（治今广东韶关）进屯南康（今江西赣县），准备讨伐侯景。梁湘东王萧绎以霸先为持节、明威将军、交州刺史。大宝二年（551年），陈霸先率大军溯赣江而上，有甲士3万人、强弩5000张、舟舰2000乘，存粮50万石，军容甚整。当年八月，霸先军与荆州王僧辩军会师于湓城（今江西九江），时荆州军乏食，霸先分军粮30万石与之。承圣元年（552年）正月，霸先与王僧辩合兵一处，进攻建康。三月，王僧辩与霸先联军同侯景军在建康外围展开决战，霸先采用分敌兵势的战术，在石头城西北筑城8座牵制敌军，经过激战，大败侯景军，景出逃被杀。陈霸先以平侯景之功，升任使持节、都督南徐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今江苏镇江）。

承圣三年（554年），西魏攻破江陵。次年二月，陈霸先与王僧辩在建康拥立萧方智为帝。这时，已经占据江北地区的北齐意欲乘势向南发展，乃欲立被俘的梁武帝侄儿萧渊明为帝，并提出条件与王僧辩联络，请他迎萧渊明南还，以便使萧梁成为北齐的

傀儡。王僧辩委曲求全，答应了北齐的条件，于承圣四年（555年）七月迎萧渊明入建康即帝位，改以萧方智为皇太子。陈霸先对此事曾全力反对，但王僧辩不予理睬。霸先旋于九月于京口起兵偷袭建康，擒杀王僧辩，重以萧方智为帝。陈霸先此举使萧梁免除了做北齐的傀儡，从而声名大振，升任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南徐2州刺史等职，掌握了朝政大权。绍泰二年（556年）三月，北齐派仪同萧轨等率大军10万渡江南进，攻至建康，陈霸先率军奋勇抵抗，大破齐军，俘斩萧轨，缴获军资器械无数。于是，陈霸先以保全萧梁之功威望更著，已成代梁之势。同年九月，陈霸先进位丞相、录尚书事、镇卫大将军等职，朝政全由己出。不久，又进位相国，封陈公，进爵为王。太平二年（557年）十月，陈霸先称帝，取代了萧梁王朝。

二、陈朝的政治

陈霸先称帝之初，统治很不稳定。一是梁湘州刺史王琳割据湘（治今湖南长沙）、郢（治今湖北武昌）、江（治今江西九江西南）3州，立梁元帝之孙萧庄为帝，并和北齐勾结，与陈对抗。一是侯景之乱后，江南地方豪强势力纷纷崛起，割据州郡称雄，成为陈王朝的心腹之患。因此陈王朝当时所能控制的区域，只有建康附近不大的一块地区。

永定三年（559年），陈霸先病死，因其子陈昌在江陵失守时陷于西魏，遂由其侄儿陈蒨继帝位，是为陈文帝。陈文帝是陈朝诸帝较有作为的皇帝，他首先击破王琳和北齐的联军，收复江、郢2州。后又大破乘文帝与王琳交战之机占据湘州的北周军队，将王琳及北齐、北周在江东的势力全部肃清，稳定了陈朝的统治。接着，陈文帝又采取镇压和安抚两手策略，一面消灭存有异心的地方豪强势力，另一面吸收和自己合作的地方豪强参予最高统治集团。于是，陈文帝终于统一了长江以南、蜀地以东的广大地区。此外，陈文帝还曾实行一些诸如劝课农桑、整理户籍、赈济饥荒等

有利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措施。这样，陈朝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天康元年（566年），陈文帝死，其子陈伯宗继帝位，文帝之弟陈顼以司徒、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辅政。太建元年（569年），陈顼废陈伯宗自立为帝，是为陈宣帝。陈宣帝时，趁北齐衰败之机，一度收复淮南。但陈承南朝政治黑暗、社会危机四伏的总趋势，加上陈王朝所辖区域缩小，领户大为减少，因而各种矛盾显得更为突出。末代皇帝陈后主更是荒淫奢侈，不理政事，不恤民情，终日沉湎于酒色声乐之中，他为满足自己的挥霍享乐，增加赋税，横征暴敛，政治腐败不堪。祯明二年（588年），励精图治的隋文帝发大兵50万南进，但陈后主不筹划抵抗，依然饮酒赋诗，寻欢作乐。次年，隋军攻入建康，陈灭亡。陈一朝历5帝，凡32年。

三、南朝军事实力的衰弱

陈朝是南朝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版图缩小，人口减少，这直接导致了南朝军事实力的衰弱。

南朝军事实力的削弱，始于侯景之乱。此后建立的陈朝，从版图上说，“西不得蜀、汉，北失淮、淝”①，局促于长江下游的大江以南地区，比之前代所辖区域大为缩小。从国家控制的人口说，陈亡时有户50万，人口200万；而刘宋大明年间（457～465年），南朝有户96万左右、人口460万左右，陈代人口比宋代约减少一半。此外，梁末陈初连年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破坏，也非短期所能恢复。因而陈朝无论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大为削弱，尤其是军事实力的衰弱更为明显。晋宋以来，由于战争消耗、士兵逃亡、私家分割等原因，世兵数量日渐减少，其战斗力也日渐低下，因而南朝各代常用征兵、募兵等方式补充兵源的不足。但由

---

①《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

于“军户”身份低贱，人们往往不愿从征，或从征以后纷纷逃亡。统治者经常采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士兵逃亡，一人亡叛，一家补丁；一家亡叛，亲戚邻伍补丁。这不仅促使农民大量逃亡，以避兵役，而且也导致了南朝军队战斗力的低落。到了陈代，无论经济实力或军事实力，都衰落到了极点，因而陈朝的灭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十五章　南朝的军制

第一节　军事领导机构

一、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南朝的中央军事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大系统。

驻守在京城的部分中军，统称禁卫军，是封建王朝的重要军事力量。南朝中军系统的主要部分是六军，即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所统军队。此外，还有左军、右军、前军、后军四将军所统军队，称为四军；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所统军队，谓之三将；屯骑、步兵（梁为步骑）、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所统军，谓之五校尉；还有积射、强弩二将军所统军队。萧梁时，曾改六军中的骁骑将军为云骑将军，游击将军为游骑将军，另置左、右骁骑将军，左、右游击将军，位在云骑、游骑将军上，也属中军系统。上述诸军皆为中军，但六军为中军主力。中军中的左、右卫二军宿卫宫阙，其余众军平时防卫京师，有战事时出兵征讨。宋武帝曾下令："有征讨悉配以台见军队，行还复旧"①。所谓"台见军队"，即指中军。

六军中的领军将军，是中军首领，资历名望较轻的为中领军。《宋书·百官志》下云："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所谓内军，也即中军。宋初谢晦任领军将军，"入直殿省，总统宿卫"②。南齐时，

---

①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② 《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

领军将军称为“端戎”①，也掌中军，所以当时“诸为将军官，皆敬领、护”②。梁代，“领军管天下兵要”③。梁武帝以臧盾为中领军，诏曰：“总一六军，非才勿授”④。陈代沿袭前代之制，仍以领军将军掌管中军。

中军的另一首领是护军将军，资历名望较轻者为中护军。南朝时期，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并称“领、护”，同为中军首领。刘宋时，王僧达辞护军将军一职时说：“若首统军政，董勒天兵，既才所不周，实诚非所愿……护军之任，实不敢处”⑤。齐高帝萧道成以吴郡太守张岱为中护军，诏曰：“总戎务殷，宜须望实，今用卿为护军⑥。”梁、陈两代，护军将军一职大体沿袭宋、齐旧制。关于护军将军的具体职掌，《宋书·百官志》下云：“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这里所谓的“外军”，实际上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与领军将军具体职掌的“内军”相对而言，也即中军中的外军。南朝领军将军所统的内军，从宋初谢晦为领军，“依晋中军羊祜故事，入直殿省，总统宿卫”⑦的记载来看，显然是沿袭晋法，指中军中驻于京师建康台城之内的宿卫部分或加上“二卫骁骑材官诸营”⑧。而护军将军所掌管的外军，虽也保卫京师，但不宿卫宫阙，即驻于台城之外的其他部分中军⑨。另一层是指与中军相对而言的外军，即各地都督所领驻在地方的军队。刘宋蔡廓论诸官位次时曾说：“今护军总方伯，而位次故在持节都督下”⑩。说明护军将

---

① 《南齐书》卷二十三《褚渊传》。

② 《南齐书》卷二十六《百官志》。

③④ 《梁书》卷四十二《臧盾传》。

⑤ 《宋书》卷七十五《王僧达传》。

⑥ 《南齐书》卷三十二《张岱传》、卷二《高帝纪》。

⑦ 《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

⑧ 《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

⑨ 参阅陈勇《刘宋时期的皇权与禁卫军》，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⑩ 《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

军有掌管外军的权力。但史籍中有关护军将军直接指挥都督军队的记载却很少见，这可能是由于外监（详后）侵权，以及都督中外诸军事高居其上的缘故。总之，护军将军按其职掌权力很大，但在中军中的地位，要低于负责宿卫宫阙和接近皇帝的领军将军。

南朝中军的总兵力不见于具体记载，一般认为其数量较少，远不如魏晋中军势力那样雄厚。但从南朝各代的几次出兵看，其中军的总兵力也当有10万人左右。梁武帝萧衍于南齐末年进攻建康时，齐廷新亭城主江道林军被击溃，石头军主朱僧勇军归降后，东昏侯萧宝卷遣征虏将军王珍国等“列阵于航南大路，悉配精兵利器，尚十余万人”①。由此可见，南朝中军的实力并非很弱。其实南朝各代的开国皇帝，都是在前代出任领军将军掌握了中军大权后，才得以篡权自立的。这说明中军在当时还具有相当实力，并在当时政治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朝的禁卫军还包括太子东宫宿卫兵。东宫兵由太子直接掌管，自成系统，不隶领军。东宫兵包括太子左卫率、太子右卫率所统兵，还有太子屯骑校尉，太子步兵校尉、太子翊军校尉、太子虎贲中郎将、殿中将军等多人，他们或领兵，或为太子身边的高级侍从武官。由于太子的皇储特殊地位，东宫兵实力很强，最多时达万余人。东宫设太子詹事一人，总理东宫军政，职掌相当朝廷的尚书令和领军将军。东宫兵虽不受领军指挥，但朝廷有事出征，须接受皇帝调遣。

尚书省是南朝中央军事机关的另一大系统。魏、晋以降，尚书省成为封建王朝的中枢行政机关。南朝尚书省六曹八座，分掌朝政，其中设五兵尚书一人，专总兵事。五兵尚书下辖中兵、外兵、骑兵等曹郎，分头理事。刘宋曾一度废置五兵尚书，但中兵、外兵二尚书曹郎不废。南朝各代有战事时，由皇帝下诏，尚书下符，调遣指挥全国军队。

南朝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是皇权政治，皇帝的权力至高无

---

①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

上，他总领一切军政大权。因而除权臣当政外，南朝中央各军事机构都须向皇帝负责，一切军务都要报请皇帝，最高调遣指挥权在皇帝手中。由于皇帝不可能亲自掌管军队，而对于掌握军事大权的领、护军将军又不放心，于是南朝各代君主在利用寒人掌机要的同时，更设置制局监这一机构，由其幸臣任职，专掌军事，以便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南齐书·幸臣传序》云："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这种制度"爰及梁、陈，斯风未改"①。刘宋时已有类似制局监的机构，只不过名称不同，叫外监，而不叫制局监。其实上述两种称谓，由于职掌相同，因而可以互称。当时，制局监或外监权力很大。《南史·恩幸传论》说：自宋中期以来，"制局小司，专典兵力……至於元戎启辙，武候还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辔，督察往来，驰骛辇毂，驱役分部，亲承几案，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人役，优剧远近，断于外监之心，谴辱诋诃，咨于典事(外监属官)之口。"可见南朝的制局监，成为与执掌中军的领、护等将军平行的军事机关，因其与君主的密切关系，有时更凌驾于正常军事机关之上。如齐武帝时吕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将军守虚位而已"②。但如果领军将军威望较重，或深得君主信任时，又常使外监隶属于此领军之下。宋文帝时，赵伯符出任领军将军，"先是，外监不隶领军，宜相统摄者，自有别诏，至此始统领焉"。③宋孝武帝去世前，遗诏命将外监事委以领军将军王玄谟。④ 总之，南朝的制局监或外监成为与领、护将军平行的又一军事机关，这虽加强了君主对军队的控制，却也带来了军事指挥上的某些混乱，以及恩幸小人专权胡作非为的种种弊病。

南朝在皇帝之下、领护军之上还设有一种总领全国中外一切军队的职位，即都督中外诸军事。凡任此职者，有权调遣指挥全

---

① 《南史》卷七十七《恩幸传序》。

② 《南史》卷七十七《茹法亮传》。

③ 《宋书》卷四十六《赵伦之传附子赵伯符传》。

④ 《宋书》卷七十六《王玄谟传》、卷六十一《江夏王刘义恭传》。

国军队，按正常军事领导职能，都督中外诸军事仍须在皇帝领导下指挥军队，但南朝任其职者大都是权臣，便可以此专权自大，独揽军事大权。南朝各代的开国君主都曾在前朝任此职位，从而凭借军权夺得皇位。

此外，传统的骠骑、车骑、四征、四镇、四安、四平等重号将军及众多杂号将军，到南朝时除加都督刺史、仪同三司及置佐领兵者外，一般已成为虚衔，实际上已不能算作军事机构。

二、地方军事领导机构

南朝的地方军事领导机构包括都督和州郡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拥有的军队，统称为外军。

都督府是地方上的重要军事领导机构。魏晋以降至于南朝，都督的设置已成定制。南朝的都督制度略同于两晋，都督仍按权力大小分为使持节、持节、假节 3 种；同时又以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又次之。南朝承两晋以来都督滥置的趋势，都督遍设于全境各地。都督所辖区域少则数郡，多则数州，最多有督十六州诸军事者。南朝都督概兼刺史，下设府、州两套办事机构，有参军、长史、别驾、治中等僚佐，分头治理军政事宜。因而都督不仅领兵，掌管一州或数州的军政，而且兼理民政，成为高踞于州之上的地方军政长官，其都督府实质上成为一方最高军政领导机关。

南朝都督拥有的兵力十分可观，所谓“群蕃岳峙，锐卒精旅，动有万数”①。有些大州都督所拥有的兵力，更是大得惊人。如刘宋时沈攸之任持节、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秦、北秦 8 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经营荆州数年，有“战士十万，铁马二千”②。因而南朝地方都督的军队，不仅在总数上大大超过朝廷的

① 《宋书》卷五十一《临川王刘道规传》。

② 《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中军，即或某些大州都督一州的兵力，也足以与中军相匹敌，这也是南朝时期内轻外重政治军事形势的主要根源所在。

南朝都督的军队虽与地方州郡兵统称为外军，但它的性质却不同于州郡兵，仍属于中央正规军。都督出镇，常由中央配以军队。刘宋时，臧质出为都督江州诸军事、车骑将军、江州刺史，"之镇，舫千余乘，部伍前后百余里"①。始兴王刘濬出为使持节、都督南徐、兖二州诸军事、南徐、兖二州刺史，"及出镇京口，听将扬州文武二千人自随"②。晋熙王刘燮为郢州刺史，朝廷"配以资力，出镇夏口"。③ 南齐时，庐陵王萧子卿出为使持节、都督南豫豫司三州军事、南豫州刺史，"之镇，道中戏部伍为水军"④。青州刺史颜师伯出镇，朝廷差焦度领幢主随行⑤。陈祯明三年（589年），后主以施文庆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⑥。上述都督到任或即将到任时所带军队，均由中央配给，应是来源于中军。此外，中央派中军出讨，有时就留于方镇。如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护军将军萧思话率精甲3000助镇彭城，不久他转为持节、监徐、兖、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诸军事，兖、徐2州刺史，其所领中军遂成都督军队。有时中央也将某方镇军队，配给另一方镇都督。如刘宋文帝时，"欲大举北讨，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⑦。南齐崔惠景出任持节、都督梁、南、北秦、沙4州军事、梁、南秦2州刺史，朝廷"敕荆州资给发遣，配以实甲千人，步道从襄阳之镇"⑧。总之，都督军队若由朝廷配给的，其主要来源之一即是中军，其性

---

①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② 《宋书》卷九十九《始兴王刘濬传》。

③ 《宋书》卷七十九《桂阳王刘休范传》。

④ 《南齐书》卷四十《庐陵王萧子卿传》。

⑤ 《南齐书》卷三十《焦度传》。

⑥ 《南史》卷七十七《施文庆传》。

⑦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⑧ 《南齐书》卷五十一《崔慧景传》。

质是中央正规军，但因驻守在外，故与宿卫宫阙和驻守京师的中军对称为外军。南朝都督的军队从分布上看，除布防在与北朝接壤的沿边镇戍外，内地主要分布在荆、扬、南徐等诸州，荆州驻守重兵，用以接应南北争夺的襄阳前线，扬、南徐 2 州为京师两翼屏障，其雄厚兵力则为拱卫京师建康。

南朝地方都督皆由中央任命，君主对各地方都督有调遣指挥的权力，而且对他们也常有一些限制。朝廷遇有战事时，常令各镇都督出兵。如元嘉三年（426 年），宋文帝讨荆州刺史谢晦，诏使持节、督益、宁 2 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汉中、秦州之怀宁、安国六郡诸军事、冠军将军、益州刺史张茂度出兵袭江陵，茂度进军迟缓，被“代还京师”①。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朝廷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②。宋孝武帝为了加强皇权，曾诏令“刺史守宰，动民兴军，皆须手诏施行”③。此外，南朝某些时期的都督“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④；“自非临军战阵，不得专杀”⑤，这些显然都是朝廷对都督权力的限制。但南朝都督既已成为一方军政长官，某些大州都督实力又足以与中央相匹敌，完全有条件抗命不遵，乃至起兵谋叛，因而南朝方镇起兵向阙者屡见。而齐、梁两代的开国皇帝都是以方镇军队起事成功，从而夺得帝位的。

南朝州郡皆有兵，州郡兵为地方部队，也称作外军。州、郡是都督之下的地方军事机关。这里所讲的州兵，在南朝未设都督的州来说，即指州所拥有的地方兵，而对设有都督即一州有军府、州府两套官僚机构的州来说，则指州系统下原属的州兵。州刺史僚属中有祭酒从事史一职，置员随州大小不等，专掌兵事。但州兵的指挥权在刺史手中。南朝郡守下设尉一人，掌管兵事，郡兵

---

① 《宋书》卷五十三《张茂度传》。

② 《宋书》卷七十七《柳元景传》、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③⑤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④ 《宋书》卷五《文帝纪》。

的指挥权也是在郡守掌握之中，但刺史有权指挥所属各郡之兵。

州郡兵的主要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以保证封建王朝的地方统治秩序。南朝的州、郡根据其大小领兵不等，以郡来说，多者可有兵数千，少者也有兵数百。州郡无权擅自出兵，受所隶都督指挥，有战事时也直接听命于中央。

三、军事指挥系统的混乱及其后果

南朝各代皇帝为了防止军权旁落，危及统治，设置指挥系统不一，可谓叠床架屋。从中央来说，有领、护将军一层指挥系统；又有尚书省一层指挥系统；还有皇帝近臣制局监一层指挥系统。此外，皇帝还常常亲自指挥，“遥制兵略”①。将帅出征，要“仰听成旨”②。如宋文帝即常“悬授兵略”，临战还要使人“衔中旨，临时宣示”③。从地方上说，除有中央各指挥系统外，州之上还有都督一层指挥系统；郡县之上则又有州郡一层指挥系统。指挥系统如此繁多，必然会造成军事指挥上的混乱。

南朝指挥系统的混乱，给出征将帅的临阵指挥带来很大的牵制和不利，直接影响了南朝一些战事的结局。皇帝的“悬授兵略”，常常是“诏从远来，事势已异”④，而将帅却要依诏而行，这是严重违背战争规律的。两军对阵，兵机千变万化，所以用兵贵在灵活多变，适时而动，以出奇制胜。皇帝遥控指挥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南朝对敌作战罕有胜利的原因之一。如刘宋元嘉末，北伐东路军失利后，所攻占的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已不可守。然而宋文帝却诏令不许退兵，幸亏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抗诏，坚持退往历城（今山东济南西），主帅萧斌依其议而行，才免遭全军复没。南朝指挥系统也常使军队在战争中彼此缺乏呼应，贻误战机。

---

①② 《宋书》卷五《文帝纪》。

③ 《宋书》卷九十四《恩幸徐爰传》。

④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如侯景叛梁之战，敌军至长江，准备伺机渡江时，梁武帝以沿江防守的太子家令王质兵力单薄，改以云骑将军陈昕代其任。但王、陈2军却互不通气，王质已退，而陈昕尚未至，遂使侯景乘隙渡过长江，这显然是指挥上的严重失误。

第二节 兵役制度及军队的编制与训练

一、世兵制的衰落

南朝时期，世兵制仍是主要的集兵方式之一，但在魏晋盛行一时的世兵制，到了这时已渐趋衰落。

魏晋以来，世兵称为“军户”。军户与普通民户分立户籍，其户籍由军府管辖，军户为世袭制，不经朝廷放免，子弟要世代为兵。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私家分割及兵士逃亡等原因，南朝世兵数量更渐减少。由于军户的身份卑贱，除了一部分罪犯或被征服者加入世兵队伍外，只能由世兵的子孙来补充，显然这些来源都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整个南朝时期，世兵的数量在日益减少。此外，由于世兵身份地位的低贱，极大地影响了世兵的士气和战斗力。世兵数量的减少和缺乏战斗力，使南朝世兵制走向衰落。刘宋世，荆州刺史谢晦曾“欲焚南蛮兵籍，率见力决战”。① 宋文帝太子刘劭也曾“焚京都军籍，置立郡县，悉属司隶为民”。② 谢晦、刘劭2人都是在反叛时赦免军户的，其目的是拢络军心，使士兵为其死战。但他们之所以采用这一手段，正好说明了军户世代为兵的低贱地位，以及世兵制的必然衰落。刘宋文帝时，赵广起义，众至10万，围困成都。益州刺史刘道济以世兵战斗力不强，更怕其临阵倒戈，便下令“免吴兵三十六营以为平民，分立宋兴、宋

① 《宋书》卷四十四《谢晦传》。

② 《宋书》卷九十九《刘劭传》。

宁二郡”①。南朝统治者为了提高世兵的战斗力，常常以放免军户的办法，刺激世兵为其效力。如宋孝武帝曾下诏令“军户免为平民”②。封建统治者不断放免军户，显示着世兵制日见衰落的总趋势。总之，世兵制发展到了南朝，已经走到它的尽头，起不到维持封建统治的作用了。

二、公私募兵的盛行

南朝最主要的集兵方式是募兵，这是南朝军队兵员补充的主要来源。募兵，即指招募人丁自愿为兵。募兵可以选择身强力壮，身负军事技艺的劲勇为兵，因而募兵战斗力很强。南朝时由于世兵制的衰落，而募兵可以保证军队的来源和战斗力，所以南朝募兵制盛行。

南朝的募兵分为公、私两种。所谓公，指朝廷诏令允许的募兵；所谓私，则指将领或豪强私自募兵。

南朝各代的军队，大都依靠募兵补充。如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为进行北伐，“募天下弩手，不问所从，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③。宋明帝初即位，因四方反叛，从中书舍人戴明宝之议，遣黄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④。宋明帝泰始年间（465～471年），“时欲北讨，使（沈）勃还乡里募人”⑤。孙谦为巴东、建平2郡太守，“将述职，敕募千人自随”⑥。萧齐时，防戍北边与北魏对垒的军队，多为募兵组成。齐永明十一年（493年），为抵抗北魏军队南侵，“发

① 《宋书》卷四十五《刘粹传附弟道济传》。

② 《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③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④ 《宋书》卷八十三《黄回传》。

⑤ 《宋书》卷六十三《沈演之传附子勃传》。

⑥ 《梁书》卷五十三《良吏·孙谦传》。

扬州民丁，广设召募”①。南朝各代在有战事时经常下诏募兵，这些属于封建政权的公开招募。

南朝时期，不经朝廷允许的私家招募更为盛行。自刘宋泰始以来，内外战乱频仍，将帅各募部曲私兵。由于私家募兵毫无限制，齐高帝萧道成即位后下诏禁断，诏曰：“设募取将，悬赏购士，盖出权宜，非曰恒制……自今以后，可断众募。”② 但此后私家招募之风，并未因此而减弱。齐末梁武帝起兵时，即“颇招武猛，士庶向从，会者万余人”③。梁末侯景之乱，江南地方豪强蜂起，他们的武装大都由募兵组成。陈武帝陈霸先以定侯景之乱起家，其军队亦由募兵组成。陈霸先为广州刺史萧暎之中直兵参军时，即“招集士马，众至千人”④；“益招勇敢，器械精利”⑤。陈霸先还使其侄儿陈蒨（即陈文帝）“还长城招聚兵众”⑥。最后终于组成一支颇具战斗力的三、四万人的精兵，陈霸先遂凭此夺得帝位，建立了陈朝。

总之，南朝募兵是军队的主要来源，通过招募集兵是最重要和普遍的方式。不论公私招募的兵士，都不是终身为兵，应募者在一定期限后，即可免除当兵的义务。而且募兵常有赏赐，待遇较丰，并因军功可升入统治阶层，因而募兵的身份地位较世兵要高，这样既扩大了军队的来源，又有助于南朝军队战斗力的提高。

三、强行征兵制

强行征兵制，指南朝封建政权强行征发民丁为兵。这种征兵制，也是南朝经常采用的集兵方式。

---

①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② 《南齐书》卷二《高帝纪》下。

③ 《梁书》卷十一《吕僧珍传》。

④⑤ 《陈书》卷一《武帝纪》上。

⑥ 《陈书》卷十一《章昭达传》。

南朝各代遇有重大战事时，都经常征发民丁为兵，用来弥补兵力的不足。刘宋元嘉末北伐，即曾“发南兖州三五民丁”，并命令“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①。所谓“三五民丁”，即户有三丁者，出一人为兵，户有五丁者，出二人为兵。所征民丁接到命令后，要按时到指定地点集合。如果违期不至，便要受到严惩。如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发三五丁，弟萨应充行，坐违期不至，依制，军法，人身付狱”②。而且要处以死刑。齐高帝曾令南兖州刺史柳世隆，“民间若有丁多而细口少者，悉令戍”③。这也是强征民丁为兵。永明十一年（493年），北魏扬言南进，齐武帝遂“发扬、徐民丁”④预作准备。梁天监四年（505年）北伐，亦曾发民丁为兵。

此外，南朝的方镇刺史也常强行征集境内百姓为兵。刘宋荆州刺史沈攸之准备反叛，即曾“扬声讨伐，尽户发上，蚁集郭邑……遂使田野百县，路无男人，耕田载租，皆驱女弱”。⑤可见沈攸之征发民兵之多。刘宋晋安王刘子勋反叛时，其长史邓琬征发“诸郡民丁，收敛器械，十日之内，得甲士五千人”。⑥

南朝的征兵制，似非常制，一般在有重大战事时为补充兵力，以临战应急之用，因而当在战事结束后被征兵士即解甲归田。征兵制下的兵士多来自平民百姓，由于缺乏军事训练，军纪和战斗力均很差。征兵制在南朝不是主要的集兵方式，被征兵士在军队中不占主要成分。

---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宋书》卷九十一《孝义·孙棘传》。

③ 《南齐书》卷二十四《柳世隆传》。

④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⑤ 《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⑥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

四、军队的编制及训练

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大致为军、幢、队、什、伍等单位。

南朝军队最高一级的建制单位是军，当时出兵防戍作战，一般皆以军为单位。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朝廷进讨雍州刺史袁觊，殷孝祖为前锋都督，“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络绎继至”。① 南齐为防止北魏军南进，在边地设置重兵把守，于“梁山置二军、南置三军、慈姥置一军、洌州置二军、三山置二军、白沙洲置一军、蔡州置五军、长芦置三军、菰浦置二军、徐浦置一军”②。军的统军长官叫作军主，各军皆设军主、军副，负责指挥全军。

一军的统兵数为多少，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南齐豫章王萧嶷曾遣帐内军主戴元孙率2000人进至石头。齐末，石头军主朱僧勇率水军2000人归降萧衍。当侯景之乱时，梁荆州刺史萧绎（梁元帝）“遣步骑一万，使援京师。”另一处记载此事说，萧绎“凡遣五军入援京师”③。五军合1万人，也正好一军2000人。刘宋元徽二年（474年）桂阳王刘休范反叛，荆州刺史沈攸之遣二军主孙同、沈怀奥率兵3000入援京师，则每军为1500人。当邓琬反叛时，军主郭季之、荀僧韶率众3000，声援沈攸之。似亦为两军3000人，一军1500人。此外，宋刘子勋反叛时，曾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派军主张宗之率千余人助守。齐武帝也曾遣军主张应期、邓惠真率3000人袭豫章。梁代军主王怀敬也曾率千余人守怀静城。根据上述材料，这些军有兵1500人。另外还有一军领兵千人的记载。如刘宋明帝泰始初年，军主王敬则率兵千人隶刘怀珍出征。宋陈显达为军主时，领1000人守下邳。宋末平定刘子勋叛乱时，辅国

---

① 《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②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③ 《南齐书》卷四十四《萧方传》，《陈书》卷十一《淳于量传》。

将军吴喜派军主佼长生率兵1000人，乘轻舸二百，以为游军。

南朝一军所统兵力，何以相差如此之多呢？东晋南朝承袭西晋旧制，诸王开国，并以户数相差为大、次、小三品。大国置上、中、下三将军；次国置中、下二将军；小国置将军一人。晋制王国置军，“大国中军二千人，上、下军各千五百人；次国上军二千人，下军千人”①。可见西晋以来，一军素有2000人、1500人、1000人之分。据此，南朝一军兵力的正常编制，当为2000、1500、1000不等。据记载看，其中2000人、1500人之军，多为中军或大州都督所统军队。此外，南朝时期凡带兵者，不论带兵多少，亦常称作军主。如刘宋黄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宁朔将军、军主”②。这类军主，统兵常不足千人，与正常编制下的军有所不同。

军以下的建制单位是幢，幢介于军与队之间，因此当时常将“军幢”或“幢队”并称③。刘宋竟陵王刘诞反时，其幢主孙安期“率兵队出降”。证明幢在队之上。幢是紧接军以下的一级作战单位。孝武帝刘骏起兵讨伐元凶刘劭时，即“分麾下以为三幢，（刘）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马文恭各领其一”④。当时刘骏为江州刺史，这里的“麾下”当然不是指他的全部军队，而应是指他直属的一军。从史籍的记载看，幢主的地位不低，如刘宋蒯恩曾“以宁远将军领幢”。宁远将军虽为小号将军，但当时以小号将军出任幢主的却不在少数。张涣为江夏国侍郎幢主，卜伯宗为正员将军幢主。皇甫仲远为正员将军军副。这里的正员将军即殿中将军，与殿中员外将军相对而言。幢主卜伯宗为殿中将军，是宫廷宿卫将领，其地位当不低。他与军副皇甫仲远同为正员将军，显

---

①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

② 《宋书》卷八十三《黄回传》。

③ 参见《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卷十八《礼志五》、卷六十四《何承天传》、卷九十九《二凶传》。

④ 《宋书》卷四十五《刘怀慎传附刘道隆传》。

然身份相当，其职位与军副相差不多。这表明幢是仅次于军、而高于队的一级建制。

那么，一幢拥有兵力多少呢？从宋孝武帝刘骏分其麾下为三幢看，幢之兵力当不会太少。又刘宋时幢主杨仲怀“领五百人居前”，后其“所领五百人死尽”①。则一幢有兵约五百人，一军分为三幢，似也合乎情理。《宋书·索虏传》说：“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这里虽指北魏军队编制，但也可作为南朝军队编制的参证。因此，一幢大致有兵五百人。幢的兵力编制，也有多于五百人的，如宋末，“幢主檀文起率千人戍西昌”②。大概在一军兵力多于常制时，则一幢的兵力也随之增多。

幢以下的建制单位是队。队是南朝军队编制中介于幢与什、伍之间的一级组织，队设队主、队副，负责指挥全队。

南朝军队一队所拥有的兵力，大约为 50 人。西晋皇帝大驾卤簿仪制规定中有步、骑兵卒 30 队，每队 50 人。刘宋“兼用汉、魏之礼”③，此仪制应与晋制相同，即每队 50 人，因晋与汉魏在制度上本是一脉相承。刘宋诸王常行随从不得过 6 队，如以 50 人为一队，则有兵 300 人，再加上“格置三百许人”④的随身白直、夹毂，已约 600 人。而王国置军，西晋时的下国仅有兵 1500 人。南朝各代王国领兵数一般已少于西晋。因而当时诸王常行所从用 600 人，已为数不少。如再增加，则与王国所领兵力不相协调。又刘宋王僧达为征虏将军、吴郡太守时，置佐领兵，“台符听置千人，辄立三十队，队八十人”⑤。这里僧达所领兵数及每队人数皆超出常制，所以史家特指出八十人为一队。同僧达职衔相近的龙骧将军、鄱

① 《宋书》卷八十七《殷琰传》。

②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

③ 《宋书》卷十四《礼志一》。

④ 《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王萧嶷传》。

⑤ 《宋书》卷三十五《王僧达传》。

阳太守虞丘进，“统马步十八队，于东道出鄱阳”①。如以50人为一队，总兵力则近1000，正好符合“台符听置千人”的规定。

从队主的身份看，其所统兵力也不会太多。刘宋宗越，出身补郡吏，刺杀父仇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为队主”②。宋衡阳王刘义季队主续丰“母老家贫，无以充养”③。他们或以身份卑贱的郡吏补队主，或家贫无以养母，说明其地位很低，统领50人之众是符合其身份地位的。

南朝队这一建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王镇恶讨刘毅时，“大城内，(刘)毅凡有八队，带甲千余……金城城内东从旧将，尤有六队千余人”④。这里队又似有百余人至200人许。刘裕北伐后秦时，派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余人……为却月阵”⑤。这里一队又似有700人。前者为强藩所领军队，后者为抗击北魏骑兵的阻挠，因而其队兵力有逾常制，显是特例。

南朝军队最基层单位是什、伍，这是传统的基层建制。刘宋时，卜天生“少为队将，十人同伙”⑥。“伙”即“什”，每伙十人，正同于传统建制。这里所谓“队将”，可能是泛指最基层军官，包括什长在内。从天生教同伙跳坑“并皆叹服”看，他大约是什长，依据惯例，什以下为伍，伍的兵力为什的一半，由五人组成，设伍长一人。

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战争频仍，各代都比较重视军队的训练。

南朝中军的训练在京师进行，训练时皇帝常亲自参加，颇具规模。刘宋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在京师建康专设宣武场，用

---

① 《宋书》卷四十九《虞丘进传》。

② 《宋书》卷八十三《宗越传》。

③ 《宋书》卷六十一《衡阳王刘义季传》。

④ 此事为东晋末年事，但其制应与南朝相接，见《宋书》卷四十五《王镇恶传》。

⑤ 《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附朱超石传》。

⑥ 《宋书》卷四十一《卜天兴传附弟天生传》。

以操练步兵骑兵。此后，宣武场遂成为南朝各代训练军队的场所。刘宋孝武帝时，又在玄武湖大阅水师，所谓“大阅”，即检阅训练水军。随后玄武湖成为南朝各代训练水军的场所。

南朝各代皇帝都重视中军的训练，经常亲临现场检阅中军。宋文帝时，曾多次阅师讲武。孝武帝也曾大阅步骑水军。南齐时，齐武帝多次“讲武”，或至宣武场校阅步骑，或至玄武湖校阅水步军。梁代，中军训练仍依宋法。陈宣帝时，也曾在玄武湖大阅水、步、骑三军。

南朝中军的训练规模很大，自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以下的六军及中军的其他部分都要参加，有时参加人数达 10 万之多。训练时，不仅要操练队列，还要比试武艺。如南齐周盘龙即常在齐武帝讲武时，“领马军，校骑骋稍”①。

南朝外军也常进行训练，一般由各方镇都督刺史主持。梁武陵王萧纪为益州刺史“九日讲武，躬领幢队”②。梁豫州刺史夏侯夔任职 7 年，有部曲万人，马 2000 匹。史称其军“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③。所谓“服习精强”，即训练有素的结果。

第三节　兵种、装备及后勤供应

一、兵　种

南朝军队主要由水、步、骑等兵种组成。

南朝的地理环境特点，是江河湖泊星罗棋布，水运便利。而且与北朝对峙，先后以黄河、淮水、长江为守，因而南朝的水军比较发达，是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南朝各代出兵，或以舟师为主，

---

①《南齐书》卷二十九《周盘龙传》。

②《南史》卷五十三《武陵王纪传》。

③《梁书》卷二十八《夏侯亶传附夏侯夔传》。

或必辅以舟师。如刘宋元嘉末，北魏南进，宋文帝令太子刘劭总统水军，其时“阵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①。孝武帝时，南郡王刘义宣起兵反叛，“率众十万发自江津，舳舻数百里”②。梁代侯景作乱，荆州水师在长江中游大破侯景水军，侯景因而诫嘱部下：“西人（指荆州军）善水战，不可与争锋”③。荆州水师的这次胜利，对平定侯景之乱起了重要作用。陈武帝陈霸先亦以水师起事，进讨侯景时，有“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舟舰二千乘”④。陈永定二年（558年），陈武帝命临川王陈蒨（陈文帝）带兵西讨，“以舟师五万发自京师”⑤。

南朝水师的装备，比前代有很大发展，战船的种类大增，战船所配攻具比以前有了进步。当时水师战船的种类见于史籍记载的，有平虏、金翅、青龙等大型战舰；又有蒙冲、斗舰等小型战船，还有拍舰、火舫、水车等多种专用战船。大型战舰一般建有重楼，因此又统称为楼船。楼船上一般建楼三重，高达十余丈，有时更建楼四重，高二十丈。船上四周设列防护女墙，上开有弩窗矛穴，并在甲板上设置抛车，可以抛射垒石，从远处进攻敌船。由于楼船既可远攻，又可近战，颇具威力。前边提到的平虏、青龙等舰大体都是楼船。蒙冲、斗舰等小型战船专门用来冲锋陷阵。如蒙冲战船以生牛皮蒙体，不畏矢石，船仓开设掣棹孔，划船水手皆在舱内，左右前后皆有弩窗矛穴，敌人不能近。由于此船防卫性能极好，又船体窄小轻巧，行进疾速，专门用来冲锋，在敌人猝不及防时，快速冲破敌阵。斗舰上设有多重防护女墙，专门用来与敌舰正面冲杀。此外，当时小型战舰还有多种，名称各异，有的性能极好。如梁末王僧辩率水军进

---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宋书》卷六十八《南郡王刘义宣传》。

③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④ 《陈书》卷一《高祖纪》上。

⑤ 《陈书》卷二《高祖纪》下。

攻侯景水军，侯景水军有“鵃䑽千艘……两边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①。鵃䑽是一种轻型战船，应是唐杜佑《通典》中所云“走舸”之一种。这种战船上立防护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②。南朝时期，尤其在梁陈之际，出现了多种专用船只，如拍舰，实即炮舰，这后面还要提到。另外，火舫、水车等船，从其名称看，大概是用于火攻和其他用途的战船。

南朝水师的武器装备也比前代有了进步，像矛、弩等兵器都在战船上得到广泛的使用，但其最主要的新型武器是“拍”。南朝史籍讲水战时，常有“发拍中于贼舰”的记载。“拍”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陈初，侯安都征叛将留异，“引船入堰，起楼舰与（留）异城等，放拍碎其楼雉”③。又陈平定华皎之乱时，“官军以大舰拍之，贼舰皆碎，没于中流”④。陈将淳于量、吴明彻平华皎之乱时，“募军中小舰，多赏金银，令先出当贼大舰，受其拍。贼舰发拍皆尽，然后官军以大舰拍之”⑤。这些说明，拍虽威力很大，但不能长时间使用，一旦发拍皆尽，就不能使用了。而且拍发出后，可能击中敌舰，也可能击不中。综上所述，南朝水军所使用的“拍”，乃是一种置于大型战舰之上，可以连续击发出去，并经一段时间可能用尽的威力很大的重型武器。关于拍的具体形制，杜佑在《通典·兵典》中记楼船云：“置抛车垒石铁汁”。在抛车条又说，抛车是利用杠杆原理抛射石块的一种远程投射兵器，其威力很大。三国时期，曹操与袁绍交战时曾建造抛车，因其发射石块之声甚巨，又名“霹雷车”。而抛车的性能与特点和拍很相近，因而拍可能即是杜佑所云楼船所配备的抛车。杜佑一并提到的垒石、铁汁，显然即拍所用的攻具。其实，当时的史籍有时即将拍

---

① 《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

② 《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典十三》。

③ 《陈书》卷八《侯安都传》。

④⑤ 《陈书》卷二十《华皎传》。

车写成抛车。如《陈书·黄法𣰰传》云："于是乃为拍车及步舰，竖拍以逼历阳"。《南史·黄法𣰰传》则云："于是为抛车及步舰，竖拍以逼之，炮加其楼堞"。西晋末年，杜弢义军曾于战船上竖"木桔槔"以进攻官军，而抛车正是"中立独竿者，如桔槔状"①。南朝的拍，可能即从晋时水师所用桔槔原理的抛石机发展而来。需要指出的是，抛车是因将抛石机置于木床架之上，下有四轮可以行走，故曰"抛车"。而战船上的"拍"，应是将与抛石机性能相近的装置固定在甲板之上，因而拍实即抛石机一类的战斗机械武器。前边提到的拍舰，则可能是于舰上大量设置抛石机，从远处轰击敌舰的专用战船。古代抛石机又称炮，所以"拍"也称"炮"。如《陈书·黄法𣰰传》说"施拍加其楼堞"，而《南史》同传则称"炮加其楼堞"。因而拍舰又可以称为炮舰。

南朝各类大小型战舰的增加，其性能的改进，加之"拍"这种新型武器及矛、弩等兵器在战舰上的广泛使用，不仅加强了水军的战斗力，而且使南朝水军在我国水军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步兵也是南朝军队中的主要兵种。南朝各代宿卫戍边、攻伐征战，都离不开步兵。有时水军弃舟登岸，即成步兵。因此，步兵在南朝军队中仍然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骑兵因其速度快，冲击力强，在古代战争中战斗力最强。骑兵也是南朝军队的兵种之一，但因地理环境特点和马匹资源缺乏，南朝的骑兵远不如水、步二军发达。

南朝各代出兵征战，常以骑兵配合步兵，如刘宋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就曾命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八千，配合右将军到彦之北伐。齐、梁、陈也常以步骑配合出战。南朝各代讲武训练，均有骑兵参加。如齐武帝为皇太子时，"于曲阿后湖斗队，使晃御马军"②。齐武帝"数讲武，常令（周）盘龙领马军"③。但从总体上看，南

① 见《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典十三》。

② 《南齐书》卷三十五《长沙王萧晃传》。

③ 《南齐书》卷二十九《周盘龙传》。

朝骑兵不够强大。因为南朝境内大部分地区不产马匹，虽然各代统治者采用各种办法尽力搜集马匹，但南朝马匹资源始终十分贫乏。像素称兵马重镇的雍州，在梁武帝萧衍起兵时，仅集得“马千余匹”①。宋桂阳王刘休范在江州刺史任内起兵作乱时，有兵2万人，却仅有“骑五百匹”②。宋荆州刺史沈攸之在荆州经营多年，有战士10万人，而马匹也只有2000，这是南朝强藩拥有骑兵的最高数字。南朝中军骑兵从几次出兵情况看，似也不过万人上下。因此，南朝的骑兵既远不如自己的水、步二军发达，更无法与拥有数十万骑兵的北魏相比。当时人在论及南北军事形势时，曾有“马步不敌，为日已久”③的说法。说明南朝军队在脱离了适宜水军的南方环境后，便以步兵为主，而骑兵在南朝军队中不占主要地位。

二、军器、军械的制造及供应

军器、军械是指用以装备军队的兵器铠甲、攻守战具等多种军用物品。南朝时期，军器、军械的制造、贮存、供应等皆由中央设部门专门管理。

传统的弓弩矛槊等，仍是南朝军队使用的主要兵器。特别是有利于水战的弓弩，在南朝使用极为普遍。宋武帝刘裕北伐时，先锋朱超石与北魏军在黄河北岸作战，“先以软弓小箭射虏，”然后“百弩俱发，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④。宋泰始三年（467年），北魏军进至淮北，萧道成命军主高道庆“将数百张弩浮舰淮中，弩一发数百箭俱去，虏骑相引避之”⑤。陈霸先之兄陈道谈在梁世为东宫直阁将军，“侯景之乱，领弩手二千援台，于城中中流矢卒”⑥。

---

①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

②⑤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

③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④ 《宋书》卷四十八《朱龄石传附朱超石传》。

⑥ 《陈书》卷二十八《始兴王伯茂传》。

陈霸先起兵进讨侯景时，有“甲士三万人，强弩五千张”①。南朝除传统的弓弩之外，还出现一种“万钧神弩”，又称为“神弩”，“万钧弩”，“神锋弩”②。宋武帝刘裕与卢循义军作战时，“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莫不摧毁”③。南齐萧子响与台军对抗时，“将万钧弩三四张宿江堤上”，次日与台军开战，“子响于堤上放弩，亡命王充夫等蒙楯陵城，台军大败”。显然，“万钧弩”不同于一般弩，其杀伤威力甚大。1960年，江苏南京市曾出土一件南朝大型铜弩机，长39厘米，宽9.2厘米，通高30厘米，经复原后，其弩臂长达2米以上④。这种铜弩机属于床弩，亦即《通典·兵典》所云车弩一类。

矛槊也是南朝军队的常用兵器。矛、槊本为一物，槊又作“矟”。东汉刘熙《释名》云：“矛，冒也，刃下冒也，长三丈，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南朝军中所用矛、矟没有刘熙讲的这种区别，当时步、骑兵所用皆称为矟，因有步矟、马矟之名。如宋朱龄石“所领多鲜卑，善步矟”⑤。宋孝武帝以沈攸之“善战，配以仇池步矟”⑥。《宋书·殷琰传》云：“（刘）顺幢主樊僧整与台马军主骠骑中兵参军段僧爱交矟斗”。齐武帝“尝幸锺山”，萧晃从驾，“以马矟刺道边枯蘖”⑦。梁末，“少府奏新造两刃矟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梁武帝因赐羊侃，令其试之。“侃执矟上马，左右击刺，特尽其妙”⑧。可见南朝的“矟”，实际上就是“矛”，尺寸也不限于一丈八尺，与《释名》所记已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矟在南朝的使用非常广泛，是军队的最常备武器，不仅用于近战搏杀，有时临阵应急还常变通为射远兵器

---

① 《陈书》卷一《武帝纪》上。
② 《梁书》卷十《杨公则传》。
③⑤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④ 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中国古代兵器分册》。
⑥ 《宋书》卷七十四《沈攸之传》。
⑦ 《南齐书》卷二十五《长沙王萧晃传》。
⑧ 《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使用。如朱超石随刘裕北伐曾带大锤并千余张矟，及战时“乃断矟长三四尺，以锤锤之，一矟辄洞贯三四虏。”萧道成父萧承之为刘宋汉中太守时，与氐帅杨难当交战，时杨难当军“皆衣犀甲，刀箭不能伤”。萧承之“命军中断槊长数尺，以大斧槌其后，贼不能当”。以断矟击发制敌，大约是当时常用的办法。朱超石军携带上千张矟，说明矟在当时使用的普遍程度。

南朝军队所使用的铠甲，仍为传统的铁甲、犀甲等等。刘宋元嘉末大举北伐，西路军柳元景部与北魏军在陕城(今河南三门峡西)大战，时北魏骑兵势盛，刘宋“众军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脱兜鍪，解所带铠，唯著绛纳两当衫，马亦去具装，驰突以入敌阵”①。薛安都所穿铠甲，应即传统铁甲。刘宋御史中丞刘桢曾“奏前广州刺史韦朗于广州所部作犀皮铠六领，请免朗官”②。这里的犀皮铠是指犀甲。南朝骑兵的战马也披有铠甲，上引薛安都临战使战马去掉的“具装”，即是全套的马铠。南朝的骑兵一般都备有“具装”马铠，如刘裕北伐时，使宁朔将军索邈“领鲜卑具装虎豹突骑千余匹，皆被练五色”③。宋明帝时，萧道成带兵讨伐刘子勋叛军，“时朝廷器甲皆充南讨，太祖(萧道成)军容寡阙，乃编椶(棕)皮为马具装，析竹为寄生，夜举火进军”④。宋末由于战事繁殷，马铠一时供应不上，只好以棕皮为之，聊以充数。所谓“寄生”，是防护战马尾部的铠具。这说明当时的“具装”马铠，乃是骑兵的一种常备器具。

南朝军队使用的攻守战具种类很多，见于史籍的，有云梯、轒辒车、冲车、尖头木驴、大蛤蟆车、抛车、木幔、彭排等等。其中云梯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攻具，其大致构造是“以大木为床，下置六轮，上立双身，身有检梯，节长丈二尺”⑤。攻城时，将云梯

---

① 《宋书》卷七十七《柳元景传》。

②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六引《宋元嘉起居注》。

③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④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

⑤ 见《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典十三》。

推至城下，将士攀登而上。而辒辒车、尖头木驴、大蛤蟆车等，大体为一类攻具，皆是以木为脊架，上蒙以生牛皮，将士隐蔽其内，可以抵近城墙发动进攻。抛车即抛石机，是一种用杠杆原理发射石块等物远攻敌人的器具，即古代的炮车，前边已经讲过。木幔则是“以板为幔，立桔槔于四轮车上，悬幔逼城堞间，使矫捷者蚁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①。彭排是南朝常用的防卫器具。经考证，“彭排”即是盾牌，不仅施用于车，也常负于人身以为防卫。《诸葛亮军令》云：“帐下及右阵各持彭排”②。这里的彭排，显然是指盾牌③。

南朝时期，中央军器军械的制造由少府（梁、陈称少府卿）所属尚方负责。宋、齐二代，少府皆设“左尚方令、丞各一人，右尚方令、丞各一人，并掌造军器”④。梁、陈二代，设左、中、右三尚方，以掌军器制造。由于尚方职掌军器制造，南齐始安王萧遥光作乱时即于“东冶出囚，尚方取仗”⑤。梁武帝时，“少府新造两刃矟成，长二丈四尺，围一尺三寸”⑥。可见少府所统尚方确为南朝制造军器军械的机构。尚方之下又设有东冶、南冶等机构，具体负责冶铸兵器，宋、齐二代，朝廷设东冶令、丞各一人，南冶令、丞各一人，梁代则有东、西冶。南齐戴僧静曾奏请齐武帝，“以锻箭镞用铁多，不如铸作。东冶令张侯伯以铸镞钝，不合用，事不行”⑦。梁末侯景之乱时，景“以台所给仗多不能精，启请东冶锻工，欲更营造，敕并给之”⑧。

南朝地方强藩，大体皆有修造军器军械的机构，称为作部。如

---

① 见《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典十三》。

② 《太平御览》卷三百五十七《兵部八八》引。

③ 参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宋书·彭排〉》。

④ 《宋书》卷三十九《百官志上》。

⑤ 《南齐书》卷四十五《始安王萧遥光传》。

⑥ 《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⑦ 《南齐书》卷三十《戴僧静传》。

⑧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刘宋黄回曾因罪“为台军主谢承祖所录，付江州作部”①。南齐晋安王、雍州刺史萧子懋在郁林王萧昭业即位时“见幼主新立，密怀自全之计，令作部造器仗”②。

南朝中央设南、北二武库，专用来储存军器，少府修造军器完毕，即运入武库贮存。武库设武库令一人，掌管军器。南朝尚书诸郎中有尚书库部郎一人，专司武库军器诸事，武库令即其属官。宋文帝时顾琛为尚书库部郎，当时正值刘宋第一次北伐大败之后，武库空虚。宋文帝设宴有北来降人在座，“上问琛：‘库中仗犹有几许?’琛诡答：‘有十万人仗’。旧武库仗秘不言多少，上既发问，追悔失言，及琛诡答，上甚喜”③。尚书库部郎因掌管军器，所以权力很大，在特殊情况时，还总管制造军器诸事。如陈宣帝时，因兵器空匮，乃以萧引为库部侍郎，掌知营造弓弩矟箭等事。引在职一年，“而器械充牣”④。

南朝各州作部所造军器军械，亦由中央统一管理，有的须直接上交中央武库。如刘宋沈攸之为荆州刺史，“荆州作部岁送数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讨四山蛮”⑤。这里讲的“岁送数千人仗”，是指荆州作部按规定应上送中央的武器数，沈攸之割留后，要以“供讨四方蛮”之用向中央作假汇报。有些作部制造的军器，即存于当地镇库，但中央有统一调配之权。如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以崔慧景为南梁、南秦2州刺史，即“敕荆州资给发遣，配以实甲万人。”⑥ 刘宋时“朝廷疑惮沈攸之，密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齐武帝曾“敕荆、郢二镇，各作五千人阵”⑦，以供急用。

---

① 《宋书》卷八十三《黄回传》。

②⑦ 《南齐书》卷四十《晋安王萧子懋传》。

③ 《宋书》卷八十一《顾琛传》。

④ 《陈书》卷二十一《萧允传附弟萧引传》。

⑤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

⑥ 《南齐书》卷五十一《崔慧景传》。

南朝各代对兵甲器仗控制很严，将帅出兵征战，一般临时配以兵甲器杖。如刘宋末，桂阳王刘休范反叛，形势紧急，“不暇得更处分，开南、北二武库，随将士意取”①。萧梁天监四年（505年）北伐，主帅萧宏为梁武帝之弟，因而“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② 梁末侯景之乱，事起仓促，“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③ 南朝诸王和州镇将帅不经允许，严禁擅造或私藏军器。南齐长沙王、南徐州刺史萧晃“罢徐州还，私藏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于水”。④ 梁代邵陵王萧纶为丹阳尹，“擅造甲仗”，⑤ 经梁武帝发现后，他将兵器沉于江中，以便逃脱罪责。

---

① 《宋书》卷七十九《桂阳王刘休范传》。

② 《梁书》卷二十二《临川王萧宏传》。

③ 《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④ 《南齐书》卷三十五《长沙王萧晃传》。

⑤ 《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兵部》七十引《三国典略》。

第十六章　刘宋元嘉末年的北伐和北魏的南征

第一节　宋文帝伐魏的决策及军事部署

一、宋廷的北伐谋议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以来，便积极图谋北伐。元嘉七年（430年），他为收复宋武帝死后被北魏攻占的黄河以南地区，以右将军到彦之为主力，出兵10万北伐。结果宋军大败而回，损失军队将近2万人，丢弃的甲仗器械无数，武库为之空虚。前去增援的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施尽计谋，才得以全军而退。刘宋经此大败，一时无力再举，遂整顿政治、恢复国力，以图再举。宋文帝北伐之志不曾懈怠，待国力稍见恢复后，立即着手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元嘉二十一年（444年），以左军将军徐琼为兖州刺史，由彭城（今江苏徐州）移镇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南），以大将军参军申恬为冀州刺史，移镇历下（今山东济南西）。次年，以武陵王、南豫州刺史刘骏为雍州刺史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接着，罢南豫州并入豫州，以南平王、南豫州刺史刘铄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今安徽寿县）。

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三月，北魏高梁王拓跋那等人率大军攻入刘宋边境，侵扰兖、青、冀3州，并掳走百姓4000余人，牛6000余头。宋文帝遂将北伐列入议事日程，向群臣咨询北伐之策。御史中丞何承天上《实边论》陈述己见，他提出如果想彻底解决北魏侵扰问题，应当“大田淮、泗，内实青、徐，使民有赢储，野有积谷，然后分命方、召，总率虎旅，精卒十万，使一举荡夷，则

不足稍勤王师，以劳天下”。又说：“奇兵深入，杀敌破军，苟陵患未尽，则困兽思斗，报复之役，将遂无已”。因此，他主张宜安边固守即所谓“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① 应该说，何承天的意见，较为切合刘宋对魏战争的实况。但宋文帝志在北伐拓境，未能采纳何承天的安边之策。彭城太守王玄谟迎合宋文帝，屡上疏陈述北伐，却大为宋文帝宠信。

元嘉二十五年（448年），宋文帝以彭城地当南北要冲，以武陵王刘骏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镇彭城。次年，以竟陵王刘诞为后将军、雍州刺史，镇襄阳。因襄阳为临魏境军事重镇，朝廷“欲广其资力，乃罢江州军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台税租杂物，悉给襄阳”②。这些措施都是为大举北伐而做的准备工作。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率大军10万南进，刘宋陈、南顿2郡太守郑琨，汝阳、颍川2郡太守郭道隐弃城而逃。拓跋焘围攻悬瓠（今河南汝南），守将陈宪率不足千人的守军奋力抵抗。魏军围攻40余日不能破城。刘宋救兵将至，拓跋焘遂撤围北还。

北魏撤军之后，宋文帝决定立即大举北伐。左军将军刘康祖以当年季节已晚，建议再等一年北伐。宋文帝则认为，“河北义徒并起，若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志”③。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进谏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请舍远事，且以檀（道济）、到（彦之）言之。道济再行无功，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将恐重辱王师，难以得志”④。宋文帝反驳说：“小丑窃据，河南修复，王师再屈，自别有以；亦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唯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则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馆谷吊

① 《宋书》卷六十四《何承天传》。

②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③ 《宋书》卷五十《刘康祖传》。

④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间，城守相接，虏马过河，便成禽也”①。宋文帝又令近臣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等人与庆之辩论。庆之愤然说：“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辈谋之，事何由济?”②当时，太子刘劭及护军将军萧思话亦固谏北伐之事不可遽行。宋文帝不顾群臣的反对，也不考虑他们反对北伐的理由，决意向北魏进军。

二、宋文帝的决策及进攻部署

刘宋北伐之前，宋、魏双方对峙于黄河以南由东向西的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今河南滑县西南）、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洛阳（今河南洛阳白马寺东洛水岸）、金墉（今河南洛阳东）、潼关（今陕西潼关北）一线。上述沿线各据点，皆为战略要地，当时都在北魏的控制之下。魏军凭借这些据点，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十分主动。刘宋则以从东至西的历下、彭城、寿阳、襄阳等战略要点为北伐基地，利用河、淮之间的泗（古水名，为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流经今山东、江苏两省）、颖（源出今河南登封西南，东南流）、济（古水名，黄河支流）、清（古水名，济水自巨野泽以下的别名）诸水，可以用舟师直捣河南，并可从水路运输辎重补给诸军。宋文帝北伐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夺回河南失地，因而宋军的进攻目标，即是黄河以南北魏据守的各战略要地。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七月，宋文帝下诏分3路大举北伐，诸军部署如下：

1、东路军6万人由辅国将军、青、冀2州刺史萧斌为统帅，以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谘议参军申坦等水军1万为先锋，经淮、泗入河，进攻碻磝、滑台等地。镇军将军、徐、兖2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率水陆继进，并兼统东路青、冀、

①②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徐、兖4州之军。

2、中路军以太子左卫率臧质率东宫禁兵，帅骁骑将军王方回、建武将军刘康祖、右军参军梁坦等步骑10万，直趋许昌（今河南许昌）、洛阳。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率所部后继配合。

3、西路军以雍州刺史随王刘诞为统帅，率所部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直向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统率所部袭扰汧（山名，在今陕西陇县西南）、陇（山名，在今陕西陇县至甘肃平凉一带）一带，威胁长安。

此外，宋文帝又特派太尉、江夏王刘义恭进驻彭城，统一调度诸军。

刘宋朝廷为补充兵力的不足，从尚书左仆射何尚之议，大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民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凡所发民丁，“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①。又募天下弓弩手，若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募者，加以厚赏。宋廷为了筹足军资，下令扬、南徐、兖、江4州富民家资满50万，僧尼满20万者，“并四分换一，过此率计，事息即还”②。从刘宋政权在战争开始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可以看出刘宋不仅在谋略上没有经过仔细的筹划，而且北伐的兵力和财力的准备，也是很不充分的。

第二节　北魏针对刘宋北伐的战略决策

一、北魏统一北方后的国势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灭掉北方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凉，统一了北方。

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建国开始，凭借其强大的骑兵四处征伐，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七月。

②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到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全部占有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的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广大地区。北魏政权在征伐和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非常重视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大量掠夺被征服民族的人口和牲畜，先后建立了代郡、漠南、河西3大牧场，还建立了平城畿内和大宁川两个农业基地。当漠南牧场建立数年之后，“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①。畜牧业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耕牛，农业又为畜牧业部落民提供了粮食，二者相互促进。北魏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数十万骑兵粮食和军用物资的供应，更解决了常年维持数十万匹战马的急需。随着北魏对北方的统一，生产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强大，北魏的国势极为强盛。

太武帝时期的北魏政权，也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拓跋氏以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少数族，君临于封建经济和文化发达的汉族居住地区，因为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阶级的各类矛盾严重存在，并交织在一起，社会极不安定，其统治不够稳固。同时，北方虽然地域辽阔，物产丰富，素为经济发达区，但连年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破坏还远远没有得到恢复。而且北魏的军事力量虽然强大，但连年征战，军队少有休整机会，士卒疲惫。因而北魏国势虽然强盛，但无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二、太武帝的反攻决策

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宋魏之间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拓跋氏逐渐强盛后，本有南进之心。刘宋永初三年（422年），宋武帝刘裕病死，明元帝拓跋嗣即乘机南进，攻占了刘宋的河南之地。太武帝即位，想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继而向南扩展领土，曾几次派兵南进，袭扰刘宋边境。北魏太平真君十年（449年），太武帝亲率大军大破柔然，俘获柔然人户畜产百余万，柔然从此一蹶不

① 《魏书》卷一百零三《高车传》。

振。太武帝除掉后顾之忧后，遂转过头来全力对付刘宋。

当太武帝闻刘宋将大举北伐，遣使与宋文帝书，带着轻视和讥笑的语气说："彼（指宋文帝）年已五十，未尝出户，虽自力而来，如三岁婴儿，复何知我鲜卑常马背中领上生活。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猎白鹿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来远，或不服水土，药自可疗"①。这封信反映出北魏太武帝仗恃其强大的骑兵武力，根本不把刘宋北伐军放在眼里。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 年）七月，刘宋 3 路大军北伐。北魏群臣闻知，皆请太武帝出兵救援与刘宋接壤的各据点。但太武帝却说："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展至十月，吾无忧矣"②。于是北魏按兵不动，至九月，太武帝令太子拓跋晃率兵屯于漠南（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防备柔然，随后亲率大军，号称百万，大举南征。

第三节　战争经过

（参见附图 7）

一、刘宋三路北伐及战争初期的胜利

宋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七月，当宋魏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宋处于战略进攻，北魏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在战争初期，刘宋三路大军进展顺利，取得了程度不同的胜利。

七月中旬，宋东路军向魏军发起攻击，青、冀 2 州刺史萧斌部下建武司马申元吉率军猛攻碻磝，北魏碻磝戍主、济州刺史王

---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宋纪七》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七月。

买德弃城逃跑，宋军占领碻磝。与此同时，萧斌遣将军崔猛进攻魏青州刺史张淮之镇守的乐安（今山东广饶北），张淮之亦弃城而逃。宋军又攻占乐安。萧斌进驻碻磝，亲临前线指挥，命王玄谟部沿河西攻滑台。王玄谟命钟离太守垣护之领百舸为前锋，进占滑台西南120里处的石济津（黄河渡口），全军进攻滑台。王玄谟军士卒众多，器械精良，魏滑台岌岌可危。

同时，豫州刺史刘铄所率中路军，也向魏境展开进攻。刘铄命中兵参军胡盛之、到坦之分两路会攻长社（今河南长葛东）。魏长社戍主、荆州刺史鲁爽败走，宋军攻克长社。接着，宋幢主王阳儿、张略等进据小索（古城名，在今河南荥阳）。北魏豫州刺史拓跋仆兰闻知，率步骑2000从大索（古城名，在今河南荥阳，距小索城四里许）阻击宋军，被王阳儿击败。到坦之等进占大索，仆兰逃奔虎牢。于是，刘铄又派安蛮司马刘康祖率军为到坦之部后继，合军进攻虎牢。

当宋东、中两路军发起进攻时，西路军积极配合。八月，雍州刺史刘诞派中兵参军柳元景率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鲁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广威将军田义仁等众军，自襄阳分头北进。闰十月，西路军大败魏军，攻占弘农（今河南灵宝北）。随后，薛安都、鲁云平、尹显祖等人进攻魏陕城（今河南三门峡西）。北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步骑2万赴援，与宋军展开激战。薛安都等大败魏军，斩首3000余级，俘虏2000余人。攻克陕城，阵杀魏军统帅张是连提。西路军另一部庞法起军在薛安都等人进攻陕城之时，率军一举攻占潼关。这时“关中诸义徒并处处锋起，四山羌、胡咸皆请奋”①。西路军的胜利，使北魏关中摇动，这对宋军的北伐非常有利。

---

①《宋书》卷七十七《柳元景传》。

二、宋将王玄谟的滑台溃败

当刘宋各路北伐大军进展顺利之时，东路军王玄谟部以精锐之师，围攻滑台数十日之久，却未能攻克。玄谟军围攻滑台之初，众将士以城内多茅草房，建议用火箭射城内，引燃茅房，使城内军民惊慌，宋军乘势攻城。玄谟不许。十月，北魏救兵将至滑台，钟离太守垣护之建议强攻，以便迅速破城。他写信给玄谟说："昔武皇（指刘裕）攻广固，死没者亦众。况事殊曩时，岂得计士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①。玄谟又不采纳。众将士再建议发车为营，以抵抗魏骑兵救援，玄谟仍拒不采纳。王玄谟一再拒绝正确的意见，多次失去战机，屯兵滑台近3个月而无所获。

闰十月初七日，魏太武帝大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浚县西，位置在滑台以西古黄河北岸），立即派殿中尚书长孙真率骑兵5000自石济津渡过黄河，切断宋军退路，以防止王玄谟军逃跑。又派关内侯陆真乘夜率数人潜入滑台城，抚慰守城将士，并登城察看宋军动静，然后连夜回营还报太武帝。次日，太武帝亲临前线，率大军渡河，直逼宋军。魏军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军势甚盛。王玄谟见北魏大军逼近，惊慌失措，弃军逃跑。宋军失去主将，阵势大乱。魏军乘势进攻，斩首万余级，缴获军资器械无数。太武帝进驻东平（今山东东平东）。魏军遂以缴获宋军的战船，用铁索相连，在黄河上组成3道封锁线，企图截断滑台以西垣护之率领的宋军。王玄谟败逃，顾不上告知垣护之，因而垣护之得知宋军败退时，退路已被魏军截断。垣护之急命部下乘河水迅猛，顺流而下，如遇拦截铁索便以长斧砍断。在垣护之率领下，宋军将士奋勇作战，全军冲破封锁线退还，仅损失一艘战船。

王玄谟狼狈逃回碻磝，手下将士死亡殆尽。东路军主帅萧斌

---

①《宋书》卷五十《垣护之传》。

大怒，欲将王玄谟斩首，经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力劝乃止。萧斌见前锋已败，准备亲率主力固守碻磝。沈庆之劝他说："夫深入寇境，规求所欲，退败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虚弱，而坐守孤城，若虏众东过，青东非国家有也"①。正在这时，宋文帝诏书至，不许萧斌后退。沈庆之仍坚持退军说："阃外之事，将所得专，诏从远来，事势已异"②。于是萧斌重新部署诸军，以王玄谟守碻磝，申坦、垣护之守清口（今山东东平西，为清水入黄河之口），自率诸军还驻历城（今山东济南西）。这时东路军的失败，已成定局。此后，总统北伐军事的太尉刘义恭以碻磝孤城，必不可守，召令王玄谟退军，碻磝落入魏军手中。

宋文帝认为东路军败退，魏兵深入南境，西路柳元景等军不宜独进，遂令其撤退。于是弘农、陕城、潼关又为魏占有，西路军所取得的辉煌成果，遂付之东流。刘宋东路军的败退，实际上影响了整个北伐战局，此后北魏发起全面进攻，刘宋则由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守。

三、魏军渡淮大举南进

魏军反攻初胜后，太武帝遂命诸将分兵5路大举南下：

1、征西大将军、永昌王拓跋仁自洛阳向寿阳（今安徽寿县）；

2、尚书长孙真向马头（今安徽怀远南）；

3、楚王拓跋建向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

4、高凉王拓跋那自青州（魏青州治今山东广饶）向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5、太武帝亲率主力自驻地东平（今山东东平东）向邹山（今山东邹城东南）。

十一月初，太武帝大军进攻邹山，宋戍主、鲁阳阳平2郡太

①②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守崔邪利投降。太武帝进驻邹山。

与此同时，楚王拓跋建军进驻彭城门户萧城（今安徽萧县西北），另军步尼公进屯彭城另一门户留城（今江苏沛县东南）。镇守彭城的宋武陵王、徐兖2州刺史刘骏与驻在彭城节度北伐诸军的江夏王、太尉刘义恭派参军马文恭、军主嵇玄敬率军分别进至萧城、留城，观察魏军的动向。马文恭、嵇玄敬2军先后与魏军遭遇，马文恭军大败，文恭只身逃回。嵇玄敬军由于当地百姓的协助，取得胜利，魏军遭到失败。当时，萧城魏军距彭城仅10里之隔，彭城守军虽多，但军粮匮乏，形势十分危急。刘义恭欲弃城南逃，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力谏不可。他说："今城内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关扃严固，欲去莫从耳。若一旦动脚，则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罄，量其欲尽，临时更为便宜，岂有舍万安之术，而就危亡之道"①。刘骏认为张畅所言有理，也劝义恭留镇彭城。刘义恭才决意坚守彭城。太武帝率大军进至彭城，宋军据城固守，魏军不能克。

魏永昌王拓跋仁率骑兵8万，自洛阳南进，连克宋悬瓠、项城（今河南沈丘），直趋寿阳。宋文帝恐镇守寿阳的豫州刺史刘铄被围，遂急令已向虎牢的安蛮司马刘康祖返回寿阳。康祖得令后火速回师，在寿阳北数十里处，被拓跋仁的8万大军追及。康祖军仅有8000之众，军副胡盛之建议傍山依险，从小路返回寿阳。康祖大怒，说："寇今自送，不复远劳王师，犬羊虽多，实易摧灭。吾兵精器练，去寿阳裁数十里，援军寻至，亦何患乎"②。遂命将士结车营沿大道向寿阳进发。魏军仗恃人多，四面夹攻宋军，康祖率军奋战一天一夜，杀敌万余人。魏军又分为3批，轮番进攻，并以马匹运草火烧宋军车营，康祖激励将士，拼死决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康祖身被10创，中流矢坠马而死。北魏拓跋仁军围攻寿阳，并分兵袭扰宋马头、钟离等地。宋刘铄命将士烧

① 《宋书》卷五十九《张畅传》。

② 《宋书》卷五十《刘康祖传》。

掉寿阳四周庐舍，凭坚城固守。

十一月底，魏军各部进抵淮水一线。太武帝见彭城、寿阳等坚城急攻难下，遂决定置宋孤城不顾，渡淮南进，兵锋直指长江。

十二月初一日，北魏诸军渡淮南进：高凉王拓跋那出山阳（今江苏淮安）、永昌王拓跋仁出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中书郎鲁秀出广陵（今江苏扬州），太武帝自率大军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瓜埠）。魏军未带军粮，沿途本以抄掠为食。渡淮后得知宋盱眙（今属江苏）城有储粮，便猛攻盱眙。盱眙太守沈璞与辅国将军臧质奋力抵抗，魏军攻城不下，便绕城而过，继续南进。魏军沿路烧杀抢掠，刘宋许多城邑守将望风奔逃。十二月十五日，太武帝军抵达瓜步，与建康隔江而对。

四、魏军因“天堑难越”而退军

魏军到达长江北岸后，大拆民房，割筆造筏，声言渡江。建康震动，宋廷上下一片恐慌。宋文帝命令建康内外戒严，悉发丹阳（治建康）地区丁壮为兵，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建康津要，派水军沿江巡逻，“上接于湖，下至蔡州，陈舰列营，周亘江畔，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①。文帝又命太子刘劭总统水军，出镇石头城（今南京城西），丹阳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总统军事。文帝悬重赏购太武帝君臣首级，斩太武帝首级者，封八千户开国县公，赏布绢各万匹，金银各百斤。又募人将毒酒置江北空村中，欲以毒死魏军将士。

太武帝虽声言渡江，其实是虚张声势。魏军逞一时兵威，从黄河北岸一直打到长江北岸，连过刘宋青、冀、兖、徐、豫、南兖 6 州，沿途烧杀抢劫，遭到江淮人民的强烈反抗，他们纷纷以

---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坚壁清野对抗魏军。魏军抄掠无所得，军资奇缺，人马饥乏。同时魏军屯长江北岸，前有长江天堑，没有强大水师无法渡江，后有刘宋6座州治坚城未破，难免有后顾之忧，而且沿路征战，士马损失过半，因而魏军此时已是强弩之末，退兵乃是大势所趋。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正月初一，太武帝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初二，魏军掠民户5万余户，焚庐舍撤军北还。魏军在返回途中为了解决军粮，再次围攻盱眙，守将臧质率领将士英勇抵抗。魏军先后筑长围，施以钩车、冲车等器具连续攻城，宋军以相应办法抵抗。魏军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坠而复升，莫有退者，杀伤万计，尸与城平”。魏军猛攻20余日，盱眙岿然不动。二月二日，太武帝因北魏军中多疾疫，又有人告以宋廷命彭城守军断其归路，并遣水军自海入淮来攻，遂撤盱眙之围北还。

魏军路过彭城时，刘义恭畏惧不敢截击，魏军驱迫掳掠来的民户万余口宿于彭城几十里处的安王陂，诸将皆请出击，义恭不许。次日，宋文帝诏令义恭全力追击魏军，义恭才遣将追击。魏军已得知此讯，将万余口百姓全部杀掉，平安撤回魏境。这场持续半年多的宋魏战争，以刘宋失败而告结束。

第四节　战争胜败原因及其影响

刘宋元嘉末年的宋魏战争，以刘宋的主动北伐而开始，又以刘宋的最后失败而告终。刘宋不仅没有能收复河南失地，反而使魏军长驱直入，大片领土遭魏军蹂躏。北魏在战争中，采取的是前期防御、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兵锋南向，饮马长江是它的既定目标。因而在时机成熟之后，北魏立即以数十万骑兵反击，扫荡刘宋江淮6州之地，直逼刘宋京师建康，宋军无力反击，魏军最后主动撤军。魏军是这次战争胜利的一方，刘宋是失败的一方。

这次战争以南败北胜的结局告终，不是偶然的。战争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较量，宋魏双方在这些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先看刘宋，从政治上看，刘宋初年虽号称盛世，但东

晋以来君权衰弱、权臣专制朝政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宋文帝本人就是在权臣徐羡之、谢晦等人策划的宫廷政变中登上皇帝宝座的。权臣功高震主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宋文帝。如功高位重的名将檀道济，曾参与宫廷政变，而身遭猜忌被杀，这就导致了刘宋北伐时缺乏将才，不得不以庸才将领统兵。而且宋文帝唯恐军权旁落，不敢放手使用将帅，"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①。这实际上等于捆住了将帅手足，很难发挥他们的指挥才能。刘宋初年所谓"财阜人丰"的"小康"局面，只不过是与乱世比较而言，其经济实力不足以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所以临战还须向全境富民借贷军资。从军事上看，刘宋兵力不足，靠临战征发庶民补充，缺乏军事训练，战斗力很差，加之刘宋军队多为水军、步兵，缺乏战斗力较强的骑兵，因此从整体上说，刘宋的军事实力远不如北魏强大。刘宋担任主攻方面的前锋王玄谟，本无大将之才，因其迎合文帝极力主张北伐，而被委以重任。但他既无谋略又无胆识，刚愎自用，临战不采纳正确意见，先是坐失战机，继而惊慌失措，弃军南逃，导致东路宋军溃败，牵动北伐全局。而宋文帝的遥控指挥，常常是"诏从远来，事势已异"②，这些都成为刘宋北伐失败军事上的主要原因。

反观北魏，政治上虽不甚稳定，但毕竟完成了北方统一大业，表面上有一个安定的局面，而且北魏中央王权强大，对军队征调指挥自若。在经济上，北魏在农业畜牧业方面都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北方地大物博，又新破柔然，补充了大批人力物力。在军事上，北魏有数十万久经战阵的强悍骑兵，其战斗力很强。亲临前线指挥的太武帝富有军事天才，知己知彼，正确地采用后发制人的战略，选择有利于己方的秋季反攻，善于利用骑兵优势，敢于绕过坚城，迂回纵深穿插南下，此种战略战术大获成功。这些决定了这次战争以北魏胜利而告结束。

---

① 《宋书》卷五《文帝纪·史臣曰》。

② 《宋书》卷七十七《沈庆之传》。

这次战争给宋魏双方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刘宋方面，不仅未能收复失地，反而丧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魏军南进所过州郡，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史称："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①。又说："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②。经此一战，刘宋国力大为削弱，"元嘉之治"遂告结束。此后，南朝历代内乱迭兴，战祸不已，没有超过元嘉之政者，南弱北强的局面逐渐形成。

对于北魏来说，虽然其战争获胜，也曾饮马长江，直逼刘宋京师。但除了显示其兵威以外，也未能获得实际利益，最后还要返回河南之地。而且北魏统一不久，被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远未恢复。经过这次战争，魏军死伤过半，国力也被削弱，国内矛盾更趋尖锐。不过由于以后历代魏帝尚能励精图治，特别到孝文帝更是锐意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从而使北魏中期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人口大为增加，因而南北国势继续沿着北强南弱的形势发展下去。

① 《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正月。

第十七章　刘宋内乱诸战

第一节　刘宋政权发生内乱的原因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曾以权臣身份专制东晋朝政，后继而代晋称帝。他鉴于东晋王朝君权衰弱，权臣擅政，门阀士族势力强盛，州镇刺史拥兵自重举兵向阙等诸多弊端，曾在中央起用寒人典掌机要，在地方上专用宗室诸王出任重要方镇，以期巩固刘氏王朝的统治。刘裕临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①。又以“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②。因此，刘宋时期，荆、南徐、南兖、江州等重要州镇一般皆由宗室诸王担任刺史，并带都督号，既治民又带兵，掌管一州或数州的军政大权，成为该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

刘裕此举在于加强宗室藩卫中央的能力，其结果却导致了宗室诸王争夺皇位的争斗，并由此演变成为宗室之间的骨肉相残。在刘宋短短 60 年的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幕宗室内乱的闹剧。

刘宋初期，刘裕父子力行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都有所好转，特别是维护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也有所加强。但自元嘉末年刘宋北伐失败以后，中军受到很大损失，从而直接削弱了维系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在中军力量不足以威慑地方重镇的情况下，刘宋京师建康经常处于大州方镇的威胁之下，不过这种威胁不像东晋主要来自异姓权臣，而是来自宗室诸王。

刘宋各宗王方镇都拥有强兵劲旅，所谓“群蕃岳峙，锐卒精

① 《宋书》卷六十八《南郡王刘义宣传》。

② 《宋书》卷七十八《刘延孙传》。

旅，动有万计”[1]。他们独揽一方大权，在中央集权力量衰弱时，常心怀叵测，图谋控制朝政，甚至觊觎皇位。尤其是处于有利地理位置的某些大州，如荆、江、南兖、南徐 4 州，多为宗王起兵叛乱的据点。

荆州，治江陵（今属湖北荆沙），为南朝长江中游的著名大州，与长江下游京师所在地的扬州齐名，所谓“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2]；“江左大镇，莫过荆、扬”[3]。刘宋时，因“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刘裕）使诸子居之”[4]。实际上，以后齐、梁各代，均沿袭宋制。因而居于荆州的宗王，凭借地利、甲兵、财富，常起兵问鼎。以致形成像杜佑所说的南朝荆州“兵强财富，地通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5] 的局面。

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地理位置介于荆州与扬州之间，为晋初分扬、荆 2 州 10 郡所置。刘宋时辖 9 郡，共有 5 万余户，37 万余口，是江南仅次于荆、扬的大州。因为江州地理位置重要，杜佑称其为“中流襟带，常为重镇”[6]。

南徐州，治京口（今江苏镇江）。东晋以来，南徐州是北来侨民聚居之地，民风劲悍，为东晋精兵“北府兵”的发源地。史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7]。南徐州为京师建康东面门户，“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即建康）之危立至”[8]。因而刘裕临终时，遗诏京口重镇“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①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② 《宋书》卷六十六《何尚之传》。

③ 《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

④ 《宋书》卷五十一《临川王刘义庆传》。

⑤ 《通典》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典十三》。

⑥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州郡典十二》。

⑦ 《世说新语》中卷下《捷悟篇》注引《南徐州记》。

⑧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五。

南兖州，宋初治京口，元嘉八年（431年）以后，移治广陵（今江苏扬州）。南兖州为建康东北面门户，为南下北上的军事要冲，其地民风与京口相似。

由于上述4州地势有利，军力强大，所以刘宋时期宗王的内乱，几乎就在这几个地区轮流发生。刘宋元嘉以后，政治渐趋腐败，皇帝一即位常杀戮宗室，宗王之间争权夺利，上下互相猜忌，离心离德，这种情况更加助长了宗王叛乱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刘宋宗王的叛乱，伴随着刘宋王朝的覆灭才告结束。

第二节　柳元景等征刘劭之战

刘宋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子刘劭知文帝将废己另立太子，乃集合平日蓄养的东宫劲卒2000余人，使亲信张超之率领，冲入宫内杀死其父宋文帝，并杀掉文帝近臣徐湛之、江湛等人，自己即位称帝。由此揭开了刘宋骨肉相残、内乱纷争的序幕。

刘劭是宋文帝的长子，6岁被立为太子。文帝为保证刘劭的太子地位，使“东宫置兵与羽林等”①。后来怕有内乱，又“辄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②。刘劭为太子多年，与异母弟刘濬交好，二人“並多过失”③。刘劭怕其过失被文帝知道，便迎奉女巫严道育，先是让她祈祷自己的过错不被文帝发觉。后又作宋文帝像，埋于宫内，希望文帝早些死掉。事泄，文帝准备废刘劭另立太子，刘劭遂杀父自立。

这年三月，文帝第三子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在讨伐蛮族前线西阳五洲（今湖北蕲水西）起兵，以沈庆之领府司马，以柳元景为谘议参军领万人为先锋，回师讨伐刘劭。宋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会稽太守随王刘诞、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等皆

①②③《宋书》卷九十九《元凶刘劭传》。

起兵响应，共向京师。刘骏并传檄四方，共同讨伐刘劭，“州郡翕然响应”。

刘劭自以素习武事，狂妄轻敌，闻知刘骏等人起兵，对朝士说：“卿等但助我理文书，勿措意戎阵。若有寇难，吾当自出”①。并下令京师内外戒严，刘劭以其妃的父亲殷冲掌管文符，左卫将军尹弘掌管军旅，领军将军萧斌总统众事。萧斌等人劝刘劭亲率水军溯江而上迎击义军，如不能胜，再退据梁山（今安徽当涂西南），以保京师。江夏王、大将军刘义恭对刘劭心怀不满，怕刘骏军仓促起事，船舫陋小，不利水战，便向刘劭进言说：“贼骏（指刘骏）小年未习军旅，远来疲弊，宜以逸待之。今远出梁山，则京师空弱，东军（指随王刘诞军）乘虚，或能为患。若分力两赴，则兵散势离，不如养锐待期，坐而观衅，割弃南岸，栅断石头，此先朝旧法，不忧贼不破也”②。萧斌厉色曰：今荆、江、雍三路军同据上流，沈庆之、柳元景等甚习军事，屡立战功，形势紧急，“唯宜及人情未离，尚可决力一战，端坐台城，何由得久”③。刘劭认为刘义恭的建议正确，拒不采纳萧斌意见，按兵不动。有人劝刘劭固守石头城（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素为防守建康的军事重镇）。刘劭认为以往守石头城，是等候勤王援军，“我若守此，谁当见救？唯应力战决之，不然不克”④。刘劭每日亲身视察军队，慰劳将士，督造战舰，又焚烧秦淮河南岸民房，驱迫百姓迁居水北，“欲阻淮以自固”，准备同刘骏等义军在台城以南秦淮河一线决战。

刘骏所部前锋柳元景军，本以己方水军皆为小船，怕与刘劭水军作战。但直至芜湖（今属安徽），并未见敌水军前来迎战。元景大喜，遂令部下倍道兼行，途中听说敌军从石头城开出战舰，便命将士避开敌水军，于江宁（今江苏南京西南）弃舟登岸。四月十九日，元景军进至新林（今江苏南京西南），命宁朔将军薛安都率骑兵进驻秦淮河南岸。四月二十一日，柳元景率军潜行至新亭

---

①③④ 《宋书》卷九十九《元凶刘劭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七《宋纪九》文帝元嘉三十年四月。

（今江苏南京南）依山据险修筑营垒，观敌动静。这时，刘骏派出的龙骧将军程天祚部赶至，在柳元景驻地东南据高丘修筑营寨，两军成犄角之势。建康城中军民见义军兵临城下，人心惶惶，纷纷出城归降义军，并劝柳元景迅速攻城。善于用兵的柳元景却说："不然。理顺难恃，同恶相济，轻进无防，实启寇心。当倚我之不可胜，岂幸寇之不攻哉！"① 遂按兵待时，以便乘间破敌。

当柳元景初至新亭时，刘劭龙骧将军鲁叔儿建议趁其营垒未立，即刻发动进攻，刘劭不许。次日，刘劭才使萧斌统步兵，褚湛之统水军，与鲁秀、王罗汉等精兵万人，进攻柳元景新亭垒。刘劭身登朱雀门（建康南门）亲自督战。柳元景至新亭后，料定敌军必来进攻，于前一天夜间传令："鼓繁气易衰，叫数力易竭。但各衔枚疾战，一听吾营鼓音"②。刘劭部下因得重赏，皆殊死搏战。柳元景虽水陆受敌，但毫不畏惧，督率将士拼死抵抗，使身边随从全部出战，只留下数人传达命令。两军激战之间，鲁秀误击退兵鼓令，"劭众遽止"。元景乘势命军士开垒猛攻，刘劭军大败，坠淮死者甚众。刘劭率亲随来攻元景营垒，元景再次破之。劭军兵士退逃，刘劭手斩退者，亦不能禁。刘劭仅以身免，奔逃入城。刘劭步兵统帅萧斌臂为流矢所伤，水军统帅褚湛之率其二子与檀和之归顺义军。柳元景指挥的新亭垒之战，奠定了平定刘劭之战的基础。刘劭败回台城（建康宫城）后，焚烧京都将士军籍，放免军户为民，以鼓舞士气。这时，江夏王刘义恭见有机可乘，也逃归义军。

五月，响应刘骏起兵的会稽太守、竟陵王刘诞遣参军刘季之与宁朔将军顾彬之同刘劭殿中将军燕钦、太保参军庾道二军战于曲阿（今江苏丹阳），刘劭军大败。与此同时，豫州刺史刘遵考遣其将夏侯献之率步骑五千进至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瓜埠），雍州刺史臧质率义军 2 万亦至新亭。刘劭见建康危急，命人断绝水路，缘秦淮河竖船舶为楼，多设大弩。因当时男丁已尽，发妇女供役。

---

①② 《宋书》卷七十七《柳元景传》。

五月三日，义军攻破大航（即朱雀航，建康南门外之浮桥）。刘劭“缘渚幢队，以次奔散，器仗鼓盖，充塞街衢”①。萧斌知大航不守，令所部解甲归降，被斩于军门。五月四日，义军进攻台城，刘劭军主徐兴祖、罗训等来降，义军诸部分别从台城各门攻入。刘劭穿墙逃入武库井中，被义军捉杀。刘濬南逃，被江夏王刘义恭所杀。至此，刘劭之乱遂告平定。

在柳元景新亭大捷后，武陵王刘骏称帝，是为宋孝武帝。孝武帝进入建康后，尽杀刘劭四子及刘濬三子。刘劭叛乱时，宗室长沙王刘瑾（刘义欣子）、刘瑾弟刘楷、临川王刘烨（刘义庆子）、桂阳侯刘觊（刘义融子）、新渝侯刘玠（刘义宗子）皆下狱死。当江夏王刘义恭投靠义军时，其十二子皆被刘濬所杀。

第三节　沈庆之伐竟陵王刘诞之战

刘宋大明三年（459 年），孝武帝刘骏任命义兴太守垣阆为兖州刺史，命他与给事中戴明宝率羽林禁兵以赴任为名，偷袭被其猜忌、怀有异心的竟陵王、都督南兖、南徐等 6 州诸军事、南兖州刺史刘诞。事泄，刘诞遂据州治广陵（今江苏扬州）反叛，焚兵籍放免兵户，又赦免南兖州作部刑徒和囚犯充兵，并大破垣阆军，击杀垣阆，戴明宝逃回京师。孝武帝起用 70 高龄的老将沈庆之为使持节、都督南兖、徐、兖 3 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命其率兵进讨刘诞。南兖州距京师不远，孝武帝命内外戒严，亲率禁兵出屯宣武堂。

刘诞为宋文帝第六子，在平定刘劭之乱中立有大功。此后，在孝武帝平定南郡王荆州刺史刘义宣、江州刺史臧质、南豫州刺史鲁爽等人的叛乱中，刘诞以侍中、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居中主持平叛大事，又立殊功。刘诞功高位重，渐遭孝武帝猜忌，先出

① 《宋书》卷九十九《元凶刘劭传》。

任南徐州刺史，后以南徐州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离建康太近，被改任南兖州刺史。刘诞既见猜疑，亦暗中防备，以北魏军寇边为由，修筑城隍（城墙和城壕），聚敛粮草兵器。到大明三年（459年），君臣之间终于以兵戎相见。

沈庆之率大军进至广陵，豫州刺史宗悫、徐州刺史刘道隆等率兵来助，皆受沈庆之指挥。刘诞焚烧城外村邑，将百姓赶入城内，闭门固守。孝武帝怕刘诞北逃，命沈庆之断其北走之路。于是沈庆之移营至离广陵18里的白土，又进占广陵城外的新亭。刘诞见朝廷众军大集，果然弃城逃跑，留中兵参军申灵赐守城，自率亲信数百人，诈称出战，出北门后掉头东去，直奔通往海陵郡（治今江苏泰州）的大道。沈庆之闻讯，派龙骧将军武念前去追赶。刘诞东走10余里，部下皆不欲远去，劝刘诞还城固守。其亲信杨承柏拉住刘诞乘马说："死生且还保城，欲持此安之？速还尚得入，不然败矣"①。这时，沈庆之别将戴宝之单骑驰至，挥矛险些将刘诞刺倒，刘诞恐惧，退还广陵。

不久，右卫将军垣护之、左军将军崔道固、屯骑校尉庞孟虬、虎贲中郎将殷孝祖等军，破北魏后还师广陵。孝武帝遂命上述诸军统归沈庆之指挥，并从京师派屯骑校尉谭金、前虎贲中郎将郑景玄率羽林兵进至广陵，也由沈庆之节制。庆之命诸军填塞壕堑、修筑土山高楼，造制攻具，准备攻城。

沈庆之大军进逼广陵，城中人心浮动，刘诞部下将士纷纷出降。刘诞派兵出战，先遣兵千余人开北门攻打强弩将军苟思达营垒，被龙骧将军宗越击败。再开东门攻打刘道隆营，被殷孝祖及沈攸之等军击败。此后，刘诞还先后派兵出东门攻宋军刘道产及刘勔营，皆被沈攸之击破。刘诞军出战数次，无一胜绩。

孝武帝急欲破城，催沈庆之攻城，又命其修筑烽火台3座，如攻克广陵外城，即点一烽火为号，如克内城，即举二烽火，如擒获刘诞，则举3烽火为号。孝武帝玺书催督进攻，使者前后相继。

---

① 《宋书》卷七十九《竟陵王刘诞传》。

时值久雨，沈庆之无法攻城。自四月至七月，城犹未拔。孝武帝准备亲自率军出征广陵，经江夏王、太宰刘义恭力谏乃止。

七月，沈庆之率大军进攻，身先士卒，不避矢石，众军奋勇而进，遂克广陵外城。乘胜再进，又克内城。刘诞闻朝廷军队进城，与亲信申灵赐逃至后园，被沈庆之军队主沈胤之杀死，刘诞之乱平定。

沈庆之军队入城后，诛刘诞同党，又将城内男丁五尺以上全部杀戮，死 3000 余人，聚其首于石头南岸为京观纪功。城中女口作为军赏，赐与将士。广陵无辜百姓成为刘宋内乱的牺牲品。

第四节　宋明帝讨晋安王刘子勋之战

刘宋大明八年（464 年），孝武帝死，其子刘子业继位，是为前废帝。前废帝即位后，残害骨肉，杀戮大臣。永光元年（465 年）八月，前废帝率宿卫兵诛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及其四子、尚书令、骠骑将军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及其四子。朝中人人自危。次年十二月，前废帝被亲信主衣寿寂之、外监典事朱幼、中书舍人戴明宝等同盟十余人杀死。建安王刘休仁等拥立宋文帝第十一子、湘东王刘彧为帝，是为宋明帝。

前废帝未死之时，宁朔将军何迈密谋废掉前废帝，改立前废帝之弟、晋安王江州刺史刘子勋为帝。事泄，何迈被杀。前废帝以刘子勋为孝武帝第三子，而宋文帝、孝武帝皆以第三子的身份登上帝位，心怀猜忌。因而他便以何迈事为由，遣朱景云送毒药赐刘子勋死。朱景云到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西）后，刘子勋的典签谢道迈等人将此事告诉实际掌握江州权力的长史邓琬。邓琬遂拥奉刘子勋起兵反抗，欲“指率文武，直造京邑，与群公卿士，废昏立明”①。他以子勋名义，宣布江州戒严，征集诸郡兵

① 《宋书》卷八十四《邓琬传》。

丁，收敛兵器，10天之间得甲士5000人，出屯大雷戍（在今安徽望江境内），构筑营垒。子勋使谘议参军领中兵陶亮总统军事，并释被前废帝抓捕进京的前军长史、荆州行事张悦之罪，任其为司马，与邓琬共掌众事。

正当刘子勋、邓琬欲起兵反抗前废帝时，前废帝突然被杀。明帝即位，子勋进号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佐吏闻知此事都很高兴，但邓琬却认为刘子勋排行第三，有帝王之命，遂与陶亮等人拥立子勋于寻阳即帝位，并修制兵器，传檄四方，与明帝相对抗。由于刘子勋为孝武帝之子，继帝位名正言顺，所以安陆王郢州刺史刘子绥、临海王荆州刺史刘子顼、寻阳王会稽太守刘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晋陵太守袁标、义兴太守刘延熙等众多州郡皆起兵响应。一时间所谓“普天同逆”①，仅京师所在地丹阳郡还在明帝朝廷控制之中，“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②，明帝的统治万分危急。

泰始二年（466年）正月，即子勋称帝当月，明帝任建安王刘休仁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领军将军王玄谟为其副，率水军南讨；以兖州刺史殷孝祖为前锋部督，统率寻阳太守沈攸之、宁朔将军江方兴等诸军先进据虎槛（洲名，在今芜湖西南），抵御江州叛军。与此同时，明帝遣辅国将军刘勔率宁朔将军吕安国等军西讨响应子勋的豫州刺史殷琰，以山阳王刘休佑为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总统西讨诸军。又以巴陵王刘休若统率建威将军沈怀明、尚书张永、辅国将军萧道成等诸军东讨起兵响应子勋的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孔觊及顾琛、王昙生、刘延熙等人。

刘子勋、邓琬起兵后，即命谘议参军孙冲之率陈绍宗、胡灵秀、薛常宝等军共万人为前锋，自大雷戍顺流而下，进据赭圻

---

① 《宋书》卷八十六《殷孝祖传》。

② 《宋书》卷八十《晋安王刘子勋传》。

（在今安徽繁昌西赭圻岭下），向建康进发。同时命陶亮所统率郢、荆、湘、梁、雍等5州军主共2万人，以为后继。陶亮闻知刘休仁亲率大军来战，又见殷孝祖等军将至，不敢前进，屯於鹊洲（在今安徽铜陵至繁昌江中）。

三月，宋廷前锋都督殷孝祖率军从水陆二路进攻赭圻，陶亮引军来救，宋军大败，殷孝祖中流矢而死。孝祖所属军主范潜等500人投降陶亮。当时宋廷派出的东路军已平定东部地区，江方兴军还至虎槛。坐镇虎槛的刘休仁派江方兴与龙骧将军刘灵遗各率3000人增援赭圻。这时，深为众将所服的沈攸之认为，殷孝祖阵亡，敌军士气大增，必须立即继续发动进攻，不能示弱以长敌锐气。但沈攸之恐与其名位相亚的江方兴不肯受他指挥，为了顾全大局，他亲率众军主去拜会江方兴，请他总统军事。江方兴欣然允诺。次日，沈攸之与江方兴合军一处，向赭圻敌军发动猛攻，大破敌军，斩首数千级。陶亮、孙冲之退至鹊尾（今安徽繁昌东北），留薛常宝守卫赭圻。刘休仁使沈攸之代殷孝祖为前锋都督。

邓琬又派其豫州刺史刘胡率铁骑2000，水步军3万增援鹊尾。刘胡为当时宿将，屡立战功，素负盛名，为时人所推服。沈攸之等军不敢轻动。明帝朝廷物资缺乏，前方军用不足，但刘休仁亲身抚慰将士，与其同甘共苦，因而前方军队10万之众，未因此离散。正好这时辅国将军吴喜平定三吴地区之后率兵5000人来到赭圻，带来不少军粮辎重，缓和了休仁军缺粮的危机。

留守赭圻的子勋将薛常宝粮尽，向刘胡求援。刘胡将米袋系于浮木，又将浮木固定于船中心，然后佯装翻船，以便顺风流下赭圻，支援薛常宝军粮。三月二十九日，刘胡率步卒1万，乘夜掘山开路，以布袋装米运往赭圻。次日清晨，刘胡军开至赭圻，距城仅一壕之隔，即将入城。沈攸之挥军向刘胡发动急攻，双方展开激战。沈攸之身先士卒，马被刘胡骑兵刺中，幸亏马军主段佛荣等人来救，才得免于难。攸之军主刘沙弥轻骑冲入敌阵，力战而亡。攸之将士皆奋勇死战，终于大败刘胡军。刘胡受伤，其部下舍粮弃甲，缘山败走，攸之军乘胜追杀，杀伤甚众。刘胡既败，

薛常宝以孤军难守，决定突围撤回，并遣人告诉刘胡。四月四日，刘胡率兵数千人接应薛常宝突围。沈攸之率辅国将军沈怀明、军主周普孙、江方兴、申谦之等军全力截击。吴喜闻知，亦率军来助，双方皆殊死决战。攸之军幢主卜伯宗、张涣战死，吴喜险些被擒。刘胡军薛常宝、张继伯、胡灵秀、焦度等皆受重伤。经过一天激战，沈攸之军终于大胜，攻占赭圻。随后，刘休仁水军张兴世、吴喜等人又大破刘胡水军陈绍宗部，刘胡军退还鹊尾。

刘休仁自虎槛进驻赭圻，以便临近指挥战事。明帝为收揽人心，鼓舞士气，派吏部尚书褚渊至赭圻犒赏有功将士。又派强弩将军任农夫、振武将军武会仓、冗从仆射全景文、军主刘伯符等率军增援。

邓琬见赭圻失守，为了增强兵力，以刘子勋之命急令雍州刺史袁觊率雍州兵顺流而至寻阳。六月，邓琬以刘胡与沈攸之在鹊尾一带相持不下，加袁觊都督征讨诸军事，使其率楼船千艘、战士 2 万增援鹊尾，进驻浓湖（在今安徽芜湖西南，地在鹊尾下游）。

明帝龙骧将军张兴世见敌军增援，一时难胜，劝沈攸之以奇兵出敌背后断其后路。他说："贼据上流，兵强地胜。我今虽相持有余，而制敌不足。今若以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自固，随宜断截，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沮，中流一梗，粮运自艰。制贼之奇，莫过于此"①。沈攸之、吴喜等人皆赞成其计。宋明帝这时又派援军 2 万来相助，攸之乃分战士 7000 归张兴世统领。兴世命部下乘轻舸溯江上行，旋即撤退，一二日中，反复如此以疑敌，使其不备。并向沈攸之建议迅急攻占上流险要钱溪（今安徽贵池东梅根港，在浓湖上游）。沈攸之令张兴世乘夜率水军溯江而上，进至鹊尾。刘胡发现，遣胡灵秀等军于东岸沿江监视张兴世军。兴世为了摆脱敌军监视，于次日黄昏宿于江浦（今安徽铜陵北），胡灵秀等亦驻军不动。兴世却暗中遣部下黄道标率领战船 70 艘，乘

① 《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夜潜往钱溪，修筑营寨。第二日，张兴世大军齐集钱溪。刘胡见自己退路及运输线被断，亲自率领水步 26 军来攻。兴世部下欲出寨迎击，兴世不许，说："贼来尚远，气盛而矢骤，骤既易尽，盛亦易衰，不如待之"①。等敌军士气稍减时，兴世乃命任农夫等将领率数百壮士为先锋，各军随后相继，发动猛攻，大败敌军。刘胡军被杀数百，投水死者甚众，只好收军回鹊尾。

张兴世占据钱溪后，断绝敌人后方接济，刘胡军势所必争。当时张兴世营垒尚未坚固，刘休仁为分敌兵势以减轻兴世压力，遂遣沈攸之、吴喜等军进攻浓湖。当刘胡率众正向钱溪进发时，袁𫖮果然以浓湖被攻甚急，遣人追刘胡火速还保浓湖，从而使张兴世钱溪营寨得以修固和保全。

张兴世用奇兵占据钱溪，是这次讨伐刘子勋之战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沈攸之赭圻之胜阻止了江州军的汹汹来势，稳定了京师的局势。那么，张兴世率军占据钱溪，则是给明帝军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此，刘子勋军处于前后受敌的境地，而明帝军则取得了主动的地位。

张兴世据守钱溪，阻断江路，使邓琬从寻阳送来的大批甲仗军粮不能通过，顿于南陵（今安徽繁昌西北）。刘胡见军粮不济，遣袁𫖮安北府司马沈仲玉领千人从陆路至南陵接运军粮。沈仲玉从南陵取米 30 万斛，钱布数十船，企图从水路冲过钱溪，请刘胡派大军接应。张兴世闻知，与任农夫等人率 3000 将士于路袭击沈仲玉，仲玉逃回，兴世将其军粮物资全部缴获。刘胡军闻知，人心浮动，刘胡副将张喜出降。

八月，刘胡见大势已去，遂弃袁𫖮不顾，自率军逃跑。袁𫖮本无将略，见势欲逃归寻阳，于路上被杀。刘胡逃归寻阳后，诡称欲与朝廷军再战，请求补充军资，随后弃刘子勋连夜逃往沔口（今湖北武汉汉口）。刘胡既逃，刘休仁率军进占浓湖、鹊尾，收纳降卒 10 万，即命各路军追击子勋残军。

---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一《宋纪十三》明帝泰始二年七月。

邓琬见刘胡逃走，忧惧不知所为。这时，被邓琬拉入子勋集团的司马张悦杀琬，携其首诣刘休仁投降。不久，沈攸之等军进占寻阳，杀刘子勋。刘休仁命诸军进平荆州、郢州等地。

当年十月，响应刘子勋起兵的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萧惠开、梁州刺史柳元怙、兖州刺史毕敬众、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等人，见子勋已败，皆遣使向明帝乞降。至此，宋明帝讨伐刘子勋的战争，以明帝一方胜利而告结束。

宋明帝以薛安都等乃被迫投降，欲示威淮北，遣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等率甲士5万往迎薛安都。薛安都见大兵北上，对朝廷产生疑惧，遂向北魏请降，常珍奇亦同时降于北魏。北魏派大军南下接应薛安都，大败张永、沈攸之军，进占淮北。不久，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亦降于北魏。魏廷遂又派大军南下接应，与刘宋展开争夺淮北之地的战争。到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刘宋的淮北4州全被北魏占领，这主要是由于明帝平定子勋之乱后，对薛安都等措置失当所造成的。

第五节　萧道成两次平乱之战

一、平定桂阳王刘休范之战

宋明帝在位期间(465～472年)，除在平定刘子勋时将孝武帝12子全部杀死外，又先后逼杀其兄庐江王刘祎、其弟晋平王刘休祐、建安王刘休仁、巴陵王刘休若。这样，文帝仅存的5个儿子(明帝除外)，被他杀掉4个，仅桂阳王刘休范因人才庸劣得免。

泰豫元年(472年)四月，明帝死，子刘昱即位，是为后废帝。时尚书令袁粲、护军将军褚渊等人辅政，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等近习弄权。当时桂阳王休范为江州刺史(治今江西九江)，以自己为文帝仅存之子、皇帝之叔，理应入为宰辅，既不如愿，心怀怨恨，招养勇士，缮治器械，又折节下士，拢络人材，准备起兵反叛。

刘宋朝廷知休范已有异志，也暗作防备。元徽元年（473年）二月，以晋陵王刘燮为郢州刺史，黄门郎王兴为长史行府州事，配给军队，出镇夏口（今湖北武汉）。郢州（治今武汉）地处江州上游，为防备刘休范截留，刘燮等人不走寻阳，绕道而行。刘休范知朝廷此举在于从上游监视他，大怒，谋袭建康。次年五月，刘休范遂举兵反叛，率兵2万，骑兵500，自寻阳昼夜疾进，直向建康。大雷戍（在今安徽望江境内）戍主杜道欣驰告朝廷。道欣至建康刚刚一夜，刘休范军已至新林（今江苏南京西南），朝廷震动。尚书仆射刘秉、护军将军褚渊、领军将军刘勔、征北将军张永、右卫将军萧道成、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等人于中书省商议对策。众文武皆忧惧不知所措，唯萧道成胸有成算，他说："今应变之术，不宜念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①，坚守宫掖、东府、石头② 以待。贼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③。萧道成并自愿顿新亭以当敌锋，征北将军张永屯兵白下，领军将军刘勔与前兖州刺史沈怀明据守石头城。这是坚守要地，等待时机，后发制人的策略。

萧道成军至新亭，修筑城垒未毕，刘休范前军已到。萧道成外示从容安定人心，然后登墙指挥，命令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等乘船与敌进行水战。于是大破敌军，焚烧船舰，杀敌甚众。次日，刘休范于新林弃舟登岸，遣将领丁文豪、杜黑骡等分兵直趋台城，自率大军自陆路攻新亭。休范军至新亭垒南，萧道成使宁朔将军黄回、马军主周盘龙率步骑出垒拒敌。休范又分兵攻新亭垒东，双方短兵相接，激战近半日，休范

① 新亭，今江苏南京西。白下，建康附近滨江要塞，在今江苏南京金川门外。

② 东府，即东府城，为扬州刺史治所，在今江苏南京东。石头，即石头城，在今江苏南京清凉山，为建康军事要地。

③《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

军攻势不减。道成见己方将士有惧色，安慰说：“贼虽多而乱，寻破也”①。当时员外郎杨运长所率三齐射手700人，射技精湛，每发必中，使敌军难于接近城垒。这时，刘休范想了解敌情，乘肩舆与随从数十人登城南临沧观（在今江苏南京西）瞭望。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见有机可乘，禀告萧道成，请以诈降计除掉刘休范。萧道成大喜，对张敬儿说，如果能将此事办成，将以本州刺史相赏。于是张敬儿与黄回出城南垒，放下兵器大呼投降。刘休范大喜，召张敬儿等至舆侧，黄回诡称萧道成降意。刘休范信以为真，使其2子入道成营为质，并置黄、张2人于左右。张敬儿乘刘休范不备，夺其防身刀，将其斩首，其左右尽皆散走。张敬儿驰马持休范首级还新亭垒。

萧道成命队主陈灵宝将休范首级送台城，以鼓舞己方士气，并晓喻敌军投降。陈灵宝回台途中，遭遇休范军，被迫将休范首级投于水中，因而朝廷军与刘休范军皆不知休范已死。休范将丁文豪、杜黑骡继续猛攻台城，直向朱雀桁（即大航，在朱雀门外秦淮水上）南。右军将军王道隆领羽林兵守朱雀门，急召屯守石头的刘勔回救。刘勔回军，建议撤掉朱雀桁以阻敌军。王道隆不许，命刘勔等进战。刘勔渡桁南战死，王道隆弃军欲还台城，为追兵所杀。于是中外大震，皆言台城已陷。沈怀明兵溃于石头，张永兵败于白下，唯新亭未失。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城纳休范军，中书舍人孙千龄开承明门出降。萧道成急令军主陈显达、任农夫、张敬儿、周盘龙等自石头渡秦淮河，从承明门（台城北门）入卫宫阙。陈显达等军与敌军展开激战。不久，休范死讯传来，文豪等军渐无斗志。陈显达、张敬儿等军终于在宣阳门大破敌军，阵斩杜黑骡、丁文豪，进克东府城，休范余党悉平，建康遂得保全。

由于萧道成调度得当，力战破敌，及其振旅入城，京师百姓缘道聚观，皆曰：“全国家者此公也”②。于是，萧道成以功迁散骑常侍、中领军、南兖州刺史，与袁粲、褚渊、刘秉共掌朝政。

---

①② 《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

二、平定建平王刘景素之战

刘景素为宋文帝第七子、建平王刘宏之子。刘宏死，景素承袭王爵。后废帝时，任镇军将军、南徐州刺史，镇京口。刘景素喜好文学，礼贤下士，很得朝野人心。后废帝即位后，荒淫残暴，大失人心。当时宋文帝诸子尽已死去，诸孙中以景素为最长，朝野皆以为景素应代后废帝刘昱为帝。但当时弄权近臣阮佃夫、杨运长认为幼帝在位，可以使他们长期专权，不想让景素为帝，于是刘宋宗室之间又发生一场内乱。

元徽三年（475 年），刘景素下属防阁将军王秀符因私怨奔往京师，诬告景素欲反。杨运长等人欲乘机出兵除掉景素，辅政的中领军萧道成及卫将军袁粲等人认为消息不实，皆不同意。与此同时，刘景素也遣其子刘延龄返回建康申辩。杨运长虽将王秀符徙于梁州，但却夺去景素镇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职衔。此后后废帝暴虐日甚，朝野更加归心于景素，而杨运长等人对景素更为猜忌。元徽四年（476 年）夏，刘景素遂与司马何季穆、录事参军殷沵、记室参军蔡履、中兵参军垣庆延等人策划，暗中谋自全之计，乃遣人去京师，以金帛结交才力之士。冠军将军黄回、游击将军高道庆、辅国将军曹欣之、前军将军韩道清、长水校尉郭兰之、羽林监垣祇祖等人皆暗中与之通谋，其余武人不得志者，也皆投靠景素。

曹欣之谋划在后废帝独出郊游时，据石头城发难，事成后迎立刘景素。韩道清等人准备邀萧道成一同参加行动，如果他不同意，便将他除掉。刘景素闻知，屡加禁止，不许他们轻举妄动。杨运长急于陷害景素，指使人假投景素，劝景素起兵反叛。景素心知此人为杨运长所遣，将其杀掉，并送首级于京师。

这年七月，垣祇祖率数百人突然投奔京口，称京师已大乱，劝

刘景素立即起兵。景素遂于京口举兵，士民“负戈至者数千人”①。

京师杨运长见垣祗祖逃走，早有准备，萧道成出屯玄武湖，骁骑将军任农夫、领军将军黄回、左军将军李安民各领步军，右军将军张保率水军进讨刘景素。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荣为都统，其余众军相继而进。刘景素欲派兵切断竹里山（在今江苏句容北，为京口至建康陆路要冲）以拒朝廷军。垣庆延、垣祗祖、沈颙等人皆认为天时旱热，台军（中军）远来疲困，引其至附近，以逸待劳，可一战而克。任农夫等军至，焚烧市邑，垣庆延等互相观望，皆不肯战。张保水军进至京口城西，景素亲随勇士数十人截击，阵斩张保。但景素诸将不相接应，终为台军击败。任农夫等逼近京口城，沈颙先临阵退走，垣祗祖随之逃走，其余诸军遂各奔散。殿中将军张倪奴、前军将军周盘龙攻破京口，倪奴杀刘景素及其三子。随后垣庆延、垣祗祖等人皆被杀掉，此次平乱之战遂告结束②。

中领军萧道成在平定刘景素后，威望更著，逐渐掌握宋廷军政大权，以致最后篡宋称帝。

第六节　刘宋内乱的历史影响

刘宋内乱的历史影响，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下列 4 点：

第一，刘宋连续不断的内乱，直接导致了刘宋王朝的覆灭。刘宋宗室之间骨肉相残，战乱迭起，严重削弱了刘宋王朝的统治力量。刘氏宗室中，像彭城王刘义康、江夏王刘义恭、建安王刘休仁等都是较有才略的人物。因其君臣之间不能相容，皆死于内乱之中，导致刘氏宗室后继无人，最后拱手让出政权。萧道成利用刘氏的内乱先掌握了朝政大权，继而篡宋自立。正如萧道成所云：

---

① 《宋书》卷七十二《建平王刘景素传》。

② 按刘景素起兵称“叛乱”，乃依史载而言。考其事，似有冤情，此不详论。

“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① 应该说，刘宋王朝的覆灭首先是由皇室自己一手造成的。

第二，刘宋内乱上承西晋（东晋宗室衰微例外），下开南朝宗室骨肉相残之端，以后齐、梁两代，沿袭刘氏之弊，宗室争夺皇位，骨肉自相残杀，成南朝一代风气。尽管前有覆车，以后仍然重蹈覆辙，这是当时门阀贵族统治的政权结构决定的②。南朝各代统治时间短促，这显然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刘宋中后期，君臣热衷于内部自相残杀，对外却庸劣无能，在内乱中对与北魏边境接壤的地方官处置不当，逼迫其投降北魏，使南朝疆域因此缩小。如宋明帝平刘子勋之乱，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兖州刺史毕众敬等人，虽曾响应刘子勋，但当子勋失败后，他们都表示拥戴宋明帝，却最终不能为朝廷所容，使他们转投北魏。由此引得北魏大军南下，大败宋军，连夺宋青、冀、徐、兖 4 州。刘宋从此失去淮北这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重要战略要地，并随之失去大量人力物力，使自己国力受到削弱。

第四，刘宋内乱连续不断，给南朝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也给南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刘宋内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最明显的例子是孝武帝讨平竟陵王刘诞后，竟下令将广陵城中 5 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杀死，而女口也被充作军赏。军队连年的互相攻伐，使大量的青壮男丁死亡。而长期的战乱，使百姓流离失所，或死于疾疫，或死于饥寒。这不仅使生产遭受影响，而且直接摧残劳动生产力，使南朝的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同时，战争消耗掉大量军需物资，造成南朝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所有这些，直接削弱了刘宋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使得南朝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加上北魏日愈强大，从而使北强南弱的局面日益形成。

---

① 《南齐书》卷三十五《长沙威王晃传》。

② 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第十八章　萧梁伐魏之战

第一节　萧梁北伐损失惨重

一、梁武帝伐魏的决策

萧梁天监二年(503年)，北魏宣武帝元恪以萧衍代齐初立，政权不稳，从归降的南齐宗室萧宝夤、萧梁降将陈伯之伐梁之请，发冀、定、瀛等6州兵2万，与原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将士3万，统归任城王元澄率领，进军伐梁。这年十月，元澄指挥魏军自寿阳向萧梁发起攻击，分派大将傅竖眼、王神念等进攻梁东关(今安徽含山西南濡须山上)、大岘(今安徽含山东北)等军事要地。不久攻占大岘等城，后因粮草不继，暂行退军。次年，元澄又进军围攻梁之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虽曾数败梁军，后梁军利用雨季淮水大涨之机以舟师反击，魏军大败，退回寿阳。

在元澄进军的同时，魏平南将军元英率军向梁司州治所义阳(今河南信阳)发动进攻，司州刺史蔡道恭率不足5000将士拒城固守。从天监二年(503年)十月到次年五月，魏军遍施攻术，道恭随方守御，坚守义阳达8个月之久。天监三年(504年)五月，蔡道恭病死，其从弟骁骑将军蔡灵恩代行其职。八月，马仙琕援军被魏军战败，曹景宗军观望不进，蔡灵恩势穷降魏，义阳终于被魏军攻占。

天监四年(505年)，梁朝政局日渐稳定。梁武帝又以魏军屡次南侵，遂谋划北伐之策。二月，梁廷派遣威名素著的老将杨公则率宿卫中军2万进屯洛口(洛水入淮之处，在今安徽淮南东)，对西边的寿阳魏军形成进攻的态势。与此同时，北魏利用梁汉中

太守夏侯道迁归降的机会，遣尚书邢峦率军攻占南朝梁州（治今陕西汉中），接着进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八月，因攻克义阳进封中山王的魏将元英也向梁雍州（治今湖北襄樊）发动进攻，与西部魏军互相策应。梁杨公则军至洛口，寿阳“士女归降者数千户”①。魏豫州刺史萧恭度遣长史石荣等军与梁军战，公则阵斩石荣，大败魏军。但不久，公则左翼梁军姜庆真部战败，公则退屯马头（今安徽怀远南）。天监四年十月，梁武帝决定大举北伐，以其六弟、临川王扬州刺史萧宏为都督北讨诸军事，尚书右仆射柳惔为其副，指挥北伐诸军。并“以兴师费用，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助军资”②。

梁武帝北伐统帅的安排，乃是错误的决策。临川王萧宏素不知兵，既乏将略，又无临战经验，根本没有统帅大军的能力，仅因其为梁武帝之弟，遂被任为统帅。当时，北魏已日见衰败，而萧梁正处于上升时期，且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如果萧梁北伐统帅得人，或能收复淮南义阳、寿阳等军事重镇乃至淮北地区，至少可以与魏军相对峙。但梁武帝用人唯亲，舍弃当时魏军畏之如虎的名将韦睿不用，却用昏庸无能的宗室萧宏为帅。战争统帅的选择是胜败的关键，梁军以萧宏为帅，可以说败局已是必然的了。

二、萧宏临敌怯懦不战自溃

天监四年（505年）十月，萧宏率诸军进发洛口。萧宏因以“帝之介弟”带兵，“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③。天监五年（506年）二月，萧梁北伐诸军向魏军发起攻击。冠军将军、北徐州刺史昌义之率州兵为北伐前军，首先向魏梁城（今安徽砀山）发动进攻。魏梁城守将平南将军陈伯

---

① 《梁书》卷十《杨公则传》。

②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③ 《梁书》卷二十二《临川王萧宏传》。

之率军迎战，义之大败而回。萧宏命记室丘迟给陈伯之写了一封有名的劝降信，晓以大义，言辞恳切动人。于是陈伯之率将士八千降梁，昌义之攻占梁城。与此同时，辅国将军、豫州刺史韦睿率军北进，命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进攻魏小岘城（今安徽含山北），一时未能攻下。韦睿巡视营栅，城中突然冲出数百魏军将士，形势紧急。韦睿欲攻击这股敌人，左右认为出外巡视，没有战斗准备，应回营整束衣甲后再去迎敌。韦睿说："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①。左右仍迟疑不定，韦睿严令即刻进攻，于是手下将士皆殊死战，大败魏军。韦睿随即率将士急攻小岘城，果然攻克。韦睿随之进兵合肥（今属安徽）。此前，梁右军司马胡略久攻合肥不下。韦睿到达后，亲自察看山川地形，命令堰淝水（古水，源出安徽合肥西北将军岭，从西北流入寿县境，折北流经寿县城东）以通水道，准备用水师进攻。不久，魏遣大将杨灵胤率军 5 万援救合肥，梁军虑不敌，请表朝廷增兵。韦睿笑着说："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临难铸兵，岂及马腹。"②他沉着应战，多方设计，大破杨灵胤军。魏军人多势盛，梁军上下请求退还巢湖，韦睿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③。他虽身体素弱，仍身先士卒，督厉众军，命修造大型斗舰，高与合肥城等，从四面攻城。魏人计穷，相与悲哭。五月，魏守将杜元伦被梁军射死，而魏之援军又因堰水涨满无法相救，城中守军溃散，梁军攻克合肥，俘虏万余人，缴牛马绢帛无数。同月，梁太子右卫率张惠绍与冠军长史胡辛生、宁朔将军张豹子等军攻克魏宿预（今属江苏）。同时，辅国将军、庐江太守裴邃乘大雨淮水暴涨之机，率水师攻克魏羊石城（今安徽霍丘东），随即进兵攻占霍丘（今属安徽）。六月，青、冀二州刺史桓和攻克魏朐山（今江苏连云港西南锦屏山）城。

这次北伐之初，梁各路北伐军进展顺利，从东北至西南方向对魏之寿阳城形成扇形围攻形势。北魏调兵遣将，以中山王元英

①②③《梁书》卷十二《韦睿传》。

为征南将军，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率兵10万从北向南反击梁军，以尚书邢峦为都督东讨诸军事，从西部侧击梁军，后又发定、冀、瀛等6州兵10万人补充前线诸军。接着，在梁魏交战中，梁军张惠绍败于邢峦，弃宿预退守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韦睿军自合肥北上接近魏军，昌义之驻守梁城，梁军统帅临川王萧宏屯于洛口。萧宏自出征以来，部署诸事常不合时宜，“多违朝制”①。本来梁军进展顺利，诸将皆请乘胜前进，但萧宏闻北魏援军将至，畏懦不敢再进，反而召集众将商议退军。众将见萧宏如此胆怯无能，皆愤怒不已。昌义之“怒须尽磔，曰：‘……岂有百万之师，轻言可退，何面目得见圣主乎！’”②。马仙琕认为：“天子扫境内以属王，有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③。将领朱曾勇、胡辛生拔剑而起说：“欲退自退，下官当前向取死”④。萧宏副手柳惔也愤怒地反对退兵。萧宏见众怒难犯，遂暂停退军之议，但不许诸军再进，下令“人马有前行者斩”⑤。于是诸将皆有怨心。魏军见萧宏懦弱，派人送来巾帼（当时妇女包头的巾和帕）等物侮辱萧宏。魏军将士并编歌谣嘲笑说：“不畏萧娘（指宏）与吕姥（指吕僧珍），但畏合肥有韦武（指韦睿）”⑥。在萧宏阻止梁军前进之际，魏将奚康生向元英建议说：“梁人自克梁城已后，久不进军，其势可见，当是惧我，王若进据洛水，彼自奔散”⑦。元英回答说：“萧临川虽騃（痴愚），其下有好将韦、裴之属，亦未可当。……今且观形势，未可便与交锋”⑧。可见这时魏军尚畏惧梁军，不敢轻举妄动。

九月，洛口夜降暴风雨，梁军惊恐，萧宏胆怯，竟与手下数骑弃军而逃。梁军知统帅不见，遂皆溃散，“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⑨。萧宏乘大船渡江，逃回建康。张惠绍闻洛口溃败，从下邳撤回。当时韦睿驻地距魏仅20里，闻梁军已败，命令辎重前行，自己亲自断后，魏军畏韦睿威名，不敢追赶，韦睿遂全军而返。于是，萧梁这次大举北伐遂因主帅无能，临阵退逃而无功，不仅北伐初期所取得的战果化为乌有，军力还受到损失。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临川王萧宏传》。

梁军北伐溃逃，魏军乘势进军。十月，元英率大军围攻钟离，幸赖守将昌义之率3000将士奋勇抵抗，梁将韦睿、曹景宗等人率军及时救援，并于次年三月利用淮水暴涨之机，大败魏军，钟离才得保全，由此阻住了魏军南进的势头。

第二节　陈庆之北伐攻克洛阳之战

一、陈庆之受命进攻洛阳

北魏自宣武帝景明（500～504年）年间以后，政治日渐腐败，贵族官僚荒淫腐化，阶级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终于在正光五年（524年），爆发了六镇大起义。此后各族人民起义此伏彼起，北魏政治动荡不安，元氏王朝摇摇欲坠。居于北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境内）的契胡（即羯人）酋长尔朱荣乘机起兵，在镇压各族人民起义的过程中，控制了北魏中央政权。这时，身兼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相州刺史等数职的北魏宗室元颢见国内大乱，尔朱荣专政，图自全之策未成，遂率其子元冠受南逃，投奔萧梁。

梁武帝喜元颢来降，见其“泣涕自陈，言辞壮烈”①，欲利用元颢向北扩展势力。于是他封元颢为魏王，以东宫直阁将军陈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令其护送元颢北还。实际上，这是萧梁政权利用北魏政治危机所进行的一次北伐。

梁大通二年（528年）十月，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北上。陈庆之先进军袭取魏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观察北魏虚实，待机而动。当得知魏廷派大军东出平邢杲之乱后，庆之乘虚而进，急速从铚县进兵荥城（今河南宁陵南）、睢阳（梁国治所，今河南商丘南）。魏睢阳守将丘大千有众7万，在城外分筑9座城垒抵御梁军。

---

①《魏书》卷二十一上《北海王元详传附子元颢传》。

中大通元年（529年）四月，梁军向睢阳发动进攻。陈庆之率将士奋力作战，自清晨战至下午，连破魏军3座城垒，丘大千投降，梁军攻占睢阳。元颢随之在睢阳称帝，改年号为孝基元年，以陈庆之为使持节、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魏廷遣济阴王元晖业率羽林庶子2万人来救睢阳，晖业进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南），闻睢阳已破，屯驻考城不进。考城“四面萦水，守备严固”①。陈庆之率军进至考城，命将士浮水筑垒，很快将其攻克，生擒元晖业，获租米车7800辆。五月，陈庆之进军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魏军望风归降。元颢晋封陈庆之为卫将军、徐州刺史、武都公。

魏廷见陈庆之军渐逼近京师洛阳，乃遣南道大都督杨昱镇守荥阳（今属河南）、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隆镇守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左卫将军尔朱世承镇守轘辕关（在今河南偃师东南），防卫京师。陈庆之率军进攻荥阳，未能取胜。元颢派左卫刘业等人招降杨昱，杨昱不从。魏荥阳守军有7万之众，陈庆之仅有将士7000，而且当时魏上党王元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兆已击破邢杲军，率大军还救荥阳。梁军前有坚城，后有大敌，将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士卒皆惶恐不安。陈庆之激励将士说：我军北进以来，“屠城略地，实为不少，君等杀人父兄，略人子女，又无算矣”，与魏人已结仇恨。我军只有7000人，敌军达30余万，“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虏骑多，不可与之野战，当及其未尽至，急攻取其城而据之。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脍”②。随即命令全军攻城。于是梁军将士个个争先，相率蚁附登城，梁军虽死伤500余人，但荥阳即时攻下，生擒杨昱。这时，元天穆、尔朱兆率大军已至荥阳，陈庆之亲率骑兵3000背城迎战，又大破魏军，元天穆、尔朱兆皆败走。陈庆之疾速进攻虎牢、轘辕等地，尔朱世隆闻讯弃城逃跑，尔朱世承被梁军活捉，陈庆之遂相继攻占虎牢、轘辕

①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②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五月。

二地。荥阳、虎牢等地既失，魏都洛阳完全暴露于梁军兵锋之下。魏孝庄帝元子攸从中书舍人高道穆之议，从洛阳北渡黄河，逃往河内郡（治今河南沁阳）。魏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等率百官封存府库，迎元颢入洛阳①。元颢入居洛阳宫，改元建武，大赦天下，晋封陈庆之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不久，元天穆等率魏军4万又先后攻下大梁、睢阳，并由魏将费穆率兵2万进攻虎牢，对洛阳构成威胁。陈庆之又回师进击魏军，天穆畏庆之，率军北渡黄河。费穆攻虎牢将拔，闻天穆北渡，又见庆之来援，摄于梁军压力，遂降庆之。陈庆之再次攻下被魏军收复的大梁、睢阳等城，声势甚盛。陈庆之护送元颢北还，自攻占铚县到进入洛阳，连破魏32城，共经40余战，所向皆捷。

二、孤军奋战洛阳得而复失

元颢的北归，以及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本是互相利用。元颢企图借梁军势力在北方立足，而梁武帝则想乘机扩大统治区域。因此，元颢在进入洛阳后，一方面志得意满，极尽享乐，沉湎酒色不问政事；另一方面，他见洛阳百官臣服，利用萧梁力量登上皇位的目的已经达到，心中渐起异心，遂与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等筹划叛梁之计。但由于他当时尚须倚仗陈庆之的兵力，所以表面上不露声色，实际上与萧梁已貌合神离。陈庆之有所察觉，也暗中谋划对策，向元颢陈述“远来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虚实，方更连兵，而安不忘危，须预为其策”②。他建议梁廷增兵，并主张解放被掠在北方的南人，以扩充军力。元延明劝元颢说：“陈庆之兵不出数千，已自难制，今增其众，宁肯复为用乎？权柄一去，动转听人，魏之宗社，于斯而灭”③。元颢深以为是，不准陈

① 参阅朱大渭《萧梁名将陈庆之战绩考实》，载《冰茧彩丝集》。

②③《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庆之所请。他为防止庆之暗中向梁请兵，抢先给梁武帝上表说："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唯尔朱荣尚敢跋扈，臣与庆之自能擒讨。今州郡新服，正须绥抚，不宜更复加兵，摇动百姓"①。梁武帝见表，信以为真，竟令诸路梁军皆停于梁界，不许入魏境。当时，陈庆之所领梁军在洛阳者不足一万，兵力既很单薄，而又处于孤军作战的境地。陈庆之手下军副马佛念认为庆之功高震主，难为元颢所容，劝其乘机杀掉元颢，据洛阳自图大事。陈庆之不从，认为这是对梁廷不忠。他为了摆脱元颢的控制，请求赴徐州刺史（治今江苏徐州）之任，以便相机进退。元颢猜忌庆之，自然不许其请。

魏孝庄帝元子攸逃出洛阳后，先至河内郡，后又往长子（今山西长子西南）暂住。这时，控制北魏朝政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尔朱荣亲至长子朝见孝庄帝，并统领兵众，集聚军资器仗，护送孝庄帝南返。六月，尔朱荣、尔朱世隆、元天穆、尔朱兆等率大军号称百万，攻占在元颢控制之下的河内郡，杀河内太守元袭和都督宗正珍孙。闰六月，尔朱荣大军进至洛阳北面的黄河北岸，与陈庆之军相峙于黄河一线。当时元颢以陈庆之守北中城（河阳三城之一，为洛阳外围戍守要地，故址在今河南孟州西），元颢守河桥（黄河浮桥，在今河南孟州西南、孟津东北黄河之上，为洛阳外围戍守要地，北中城即在河桥北岸）南岸，安丰王元延明沿河据守。尔朱荣军缺乏舟船，一时无法渡河，加之陈庆之军守北中城杀伤魏军甚众，尔朱荣欲暂时退军，以图再举。黄门郎杨侃等人力谏，认为若一旦退军，将会失天下之望。杨侃又献计，请征发民间木材，多扎木筏，布在黄河数百里沿岸之上，作出将从各处渡河的态势，使梁军首尾不能兼顾，然后集中兵力从一处突破，必能成功。尔朱荣大喜，遂令依杨侃之计而行。恰好这时世居马渚（黄河码头）的伏波将军杨檦与族人等有小船数艘，自愿充当向导领魏军渡河。尔朱荣令杨侃与车骑将军

---

①《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都督尔朱兆、抚军将军大都督贺拔胜等人，率精锐骑兵乘夜南渡黄河。元颢之子元冠受领马步军 5000 人前来迎战，尔朱兆等人大败冠受军，生擒元冠受。沿河据守的元延明听说元冠受被擒，尔朱荣已经渡河，先自逃走，士众溃散。元颢闻听败讯，率左右亲随数百人南逃，至临颍（今河南临颍西北）被县卒杀死。陈庆之知元颢、元延明军溃散，收集部下马步军数千人，结成方阵渡河南还。尔朱荣亲自率军追赶，但未能追及。庆之军速退至阳城（今河南登封南）西，恰遇嵩高山水洪溢，军队被水冲没，死散殆尽。庆之剃发假扮成僧人，只身从小路经汝阴（今安徽阜阳）逃回江南。洛阳复被魏军占领，梁军此次北伐所克之地，也尽被北魏所收复。

从陈庆之孤军北上到单身逃回，萧梁始终未派一兵一卒给予接应，陈庆之北伐取得的辉煌战果，遂因孤军奋战而付之东流。

第三节　萧梁两次伐魏的历史教训

从当时南北政权总体上说，南朝军事力量弱于北朝，但一次作战的胜负，却并不完全决定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强弱，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把萧梁两次北伐综合起来考察，其失败的教训大体上有 3 个方面。

第一，调兵遣将用人唯亲，北伐统帅用非其人。萧梁天监四年（505 年）的北伐，梁武帝以其弟临川王萧宏为统帅，这是很大的失策。萧宏一生唯知聚敛财物，腐朽无能，未见他在军事上有所作为。梁武帝用萧宏统军北伐，完全是把军国大事当作儿戏。萧梁当时并非没有统军人才，像韦睿即是非常合适的人选。韦睿既富有军事天才，具有胆略，且久经战阵，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梁武帝对此，乃是十分清楚的。他起兵进军建康时，便曾起用韦睿担任留守郢城（今湖北武汉）的重任，并说："弃骐骥而不乘，焉

逴逴而更索?"① 韦睿后来出色地完成了留守任务。在第一次北伐中，韦睿亲率一军居于梁军最前线。当梁军大败之际，韦睿沉着冷静，亲自断后，全军而返。这些都说明了韦睿的军事才能。梁武帝怕军权旁落，用人唯亲，这显然是萧梁第一次北伐失败的沉痛教训。梁武帝之所以弃良将而不用，将军国大事轻托于很不称职的萧宏，这是同当时梁立国未久，朝野上下离心的阴影在武帝心中作怪分不开的。虽然他后来曾注意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但梁国初建时还无暇顾及。

第二，北伐缺乏周密的战略部署，也无一往无前的决心和勇气。陈庆之北伐，正当北魏大乱之时，但梁武帝此次用兵目的，只是想利用北魏宗室元颢控制北魏，实际上无意大举进兵，只派陈庆之率不到一万军队孤军深入。其结果，陈庆之虽然开始进展顺利，屡战屡胜，后来却因孤守洛阳，援军不继，最后全军覆没，陈庆之仅以身免。萧梁此次北伐的教训，在于缺乏周密的部署和通盘的计划。派陈庆之轻军深入，却没有进一步的相应措施。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过程千变万化，所以在用兵之前，需要有通盘的战略考虑，同时也要有坚定的决心，进则全力以赴，以求必胜；不进则养精蓄锐，待时观变，力求掌握战争发展的规律，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萧梁第二次北伐，显然是想以陈庆之及其部属作赌注，以期赢得对北方的控制。所以萧梁对战争局势的发展任其自然，全无相应措施。陈庆之进展顺利，不见有所接应，对其孤军深入的危险性，毫无警惕，其最后败退，又没有丝毫的救援。梁武帝的用心是很清楚的，即想用最小的代价去换取对洛阳以南的控制，根本没有下决心大举北伐。在此情况之下，陈庆之北伐全军覆没，便是势所必然的了。

第三，萧梁北伐时机选择不当。从军事力量上说，南朝弱于北朝，而南朝又缺乏战斗力强大的骑兵，这就更增加了萧梁北伐的难度。但这并不能说明萧梁北伐就没有成功的可能，如果用人

---

① 《梁书》卷十二《韦睿传》。

得当，善于抓住战机，萧梁也可能取得北伐的局部胜利。梁大通二年（528年）元颢投奔萧梁之时，北魏人民起义如火如荼，朝廷军多次被起义军击败，其政权分崩离析，其军事实力在镇压义军的过程中被大大削弱，萧梁若于此时大举进兵，正合时机。可以说，这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最好的一次北伐机会。但梁武帝此时却不图大举，而只想派少数兵力利用元颢向北扩展势力，没有下决心通过战争逐步占领黄河以南地区。尽管如此，陈庆之进军仍取得了47战破32城，迫使魏孝庄帝弃京师而逃的辉煌战绩。北魏素称慓悍的骑兵多次被梁军击败这一事实，说明了北魏军事力量的削弱。如果梁武帝真下决心北伐，调度有方，陆续增派大军援助，采取措施巩固所占之地，很可能出现对萧梁有利的局面。但梁武帝热衷于通过对元颢做傀儡来控制北朝，命令边界诸军按兵不动。这就给了北魏喘息的机会，当它镇压了起义军后，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梁军。而且当时梁军的敌人，已由腐朽的北魏朝廷变为新兴的契胡酋帅尔朱荣的强大骑兵势力，以致陈庆之最后全军覆没。这就是说，梁廷第二次北伐，虽时机很好，但梁武帝却不愿大举北伐。相反，梁廷第一次北伐时，北魏国势虽已呈衰败之势，但其政权尚称稳定，军事力量也还很强大。综观萧梁两次北伐，该大举进兵而不进，不该进却轻易进兵，不善于捕捉战机，没有遵守待机而动的用兵原则，这是萧梁伐魏失败的又一个教训。

第十九章　侯景乱梁之战

第一节　侯景降梁

一、侯景叛魏降梁

东魏武定四年（梁中大同元年，公元546年）十二月，执掌东魏大权的丞相高欢病重，怕“狡猾多计，反复难知”① 的司徒、南道行台侯景将作乱，乃使其子高澄召侯景入朝。久怀叛志的侯景“虑及于祸”②，遂起兵反叛。侯景被东魏军击败后，决计降梁，以求一逞，由此揭开了侯景乱梁之战的序幕。

侯景，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人，或云其为雁门（郡治善无，今山西右玉南）人。侯景初以“骁勇有膂力，善骑射”③，入选为北魏六镇戍兵，后投奔尔朱荣，以破葛荣起义军之功升任定州刺史、大行台，渐知名于世。高欢起兵开创东魏基业，侯景转投高欢麾下，多有战功，甚为高欢倚重，使其“拥兵十万，专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体”④。侯景驭军严整，长于谋略，每战多捷，在东魏“总揽兵权，与神武（高欢）相亚”⑤，威名素著。侯景又素有大志，曾向高欢说：“请兵三万，横行天下，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⑥。侯景自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起，经营河南近14年，渐有不臣之心，曾对人说：“王（高欢）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指高澄）共事”⑦。武定五

①②③⑤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④⑥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⑦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

年（547年），侯景见高欢病重将死，意欲谋乱，恰逢高澄召其进京，遂据河南13州之地反叛，于当年二月使其行台郎中丁和上表向萧梁请降。这时高欢已死，高澄继任丞相，执掌东魏大权，见侯景叛魏降梁，派司空韩轨率兵进讨，将侯景围于颍川（郡治颍阴，今河南许昌）。侯景以梁援未至，又以河南6州之地请降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乘此机会欲向东扩展势力，遂派军东进援助侯景，解除了东魏军对侯景的围攻。但宇文泰是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与东魏交战多年，深知侯景其人素有野心，反复无常，未必能真正臣服于己。因此他对侯景来降，采取冷静审慎的态度。东魏军退走后，他命大将王思政屯据颍川，逐步侵蚀侯景之地，又征召侯景入朝，准备削夺其兵权。侯景亦深知自己与西魏为敌多年，结怨甚深，转投西魏只是在东魏军逼迫之下的权宜之计。当西魏要解除其兵权时，遂转过头来一心投靠萧梁。

当侯景使者丁和于梁太清元年（547年）三月至建康请降时，梁武帝召集群臣商议，“皆云纳侯景非宜”①。梁武帝既贪侯景所献东魏13州之地，又“以为景能立功赵、魏”②，很想利用侯景向北扩展自己势力，但因群臣反对犹豫不决。本来在此前不久的正月，梁武帝曾夜梦“中原平，举朝称庆”③。梁武帝幸臣中书通事舍人朱异认为此梦是“宇内方一之征”④，以迎合武帝的心意。武帝遂独自问计于朱异，异知武帝意在接纳侯景，对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岂非天诱其衷，人奖其计。原心审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⑤。武帝听罢大喜，遂决定接纳侯景。于是，以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使持节、董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又命司州刺史羊鸦仁、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率精兵3万北上，

---

①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② 《南史》卷二十《谢弘微传附谢举传》。

③④⑤ 《梁书》卷三十八《朱异传》。

进军悬瓠（今河南汝南）接应侯景。同年六月，侯景不应西魏宇文泰之召，据悬瓠、项城（今河南沈丘）等地，请援于梁司州刺史羊鸦仁，正式投靠萧梁。七月，梁羊鸦仁军进占悬瓠。梁武帝遂改悬瓠为梁豫州，以羊鸦仁为司、豫2州刺史，又以东魏之项城为殷州，以西阳太守羊思建为殷州刺史，萧梁势力终于乘侯景来降的机会进入河南地区。

二、梁军彭城寒山堰之败

萧梁太清元年（547年）八月，梁武帝派其侄贞阳侯、南豫州刺史萧渊明为大都督，率军10万从寿阳（今安徽寿县）水陆2道直趋彭城（今江苏徐州），与侯景互为犄角，大举北伐。武帝敕告萧渊明作战方略云："侯景志清邺、洛，以雪仇耻。其先率大军，随机抚定。汝等众军可止於寒山筑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汛，孤城自殄，慎勿妄动"。①

九月，萧渊明军至彭城寒山（今江苏徐州东南），依武帝之令修筑寒山堰，堰清水（即泗水，源出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西南流经江苏徐州入淮河，全长千余里，为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淹彭城。梁冠军将军羊侃监修堰事，调度得宜，寒山堰两旬而成。于是，大水直灌彭城，水及于城堞，城"不没者三板"②。东魏彭城守将徐州刺史王则率将士坚守。羊侃建议乘水猛攻彭城，萧渊明不许。十一月，高澄以西南道大都督高岳为统帅，东南道行台慕容绍宗为其副，率大军10万来救彭城。羊侃又建议乘东魏援军远来疲惫而击之，萧渊明又不许。羊侃只好率所部将士出屯寒山堰上。萧渊明本无统军之才，当东魏大军来救之机，"谋略不出，号令莫行"③。诸将前来问询，他无言以对，却怒曰："吾自临机制变，

①②③《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萧懿传附萧渊明传》。

勿多言"①。梁军众将见渊明计无所出，号令不行，皆无战心，各率手下抄掠百姓，渊明不能制止。不久，东魏慕容绍宗军至彭城，命将士决堰放水，梁军人心浮动。渊明命众将出兵拒敌，诸将皆不肯行。这时，梁北兖州刺史胡贵孙劝谯州刺史赵伯超共同出战迎敌，伯超畏敌不敢出，贵孙遂率手下将士独自出寨与敌接战。赵伯超见东魏军势甚盛，对部下说："与战必败，不如全军早归"②，竟临战率军而逃。结果胡贵孙率孤军奋战，死于乱军之中。在两军对阵时，梁军统帅萧渊明还大醉不起，于是梁军大乱，东魏慕容绍宗率军猛攻，梁军大败，萧渊明被俘，将士损失数万人。唯羊侃屯兵堰上，率手下将士结成方阵徐徐退兵，全军而还。

慕容绍宗大破彭城寒山梁军后，随后进攻退保潼州（治今江苏睢宁西南）的梁潼州刺史郭凤。十二月，郭凤弃城逃跑，慕容绍宗攻占潼州，遂转过头来进攻侯景。与此同时，侯景率军围攻东魏谯城（今安徽亳州）不胜，移军攻下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遣其行台左丞王伟等至建康献策，请求梁武帝选择在江南的北魏宗室元姓子弟为王，以便辅佐其北伐东魏。梁武帝遂以太子舍人元贞为咸阳王，命其渡江北上，随侯景军北伐。但当侯景闻东魏慕容绍宗率军来攻时，率所领甲卒数万人，及战马数千匹、辎重万余车，退保涡阳（今安徽蒙城）。慕容绍宗率军追赶，两军相持于涡水（今涡河，为淮河支流，流经安徽蒙城）之北。侯景善于用兵，2军接战，景命将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视砍人胫马足"③，由是击败东魏军。东魏名将慕容绍宗谓其部下斛律光说："吾战多矣，未见此贼之难也"④。到梁太清二年（548年）正月，双方相持已一月有余，侯景粮尽，其部属皆为北人，本不愿南渡，于是景所率各部投降慕容绍宗。侯景军4万余人，一时溃散殆尽。侯景见大势已去，与心腹数人自硖石（在今安徽凤台西南）渡过淮水，收集散卒，得步骑800人，昼夜兼行，又派人对慕容绍宗

---

①② 《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萧懿传附萧渊明传》。

③④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说："景若就禽，公复何用？"① 绍宗遂不追赶，侯景得以南逃。侯景渡淮后，不知所归，正好这时梁马头（古城名，故址在今安徽寿县西北）戍主刘神茂与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的监南豫州事韦黯有怨，遂进见侯景，劝其夺取寿阳，说："寿阳去此不远，城池险固，韦黯是监州事。王（指侯景，时为梁河南王）若次近郊，（黯）必郊迎，因而执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后，徐以启闻，朝廷喜王南归，必不责也"②。侯景闻之大喜，依计而行，率军直奔寿阳。韦黯先不肯纳景，刘神茂使侯景派人入城劝说韦黯，黯懦弱寡谋，遂开门迎纳侯景。侯景占据寿阳后，派使者至建康申述自己战败情况，并自请贬官。梁武帝优诏不许。侯景又请求兵资，梁武帝以其为南豫州刺史，其他官职如故。侯景占据寿阳后"多所征求"③，招募士兵，扩充军队，请梁廷给予兵器甲仗等物，为叛乱作兵力和物资上的准备。梁武帝毫无戒备，一无所拒，皆从其请。

第二节　侯景叛梁及其败亡

一、寒山堰之战后的梁魏和议

东魏既先后大破萧渊明及侯景军，将河南失地收复后，便积极与萧梁讲和，以图离间萧梁与侯景之间的关系。当萧渊明被俘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南，高欢父子坐镇此以遥控朝政）后，高澄待之以礼，并声称"先王（高欢）与梁主和好十有余年……不谓一朝失信，致此纷扰"④，现愿与梁通和，并表示可以放渊明南还。高澄使渊明写信给梁武帝转达其意。梁太清二年（548年）二月，

①②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③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④ 《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长沙宣武王萧懿传附萧渊明传》。

萧渊明之书信送达建康，梁武帝“览之流涕”①，遂与群臣商议与东魏通和之事。中领军、兼中事通事舍人朱异认为“高澄此意，当复欲继好，不爽前和，边境且得静寇息民，于事为便”②。司农卿、兼中书通事舍人傅岐认为不可，说：“高澄既新得志，其势非弱，何事须和？此必是设间，故令贞阳（萧渊明）遣使，令侯景自疑当以贞阳易景。景意不安，必图祸乱。今若许澄通好，正是堕其计中。且彭城去岁丧师，涡阳新复败退，令便就和，益示国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许”③。从实际情况看，傅岐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朱异固执己见，群臣亦多附和其议，而梁武帝本心也想与东魏讲和，遂采纳朱异的意见，派使者至东魏通好议和。

侯景闻知梁、魏通和，极力反对，上疏劝谏梁武帝说：“臣与高氏，衅隙已深……今陛下复与高氏连和，使臣何地自处”④。武帝回答说：“朕与公大义已定，岂有成而相纳，败而相弃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进退之宜，国有常制，公但清静自居，无劳虑也！”⑤此后，侯景又屡次上疏固谏，武帝一无所纳。侯景欲探梁武帝的真实意图，乃伪作东魏书信，内称欲以萧渊明换回侯景，使人假冒东魏使臣送往建康。梁武帝信以为真，便欲应允。傅岐又谏止说：“侯景以穷归义，弃之不祥。且百战之余，宁肯束手受絷”⑥。朱异等人却认为：“景奔败之将，一使之力耳”⑦。武帝遂从之，复书给来人，称“贞阳旦至，侯景夕反”⑧。侯景探得实情，对左右说：“我知吴儿老公（指武帝）薄心肠”⑨。景亲信王伟劝侯景说：“今坐听亦死，举大事亦死，王其图之”⑩。侯景遂决心起兵叛梁。

这时，被梁武帝封为咸阳王的北魏宗室元贞尚在侯景军中，他见状逃还建康，将侯景反叛事告知武帝。同时，侯景派人拉拢司州刺史羊鸦仁与其共同起兵，羊鸦仁将使者送至建康，镇守合肥

---

①⑥⑦⑧⑨⑩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②③ 《梁书》卷四十二《傅岐传》。

④⑤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九》武帝太清二年二月。

（今属安徽）的梁鄱阳王萧范亦屡次上疏，称侯景有反叛之心。但朱异纳侯景“饷金三百两”，皆不报知武帝。因此，侯景叛梁之事得以顺利进行，而未受任何遏制。侯景又拉拢左卫将军、临贺王萧正德，向其下书说：“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宪章错谬，政令颠倒，以景观之，计日必败。况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天下义士，窃所痛心，在景愚忠，能无忿慨。今四海业业，归心大王，大王岂得顾此私情，弃兹亿兆。景虽不武，实思自奋。愿王允副苍生，鉴斯诚款”①。萧正德本为武帝养子，因其未立为太子，“恒怀不轨”，见书后大喜。他回书侯景说：“朝廷之事，如公所言。仆之有心，为日久矣。今仆为其内，公为其外，何有不济！机事在速，今其时矣”②。侯景见谋反诸事已备，公然向武帝挑衅说：“请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许，即领甲临江，上向闽、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③。梁武帝老迈昏庸，仍不以为意，反而命朱异答曰：“譬如贫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亦有一客（指侯景），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④。至此，侯景叛梁的一切准备工作已就绪，而梁廷却毫无警觉，未能采取任何相应措施。

二、侯景叛梁攻破台城

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侯景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等奸佞为辞，于寿阳起兵叛梁。将城中居民全部召为军士，停收商税及田租，百姓子女悉配与将士。侯景分兵攻打马头(今安徽寿县西北)、木栅(今安徽寿县东)等地，擒马头大守刘神茂、戍主刘曹璆等人。梁武帝闻侯景起兵，一面悬赏购侯景首级，一面仓促分派诸军进讨。以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以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以司州刺

① 《梁书》卷五十五《临贺王萧正德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梁纪十七》武帝太清二年八月。

③④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以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分数路进攻侯景。又以开府仪同三司、邵陵王萧纶为持节，总督上述诸军。

侯景见梁军来攻，与亲信王伟商量对策，王伟献计说："兵贵神速，莫若直掩扬都，临贺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①。侯景深以为是，遂决定乘梁军未至，以轻骑快速通过淮南，与萧正德里应外合，袭取建康。九月下旬，侯景留其中军大都督王贵显守寿阳城，自己率军诡称游猎出寿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略，扬言进攻合肥，却直趋谯州（治今安徽滁州）。十月，侯景兵至谯州，梁军助防董绍光开城投降，侯景占据谯州，活捉刺史萧泰。梁武帝闻侯景南下，遣太子家令王质率兵3000巡江防备。侯景随即率军转攻历阳（治今安徽和县），历阳太守庄铁遣其弟庄均率数百人夜袭侯景，庄均兵败被杀，庄铁遂以历阳投降。侯景既克历阳，兵锋直逼长江，梁军沿江镇戍相率启告建康。梁武帝问计于群臣，都官尚书羊侃建议："景反迹久见，或容豕突，宜急据采石（矶），令邵陵王袭取寿春。景近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众，自然瓦解"②。但朱异等人还认为"景必无渡江志"③。军情如此紧急，梁武帝对形势仍没有清醒的认识，致使羊侃的正确建议未能被采纳，一再延误战机。

侯景攻陷历阳后，投降的历阳太守庄铁劝景快速进兵渡江，说："急则应机，缓必致祸"④。侯景从其计，遂以庄铁为向导，准备南渡长江。这时，与侯景早有密约的萧正德以载荻为名，调遣大船数十艘至长江北岸，接应侯景渡江。侯景至江北岸，恐沿江巡守的王质率兵阻截，未敢冒失南渡。恰好这时梁武帝以侯景军临江，恐王质兵力单薄，改以云骑将军陈昕代王质戍守采石，征王质还为丹阳尹。十月二十二日，王质军已退，而陈昕军未至，侯景探得此讯，急率手下将士八千、马数百匹乘此空隙从采石渡过长江，而萧梁京师建康竟毫无知晓。侯景渡江后，分兵进攻姑孰

---

①③④《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②《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今安徽当涂），活捉淮南太守萧宁，遂进军至慈湖（今安徽当涂北），接近建康。侯景军猝然而至，建康一片混乱，“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第”①；“军人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②。梁武帝急令京师文武分守建康内外诸要地，以太子萧纲居中书省总统军事，以杨州刺史宣城王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都官尚书羊侃为其副，以南浦侯萧推守东府城（今江苏南京通济门一带，为南朝扬州刺史治所）、西丰公萧大春守石头城（建康军事重镇，故址在今江苏南京清凉山）、轻车长史谢禧守白下（建康附近滨江要地，故址在今江苏南京金川门外）。十月二十四日，侯景军至建康朱雀桁（建康正南门朱雀门外之浮桥）南，遣手下徐思玉入建康上疏，“乞带甲入朝，除君侧之恶，请遣了事舍人出相领解”③，而“实欲观城中虚实”④。梁武帝遣中书舍人贺季、主书郭宝亮出见侯景。贺季问景：“今日之举，何以为名？”⑤景答曰：“欲为帝也”⑥。景扣留贺季，使郭宝亮回宫复命。时东宫学士庾信镇守朱雀门，率兵千余人屯于朱雀桁北，梁廷尚不知萧正德已与侯景暗中勾结，太子萧纲使其率兵镇守宣阳门（建康另一南门）。萧纲命庾信拆朱雀桁以阻侯景兵锋，萧正德劝庾信暂缓拆桁，以便安定人心。不久侯景军至，庾信拆桁不及，又见景军将士皆戴铁面具，心中畏惧，弃军而走。萧正德率所部与侯景军会合，两军从宣阳门攻入建康。萧纲急令王质率精兵3000增援庾信，王质与侯景军相遇，也不战而走。于是梁军奔散，萧大春弃石头奔京口（今江苏镇江），谢禧弃白下而逃，侯景军占领石头城。次日，侯景指挥军队围困台城（宫城）。从此，梁军开始了130多天的台城保卫战。

台城被围之初，城内有百姓10万，带甲将士3万，全城军民齐心协力，坚守台城。侯景命军士四面猛攻台城，梁名将都官尚书羊侃久经战阵，智勇过人，负责指挥台城防务。侯景先以火攻台城大司马、东华、西华诸门，羊侃亲临城门，令梁军将士钻门

①② 《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③④⑤⑥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为孔，洒水灭火。侯景又派兵砍东掖门强攻，羊侃命将士凿门为孔刺杀景军多人，侯景兵遂暂退。侯景纵兵焚烧台城城外士林馆、太府寺等地，随后继续攻城，先以木驴攻城，城上梁军掷以石块，木驴尽皆破碎。侯景又命以不畏矢石的尖头木驴进攻，羊侃命令军士作雉尾矩，上灌以油，点火后从城上掷下将其烧毁。侯景又于台城起土山两座，据以攻城，羊侃命人从下潜挖地道，其山不能立。侯景遍施攻术不逞，将士死伤惨重，遂于台城外起筑长围，隔断台城内外联系。十一月一日，侯景如约立萧正德为帝，自称丞相。随后修制百尺楼车，转攻东府城，城破，侯景遣其仪同卢晖略率兵数千人持长刀挟守城门，尽驱城内文武裸身而出，使城门守兵持刀乱杀，死者2000余人，南浦侯萧推亦被杀。侯景命卢晖略与萧正德之子萧见理镇守东府城。侯景为了瓦解台城内军心，增强自己的兵力，引诱城内奴隶为兵，凡投降者皆免为平民，并赐以官职。朱异家奴出城投降，侯景任其为仪同，并使其乘马披锦袍向城内炫耀，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领军（三品官），我始事侯王，已为仪同（二品官）"①。城内奴僮竞出投景，加上虏掠充兵的百姓，侯景兵力剧增，至数万之众。这时，原本率军北讨侯景的邵陵王萧纶闻侯景渡江，率军昼夜兼行回救建康。十一月下旬，萧纶率西丰公萧大春、新淦公萧大成等步骑3万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入援京师，进据鍾山（在今江苏南京东）。十一月二十九日，萧纶进军与侯景军相持于建康玄武湖侧，侯景先按兵不动，待至黄昏时引军后退。萧纶部下萧骏见景军退，率兵数十人追击，侯景见萧骏轻动，立即回军反击，萧骏败回，引起萧纶军混乱。侯景乘势猛攻，大败萧纶军，生俘萧大春以下1000余人，萧纶败还京口。十二月，负责台城防守的梁军主将羊侃病死。侯景乘机"造诸攻具及飞楼、撞车、登城车、钩堞车、阶道车、火车，并高数丈，一车至二十辆，阵於阙前，百道攻城"②。台城守军拼死抵抗，以火攻反击，悉焚景军攻具，力保台城不失。随

①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②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后，双方攻守连日，死伤累累，侯景始终未能破城。这时，梁材官将军宋嶷投降侯景，献计引玄武湖水灌城，侯景依计而行，于是"阙前御街并为洪波"①。

在侯景初围台城之时，梁湘东王、荆州刺史萧绎移檄各方镇，发兵入援京师。司州刺史柳仲礼、衡州刺史韦粲、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南陵太守陈文彻等皆率军赴援，集结于建康周围，共推柳仲礼为大都督，统一指挥盟军。柳仲礼分派诸军，使韦粲屯青塘（地当石头城要道，为建康防守要地），裴之高屯建康南苑，陈文彻与宣猛将军李孝钦屯丹阳郡，柳仲礼屯朱雀航南。太清三年（549年）正月，盟军劲旅韦粲移营青塘。久经战阵的侯景观韦粲营垒未合，率精锐出城突击。韦粲军副王长茂劝粲据寨栅拒之，韦粲不听，令军主郑逸迎击侯景，又使柳仲礼派来协助自己的直阁将军刘叔胤以水军截景军后路。刘叔胤畏懦不敢进，郑逸遂被景军击败。侯景军攻入粲军营寨，韦粲与其子弟数人皆力战阵亡。柳仲礼闻讯率军来救，亦被重创，险被景军活捉。盟军初战不利，士气大衰。不久，邵陵王萧纶复收散卒，与临城公、东扬州刺史萧大连等人合军至建康。高州刺史李迁仕，前司州刺史羊鸦仁，湘东王萧绎所派援军等，亦皆先后至建康外围，勤王之师总数约30余万，号称百万。萧梁诸路援军初至建康时，"百姓扶老携幼以迎王师"②。但援军"才得过淮，便竞剥掠，征责金银"③，大失民望。各路勤王之师不能团结对敌，"互相疑贰"，"甚於仇敌"④。他们或保存实力，互相观望，或"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⑤。援军不仅援救不力，而且欺压百姓，失去民心，景军中"欲自拔"降援军者，"闻之咸止"⑥。

太清三年（549年）二月，台城在侯景长期围困之下，粮食已尽，众军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⑦。当时侯景军粮食亦尽，不能再战，其所据东府城虽广有积粟，但其通路被梁勤王援军所断。而这

①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②③④⑥⑦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⑤ 《南史》卷三十八《柳元景传附柳仲礼传》。

时又闻湘东王萧绎率荆州水师将至建康。侯景与王伟计议，遣其将任约向梁武帝乞和，请割江右（指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区）四州之地给景，并请宣城王萧大器出城相送，然后撤围赴江右。梁武帝在太子萧纲固请之下，许其议和。但侯景并无求和诚意，其真实意图是想乘暂时议和，诸路援军按兵不动之机，抢运东府积粟入于石头，以解军粮之急，然后再一举攻下台城。武帝既许侯景之和，遂令已渐临近建康的湘东王萧绎等军回师，驻军江北的南兖州刺史、南康王萧会理等改屯江南；又令永安侯萧确等军进入台城，遂使侯景假和之计得逞。二月末，侯景军粮既足，又见诸路勤王军号令不一，矛盾重重，不足为虑，遂上疏数武帝十失，再次围攻台城。当时台城内军民死伤殆尽，守城者仅剩二三千人，且皆为羸弱，城内疾疫流行，横尸满路，无人掩埋，"臭气熏数里，烂汁满沟洫"①。三月，梁将羊鸦仁、柳仲礼等人进军东府城北，营寨未立，侯景派将领宋子仙率兵突袭，梁军大败，死者数千人。接着，侯景决石阙前水（前景引玄武湖水积于此者）灌城，百道攻城，昼夜不息。至三月十二日，台城终于被侯景军攻破。

侯景入城，撤换宫中侍卫，改由自己手下将士防守，废萧正德帝号，自为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执掌朝政大权。并矫诏命"征镇牧守各复本位"②，各路援军或降或散，一时尽去。五月，梁武帝忧闷而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傀儡皇帝。随后，侯景分兵攻占素称富庶的三吴地区，其势力达到顶点。

三、王僧辩、陈霸先讨侯景之战

当侯景攻破台城之后，湘东王、荆州刺史萧绎受梁武帝密诏，以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司徒承制主盟。梁武帝既死，荆、郢、雍、

---

①②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湘等州宗室方镇觊觎帝位，发生火并，“自相鱼肉”①，相互削弱梁军力量，正是所谓“代景行师”②。于是，侯景乘机向长江中游扩展势力，兵锋直逼荆、郢。梁大宝元年（550年）七月，侯景派大将任约率军进攻长江中游的郢州（治夏口，今湖北武汉），军至江州（治湓城，今江西九江）时，在江州的寻阳王萧大心遣司马韦质出战兵败，遂举江州投降任约。镇守郢州的邵陵王萧纶闻任约军将至，派司马蒋思安率精兵5000袭击任约。蒋思安初战得利，轻敌不备，反被任约击败。萧纶大修器甲，准备与侯景军决战。在上游的湘东王萧绎闻萧纶兵力强盛，心生猜忌，竟派大将王僧辩率兵1万以讨伐任约为名，突然进攻萧纶。九月，王僧辩攻占郢州，萧纶出逃，投靠北齐。任约乘机攻占西阳（今湖北黄州东）、武昌（今湖北鄂州）等地。萧绎急派左卫将军徐文盛、右卫将军阴子春等率军东下，迎击任约。从此，侯景军与萧绎的荆州军，在长江中游的郢州战场激战，致使侯景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的致命错误。荆州军本为萧梁军队主力，尤以水军为盛，而侯景军不善水战，从而使侯景在军事上开始走下坡路了。十一月，徐文盛大破任约军，侯景派将领宋子仙率主力2万赴援。大宝二年（551年）正月，萧绎遣护军将军尹悦等率水军2万东下，增援仍与任约军相持于西阳、武昌一带的徐文盛军。二月，徐文盛进军攻克武昌，任约退保西阳，向侯景求救。三月，侯景亲率水军2万西上增援。徐文盛见侯景军至，畏惧不敢战，诸将皆劝曰：“景水军轻进，又甚饥疲，可因此击之，必大捷”③。文盛不许。侯景暗中得知郢州空虚无备，遂派宋子仙率轻骑袭破郢城，活捉郢州刺史萧方诸，尽获武昌军人在郢州的家属。徐文盛军闻讯溃败，逃归江陵（今属湖北荆沙）。侯景乘胜西上，军势甚盛，其众“号二十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④。

---

①② 《梁书》卷二十九《邵陵王萧纶传》。

③ 《梁书》卷四十六《徐文盛传》。

④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在此之前，萧绎以领军将军王僧辩为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横等军，东下西阳迎击侯景。王僧辩军至巴陵（今湖南岳阳），闻徐文盛兵败，郢州失陷，遂屯驻巴陵。萧绎闻侯景乘胜西上，对御史中丞宗懔说："贼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顿长沙，徇地零、桂，运粮以至洞庭，湘、郢非吾有，此中策也。拥众江口，连攻巴陵，锐气尽于坚城，士卒饥于半菽，此下策也"①。侯景军至巴陵，偏偏选择了萧绎视为的下策，命将士设长围，挖土山，"起长栅绕城，大列舸舰，以楼船攻水城西南角"②。又修制虾蟆车、障车等攻具临城，昼夜从水陆猛攻巴陵。王僧辩命众军据城固守，侯景军死伤累累。侯景久攻巴陵不下，军中食尽，将士疾疫死伤大半。五月，萧绎再遣平北将军胡僧祐率兵救巴陵，侯景遣任约率精卒数千逆击僧祐。僧祐改道西上，任约以为僧祐畏己，尾随急追。胡僧佑引军据守赤亭（在今湖南岳阳西），与此时赶来的信州刺史陆法和合兵一处。六月，胡僧祐与陆法和大败任约军，临阵生擒任约，杀伤其军士甚众。侯景闻知任约被擒，命宋子仙、丁和等人戍守郢城，支化仁、阎洪庆等守鲁山（今湖北武汉汉阳），自己连夜奔还建康。赤亭之战，成为侯景在军事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王僧辩随之进军，连克鲁山、郢州。七月，乘胜东下进军湓城（寻阳郡治，今江西九江东）。

在侯景叛梁之初，梁高要太守陈霸先杀掉与侯景暗中勾结的广州刺史元景仲，起兵讨伐侯景。大宝元年（550 年），陈霸先自始兴（今广东韶关）进屯南康（今江西赣县），待时观变。萧绎承制以陈霸先为军师将军、南江州刺史。同年七月，侯景在派任约进攻郢州的同时，又派别将于庆进袭新淦（今江西新干）。陈霸先遣周文育与自保乡里的黄法氍合兵一处，击退于庆。大宝二年（551 年）二月，萧绎以陈霸先为江州刺史，命其攻取江州。截断

①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② 《梁书》卷四十五《王僧辩传》。

任约退路。于是，陈霸先率甲士3万、舟船2000艘自南康沿赣江顺流而下。七月，陈霸先率军进至巴丘（今湖南岳阳），准备与已进驻湓城的王僧辩军会师。当时王僧辩军乏粮，陈霸先贮有军粮50万石，遂分30万石给王僧辩军。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二月，王僧辩奉萧绎之命，自寻阳（治湓城）率大军东讨侯景，陈霸先也率所部甲士3万，自南江（今赣江）出湓口（即湓城），与僧辩会师于白茅湾（在今江西九江东北），王、陈二人筑坛盟誓，两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携手东进，直指建康。

四、侯景篡梁及其败亡

侯景攻入建康之初，立萧正德为帝，自为相国、天柱将军。太清三年（549年）攻破台城后，废萧正德，自为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相国、河南王、侍中等官职，控制朝政。武帝死后，拥立简文帝萧纲，以泰山等20郡自封为汉王。随后，又自号为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大宝二年（551年）六月，侯景自巴陵逃回建康后，废掉简文帝，改以豫章王萧栋为帝。同年十一月，侯景矫称萧栋禅位于己，升坛受禅，篡梁自立，定国号为汉，设置百官，大赦天下，改元为太始元年（551年）。

承圣元年（552年）二月，王僧辩、陈霸先联军东下，一路势如破竹。侯景派其将侯子鉴率水师迎击联军，侯子鉴军至战鸟（今安徽繁昌北），不战退逃。联军进军芜湖（今属安徽），侯景芜湖守将张黑也弃城逃跑，联军直指姑孰（今安徽当涂）。这时侯子鉴率步骑数万人据姑孰南洲（在今安徽当涂江中），以抵抗联军。三月初一，侯景亲至姑孰巡视营寨，并告诫子鉴说：“西人善水战，不可与争锋，往年任约败绩，良为此也。若得马步一交，必当可破，汝但坚壁以观其变”①。子鉴为避免与联军水军交锋，舍舟登

---

①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岸，闭营不出。王僧辩等遂停军十余日，侯景将士因而大喜，报告侯景说："西师惧吾之强，必欲遁逸，不击，将失之"①。侯景信以为真，准许侯子鉴与联军水战。子鉴领命，率水陆军俱进，联军迎击。二军激战于大江之中，联军水师战斗力强，大破侯景军，子鉴仅以身免。三月十二日，王、陈联军进至建康。侯景大惊，命将士自石头城至朱雀航缘淮立栅，以拒联军。联军与侯景军在建康外围展开大决战。这时，陈霸先对王僧辩说："前柳仲礼数十万兵（指勤王师）隔水而坐，韦粲之在青溪，竟不渡岸，贼乃登高望之，表里俱尽，肆其凶虐，覆我王师。今围石头，须渡北岸。诸将若不能当锋，请先往立栅"②。于是陈霸先于石头城西北连筑 8 座营寨，王僧辩率军营于石头城北。侯景见联军态势，恐西路被断，亲率侯子鉴、于庆等人于石头城东北立营垒 5 座，以便遏守大路。随后，侯景率万余人、铁骑 800，结阵而进，意欲突击联军。陈霸先分析敌情说："今我师既众，贼徒甚寡，应分贼兵势，以强制弱，何故聚其锋锐，令必死于我？"③乃命诸将分处置兵。陈霸先与侯景军激战于石头城西北，侯景军猛冲王僧志营，陈霸先遣徐度率弩手 2000 横截其后，乱箭齐发，景军退却。陈霸先与王琳、杜龛等人纵铁骑乘势猛攻敌军，侯景退还营垒据守。不久，侯景仪同卢晖略开石头城北门投降，王僧辩进占石头城。侯子鉴等人各弃营垒而走，侯景军大溃。侯景见大势已去，以皮囊盛其二子，率散卒百余骑弃建康东逃。王僧辩遣侯瑱率精甲 5000 追赶，侯景遂与腹心数十人乘船入海，欲从蒙山北逃。梁将羊侃之子羊鲲亦随侯景出走，暗使舵师直回京口。侯景发觉，羊鲲刺杀之，送其尸于建康。王僧辩、陈霸先传其首于萧绎所在地江陵。历时近 4 年之久的侯景之乱遂告结束。

同年十一月，萧绎在江陵即帝位，改元承圣，是为梁元帝。承圣二年（553 年）三月，萧绎请西魏出兵助其征讨在益州称帝的武

---

① 《梁书》卷五十六《侯景传》。

②③ 《陈书》卷一《高祖纪》。

陵王萧纪。西魏丞相宇文泰立即派大将尉迟迥进军梁（治今陕西汉中）、益（治今四川成都）2州。萧纪虽被消灭，但萧梁所辖梁、益2州皆被西魏占领。承圣三年（554年），原占据雍州（治今湖北襄樊）依附西魏的梁岳阳王萧詧与西魏合兵攻灭萧绎，西魏又将梁之雍州占领，并立傀儡萧詧于江陵。于是，萧梁长江上中游之梁、益、荆、雍等州皆被西魏占据。与此同时，东魏北齐也乘机攻略梁淮南江北之地，梁江北州郡，大半被北齐攻占。萧梁虽然最终平定了侯景之乱，但其辖区缩小，实力耗尽，已不可避免地趋向瓦解。

第三节　侯景之乱的深远影响

侯景自太清二年（548年）八月于寿阳起兵，仅7个月即攻破台城。他以不善水战的8000士卒，长驱直入，横跨大江，一举摧毁萧梁政权，这不是偶然的。侯景久经战阵，善于用兵，其行军作战，指挥灵活，变化多端，兵法谓“兵不厌诈”，这正是侯景用兵的一大特点。他对部下恩威并施，将士乐为其效死。同时侯景在东魏，专制与萧梁交界的河南地区14年，熟悉萧梁内情，他在讨梁檄文中，深刻揭露梁廷的腐败统治，在军事上集中打击以萧梁宗室为首的高门士族集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人民，使其野心能够暂时得逞。从萧梁方面看，梁士族政权极端腐朽，在侯景叛梁之前已呈土崩瓦解之势，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侯景正是利用了这些矛盾，才得以偷渡长江，攻破台城，横行江南近四年之久的。军事是政治的继续，萧梁政权的腐朽性，表现在军事上，是兵不习战，号令不一，其军队不堪一击，这也是侯景暂时得胜的原因之一。

侯景之乱是南朝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给南朝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侯景之乱直接摧毁了萧梁政权，使继之而起的陈政权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大为削弱。自刘宋元嘉末年宋魏大战之后逐渐

形成的北强南弱的趋势，至此更加明朗化，南北双方表面上势均力敌的局面被彻底打破。陈朝的统治区域在南朝为最小，长江上中游的荆、益、梁、雍地区被西魏占领，而中下游的江北淮南地区被北齐占领。陈立国“西不得蜀汉，北不得淮淝”①，局促于长江中下游的大江以南地区，因而陈朝在南朝各代中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最弱。

第二，侯景之乱对江南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萧梁京师建康，是江南经济发达区，也是南朝政权财政的重要来源地。而持续近 4 年之久的侯景之乱正好主要发生在这一地区。侯景围困建康台城数月，城中人口死亡殆尽，后王僧辩率领的荆州军平定侯景时，又抄掠百姓，烧毁宫殿，所谓“王师之酷，甚于侯景”②。建康地区遭此浩劫，其经济从此一落千丈。史称“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③的三吴地区亦是如此，侯景兵锋所及，烧杀抢掠，“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④。江南在侯景之乱中，人口损失严重，“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⑤。陈文帝天嘉元年（560 年）下诏云：“自丧乱以来，十有余载，编户凋亡，万不遗一，中原氓庶，盖云无几”⑥。由于南朝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遭到摧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必然受到破坏，社会经济难以及时恢复。因而南朝“自侯景之乱国用常褊（狭小，指不足）”⑦。南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和不能及时恢复，使陈朝因境域缩小带来的实力削弱更为加剧，它已完全无法与西魏（后为北周）、北齐抗衡了。

第三，侯景之乱使江南的士族势力遭到沉重的打击。萧梁时期，江南士族已日渐走向衰落，侯景之乱更使其受到沉重打击，从

---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历代州域形势》。

②⑤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③④ 《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三《梁纪十九》简文帝大宝元年五月。

⑥ 《陈书》卷三《世祖纪》。

⑦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此一蹶不振。侯景起兵之初，即有打击士族高门的企图，他曾“请娶于王、谢，（梁武）帝曰：‘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景恚曰：‘会将吴儿女以配奴’”①。侯景围攻建康时，“纵兵杀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军营”②。由于建康是江南士族聚居之地，侯景军的锋芒又主要指向士族，因而被杀者大部分是士族。后台城遭围困数月，城中饥疫流行，人口死亡殆尽。史载：“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③。此后，西魏攻破梁元帝占据的江陵，元帝身边的官僚及士民 10 余万被掳北徙，“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④，“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⑤。经过梁末建康和江陵两次战乱，江南士族遭受到致命打击，士族势力从整体上说，受到极大削弱，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第四，侯景之乱为江南少数民族酋帅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兴起开辟了道路。本已趋向衰落的江南士族，经过侯景之乱的沉重打击，在政治上已一蹶不振。当萧梁王朝濒临土崩瓦解之际，江南的酋帅豪强势力乘势兴起，登上了江南的政治舞台。史称：“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⑥。又说：“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⑦。陈王朝就是在酋帅豪强势力勃兴的基础上建立的，因而所谓“士庶天隔”的政治局面被打破，南方少数民族酋帅和地方豪强势力大批地涌进陈政权最高统治集团。如果把梁、陈两代最高统治集团士庶比例作一比较，可以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梁代将相大臣共 127 人，其中高门士族 109 人，约占总人数的 85%；庶民地主 19 人，约占总人数的 15%。在高门大族中，王、谢、袁、萧 4 大族共 68 人，约占士族总人数的

---

①② 《南史》卷八十《贼臣侯景传》。

③ 《北齐书》卷四十五《颜之推传》引《观我生赋》自注。

④ 《周书》卷三十二《周瑾传》。

⑤ 《颜世家训》卷三《勉学篇》。

⑥⑦ 《陈书》卷三十五《史臣曰》。

62%。这3种统计数字表明，梁代门阀势力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占绝对多数，他们把持最高统治权力。而王、谢、袁、萧四大族仅占将相大臣中士族23姓中的17%，却占士族总人数的62%。这又说明，王、谢、袁、萧第一流高门，在梁代上层统治中居于特殊地位。同时，梁代最高统治集团中，属于北方籍的共有110人，约占总人数的87%；属于南方籍的共有17人，约占总人数的13%。由此可知，从东晋以来，南方政权主要由北方南渡士族所掌握的局面，一直沿袭到梁代。陈代最高统治集团共有72人，高门士族共29人，约占总人数的38%；庶民地主共48人，约占总人数的62%。王、谢、袁（萧氏无一人）三姓共11人，约占士族总人数的38%。这3种统计数反映出，陈代最高统治集团士族人数，从东晋以来第一次退居少数。而且陈代最高统治集团中，属于北方籍的人物只有23人，约占总人数的30%；属于南方籍的共有54人，约占总人数的70%①。这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证明，陈代士族的衰落和南方豪帅的兴起。这是魏晋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历两晋、宋、齐、梁各代，最高封建统治集团中士庶组成结构带根本性的变化。侯景之乱给南朝政治和社会的深远影响，最集中地表现在这一点上。

---

① 朱大渭《梁末陈初少数民族酋帅和庶民阶层的兴起》，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第四编

北朝军事

第二十章　北朝政权的更替

第一节　北魏王朝的兴衰

一、北魏的崛起和统一北方

北魏王朝是由游牧民族鲜卑拓跋氏建立的。

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支，根据1980年7月在内蒙古发现的鲜卑祖庙——石室看，其最早游牧于今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一带。东汉时期，拓跋氏南迁入居塞外匈奴故地。到其始祖神元皇帝拓跋力微时，拓跋氏迁居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社会形态渐从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西晋末，力微之孙拓跋猗卢统部，有“控弦骑士四十余万”①，入居平城（今山西大同），受晋封为代公。猗卢助并州刺史刘琨击匈奴刘聪，进封代王。猗卢死后，“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②。后数传至拓跋什翼犍统部时，才逐渐安定。什翼犍少时曾作为质子居于后赵国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接受了先进的汉文化，即位后，仿汉制设置百官，建立

① 《魏书》卷一《序纪》。

② 《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附卫雄、姬澹传》。

年号，拓跋氏的国家初步形成。但什翼犍时代正是前秦王朝兴盛的时候。376 年，前秦主苻坚起兵攻打拓跋氏，什翼犍兵败被俘，其国家遂告灭亡。

公元 383 年淝水之战后，前秦王朝瓦解，北方各少数族纷纷自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也乘机复国。386 年，拓跋珪纠合拓跋旧部，于牛川（今内蒙古锡拉木林河）即代王位，建立年号，称登国元年（386 年），不久改称魏王。拓跋珪称王后，先后大破塞外另一游牧民族高车部及匈奴别种刘卫辰部，俘获大批人口牲畜，北方许多游牧民族随之纷纷归顺，拓跋珪势力日益强大。

这时，北方割据诸国中最为强盛的后燕见拓跋氏对自己构成威胁，且不肯臣服于己，便决定进攻拓跋氏。北魏登国十年（395 年）五月，后燕主慕容垂派其太子慕容宝率兵 8 万向立国未久的拓跋魏发动进攻。拓跋珪见后燕军来势凶猛，采取避敌锐气的战略，率部落西渡黄河，不与敌交战。到当年十一月，拓跋珪乘后燕军师老兵疲之时，分派诸将截断燕军退路，自己亲率 2 万精锐骑兵追赶正要撤退的燕军，终于在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大破敌军。后燕军全军覆没，慕容宝单骑逃回，拓跋珪将俘虏的后燕军士四五万人全部坑杀。经此一役，后燕元气大伤。北魏皇始元年（396 年），后燕主慕容垂为报参合陂之仇，亲率大军攻魏。拓跋珪同样采取先避敌锐气，后发制人的战略方针，慕容垂大军虽进据拓跋氏所居之地，但始终未能与拓跋珪的主力决战。不久，慕容垂因病死去，后燕军无功而返。此后，后燕政权一蹶不振。

皇始元年八月，拓跋珪亲率大军 40 余万南下，向已呈颓势的后燕发动进攻。九月，后燕并州牧慕容农弃城而逃，魏军攻占晋阳（今山西太原南），随后又相继攻占信都（今河北冀州）、中山（今河北定州）、邺（今河北临漳西南）等重镇。魏军兵锋所及，后燕守将纷纷归顺。到天兴元年（398 年）正月，拓跋魏已尽占今山西、河北等地，势力迅速发展。同年，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改称皇帝，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是为北魏道武

帝。

道武帝死后，拓跋氏继续向四周扩展势力。到其孙太武帝拓跋焘时，先后灭掉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统一了北方的广大地区。

二、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

北魏以游牧民族入主封建经济发达的汉族中原地区，是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通过武力征服这一手段来实现的。它虽然表面上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但这一地区固有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仅没能得到解决，反而更加尖锐起来。因而北魏从建国到孝文帝改革前的100多年间，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统治很不稳固。北魏前期，官吏无俸禄，更促使各级官吏贪赃枉法，聚敛财富，残酷盘剥百姓。各族人民不堪重压，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绵延不断。同时，北方自西晋永嘉之乱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并未得到恢复，农业生产衰落，大批良田和劳动人手掌握在豪强大族手中。而且，大量的荒地无人垦殖，国家无法取得足够的田租户调收入，这种情况又反过来激化了各种矛盾。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

文明太后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452～465年在位）的皇后，文成帝死后，献文帝继位（466～470年在位），她被尊为皇太后。延兴元年（471年），不满5岁的孝文帝拓跋宏即帝位，文明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从此直至太和十四年（490年）去世，她掌握北魏大权达20年之久。文明太后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女政治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她和孝文帝共同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北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改革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均田制和推行汉制两方面的内容。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颁布均田令，宣布实行均田制。其规定：男子15岁以上受露田40亩，女子20亩。根据当时的休耕法，凡使用2年轮种一次的，男子受田80亩，女子40亩；使用3年轮

种一次的，则男女分别受田120亩和60亩。露田不许买卖，身死及年满70岁时，归还朝廷。此外，初受田的人，男丁每人给桑田20亩，作为永业田，死后不还。新受的桑田必须在3年内种上规定数量的桑、榆、枣树。不宜种桑的地方，男子给麻田10亩，妇人5亩。新定居的民户还有少量宅田。又制订田租户调之法，一夫一妇每年向国家交纳帛一匹，粟2石。奴婢同平民一样受田，不给桑田，一奴每年交纳平民租调的八分之一。丁牛一头受露田30亩，每户以四头为限，一牛每年交纳平民租调的二十分之一。

推行均田制，必须从整理户籍入手。魏廷在颁行均田制的第二年，又颁行3长制，即5家立一邻长，5邻立一里长，5里立一党长。3长制是为了清查和控制人口，一方面和世家大族争夺劳动人手，另一方面防止百姓的逃亡。只有朝廷控制了大量的劳动人手，才能推行均田制，因而3长制与均田制是相辅相成的。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为了加强对中原的控制，进一步加深改革，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推进民族融合，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此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汉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改革官制。北魏前期，官制胡、汉混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模仿汉晋南朝制度改革官制。在中央设置三师、三公、门下、中书、尚书、九卿、将军等官，地方上统一设置州刺史、郡守、县令等各级官吏，又设立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这样，北魏的各级行政机构和职官名称全部实行汉制。

禁胡语胡服。太和十九年(495年)六月，孝文帝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指鲜卑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①。禁止各级官吏用鲜卑语，"一从正音"，即皆用汉语。并规定，凡30岁以上的人，因习性已久，可逐渐改说汉语。30岁以下的人，必须全部使用汉语，如有违犯的，要降爵黜官。此项改革颇为重要，因为只有学会汉语，才能更好地学习汉人的经典文化。与此同时，

---

①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孝文帝命令鲜卑人不论男女，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禁止再着胡服。

改鲜卑姓为汉姓，重新规定胡、汉士族等级。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命帝室拓跋氏改姓元氏，又将北魏皇族九姓及北魏初期所统部落118氏，大都改为汉姓。孝文帝又使鲜卑贵族门阀化，并以世代官位高低评定胡、汉士族门第的高下，奖励胡汉通婚，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在仕宦和血缘上结合起来。

此外，北魏王朝还于太和八年（484年）颁行了官吏的俸禄制度。并规定，此后再有贪赃满一匹的，便要处以死刑。太和十六年（492年），又颁行了仿照汉制制订的新律。

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的改革，推进了北方民族融合的进程，缓和了北魏境内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并使胡、汉统治阶级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巩固北魏政权的目的。同时，改革也使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由于均田制的实行，一部分荒地得到开垦，大批劳动人手与土地结合起来，使农业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到北魏孝明帝（516～528年在位）神龟年间（518～519年），“国库殷实，库藏盈溢，钱绢露积于廊者，不可较数”①。魏廷所掌握的户口数也急剧上升，比西晋最繁荣的太康年间的户口数，竟多出一倍。北魏王朝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达到极盛时期。

三、北魏后期政治的腐败

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的兴盛并没有维持多久。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孝文帝病死，继任的宣武帝元恪资质平庸，为政“宽以摄下，从容不断”②，朝政渐趋衰败。延昌四年（515年），宣武帝死，7岁的孝明帝元诩即位，其母胡太后临朝称制。正

① 《洛阳伽蓝记》卷四《法云寺》条。

② 《魏书》卷八《世宗纪》史臣曰。

光元年（520年），宗室元义和宦官刘腾幽禁胡太后，2人专断朝政，北魏政治更加腐败。北魏后期，朝中权贵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地方州郡长官更是贪污腐化，"聚敛无极"①。与此同时，北魏宗室贵族经过门阀化后，生活上也迅速地腐化起来，当时的"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②。有的"僮仆六千，妓女五百"③，有的"奴婢千数"④，有的"富倾天下"⑤。贵族官僚们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压榨之上的，因而北魏后期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又尖锐起来。此外，由于北魏的迁都和鲜卑贵族门阀化，造成了鲜卑内部南迁洛阳者，同镇守北方六镇者之间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上的差异，随着戍守北疆六镇士卒的贫困，六镇成为北魏后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地区。正光五年（524年），魏末各族人民反抗北魏王朝残酷压迫剥削的大起义，终于在六镇地区首先爆发了。接着经过河北起义和关陇起义，北魏王朝就在人民大起义的烈火中崩溃了。

四、北魏分裂为东、西魏

在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中，居于北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境内）的契胡（即羯人）酋长尔朱荣乘机起兵，控制了北魏政权。随后，尔朱荣凭借其强大的骑兵，扑灭了各地起义军，尔朱氏势力得到迅速发展。尔朱荣死后，其从子尔朱兆继续掌握大权，尔朱氏掌权后"割剥四海，极其暴虐"⑥，魏末腐败政治因循未改。这时，出身于六镇下级官吏，曾参加魏末六镇起义又转而投靠尔朱

---

① 《北史》卷十五《魏河间公齐传附孙志传》，同卷《魏常山王遵传附晖传》。

② 《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

③⑤ 《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

④ 《魏书》卷二十一《咸阳王禧传》。

⑥ 《魏书》卷七十五《尔朱世隆传》。

荣的高欢，以去山东避荒就食为名，带领起义失败后被改编的六镇兵卒，至冀州首府信都(今河北冀州)起兵，联合当地的汉族豪强势力，反抗尔朱氏。后来，高欢又击败前来进攻的尔朱氏 20 余万军队，成功地控制了今山东、河北地区。不久，高欢废魏帝元朗，另立宗室元修为帝(孝武帝)，自任大丞相，居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控制朝政。元修不甘心自己的傀儡地位，与高欢的关系日益紧张。永熙三年(534 年)五月，元修发河南诸州兵，准备突袭晋阳。高欢闻知，亲率 20 万大军南下，声言伐梁，意欲先向元修发动进攻。元修见大势已去，西逃入关投靠宇文泰。高欢改立魏宗室元善见为帝，并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史称东魏，元善见是为东魏孝静帝。从此，北魏分为东、西魏。北魏一朝历 12 帝，凡 148 年。

在高欢割据河北、山东的同时，出身于六镇武川豪强，也曾参加魏末起义军又投靠尔朱荣的宇文泰，凭借武川豪强酋帅割据关陇地区。永熙三年，北魏孝武帝元修自洛阳逃奔关中，宇文泰遂奉元修为帝，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同年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元修，另立元魏宗室元宝炬为帝。次年，改年号为大统元年（535 年），史称西魏，元宝炬是为西魏文帝。

第二节　北齐、北周的对峙及北周灭北齐

一、东、西魏被北齐、北周取代

东、西魏虽然表面上都奉魏宗室为帝，但实际权力却分别掌握在高欢和宇文泰手中。以后东、西魏便被北齐、北周两个政权所取代。

高欢拥立元善见为东魏皇帝后，自己以大丞相居晋阳遥控邺城朝政，其时“军国政务，皆归相府”①。东魏武定五年(547 年)，高

①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欢死，其子高澄继任其位。高澄执掌东魏大权后，加紧夺取帝位的步骤，但未及成功，便于武定七年(549年)被刺身亡。其弟高洋继掌朝政。武定八年，高洋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并受封为齐郡王，食邑1万户，不久又进封齐王。到这一年的五月，东魏帝元善见见大势已去，遂将帝位禅让给高洋。于是，高洋即帝位，改国号为齐，史称北齐，高洋是为齐文宣帝。

宇文泰拥立西魏文帝元宝炬建立西魏政权后，自己任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大行台，实际掌握军政大权，西魏文帝形同傀儡。此后，宇文泰又进位柱国大将军，再进位为太师、大冢宰，朝廷军国大事一由己出。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十月，宇文泰病死，其三子宇文觉继任其位。当年十二月，宇文觉进封周公。随后，西魏恭帝将早已有名无实的帝位禅让于宇文觉。宇文觉登上帝位后，改国号为周，以长安为都，史称北周，宇文觉是为北周孝闵帝。至此，西魏政权又被北周取代。从此，北方形成北齐、北周东西对峙的局面。

二、北齐的反动统治及其衰败

北齐强大时期，占有今黄河流域下游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及苏北、皖北等广大农业生产发达区，拥有户口300万，人口2000万，国力强盛。从经济军事力量对比上看，北齐强于北周，尤其在军事实力上，北齐拥有一支数量远胜于北周的强悍的鲜卑兵，在与北周的对峙乃至互相争斗中，北齐实力上居于优势。但北齐统治者实行的却是一条不利胡汉融合的政治路线。北齐的创建者高欢是依靠六镇鲜卑才得以成功的，因而北齐在政治上鲜卑化的倾向很重，而且最高统治者竟将鲜卑化作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北齐境内，通行鲜卑语，鲜卑贵族视汉人为奴，歧视迫害汉人，这无疑是对孝文帝实行汉制政策的反动。北齐当权者的这种作法，不仅使得汉族百姓与鲜卑贵族矛盾激化，即使在统治集团内部，胡、汉之间的关系也渐趋紧张，因而北齐时期的民族矛盾又尖锐起来。

北齐最高统治者为了拉拢鲜卑贵族，对他们实行一种纵容、放任的政策，这使得北齐的吏治极其腐败。早在高欢执政的东魏时期，汉人大臣杜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洁”①，请高欢先限制掠夺百姓的勋贵，再向外发动进攻。高欢却回答说：“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②。由于高欢需要这些勋贵为他效命，以对抗西魏宇文泰和江南的萧梁政权，对于他们的贪赃枉法，不肯处置。因而，北齐一朝，从朝廷到地方州郡，吏治败坏，贪污贿赂成风。到北齐后期，更是“官由财进，狱以贿成”③，“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竞为贪纵，民不聊生”④。广大劳动人民在如此残酷的剥削之下，无以为生，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北齐时期，也曾实行过旨在振兴农业生产，扩大国家赋役征收范围的均田制。河清三年（564年），北齐朝廷颁行均田令。这次均田令同北魏太和年间的均田制大体相同，但奴婢受田有限制。按规定：“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正三品已上及皇亲，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⑤。在北齐政权腐败的情况下，这些限额不会起多大作用。北齐的赋役制度规定，一夫一妇除每年交纳垦租二石，绢一匹外，还要交纳义租五斗，绵八两，百姓的负担显然比北魏加重了。此外，北齐的力役征发，也很繁重。

由于北齐统治区是地主经济发达的地区，土地兼并剧烈，“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⑥。因而北齐均田制没有能很好地实行，所以均田令颁布后，仍然是“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⑦。贫苦农民由于承受不了沉重的赋役负担，纷纷逃亡，于是“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产，至春困急，轻致藏走”⑧。在这种状况下，北齐统治地区社会经济遭到破坏，其财源和兵源受到限制，因而北齐的

---

①② 《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

③④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⑤⑥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⑦⑧ 《通典》卷二《田制下》引《关东风俗传》。

实力严重地被削弱了。到后期,更是“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殚,帑藏空竭”①。北齐在与北周的力量对比中,逐渐处于劣势。

三、北周的改革及统一北方

关于北周的改革，实际上包括西魏宇文泰和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改革。

北周强盛时占有今陕西、宁夏、甘肃、四川以及云南、贵州、湖北、河南的部分地区，北周的主要统治区域如关中地区的社会经济，没有北齐境内那样发达，军事实力也远弱于北齐，整个立国条件不如北齐。北周要想图存和发展，必须走一条全面革新的道路。西魏和北周初期的关中地区，经济不如北齐的河北、山东地区发达，士族势力不很强大等特点，恰好使北周的改革比北齐要少一些阻力，多一些有利条件。加之北周的最高统治层，较少门阀士族的腐败习气，比北齐统治集团显得有生气。他们锐意革新，继续推行汉制，最终使北周的改革取得了成功。

北周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项内容。

选拔贤能，整饬吏治。宇文泰执政时，令谋主苏绰制订的《六条诏书》，就有《擢贤良》一条。据此，西魏北周选举不限门第高下，“唯在得人”②，尽量将各方面的贤才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因而西魏北周的吏治清明，各级官吏大体都能廉洁奉公。这既是北周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改革得以成功的必要保证。

实行均田制，发展生产。西魏时重新颁布均田令，并严格禁止大户隐丁、隐地，以法律形式规定：“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刑”③。很显然这是为了保证均田制的顺利

①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②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③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施行。此外，西魏北周命令地方各级官吏大力劝课农桑，并制订很具体的劝课内容，令地方官吏执行。这一切，都促进了北周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均赋役，减轻人民的负担。北周对百姓征收的赋税，联系均田令中的受田数，比北魏要轻。北周力役规定："凡人自十八至五十有九，皆任于役"①。这也比北魏时15岁开始服力役的规定减轻了。而北周在征收赋役上最突出的，是坚决革除北魏赋役舍强征弱的弊政，强调均平赋役，《六条诏书》中有一条即是"均赋役"。北周政权要求地方官吏征收赋税，要"斟酌贫富，差次先后"，先富后贫，征发徭役也严禁"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一类的现象发生。如果借征发赋役，欺压百姓，地方官就是"王政之罪人"②，要受到严厉惩处。

创立府兵制度。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年），宇文泰将鲜卑部落兵制和周官六军二者结合，创建了府兵制。府兵制中设八柱国，宇文泰为八柱国之首，总领府兵，另一柱国为北魏宗室，仅具虚名，因而实际领兵官为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下，每柱国又各设二大将军，共12大将军；每大将军下，又各设二开府，共24开府，是为24军。府兵归西魏北周中央直接指挥，属于中央禁卫军性质，士兵地位比前之兵户有很大的提高。北周府兵制的创建，加强了中央集权，增加了军事实力，对于后来北周的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

释放奴婢，罢沙门道士为民。这项措施主要在周武帝时代进行。周武帝曾5次下诏放免奴婢为平民，大批奴婢经过放免成为国家的编户，这对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赋税收入的增加，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承北魏以来寺院势力急剧发展的趋势，北周、北齐境内僧尼总数竟达300万人。如此众多的人口游离于国家领民之外，严重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因此，

---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② 以上均见《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周武帝于建德三年（574年）下令："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①。这一重要措施，使大批的人力、物力回到国家手中，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北周的国力。

由于北周改革措施的实施，其国势日渐强盛，在与北齐的对峙中逐渐由弱变强。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出兵灭亡日益衰落的北齐，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与长江上游广大地区，为以后隋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

①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第二十一章　北朝的军制

第一节　北朝军事指挥机关的沿革

一、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变化

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3个时期的中央军事领导机关有很大的差异。

北魏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北魏建国之初，拓跋部刚刚进入奴隶社会，其政权还留存有浓重的氏族部落联盟的痕迹。北魏当时的军事力量主要即是部落兵，他们分属于各部落酋帅，而部落酋帅则听命于皇帝。因而，北魏早期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由皇帝与各部落酋帅组成，皇帝是最高军事统帅。北魏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拓跋珪"初建台省，置百官"①，仿照魏晋汉制设置官吏，其中包括不少武官官职。但北魏前期，这类官职徒有虚名，实际掌握北魏军政大权的是与之并行的鲜卑官职，主要包括八部大人和内侍官两部分。由于北魏前期军政不分，八部大人和内侍官，实际上也就是北魏前期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天兴元年（398年）十二月，道武帝在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置八部大夫，"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常侍……出入王命"②。八座，即相当于魏晋尚书中的八座。二年（399年）三月，道武帝又"分尚书三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③。至此，八部大夫成为北魏前期的中央军政中枢机关。八部大夫即

①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②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

拓跋部落酋帅，又称八部帅。他们还掌管京畿地区亦农亦兵的部落成员，对其“劝课农桑，量校收入，以为殿最”①。道武帝之后的明元帝拓跋嗣继续实行八部大人制，神瑞元年（414 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属官，总理万机，故世号八公云”②。泰常二年（417 年）夏，曾改“置六部大人官，有天部、地部、东、西、南、北部，皆以诸公为之，大人置三属官③”。八部大人常“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④，是北魏前期辅佐皇帝处理军政的决策机关，也就是当时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北魏前期的内侍官有都统长、幢将等职。登国元年(386 年)，道武帝置都统长，又置幢将等官。都统长领殿内之兵，直卫皇宫；幢将员六人，主三郎卫士直宿禁中者。都统长和幢将是皇宫宿卫武官，分别掌管殿内及禁中的宿卫军。北魏前期还设外朝大人，为皇帝的侍从官，掌管出纳诏命。北魏的内侍官虽不亲身参预军事领导，但由于其身为皇帝近臣，常可“迭典庶事”，“参军国之谋”⑤。因而在北魏前期，内侍官有时可以发挥中央军事领导机关的职能。

在太武帝时代(424～451 年)，北魏前期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发生一些变化。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设置尚书左、右仆射，尚书左、右丞及诸曹尚书等官，加强早先在北魏官制中不起多大作用的尚书省的实际权力，八部大人制逐渐被弃置不用，尚书省成为中央行政中枢。尚书省中与军事有关的尚书，也就成为太武帝时代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如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⑥，掌管皇帝宿卫军，是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重要部门。又如北魏特有的南部、北部尚书，分掌南边、北边州郡军政大权，也属于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重要部门。

---

① 《魏书》卷一百一十《食货志》。

②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

④ 《魏书》卷二十五《长孙嵩传》。

⑤ 《魏书》卷二十九《叔孙建传》。

⑥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太武帝世，北魏的内侍武官仍掌握兵权。明元帝时增加的四厢大将、十二小将等内侍武官也保存下来，与幢将等共掌皇帝宿卫军。

此外，从道武帝开始，北魏朝廷还常任命王公重臣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等职，使他们担当一方的军事重任。如道武帝时，曾以东平公拓跋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其进攻后燕中山（今河北定州）、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等地。又如文成帝兴安元年（452年）曾以骠骑大将军元乐寿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北魏前期这类官职，乃是北魏皇帝临时设置，不如魏晋及南朝同样官职权重，但仍可视作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一部分。以上是北魏孝文帝改制前，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大体情况。

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孝文帝元宏仿魏晋旧制作《职员令》21卷，改革官制。从此，北魏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有了根本的变化。

改革后的北魏军事力量包括中兵、镇戍兵、州兵3部分，其中，中兵是军队的主力，是北魏王朝的主要支柱。因此，中兵的指挥系统是北魏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主要部分。

北魏后期，中兵的领导体制仿效汉制，设领军将军一人，总统中兵。领军将军权势极大，孝明帝世（516～528年在位），宗室元叉为领军将军，时人说他“总握禁旅，兵皆属之”①。宣武帝（500～515年在位）时，咸阳王元禧任宰辅，权重一时，曾向领军将军于烈求差遣羽林虎贲等武士执仗出入。于烈断然拒绝说：“领军但知典掌宿卫，有诏不敢违，理无私给”②。从中也可窥见领军将军的权势。领军将军下设左、右卫将军各一人，左、右卫将军下又各设武卫将军二人；领军将军以下还有领左、右将军等职，以下还有各种名号武官。此外，京师四面设置的关津，也由中兵镇守，分由东、西、南、北四中郎将统领，另由护军将军总统四中

---

① 《魏书》卷十六《京兆王黎传附继子叉传》。

② 《魏书》卷三十一《于栗磾传附于烈传》。

郎将，捍卫京师。

中兵系统外，北魏后期尚书省设五兵尚书专管兵事，下设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等曹郎，分统军事。这是北魏后期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又一主要部分。此外，北魏后期还常置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官职，以掌管军事。

以上是北魏后期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大体情况。应该指出，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无论在北魏的前期或后期，魏廷的军事领导机构都必须对君主负责，君主是真正的最高军事领导者。

东魏北齐时期，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也有一个变化过程。东魏皇帝是傀儡，朝廷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丞相高欢父子手中。因而东魏朝廷形式上存在的军事职官系统毫无实权，东魏真正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是丞相府。

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等人在东魏皆担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官，替代皇帝成了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高氏丞相府中设内、外二曹专管兵事，内曹为骑兵曹，管中兵即鲜卑兵诸事；外曹是步兵曹，管外兵即汉人兵诸事。这是东魏真正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高氏取代东魏建立北齐后，中央军事领导机构随之发生变化。天保元年（550年），高欢次子高洋代魏称帝，高洋即文宣帝。文宣帝登上皇位后，为使实际权力继续掌握在自己手中，于同年十月罢丞相府，将丞相府下属诸司合并尚书省。他又特意留下骑兵、外兵二曹，改立为省，称骑兵省、外兵省，命亲信大臣唐邕、白建分任二省长官，仍掌兵事，由自己亲自管理。于是，骑兵、外兵二省成为北齐特有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北齐仍沿袭北魏旧制，设置领军将军等一整套官职指挥中兵，还设五兵尚书及所属曹郎 掌管兵事，其大体情况如上述魏制。同时，北齐又在京师邺城设置京畿大都督一人，统领京畿地区领军将军系统之外的所有军队，职权也很重①。这也属于北齐中央重要

---

①《周书》卷三十六《王士良传》："东魏徙邺之后，置京畿府，专典兵马。"

的军事领导机构。

西魏北周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自成系统，与北魏、东魏北齐都大不相同。

西魏时期，朝政大权掌握在丞相宇文泰手中，皇帝成为傀儡。宇文泰自任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是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他的丞相府遂成为西魏中央的军事领导机构。宇文泰丞相府中设有谘议、中兵、外兵等参军及各种属官，分掌军事。

由于西魏实行了府兵制，府兵虽归宇文泰指挥，但属于宿卫兵性质，也即是中兵。因而，府兵的指挥系统是西魏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的另一重要部分。西魏府兵制，设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自任其一，实为府兵统帅，另一柱国大将军元欣仅具虚名，实际只有六柱国大将军，其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下，各设二大将军；大将军下，又各设二开府；开府下，又各设二仪同，以下还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武职。宇文氏代西魏建立北周后，周武帝宇文邕为加强中央集权，将府兵收归自己亲自统率指挥。府兵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央宿卫军。

北周制度与北魏、东魏不同，集中表现在宇文泰执政时命大臣苏绰、卢辩依《周礼》创建的官制上。这种官制在宇文泰时并未能实行，直到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即北周代西魏的前一年，才颁令实施。因此，西魏时依《周礼》制定的官制，主要实行于北周时期。

北周官制中，夏官系统执掌兵事，其长官为大司马，总统夏官府诸官。周武帝时，卫剌王宇文直“请为大司马，意欲总知戎马，得擅威权”①。可见大司马确掌握中央军权。大司马下，设小司马、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等多种属官，分掌军事②。这是北周特有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

---

① 《周书》卷十三《卫剌王直传》。

② 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五《夏官府第十》。

二、地方行政建制及军事机构的变化

北魏建国后，道武帝在四处征伐中不断在所攻占的郡县设置地方官，开始了地方行政的建置。天赐二年(405 年)，道武帝下令每州置 3 刺史，每郡置 3 太守，每县置 3 县令。但其中的太守在初置的一段时间内大约未曾临民。道武帝在攻灭后燕后，曾在燕地设置军府①，"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这是北魏前期在地方设置的军事机构。天赐元年(404 年)十月，"又制诸州各置都尉以领兵"②。后将此制继续推广。同时，北魏为防御北方柔然等游牧民族的南侵，在北部边疆设置镇戍。史称"旧制缘兵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③。实际上，北魏初期，如果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民族关系复杂，则专置镇戍以统民；如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处，则镇戍与州郡并置，如长安镇与雍州同置，仇池镇与梁州同置等。大体说来，北魏前期的地方军事机构，诸州设都尉协助刺史统领州兵，缘边和内地诸镇设镇将统御镇戍兵。北魏从皇始(396～397 年)年间开始，还在少数族聚居地区设置护军，加以军事控制。如离石、吐京、阻曲、柏壁等地都设有护军，后来护军制似渐改为镇戍④。如护军地区少数民族已分户农耕，则改护军为太守。随着北魏军队的南进和统治区的扩大，地方军镇的机构的设置逐渐推广至新占地区，从而南方缘边与南朝接壤的地区，也设置了不少镇戍。北魏后期的地方军事机构与前期相比无大变化，仍是诸镇镇将统御镇戍兵，州郡牧守统率州郡兵。

北魏诸镇特别是诸州郡领兵机构，在地方军事机构中不占主导地位，尤其在北魏后期州、郡、县滥置以后，州郡系统的作用更是日趋减弱。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军事机构，乃是地方都督制。

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即曾仿魏晋旧制设置都督，但地方都

---

①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附弟椿传》。

②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

④ 《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石州》条。

督制的确立，却是在太武帝时期（424～452年）。神䴥三年（430年），太武帝下诏："诸征镇将军、王公仗节边远者，听开府辟召，其次增置吏员"①。大约在此时，仗节在外的将军、王公等都督，方可开府置吏，北魏都督制也才逐步完善。

北魏都督，一般由朝廷委派，督率一方军队，统辖范围常达数州。在名位上，也如同两晋南朝，有使持节、持节、假节以及都督诸军、督诸军的高下区别，唯独都督诸军之下、督诸军之上的监诸军这一名号似不常设。如太武帝延和二年（433年）正月，曾以乐安王拓跋范为假节，加侍中，都督秦、雍、泾、梁、益5州诸军事，卫大将军，仪同三司，镇长安。又太平真君三年（442年）曾以淮阳公皮豹子等人督关中诸军、建兴公古弼督陇右诸军，郁林公司马文思督洛、豫诸军事，共讨宋将裴方明。孝文帝时，也曾以赵郡王元干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都督关右诸军事"②。此外，北魏还常设西道都督、东道都督，分掌东、西道数州军事。

北魏都督一方者，皆可全权处理一方军事。因而孝文帝在任命元干为都督关右诸军事后，"以干总戎别道，诫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师，散骑常侍卢渊方堪询访，汝其师之'"③。

北魏前期，都督虽常兼任刺史，但刺史却未必都是都督，而且都督所辖也常不止一州。但至后期，都督设置渐滥，诸州刺史大多为都督④。如李愍即曾于魏末先后任易阳当郡大都督、相州都督、东荆州大都督等职。而且"郡县之官，率多行督"⑤。这时的都督已成为地方州郡常设的军事机构，而且已具有军政合一的性质。

东魏北齐时期，地方军事机构大体同于北魏后期，其主体也是都督制。

如同北魏一样，东魏北齐常设置都督主一方军事，其统辖区

---

①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③ 《魏书》卷二十一上《赵郡王干传》。

④ 《北齐书》卷十八《高隆之传》。

⑤ 《魏书》卷十一《后废帝纪》。

域少则数州，多则十余州。如东魏天平（534～537 年）年间，尉长命被任命为车骑大将军，都督西燕、幽、沧、瀛 4 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斛律羡也曾于北齐河清三年（563 年）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北营、东燕六州诸军事，幽州刺史。武定年间（543～550 年），梁州刺史张亮加都督扬、颍等 11 州诸军，转都督二豫、扬、颍等 8 州军事，征西大将军，豫州刺史。

除以上持节主管一方军事的都督外，北齐还有具体领兵的州郡都督，这也是北齐地方军事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魏末年，州郡滥置，数量大增，州郡牧守多为当部都督。东魏北齐承此遗风，牧守亦大体为当部都督。天平（534～537 年）年间，尚书仆射高隆之曾上表建议整顿地方滥置都督的现象，以减少僚佐，请州郡"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①。史称此表上奏后，"诏奏如表"②。那么，可能这一现象有所改变。

东魏北齐时，沿袭北魏，在缘边地区设置镇戍。如文宣帝（550～559 年在位）时，"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③。东魏北齐的镇戍，镇设镇将、副将；戍设戍主、副。北齐的镇戍，也是其地方军事机构的一部分。

西魏北周的地方军事机构，大体上也同于北魏，但在名称上有些变化。西魏时期，地方军事机构的主体仍是都督制。如西魏大统六年（540 年），独孤信曾任陇右 10 州大都督、秦州刺史。西魏废帝二年（553 年），尉迟迥因平蜀之功，被任为大都督、益、潼等 18 州诸军事、益州刺史。大统十三年（547 年），宇文导被征为陇右大都督、秦、南等 15 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西魏时，除以上主一方军事的大都督外，州郡等地方官似亦沿袭北魏后期制度，兼任当部都督。当时称总一方军政的都督为大都督，可能即用以区分刺史郡守兼任的都督，以及当时存在的实即领兵官的各种都督。

---

①② 见《北齐书》卷十八《高隆之传》。

③ 《北齐书》卷四《文宣纪》。

北周时期地方军事机构的主体是总管制。总管，实即原来的都督。北周武成元年（559 年），周明帝“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①。此后，总管制正式建立。

北周的总管有大、小的区别。大者一般统辖数州或十余州，最多者可至数十州；小者仅统一州，实即原先的当州都督。如武成(559～560 年)时，宇文宪除益州总管、益、宁、巴、泸 24 州诸军事、益州刺史。这是大总管。周武帝保定五年(565 年)，下令“荆州、安州、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②。这里的荆州、安州、江陵总管，应是小总管，即仅掌管一州军事的总管。北周末年，益州总管王谦反叛时，“所管益、潼、新、始、龙、邛、青、泸、戎、宁、汶、陵、遂、合、楚、资、眉、普十八州……之人多从之”③。与王谦同时反叛的郧州总管司马消难起兵时，其所管郧、随、温、应、土、顺、沔、环、岳等 9 州响应。这里王谦与司马消难显然是大总管，从前边的安州、荆州、江陵总管归襄州总管统领推断，他们所领之 18 州和 9 州应各有总管，而属于小总管。

西魏北周时期，在边境及一些重要地区也设置镇戍。如司马消难所统 9 州中，便有鲁山、甑山、沌阳、应城、平靖、武阳、上明、涢水等 8 镇。这 8 镇即是当时的地方镇戍。镇戍设镇将、戍主主管镇戍军务④。西魏北周的镇戍，也是地方军事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节　北魏的军队体制

一、北魏由部落兵向常备军的转化

北魏早期，部落兵是其军队的主体。北魏建国之初，拓跋部

① 《周书》卷四《明帝纪》。

②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③ 《周书》卷二十一《王谦传》。

④ 《隋书》卷二十八《百官志》下。按：隋制当沿袭周制。

的氏族部落联盟虽然在逐渐解体，但其部落组织还大量存在。在部落联盟时期，氏族成员既从事生产，又参加氏族的军事行动，每一成员既是生产者，又是部落兵，因而在部落组织大量存在的北魏早期，军队即由部落兵组成。皇始元年（396年）八月，道武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① 大举伐燕。这里的"六军"是借用魏晋旧名，实际上即是部落兵。北魏早期部落兵由各部落酋帅统率，随皇帝四处征伐。如陆俟，其"曾祖干、祖引，世领部落。父奕，太祖（道武帝）时率部民随从征伐，数有战功"②。又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车驾南巡……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③。这里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也是指部落兵。

北魏中期，随着北魏的封建化和连续不断的战争，部落兵渐渐向常备军转化。由于战争连年，担当军士的拓跋部部落成员无法进行生产，逐渐成为国家的常备军。另一方面，拓跋部在四处征伐中，常将新占领地区的百姓强行征发为兵。此外，北魏朝廷还常将死罪犯人恕死徙至边境充兵，这些人一经当兵，便不能脱离兵籍而成为兵户，也成为北魏的常备军。北魏孝文帝后，开始征发汉人服兵役，这些人也是北魏常备军的成员。

二、孝文帝改革后的中央军、州郡兵、镇戍兵及谪戍兵

中央军又称中兵或台军，是北魏军队的主力，性质属于皇帝宿卫军。北魏前期的都统长、幢、四厢大将、十二小将等内侍武官及其所统，便是北魏宿卫军的雏形。此后经过历代的发展，形成庞大的中军编制。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发京师南伐，

①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② 《魏书》卷四十《陆俟传》。

③ 《魏书》卷三《太宗纪》。

步骑三十余万"①。这里的"步骑三十余万"，大约全是中兵。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在汉制改革的基础上，整顿中军队伍，扩大编制，并仿汉制对中军领导体制进行改革。八月，孝文帝"诏选天下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②。同时，下诏"诸从兵从征被伤者皆听还本"③。这是使中军里伤病不堪战斗者，复员返家务农。明年（496年）十月，孝文帝又"以代迁之士皆为羽林、虎贲"④。这样，京师的中军增至数十万之众，加上散在各地的中军，北魏后期中军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当时作为中军的羽林、虎贲，要具备一定的品格，体格强壮、武艺高强者才能入选。武勇应选时，"上格者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⑤。因此，孝文帝改革之后的中军，从数量和质量上看，比以前有所增加和提高，从而增强了中军的战斗力。

同时，孝文帝仿效汉制，设置中军领导体制。中军统帅为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同为第二品上阶。领军将军有时也称中领军，总统中兵，权势很大。北魏宣武帝时（500～515年在位），于忠任侍中、领军将军，史称他"既居门下，又总禁卫，遂秉朝政，权倾一时"⑥。领军将军下分左、右二卫，设左卫、右卫将军各一人，左、右二卫之下，又各设武卫将军二人为左、右卫将军之副。以下还有各种正、副都督及武骑、云骑、骁骑、游击、前后左右四军等将军，及左右中郎将等多种宿卫武官，各置人数多少不等。领军将军之下又有领左、右府，设有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等职，以下又有左右备身正副都督等多种属官。领军将军直接统率皇帝宿卫部队及驻屯京师的中军。护军将军，有时也称中护军，亦为中军统帅，主管驻屯京师四周各要津的中军部队。护军将军之下，有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各一人，具体指挥京师四周要津的屯

---

① 《北史》卷三《魏本纪·高祖孝文帝》。

②③④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⑤ 《魏书》卷二十一《高阳王雍传》。

⑥ 《魏书》卷三十一《于忠传》。

戍中军①。领军、护军将军虽同为中军统帅，但领军将军权重于护军将军。宣武帝永平年间（508～512年），护军将军属下的四中郎将改归领军将军统率，领军将军遂独揽中军大权，权势更重。

北魏中军的任务是平时宿卫、战时出征。中军除担任皇帝宿卫以及驻扎京师及附近要地外，也有相当部分驻扎于全国各地州郡。如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卢昶为徐州刺史，请增兵御梁。诏云："可遣冀、定、瀛、相四州中品羽林、虎贲四千人赴之"②。北魏末年，殿中侍御史鹿悆外出监军，与萧梁将对阵时说："安乐王鉴、李神领冀、相、齐、济、青、光羽林十万，直向琅玡南出"③。可见上述诸州，都曾驻有中军。由于中军常屯戍京畿以外地区，因而任城王元澄在孝明帝时（516～528年）上疏建议："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④。

州郡兵，是北魏地方州郡设置的地方军，相对中军而言，可以称作外军。北魏建国之初，道武帝曾"制诸州各置都尉以领兵"⑤，这便是北魏州郡兵的早期形制。此后随着北魏的四处征伐，在新占领区设官置守，同时便在全国各州郡形成了一支为数不少的州郡兵。孝文帝改革后，州郡兵沿袭前制，没有很大的变化。

州郡兵的主要任务是维持地方的统治秩序，保护所属州郡的治安，并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如孝文帝时，汾州吐京胡民去居等600余人聚众反叛，刺史元彬请求朝廷发兵2万镇压。孝文帝大怒说："何有动兵马理也！可随宜肃治，若不能权方静帖，必须大众者，则先斩刺史，然后发兵。"元彬奉诏大惧，"率州兵，身先将士，讨胡平之"⑥。这说明州郡兵维持地方治安，镇压境内人

---

① 参见《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

② 《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卢昶传》。

③ 《魏书》卷七十九《鹿悆传》。

④ 《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云传附子澄传》。

⑤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

⑥ 以上见《魏书》卷十九下《章武王太洛传附彬传》。

民的反抗斗争，乃是分内之事。

当朝廷有大规模战事，或其他需要时，州兵也要奉调参战或屯戍。如太和二十二年（498年），孝文帝曾“发州郡兵二十万人，限八月中旬集悬瓠”①。孝明帝世，氐族反叛，朝廷“诏（张）普惠以本官为持节、西道行台。给秦、岐、泾、华、雍、豳、东秦七州兵武三万人，任其召发”。普惠到职后，停诸州之兵，仅“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统”②。这里所提“兵武”，即是州兵。景明（500～504年）初年，扬武将军、汝阴太守带镇将傅永曾“领汝阴之兵三千”③，增援与萧梁对阵的彭城王元勰军。这里的“汝阴之兵”，当是兼郡兵与镇兵身份于一的军队。孝明帝世，冀州刺史李韶清简爱民，他死后“有冀州兵千余人戍于荆州，还经韶墓，相率培冢，数日方归”④。显然，这是州郡兵出外屯戍的例子。

各州郡拥有的兵数多少不等，但从史籍看，一州大约至少有数千之众。郡则可能视其地位重要与否，规定驻兵数，像上述汝阴郡，因地临南北边境，至少有兵三千，已与一州兵力相差不多了。

镇戍兵，是北魏边境所设镇戍拥有的兵，相对中军亦可称为外军。北魏早期的镇戍一般设于北边，是为了防御北方的柔然等游牧民族。早在道武帝时期，就曾在后燕故地“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⑤。这是北魏最早的镇戍兵。此后，随着北魏的入主中原与向南发展，镇戍遍设于北部、南部边境及内地一些重要地区。如北部有著名的沃野、怀朔等6镇，南部缘淮南北有诸多镇戍。内地也有不少镇戍，而且设置也较早。如王慧龙在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便曾“拜洛城镇将，配

① 《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② 《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③ 《魏书》卷七十《傅永传》。
④ 《魏书》卷三十九《李宝传附孙韶传》。
⑤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附椿传》。

兵三千人镇金墉"①。再如文成帝（452～465 年在位）时，以广阿泽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广民稀，多有寇盗，乃置镇以静之"②。总之，北魏为了防备外敌入侵和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在边境和内地都设置了大量镇戍，镇戍皆领有数量不等的镇戍兵。

镇戍兵分由各镇、戍的主管军官统带。镇设镇都大将、都副将、镇将、副将等不同名称的官职，以主管一镇军政。史称北魏"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③。戍设戍主、副主，管一戍军政，地位同于郡守。有时戍主即由郡守兼任，如李辅曾除镇远将军、颍川太守，带长社戍主。杜颙于正光（520～525年）年间任盱眙太守，带大徐戍主。

北魏各镇戍拥有镇戍兵的数量，从前引史料看，每镇大约有 3000 至 5000 人。但有的镇戍兵力很弱，如道武帝早期设置的镇戍，至"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④。有的重要镇戍兵力又很强，如彭城（今江苏徐州）为南边重镇，"在镇之兵，不减数万"⑤。可见各镇戍拥有的兵力不等，主要由其本身的军事地位轻重而定。北魏镇戍兵的设置主要是为了防御外侵，但在对外作战时，也常受调遣出征。如景明元年（500 年），萧齐徐州刺史裴叔业降魏，宣武帝诏云："前即敕豫州缘边诸镇兵马，行往赴援"⑥。孝文帝改制后，镇戍兵的基本情况变化不大。至北魏后期，在六镇起义军的打击下，孝明帝被迫于正光五年（524 年）八月下诏"改镇为州"⑦，但这时已离北魏王朝灭亡为期不远了。

谪戍兵，是朝廷将犯有死罪的人免去死罪，然后徙去戍边的一种戍兵。北魏前期，就有将死刑犯免死充兵戍边的作法。如文

---

① 《魏书》卷三十八《王慧龙传》。

② 《魏书》卷五十一《韩茂传附子均传》。

③ 《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

④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附椿传》。

⑤ 《魏书》卷四十四《薛野賭传附子虎子传》。

⑥ 《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

⑦ 《魏书》卷九《肃宗纪》。

成帝时（452～465年），源贺上书建议，只要不是大逆，其他犯死罪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①。史称文成帝纳之。后来文成帝向群臣说：“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充北蕃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②。孝文帝改制后，继续实行这种政策，而且由于谪戍兵多有逃亡，加重惩罚，规定“一人犯罪逋亡，合门充役”③。谪戍兵一经充兵戍边，便要终身为兵，非经皇帝诏书特免，不许迁徙。由于这些人与民户分立户籍，被称为兵户，其地位低于普通民户。

北魏时期，身份等同于兵户的还有营户、镇户、府户等，实际上，这些称呼是兵户的异称。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的中兵、州镇戍兵，大体都属于兵户。身列羽林、虎贲的中军士兵与民户分开，单列军籍，他们属于职业兵，要终身当兵。羽林、虎贲由于其身充皇帝宿卫，在兵户中是地位较高的一种④。

州镇戍兵大都是兵户。北魏后期，州镇兵户地位身份日益低贱，他们要负担当兵作战的义务，还要身充各种杂役和交纳租赋，生活极端困苦。尤其北镇地区的镇戍兵，更是“号曰府户，役同厮养”⑤。

北魏末年，由于兵户地位的日益低贱，兵户所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兵户制逐渐衰落。最后，以兵户为主体的六镇兵民举起了反魏大旗，接着各地军户响应起义，终于形成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北魏最高统治者，以后北魏王朝便名存实亡了。

第三节　东魏北齐实行的夷汉分兵制

东魏北齐军制大体沿袭北魏，但也有其特点，这就是夷、汉

---

①②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

③ 《魏书》卷五十七《崔挺传》。

④ 何兹全《府兵制前的北朝兵制》，载《读史集》。

⑤ 《北齐书》卷二十三《魏兰根传》。

分兵制。

东魏北齐的夷、汉分兵制，与其军队兵员成份有关。高欢建立东魏，主要依靠的是六镇兵民，而六镇兵民都是鲜卑或鲜卑化的其他族人，后来这些鲜卑兵民成了东魏北齐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北魏解体，原在洛阳的北魏宿卫军，除少数人随孝武帝西入关中外，绝大多数跟随东魏孝静帝（534～550 年在位）迁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归入高欢手下，这些人成为东魏北齐军队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北魏宿卫军历来由鲜卑人组成，北齐时，又对迁至邺城的北魏宿卫军军士进行改编，史称："及文宣受禅，多所创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①。以上这两部分鲜卑兵成为东魏北齐军队的主力，类似于北魏时期的中军。因而，东魏北齐军队的主体是鲜卑兵。

东魏北齐也有汉人组成的军队。高欢在开创东魏北齐基业之初，就曾得到过汉人士族武装的支持。如河北大族高昂曾率乡里部曲 3000 人，参加高欢消灭尔朱氏势力的韩陵之战。此后，东魏北齐也常"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②。如兴和元年（539 年），东魏孝静帝就曾以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北道大行台，"差选勇士"③，以奚思业为河南大使，"简发勇士"④。北齐河清三年（564 年），更是正式规定以汉人服兵役。可见，东魏北齐也有不少汉人组成的军队。但汉人军队，在整个东魏北齐的军队中所占比例似较少，不是其军队的主力。

高欢执政时，鉴于东魏军队的兵员组成以及当时的鲜卑化倾向和胡、汉之间的矛盾，采用了夷、汉分兵制的办法治理军队。

东魏大权掌握在高欢手中，因此高欢在其丞相府专设"外兵曹、骑兵曹分掌天下兵马"⑤。高氏代魏称帝后，文宣帝高洋（550

---

①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④ 《魏书》卷十二《孝静纪》。

⑤ 《北齐书》卷四十《唐邕传》。

～559年在位）罢丞相府，相府诸司皆归于尚书，唯留外兵、骑兵二曹，各立一省，令亲信将领唐邕、白建各主一省，称之为外兵省、骑兵省。上述二省中的外兵省掌管汉人组成的军队，多为步兵，遂称之为外步兵省。其骑兵省因所统为鲜卑人组成的中军，因多为骑兵，故称之为内骑兵省。上述两省终北齐一世，始终是掌管军政大权的机关。

高氏代齐后，相府诸司归于尚书，尚书省成为真正中央行政中枢。尚书诸司中也反映出夷、汉分兵制的特点。如北齐诸尚书中有五兵尚书一人，下统“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五曹”①。其中左中兵、右中兵分掌“诸郡督告身、诸宿卫官”、“畿内丁帐、事力、蕃兵等事”②。左外兵、右外兵分掌“河南及潼关已东诸州丁帐，及发召征兵”、“河北及潼关以西诸州”③丁帐及发召征兵等事。前者主要管中军即鲜卑兵事宜，后者主要管外兵即汉人兵事宜。

东魏北齐的中军都是鲜卑兵，总数当在二十万以上。其中军的统帅与北魏略有差异，为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和京畿大都督。领军将军是东魏北齐中军的统帅，直接掌管皇帝的宿卫和驻守在京师周围的中军。领军将军以下设左、右卫将军各一人，领左、右将军及领千牛备身等属官，再以下还有各种武官名称，与北魏中军指挥系统大体一样。北齐时，又有领军大将军的称号。天保元年（550年），高归彦因讨侯景功，被封为长乐郡公，除领军大将军，史称：“领军加大，自归彦始也”④。高氏代魏之初，以宗室高归彦为领军大将军，目的大概是加重领军将军的权势。护军将军也是中军统帅，但权势低于领军将军，职权也略同北魏，掌管下属的东、西、南、北四中郎将。四中郎将各有所统，镇戍京师四周重要关津。从东魏北齐的实际情况看，护军将军的地位与作用都不很明显。

---

①②③《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中。

④《北齐书》卷十四《平秦王高归彦传》。

京畿大都督也是东魏北齐的中军统帅。京畿大都督一职设置于北魏末年，职掌京畿地区的中军。东魏北齐时以邺为都，高欢执政时便以其子高澄为京畿大都督，掌握东魏京师领军将军直接指挥之外的宿卫军指挥大权。此后高澄执政，又以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执掌兵权。北齐历代，亦皆置京畿大都督，以掌京畿宿卫军。以上三职中，以领军将军和京畿大都督为重。一般二职分置，有时亦由一人兼任二职。如北齐武成帝时(561～565 年在位)，曾以其子琅邪王高俨为“开府、侍中、中书监、京畿大都督、领军大将军，领御史中丞”① 等职。任此两职者，便集京畿兵权于一身，权势更大。

东魏北齐由鲜卑兵组成的中军还是职业兵，仍属于兵户。但从高欢执政开始，东魏北齐的统治者都采取尊崇鲜卑人的政策，尤其对鲜卑兵只用其行军作战，不使其承担其他租赋力役，因而东魏北齐兵户的地位，显然有所提高。

东魏北齐的外军，大体主要由汉人兵组成，包括州兵、镇戍兵等。汉人组成的外军虽然不是军队的主力，但其数量却并不少。东魏初期，拥戴高欢起事的汉人士族高乾、高昂、高慎、高季式、刘孟和、刘叔宗、封隆之等人，各率乡里部曲组成的汉人私兵，追随高欢四处征战。此后，高欢也曾大括燕、恒、云、朔、显、蔚、二夏州、高平、平凉之民以为军士，这些地区为六镇兵民聚居之地，因而所括之军士可能有不少鲜卑人，但其中同样有不少汉人。到河清三年（564 年），北齐均田令正式规定，所有男子“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②，均田民主要是汉人，也就是说，所有汉人 20 岁以上都得服兵役。北齐最盛时有户 300 万，人口 2000 万，以均田令中所规定的服役年龄推算，汉人充兵者其数量相当可观。

东魏北齐的州兵和镇戍兵，很多便由汉人兵组成。如汉人大族高季式有“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③。东魏初

---

① 《北齐书》卷十二《琅邪王俨传》。

②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③ 《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附弟季式传》。

季式任济州刺史，这些汉人部曲大约随之成为州兵，所以高季式率之“追督贼盗，多致克捷”①。汉人大族崔㥄出任徐州刺史时，“给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②，这些部曲亦随之成为州兵。北齐规定汉人服兵役后，一般也是服州兵和镇戍兵役，如前引“简华人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所谓“以备边要”，即指镇守沿边以及重要的州镇。由此可知，东魏北齐的镇戍兵大多亦是由汉人兵组成的。

应该指出，虽然汉人兵主要任务是充任州兵及镇戍兵，但州兵和镇戍兵并不是全部由汉人兵充任。事实上，州兵及镇戍兵中的鲜卑和其他族人也很多。如汉人士族封隆之参加韩陵之战后，行冀州事时，即领尔朱氏“降俘三万余人，分置诸州”③。这里所指的“降俘”，应包括各族军士，他们被“分置诸州”后，也就成了州兵。

东魏北齐的外军中，州兵一般归所属州都督统辖，镇戍兵归镇将、戍主统辖。但在州、镇戍之上有都督数州军事的都督时，则要受所属都督指挥。

东魏北齐的州兵，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的统治秩序，镇压人民起义，但朝廷有重大战事时，也可征召州兵出境作战，这一点同北魏情况类似。同样，东魏北齐的镇戍兵，职责虽是戍境御边，但也须服从朝廷的调遣征战。

第四节　西魏北周的府兵制

西魏北周实行的是独具特色的府兵制。西魏宇文泰所掌握的军事力量，其领导层主要属于武川集团，战士主要由改编关陇各族人民起义军而来，加上后随魏孝武帝入关的六坊鲜卑兵万余人，

① 《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附弟季式传》。

② 《北齐书》卷二十三《崔㥄传》。

③ 《北齐书》卷二十一《封隆之传》。

西魏最初总兵力大约在七八万人左右①。西魏的军事实力与东魏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此后，随着与东魏不断进行的战争，西魏军队的补充日渐困难，居住在关陇的鲜卑人数不多，宇文泰只好征召汉人充兵以扩充军力，并以当地有声望的关陇豪右统领这些汉人兵。为了协同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联系，提高士兵的身份以增强军队战斗力，宇文泰糅合了周官六军之制和鲜卑部落兵制，创建了府兵制。

宇文泰在起事之初，接替武川镇酋帅贺拔岳成为统军团的首领后，便整编军队，“置十二军，简诸将以将之”②。到大统八年（542 年），宇文泰“初置六军”③，由六柱国大将军统领，这即是西魏北周府兵制的萌芽。

大统九年（543 年），宇文泰邙山之战失利，西魏将士损失数万，实力大损。于是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④。从此，关陇汉人大族以及他们所率领的乡兵武装，被吸收到六军之中。

大统十六年（550 年），宇文泰采取拓跋氏早期八部组织的旧制，立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在此之前已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总领军队大权。另一柱国大将军元欣仅挂虚名，没有实权。实际领兵官为六柱国，也即大统八年“初置六军”时的六柱国，六柱国各领一军，是为六军。六柱国以下，各设二大将军，共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下，又各设二开府，是为二十四开府，每开府各领一军，为二十四军。每开府下，又各设二仪同，共四十八仪同。仪同以下又设置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领兵官。至此，西魏北周的府兵制正式确立。

西魏恭帝元年（554 年），宇文泰又仿拓跋氏早期“统国三十

① 朱大渭《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若干史实的辨析》，载《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三辑。

② 《周书》卷十七《刘亮传》。

③ 《北史》卷五《魏文帝纪》。

④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六，大姓九十九”的形制，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①。当时，高级统兵官不论汉人或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将士亦从主帅改姓。宇文泰所创建府兵制，是为了用早期部落组织的血缘关系来维系鲜卑族与其他族的感情，协调胡、汉以及将帅与士兵间的关系，改善北魏末年以来兵士地位低下的状况，以达到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

宇文泰创建府兵制之初，总兵力近 5 万人。其兵力配备为仪同领兵千人，开府领兵 2 千，大将军领兵 4 千，柱国大将军领兵 8 千②。这时的府兵，编入军籍，不负担其他赋役，平时半月宿卫，半月训练，战时出征。每名府兵唯自备弓刀一具，其他甲矛戈弩等军器，由国家供给。

西魏北周的府兵在性质上是中央宿卫军，但直至周武帝建德元年（572 年）以前，府兵制的指挥大权，一直掌握在权臣手中。西魏时，宇文泰以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等总统府兵。魏恭帝三年（556 年），宇文泰死，宇文氏随之代魏称帝，府兵大权落入大冢宰宇文护之手。史称：“自太祖（宇文泰）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等屯兵禁卫，盛于宫阙”③。

建德元年（572 年）三月，励精图治的周武帝宇文邕杀掉宇文护及其党羽，将府兵大权收归自己掌握，从此府兵才真正成为北周皇帝亲自指挥的中央宿卫军。此后，周武帝又着手对府兵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首先，周武帝采取措施加强对府兵的控制。建德元年（572 年），周武帝先后集京城以东及京城以西“诸军都督以上，颁赐有

---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② 此据《周书》卷三十三《赵刚传》及卷二十一《尉迟迥传》。

③ 《周书》卷十一《晋荡公护传》。

差"①。次年，又"大选诸军将帅"②，整顿府兵指挥系统。建德三年，周武帝接见府兵中下级将领，"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试以军旅之法，纵酒尽欢"③。同年十二月，周武帝"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赐钱帛各有差"④。不久，改府兵军士为"侍官"，使府兵在名称上也直接隶属皇帝。所有这些措施，旨在提高府兵官兵素质，拢络府兵中下级军官，提高府兵的地位，加强府兵同皇帝的隶属关系，以使皇帝有效地控制指挥府兵。

其次，周武帝为扩大募兵范围，加强府兵实力，建德二年(573年)，"募百姓充兵，除其县籍"⑤。这是募普通百姓充当府兵，并除去其郡县民籍，即免去充府兵者的赋役，以鼓励广大汉人百姓应募充当府兵。同年十二月，周武帝"诏荆、襄、安、延、夏五州总管内，有能率其从军者，授官各有差。其贫下户，给复三年"⑥。也是招募和奖励汉人百姓为府兵的事例。汉人百姓为了逃避国家赋役，踊跃应募，"是后夏人半为兵矣"⑦。府兵数量急剧增加，至北周灭齐时，北周已有府兵近二十万人⑧。

再次，周武帝注意府兵的军事训练，以提高府兵的战斗力。如建德元年(572年)十一月，周武帝曾"亲率六军讲武城南"⑨。次年十一月，周武帝"亲率六军讲武于城东"⑩。接着，又"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周武帝"亲临射宫，大备军容"⑪。建德三年(574年)六月，周武帝"集诸军将，教以战阵之法"⑫。十二月，再次"集诸军讲武于临皋泽"⑬。由于周武帝重视对府兵的军事训练，并亲自参加各类训练活动，从而大大提高了府兵的战斗力。

经过周武帝的一系列改革，府兵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显著的增加和提高，这为后来北周消灭北齐作了军事上的准备。

府兵并不是西魏北周唯一的军队。当时与府兵并存的还有中

---

①②③④⑥⑨⑩⑪⑫⑬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⑤⑦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⑧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记建德四年伐齐，共出兵17万，大体皆为府兵。

央另成系统的禁军、州镇的州郡兵和镇戍兵等。大体说来，府兵和另成系统的禁军是西魏北周的中军，州郡兵和镇戍兵是西魏北周的外军。西魏北周的禁军主要的任务是宿卫宫阙。如尉迟纲在西魏恭帝元年（554年）为中领军，总宿卫兵。到北周孝闵帝代魏时（557年），尉迟纲又“以亲戚掌禁兵，除小司马”①。府兵是西魏北周军队的主力，其职责既掌京师宿卫，又须出征作战。外军中的州郡兵和镇戍兵，分由都督（后为总管）及镇将、戍主统领，其主要职责是维持地方治安和戍边御敌，有时也出征作战。

第五节　军队编制、兵种、装备及后勤供应

一、军队编制及兵种

北朝军队的基本编制分为军、幢、队、什、伍。

军是北朝军队基层编制中的最高一级，设军主、军副各一人，统率全军。如北魏明元帝泰常（416～423年）时，閰大肥曾与娥清“领十二军出中道”② 南进。太平真君（440～451年）年间，太武帝曾命周观“统五军西讨秃发保周”③。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孝文帝大举南进，彭城王元勰等率“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④。这些记载，都说明军是军队组织的最高编制单位。军的指挥官是军主。如太和十一年（487年），柔玄镇都将李兜抗击柔然，奚康生曾任“前驱军主”，率部下将士“频战陷阵”⑤，立下战功。魏将赵遐、邢峦、李仲迁、杨大眼、贺拔胜等人，都曾以军主统军出征作战。

---

① 《周书》卷二十《尉迟纲传》。

② 《魏书》卷三十《閰大肥传》。

③ 《魏书》卷三十《周观传》。

④ 《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

⑤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关于一军的统兵数，从史籍记载看，一军拥有的兵力多少不等。如北魏道武帝时设置军府，“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①。这里反映北魏早期每军五千人，以后逐渐减为每军千人。孝文帝时，章武王元彬讨吐京胡，有“甲卒七千，与胡对战，分为五军，四军俱败，(奚)康生军独全”②。此处康生以军主从征，每军为一千四百人。北魏一军的正常编制大约为千余人左右。上述道武帝一军置五千人似非北魏常制，而后“一军兵才千余”，却可能正与当时一军兵力相符，所以北魏有所谓“千人军将”的称呼。如尉拨，随太武帝“从讨和龙，迁虎贲帅，转千人军将”③。再如尧暄，也曾“为千人军将”④。这里的军将，大概是与军主同一级别的统兵官。又当时的柔然军制，是以“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⑤。柔然军制与北魏军制未必有直接的关系，但由于二者处于同一时代，又经常交战频繁，相互产生影响则是可能的。因而柔然的军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北魏军制的情况。北魏之后的东魏北齐在制度上“多循后魏”，军制应与北魏无大差别。而与北魏制度不同的西魏北周军队的基本编制，其最低一级仪同将军所领的一军兵力也为千人，这也应该是沿袭北魏军制而来。所以从大体上说，北魏以及北齐、北周，其一军的兵力约为千人左右。

军以下的编制是幢，幢设幢主、幢副各一人，统领全幢兵士。由于军、幢是序列关系，所以当时常“军幢”连称。如路思令在北魏末上疏时说：“窃以比年以来，将帅多是贵宠子孙，军幢统领，亦皆故义托附”⑥。张普惠上疏时亦称：“宁有岳牧、二千石、县令、

①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附弟椿传》。

②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③ 《魏书》卷三十《尉拨传》。

④ 《魏书》卷四十二《尧暄传》。

⑤ 《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⑥ 《魏书》卷七十二《路恃庆传附弟思令传》。

丞、尉、治中、别驾及诸军幢，受命于朝廷，而可不预乎”①？此外，从官品上，也可看出军幢的序列关系。北魏、北齐官制，军主为从七品，军副为从八品，幢主为从九品，每级之间正好相差一品。一幢所统兵数，史籍没有明确记载。与北魏同时的柔然，其军队编制每幢有兵百人，即所谓“百人为幢”②。据《宋书·索虏传》记载：“（汝阳）城内有虏一幢，马步可五百”。则北魏军队一幢兵数远不止百人。大体估计，北魏一幢的兵力，似应有一百至数百人不等。幢主有时也称幢帅。如北魏末年，“凉州幢帅于菩提、呼延雄执刺史宋颖据州反”③。这里的幢帅，当即为幢主。

幢以下还有队的编制，队有队主、队副，统率全队。如魏孝明帝（516～528年在位）初年，赵郡王元谧为岐州刺史，时朝廷派台使至岐州，因“驿逻无兵，摄帅检核”。元谧队主高保愿“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④。这里的队主，应是北魏军队编制中队的首领。一队所有兵数不明。值得注意的是，北朝军队中“队”这一单位有些特殊的情况。如北齐皇太子卫队，其地位要高于一般军队编制中的队。从官品上看，皇太子的二卫队主为从五品，太子诸队主为从六品，太子二卫队副为正八品，太子诸队副为从八品。这里的卫队主地位比军主要高四品，诸队主比军主高二品，而军主的品级仅相当于二卫队副。显然，这里太子卫队或东宫宿卫的队，处于特殊的地位，而非一般军队编制下的队。

队以下是什、伍等传统军队编制。十人为什，设什长一人；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归所属队主统带。

以上所述主要为北魏的军队编制，北齐制度大体同于北魏，西魏北周早期制度亦与北魏略同，后期虽建府兵，其军队基本编制应与北魏大致无异。

---

① 《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② 《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③ 《魏书》卷九《肃宗纪》。

④ 《魏书》卷二十一上《赵郡王干传附子谧传》。

北朝军队的兵种主要是骑、步二种，其中又以骑兵为主。北魏前期，由拓跋部游牧部落成员组成的军队，全是擅长骑射的骑兵。由于拓跋部游牧民族的特点，早在北魏建国之前，拓跋部已有“控纭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①。直至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北魏的军队主要都是骑兵。皇始元年（396年），道武帝“亲勒六军四十余万”②，大举伐燕，所率都是骑兵。因而后燕中书令眭邃说：“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③。后燕中山尹苻谟也说：“魏军强盛……若逸骑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④。永兴五年（413年），明元帝校阅军队，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⑤。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南伐刘宋，“六师涉淮，登瓜步山观兵，骑士六十万，列屯三千余里”⑥。可见北魏初年四处征战的主要都是骑兵。神瑞二年(415年)，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发生饥荒，群臣皆劝明元帝迁都。博士祭酒崔浩反对迁都，他说：“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于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⑦。从这里立论的根据看，也表明北魏军队尽是骑兵。

北魏前期在战争中偶尔也用少量步兵，如太武帝灭大夏的第二次作战，便曾用步兵3万人。孝文帝改制后，汉人开始正式负担兵役，北魏军队中步兵成份逐渐增长。因而北魏后期出兵，步骑混杂的情况逐渐增多，而骑兵单独出击的情况渐次减少。如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率师南进，共有“步骑百余万”⑧。延昌三年（514年），诏司徒高肇出任大将军、平蜀大都督，率“步

---

① 《魏书》卷二十四《燕凤传》。

②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③④ 《晋书》卷一百二十四《慕容宝载记》。

⑤ 《魏书》卷三《太宗纪》。

⑥ 《魏书》卷一百零五《天象志三》。

⑦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⑧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骑十万西伐”①。魏末，征西将军崔延伯进剿关陇起义军，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军容甚盛”②。北魏中期以后这些出征作战的事例，都是步骑混杂使用。应当指出，北魏后期虽然骑兵已非唯一的兵种，并且在整个军队中的比例在减少，但由于骑兵冲击性大，机动性强，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仍是北魏军队的主力。

东魏北齐军队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很大。东魏北齐军队的主力是随高欢开创东魏基业的六镇鲜卑兵，以及原先北魏中央宿卫军六坊鲜卑的大部分。这些鲜卑兵是东魏北齐的中军，又大多数是骑兵，因而东魏北齐主管鲜卑兵的机构称作“内骑兵省”。东魏北齐京师宿卫，出征作战等都主要由鲜卑骑兵担任。东魏北齐的汉人兵则主要是步兵，因而主管汉人兵的机构称作“外步兵曹”。汉人步兵是东魏北齐的外军，主要担任州郡兵、镇戍兵等。但东魏北齐大规模用兵时，一般都步骑混杂和胡汉配合使用。

西魏北周军队也以骑、步为主要兵种，骑兵所占比例同样很大。如尉迟迥伐蜀，督开府将军元珍等六军，有“甲士一万二千，骑万匹”③，主要是骑兵。大统四年(538年)，宇文泰增援洛阳，达奚武“率骑一千为前锋”④。步兵也是西魏北周军队的重要兵种，西魏北周朝廷派将出征，也常以步骑配合使用。如北周孝闵帝时，诏利州总管赵刚“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兼督仪同十人、马步一万”⑤，经略信州(治今重庆奉节)。建德五年(576年)，于翼迁任豫州总管，“给兵五千人，马千匹以之镇”⑥。这都是步骑混同配合的事例。

北朝时期，由于各代都曾与江南政权对峙，南北战争不断，因而在骑、步两大兵种之外，也还有一定数量的水军。早在太武帝

---

① 《魏书》卷八《世宗纪》。

② 《魏书》卷七十三《崔延伯传》。

③ 《周书》卷二十一《尉迟迥传》。

④ 《周书》卷十九《达奚武传》。

⑤ 《周书》卷三十三《赵刚传》。

⑥ 《周书》卷三十《于翼传》。

神䴥三年（430年），为防止刘宋军队北进，就曾“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①。孝明帝时，魏扬州刺史李崇因萧梁军北侵，“密装船舰二百余艘，教之水战，以待台军”②。后魏军围攻梁硖石城，李平负责指挥，令崔亮督陆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军击其东面”③。李崇派统军李神“乘斗舰百余艘沿淮与李平、崔亮合攻硖石。李神水军克其（硖石）东北外城”④，梁硖石守将赵祖悦投降。这说明北魏在与南朝交界的边境一带，有时配以少量水军作战。

从北朝整个军事形势看，由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方地理环境的限制，以及统一江南的时机尚未成熟，因而北朝的少量水军，一般为临时建制，根本不能同南朝的水军相匹。

二、弓、弩、矛、戈及其他军械

北朝军队使用的兵器大体还是传统的弓、弩、矛、戈等。

北朝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力，因而适合骑兵使用的弓、弩是北朝的主要兵器。早在拓跋部未形成国家之前，其部落联盟就有“控弦之士数十万”⑤。这里的控弦之士，就是指的手持弓箭的骑射战士。由于拓跋部是善长骑射的游牧民族，弓、弩既是猎取野兽维持生活的工具，又是出兵征战、抵御敌人的武器。所以有所谓“北人壮悍，上马持三仗，驱驰若飞”⑥的说法。这里的“三仗”，应包括弓箭在内⑦。终北朝各代，在军队中弓箭使用都非常普遍。北魏孝文帝世，咸阳王元禧上表请求加强北魏州镇兵的训练时曾说：

---

① 《魏书》卷四《太武帝纪》上。

②④ 《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

③ 《魏书》卷六十五《李平传》。

⑤⑥ 《魏书》卷二十四《燕凤传》。

⑦ 唐释玄应《一切经音义》二十三《摄大乘论·刀仗》：“仗亦弓、矟、杵、棒之总也”。

“州镇兵人，或有雄勇，不闲武艺。今取岁暮之暇，番上之日，训其兵法。弓矢干矟，三分并教，使人闲其能，临事无阙”①。北魏招募兵勇，也以规定的“弓格”，即按照使用弓弩的力量和技术取人。北朝时期，由于弓箭使用的普遍，出现不少擅长使用强弓的勇士，如北魏卫王拓跋仪，“膂力过人，弓力将十石”。被人誉为“卫王弓”②。魏名将奚康生“性骁勇，有武艺，弓力十石，矢异常箭，为当时所服”③。他出任南青州刺史时，萧梁以康生能引强弓，“故特作大弓两张，长八尺，把中围尺有二十，箭粗殆如今之长笛，送与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犹有余力”④。魏陈留王拓跋虔，“其弓力倍加常人”，能“一箭杀二三人”⑤。

弓矢是一种杀伤力很强的兵器，而且能远距离杀伤敌人，因而其威力较大。弩，是装有金属或木制发射机的改良型的弓。弩是古代的传统兵器，战国时已见使用。北朝时期，弩仍然在军队中使用。大概是由于弩较为笨重，不适合骑兵在马上使用的缘故，因而从史籍上看，弩的使用似乎没有弓那样广泛。但北朝时期，威力较大的床弩却在军队中得到广泛使用。如北魏献文帝时，源贺上表防御北边柔然入侵之策说：“请募诸州镇有武健者三万人，复其徭赋，厚加赈恤，分为三部。二镇之间筑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床，武卫三百乘。弩一床，给牛六头”⑥。从上述数中可以看出，强弩以床论，型制较大，使用人力或畜力，因而还须配以六牛，作为运输和发射床弩之用。从城置万人，给强弩十二张看，可能这种弩主要用于城防守备，而从其数量看，使用也不很普遍。宋代军事名著《武经总要》中所记载的式样繁多的床弩，大概即由此演化发展而来。

---

① 《魏书》卷二十一上《咸阳王禧传》。

② 《魏书》卷十五《秦明王翰传附子卫王仪传》。

③ 《魏书》卷七十三《奚康生传》。

④ 《北史》卷三十七《奚康生传》。

⑤ 《魏书》卷十五《陈留王虔传》。

⑥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

矟，又称槊，实即矛。汉刘熙《释名》称："矛长丈八尺曰矟，马上所持。言其矟矟便杀也。"如依此说，则矟为骑兵马上所用之矛。北朝时期，矟也是军队使用的主要兵器，极为普遍。前引北魏咸阳王元禧上书所称"弓矢干矟"，可见矟是与弓矢一样为北魏士兵所必备的常用兵器。所谓拓跋部"马上持三仗"的三仗，其中当包括矟在内。如拓跋部成员来大千于明元帝朝任内幢将，"尝从太宗校猎，见虎在高岩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应手而死"①。当时的勇士常以使用大矟闻名，如北魏陈留王拓跋虔，"武力绝人。每以常矟细短，大作之犹患其轻，复缀铃于刃下……虔常临阵，以矟刺人，遂贯而高举"②。时人誉为"桓王矟"③。

弓、弩、矟之外，一些传统兵器如刀、戈等，也是北朝军队常用的兵器。如西魏北周的府兵即是"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戈、弩，并资官给"④。

铠甲、盾等传统防御器械，北朝也继续使用。北魏名将崔延伯镇压关陇起义时，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⑤。这里甲卒指穿铠甲的士兵，铁马指装配铁甲的战马。北齐后主时，曾亲"率宿卫者步骑四百，授甲将出战"⑥。这是指在正式出战前，要配穿铠甲。北齐清河王高岳，"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储甲千余领"⑦。西魏时，宇文泰曾"以所著铁甲赐(田)弘"⑧。邙山之战时，西魏将蔡祐曾"著明光铁铠"⑨。前述西魏北周府兵所穿铠甲，是由国家资给的。

---

① 《魏书》卷三十《来大千传》。

② 《魏书》卷十五《陈留王虔传》。

③ 拓跋虔死后谥陈留桓王，故称"桓王矟"。见《魏书》卷十五《秦王翰传附子卫王仪传》。

④ 《北史》卷六十传论。

⑤ 《魏书》卷七十三《崔延伯传》。

⑥ 《北齐书》卷十二《琅邪王高俨传》。

⑦ 《北齐书》卷十三《清河王高岳传》。

⑧ 《周书》卷二十七《田弘传》。

⑨ 《周书》卷二十七《蔡祐传》。

除弓、弩、矟、戈、刀、铠甲等单人使用的军械外，北朝历代军队也常在攻城中使用大型攻具。如北魏泰常八年(423年)，魏军攻打刘宋东阳城（今山东青州北），先用虾蟆车二十乘攻城，后又用撞车攻城，皆被宋青州刺史竺夔所破。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南进，在攻打悬瓠（今河南汝南）时，曾用冲车攻城。后攻打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又曾用钩车、冲车等攻具。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东魏丞相高欢围攻西魏要塞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也曾“起土山”，“造攻车”，其攻车威力极大，“车之所及，莫不摧毁”①。

北魏早期，军队本以骑兵为主，长于略地，短于攻城。如太武帝伐刘宋，号称百万之众，虽占有长江以北六州之地，但“六州城守未尝失也”②。即六州州城和主要镇戍，大多未攻下，以致太武帝最后不得不退兵。随着军队中步兵比重的增加及攻城的需要，北魏逐渐重视攻城之法，于是原先本为鲜卑骑兵所不熟习的各种攻城器械渐被推广使用。

前面列举的所谓虾蟆车，是特制的大型车辆，上覆以生牛皮，攻城将士伏于牛皮之下，再用人力推行，因人在牛皮下，攻城时敌弓箭不能伤。

撞车，是上边设有撞木的特制的车，撞木上裹以铁叶，逼近敌城时，以撞木撞城③。

钩车，与撞车类似，但车上不设撞木，而是设一长钩，用以钩垮敌城墙④。

冲车形制不见于记载，从名称上看，大约是如撞车一类的攻具，只是冲击城墙时用的可能不是撞木。

北朝时期，弓弩矟矛戈、刀剑铠甲及大型攻具等多种军器械，

---

① 《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宋纪八》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正月胡三省注。

③④ 见《武经总要》卷十二及卷十《双钩车图》。

一般由国家统一制造、统一管理、统一发用。

北魏天兴二年（399年）道武帝拓跋珪在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的第二年，便“增启京师十二门。作西武库”①。天赐元年（404年），又“置山东诸冶，发州郡徒谪造兵甲”②。这是北魏政权最早设置的储存军械的武库及制造军械的场所。此后，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代皆由国家设置武库，以作储存保管军械之用，并设专司掌管武库。北魏永平二年（509年），宣武帝曾下诏云：“比军役频兴，仗多毁败，在库戎器，见有无已。安不忘危，古人所戒，五兵之器，事须充积，经造即殷，非众莫举。今可量造四万人杂仗”③。由于当时武库中军械匮乏，所以要制造四万人的杂仗以备急用。东魏北齐时，中央也设有武库，其京师邺城“北城有武库”④。西魏北周亦有武库，保管兵器。

北朝武库的主管长官皆称为武库令。但武库令所隶属的机构，各朝却略有不同。

北魏前期，武库令的上级主管长官，似无定职。如明元帝（409～423年在位）世，屈垣为将作监，“统京师诸署”⑤。其统似应包括武库令在内。太武帝至孝文帝改革前，北魏诸曹尚书中有库部尚书一人。从此职的权限看，似应掌武库事⑥。孝文帝改制后，尚书诸曹郎中有库部郎中一人，隶属度支尚书，掌管“戎仗器用”⑦ 事，武库令归其统辖之下。

东魏北齐武库令的隶属情况，大抵与北魏后期相同，除库部郎中外，又有卫尉一职，亦统领武库令。

西魏军政大权在丞相宇文泰手中，武库也由相府属官掌管。如

---

①② 《魏书》卷二《太祖纪》。

③ 《魏书》卷八《世宗纪》。

④ 《北齐书》卷十二《琅邪王高俨传》。

⑤ 《魏书》卷三十三《屈遵传附孙垣传》。

⑥ 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

⑦ 见《通典》卷二十三《职官典五》兵部尚书条。

周惠达任宇文泰大将军府司马，掌管“营造戎仗，储积食粮……以济军国之务，时甚赖焉”①。北周时，夏官大司马以下设武藏中大夫、小武藏下大夫各一人，掌管军械武库等事。

北朝历代军械的制造，由专门机构负责。

北魏道武帝（385～409年在位）时，设置“山东诸冶”，即是地方上制造甲仗的机构。太武帝（424～451年在位）世，苟颓迁任奏事中散，“典凉州作曹”②，也是地方制作兵器的机构。孝文帝（471～499年）时，沈保冲因军败罪，被“配洛阳作部终身”③。这里的洛阳作部，就是中央制造军械的机构。北魏制作军械的机构总归中央的太府（孝文帝改制前称少府）统辖。太府下分设左、中、右三尚方及诸冶东西道署等，分理中央和地方各制作机构诸事。

东魏北齐虽迁都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也在中央设有军械制作机构。如东魏时，祖珽有罪，被高欢“鞭二百，配甲坊”④。甲坊乃是制甲仗的作坊。东魏北齐军械制作制度，大体同于北魏。

西魏军械制作制度，因其改革官制，在军械制作及管理机构名称及上下统属上与北魏有所不同。如薛善在西魏时任司农少卿，“领同州夏阳县二十屯监。又于夏阳诸山置铁冶……每月役八千人，营造军器”⑤。北周夏官府设司弓矢中士、司甲中士、司矟中士、司刀盾中士，专管弓矢、铠甲、矟、刀盾等制造事宜⑥。隶属武藏中大夫、小武藏下大夫。军仗造好后，送武藏中大夫、小武藏下大夫保管。

北朝历代，各种军械在一般情况下都由中央直接掌管，派兵作战需要甲仗时，必须由主管部门拨发。如北魏宣武帝时（500～

---

① 《周书》卷二十二《周惠达传》。

② 《魏书》卷四十四《苟颓传》。

③ 《魏书》卷六十一《沈文秀传附子保冲传》。

④ 《北齐书》卷三十九《祖珽传》。

⑤ 《周书》卷三十五《薛善传》。

⑥ 王仲荦《北周六典》卷六《夏官府第十》。

515年在位)，扬州刺史元澄请向南用兵，提出“须兵十万……但粮仗军资，须朝廷速遣”①。崔楷于魏末出任殷州刺史，到任后上疏称:“谨列所须兵仗，请垂矜许”②。这些都是地方官吏请求中央发给军械的事例。正因为如此，所以北魏宣武帝时曾下诏:“量造四万人杂仗”，以备各方使用。

三、军粮及军械供应

北朝军队的军粮供应，前后稍有不同。

北魏早期，军队成员大部分都是部落兵，战时打仗，平时从事畜牧业或少量农业生产。军队中没有专门的军粮供应机构，粮食给养等军资，除自己生产外，主要采用源于拓跋部落联盟时的掳掠方法解决，即所谓以战养战。如太武帝神䴥元年(428年)北魏灭北凉时，军粮缺乏，命义兵将军封礼等抄略百姓，以筹办军粮。直至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太武帝大军南侵，也还是“后无资粮，唯以百姓为命。及过淮，食平越、石鳖二屯谷。至是抄掠无所，人马饥困，闻盱眙有积粟，欲以为归路之资”③。但实际上，太武帝世(424～452年在位)已有由国家筹划的军粮供应。如始光二年(425年)，太武帝就曾“诏天下十家发大牛一头，运粟塞上”④。又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命薄骨律镇将刁雍及高平、安定、统万等三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⑤。此后太安四年(458年)，文成帝北伐柔然，有“骑十万，车十五万两”⑥，其中亦应有不少辎重车，军粮当属

① 《魏书》卷七十九《范绍传》。

② 《魏书》卷五十六《崔辩传附崔楷传》。

③ 《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

④ 《魏书》卷四《世祖纪》上。

⑤ 《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

⑥ 《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辎重之列。献文帝时（466～470年在位），柔然犯塞，车驾亲讨，诏陆馛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督兵运粮，一委处分”①。然而直至孝文帝世以前，军粮供应的主管部门和具体供应办法，大约多是临时处置，没有明确固定的制度。

在孝文帝时，北魏开始有正规的军粮筹集供应制度。如延兴三年（473年）十月，“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②。这时的军粮办法，是将粮食折成资绢，交由将士自己随身携带，任其私用。如太和五年（481年）时“州镇戍兵，资绢自随，不入公库，任其私用”③。徐州刺史薛虎子上疏说：“窃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即自随身，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论之于公，无毫厘之润，语其利私，则横费不足。非所谓纳民轨度，公私相益也”④。这里所说州镇之兵的资绢，显然是由国家发给的。由于这种作法使将士“不免饥寒”，所以薛虎子建议说：“若以兵绢市牛，分减戍卒，计其牛数，足得万头。兴力公田，必当大获粟稻。一岁之中，且给官食………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唯须内库”⑤。北魏军士这种资粮自随的作法，虽然见于太和初年，但可能亦行之于前，而“人十二匹”的数量，大约是随戍守州镇的时间来定的。太和元年（477年），北魏南部尚书皮喜讨杨文鼠于仇池，孝文帝诏令皮喜说：“今更给军粮一月，速于骆谷筑城”⑥。这里加给军粮一月，大约是军士在外征战时间超过预定期限，因而需要加给军粮，而其办法大约也是一月资绢自随。

北魏从孝文帝时开始，军粮一般皆由国家供给，并有正规的制度。像前边提到的任城王元澄征钟离时，请求“粮仗军资，须

---

① 《魏书》卷四十《陆俟传附子陆馛传》。

② 《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

③④⑤ 《魏书》卷四十四《薛野賭传附子虎子传》。

⑥ 《魏书》卷五十一《皮豹子传附子喜传》。

朝廷速遣”①。孝文帝亲信大臣范绍回答说：“计十万之众，往还百日，须粮百日。顷秋以向末，方欲征召，兵杖可集，恐粮难至”②。范绍认为时令已到秋末，十万兵士的军粮不易征收，因而劝元澄暂时不要出兵。他们两人所讲的内容，都反映出军队出征由国家统一供给军粮。

北魏自孝文帝改制后，军粮供应统一由尚书省掌管。如孝昌（525～527年）初，西道大都督萧宝夤上疏伪称军粮匮乏：“所统十万，食唯一月。”孝明帝闻言大怒，召主管人员责问，尚书令等委罪于度支尚书兼尚书右丞朱元旭。元旭“于御座前屈指校计萧宝夤兵粮乃逾一年，事乃得释”③。由此可知，北魏当时掌管军粮供应的部门是尚书省，具体主管部门为度支尚书及其下属度支郎中。从《魏书》列传有关资料看，任度支尚书和度支郎中者近二十例，其中除二例为太和年间事外，皆为宣武帝朝（500～515年在位）以后事，这可以说明孝文帝政制以后，才正式由度支尚书主管军粮事宜。前边提到薛虎子曾于太和五年建议废除“资粮自随”的军粮供应办法，而改为由军队兴办屯田，军粮由“内库”所出，这里的“内库”，应即指国家仓库。史称孝文帝采纳了薛虎子的建议。可能从那时起，军粮供应办法即由“资粮自随”，改为统一由中央或地方上的仓库拨给。当孝文帝改革官制后，这些事务即交由度支尚书主管了。

北魏的军粮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为国家征收的军粮租税，一为军队及州镇的屯田。

北魏时期，百姓每年都要交纳一定的租调，以充军粮。如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诏免徐、南豫、陕、岐、东徐、洛、豫七州军粮”④。孝明帝世，张普惠为西道行台，朝廷“送南秦、东益二州兵租，分付诸戍”⑤。普惠至南秦州，“令送租兵连营接栅，

---

①② 《魏书》卷七十九《范绍传》。

③ 《魏书》卷七十二《朱元旭传》。

④ 《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⑤ 《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相继而进，运租车驴，随机输转”①。

北魏州镇戍兵及一般军队都有屯田的任务，像前边提到的薄骨律、高平、安定、统万等镇运粟五十万斛于沃野镇的军粮，就是上述四镇屯田收获的粮食。正始元年（504年），侍中源怀巡视北镇，“案视诸镇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筑城置戍之处。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储粮积杖之宜，犬牙相救之势，凡表五十八条”②。文中提到储粮一事，所储粮食的来源，大约也是六镇诸镇屯田的收获。同年九月，宣武帝曾令“缘淮南北所在镇戍，皆令及秋播麦，春种粟稻，随其土宜，水陆兼用，必使地无遗利，兵无余力”③。内地军队也要屯田。宣武帝时（500～515年），为大举南侵，先“发河北数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缘淮戍兵合五万余人，广开屯田”④。范绍为西道六州营田大使，“勤于劝课，频岁大获”⑤。

东魏北齐时期，军粮供应的办法及主管部门等，大体同于北魏后期，军粮由国家统一管理供应。如武定八年（550年），东方老率军与西魏将陈忻战于石泉，“时东魏每岁遣兵送米馈宜阳，忻辄与诸军邀击之，每多克获”⑥。

北魏早期部落兵时期，各项制度还不完备，军中所用器械不少应出于部落兵私家。北魏末年，高欢起事山东，汉族士人各率私兵部曲响应，他们使用的军械也是出于私家。如高季式，“自领部曲千余人，马八百匹，戈甲器仗皆备”⑦。但一般情况下，北魏与东魏北齐的军械供应，都由国家统一制造管理和供给。前边讲到的北魏与北齐均由国家设置武库，军械制造完毕后入武库储存，战时由主管部门拨发军中使用。

---

① 《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②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附子怀传》。

③ 《魏书》卷八《世宗纪》。

④⑤ 《魏书》卷七十九《范绍传》。

⑥ 《周书》卷四十三《陈忻传》。

⑦ 《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附弟季式传》。

西魏北周时期，军中粮用一般也由国家供给。如大统（535～551 年）初年，赵肃任司州别驾，“监督军粮，军用不匮”①。宇文泰任大将军、大行台，出镇华州时，以周惠达为行台尚书、大将军府司马，总知后事。惠达“营造戎仗，储积食粮，简阅士马，以济军国之务”②。北周天和（566～572 年）初年，陆腾进讨信州蛮，周武帝令辛昂从通州渠等地运粮以馈周军。

西魏北周军粮供应的主管部门，因北周改革官制而前后有所不同。西魏时官制同于北魏后期，主管军粮供应的也是度支尚书及其所属曹郎。北周官制中，职权等同于西魏度支尚书的是地官大司徒的下属民部中大夫，因而北周主管军粮供应的应是民部中大夫及其属官③。如北周孝闵帝即位，裴侠迁民部中大夫，主管仓库粮储，调拨军粮当为其份内之事。

西魏北周军队的主体是府兵，府兵的军械供应，分为自备与官家供给两部分。按规定，当时的府兵是“每兵唯办弓刀一具，月简阅之；甲、槊、矛、弩，并资官给”④。也就是说，府兵须自备弓、刀各一具，其余铠甲、矛槊、弩等军械，由国家统一供给。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西魏北周的府兵主要来源之一是关陇豪右所率私兵部曲，因而在府兵制早期，府兵弓刀之外的军械常常是由带兵的关陇豪右供给的。所以文献上有府兵军械“六家共备”的说法⑤，这正是府兵早期制度所保留的痕迹。等到府兵制度发展完备后，府兵的甲、槊、戈、弩等即全部由国家供给了。

---

① 《周书》卷三十七《赵肃传》。

② 《周书》卷二十二《周惠达传》。

③ 王仲荦《北周六典》卷三《地官府·民部中大夫》条。

④ 《北史》卷六十论曰。

⑤ 所谓“六家”是指西魏时实际统兵的府兵六柱国大将军。参见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第二章第一节《六柱国领兵的由来及其变化》。

第二十二章　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的战争

第一节　太武帝继位后的政治形势及统一北方的战争谋略

一、北魏与刘宋对立

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十一月，明元帝拓跋嗣去世。始光元年（424年）嗣子拓跋焘继位，是为魏太武帝。太武帝即位时，北魏王朝经过几代皇帝的经营，其势力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北方仍未统一。当时与北魏对立并存的，在北方有大夏、北凉、北燕、柔然等多股势力，而在南方则与日益强大的刘宋王朝对立，因而形势是严峻的。

刘宋王朝的建立者是刘裕。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宋武帝刘裕是南朝很有作为的统治者，他在称帝之前，曾亲自率兵先后灭南燕、后秦，并派兵攻灭益州谯纵等割据政权。称帝前后，刘裕还在政治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刘裕死后，其子宋文帝刘义隆继续推行其政治和经济政策，使得刘宋初期政治比较清明。宋初30余年间，社会安定，人民赋役有所减轻，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力逐渐增强。刘宋的版图，也是南朝各代中最大的，占有东起大海、南至交广、西至巴蜀、北至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拥有比较雄厚的人力物力，因而刘宋初期是南朝国力最强的时期。也就是说，北魏太武帝面对的是南北对立中江南最强的对手。

北魏与刘裕集团的对立由来已久。早在刘裕专制东晋朝政时，魏明元帝就曾征集10余万大军屯驻黄河北岸，企图阻止刘裕北伐

后秦，并伺机南进。刘宋永初三年（422年）五月，宋武帝刘裕病死，明元帝乘机派魏军分3路南下，攻占了刘宋洛阳（今河南洛阳东）、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滑台（今河南滑县西南）、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等河南重镇。宋文帝（424～452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内部政局尚不稳定，未及时北伐，但却积极准备收复河南失地。太武帝面对这种南北对立形势，不能不将南方的刘宋政权，作为较强大的对手给予认真对待。

二、北魏被北凉、北燕、大夏及柔然包围

太武帝（424～451年）即位后，北魏政权在北方的对手，是北凉、北燕、大夏和柔然。北凉的创建者是匈奴人沮渠蒙逊。公元401年，沮渠蒙逊杀割据张掖（治今甘肃张掖西北）的段业，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401～411年），史称北凉。蒙逊后攻占姑臧（今甘肃武威），改称河西王。太武帝即位时，正是北凉的全盛时期，占有西北武威（治姑臧）、张掖、敦煌（治今甘肃敦煌西）、酒泉（今属甘肃）、西海（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金城（治今甘肃兰州西北）、西平（治今青海西宁）、乐都（今属青海）等郡，全据河西走廊，并西与西域密切交好，南则先后向东晋、刘宋称臣。

北燕是由汉人冯跋所建。公元409年，冯跋乘后燕政治昏乱之机，自称燕天王，建元太平（409～432年），史称北燕。北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占有辽东广大地区。

大夏的创建者是匈奴人赫连勃勃。公元407年，赫连勃勃脱离后秦姚兴的控制，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改元龙升（407～412年），史称大夏。大夏全盛时，占有今陕西、宁夏、河套以及山西南部等广大地区，以长安为都城。大夏拥有10余万精锐骑兵，军事实力很强。大夏东部以黄河为界与北魏接壤，离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很近，又拥有强大的机动灵活的精骑部队，是北魏的心腹大患。

柔然，又称蠕蠕，是公元4世纪末以来北方逐渐崛起的一支游

牧民族，占有东起大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至大漠、北至贝加尔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柔然强盛时，有数十万精锐骑兵，军事实力很强。柔然与北魏的兴起差不多同时，因而从北魏王朝建立开始，柔然就成为北魏北边的强敌。从道武帝(386～409年在位)时期起，柔然骑兵就不断地越过大漠，侵扰北魏北境，威胁京都平城。

总之，北魏在北方处于北燕、北凉、大夏及柔然的包围之中。东北方是北燕，西方是北凉与大夏，北方是柔然。而其中对北魏威胁最大的是大夏与柔然。

三、太武帝统一北方的战争谋略

太武帝即位后，志在凭借精锐骑兵以武力统一中国。他的战争谋略是各个击破、先北后南，即先统一北方，然后伺机南进，以对付刘宋，这是符合实际的正确战略方针。

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看，北魏对南方的刘宋难以一举消灭。魏泰常七年（422年），明元帝拓跋嗣“锐意南征”①，本想在宋武帝新丧之机攻灭刘宋，但魏军在攻占了刘宋河南地区的几个军事据点后，遭到刘宋军的顽强抵抗，无法继续南进，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正如北魏著名军事谋略家崔浩在事先估计的那样，北魏还不可能“一举而定江南”②。确实，北魏当时还没有条件统一南方，在地理环境上，南方地势低洼潮湿，夏季炎热，河流湖泊纵横交错，不利于北魏骑兵发挥优势。同时刘宋初期政治上比较清明，地域广阔，国力较强，对北魏的进攻有一定的抵御力量。此外，西方的大夏、北面的柔然两大强敌对北魏后方形成严重威胁，使其不能全力南进。另一方面，南方的刘宋当时正积蓄力量，一时还无力北上进攻北魏。宋文帝刘义隆（424～453年在位）即位之初，内部政局还不稳定，没有力量大规模征讨北魏，虽偶尔声

---

①②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称北伐，不过是虚张声势，目的还在于自保。崔浩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刘宋扬言北伐，乃是“先声动众，以备不虞”；“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①。此外，刘宋军队以步水师为主，显然无法在中原的广阔战场上与北魏的精骑相抗衡。所以崔浩说：“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指刘宋）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②。魏宋之间的这种形势，使得太武帝暂时把刘宋放在一边，将主要力量放在攻灭北方的敌人上。

在北方包围北魏的大夏、柔然、北凉、北燕这几股势力中，对北魏最具威胁的是大夏与柔然。太武帝要想统一北方，再继而南进，非先消灭北边和西部这两股势力不可。早在明元帝时，刘裕伐后秦，崔浩劝明元帝不要出兵抄刘裕后路时就说：“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南进”③。把消灭西北的大夏、柔然，看作进兵东南的先决条件。同时，首先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可以充分发挥北魏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容易取得战争的胜利。北魏消灭大夏、柔然后，在军事上便摆脱了被包围的形势而处于主动的地位，再进而消灭大夏西边的北凉和辽东的北燕，这样，统一北方的胜券便稳操于手了。最后，再进兵江南，图谋统一全中国。这就是太武帝各个击破、先北后南的全盘战略方针。

为实施这一战略方针，太武帝在即位的第三年(始光二年，425年)，即遣龙骧将军丘堆、谒者仆射胡觐出使刘宋，与其修好。然后，准备用全力先解决迫在眉睫的柔然问题。

第二节　北魏攻灭大夏之战

一、魏主纳崔浩之策首攻大夏

魏主太武帝在始光二年（425年）七月与刘宋通好后，立即于

①②③《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当年十月亲率大军五道并进，北伐柔然。柔然见魏军来伐，绝迹北逃，魏军无功而返。这年八月，大夏主赫连勃勃死，其次子赫连昌继任夏主。

始光三年(426年)正月，西秦主乞伏炽盘遣使至平城朝贡，并请求太武帝出兵讨伐大夏。这时，太武帝因柔然年年入境骚扰，正想彻底解决柔然问题，以乞伏炽盘请求讨夏，便下诏询问百官，今当对外用兵，大夏、柔然何者为先？北平王长孙嵩、平阳王长孙翰、司空奚斤等人认为，"赫连居土，未能为患，蠕蠕世为边害，宜先讨大檀(柔然首领)，及则收其畜产，足以富国；不及则校猎阴山，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亦愈于破一小国"①。崔浩反对说："大檀迁徙鸟逝，疾追则不足经久，大众则不能及之。赫连屈丐(即勃勃)土宇不过千里，其刑政残虐，人神所弃，宜先讨之"②。尚书刘洁等人则提出新意见，请求先灭北燕。太武帝一时难以决定，未置可否，遂率军西巡，校猎于阴山，为用兵征伐预作准备。

同年八月，太武帝返还平城，闻知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其诸子相攻，国内大乱，便准备采纳崔浩的意见首先征讨大夏。这时长孙嵩又反对说："彼若城守，以逸代劳，大檀闻之，乘虚而寇，危道也"③。其他大臣也都以为讨伐大夏有困难。唯独崔浩认为其时正是攻灭大夏的最好时机，所谓"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④。太武帝认准崔浩的谋略符合实际，遂怒责一再阻挠伐夏的长孙嵩，决定先将柔然放在一边，首先对大夏发动进攻。

二、太武帝用示弱佯退之计大败夏军

始光三年(426年)九月，太武帝分派诸将，分两路进攻大夏。一路由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等4.5万人进袭蒲坂(今山西永

①②③《魏书》卷二十五《长孙嵩传》。

④《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济西）、宋兵将军周几率洛州刺史于栗磾等万人袭陕城（今河南三门峡）；一路由太武帝亲率大军自君子津（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南）渡河进袭大夏都城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十一月，太武帝率军至君子津，留大军于后，亲率2万轻骑突袭统万城。这时大夏主赫连昌正与群臣宴会庆贺冬至日，闻魏军骤来，一片慌乱。赫连昌仓惶出城应战，败还入城。当晚，太武帝军宿于统万城北。次日，魏军四出抄略，杀获大夏军民数万，得牛马10余万。太武帝以轻军深入，而统万城坚一时难下，又怕大夏出征西秦的数万大军回救，遂驱掠虏获的人畜主动撤围还师。北魏奚斤等军进展顺利，连下蒲坂、陕城。这时，周几病死军中，奚斤乘胜进军，攻占长安，秦、雍氐、羌皆诣斤降。

始光四年（427年）正月，大夏主赫连昌遣其弟平原公赫连定率兵2万反攻长安。太武帝闻知，决定乘虚进攻统万城，便命人采集木料制造攻具。二月，魏主派高凉王拓跋礼坐镇长安，加强长安的防守力量，并遣执金吾桓贷于君子津筑桥，为再次进攻统万城作准备。四月，太武帝为免去后顾之忧，遣员外散骑常侍步堆、谒者仆射胡观等出使刘宋，与其通好。

这年四月，太武帝在做好一切准备后，发大军再攻统万城。诸军部署如下：将军贺多罗率精骑3000为前候；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等率骑兵3万为前驱；常山王拓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等率步兵3万为后继；南阳王拓跋伏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等率步兵3万运送攻城器械。五月，太武帝命龙骧将军陆俟督率诸军镇守大碛（阴山北沙漠），以防备柔然，随后亲率大军发自平城。

大夏统万城乃赫连勃勃时所修建，“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①，时用“蒸土以筑都城，铁锥刺入一寸，即杀作人而并筑之”②。由于统万城异常坚固，易守难攻，太武帝决定智取。

---

① 《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

② 《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勃勃传》。

五月初九日，魏军自君子津渡过黄河，进抵拔邻山（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筑城，留下辎重。随后，太武帝准备亲率 3 万轻骑兼道而行，奔袭统万。这时，群臣都反对以轻军深入，认为“统万城坚，非十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军攻具，一时俱往”①。太武帝说：“夫用兵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军而徒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复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以是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②。显然，太武帝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引诱敌军离开坚城，在野战中予以歼灭。六月一日，太武帝率轻骑进至统万城，屯军于黑水（今陕西靖边东北长城外无定河支流淖泥河，统万城筑于此水南），分军埋伏于深谷，以少数军队攻城诱敌。

这时，大夏将领狄子玉降魏，说赫连昌派人召攻打长安的赫连定回师，赫连定回答说：“城既坚峻，未可攻拔，待擒（奚）斤等，然后徐往，内外击之，何有不济”③。赫连昌认为赫连定的主意很好，决定固守不出。太武帝闻此讯，颇为忧虑，决定全军退至城北，示敌以弱。同时派永昌王拓跋健及娥清等率骑兵 5000，西进抄掠大夏百姓。这时魏军有士兵逃奔大夏，说魏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应该乘机进攻魏军。赫连昌见魏军北退，又听说魏军粮尽，以为魏军胆怯退走，遂率步骑 3 万，出城攻击魏军。魏司徒长孙翰等人见夏军步骑出城，建议说：“昌步阵难陷，宜避其锋，且纵步兵，一时奋击”④。太武帝说：“远来求贼，恐其不出，今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⑤。遂命令魏军佯退，诱夏军追赶，使其疲劳后反击。赫连昌认为魏军真退，命令夏军展成两翼追击。太武帝退军五六里，随后回军反击，夏军不动，稍复前行。这时恰好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晦冥。宦官赵

---

①②③④⑤《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昌传》。

倪劝太武帝收兵，说："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①。崔浩闻言大声叱责说："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息。风道在人，岂有常也"②。太武帝从其计，分兵为左右队夹击夏军，双方展开激战。这时，太武帝因马蹶（蹶，马跳起用后腿往后踢）坠地，几为夏军所获，大将拓跋齐以身捍蔽，殊死力战，夏军乃退。太武帝重上战马，刺杀夏尚书斛黎文及夏军 10 余人，手中流矢，仍奋战不已。夏军大败，死者万余人，赫连昌不及入城，败走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军攻克统万城，获夏王公卿将及妃嫔万余人，马 30 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统万之战魏军的胜利，充分显示了太武帝的军事素养和军事天才。太武帝留常山王拓跋素、执金吾桓贷镇守统万，又遣大将娥清、丘堆率骑兵 5000 略地关右，以增援长安。围攻长安魏军的赫连定闻知统万城破，率军撤回上邽。太武帝搬师返回平城。

三、大夏的灭亡

夏赫连定自长安退军后，魏长安守将司空奚斤上表请求乘势进军消灭赫连昌。太武帝许之，给奚斤增兵万人，并遣将军刘拔送马 3000 匹，使其与娥清、丘堆等人一齐进军讨伐赫连昌。

北魏神䴥元年（428 年）二月，魏平北将军尉眷从南道袭击赫连昌于上邽，昌逃奔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北）。接着，奚斤与娥清、丘堆等进屯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奚斤军战马多病死，军粮也缺乏，便深沟壁垒，以自固，并遣丘堆与义兵将军封礼至民间督征军粮。丘堆手下士卒大肆抄略百姓，疏于防范，遭赫连昌袭击大败。丘堆率数百骑逃回安定。赫连昌乘势进兵，每日至安定城外

---

①②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骚扰，魏军马料缺乏，军内恐慌。监军侍御史安颉劝奚斤募壮勇出城与赫连昌决战，打破敌军的封锁，奚斤不听。安颉多次劝谏无效，遂与平北将军尉眷暗中挑选骑兵，准备突袭赫连昌。不久，赫连昌又率兵前来攻城，安颉率骑兵出击，会大风扬尘，赫连昌退走。安颉追击，昌马蹶坠地，被安颉活捉。赫连昌之弟赫连定见昌被俘，奔还平凉，继任夏主。

奚斤自以为统帅，而擒捉赫连昌之功却被他人所得，深以为耻。神䴥元年三月，奚斤为与安颉争功，舍弃辎重，使将士携带3日粮，轻军追赶赫连定至平凉。魏将娥清建议沿泾水而进，奚斤不听，从北道截断赫连定的退路。这时奚斤部下一小将因罪叛投夏军，告以魏军食少无水。赫连定乃发兵前后夹击魏军，魏军大败，奚斤及娥清、刘拔等人皆被夏军俘虏，将士死者六七千人。丘堆在安定守辎重，闻奚斤等大败，弃辎重逃奔长安，随即与高凉王拓跋礼弃长安，东奔蒲坂。赫连定遂收复长安。北魏攻大夏之战，出现了反复。四月，夏主赫连定遣使至魏都平城请和，太武帝诏谕其归降。此后，太武帝忙于北伐柔然，攻夏之战暂告一段落。

北魏神䴥三年（430年）三月，刘宋起兵北伐，企图收复被北魏攻占的河南之地。太武帝听从崔浩的建议，对刘宋北伐采取后发制人的战略，命魏军主动放弃河南地区，撤回黄河以北。七月，刘宋到彦之军占领河南诸军事重镇，“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①。这时，大夏主赫连定见宋军进展顺利，遣使“与刘义隆（宋文帝）连和，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义隆，恒山以西属定”②。并派军进攻魏鄜城（今陕西洛川东南），图谋与刘宋夹击北魏。

太武帝见赫连定与刘宋连和，遂准备先消灭大夏赫连定。群臣以为刘宋大军压境，“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③。太武帝疑虑，问计于崔浩。崔浩分析说：“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虚唱相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

①③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② 《魏书》卷九十五《铁弗刘虎传附赫连定传》。

敢先入……（宋）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观此知刘宋无渡河意，而“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愿陛下西行勿疑”①。太武帝听了崔浩的精辟分析后，深以为是，决定立即西进讨伐赫连定。九月二十一日，太武帝第三次亲率大军伐夏，取道统万奔袭平凉，同时派卫兵将军王斤镇守蒲坂，防备长安夏军东侵。十一月，太武帝军至平凉，赫连定之弟赫连社干等婴城固守。太武帝命安西将军古弼等军进攻安定，以防正在进攻魏鄜城的赫连定回救平凉，然后分派众将猛攻平凉。夏主赫连定闻讯从鄜城赶回安定，率步骑 3 万人从鹑觚原（今甘肃灵台附近）回救平凉，于路与古弼军相遇。古弼佯退，诱夏军深入，夏军追击。太武帝令高车驰袭夏军，大败赫连定，斩首数千级。赫连定退还鹑觚原，列方阵固守。魏诸军追击，将赫连定围困在鹑觚原，断其水草。数日后，赫连定人马饥渴，被迫突围。魏武卫将军丘眷追击，夏军大溃，死者万余人。赫连定身受重伤，单骑逃走，收合余众，再保上邽。魏军俘获夏主弟赫连乌视拔、赫连秃骨及大夏公侯以下百余人，随后乘胜进军，攻占安定。接着，太武帝自安定还抵平凉，令众军掘堑壕围困平凉孤城。十二月初三日，平凉守将赫连社干等人出降，魏军攻占平凉。大夏长安等地守将闻平凉、安定等地失守，皆弃城而逃，关中地区全部被北魏占领。至此，大夏的军事力量已被太武帝消灭殆尽。

魏神䴥四年（431 年）六月，赫连定渡河进击北凉时，被吐谷浑王派军攻破，赫连定被擒。次年，吐谷浑送赫连定于魏，大夏灭亡。北魏在统一北方的军事谋略中，采取各个击破、先强后弱的方针，首先灭掉强敌腹心之患大夏，这有利于增强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鼓舞士气，动摇和瓦解其他割据势力的军心。因而北魏灭大夏之战，是其统一战争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①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第三节　北魏破柔然之战

一、柔然政权的建立及其国势

柔然，又称芮芮、蠕蠕，是“东胡之苗裔”①。从柔然主阿那瓌对北魏孝明帝所说“臣先世源由，出于大魏”②来看，柔然大概是鲜卑族的支属，并可能和拓跋氏是近支。柔然汗始祖木骨闾与郁久闾发音相近，遂以郁久闾为姓氏。4世纪初，木骨闾脱离拓跋联盟首领猗卢的控制，依附纥突邻部。木骨闾之子郁久闾车鹿会雄健，始有部落，号称柔然，仍役属于拓跋氏，“岁贡马畜、貂豽皮，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③。到车鹿会4世孙匹候跋和缊纥提时，二人分掌柔然东、西部。376年，拓跋什翼犍死，缊纥提脱离拓跋氏的控制，依附匈奴刘卫辰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复国后，进兵讨伐柔然，匹候跋与缊纥提相继败降。登国九年（394年），缊纥提之子曷多汗与社仑率部众逃离拓跋部，曷多汗被追兵杀死，社仑逃奔匹候跋，后杀匹候跋，掠掳部众远遁漠北。

社仑是柔然历史上的著名首领，他远遁漠北后，吞并另一游牧民族高车诸部，占据其地。社仑在柔然内部建立军制：“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为幢，幢置帅一人”④。同时规定军法：“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⑤。随后，社仑大破大漠西北国势富强的匈奴余种拔也稽，全据大漠地区。社仑自称丘豆伐可汗，“丘豆伐”如魏言“驾驭开张”，“可汗”如魏言“皇帝”意。从此，柔然汗国建立，其版图东起大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起大漠，北至贝加尔湖以南，成为当时亚洲东北部的强大游牧国家。

柔然汗国建立之后，凭借其游牧民族特有的强悍骑兵，不断

---

①②③④⑤《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南下侵扰北魏边地，威胁魏心腹地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平城（今山西大同）等地。当魏军发兵北讨时，柔然军则退至大漠以北，行动飘忽，来去不定。太武帝即位，柔然的统治者是社仑叔父仆浑之子大檀，号牟汗纥升盖可汗，魏言即“制胜”之意。大檀深得柔然部众拥戴，在位时期，柔然国势强盛，每当北魏对外用兵时，柔然必从其后侵扰。因此，北魏欲统一北方，对南用兵，必须消除柔然的威胁。

二、魏廷进兵柔然的谋议

北魏明元帝（409～423年在位）去世后，太武帝即位之初的始光元年（424年）八月，纥升盖可汗乘北魏新主初立之机，率骑兵6万入寇云中，杀掠吏民，攻下魏盛乐宫（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太武帝亲率轻骑自平城反击柔然，三天两夜兼程赶到云中。纥升盖可汗率军围太武帝军50余重，柔然军对魏军“骑逼马首，相次如堵”①。魏将士恐慌，幸亏太武帝“颜色自若，众情乃安”②。这时，魏军射杀纥升盖可汗之从子於陟斤，纥升盖可汗恐惧，才领兵退走。

柔然退兵后，尚书令刘洁建议太武帝说：“大檀恃众，虽破胆奔北，恐不惧往败，将复送死。请收田讫，复一大举，东西并进，为二道讨之”③。太武帝深以为是。始光二年（425年）四月，太武帝在即位后诸事就绪后，决定先解除柔然的威胁，遣龙骧将军步堆、谒者仆射胡观出使刘宋通好，又命各地运粟塞上，准备全力对付柔然。始光二年十月，太武帝自率大军东西五道并进，北伐柔然。魏军到达漠南，舍辎重带15日粮，渡大漠向柔然发动突然袭击。柔然部落惊骇北逃，魏军无功而返。次年，太武帝以大

①② 《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③ 《魏书》卷二十八《刘洁传》。

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国内大乱，决计暂将柔然搁置一边，先攻灭大夏。

神䴥二年（429年），太武帝已经消灭大夏主力，与夏主赫连定暂时处于休战状态，遂再议北伐柔然之事。这年四月，太武帝练兵于南郊，准备进讨柔然。当时朝臣内外皆不赞成对柔然用兵，只有崔浩坚决支持北伐柔然。于是，北魏君臣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对柔然用兵的争论。尚书令刘洁、左仆射安原等使黄门侍郎仇齐推举赫连昌的太史张渊、徐辩利用天象，劝说太武帝不可举兵，并说“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①。众朝臣亦同声附和张渊，说张渊曾谏阻苻坚不可南征，苻坚不从遭致失败。崔浩也从天象上论证可以用兵，并认为张渊等人“牵于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②。张渊等惭愧，又说：“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劳士马也？”③崔浩又反驳说：“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④。张渊等人哑口无言，太武帝遂决意北伐。

罢朝以后，又有人责难崔浩说：“今吴贼（指刘宋）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⑤。崔浩分析当时形势说：“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崔浩又进一步分析柔然国内形势后指出：“大军卒至，（柔然）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⑥。崔浩所说，不仅对刘宋和柔然的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实际上也是后来北魏征伐柔然的作战方略，并在战争实践中证明是正确有效的。当太武帝决定发兵征讨柔然时，北魏天师寇谦之又问崔浩，魏军此行能一举胜利吗？崔浩胸有成竹地说：“天时形势，必克无疑”，只怕

①②③④⑤⑥《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诸将多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从而不得全歼敌人①。正在这时，北魏使臣从江南还，称宋廷要北魏归还河南之地，不然就要北进伐魏。太武帝闻听此言大笑，对百官说："龟鳖小竖，自救不暇，何能为也。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上策也"②。魏廷遂决定兵伐柔然。

三、轻骑突袭大破柔然

神䴥二年（429年）四月二十九日，太武帝以太尉长孙嵩、卫尉楼伏连留守京师平城，自率大军从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使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约今内蒙古托克托一带），两路成夹击形势，同会于柔然王庭（在今蒙古哈尔和林西北）。五月，太武帝军至漠南，按照预定的作战方略，舍弃辎重，帅轻骑兼马渡大漠奔袭柔然。魏军至栗水（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数百里），柔然纥升盖可汗先无准备，民畜遍野，见魏军突至，柔然部众皆惊怖散去。可汗之弟匹黎掌管柔然东部，闻讯率众西进欲救其兄，路遇长孙翰邀击，大败。纥升盖可汗知匹黎战败震惊，焚烧庐舍，率其族党狼狈西逃。于是柔然部众四散，窜伏山谷，畜产遍野，无人照管。太武帝指挥将士分军深入搜讨，东至瀚海（今贝加尔湖），西接张掖水（今甘肃张掖西北），北渡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东西进军5000余里，南北3000余里。这次作战柔然部众前后归降者30余万，俘获柔然战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无数。七月，魏军得胜凯旋，十月，太武帝回到平城。

柔然经此一战，元气大伤，纥升盖可汗不久发病死去。太武帝在回军途中，又命左仆射安原袭击原依附柔然的东部高车，其部众数十万归降。从此，柔然国势渐衰，一时无力再南下侵扰。继

①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② 《魏书》卷一百零三《蠕蠕传》。

立的纥升盖可汗之子吴提，被迫与北魏通好。太武帝大破柔然之战，为继续统一北方及南进，解除了后顾之忧。

太武帝此战，针对柔然行动飘忽不定的特点，运用闪电般的快速突袭战，大军一近漠南，立即舍辎重轻骑突进，使本来行动疾速的柔然事先毫无战斗准备，竟仓惶西逃，人畜遭到惨重损失，魏军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一次成功的轻骑突袭战。

第四节　北魏乘胜统一北方

一、北魏灭北燕、北凉之战

太武帝在攻灭大夏、大破柔然，解除了北方这两大威胁势力之后，开始动手消灭势力较弱的北燕和渐趋衰落的北凉。

北燕占有辽东地区，军事力量很弱。神䴥三年（430 年），燕主冯跋死，其弟冯弘将冯跋诸子尽皆杀死，自立为王。

延和元年（432 年）七月，太武帝亲率大军伐北燕。魏军至濡水（今河北东北部的滦河），太武帝命安东将军奚斤发幽州（治蓟县，今北京西南）百姓及密云（今属北京）丁零族万余人运送攻具，出南路于燕都和龙（今辽宁朝阳）会合。太武帝至辽西（北燕时治肥如，今河北卢龙），冯弘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献牛酒，慰劳魏师。太武帝随后进围和龙，冯弘闭城固守。北燕石城太守李崇等 10 郡归降北魏。八月，冯弘遣兵数万出城接战，被魏昌黎公拓跋丘、河间公拓跋齐击败，死者万余人。当时北燕尚书高绍率万余家镇守羌胡固。太武帝亲自进兵讨伐，斩高绍。太武帝分派平东将军贺多罗攻占带方，抚军大将军拓跋健攻克建德，骠骑大将军拓跋丕攻占冀阳。九月，太武帝以和龙久攻不下，徙燕营丘、成周、辽东、乐浪、带方、玄菟 6 郡百姓 3 万户于幽州。

延和元年（432 年）十一月，被冯弘废黜的世子冯崇与其弟冯朗、冯邈据辽西降魏。太武帝以其为假节、侍中、都督幽、平 2 州

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并封其为辽西王。冯弘闻知，派其将封羽围攻冯崇。太武帝遣永昌王拓跋健督众军援崇，燕将封羽又以所据凡城降魏。

延和三年（434年）正月，冯弘遣使臣至魏乞和，太武帝不许。三月，冯弘遣尚书高颙上表称蕃，愿臣服于魏。太武帝乃许之，令其质送太子。六月，太武帝以冯弘不遣太子质魏，命拓跋健、司空长孙道生、侍中古弼督诸军再攻北燕和龙，收其庄稼，徙其百姓而还。太延元年（435年）六月，太武帝又遣骠骑大将军拓跋丕等5将率4万骑兵进攻和龙，遂再次掳掠百姓男女6000口而还。魏廷采取不断攻围和龙，迁徙其人口，削弱其国力的办法，使北燕处境日渐困难，已无法再坚持下去了。

太延二年（436）二月，冯弘遣使入贡于魏，请送侍子，太武帝不许。三月，太武帝遣平东将军娥清、安西将军古弼率精骑一万伐燕，使魏平州刺史拓跋婴率辽西诸军同时进兵，合攻和龙。冯弘向高句丽求救。四月，高句丽王派大将葛蔓卢率步骑2万迎接冯弘，冯弘遂率和龙军民逃奔高句丽，北燕遂亡。

北凉占有河西地区，中间隔大夏与北魏东西相望，大夏被北魏攻灭后，遂与北魏接壤。

北凉主沮渠蒙逊自北魏始光三年（426年）起，多次遣使臣与北魏通好。神䴥四年（431年），沮渠蒙逊见大夏已灭，派其子沮渠安周入侍魏廷为质子，臣附于魏。同年九月，太武帝遣兼太常李顺至河西，封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以示安抚。延和元年（432年），太武帝又命李顺出使北凉，观沮渠蒙逊虚实动静，以便采取相应措施。李顺回来说，沮渠蒙逊"专威河右三十许年，经涉艰难，粗识机变，又绥集荒陬，远人颇亦畏服，虽不能贻厥孙谋，犹足以终其一世"①。但蒙逊"不忠不信"②，其统治时间不会太长了。李顺还认为，蒙逊诸子中只有沮渠牧犍才识稍可，但也

①② 《魏书》卷三十六《李顺传》。

不及其父蒙逊，待蒙逊死后北凉就容易消灭了。太武帝听信李顺的分析，又以“方事于东（指灭北燕），未暇营西”①，决定先灭亡北燕，再图北凉。

延和二年（433年）四月，沮渠蒙逊死，其子沮渠牧犍继位，称河西王。太武帝以新灭北燕，不宜立即西进，遂遣李顺拜牧犍为使持节、侍中、车骑将军、凉州刺史、河西王，继续实行安抚策略。

太延三年（437年），太武帝欲进兵灭凉，与李顺谋议。但李顺因收受沮渠牧犍贿赂，劝太武帝推迟进兵，并说：“民劳既久，未获宁息，不可频动，以增劳悴。愿待他年”②。太武帝从之。

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再谋灭凉之事，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北凉观其虚实。贺多罗回来称：“牧犍虽称蕃致贡，而内多乖悖”③。太武帝决定即刻进兵讨伐北凉，先问计于崔浩，崔浩说：“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今出其不意，不图大军卒至，必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④。太武帝深以为是。当集公卿朝议时，弘农王奚斤等30余人皆反对用兵，他们认为：“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罪未甚彰，谓宜羁縻而已。今士马劳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尚书古弼、李顺等人皆以凉州无水草，极力劝阻伐北凉。崔浩驳斥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无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崔浩直斥李顺说：“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⑤太武帝严辞责备奚斤、李顺等人，群臣不敢再言，进兵凉州之策这才最后决定下来。

---

①② 《魏书》卷三十六《李顺传》。

③ 《魏书》卷九十九《卢水胡沮渠蒙逊传》。

④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⑤ 以上皆见《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太延五年（439 年）六月，太武帝命侍中、宜都王穆寿留平城辅皇太子拓跋晃处理朝政，大将军、长乐王嵇敬与建宁王拓跋崇率兵 2 万驻屯漠南防备柔然，自率大军从平城进发，西讨北凉。

七月，太武帝军至上郡属国城（今陕西榆林城），留下辎重，分派诸军西进。命抚军大将军拓跋健、尚书令刘洁督诸军，与常山王拓跋素两道并进，以为前锋；骠骑大将军拓跋丕、太宰杜超，督平凉、鄜城等地诸军为后继，以平西将军源贺为向导。八月，拓跋健军至河西，获北凉牛马畜产 20 余万。沮渠牧健见北魏大军压境，采纳其左丞姚定国的建议，向柔然求救，又派其弟沮渠董来率兵万余出姑臧城南应战，董来望风奔溃，牧健遂闭门固守。这时，太武帝亲至姑臧，牧健兄子沮渠祖出城降魏。九月，牧健兄子沮渠万年又率部下归降。沮渠牧健见大势已去，率文武百官投降。太武帝收姑臧城内户口 20 余万，获其仓库珍宝不计其数。太武帝命龙骧将军穆罴、安远将军源贺等人，分头攻略北凉诸郡，各地杂胡降魏者数十万。牧健弟沮渠宜得、沮渠无讳逃奔晋昌（今甘肃安西东南），北凉灭亡。十月，太武帝留骠骑大将军拓跋丕、征西将军贺多罗镇守凉州，率大军回师，并徙凉州民 3 万户于京师平城。

至此，北魏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从此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 120 余年的战乱分裂局面，这对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的增多，民族的融合，汉文化在新的条件下的复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北朝的历史，对以后隋唐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北方统一后的南北形势

太武帝统一北方以后，全国形成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北魏在攻灭北凉后，占有了西至凉州、东至大海、北至大漠、南至河南的广大地区，其国力渐趋强大。在经济上，北魏地大物博，所占地区农业和畜牧业都很发达，有着丰富的人力物力。在军事上，

经过数十年的征战及扩充军队，建立起一支拥有数十万之众的能征善战的精锐骑兵。在政治上，北魏中央集权力量强大，无割据势力内乱之忧，牢固地控制着北方地区。北魏在与南方刘宋的对峙中，占有明显的优势。雄才大略的太武帝在统一北方后，本欲一举平定南方，统一天下，因此积极准备向南发展。但北魏王朝在大一统的局面下，也隐藏着一些隐患，它统一北方凭借的是武力征服，而且统一局面出现不久，统治并不稳固，国内阶级的和民族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很尖锐。这些不利因素在南北对峙中，常影响北魏向南进兵。

南朝的刘宋政权，在区域上是南朝历代中最大的。由于宋初宋武帝刘裕与宋文帝刘义隆的励精图治，其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宋文帝统治时期更被誉为“元嘉之治”。从整体上看，太武帝统一北方后与之对峙的刘宋，是南朝国力最强盛的时代。宋文帝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对北魏乘宋武帝之死夺去的河南之地一直耿耿于怀，力图北伐予以收复。因此，南北双方的战争，乃是势不可免的。但实际上，刘宋却有许多不利于与北魏征战的因素。首先，宋文帝虽是有为之君，但东晋以来权臣震主的阴影仍笼罩着他，唯恐大权旁落，不敢放手使用人才，在战争中也常不切实际地遥控指挥。其次，当时刘宋虽号称小康，但不过是与此前的乱世比较而言，并非真正的民富国强，经济实力不足以应付战争的大量消耗。再次，刘宋军事实力远逊于北魏，尤其缺乏灵活快速、冲击力强的骑兵，在中原的广阔战场上，根本不是北魏的对手。因此，刘宋在后来与北魏的战争中，总是败多胜少，鲜有胜利的机会。

第二十三章　北魏夺取刘宋淮北四州之战

第一节　战前的南北形势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 年），宋魏之间发生的大战，其结果以北魏胜利、刘宋失败而告终。这场战争以后，南北双方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北魏太武帝凭借雄厚的军事实力，在魏、宋大战中曾逞一时兵威，从黄河南岸直趋长江北岸，其结果无功而返。由于北魏完成统一的时间不久，政治统治并不很稳固，在这场大战中魏军人马损失过半，国力被削弱，原本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更趋尖锐。宋、魏大战后的第二年（正平二年，452 年），北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首先爆发。同年三月，中常侍宗爱杀太武帝，改立南安王拓跋余。自任大司马、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专制朝政。不久，宗爱以拓跋余欲夺己权，又杀掉拓跋余。魏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等人，迎立太武帝之孙拓跋浚为帝，是为北魏文成帝。文成帝即位后，杀宗爱，随后又诛相互争权的尚书令长孙渴侯和太宰元寿乐，北魏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方告一段落。此后，文成帝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北方因战乱而遭破坏的社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军事上依然很强大，政治上也处于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北魏的国力，显然在日益增强。

刘宋在宋魏大战中是失败的一方。战争过后，刘宋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国力大为削弱，尤其是魏军南进所过郡县，烧杀抢掠，赤地千里，邑里萧条，元嘉之治遂告结束。此后，南北形势逐渐向北强南弱的局面发展。

大战之后，刘宋初期比较稳定的政治局面被破坏，统治阶级

的内部矛盾首先爆发。刘宋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太子刘劭勾结始兴王刘濬杀宋文帝自立。从此，刘宋陷入宗室自相残杀的内乱之中。

同年三月，宋武陵王、江州刺史刘骏与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起兵讨伐刘劭，荆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等皆起兵响应。同年五月，刘骏等人攻入建康，消灭刘劭、刘浚等人。刘骏即帝位，是为宋孝武帝。宋孝武帝世，刘宋相继发生了荆州刺史南郡王刘义宣、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刘诞的叛乱，这两次叛乱虽都被平定，但却严重地削弱了刘宋的国力。

大明八年（464年）闰五月，孝武帝病死，其子刘子业即位，史称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八月，辅政的太宰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等人，因受前废帝猜忌，密谋废帝，拥立刘义恭，事泄皆被杀。九月，徐州刺史义阳王刘昶亦因遭前废帝猜忌，起兵叛乱，事不成，逃奔北魏。十一月底，南豫州刺史湘东王刘彧与前废帝近臣阮佃夫、王道隆等人杀掉前废帝。十二月，刘彧即帝位，改元泰始，是为宋明帝。

宋明帝即位后，刘宋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内乱。前废帝刘子业被杀之前，曾派人持毒药去毒杀其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实际掌握江州（时治寻阳，今江西九江）权力的长史邓琬拥刘子勋起兵反抗。明帝即位后，邓琬等人拥立刘子勋为帝，与明帝相对抗。由于刘子勋是孝武帝的儿子，继承帝位比身为孝武帝之弟的明帝刘彧更名正言顺，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益州刺史萧惠开等人皆起兵响应，史称：于时“普天图逆”①。明帝朝廷所能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京师建康附近数郡，形势一度很危急。泰始二年（466年）八月，宋明帝军攻下寻阳，杀刘子勋，平定江州。接着，宋明帝逐渐平定了各叛乱州郡。

泰始二年十月，响应刘子勋叛乱的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毕众敬、汝南太守常珍奇等人见大势已去，向宋廷请降。当时，

---

① 《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附子兴宗传》。

地处与北魏接境的淮北诸州地方官已经归顺朝廷，宋廷应当持慎重的态度，采取安抚的方针。蔡兴宗曾建议说："安都遣使归顺，此诚不虚。今宜抚之以和……以重兵迎之，势必疑惧，或能招引北虏，为患不测"①。宋明帝不纳，认为自己已获大胜，欲示兵威于淮北，命镇军将军张永、中领军沈攸之率甲士 5 万北上接纳薛安都等人。薛安都闻听刘宋大军北上，恐怕自己不能为宋明帝所容，遂转而向北魏乞师请降，汝南太守常珍奇也同时降魏。由此而引起了魏宋之间争夺刘宋淮北 4 州的战争。

第二节 尉元指挥的吕梁之战

魏天安元年（466 年）十月，刘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宋降魏，并请北魏出兵救援。魏廷遣镇南大将军尉元为使持节、都督东道诸军，以镇东将军孔伯符为副，率 2 万骑兵出东道救彭城（今江苏徐州）；又遣镇西大将军拓跋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诸军事，以给事中张穷奇为副，率军出西道救悬瓠（汝南郡治、今河南汝南）。

尉元率领的东路军进至淮北，刘宋东平太守无盐（东平郡治，今山东东平东）戍主申纂诈降，被尉元识破，表面接受而暗中防备。魏军至无盐，申纂闭门不纳，尉元率军继续南进。十一月，尉元军至瑕丘（宋兖州州治，今山东兖州北）。宋兖州刺史毕众敬先起兵响应晋安王刘子勋反叛，后与薛安都等一起归顺宋廷。当薛安都乞降北魏时，毕众敬并没有改变主意。但恰在此之前，在建康的毕众敬之子毕元宾，因他罪被宋明帝杀死。于是毕众敬也遣使投降尉元。尉元立即派部将进据瑕丘，然后挥师长驱而进。十二月，尉元军至秺县（今山东定陶东）。

与此同时，刘宋张永、沈攸之等军逼近彭城，屯于下磕（今

① 《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附子蔡兴宗传》。

江苏徐州南）。张永分派羽林监王穆之率兵5000驻武原看守辎重，龙骧将军谢善居领兵2000据守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散骑侍郎张引领兵2000镇守茱萸，督运租粮，以供大军补给。

尉元率军继续南进，先张永军到达彭城，依魏献文帝诏令授薛安都为徐州刺史，进占彭城。当夜，张永军亦赶到，趁夜攻彭城南门，不克而还。

尉元见张永等军分据险要，强攻一定会损伤士卒，便命薛安都与中书侍郎李璨固守彭城，自己亲率精锐骑兵外出作战，进击吕梁宋军，断绝其粮道。宋军谢善居不敢拒敌，逃奔茱萸张引，随后2人又转逃武原。尉元纵骑兵追击，斩杀宋军800余人，随之进围武原。武原宋军共有8000人，在王穆之率领下闭城固守。尉元亲披铠甲，督率魏军四面猛攻，克王穆之外营，杀伤宋军大半，获辎重500余乘。尉元将所获辎重补给彭城魏军，然后命魏军暂缓进攻，给武原宋军让出退逃之路。于是王穆之率残兵投奔张永。魏军乘胜进军，围攻下礚。

皇兴元年（467年）正月，张永、沈攸之等人见大势已去，弃城夜逃。这时正值天降大雨雪，泗水（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流经彭城）结冰，舟船不通，于是张永等军弃船自陆路逃跑。尉元事先料到宋军将要退逃，亲率将士截其退路。同时，薛安都、孔伯恭等人从彭城出兵向南，追赶宋军。尉元将宋军退路阻截，南北夹击，在吕梁之东大破宋军，斩首以万数。加之天寒地冻，宋军冻死者大半，手足冻断者十之七八，丢弃的车船军资器械不可胜数。此次作战，宋军损失惨重。张永被冻掉脚趾，他与沈攸之2人仅以身免。刘宋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人，也被魏军俘虏。这就是尉元大破宋军的吕梁之战。

吕梁战后，刘宋丢掉淮北兖州和徐州部分地区，淮北防线撤至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睢陵（今江苏睢宁）、宿预（今属江苏）一带。尉元大败宋军后，利用张永弃船900艘，请运魏冀、相、济、兖等州租粟，以解彭城饥荒，魏廷从之。接着，尉元上表请求进攻刘宋淮北下邳等地，积极准备攻取整个淮北地区。

同年七月，宋明帝命兵败后驻屯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的沈攸之进兵收复彭城。沈攸之认为水道干涸，粮运不通，力谏不可于此时进兵。明帝坚持己见，使者往返7次。最后明帝大怒，下诏说，如果沈攸之不想北进，便另选统帅，在君威的迫使下，沈攸之勉强进军。八月，沈攸之率军北进。当宋军行至离下邳50余里的焦墟时，宋明帝又后悔，诏令退军。尉元闻宋军北进，急命孔伯恭率步骑一万拒战，又将吕梁之战俘获的宋军残废将士送还沈攸之，以挫伤宋军士气。沈攸之接宋明帝诏令后，率军后撤。孔伯恭率魏军追击，宋军大败，龙骧将军姜产之战死，沈攸之受重伤，逃往下邳，魏军随后紧追不舍。当夜，沈攸之部下将士溃散，宋军损失严重，丢弃军资器械数以万计，攸之轻骑逃回，屯于淮阴。

尉元见沈攸之兵败，乘势南进，刘宋淮北下邳、宿豫、淮阳等地守将皆弃城而走，魏军遂全据淮北徐、兖2州之地。

第三节　慕容白曜率兵“席卷三齐”

北魏皇兴元年（467年）闰正月，刘宋曾响应晋安王刘子勋叛乱的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遣使请降于魏，并请兵救援。二月，北魏献文帝诏令平东将军长孙陵、平南将军侯穷奇率军赴援。继又命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为使持节、都督诸军事，率骑兵5万驻屯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以为长孙陵等军的后援。

当时刘宋东平太守申纂戍守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并州刺史房崇吉屯据升城（今山东长清东北），截断北魏使者交通，魏廷诏慕容白曜督诸军进兵攻讨。三月，慕容白曜进军至无盐，申纂依城拒守。这时魏军中的谋士认为己方攻具不全，不宜立刻发动进攻。左司马郦范劝白曜说：“今轻军远袭，深入敌境，岂宜淹缓！且申纂必谓我军来速，不暇攻围，将不为备；今若出其不意，可一

鼓而克”①。白曜深以为然，遂命令军队佯退，作出不准备攻城的样子。申篡果然中计，防守懈怠。慕容白曜乘夜调度将士，清晨突然发动猛攻，早饭时即将无盐攻克，擒获申篡，获无盐城内男女数千口。慕容白曜欲将俘获人口作为军赏分与将士，郦范说："齐，形胜之地，宜远为经略。今王师始入其境，人心未洽，连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怀之，未易平也"②。白曜听后采纳，将俘获人口全部放免。后来的事实证明，郦范的意见是正确的。

这时，投降北魏的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在宋廷遣使招喻下，又复归附刘宋。于是慕容白曜从无盐回师北上，进抵肥城（今属山东），准备发动进攻。郦范又献计说："肥城虽小，攻则淹日，得之无益军声，失之有损威势。且见无盐之卒，死者涂炭，成败之机，足为鉴矣。若飞书告喻，可不攻自伏，纵其不降，亦当逃散"③。白曜遂命人下书晓喻肥城守军，宋军果然溃散，弃城而逃，魏军不战而有肥城，缴获军粮30万斛。白曜高兴地当众夸赞郦范说："得卿，三齐不足定矣"④。

接着，慕容白曜进军升城，宋军拒守垣苗（今山东长清西南）、麋沟（亦在今山东长清西南一带）2戍。白曜分骑兵千余突袭麋沟，宋军溃败，自投济水（古水名，自今山东东阿以西至今济南一段，略同今黄河河道）死者千余人。白曜紧接着攻破垣苗，获军粮10余万斛。白曜在一旬之内，连破无盐、肥城、麋沟、垣苗4城，缴获大批粮食，军粮充足，威震齐土。

四月，慕容白曜进抵升城，挥军猛攻，杀宋守军数百人，宋

---

①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宋纪十四》明帝泰始三年二月。

③ 《魏书》卷四十二《郦范传》。

④ 《魏书》卷四十二《郦范传》。"三齐"：秦末，项羽以齐国故地立故齐王族人田都为齐王，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田市为胶东王，都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田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东南），史称三齐，地当今山东省大部地区。

守将房崇吉乘夜弃城逃跑。白曜占领升城后，抚慰百姓，对未及逃走的房崇吉的母亲妻子，待之以礼，升城人心安定。这时，宋青州刺史沈文秀派人来投降，并请白曜进兵援助。白曜欲遣偏师赴援，郦范揣情度势，认为沈文秀不是真心投降，劝白曜不要仓促出兵。他建议先攻占较近的历城（今山东济南）、盘阳（今山东淄博南）、梁邹（今山东邹平北）等地，再长驱东进，攻取青州州治东阳（今山东青州），以免孤军东进，遭敌前后夹击。慕容白曜认为，上述诸地皆不堪一击，沈文秀是知其必败，先一步归顺，仍欲直接东进。郦范进一步分析说："历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文秀既据东阳为诸城根本，多遣军则历城之固不立，少遣众则无以惧敌心。脱文秀还叛，闭门拒守，偏师在前，为其所挫，梁邹诸城追击其后，文秀身率大军，必相乘迫，腹背受敌，进退无途，虽有韩、白，恐无全理"①。白曜这才停止进兵，后沈文秀果然是诈降。不久，刘宋又以沈攸之为统帅，使其率军北上收复彭城。魏彭城守将尉元请求援兵，魏廷诏慕容白曜率军赴援，白曜军至瑕丘（今山东兖州北），患病暂停，不久宋军停止前进，白曜遂驻屯瑕丘。

八月，慕容白曜自瑕丘进攻历城（宋冀州州治），先命人下书晓喻宋冀州刺史崔道固投降，道固拒守不降，白曜遂命将士修筑长围攻城。次年二月，白曜军攻破历城东郭，崔道固率军出降。随后，宋兖州刺史梁邹守将刘休宾亦献城投降。白曜送崔道固、刘休宾及其僚属等于京师平城，并将历城、梁邹 2 城百姓北徙，魏廷特设平齐郡（今山西朔州东南）以安置。

在慕容白曜进攻历城的同时，魏平东将军长孙陵、宁朔将军尉眷等率兵万余人进攻东阳（宋青州州治），青州刺史沈文秀遣使请降。但魏军进入东阳西郭后，大肆掳掠，沈文秀悔怒，遂转而闭城固守，并击破魏军，长孙陵等人屡攻城不克。

魏皇兴二年（468 年）三月，慕容白曜率大军自历城东进，攻

---

① 《魏书》卷四十二《郦范传》。

打东阳。沈文秀奋力固守，白曜命将士修筑长围数重。次年正月，魏军攻克东阳，生擒沈文秀送至京师，获仓粟85万斛、米3000斛、弓箭甲胄兵器等20余万、铜5000斤、钱15万，并俘获城内人口4.1万。

至此，刘宋青、冀2州尽为北魏占领，这就是慕容白曜所进行的“席卷三齐”之战。

第四节 刘宋青、冀、徐、兖四州尽失的历史影响

北魏皇兴三年（469年）正月，慕容白曜攻占东阳后，不仅刘宋淮北青、冀、徐、兖4州之地皆被北魏占领，实际上，刘宋豫州的淮西地区，也被魏夺取。魏天安元年（466年）十月，宋徐州刺史薛安都降魏时，宋汝南太守常珍奇也以汝南（郡治悬瓠，今河南汝南）降魏。魏廷以镇西大将军拓跋石为统帅，出西道至悬瓠。十二月，拓跋石率魏军至汝南，常珍奇迎魏军入城，魏廷以常珍奇为持节、平南将军、豫州刺史。后常珍奇虽又叛魏归宋，但刘宋豫州淮西地区落入魏手。

刘宋淮北四州及淮西地区被魏占领，对于魏宋双方均有着重大的影响。刘宋淮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区，大体包括今黄河以南的山东全部、江苏淮北、河南东部与安徽北部等广大地区。这些地区人口稠密，水利资源丰富，农业生产发达，当时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刘宋失去这一地区，疆域缩小，大批人力物力丧失，从而综合国力遭到削弱。而对北魏说来，则不仅是疆域扩大了，而且是人力物力的增加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后百余年北强南弱局面的形成而不可逆转。

刘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区，从军事上说，则是南北双方多年来一直争夺的重要战略要地。北魏占据这一地区后，利用当地丰富的人力和物力，以彭城（今江苏徐州）、下邳（今江苏睢宁

西北)、悬瓠(今河南汝南)、瑕丘(今山东兖州北)、历城(今山东济南)、东阳(今山东青州)等军事要地为基础，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在南北战争中占据主动的地位。而对于刘宋来说，彭城、下邳、悬瓠等地，原本是保障江南地区安全的重要屏障，刘宋失去上述地区后，在南北战争中已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此后，刘宋不仅失去了借以北伐收复河南的淮北基地，而且使自己的防线大大南移，撤至沿淮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寿阳(今安徽寿县)、义阳(今河南信阳)一线，而江淮之间已基本无险可守。在这种形势下，刘宋不但已无法北进，甚至连自己的安全也受到威胁。实际上，北魏以后常常依靠淮北地区的人力物力作为补给，长驱直进，对刘宋的沿淮防线进行攻击。在以后的南北争斗中，北魏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

总之，刘宋淮北四州及豫西地区的丢失，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对南北双方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不仅使北强南弱的局面最后形成，而且延续下来，使得整个南朝从刘宋末到陈各代，基本上忙于应付北方的南侵，完全失去了向外发展的条件，疆域逐渐缩小，国力愈来愈弱。相反，北朝各代疆域则愈来愈大，国力愈来愈强，加上其他因素，终于导致北方政权统一南方。

第二十四章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的起义战争

第一节　北魏后期政治腐败和各类社会矛盾的加剧

一、孝文帝迁都改制后拓跋贵族的门阀化

孝文帝改制中的一条，就是仿照汉族士族实行门阀制度。太和十九年（495 年），孝文帝下令制定姓族，规定在鲜卑族中，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等 4 姓为第一等，穆、陆、贺、刘、楼、于、嵇、尉等 8 姓为第二等，以下再根据其先世的地位、官品分别定为姓或族，这些属于鲜卑族的门阀士族，称为虏姓。此外又给汉族士人规定等级，汉族门阀士族称为郡姓，如“山东则为郡姓，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①。郡姓门阀依门第之高下，分为膏粱、华腴及甲、乙、丙、丁四姓：“凡三世有三公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②。姓族规定之后，孝文帝命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为选举格，名曰“方司格”③。依此，吏部必须严格按门第来选拔人才。孝文帝规定姓族制度后，北魏的“以贵承贵，以

①②③《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儒学中·柳冲传》。

贱袭贱"[①]的门阀制度便被确立下来，拓跋贵族也就在这一制度下完全门阀化了。

二、门阀政治的僵化及吏治腐败

孝文帝采用汉族的士族制度，对汉胡民族融合虽有促进作用，但胡汉各级门阀士族可以按等级享受入仕、免役、荫庇人户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这种专重门第高低的僵化制度，给北魏的政治造成了很大危害，并使拓跋贵族在极度享受的士族生活中迅速地腐化，丧失了进取精神。

北魏初期不重门第，选拔人才"唯能是寄，不必拘门"[②]，当时"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③]。所谓"唯能是寄"，实际上就是"唯才是举"，官职也没有清、浊之分。孝文帝建立门阀制度后，各级士族可以凭借姓族充任规定的官职，主观上不必再去努力进取，任职后也不用再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虽然有考课制度，但主持者多为士族高门，他们必然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这种情况严重地腐蚀了北魏的各级官吏，他们不以政事为务，仿效汉族高门去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④]；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⑤]；章武王元融亦足以与元琛"抗衡"。尚书令李崇，"亦富倾天下"[⑥]。他们广占田园，对人民进行地租剥削，以供其穷奢极欲的享乐。可以说，北魏门阀化下的胡汉高门士族在生活上的腐化，比起西晋士族来毫不逊色，其结果必然是激化阶级矛盾。

同时，北魏门阀化后"以贵承贵，以贱袭贱"，使鲜卑族中士族

---

①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传》。

②③ 《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

④⑥ 《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高阳王寺》条。

⑤ 《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法云寺》条。

与非士族之间，即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社会地位固定化，从而使身列军职的一些鲜卑平民失去了原先“不废仕宦”和“偏得复除”的权利，扩大了早已存在的鲜卑族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

门阀政治必然带来吏治的腐败。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孝文帝死后，宣武帝元恪即位，他为政“宽以摄下”，北魏吏治从此日见衰败。北魏自宣武帝世起，朝中权贵大多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宣武帝世元晖为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①。孝明帝世吏部尚书元修义则“唯专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被人称为“京师白劫”的“大贼”②。北魏后期，地方官吏唯事聚敛，纵情盘剥百姓，政治更加腐朽不堪。

三、北魏政权对人民压迫剥削的加深

北魏政权腐败的另一面，就是通过征发赋税徭役，对人民加重剥削。封建政权的一切开支，各级官吏贪赃枉法的钱财，最终必然会转嫁到人民头上。

地方官吏为搜刮百姓，在征收户调田租时，常加倍征收。如当时户调绢规定每匹宽二尺二寸、长四十尺，但官府征收时却常加大尺寸。如奚康生任相州刺史，“征民岁调，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誉”③。由于调绢的“渐渐长阔，百姓嗟怨，闻于朝野”。但由于百官俸禄常用调绢发放，“人乐长阔”，于是地方官凡能征收“绢布精阔且长”者，常“横发美誉”④。因此，地方官征调绢皆用长尺，成为风气。此外，地方官征收田租，也常用大斗，人民的租调负担无形中增加一倍乃至数倍。

---

① 《北史》卷十五《魏宗室常山王遵传附晖传》。

② 《北史》卷十九《魏宗室汝阳王天赐传附子修义传》。

③ 《魏书》卷七十六《卢同传》。

④ 以上引文见《魏书》卷七十八《张普惠传》。

北魏后期，人民的徭役负担比田租户调带来的痛苦更深。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巩固京都洛阳，夺取南朝的淮南之地便成为北魏的重要战略目标，因而不断地发动南侵战争。宣武帝即位后，战争规模日益扩大，“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治今安徽凤阳东北）、义阳（治今河南信阳），师旅相继”。这使人民的力役兵役随之加重，今河北、河南、山东一带的百姓常常“率户从戎”，或“连丁转运”①。被征入伍的百姓，也要备受所隶将领的剥削奴役，所谓“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他们“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②。农民苦于兵役，被迫到处逃亡，其中有的“或诡名托养，散在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强豪，寄命衣食”③。甚至有不少逃亡农民，“绝户而为沙门”④。

北魏政权沉重的田租户调，以及徭役负担，迫使大批农民破产逃亡，农民被迫离开土地，从而造成“通原遥畛，田芜罕耘；连村接闬，蚕饥莫食”⑤，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有这一切表明，北魏后期的各类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第二节　六镇起义

一、六镇地区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

北魏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危机四伏，但各种社会矛盾最尖锐最复杂的地方是六镇地区。

①⑤ 《魏书》卷四十七《卢玄传附昶传》。

② 以上见《魏书》卷六十九《袁翻传》。

③ 《魏书》卷七十八《孙绍传》。

④ 《魏书》卷五十三《李孝伯传附玚传》。

六镇，也称北镇，是北魏前期防御北方柔然等少数族南侵设置的六个镇戍，沿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边由西向东依次为：

沃野镇——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在黄河南岸；

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

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

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

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台基庙东北；

怀荒镇——今河北张北。

此外，怀荒以东还有御夷城（今河北赤城北），太和后期也升格为镇。因此，北方缘边实有七镇，但习惯上仍称六镇。

北魏在孝文帝迁都实行汉制以后，迁往洛阳的鲜卑族，即所谓“代迁户”迅速汉化，他们的籍贯也由孝文帝下诏改为“河南洛阳人”。其中的一部分鲜卑贵族，更成为熟悉汉族封建典章制度，与汉族高门联姻的新门阀。但六镇地区，却还保留着浓厚的鲜卑风习，这一地区的鲜卑和其他各族人，仍保留着鲜卑的语言、服饰和风俗习惯，被洛阳政权称之为“北人”。这些“北人”随着京师的南迁，以及南迁鲜卑贵族的门阀化，其社会地位迅速下降。

北魏前期，戍守六镇的士卒大多是拓跋族的氏族成员，当时，他们是统治民族的自由民，地位高于一般编户齐民。但随着朝廷强迫“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戍边①，特别是后来将各类刑徒徙至六镇充兵役，自由民出身的戍卒长期与徙民、刑徒充军者同列，其原有身份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并逐渐成为身份低于一般编户的卑贱军户②。当孝文帝迁都后，六镇拱卫国都的重要地位不复存在，更加速了戍边鲜卑自由民身份地位的下降。

北魏后期的六镇，统治者是镇将、镇将的参僚和当地的豪强，被统治者是广大六镇兵民。当时，统治者“专擅腴美”，而六镇兵

---

① 《北齐书》卷二十三《魏兰根传》。

② 参阅朱大渭《北魏末军户制的衰落》，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三辑。

民耕种的却是“瘠土荒畴”①，还要承担繁重的官私劳役和租赋。六镇兵民与镇将参僚和豪强之间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因此，六镇兵民既是六镇统治者剥削压迫的对象，又是洛阳政权歧视的鲜卑化“北人”，他们是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双重受害者。

此外，镇将、参僚、豪强虽是六镇的统治者，但他们也是洛阳政权所鄙视的“北人”，其社会地位与南迁门阀鲜卑族人的差距日益加大。南迁鲜卑大多身列门阀士族，他们却“为清流所隔”，不能享受门阀的种种特权。因而他们对洛阳政权也甚为不满，与洛阳当权者存在着尖锐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因此，北魏后期的六镇地区，既存在着六镇军户与六镇统治者之间的阶级矛盾，又存在着六镇统治者与洛阳政权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此外，居住于北边的各族人民也与洛阳政权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上述各种矛盾交织一起，错综复杂、异常尖锐，使六镇地区成为北魏后期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

二、六镇起义的爆发及对北魏统治者的打击

正光四年（523年）初，塞北出现饥荒，柔然主阿那瓌率领部民，“众号三十万”②，入塞南侵，直抵北魏旧都平城。四月二十八日，魏廷派尚书令李崇、中军将军兼尚书右仆射元篡率兵10万北讨，阿那瓌闻讯北逃，沿途抄掠人口2000，公私马牛羊等牲畜数十万北返。李崇等出塞三千里追击，不及而返。阿那瓌虽然逃回塞外，但六镇地区却遭受了一场洗劫，“遭寇之处，饥馁不粒者”③甚多。同年八月，北魏孝明帝曾下诏，令北道行台赈恤六镇遭难

① 《魏书》卷四十一《源贺传附子怀传》。

② 《北史》卷十八《魏临淮王谭附孚传》。

③ 《魏书》卷九《肃宗纪》。

的兵民。李崇的长史魏兰根曾通过李崇代奏，请求朝廷“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即军户），悉免为民”，并用“入仕次叙，一准其旧”的办法，以便提高六镇兵民的社会地位，并改变他们仕宦上“为清流所隔”[1]的境地，以消除其不满情绪。但北魏朝廷没有同意。而官府的赈恤，也未能解决六镇兵民的严重饥荒，因而终于以饥荒为直接导火索，引发了六镇大起义。

正光五年（524年）三月，沃野镇高阙戍主“率下失和”[2]，戍兵破落韩拔陵聚众杀掉戍主，改元“真王”，署官封爵，首倡起义。各镇兵民纷纷响应，义军声势浩大，一路由破落韩拔陵率领南下，进攻沃野镇；一路由义军大将卫可瓌率军东进，直逼武川镇。

沃野是六镇最西一镇，由此往东沿跋那山（今内蒙古中部阴山以西）麓，过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可攻占云中郡治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再东进可威胁旧京平城。武川镇位于怀朔、抚冥2镇之间，一旦武川被义军占领，既可东取柔玄、怀荒，西取怀朔，北取抚冥，控制整个六镇，又可以南下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为阴山南北重要通道之一），威胁盛乐。义军的战略目标很明确，首先是两支义军席卷六镇后，西路军从五原东下，东路义军从白道南下，占领盛乐，进攻旧京平城。破落韩拔陵率领的南下义军进展顺利，杀镇将慕容胜，阵斩魏统军常安成，攻占沃野镇。卫可瓌率领的东进义军，遭到敌人的顽抗。武川豪强宇文肱和其子宇文颢纠合乡里，组织起豪强武装抵抗义军。卫可瓌军先大败宇文肱于武川南河，阵斩宇文颢，但宇文肱又与豪强贺拔度拔等人协助镇将坚守武川镇。于是义军东进受阻，卫可瓌遂分兵继续围困武川，自己回师西取怀朔镇。

魏廷闻知义军起义，当即以临淮王元彧为都督北讨诸军事，率师北上镇压义军。元彧畏义军势盛，屯兵云中（治盛乐）不进。这时，怀朔镇将杨钧命军主贺拔胜突围东下，至云中向元彧告急，元

---

① 《北齐书》卷二十三《魏兰根传》。

② 《北史》卷十六《魏广阳王建传附深（渊）传》。

彧才应允继续进军。卫可瓌义军很快攻克怀朔镇城，杀怀朔豪强窦乐，杨钧先病死，贺拔度拔及其子允、岳被俘。随后义军又攻下武川，俘虏返回怀朔的贺拔胜。

元彧率主力西上进攻沃野，又遣别将李叔仁率军北攻武川。元彧军进至五原，与破落韩拔陵的东下义军相遇，两军交战，在义军的奋勇冲杀下，魏军“二将殒命，兵士挫衄”①，大败逃回。魏军李叔仁部在白道又被卫可瓌义军击败，于是北讨魏军全线失利。元彧因兵败获罪，被免掉官爵。

五月末，魏廷再以尚书令李崇为北讨大都督，率抚军将军崔暹、广阳王元渊等军进剿义军。七月，李崇与元渊率主力直趋五原，又命崔暹领军进攻武川。不久，卫可瓌率军与崔暹魏军在白道大战，魏军大败，全军覆没，崔暹“单骑潜逃”②。此后，破落韩拔陵与卫可瓌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李崇。李崇抵挡不住，退回云中，据盛乐城固守。这时，元渊以魏军屡遭大败，士气低落，再次请求魏廷改镇为州，免府户为编民，朝廷仍“不纳其策”③。

八月，在义军如火如荼的声势下，六镇东、西两部敕勒响应起义军，归附破落韩拔陵。拔陵以西部敕勒酋长斛律金、斛律野谷禄为别帅、封王。六镇地区敕勒皆反，拥护义军，义军完全控制了六镇地区。在此形势下，魏廷被迫“改镇为州”，“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④。

十月，李崇、元渊返回平城。元渊上表李崇长使祖莹“诈增功级，盗没军资”。⑤魏廷免去李崇官爵，征还京师，魏廷改以元渊总统全军。至此，魏廷在镇压六镇起义中，已三易主帅，六镇起义处于全盛时期。

---

①⑤ 《魏书》卷六十六《李崇传》。

② 《魏书》卷八十九《崔暹传》。

③ 《北史》卷十六《魏广阳王建传附深（渊）传》。

④ 《魏书》卷九《肃宗纪》。

三、六镇起义被北魏和柔然联合镇压

当义军顺利发展之际，在义军占领区发生了豪强势力的叛乱，以被俘的武川豪强贺拔度拔为首的六镇豪强袭杀卫可瓌，占领怀朔镇。贺拔度拔叛乱后，立即派其子贺拔胜往云中告捷。但魏军还未及出兵援助，义军便于孝昌元年(525年)三月将怀朔镇收复，并斩杀叛首贺拔度拔，其余豪强逃往平城投奔元渊。

魏廷见官军屡次进剿无功，深感单凭官军力量已无法消灭义军，乃于孝昌元年三月，遣使携带礼物慰劳乘义军南下再次入塞抄掠的柔然主阿那瓌，请他助剿义军。阿那瓌当即受命，率骑兵10万，从武川西向沃野，向义军发动进攻。屡次击败义军，俘杀义军将领破落汗听明等。当卫可瓌被杀后，拔陵本已孤军奋战，现又处于南北两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元渊见柔然军击败义军，乘机率军从平城北上，与柔然两路夹击武川、怀朔、沃野等地义军。六月，元渊兵至五原，遭到义军围攻，被迫突围北上怀朔，向柔然军靠扰。随后，元渊在怀朔击败义军别帅斛律野谷禄。这时，长流参军于谨建议元渊招降义军部众，元渊从其计。于谨单身入义军营中，说服了西部敕勒酋长乜列河率3万户降魏。于谨又献计以乜列河为饵，引诱破落韩拔陵来追，然后设伏消灭义军。元渊依计行事，破落韩拔陵果然中计，义军大败。

由于柔然主阿那瓌与元渊的两面夹击，义军连遭失利以及西部敕勒的投魏，战局迅速向不利于义军方向逆转。这时，柔然乘势翻越跋那山南下，兵逼五原，破落韩拔陵整军迎战，再次大败，大将破落韩孔雀战死，义军被迫南渡黄河。李叔仁魏军受到义军的威胁，请求元渊援助，元渊率兵赴援。结果义军处于阿那瓌、李叔仁、元渊三面包围之中，终于在五原被敌人击溃，破落韩拔陵下落不明，义军被迫降魏者20余万。

至此，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六镇起义，在北魏重兵和柔然骑兵的夹击下失败了。降魏的20余万义军，被强行迁徙至“饥馑积

年，户口逃散”① 的河北诸州去“就食”。降户到达河北后，根本无以为生，官府又不给赈济，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

第三节 关陇起义

一、关陇地区各族人民的联合起义

正光五年（524年），破落韩拔陵在沃野起义不久，高平（今宁夏固原）镇民赫连恩等于四月聚众起义，推举胡人酋长胡琛为首领。胡琛自称高平王，举兵攻打高平镇，响应破落韩拔陵。六月，秦州治所上邽（今甘肃天水）城民薛珍、刘庆、杜超等人因刺史李彦刑政酷虐，起兵反抗，共推羌人莫折太提为首领。莫折太提自称秦王，杀李彦，派秦州胡人卜朝率兵北上，攻打高平镇。卜朝占领高平后，杀镇将赫连略、行台高元荣。不久，莫折太提病卒，众人推其子念生继任秦王。念生改称天子，改元“天建”，设置百官。以高平镇民与秦州城民为核心的关陇起义，从此拉开了序幕。魏廷在莫折太提起义之初，即急诏雍州刺史元志为西征都督进剿，后见关陇义军发展迅速，又派吏部尚书元修义为西道行台，统率西讨诸军进剿义军。

莫折念生派其弟莫折天生率军东下，遂与元志相峙于陇口（陇山山口）。八月，莫折天生大败魏军，元志弃军逃回岐州（治雍城镇，今陕西凤翔）。天生义军随即出陇口东下，进逼岐州。九月，魏廷因西道行台元修义“每饮连日……虽至长安，竟无部分之益”②，改派尚书左仆射萧宝夤为西道行台、大都督，率征西将军都督崔延伯等西讨。十一月，雍城镇城民开城响应义军，莫折天生占领岐州，生俘元志及岐州刺史裴芬之。天生挥师继续东进，

---

① 《魏书》卷十五《常山王元遵传附晖传》。

② 《魏书》卷十九上《汝阴王天赐传附子修义传》。

进驻黑水（今陕西兴平西），兵锋直逼雍州治所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与此同时，莫折念生又派义军将领卜朝、王庆云等率偏师从北道进攻泾州（治安定，今甘肃泾川）。卜朝等军于平凉（治鹑阴，今甘肃华亭西）大败魏光禄大夫、西道别将薛岳等军。于是两路义军进展顺利，声势浩大，魏雍、泾二州告急，关中震动。

在秦州城民起义之前，魏南秦州（今甘肃西和西）境内的氐民也举起了反魏的起义大旗。当时南秦州刺史崔游用计诱杀氐族豪酋杨松柏兄弟，引起境内氐民皆反。在秦州城民起义时，南秦州城民韩祖香、张长命等人俘杀正要逃跑的崔游，据骆谷城响应莫折太提。此后，秦州义军与骆谷城的氐民起义军取得联系，相互呼应。直至十二月，南秦州义军在北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

正光五年（524 年）七月，凉州（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城民鲜卑人万于菩提、匈奴人呼延雄等拘执刺史宋颖，据姑臧城起义，响应秦州义军。不久，宋颖暗中派人与吐谷浑主伏连筹勾结，引吐谷浑兵攻打姑臧义军。万于菩提被杀，起义失败、姑臧又为魏廷控制。

高平镇民起义后，豳州（治安定，今甘肃宁县）西北地郡（治彭阳，今甘肃庆阳西南）人车金雀等聚集胡、羌百姓起兵反魏，并遣使与高平义军联络以互相响应。

从正光五年四月到七月的短短 4 个月间，关陇地区羌、氐、鲜卑、匈奴、汉人和其他少数族人民相继起义，他们互相声援，加强联络，绘成了一幅各族人民联合起义的壮丽画面。

二、起义军的长期奋战

到正光五年（524 年）十一月，秦州义军以上邽为根据地，北据高平，南连南秦州骆谷，东取岐州，兵锋从黑水直指长安，形势非常有利。但就在十一月底，高平镇民袭杀卜朝，迎高平另一支义军首领胡琛入城，使莫折念生失去了北方军事重镇。

十二月，魏廷又以京兆王元继为太师、大将军、都督西道诸军事，坐镇长安，节度各路政府军进剿义军。同时，魏廷还以东益州（治武兴，今陕西略阳）刺史魏子建为西南道行台，并令统军李苗等率军出斜谷（古道路名，在今陕西眉县西南），声援东益州。不久，魏子建将占据骆谷城的南秦州义军镇压下去，使秦州义军失去了南面的声援。

孝昌元年（525 年）正月，秦州义军莫折天生部与魏大都督萧宝夤、都督崔延伯在黑水以西展开大决战。当时义军有战士 10 多万人，官军不过 5 万余人，义军显然处于优势。但天生恃众轻敌，战前未作认真准备。而北魏久经战阵的名将崔延伯先以少数兵力探得义军虚实后，竭尽全力向义军前锋发动猛攻。义军前锋失利，致使全军溃散，阵亡和被俘者达数万人。天生率军西撤，退回陇西。魏廷岐州及陇东地区，得而复失。黑水之战是秦州义军由盛转衰的关键性战役，从此，秦州起义转入低潮。

秦州义军在北失高平，东进大受挫折，以及南面失去援军的困难局面下，内部出现了变乱。天水（今属甘肃）氐族豪酋吕伯度兄弟本来参加了秦州义军，但不久招集氐民，组织豪强武装，脱离莫折念生义军，据守显亲（今甘肃秦安西北）。吕伯度兄弟后被念生义军打败，投降高平义军胡琛，得其资助后再次据显亲，攻击念生所部义军。念生屡次反击不能胜。吕伯度在挑起秦州、高平两支义军互相仇杀后，转而投靠魏廷，与官军勾结共同攻打义军。在这种日益艰难的困境下，莫折念生于孝昌元年（525 年）九月被迫诈降萧宝夤。宝夤遂派兵进入秦州。

当秦州义军处于低潮时，高平义军迅速壮大起来。正光五年（524 年）十月，胡琛为援助豳州义军车金雀等人，派大将宿勤明达、叱干麒麟等率军东进，攻打魏豳（州治安定，今甘肃宁县）、夏（州治统万，今陕西靖边东北）、北华（州治杏城，今陕西黄陵南）3 州，当地人民热烈响应。宿勤明达等人进军，围攻西北地郡（郡治彭阳）和豳州治所安定。魏廷急忙任命毕祖晖为豳州刺史，祖晖“且战且前”，突破义军包围入据安定。魏廷又以北海王元颢

为都督华、豳、东秦（即北华）诸军事，兼西道行台，进剿明达义军，才使州城之围得解。

高平义军宿勤明达部东进时，早被山胡起义包围的魏夏州统万城粮尽援绝，危在旦夕。夏州刺史源子雍遂留其子源延伯守城，自己突围往他城借粮。源子雍东行数日，被山胡曹阿各拔俘虏。源子雍引诱曹阿各拔死后继领其众的曹桑生投降魏军，源子雍遂投入西道行台元颢麾下。元颢任命源子雍为先锋，令他北上进攻义军。源子雍拼力死战，90天中经数十战，将义军占领的地区全部夺回。高平义军被迫西撤，第一次东征遂无功而返。

同年十一月，高平镇民袭杀秦州义军大将卜朝，迎胡琛入据高平镇城。孝昌元年（525年）四月，胡琛再命大将万俟丑奴、宿勤明达东进泾州。义军沿途击败魏军卢祖迁等部，进逼安定（泾州州治，今甘肃泾川北）。这时，刚刚击败秦州义军的萧宝夤、崔延伯等赶至安定与卢祖迁等军会合，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匹，军势甚盛”①。高平义军与北魏政府军，将在泾州展开大决战。

万俟丑奴屯军于泾州西北70里处的当原城，派轻骑不断出击诱敌，准备吸引魏军主力加以歼灭。魏将崔延伯大胜秦州义军后，骄傲轻敌，遂“唱议先驱。伐木别造大排，内为锞柱……号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自泾州缘原北上”②。这时万俟丑奴派义军数百骑持诈降书去见崔延伯，请求他暂缓进攻，意在迷惑崔延伯，以便攻其不备。萧宝夤、崔延伯信以为真，迟疑不进。义军见敌中计后，突然发起进攻，宿勤明达军从东北进攻，诈降的义军从西而下，两路夹攻敌军。义军以轻骑突入排城，魏军大败，死伤近2万人。崔延伯军败后，退保安定，并修整军械，招募武勇，随后进抵距义军7里的彭抗谷下寨，准备与义军再战。四月十八日，崔延伯“耻前挫辱，不报宝夤，独出袭贼”③。义军初战不利，但魏军刚获小胜，将士到处剽掠，陈列散乱，义军乘机回师猛击，大败魏军，阵斩魏名将崔延伯，歼灭魏军万余人。高平

①②③《魏书》卷七十三《崔延伯传》。

义军在泾州两次胜利后，大大鼓舞了士气，而魏廷“朝野叹惧”①，上下一片慌乱。高平义军的这次胜利，成为关陇义军由低潮再向高潮的转折点。

孝昌二年（526年）九月，秦州莫折念生再次举起义旗，将拘执监视自己的魏行台左丞崔士和北送高平。念生与胡琛之间开始加强联系，从前期相互抵牾、残杀，转而结成同盟，互相配合。至此，关陇地区形成了以高平义军为主体的义军联合体，关陇起义进入联合发展的新阶段。不久胡琛去世，万俟丑奴总领关陇义军。

孝昌三年（527年）正月，义军于安定再次大败萧宝夤、元恒芝等官军。这次安定之战是一场成功的歼灭战，魏廷进剿关陇义军的10余万军队损失殆尽。战后，魏大陇（陇山北段）都督元仲冏、小陇（陇山南段）都督高聿又先后败逃，陇东一线复被高平义军占领。魏大都督萧宝夤退回长安，集得残兵万余人，屯于逍遥园内。魏廷以战败罪，免萧宝夤官爵为庶民，改以雍州刺史、弘农大族杨椿为西道行台，节度关中诸军。杨椿“鸠募内外，得七千余人”②，派兄子杨侃统率加强防御。

义军取得安定大捷后乘势东下，魏汧城（今陕西陇县）守将潘义渊献城投降，雍城城民拘执岐州刺史魏兰根，迎义军入城。义军连克汧、雍2城，军威大振，兵锋直逼雍州（治长安）。

与此同时，义军别路宿勤明达率大将叱干麒麟等从泾州北部南下，向豳、北华2州挺进，魏豳州刺史毕祖晖、行台羊深等纷纷弃城逃窜，北华州城民起义响应义军，宿勤明达军全据豳、北华2州。接着，明达派其侄宿勤乌过仁进占北地（今陕西耀县西南），又派其子宿勤阿非率军围攻华州（今陕西华县）。这时，粮援俱绝的魏夏州刺史源子雍弃统万城南逃。义军遂全据夏州。至此，东进和南下的两支义军，占领了雍州之外的全部关中地区。孝昌三年（527年）二月，高平义军又一举攻克军事重镇潼关，关陇

---

① 《魏书》卷七十三《崔延伯传》。

② 《魏书》卷五十八《杨播传附弟椿传》。

起义达到极盛期①。

潼关失守，魏京师洛阳失去屏障，朝廷震动，宣布“中外戒严”②。这时，关中豪强纷纷活动，组织军队袭击义军。官军也乘机反攻，义军战势不利，被迫放弃潼关，以后雍、华 2 州又被魏军全部夺去。

孝昌三年（527 年）九月，义军发生内乱。秦州义军将领杜粲袭杀莫折念生，自行州事，投降再次被魏廷起用为西讨大都督的萧宝夤。杜粲的叛乱，对秦州义军是致命的打击。上邽、骆谷城和岐、豳等州，皆被魏军占领。

孝昌三年十月，魏大都督萧宝夤以高平义军仍强盛，魏军屡战失利，而自己又深受朝廷猜忌，遂举兵反魏，自称“齐帝”，改元“隆绪”，设置百官。于是关中诸路魏军将领，或附宝夤反魏，或助魏廷进讨宝夤，魏军之间展开内哄。到武泰元年（528 年）正月，宝夤大败，转投高平义军，万俟丑奴授予太傅之职。至此，关陇的魏军经义军打击，以及内部的争斗，其主力已全部消灭。于是尔朱荣派往关中的代北武川豪强酋帅武装集团，成为关陇义军的主要敌人。

三、关陇起义的失败及其原因

在魏末人民大起义中，以契胡酋长尔朱荣为首的豪强酋帅势力逐渐形成并壮大起来。

尔朱部落是契胡的一支，它的先世居于雁北的尔朱川。尔朱荣的祖先因随北魏太武帝平定中原有功，得以保留部落，并割给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境内）300 里以为世业，尔朱氏世袭领民酋长。正光五年（524 年），六镇起义爆发，尔朱荣招合义勇，组成一支

---

① 参阅朱大渭《关陇起义第二次泾州大战及攻克潼关考》，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 年第 1 期。

② 《魏书》卷九《肃宗纪》。

豪强武装。由于他对小股起义军的镇压，以及被义军击溃的魏豪强官吏的归附，其势力渐盛。武泰元年（528年），北魏胡太后鸩杀孝明帝，改立年仅3岁的宗室元钊为帝，自己专制朝政。尔朱荣乘势率契胡骑兵南下，入洛阳沉杀胡太后及幼帝，改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孝庄帝），并大集百官于河阴，纵兵屠杀洛阳汉化鲜卑贵族和汉族士人2000余人。从此，以尔朱荣为首的地方豪帅实力派，控制了北魏政权。

尔朱氏执政，使北魏末年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后义军的对手，也由腐败无能的胡、汉门阀贵族，改变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作战能力的地方酋帅豪强。尔朱荣控制了洛阳政权后，开始准备并积极镇压各路义军。

建义元年（528年）七月，万俟丑奴于泾州称帝，设置百官，建元“神兽”。次年九月，万俟丑奴义军南下，杀东秦州刺史高子朗，攻占汧城。

永安三年（530年），尔朱荣在扑灭了河北义军后，开始专力对付关陇义军。二月，尔朱荣任命从子尔朱天光为使持节、都督2雍2岐诸军事，率左大都督贺拔岳、右大都督侯莫陈悦入关镇压关陇义军。三月，万俟丑奴率大军围攻岐州，派大将尉迟菩萨、万俟仵率2万义军自武功（治美阳，今陕西周至西北）南渡渭水，进攻魏军营寨，贺拔岳率军赴援。两军接战，菩萨中贺拔岳诱兵之计大败，菩萨被俘，义军被俘者万余人。万俟丑奴闻菩萨兵败，撤围还保安定，驻军于平亭（在安定北）。尔朱天光自雍州至岐州，与贺拔岳合军北上，追击丑奴。

四月，尔朱天光与贺拔岳合兵进至汧、渭间（今陕西宝鸡以东一带），停军牧马，扬言“今气候渐热，非征讨之时，待秋凉更图进取”①，用以麻痹义军。万俟丑奴信以为真，散军务农，令太尉侯伏侯元进领兵5000，依险立大栅，又于附近立小栅多处，每栅千人，且耕且守。尔朱天光见丑奴中计，遂乘义军兵力分散之

---

① 《周书》卷十四《贺拔胜附弟岳传》。

机，夜袭义军，经过激战，官军攻破大栅，天光将“诸所俘囚，并皆放散”，“须臾之间，左右诸栅悉来归款”①。尔朱天光乘胜进兵安定，义军泾州刺史侯几长贵献城投降，万俟丑奴被迫西向高平。天光命贺拔岳率轻骑追击，至平凉（今甘肃华亭西）长平坑，两军接战，义军仓促应战，行阵未成，贺拔岳率军突击，义军大败，万俟丑奴被魏将侯莫陈崇活捉，余众溃散。

尔朱天光自率大军西攻高平。土豪李贤与义军将领万俟阿宝投靠官军，伪称丑奴战胜，赚高平守将万俟道落东出，这时天光大军逼近高平，城民捉萧宝夤投降天光。于是义军大本营高平陷落。五月，万俟丑奴在洛阳壮烈牺牲。以后高平和秦州义军余部，虽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因寡不敌众，最后被贺拔岳等军镇压下去。

关陇起义的失败，有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说，关陇起义军面临的敌人力量强大，其中既有北魏军，又有关陇地区的士族豪强，还有以契胡酋帅尔朱荣为首的新兴地方豪强酋帅势力。尤其是第三种势力，他们骑射熟练，战斗经验丰富，各酋帅大都拥有组织严密的部落兵，有很强的战斗力，是镇压各地义军的主力。这支骑兵部队行动迅速，冲击力强。主帅贺拔岳等善于指挥，用计麻痹和分散义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从义军主观上说，由于当时北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因而义军领导成员中混入不少各族上层人物，他们在关键时刻，常常动摇变节，或投降朝廷，或杀害义军将领，或挑起义军内部的争斗，使起义遭受严重挫折。同时，起义农民是小生产者，思想意识比较狭隘，在斗争中缺乏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当秦陇起义第二次高潮时，朝廷西征军全被歼灭，因而义军主要将领产生麻痹轻敌思想，以致中敌奸计，从而在最关键性作战中失败，最后导致整个秦陇义军的覆灭。

---

① 《魏书》卷七十五《尔朱天光传》。

第四节　河北起义

一、“六镇降户”的悲惨处境

六镇起义失败后，起义群众有20余万被迫降魏。当时广阳王元渊曾建议在恒州（治平城，今山西大同）以北“别立郡县，安置降户，随宜赈赉，息其乱心”①。但魏廷不采纳这个建议，强行将六镇降户迁徙至河北一带“就食”。

当时的河北地区，“饥馑积年，户口逃散”②，数十万兵众一下涌到河北地区，根本无食可就。六镇降户留恋故土，本来不愿迁徙，当他们一路上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河北地区时，却又无以为食，处于饥寒交迫的悲惨境地。北魏政权对六镇降户的死活毫不关心，不给任何赈济，饥民忍无可忍，终于再次举起反魏大旗，掀起了河北大起义的高潮。

二、杜洛周、鲜于修礼的相继起义

孝昌元年（525年）八月，柔玄镇兵杜洛周首先在燕州上谷（郡治今北京延庆）率领降户起义。杜洛周起义后，沿用破落韩拔陵的年号“真王”，出兵四处攻占郡县，并进围燕州治所广宁（今河北涿鹿）。

杜洛周起义，使北魏朝廷震动。九月，孝明帝以幽州刺史常景为行台，命其与幽州都督元谭等于卢龙塞（今河北宽城南喜峰口一带）至军都关（今北京昌平北）一线布防，以防止杜洛周军南下。但义军并未急于南下，而是自燕州西上入恒州，似将进取

---

① 《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建传附深（渊）传》。

② 《魏书》卷十五《常山王元遵传附晖传》。

北魏旧京，即恒州州治平城。当时北魏在恒州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义军进入恒州后，六镇流民纷纷来归，怀朔等地豪强高欢、段荣、尉景等也都归附了义军。杜洛周屯军恒州，招集降户流民，扩大队伍。当其势力渐盛后，并没有攻打平城，而是等待时机，准备南下进攻幽（治蓟城，今北京）、瀛（治赵都军城，今河北河间）2 州。

孝昌二年（526 年）正月，安州（治广阳，今河北隆化）的石离、穴城、斛盐（今河北滦平南）三戍士兵 2 万余人举行起义，响应杜洛周。随后，安州义军 2 万余人西进，准备与洛周义军会合。魏幽州都督元谭派部下崔仲哲屯兵军都关阻拦。义军猛攻军都关，阵斩崔仲哲，洛周军又从外夹攻，大获全胜，两股义军胜利会师，并打开了自上谷南下幽州的通道。

杜洛周见南道已通，遂挥师出军都关南下。魏廷慌乱，急以李琚为幽州都督，代领元谭余部抵御义军。四月末，杜洛周与魏军在蓟城之北展开激战，阵斩幽州都督李琚，并进围蓟城。行台常景在汉族大族阳休之等人协助下，固守待援。义军一时攻城不下，主动撤回上谷后，集中兵力攻打已围数月之久的广宁（燕州治所）。五月，魏燕州刺史崔秉裹胁百姓，南逃中山（定州治所，今河北定州）。义军攻占广宁，据有燕州全境。此时，洛周再次挥师南下，一举攻克蓟城，魏行台常景被迫将幽州治所移至范阳（今河北涿州）。洛周占据蓟城后，命都督曹纥真等人至蓟南征集军粮，在回军路上遭常景都督于荣伏击，曹纥真阵亡。洛周闻知大怒，亲率大军南下，直逼范阳。常景起用汉族大族卢文伟，协力固守范阳。十月，义军与常景军在范阳城西交战失利，大将贺拔文兴等阵亡。但洛周坚持不退，继续围攻范阳。十一月，范阳城民捉行台常景、刺史王延年和行台郎中卢文伟等，开城归顺杜洛周义军。义军遂克范阳，全据幽、燕二州，军威大振，兵锋指向定、瀛 2 州。

杜洛周起义不久，定州（治中山，今河北定州）又爆发了鲜于修礼领导的六镇降户起义。孝昌二年（526 年）正月，六镇降户

鲜于修礼在定州左人城（今河北唐县西）聚众起义，定州各地内迁的降户和流民纷纷响应，义军迅速壮大。中山太守赵叔隆等率州军镇压义军，被义军击败后逃回，义军兵逼州城中山。

河北定州为北魏腹心地带，当鲜于修礼起义后，魏廷十分恐慌，先以元渊任定州刺史，后又改以元固为定州刺史，并派杨津率军援救中山。不久，魏廷又以左光禄大夫长孙稚为大都督北讨诸军事，与河间王元琛率大军北上进剿义军。孝昌二年(526年)四月，魏政府军进至滹沱河，鲜于修礼先发制人，主动率义军迎击，两军大战于滹沱河北。魏元琛军畏怯不敢战，长孙稚孤军被义军大败，元琛军一同溃散。长孙稚、元琛以战败罪，被免去官爵。

孝昌二年五月，魏廷改以元渊为北讨大都督，统率左都督元融、右都督裴衍北上。元渊见魏军屡战屡败，已毫无斗志，故意拖延时日，每日仅行军10余里，进至交津（漳水与衡水汇合处，今河北献县境内）后隔水布阵。

鲜于修礼派大将毛普贤、葛荣统率督将程杀鬼等人，迎击官军。八月，义军至交津与魏军隔水对峙。这时，元渊引诱曾任自己部下的毛普贤降魏，普贤有降意。葛荣先受鲜于修礼信任，后因修礼重用普贤，他便心怀忌恨，当其得知普贤欲降魏后，借此将普贤杀死。后来，葛荣回师中山，又将鲜于修礼杀掉，自任义军统帅。

九月，元渊乘葛荣回师中山，率军渡交津北上，尾追义军至白牛逻（在今河北蠡县）。葛荣夺得义军领导权后，立即回师东下，在官军长途行军疲惫之时，以轻骑袭击左都督元融军。义军与官军经过终日激战，义军大败魏军，阵斩元融。元渊率残兵退至定州，守将杨津闭门不纳，元渊逃至博陵郡（治今河北安平）界，被义军抓住杀掉。葛荣在白牛逻大捷消灭官军主力后，自称天子，建国号为“齐”，改元“广安”。

葛荣乘胜发展势力，先招降魏定州（治中山）守将杨津未果，攻中山又不克，遂挥师南下。孝昌三年（527年）正月，葛荣率义军攻占殷州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南），杀魏殷州刺史崔楷。随后，葛荣从广阿东下，进围冀州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州）。冀州刺史元

孚大量起用州内豪强协力固守，抵抗义军。三月，魏廷以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雍为北讨大都督，率军救援信都。七月，又命相州刺史元鉴与北道都督裴衍共援信都。元鉴见北魏政治昏乱，而义军势力转盛，据邺城（相州州治，今河北临漳西南）投降义军。魏大都督源子雍随即击败元鉴军，收复邺城。

这时，葛荣所遣偏师攻克清河郡（治今山东临清东），清河太守杜纂投降义军，杜纂至信都，建议以水灌城，葛荣从其计，截滏阳河水灌信都。十二月，义军攻克信都，生俘元孚及其僚佐500余人。葛荣攻下河北军事重镇信都后，率主力向南挺进，不久于阳平郡（治今河北馆陶）北漳水曲大败北进的魏军，阵斩其主将北讨大都督源子雍、相州刺史裴衍，魏全军溃散。此战是葛荣义军继白牛逻之战后再次大量消灭魏主力军的重要战役，于时北魏“朝野人情，莫不骇惋”①。

葛荣攻克殷、冀2州后，使定、瀛2州隔绝于北境，为杜洛周义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形势。洛周军久围中山不克，武泰元年（528年）正月，定州魏军在长期围困下，长史李裔见殷、冀等州为葛荣义军占领，孤城远隔，便向义军投降。先后为两支义军围困的中山终于被义军占领，守将杨津被义军俘虏。杜洛周义军攻克定州州治中山，对于义军形势有着重大的影响。定、冀、殷三州被义军占领后，瀛州（治今河北河间）悬隔北境，不久，瀛州刺史被迫向杜洛周投降。杜洛周占领定、瀛二州后，声威大振。河北义军的两大部，杜洛周和葛荣义军所控制的区域连成一片，起义形势很好。二月，葛荣率军北上，吞并杜洛周，两支义军合为一支。

三、葛荣的胜利进军及其失败

葛荣吞并杜洛周后，气势更盛。武泰元年（528年）三月，葛

---

①《魏书》卷七十一《裴叔业传附衍传》。

荣攻克沧州（治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活捉刺史薛庆之。随后，魏东冀州刺史高翼慑于义军声威，献州归顺义军。葛荣攻占河北诸州后，迅速挥师南下，直逼北魏京师洛阳，这时河北义军达到极盛时期，北魏政权危在旦夕。

当时北魏洛阳政权的执政者，已由腐败无能的胡、汉门阀贵族，换成了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地方酋帅豪强实力派，其首领是尔朱荣。尔朱荣等人正在跃跃欲试，准备一举扑灭起义军。武泰元年六月，魏廷下诏北伐，以尔朱荣为左军、杨椿为右军、元天穆为前军、穆绍为后军。

葛荣退军于相州之北。尔朱荣使怀朔豪强高欢诱邺城西北的义军归降，于是葛荣部下将领 7 人、将士万余人投降尔朱荣。八月，葛荣军号称百万，围邺城，前锋南进已过汲郡（今河南新乡东北）。魏庄帝诏令元天穆进讨义军，于是元天穆屯兵朝歌（今河南淇县）之南，有众 8 万人。尔朱荣留从子尔朱天光镇守大本营晋阳（今山西太原南），自率精骑 7 万，东出滏口（在今河北邯郸西南处），从西面进逼义军。

义军虽号称百万，但家属相随，实际兵力不过二三十万。魏军方面，有元天穆的 8 万之众，又有尔朱荣的 7 万精骑，双方的实际作战能力悬殊并不是很大。但葛荣认为自己连战皆胜，此次以众击寡，也必胜无疑，听说尔朱荣大兵将至，面有喜色，令战士各备绳索准备缚取俘虏，显然他低估了对方的战斗力。由于葛荣战略上的矜骄轻敌，使他在战术上也犯了分散兵力的致命错误。他在魏军逼近之前，便命义军拉开架式，“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①。而善于用兵的尔朱荣，利用葛荣战略上轻敌，战术上分散兵力的弱点，作了周密的部署。他将军队伏于山谷之中，分督将以上三人领数百骑兵为一处，命他们扬尘呐喊，使义军不知己方虚实。又命将士每人备木棒一根，置于马侧，交战时不许费时去割首级，只以木棒击之，以便快速消灭义军有生力量。再分

---

① 《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

派武勇在前驰骋冲突。尔朱荣自己亲率精骑，从后面夹击义军。

两军交战，义军腹背受敌，兵力分散，终致大败，葛荣被俘，数十万众也皆被敌军俘虏。尔朱荣将葛荣送至洛阳杀掉，义军所占有的冀、定、沧、瀛、殷等州，尽皆被北魏收复。

滏口之战，是河北义军与尔朱荣势力之间有关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而此战以义军失败告终，也就决定了这次作战成为河北义军由胜利到失败的转折点。

葛荣战败后，义军别部韩娄、郝长等数万将士，犹据守幽州治所蓟城，尚能控制幽州一带。尔朱荣以贺拔胜为大都督镇守中山，堵住义军南下之路。永安二年（529 年）正月，尔朱荣以杜洛周降将侯渊为大都督，命他率兵进剿韩娄义军。九月，韩娄中侯渊诡计，城陷被俘。至此，河北起义在以尔朱荣为代表的地方豪强酋帅实力派的镇压下彻底失败了。

第五节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历史影响

从正光五年（524 年）六镇起义到普泰元年（531 年）关陇起义被最后镇压，魏末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整整持续了 8 年之久。在这期间，六镇、关陇、河北 3 大起义军先后攻占过沃野等 9 镇，以及幽、燕等 23 州，起义烈火燃及整个北部中国，起义群众达数百万。义军以顽强的战斗精神痛歼了北魏官军的主力，沉重打击了北魏的腐朽统治，起义过后北魏王朝已名存实亡。

魏末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首先，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胡、汉高门氏族，促使魏晋以来所形成的士族制度进一步衰落。这一方面表现在魏末人民大起义直接给予皇室和高门士族势力的冲击，消灭了由他们控制的北魏官军主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北魏最高统治集团在各族人民起义中元气大伤，使得新兴地方豪强酋帅实力派借机登上政治舞台

后，对门阀士族的再次打击。而且受魏末各族人民的大起义洗礼的六镇地区高欢、宇文泰两个新兴庶族地主集团最后登上政治舞台，分别建立东魏与西魏政权，取代了腐朽的北魏王朝。

其次，魏末各族人民的起义，促进了社会的变革。继北魏而起的东、西魏乃至后来北齐、北周的统治者，不少人亲身参加过六镇和河北起义，感受到了人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况且，他们正是在各族人民起义所造成的有利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建立政权的。因而他们重视吏治，锐意改革。其中东魏北齐的改革不彻底，加上一些不利的历史条件，其成效较差。但西魏北周的统治者却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加之其政权完全摆脱了北魏旧政权的影响，关中士族地主势力较之东魏北齐境内也要弱的有利条件，因而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西魏北周的改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各个方面，从而使西魏北周政权政治稳定、吏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不断的发展，军事实力日益强大，最终消灭了北齐，统一了北方。而西魏北周成功的改革，正是魏末人民大起义所直接带来的成果。

再次，魏末各族人民的大起义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两晋十六国以来，各民族间的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最后完成，却是在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推动下实现的。六镇起义，主要参加者是代北鲜卑和鲜卑化的各族人民。起义失败后，六镇各族人民被迁徙至河北地区，六镇降户发动起义后，最盛时号称百万，其中大多数是河北地区的汉族人民，六镇鲜卑及鲜卑化的各族人民，与河北地区的汉族人民共同战斗达 4 年之久。六镇和河北起义军的领袖人物，有匈奴人、鲜卑人、乌丸人、汉人。关陇起义军的首领中，也包含有羌、氐、高车、鲜卑、匈奴、汉等多种民族。关陇义军曾发展到数十万人，坚持斗争达 8 年之久。各族人民在六镇、河北和关陇起义中，结成战斗的联盟，在长期对敌斗争中，休戚相关，生死与共，其共同的利益无疑极大地加强了融合和了解，消除了民族隔阂。经过魏末人民大起义后，无论西北或华北地区，民族融合都基本完成了。

在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后建立起的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政权中，执政的重要人物的族属范围，比北魏时显著扩大了。如东魏政权以鲜卑高氏为首，但此外几乎各族的统治者都参加到最高统治集团中来。西魏北周也是如此。此外，北齐、北周政权已不象北魏那样以一个民族为主，而且各族人民在生活习俗及文化上还保持着相对独立性的状况，而是一个各民族的联合政权。在这个联合政权中，各族生活习俗及文化正趋向一致，民族差异也基本消失。在参与新政权的各族人物中，只能从他们的姓氏上去分别他们的族属，这也是民族融合完成后在政权最高层人事上的反映①。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促进北方民族融合的基本完成，从而使北周统一北方后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局面，这对隋唐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参阅朱大渭《代北豪强酋帅崛起述论》，载《文史》总三十一辑。

第二十五章　高欢消灭尔朱氏势力的广阿、韩陵两大战役

第一节　尔朱荣掌握朝政后的北魏政治形势

契胡酋长尔朱荣在镇压魏末人民大起义的过程中，作为地方豪强酋帅势力的代表人物，控制了北魏朝政。

尔朱部落是契胡部落的一支，在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境内）地区被允许保留部落，并世袭领民酋长。尔朱荣的父亲尔朱新兴忠于北魏朝廷，被提升为散骑常侍、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孝明帝时（516～528 年），尔朱新兴经过魏廷同意，将爵位传于尔朱荣。尔朱荣本人与北魏朝廷的关系，也很不一般，他是魏宗室南安王元桢的女婿，他的女儿则是孝明帝的嫔妃。在他取得朝廷大权之前，曾历任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等高官，由于尔朱荣有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又有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实力，还有方圆三百里的秀容川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所以北魏末年逐渐崛起的代北豪强酋帅集团，便把尔朱荣视作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理想人选。尔朱荣正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契胡骑兵势力，以及代北豪强酋帅集团的投靠，扑灭了魏末人民大起义，取得了专制北魏朝政的地位与权力。

尔朱荣虽然成为地方豪强酋帅集团的代表人物，但他本人的家世和社会地位，却决定他不能对北魏末年的腐败政治有所革新。从本质上说，尔朱氏属于门阀士族集团。西晋以来，士族门阀政治经济特权，主要表现在可以任品级较高的清官要职，荫庇人户和免除赋役两方面。而这两种特权，尔朱氏都具备。从尔朱荣高

祖羽健拜散骑常侍起，历代都曾任过二品、三品的清官，而尔朱荣更是官至从一品（仪同三司）。其祖父代勤时，魏太武帝曾“给复百年”①，即免除其统治下百姓的百年赋税和徭役，使其供尔朱氏剥削和奴役。又孝文帝定姓族时，曾规定：“原出朔土，旧为部落大人，而自皇始以来，有三世官在给事（从第三品上）已上，及州刺史、镇大将，及品登王公者为姓”②。从以上情况看，无疑尔朱氏属于门阀士族集团。但尔朱荣属于少数族地方实力派，没有受到汉族高门文化的影响。

因而尔朱荣专魏政以后，对于魏末的种种政治弊端，不仅因循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尔朱荣身居晋阳（今山西太原南）遥控朝政，人有“侥幸求官，皆诣荣承候，得其启请，无不遂之”③。有一次，尔朱荣拟补一人为曲阳县令，吏部认为不合适，改任别人，他“即遣其所补者往夺其任”④。荣从弟尔朱仲远竟“摹写荣书，又刻荣印，与尚书令史通为奸诈，造荣启表，请人为官，大得财货”⑤。尔朱荣死后，尔朱家族成员更是杀主虐臣，无恶不作。尔朱世隆任尚书令，“既总朝政，生杀自由，公行淫佚，无复畏避，信任群小，随其与夺”⑥。尔朱仲远在大梁，劫夺财物，淫乱妇女，人们把他“比之豺狼”⑦。尔朱氏集团“各拥强兵，割剥四海，极其暴虐。奸谄蛆酷多见信用，温良名士罕预腹心。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厌毒”⑧。

当尔朱氏代替北魏胡、汉士族成为当权派后，对北魏腐败政治因循不改，大失人心，因而代北庶族豪强酋帅集团只有消灭尔朱氏势力，才能开辟新的政治局面。于是，以高欢为首的代北怀朔豪帅集团与尔朱氏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决战。

---

①③④《魏书》卷七十四《尔朱荣传》。

②《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

⑤⑥《魏书》卷七十五《尔朱彦伯传附弟仲远传》。

⑦⑧《魏书》卷七十五《尔朱彦伯传附弟世隆传》。

第二节　高欢击败尔朱兆的广阿之战

高欢是代北怀朔豪强酋帅集团的代表人物。他曾先后加入杜洛周和葛荣起义军，后至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境内）投奔尔朱荣。他劝荣利用雄厚的军事实力成就“霸业”，尔朱荣深以为是，并任命高欢为亲信都督。

尔朱荣掌管北魏朝政后的种种倒行逆施，使魏廷政治更加黑暗。高欢大失所望，遂决定摆脱尔朱氏，重新创业。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尔朱荣被杀。高欢时为晋州（治白马城，今山西临汾）刺史。尔朱兆将举兵赴洛阳，为荣报仇，高欢不应其召，拥兵观望，以待时机。当河北大起义失败后的六镇降户20余万流入并、肆2州后，备受契胡欺凌，加之当时连年饥荒，降户常“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无谷色”①。降户衣食无着，常举行零星起义，大有再起之势，尔朱兆对此甚为焦虑。高欢想乘机利用降户成就事业，便请求率领六镇降户去山东“就食”，以便解除降户起义的潜在危机。尔朱兆不明底细，欣然同意。高欢控制了这支20余万的六镇兵民，积极准备摆脱尔朱氏的控制。

普泰元年（531年）二月，高欢率六镇兵民到达信都（今河北冀州）。这时，已控制信都的冀、定（今河北定州）2州汉人大族高乾、高昂、封隆之、李元忠等人迎纳高欢。高欢在河北地区大族的帮助下，占有了冀州这块重要地盘。随后，高欢将六镇兵民组编成一支严整的军队。他先假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于是“众皆愁怨”②。后又假作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尔朱兆驻此）符令，称尔朱兆要征发六镇兵民去征讨步落稽，并将发万人成行，然后由亲信将领孙腾等佯装求情，请再宽限5日。当六镇兵民极度怨恨尔朱氏后，高欢对六镇兵民说，我与你

---

①②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们一样都远离家乡，义同一家，想不到上面这样强行征召，现在"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指契胡）又当死，奈何？"①六镇兵民皆曰只有起来反对尔朱氏，并愿拥戴高欢为首领。高欢乘机提出要求说："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②。众人皆叩首，愿遵从高欢军令。这样，高欢改编兵民为己所用的目的经达到。

同年六月，高欢在信都起兵。不久，李元忠、高乾等人袭杀殷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刺史尔朱羽生。高欢任命李元忠为殷州刺史，并公开抗表罪状尔朱氏，与其彻底决裂。

当时，尔朱氏势力还很强大，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等共掌洛阳朝政；尔朱天光占有关中；尔朱兆占据并州；尔朱仲远占有徐（今江苏徐州）、兖（今山东兖州北）2州。他们听说高欢起事的消息，尔朱兆亲率步骑2万自晋阳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西），直扑殷州，李元忠败逃信都，尔朱兆占据殷州。八月，尔朱仲远、度律率兵进讨高欢。十月，高欢听从部下孙腾的建议，立魏宗室元朗为帝，改元中兴，以正己名。元朗以高欢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欢随即准备迎战。

尔朱氏数路大军逼近，尔朱兆军号称10万，屯于广阿；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大将斛斯椿、贺拔胜等军屯于阳平（今山东莘县）。高欢见敌军势大，便采用大将窦泰的建议，施反间计。他散布谣言说："世隆兄弟（彦伯、仲远、世隆为兄弟）谋欲害兆，复言兆与王图仲远等"③。尔朱氏内部本有矛盾，听信传言，尔朱兆与仲远等人之间"两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进"④。结果仲远等军不战而退。高欢反间计大获成功，分散了敌人兵力，摆脱了两面作战的困境，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尔朱兆。但高欢仍因众寡不

---

①②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③④ 《魏书》卷七十五《尔朱兆传》。

敌而忧心忡忡，并以此问计于亲信都督段韶。段韶分析说："所谓众者，得众人之死；强者，得天下之心"①。现在尔朱氏杀天子，诛公卿，虐百姓，人心尽失，智者不为其谋，勇者不为其斗。你以顺讨逆，如滚水融雪，尔朱氏有什么人多势众可言！高欢深以为是，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接着，高欢挥军至广阿向尔朱兆军发动进攻，结果大获全胜，俘尔朱兆甲卒5000余人，尔朱兆逃回晋阳。高欢乘胜进军，围攻相州治所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次年正月，高欢攻克邺城，活捉相州刺史刘诞。高欢在与尔朱氏的第一次决战中取得了胜利，并扩大了自己的占领区域。

第三节　著名的以少胜多的韩陵之战

高欢在广阿大胜后，又攻下邺城，对尔朱氏形成威胁，使尔朱氏集团内部又暂时团结起来。普泰二年（532年）三月，在朝秉政的尔朱世隆送厚礼于尔朱兆，卑辞请他至洛阳，并请魏节闵帝元恭（531～532年在位）纳尔朱兆之女为后。尔朱兆始弃前嫌，与尔朱天光、度律等人盟誓和好，共对高欢。

闰三月，尔朱氏集团各起大兵，天光自长安，兆自晋阳，仲远自东郡（治今河南滑县），度律自洛阳，共会师于邺，众号20万，沿洹水（今名安阳河，流经邺城南）两岸布阵。

高欢见尔朱氏大军到来，令吏部尚书封隆之守邺城，自率军出屯紫陌（今河北临漳西，漳水以北）迎战。当时高欢步兵不足3万，战马不满2000匹，实力远逊于尔朱氏大军。

闰三月二十六日，尔朱兆率轻骑3000夜袭邺西城，不克而还。二十八日，高欢率兵渡漳水进至韩陵山（今河南安阳东北17里）布阵。由于众寡不敌，高欢将军队布成一圆阵，并连系牛驴无数，

① 《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附子韶传》。

将退路堵塞，使将士以必死之心对敌。这是“陷之死地然后生”①的战法。此种战法的使用是有条件的，这要军队素质好，军令严，战斗力强。高欢军队具备这些条件。高欢早在起事之初，就向六镇兵民提出：“犯军令，生死任吾”。部下答应：“死生唯命”②。高欢手下将士的士气很高涨，他们怨恨尔朱氏，衷心拥戴高欢，乐为其效死。高欢军队多为六镇降户，原为军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因而战斗力很强。当时，河北汉人大族高昂率乡里部曲3000人随高欢出战，高欢见其部曲皆为汉人，恐不足御敌，准备分鲜卑兵千人与其部曲合编。高昂却说：“敖曹（昂字）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胜则争功，退则推罪，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③。这里可以看出，高欢手下不仅久经战阵的鲜卑兵有很强的战斗力，即便是汉人兵，也经过严格训练，战斗力也不弱。

两军在韩陵相对，尔朱兆责备高欢背信弃义，高欢以尔朱兆弑魏孝庄帝（528～530年在位）事，据理驳斥。当两军接战，高欢令高敖曹率左军，使从父弟高岳率右军，自己亲率中军，将圆阵改为攻击之横阵出击。高欢中军初战不利，尔朱兆乘机猛攻，从高欢兵背后率铁骑陷阵。正在这紧急关头，度律“恶兆之骄悍，惧其陵己，勒兵不肯进”④。这时，高岳率5000精骑迎头冲击尔朱兆前军，别将斛律敦收集中军散卒从尔朱兆背后袭击，高敖曹率千余骑兵从侧翼横击尔朱兆军。高欢军三面夹攻，度律军观望不前，尔朱兆军顾此失彼，高欢反败为胜。于是尔朱兆军大败，其手下大将贺拔胜、杜德于阵降高欢。尔朱氏其他各军溃散，尔朱兆逃回晋阳，尔朱仲远奔回东郡。

尔朱氏大败之后，其内部生变。四月，大都督斛斯椿等人反

---

① 《孙子兵法·九地》。

②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③ 《北齐书》卷二十一《高乾传附弟高昂传》。

④ 《周书》卷十四《贺拔胜传》。

叛，尽杀尔朱氏之党，执尔朱世隆、尔朱彦伯斩于洛阳，又捉尔朱天光、尔朱度律送于高欢。高欢进入洛阳。彻底摧毁尔朱氏势力的韩陵之战，遂以高欢以少胜多而宣告结束。

广阿、韩陵两大作战，都以高欢以少胜多而结束，这不是偶然的。从高欢方面看，一是他成功地利用了尔朱氏内部的矛盾，施反间计分散其军力，使广阿之战一举成功。二是他知己知彼，运用了“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战法，使将士勇往向前，韩陵之战因而获胜。三是高欢军纪严明，将士痛恨尔朱氏，士气高昂，战斗力强。四是高欢从一开始就进行了政治革新，深得人民拥护，这也是他能战胜敌人的重要政治基础。从尔朱氏方面看，其掌握朝政后，政治比北魏更加腐败，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天下之人莫不厌毒”①，从而遭到各阶级人民的反对，士卒不愿为其效力。此外，尔朱氏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给高欢以可乘之机，广阿之战以主力分散而失败。韩陵之战时尔朱氏虽暂时联合，但矛盾并未消除，没有统一的号令指挥，因而不能同仇敌忾，协力作战，这为高欢的取胜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

第四节　广阿、韩陵两大战役的历史影响

高欢以少胜多的广阿、韩陵两大作战，对于当时乃至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高欢广阿、韩陵两大作战的胜利，为彻底消灭尔朱氏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也就基本上结束了北魏后期一直延续到尔朱氏专政时的腐败的士族门阀政治。

广阿、韩陵两大作战后，尔朱氏集团的主力军被高欢消灭。普泰二年（532 年）四月，高欢进入洛阳，废魏节闵帝元恭及自己所

---

① 《魏书》卷七十五《尔朱彦伯传附弟世隆传》。

立的宗室元朗（后废帝），改以宗室元修为帝（孝武帝）。高欢自任大丞相、太师、世袭定州刺史，控制了洛阳政权。

同年七月，高欢率军北伐逃回晋阳的尔朱兆。尔朱兆见高欢大军将至，大掠晋阳城内，北逃秀容川（今山西忻州境内）。高欢进入晋阳，以晋阳地形险固，建大丞相府于晋阳，自己居此遥控洛阳朝政。尔朱兆北逃秀容川后，分兵扼守险要，并不断派兵南下抄略。高欢屡次声称北讨，却不发兵，使尔朱兆懈怠。然后乘新年之机派大将窦泰率精骑突袭，一昼夜行300里，自己率大军随后继进。永熙二年（533年）正月，大破尔朱兆军，尔朱兆逃窜荒山，势穷自杀。至此，高欢彻底消灭了尔朱氏集团。

尔朱氏本质上属于士族门阀集团，其本身腐朽不堪。史称其"所争唯权势，所好唯财色，譬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怀怨愤，遂令劲敌得容觇间，心腹内阻，形影外合。是以广阿之役，叶落冰离；韩陵之战，土崩瓦解"①。这个评论指出，尔朱氏的失败主要是由政治腐败、民心尽失所造成的。尔朱氏的被消灭，以高欢为首的怀朔豪强酋帅集团兴起及执掌朝政，使北魏后期以来腐败的门阀士族政治基本结束。从此，北朝门阀士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代北豪强酋帅崛起，成为北朝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因而广阿、韩陵之战高欢的胜利，成为北朝历史最高统治层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转折点。

其次，高欢广阿、韩陵两大作战的胜利，为代北豪强酋帅的崛起，以及开辟新的政治局面扫清了道路，从而改变了北魏以来的政治格局。所谓代北豪强酋帅，是指北魏时期以六镇为中心的北边地区的各族豪强酋帅，具体说来，主要包括怀朔、武川、代郡（治平城，今山西大同）3个地域性集团。在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中，代北豪强酋帅乘机而起，他们中不少人曾参加过反魏的起义军，但其目的与广大人民群众有本质的区别。从阶级属性看，代北豪强酋帅属于庶族地主阶层，是统治阶级，他们起兵主要是为

① 《魏书》卷七十五史臣曰。

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跻身封建统治最上层。魏末各族人民起义严重打击了胡汉士族门阀，使尔朱氏兴起，高欢又起而消灭尔朱氏集团，为代北豪强酋帅的跻身最高封建统治层，开辟了广阔的道路①。随后，以高欢为首的怀朔豪帅集团控制了关东地区，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豪帅集团控制了关陇地区。于是，胡汉士族门阀统治的北魏统一王朝，分别被代北豪强酋帅集团控制的东、西魏所代替，政治局面为之一新。

再次，由于东、西魏的执政者出身于中下层，他们对北魏的腐朽政治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对民情也比较了解。他们亲身经历了魏末各族人民的大起义，受到人民起义巨大力量的震慑，所以他们执政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对魏末弊政进行革新。其中西魏北周的改革成效较大，其政治清明，经济、军事实力与日俱增。因此，西魏北周终于由弱变强，最后统一了北方。

① 参阅朱大渭《代北豪强酋帅崛起述论》，载《文史》总三十一辑。

第二十六章　东魏和西魏间的兼并战争

第一节　东西魏的分裂和对峙

一、东西魏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

东魏和西魏政权是分别由高欢和宇文泰建立的。

高欢出身于怀朔豪帅集团，他创建东魏政权凭借的也正是这个集团的力量。当他控制六镇降户起事信都时，得到了这个集团的全力支持。当时许多怀朔豪强酋帅直接“参定大策”①。如后来身列东魏军政集团要职中的孙腾、窦泰、厍狄盛、段荣、可朱浑元、斛律金、斛律平、莫多娄贷文、韩轨、潘乐等多人，或直接策划，或远道投奔，或遣使交好，都积极支持高欢起兵。怀朔诸多豪强酋帅之所以尽全力支持高欢，是因为他们既同属于怀朔地域，又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高欢因此成为他们的代表人物。

高欢初到河北时，就得到了冀、定 2 州的汉族大姓封隆之、高乾、李元忠等人的拥戴，这也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反对尔朱氏的共同利益。此后，高欢正是凭借这两股力量，最终消灭了尔朱氏，开创了东魏的基业。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也就形成了以高欢为首领，以怀朔豪强酋帅为核心，参以河北汉人大族豪强武装的东魏军事集团。

宇文泰，世居于武川镇。其父宇文肱在魏末六镇起义时，曾纠合武川豪族“首望”贺拔氏、独孤信等部族镇压起义，后转投起义军，宇文泰也随父成为义军将领。河北起义失败后，宇文泰被尔朱

① 《北齐书》卷十九《贺拔允传》。

荣迁往晋阳，又成为尔朱荣统军。随后，宇文泰身列贺拔岳麾下，随尔朱天光入关镇压关陇起义军，深受岳重用。太昌元年(532年)岳为关西大行台，任泰为左丞。尔朱荣被杀，天光率兵东返，贺拔岳被暗通高欢的侯莫陈悦杀死，其部属赵贵等人以宇文泰“英恣不世，雄谟冠时，远迩归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齐肃，赏罚严明”①，遂奉迎宇文泰继任统帅。宇文泰掌握这支队伍后，消灭了侯莫陈悦，控制了关陇地区。到永熙三年(534年)七月，孝武帝元修入关，宇文泰便拥立元修建立了西魏政权。宇文泰创建西魏政权，所依靠的是武川豪强酋帅集团。宇文泰本人属武川集团的中坚分子，西魏军政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如赵贵、李弼、李虎、念贤、寇洛、独孤信、杨忠、侯莫陈崇、侯莫陈顺、若干惠等数十人，也都是武川豪强酋帅集团的重要人物。此外，宇文泰在割据关陇地区的过程中，又与当地的汉人士族豪强武装相结合，如武功(今属陕西)苏氏、陇西(今甘肃陇西南)李氏等大族都成为西魏政权所依仗的力量。从而在与东魏相对立的过程中，西魏也形成了以宇文泰为首领、武川豪强酋帅集团为核心，关陇地区的汉人豪强大族武装为辅的关陇军事集团。

二、高欢、宇文泰的治国治军政策及双方力量的对比

高欢、宇文泰虽同为鲜卑族，但其治国、治军政策却大不相同。高欢在治国上实行纵容迁就鲜卑贵族，尊崇鲜卑民族的政策，在治军上实行夷、汉分兵，偏重鲜卑兵的政策。东魏时吏治仍然腐败，高澄主持吏部时，虽曾一度整顿吏治，但为时很短，收效较微。整个东魏、北齐时期，贪污成风，鲜卑贵族及各级官吏“罕有廉洁”②者。杜弼请加以治理，高欢却认为：“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

---

① 《周书》卷一《文帝纪》上。

② 《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

在关西，黑獭（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① 在沙苑之战前，杜弼又请先除掉"掠夺万民"的"内贼"②，高欢却说："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③。高欢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于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采取纵容迁就态度。高欢起事依靠的是六镇鲜卑，因而他尊崇鲜卑族的政策，这使东魏政权鲜卑化的倾向很重。他在军中发令用鲜卑语，并视鲜卑人为主人，汉人为奴隶。虽然他曾命令不许鲜卑士兵欺凌汉人，力图缓和民族矛盾，但在当时整个政权鲜卑化的影响之下，其收效甚微。

高欢起事之初，主要依靠的却是鲜卑或鲜卑化的汉人。后来魏孝武帝西迁，随他入关的洛阳"六坊"鲜卑不过万人，其余的大都归附了高欢。因此，高欢的军队主要是鲜卑兵。高欢基本上采取的是以鲜卑人当兵打仗，汉人务农纳粮服杂役的作法。东魏时虽也有少数汉人兵，但与鲜卑兵分治，单独组织军队，由汉人统带。

宇文泰的治国、治军政策与高欢不同，其主要特点是不因循守旧，敢于大胆革新。

西魏建立不久，宇文泰便于大统三年（537年）三月，颁布了"益国利民"的"二十四条新制"④，走上了改革之路。到大统七年（541年），又颁行"十二条新制"。大统十年（544年），他命尚书删改补益前后三十六条新制，总为五卷，作为"中兴永式"，颁行全国。同时，又命苏绰撰《六条诏书》，并规定，地方官吏不通"六条"者不能任职。《六条诏书》是西魏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核心是革易时政，务求强国富民。其主要内容有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六条，包括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西魏朝廷认真按《六条诏书》及新制

---

①②③ 《北齐书》卷二十四《杜弼传》。

④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实行改革，在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负担，整顿吏治，选拔人才，抑制豪强等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效。显然，宇文泰治国所实行的是一条励精图治，锐意改新，革除时弊，强国富民之路。

宇文泰在军事上也作了大胆的改革，这就是西魏府兵制的创建。宇文泰赖以割据关陇的武装集团，其战士主要由改编关陇各族起义军而组成，加上后来随魏孝武帝入关的六坊鲜卑万人，总兵力约有七八万人。但随着与东魏之间战争的频繁，西魏军队的补充逐渐困难。于是宇文泰征召关陇豪右武装为兵，由当地有名望的大族统领。为了协调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联系，又依照拓跋氏早期部落兵制和周官六军之制，创立府兵制。府兵制下，士兵地位较前有所提高，战斗力相应也有所增强。

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北朝形成东、西魏相对峙的局面。开始时，双方在力量的对比上，是东魏强于西魏。

东魏从地域上说，占有淮水以北，黄河中下游今河南、河北、山东的广大经济发达区，拥有户300万，人口2000万，人力物力的基础很雄厚。东魏的军事力量也很强大，从几次出兵来看，约有20万精锐善战的鲜卑兵，因而其综合国力很强盛。

西魏从地域上看，占有关陇地区，这个地区的农业经济，从魏晋以后远没有东魏统治区内发达，西魏人口比东魏少，人力物力资源都比东魏差得多。从军事力量上看，西魏之初，大约有兵七八万人，明显少于东魏军，推行府兵制后，虽兵源有所增加，但那是西魏后期的事情，因而西魏的综合国力，远逊于东魏。

第二节　东西魏间的战争

（参见附图8）

一、潼关之战

东魏天平三年（536年），关中出现大饥荒，“人相食，死者十

七八"①。东魏乘机向西魏发动进攻。十二月，高欢调动10万大军，分3路齐出：以司徒高敖曹领军攻上洛（洛州，今陕西商州），大都督窦泰率步骑万余直趋潼关（在今陕西潼关北），自己亲率军进屯蒲坂（今山西永济西）。高欢的战略意图是，当窦泰攻破潼关后，东魏军从潼关和上洛两路进攻长安，自己作后继配合。次年正月，西魏宇文泰率军出屯广阳（今陕西高陵附近），准备迎敌。这时，高欢采取声东击西之计，命令在黄河上修架三座浮桥，作出欲渡河攻击渭北（今陕西渭水北）的态势，目的在于迷惑西魏军，以掩护窦泰军夺取潼关。宇文泰认真分析敌情后，识破高欢的战略意图，决定对高欢主力军采取守势，而专力对付窦泰军。

窦泰是东魏猛将，常任前锋，其部下士卒精锐，每战多捷。宇文泰决定利用窦泰"屡胜而骄"②的弱点，攻其不备，一旦击破窦泰军，高欢就会不战自退。当时西魏诸将对宇文泰的战略意图很不放心，认为击窦泰军是舍近袭远，一旦在军情上发生意外，都城长安就危险了。因而他们建议采取稳重方针，分兵御敌。宇文泰说，高欢以前曾两次攻打潼关，我军都只出屯霸上（今陕西西安东）防备。这次敌军来攻，我军也采取守势，敌人认为我军只在自守，没有远道出击的意图。现在我们乘他们轻敌之际，突然发动袭击，一定会成功。何况敌军虽然修筑浮桥，但短时间内还不能渡过黄河，乘此良机，我们一定可以击败窦泰。宇文泰亲率骑兵6000返回长安，声言还保陇右，以迷惑敌军。这时，宇文泰族子尚书直事郎宇文深献计说："窦氏，欢之骁将也。顽凶而勇，战亟胜而轻敌，欢每仗之，以为御侮。今者大军若就蒲坂，则高欢拒守，窦泰必援之，内外受敌，取败之道也。不如选轻锐之卒，潜出小关（今潼关之东），窦性躁急，必来决战，高欢持重，未即救之，则窦可擒也。既虏窦氏，欢势自沮，回师御之，可以制

---

① 《北史》卷五《魏本纪·西魏文帝纪》。

②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胜"①。宇文泰见深之计谋与自己不谋而合，大喜，决定依计而行。

西魏大统三年(537年)正月十五日，宇文泰率精骑潜出长安，十七日军至小关。窦泰未料到西魏军突然到来，仓惶应战，依山布阵，立阵未成，宇文泰纵兵急攻，东魏兵大败，窦泰自杀，万余名士卒皆被西魏军俘虏。高欢援救不及，遂毁浮桥撤军。东魏高敖曹一路进展顺利，这时已攻下上洛，正准备继续进军蓝田关(今陕西蓝田)。高欢以窦泰一路军败，派人召回高敖曹，西魏军又收复上洛。潼关之战以西魏胜利而告结束。

二、沙苑之战

西魏大统三年(537年)八月，宇文泰乘潼关之战的胜利，主动进攻东魏，占领了弘农(今河南灵宝北)，斩东魏陕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战士8000人。因关中连年饥荒，宇文泰遂驻于弘农"就谷"。这时黄河以南先已归顺东魏的地方豪强，又纷纷归附西魏。

高欢见此情况，遂于闰九月，发动20万大军，再次进攻西魏。命高敖曹率兵3万进军弘农，自率大军从壶口(在今山西吉县西)出发，准备从蒲津(今山西永济西)渡过黄河。宇文泰部下只有不足一万将士，见东魏军势大，遂率兵入关。高敖曹进兵围攻弘农。高欢的丞相长史薛琡建议说："西贼连年饥馑，无可食啖，故冒死来入陕州，欲取仓粟。今高司徒已围陕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诸道，勿与野战，比及来年麦秋，人民尽应饿死，宝炬、黑獭自然归降"②。他劝高欢不要过河与西魏交战。东魏大将侯景也劝高欢说："今者之举，兵众极大，万一不捷，卒难收敛。不如分为二军，相继而进，前军若胜，后军合力，前军若败，后军承之"③。高欢皆不纳，挥军渡过黄河，又过洛水，屯兵于许原(在

① 《周书》卷二十七《宇文测传附弟深传》。

②③ 《北齐书》卷二十六《薛琡传》。

洛水以南）西。

宇文泰进关后，以兵力不足，征诸州兵准备迎敌。诸州兵一时未至，宇文泰决定不等州兵，乘高欢远来立足未稳，发动进攻。诸将都认为敌众我寡，应等待时机再战。宇文泰说："欢若得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情转骚扰。今及其新至，便可击之"①。遂于十月一日，在渭水上架设浮桥，令战士带三日粮，轻骑北渡渭水进至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二水之间），距东魏军60里布阵，准备与高欢决战。大将李弼献计说："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②。宇文泰从之，移军至渭曲，将军队编为左、右两个方阵，分由大将赵贵、李弼率领，背渭水为阵，东西二十里，令战士放倒兵器伏于芦苇之中，严阵以待，闻鼓声起战。

十月二日，高欢军至渭曲，大都督斛律羌举见地形复杂，劝高欢说："黑獭若欲固守，无粮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决，有同猘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泞，无所用力。若不与战，径趣咸阳，咸阳空虚，可不战而克。拔其根本，则黑獭之首，可悬军门"③。高欢不听，准备用火攻。侯景却说："当擒以示百姓，烧杀谁复信之？"这时大将彭乐奋勇请战，说："我众贼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④ 高欢采纳，遂纵兵进击。两军将战，东魏军见对方人少，争相向前，行列大乱。宇文泰乘机鸣鼓，西魏伏兵齐出，左、右两军与于谨等六军合战，将东魏军主力横截为二。西魏将士奋勇冲杀，东魏军大败，高欢乘夜骑骆驼逃往黄河西岸，乘渡船过河，仅以身免。东魏军被杀7000余人，前后被俘7万人，损失辎重铠甲无数。高敖曹闻东魏军主力已败，撤围还师洛阳，沙苑之战又以东魏失败而结束。沙苑一战，东魏精锐损失过半。

---

①②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③ 《北史》卷五十三《斛律羌举传》。

④ 《北史》卷五十三《彭乐传》。

三、河桥之战

宇文泰沙苑大胜后，乘胜东进，命冯翊王元季海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2万直趋洛阳，洛州刺史李显进军荆州，贺拔胜、李弼率军围攻蒲坂。不久，西魏军先后攻占蒲坂、洛阳，继而攻略东魏河南之地。

东魏元象元年（538年），高欢大举反攻。二月，命其大都督贺拔仁攻西魏南汾州（治今山西吉县），西魏刺史韦子粲投降，东魏进占南汾州。于是，高欢命大行台侯景驻屯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积极准备收复失地。七月，侯景陆续收复颍川（今河南禹州）、汝南（今属河南）、襄城（今属河南）等河南失地后，与高敖曹等人进攻西魏独孤信镇守的洛阳。

宇文泰闻知，亲率关中之兵东救洛阳。当年八月，西魏救兵到达洛阳西北的谷城。东魏将莫多娄贷文、可朱浑元率千骑迎战，被西魏前锋李弼、达奚武大败，莫多娄贷文被杀，千余将士皆被俘虏，只有可朱浑元单骑逃回。西魏军进至瀍东（今河南洛阳东），威胁侯景军后方，景乘夜解围去。宇文泰弃大军于后，自率轻骑追赶侯景至黄河岸边。侯景北据河桥（桥名，故址在今河南孟州西、孟津东北黄河上，为洛阳外围戍守要地），南依邙山（在今河南洛阳北）布阵。宇文泰纵兵进攻，其所乘马忽中流矢惊奔，泰坠马，将被俘，幸亏都督李穆让马与他，才免于难。这时，西魏大军杀到，军势复振，独孤信、李远等军居右，赵贵、怡峰等军居左，宇文泰率大将王思政、蔡佑居中，开府李虎、念贤等军继后，东、西魏军展开大会战。西魏左、右军败，当时两军布阵很大，首尾不能相顾，左、右军不知宇文泰中军的情况，遂与后军一同退兵。西魏中军在宇文泰率领下，大将王思政、蔡佑拼死力战，终于大破东魏军，阵斩东魏名将高敖曹，俘虏东魏甲士1.5万人。宇文泰知左、右军已退，遂撤兵退还。这时高欢亲率7000骑从晋阳来援，闻西魏军已退，遂攻破金墉城而还。这就是历史

上著名的河桥之战。

河桥之战，虽最后以西魏胜利告终，但这是一场东西魏之间空前激烈的大战，久经战阵的宇文泰既胜之后，竟惊骇不能入睡，枕在猛将蔡佑的腿上，才稍觉心安，可见这场战斗之险恶①。东魏在这场战争中损失较重，失去高敖曹等数员猛将，将士被西魏俘虏1.5万人，赴河死者亦达万余人。

四、邙山之战

东魏武定元年（543年）二月，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归降西魏。宇文泰任命其为侍中、司徒，亲率大军至洛阳接应，以李远为前驱，并派大将于谨攻破西魏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三月，西魏军进围河桥南城（河桥南、北及河中洲上各筑有城一座，谓之河阳三城，又称河桥三城），东、西魏之间战火又起。

高欢闻知，亲率10万大军赶至黄河北岸。宇文泰退军瀍上（今河南洛阳西），以火船从瀍水上游流下欲烧河桥，使高欢不得渡河。东魏将张亮用小船百余只载长琐，待火船将至，以钉钉之，引锁向岸，桥遂保全。高欢大军遂从河桥渡河，据邙山为阵，连续几日按兵不动。

三月十七日，宇文泰留辎重于瀍曲，指挥将士夜登邙山，逼近东魏军，高欢严阵以待。次日黎明，两军接战。东魏右翼军彭乐率数千骑冲击宇文泰军北翼，泰军奔溃，彭乐攻入西魏军营。宇文泰败走，彭乐俘虏西魏将佐48人。东魏军乘胜追击，大破西魏军，斩首3万余级，宇文泰险些被彭乐活捉。三月十八日，宇文泰整军再战，自为中军，以大将赵贵、若干惠分为左、右军。西魏中、右军合击东魏军，大破之，俘获其全部步卒。高欢军败失马，其部下赫连阳顺让马与欢，高欢才得免于死。这时，有东魏

---

① 《周书》卷二十七《蔡佑传》。

军士投降西魏者，告欢所在。泰募勇士 3000 人，皆执短兵器，以大都督贺拔胜率军追欢。胜追欢数里，紧紧相随，槊刃将刺及欢。在此危急时刻，东魏河州刺史刘洪从傍射胜，中其二骑，武卫将军段韶射死胜马，待副马至，高欢已逃去。

西魏左军赵贵等 5 将战不利，东魏军复振。宇文泰率西魏军再战不利，时日已暮，宇文泰遂决定退军。东魏军随后追击，西魏将独孤信、于谨等收集散卒，自后袭击追兵，宇文泰才得以全军而退。高欢这时也无心再战，遂引兵东还。邙山之战，战局胜败几经反复，双方统帅都曾身处险境，可见战斗之激烈。这次战争两雄相争，虽互有胜败，但最后以东魏胜利告终。

五、玉 壁 之 战

武定四年（546 年）九月，高欢又亲率大军自晋阳南下，进攻西魏军事要冲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当时，西魏名将韦孝宽镇守玉壁，见东魏来势凶猛，坚守不出。于是双方开始了一场长达 50 余日的玉壁攻守战。

高欢兵临玉壁后，连营数十里，令将士昼夜猛攻，韦孝宽率将士全力防守。高欢先后用起土山、断水、挖地道、攻车撞城等办法攻城，韦孝宽随机应变，以相应办法御敌。后高欢又命将士在城四面挖掘地道 21 条，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然后放火烧柱，以使柱折城崩。韦孝宽立即命将士于城崩之处竖木栅拒敌，东魏军仍不能破城。高欢攻城之术已尽，而韦孝宽守城之方有余。高欢无奈，令人说孝宽投降，又被严辞拒绝。

高欢连攻玉壁 50 余日，毫无进展，10 万大军战死病死者有 5 万之多。高欢智力俱困，因而患病，被迫撤围退军。玉壁之战实际上以东魏失利而告终。

高欢回师不久，病重死去。侯景之乱随之发生，东、西魏之间的兼并战争遂暂时告一段落。

第三节　对东西魏战争双方指挥谋略的评析

长达十年的东、西魏战争，从整体上说，双方基本战成平手，处于僵持状态。东魏军事力量本强于西魏，但战争之初，高欢自恃兵力雄厚，骄傲轻敌，结果导致失败，精锐军力损失大半。此后，双方互有攻守，彼此各有胜败，谁都无力消灭对方，说明双方力量相近。高欢、宇文泰二人，都是难得的军事指挥天才，但从战争实践看，宇文泰驾驭战争的能力，似比高欢略胜一筹，所以在历次战争中，西魏军胜多败少，损失较小，而东魏军损失较大。下面对双方指挥谋略的特点，作一简要的分析。

东魏的军事实力，以及综合国力都强于西魏，因而东魏高欢骄傲轻敌，常想一举消灭西魏。在双方的战争过程中，东魏大多是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骄傲轻敌是整个高欢集团主观指导思想上的致命弱点，由此造成了东魏战争指挥谋略的许多失误。

其一，东魏在指挥谋略上缺乏细致周密的全面计划，不能遵循“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① 的战略原则，常给敌以可乘之机。如小关之战，高欢自己佯作渡河态势，以掩护窦泰夺取潼关是对的，但对敌手未作深入正确的分析，始终低估了宇文泰的指挥和作战能力，因而没有做窦泰被袭击之后的准备工作。而且各军互相没有接应，结果被宇文泰轻骑偷袭，窦泰被杀，高欢也因持重而未及时救援。

其二，恃勇冒进，缺乏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沙苑之战前，薛琡曾向高欢建议断西魏运道，不与其野战，困死西魏。从当时情况看，这是比较正确的意见，因为西魏连年饥荒，粮运困难，但高欢不听。侯景又劝高欢分兵前后继进，以成互相接应之势，高欢也不听。及至沙苑二军相对，大都督斛律羌举劝高欢不要在地

---

① 《孙子兵法·军形》。

形复杂的地方与宇文泰交战，建议出奇兵直捣西魏腹地。当时西魏诸州兵尚未集结，斛律羌举的建议有其合理性，高欢仍然不听。等到军至沙苑，准备用火攻时，侯景轻敌，认为应活捉宇文泰；彭乐更是恃勇请战，高欢却一一听从。东魏将帅都以为胜券在握，放弃了对自己较为有利的火攻战术，骄横如此，不败若何！

其三，意气用事，轻率用兵。纵观东、西魏战争，大多为高欢挑起战端。沙苑之战时，西魏宇文深对高欢军的分析，颇能说明问题。高欢大兵临近，西魏诸将皆惧，唯宇文深向宇文泰祝贺。泰问其故，深曰："欢抚河北，甚得众心，虽乏智谋，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图。今悬师渡河，非众所欲，唯欢耻窦氏，愎谏而来，所谓忿兵，一战可擒也"。高欢方面既然是"忿兵"，就很难理智正确地分析敌我形势，不能作到知己知彼，因而东魏屡次进兵，多败少胜，从而使自己国力不断削弱。

应当指出，高欢在几经战败，精锐兵力大受损失后，指挥谋略有所改进。如邙山之战，高欢渡过黄河，依山布阵后，连续几日观敌动静，按兵不动，使得宇文泰援山仰攻，终于战败西魏军。但总的说来，东魏由于国力强大，经济富裕，兵力充足，轻视宇文泰集团，常主动出击，一旦失利，便感情用事。因而在战略上，既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待机歼灭敌之主力，又不能寻求变化，出奇制胜，所以在东、西魏战争中，必然处于劣势。

西魏宇文泰在指挥谋略上要比高欢略胜一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他用兵的最大特点是能知己知彼，料敌度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去夺取胜利，而这正是用兵的精髓，所以他常能以劣势兵力打败优势的对手，取得胜利。

小关之战，宇文泰认真分析敌情，在正确地估计己方和敌方形势的基础上，识破敌人的谋略，毅然置正面敌人于不顾，舍近求远，看准敌军的弱点下手，以轻骑偷袭成功，一举获胜。

沙苑之战，高欢大军长驱直进，宇文泰征州兵未至，兵力不足以与高欢决战，于是他采取后发制人的策略，先退入关中，避其兵锋。但当东魏军深入后，他认识到如果再让高欢继续深入，自

己后方就会出问题，决定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利用渭曲的有利地形，以劣势的兵力设伏，击退敌军。最后由于高欢的轻敌，宇文泰果然取胜。这里可以看出，宇文泰掌握作战时机，抓住敌人弱点，利用有利地形，在战斗中创造机会以少胜多的谋略是正确的。

宇文泰用兵上也有一些弱点，如邙山之战，宇文泰就因胜利而冒进，受挫于对手。但从整个东、西魏用兵谋略上看，他能审时度势，该战则战，不该战则暂退一时，常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出奇制胜，变化无方，确实是一个深谙用兵之道的著名军事家。正由于他的正确谋略，使得西魏在与东魏的战争中，胜多败少，损失也远小于对方，遂能以劣势的兵力与相持10年而毫无力蹙之感，反而在战争中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第二十七章　周武帝统一北方的战争

第一节　周武帝统一北方的战略方针

一、周武帝所进行的政治军事改革

周武帝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西魏恭帝三年（556 年）十月，宇文泰死，其第三子宇文觉继任其职。十二月，恭帝禅位于宇文氏。宇文觉于次年正月即帝位（孝闵帝），宇文泰从子宇文护以大司马、晋国公辅政。九月，专断朝政的宇文护杀宇文觉，改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为帝（明帝）。武成二年（560 年）四月，宇文护又毒杀明帝，改立宇文邕，是为周武帝。

周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即帝位后，对于宇文护的专擅朝政，极不满意，但因宇文护手握军权，党羽满朝，未敢轻动。至天和七年（572 年）三月，周武帝以计杀掉宇文护及其亲党，亲自掌握朝政大权。

自宇文泰执政以来，西魏北周成功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北周的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经济也有了发展。周武帝在此基础上，又实行一些改革措施。

在政治上，周武帝注意严明法纪，进一步整顿吏治。史称他“用法严整，多所罪杀，号令恳恻，唯属意于政。群下畏服，莫不肃然”①。保定三年（563 年）二月，曾颁行新律，建德六年（577 年），又颁行《刑书要制》，明确规定：“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

①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①]。在周武帝的励精图治下，北周的政治经济沿着西魏宇文泰以来的改革，继续向深入发展，因而这一时期政治整肃，吏治也很清明。

在社会经济方面，周武帝继续实行宇文泰时代推行的均田制，并注意兴修水利，开建屯田，劝课农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如保定二年（562 年）初，“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②]。保定四年（564 年），河州刺史李贤也曾“大营屯田，以省运漕”[③]。此外，周武帝继续实行宇文泰时“均徭役”的政策，“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役”[④]。即由原来每夫每年服役一个半月，改为服役一个月，以减轻人民的徭役负担。

周武帝为了增加民户，富国强兵，实行释放奴婢和杂户的政策。同时因北周寺院经济发展，僧尼众多，严重影响国家赋役收入。武帝于建德三年（574 年）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⑤]。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后，众多的寺院被毁，寺院霸占的无数良田收归国有，大批的僧尼还俗，以及放免的奴婢等，均成为国家编户，这就扩大了国家征收赋役的范围，大大地增加了北周的人力物力。因此后来周武帝自己说：“自废（佛道）以来，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伐妖戎，国安民乐，岂非有益”[⑥]。

在军事上，周武帝为了加强君主集权和扩大兵源，对府兵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宇文泰创设府兵制之初，由于西魏的实际执政者是大丞相宇文泰，因而府兵的指挥权在丞相府。宇文泰死后，大冢宰宇文护专权，府兵的指挥权也在相府。周武帝在建德元年（572 年）诛宇文护后，才掌握了府兵的指挥大权。建德三年（574 年），周武帝

---

①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②④⑤ 《周书》卷五《武帝纪》上。

③ 《周书》卷二十五《李贤传》。

⑥ 《广弘明集》卷十。

改府兵军士名称为侍官，以改变府兵的从属观念，使其直隶于君主，加强君主集权。周武帝改变以前专以六镇鲜卑及关陇豪右子弟为府兵的作法，而是“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即凡充任府兵者，其户口不属州县，因而可免除赋役。这种作法扩大了府兵的来源，“是后夏人（汉人）半为兵矣”①。

周武帝通过以上一系列改革，加强了北周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消灭北齐、统一北方打下了物质基础。

二、统一北方战略方针的制定及战略部署

周武帝收回朝政大权后，开始筹划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大事。为消灭北齐，周武帝在战略上采取北连突厥、南和陈朝的方针，以便形成夹攻北齐的形势，使其疲于奔命，难于应付。

突厥是6世纪中叶前后强大起来的游牧民族，生活在我国北方大漠以北的广大地区。当时在北方对峙的北周、北齐都想连结突厥以为外援，因而连结突厥是北周的既定国策。宇文泰即曾准备与突厥和亲，后因其早死而止。周武帝即位后，北周与北齐在外交上经过一番较量，在保定三年（563年）北周得与突厥和亲，武帝娶突厥女为皇后，随后常与突厥信使往来。周武帝政由己出后，继续实行结好突厥的政策，每年“给缯絮锦彩十万段。突厥在京师者，又待以优礼，衣锦食肉者，常以千数”②。同时，周武帝采纳大司马窦毅的建议，对原先不太受宠的突厥阿史那后用心慰抚，以收连结突厥之效。

与此同时，周武帝对南方的陈朝也采取联合的方针。建德元年（572年），武帝在收回朝政后不久，便派司城中大夫杜杲出使陈朝，约以联合攻齐。陈宣帝表示：“若欲合从，共图齐氏，能以

---

①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隋书》记此事于建德二年，实际上建德三年才开始。

② 《周书》卷五十《异域下·突厥传》。

樊、邓（今湖北襄樊、河南邓州一带）见与，方可表信”①。杜杲说：“合从图齐，岂唯弊邑之利。必须城镇，宜待之于齐。先索汉南，使者不敢闻命”②。此后，北周与陈信使往返，约以伐齐。建德二年（573 年）三月，陈宣帝以都督征讨诸军事吴明彻为统帅，出兵伐齐，至同年底，攻占北齐淮南之地。

建德四年（575 年），周武帝北和突厥、南连陈朝的战略方针既已实现，遂准备大举伐齐。二月，武帝增加边镇戍兵，又命边镇增加军用物资的储备。北齐也针锋相对，修饬边防武备。这时柱国于翼劝武帝暗中准备，而表面上与其修好，以便攻其不备。他说：“疆场相侵，互有胜败，徒损兵储，非策之上者。不若解边严，减戍防，继好息民，敬待来者。彼必喜于通和，懈而少备，然后出其不意，一举而山东可图”③。武帝采纳，从其计而行。

这时，北周名将柱国韦孝宽上疏陈伐齐三策，其一策认为，伐齐应立即乘隙而进，现陈已取齐之淮南，我如乘势进军，确实是一大良机。其二策认为，如果武帝想从长计议，不即刻进兵，则可在与齐交界处广设屯田，与陈联合分其兵势，以逸待劳。而北齐由于政治“昏暴，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熬然，不胜其弊”。齐朝灭亡已是早晚的事，待机而发，可一战成功。其三策认为，如果武帝欲持重行事，则可保持目前相持之势，表面与其通好，养精蓄锐，北周疆域广大，国势强盛，如此“长策运驭，坐自兼并也”④。

武帝读韦孝宽的伐齐三策后，问计于开府伊娄谦。伊娄谦认为，北齐已经“上下离心，道路仄目”⑤，正是用兵之时。武帝综合了于翼、韦孝宽、伊娄谦等人的意见，先遣小司寇元伟与伊娄谦持重金出使北齐，以观其动静，并麻痹对方。然后调遣大军，决

---

①② 《周书》卷三十九《杜杲传》。

③ 《周书》卷三十《于翼传》。

④ 《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⑤ 《隋书》卷五十四《伊娄谦传》。

定即刻进兵伐齐。

第二节　北周灭北齐之战

一、周武帝仓促进兵临战受阻

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周武帝出动18万大军伐齐，以北齐洛阳为进攻目标，沿黄河两岸，数道并进：

1、齐王宇文宪率众2万直趋黎阳（今河南浚县）；

2、随国公杨坚、广宁侯薛迥率舟师3万自渭水入黄河，顺流而下；

3、周武帝亲率6万大军直指河阴（今河南孟津东），以威胁洛阳；

4、常山公于翼率众2万出陈、汝（今河南淮阳汝水间一带）、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2万守太行道（在今河南孟州北）、申国公李穆率众3万守河阳（今河南孟州）道，以牵制和阻击北齐各路援军。

八月，北周军队攻入齐境。周武帝军攻破河阴大城（外城），北齐军退至子城（内城）固守。宇文宪军攻占武济（今河南孟津），进围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今河南巩义东北），攻克东、西2城，烧毁浮桥。周武帝攻河阴子城不克、转而进攻金墉城（今河南洛阳东北），又不克。这时，宇文宪、李穆、于翼等军连下北齐30余城，但皆未留兵防守。北周军队又攻克河阳南城（即河桥南城，河桥有南、北、中潬三城，分别建于桥南、桥北及河中洲上，为洛阳外围戍守要地），继而围攻中潬城，北齐永桥大都督傅伏率兵固守。周军猛攻二旬，未能克。

九月，北齐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晋阳（今山西太原）率大军南下救洛阳。周武帝以金墉城坚难下，又恰遇自己生病，遂下令退兵。周军尽弃所下之城，撤兵西还。

周武帝此次伐齐仓促出兵，终因谋划不周，而顿兵坚城，久不能克，加之自己突然生病，结果被迫退兵。

当北周进兵之初，内史上大夫宇文弼、民部中大夫赵煚、遂伯下大夫鲍宏等人都认为，洛阳及附近诸城是北齐精兵所聚的重镇，又当四冲之地，敌兵救援便利，易守难攻。他们劝周武帝不要正面进攻洛阳，建议出奇兵从侧面绕道突袭北齐心腹要地晋阳，可以出敌意外，一战成功。但周武帝却未能采纳，终于使第一次伐齐无功而返。

二、平阳之战的周密谋划及决战决胜

周武帝第一次伐齐虽没有成功，但却吸取了经验教训，并进一步知道北齐虚实，见其“行师，殆同儿戏”，其朝政“昏乱，政由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谋夕”①。这就使周武帝更加坚定了灭齐的决心。建德五年（576年）十月，周武帝决定第二次出兵伐齐。

周武帝这次进军，作了周密的部署，改以晋州（治平阳，今山西临汾）为攻击目标。晋州为北齐重镇，地当晋阳、洛阳之间，将洛阳与晋阳南北连成一线。周武帝的战略部署是，先攻击晋州，扼其咽喉，齐军必来援救，这时集大军一举消灭来援的敌之主力，然后乘胜东进，直指北齐京师邺城。

十月四日，周武帝部署诸军，以越王宇文盛、杞国公宇文亮、随国公杨坚为右三军统帅，以谯王宇文俭、大将军窦恭、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统帅，齐王宇文宪、陈王宇文纯为前军统帅，亲自督率各军，向北齐晋州发动进攻。北周大军攻入晋州，进至汾曲（今山西临汾南），周武帝分派诸将各据要地，遣宇文宪率精骑2万守雀鼠谷（在今山西介休西南），宇文纯率步骑2万守千里径（在今山西临汾北，是通往晋阳的要道），郑国公达奚震率步骑1万守

①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统军川（今山西石楼西），大将军韩明率步骑5000守齐子岭（今山西垣曲东），乌氏公尹升率步骑5000守鼓钟镇（今山西垣曲北），凉城公辛韶率步骑5000守蒲津关（今山西永济西），柱国宇文盛率步骑1万守汾水关（今山西离石西南）。以上诸军除蒲津关一路为保障后路安全外，其余诸军都用以截断敌援军之路。此外，周武帝又命赵王宇文招率步骑1万自华谷（今山西闻喜东）攻北齐汾州（治蒲子城，今山西隰县）诸城，使其自顾不暇，无法救援晋州。然后，周武帝命内史王谊监诸军猛攻平阳，自己驻屯汾曲节度各路大军，每日亲至平阳城下督战。当时齐主正与冯淑妃猎于天池，晋州告急者，自早至午，驿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说："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①"不发兵救晋州。在周军猛攻之下，北齐平阳守将侯子钦、崔景嵩相继出降。十月二十七日，北周军队攻占平阳，俘虏齐海昌王尉相贵及甲士8000人。与此同时，周军宇文宪一路进展顺利，连下洪洞（今山西洪洞北）、永安（今山西霍州）2城，更图进展。周武帝又派遣诸军攻略北齐城镇，齐守军纷纷归顺。

十月二十五日，当平阳快被周军攻破时，北齐后主高纬才亲率10万大军自晋阳南下赴援，周军已攻破平阳，高纬才到达平阳。周武帝以齐大军新到气势正盛，为避其锐气，乃命刚刚任命的晋州刺史、上开府梁士彦领精兵1万镇守平阳，其余各路周军一齐撤退，宇文宪率军断后。北齐援军随后追赶，宇文宪与开府宇文忻各率精兵百骑殿后，斩杀北齐骁将贺兰豹子、山褥瓌等百余人，北周大军退至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一带，以逸待劳。这时，北齐已开始围攻平阳。周武帝命宇文宪率兵6万回援平阳。宇文宪回师，屯军涑川（今山西闻喜），遥为平阳声援。

周武帝退兵后，齐后主亲率大军将平阳围住，昼夜猛攻。周晋州刺史梁士彦，率手下将士拼死固守。齐后主亲督将士攻城，两军短兵相接，城墙毁坏。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说："死在今日，

---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陈纪六》宣帝太建八年十月。

吾为尔先"①。激励将士奋勇死战，呼声动地，将齐军杀退。梁士彦随即令自己妻妾儿女与军人家属一齐修筑城墙，昼夜不停，三日将城修好。齐军又作地道攻城，打开10余步宽的一个缺口。但齐后主不许将士立即攻入，而等宠妃冯淑妃观看后再攻，因此贻误战机。梁士彦忙令将士用木拒将缺口堵住，齐军未能攻入城中。

周武帝回师后，于十一月十八日还抵京师长安。次日即又下诏，将率诸军还救平阳。十一月二十二日，周武帝自长安回军。武帝回长安后仅三天即又率军东返，一是为了迷惑齐军，使其放心攻打平阳，将其主力吸引在平阳一线，以便集中兵力一战全歼；二是为了避敌锐气，待其师老兵疲时回师猛攻，从而更有把握取胜。

十二月初三，周武帝进至高显（今山西闻喜附近），与宇文宪手下6万精兵会合，即命宇文宪率所部在前，向平阳推进。十二月初四日，武帝至平阳。初六日，周军各路将士齐集平阳，有众8万人，逼近平阳列阵，东西长20余里。

齐军进围平阳之时，为防备北周军队突然回兵，曾于平阳城南挖堑壕，东起乔山（今山西襄汾北）、西抵汾水。这时，周、齐两军即对峙于堑壕南北两侧。周武帝乘坐平时的御马，巡视军队，由于他平时亲自接见军队各级将帅，所到之处直呼主帅姓名，加以慰勉，周军将士"感见知之恩，各思自厉"②，士气高涨。武帝欲使诸军进击齐军，但阻于堑壕，自清晨至下午，两军相持不决。

这时，齐后主问右丞相高阿那肱，是否与周军决战，高阿那肱认为决战没有必胜把握，建议不与周军接战，退守高梁桥（今山西临汾东北）。但后主诸幸臣说："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③齐后主以为是，遂令众军填堑南进。周武帝见齐军来攻，大喜，督率诸军迎击，双方展开激战。这时北齐军东翼稍稍退却，与齐后主一同观战的冯淑妃，便惊惧大叫：

---

① 《周书》卷三十一《梁士彦传》。

②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③ 《北齐书》卷五十《恩幸·高阿那肱传》。

"军败矣！"[1] 幸臣穆提婆也惊慌失措曰："大家去！大家去！"[2] 齐后主遂与冯淑妃逃奔高梁关。北齐开府奚长劝谏说："半进半退，战之常体。今兵众全整，未有伤败，陛下舍此安之？御马一动，人情惊乱，且速还安慰之"[3]。武卫张常山自阵前追上后主，也说："军寻收回，甚整顿，围城兵亦不动，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将内参往视"[4]。齐后主将回军，穆提婆引后主肘说："此言难信"[5]。后主遂与冯淑妃继续北逃。齐后主逃跑，北齐将士人心涣散，因而齐兵大败，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6]。平阳之战以北周胜利告终。

平阳的决战使周武帝实现了战前的战略设想，达到了诱北齐主力南下然后歼灭的目的。经此一战，北齐主力损失严重，元气大伤。

三、周军乘胜歼敌，北齐灭亡

周武帝大败齐军后，晋州刺史梁士彦劝武帝乘胜进军。武帝从之，遂以梁士彦继续镇守平阳，执其手说："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7]。随后，武帝命诸军追击齐军，诸将皆请求还师。武帝说："纵敌患生。卿等若疑，朕将独往"[8]。众将不敢再言。东魏军连克高壁（今山西灵石东南）、介休（今属山西）2城，逼近晋阳。

齐后主逃回晋阳后，忧惧不知所为，问群臣说："周师甚盛，若何？"[9] 群臣回答说："宜停百赋，安慰朝野，收拾遗兵，背城死战，以存社稷"[10]。后主犹豫不决，意欲逃往北朔州（今属山西），准备一旦晋阳失守，便北逃突厥。便命安德王高延宗等守晋阳。暗

---

① 《北史》卷十四《后妃下·齐后主冯淑妃传》。

②③④⑤ 《北齐书》卷五十《恩幸·高阿那肱传》。

⑥⑦⑧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⑨⑩ 《北齐书》卷八《后主纪》。

中送皇太后、皇太子至北朔州，为逃跑预作准备。

十二月十三日，周军已进至晋阳。齐后主以高延宗为相国，命他掌管防务，自己欲乘夜北逃突厥。领军梅胜郎叩马劝谏，后主才转奔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亲信从者数十人。这时后主幸臣穆提婆投降北周，被封为柱国、宜州刺史。武帝为分化瓦解敌军，下诏命北齐官吏降周的，“官荣爵赏，各有加隆”①。于是北齐朝臣降周者，相继不绝。

十四日，北齐相国高延宗称帝。十六日，高延宗发库藏及后宫美女赏赐将士，整顿 4 万军士出城抵御周师。周武帝率诸军击退齐军，乘胜攻入晋阳东门，并令城外军绕城布阵。入夜，高延宗率将士反击，大败入城周军，死者 2000 余人，武帝与随从数人辗转奔逃，幸得降人引出，才免于难。这时，武帝欲退兵，北周诸将也劝武帝回师。当此紧急关头，开府宇文忻劝谏说：“自陛下克晋州，破高纬（齐后主）乘胜逐北，以至于此。致令伪主奔波，关东响振，自古行兵用师，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将士轻敌，微有不利，何足为怀。丈夫当死中求生，败中取胜。今者破竹，其势已成，奈何弃之而去？”② 武帝从其言。次日，武帝整军再战，果然大破齐军，生擒高延宗，攻克晋阳。周武帝下令大赦，废除齐的苛政，礼贤下士，以收齐人之心。

齐后主逃回邺城后，广宁王高孝珩请后主出后宫美女及珍宝赏赐将士，急召各地军队与周再战。后主不悦。侍中斛律孝卿又请后主巡视邺城守军，并为他撰好讲稿，请其讲话时要慷慨流泪，以激励将士。但齐后主面对军士，记不住讲稿内容，却大笑不止，其亲从也笑。齐军将士寒心，怒说：“身尚如此，吾辈何急！”③ 于是邺城守军，皆无战心。

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武帝以上柱国宇文纯镇守晋阳，自率大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陈纪》太建八年十二月。

② 《隋书》卷四十《宇文忻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二《陈纪六》宣帝太建八年十二月。

军自晋阳南下进攻北齐京师邺城。

齐后主闻周师南下，召集诸文武一品以上大臣入皇宫商议御周之策，众人各持异议，后主不知所从。于时邺城之中，人心动摇，北齐朝臣出降北周者，昼夜相继。北周建德六年（577 年）正月初一，齐后主将皇位禅让于年仅 8 岁的皇太子高恒，自为太上皇。这时，北齐皇门侍郎颜之推等人劝齐后主至河南地区募兵，如事不成，则南投陈朝。后主从之，遂于正月初三先使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邺城逃往济州（治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正月初九，齐幼主高恒也从邺城东逃。

正月十八日，北周军队进围邺城，齐军出战大败。齐后主率百余骑东逃济州，周师攻占邺城。齐王公以下皆降周。齐洛阴守将独孤永业有甲士 3 万，请降于周，武帝以永业为上柱国，封应公。

齐后主逃至济州后，令高阿那肱镇守碻磝关（济州城北），自与太后冯淑妃、幼主等人逃奔青州（今属山东）。接着，北周军队逼近济州，高阿那肱投降。齐后主率幼主等人南逃，被北周将领尉迟勤追及，全部被俘送往邺城。

周武帝攻占邺城，生俘齐后主、幼主等人后，命诸军四出，攻略北齐各地州镇。至建德六年（577 年）二月，平定北齐全境。至此，周武帝彻底消灭了北齐，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第三节　北周灭北齐后的南北形势

北周灭北齐后，与江南的陈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此后，周武帝志在“平突厥、定江南”，使“天下一统”①。因此，他统一北方后立即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稳定原北齐统治区，以为将来平定江南打好基础。

---

①《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在攻占邺城的当月，周武帝下诏为北齐冤死的名臣斛律明月、崔季舒等人平反，为其子孙随荫叙录官爵，并发还被抄没的家口田宅。同时，拆毁齐后主供享乐的东山、南山园、三台等园苑台阁，将拆下的瓦木砖石可用者，尽赐与百姓，其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建德六年（577年）二月，周武帝下诏放免被北齐掠为奴婢的河南百姓，准其返回故土，随意去留，国家给予安置。八月，又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①，这是对各类杂役之户的普遍放免。十月，又将原北周境内的奴婢并皆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②。一年之内，三次放免奴婢、杂户，使大量劳动力解放出来。

在平定齐地的建德六年（577年），周武帝曾连续三次下诏，选拔齐地人才。三月，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③。七月，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④。九月，下诏令北齐境内儒生明一经以上的，全部由州郡以礼举送朝廷。

建德六年（577年）十一月，周武帝颁行《刑书要制》，将北周严明法制、整顿吏治的革新措施，在北齐旧境内推行。同时，周武帝又徙并州军人4万户约20余万人到关中，以消除齐地的不安定因素，并充实关中的人力和物力。

周武帝在平齐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革除了北齐的弊政，使全境政治清明，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迅速稳定了北方统一后的局势，北方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新气象。这时南方的陈朝恰与北周相反，已呈衰颓之势。然而陈宣帝（569～582年在位）不自量力，“志大意逸”⑤，反而欲乘北周初平北方之际，攻取淮北之地。陈太建九年（577年）十月，宣帝诏南兖州刺史吴明彻进军北伐。明彻进军淮北，围攻北周徐州重镇吕梁（今江苏徐州东南），

---

①②③④ 《周书》卷六《武帝纪》下。

⑤ 《陈书》卷五《宣帝纪》史臣曰。

北周徐州总管梁士彦率军出战不利，退守徐州（今属江苏）。吴明彻截清水（古水名，又名清泗，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灌城，列舟舰于城下猛攻，梁士彦率军固守。

十一月，周武帝派上大将军王轨率军增援。王轨率军急进，潜于清水入淮口（清水入淮处，今江苏淮阴西）横流竖木，用铁锁连贯车轮，横截江中，以断陈舟师水路，然后于淮口筑城，准备阻击陈军。当王轨军初至淮口，营垒未立时，陈将萧摩诃曾建议急速派军袭击，以使周军无法建立营垒，但吴明彻不纳。周军在10天之内修筑好营寨，陈军后路被切断，陷于被动局面，全军上下一片恐慌，想尽快打开水堰，用舟船从水路南撤。马军主裴子烈说，如果决堰，船会倾翻，不如以马军先行，徐徐退兵。太建十年（578年）二月，吴明彻见陈军后路被断，知败局已定，遂命大将萧摩诃率马军数千先行，然后从众将士议，决开水堰，欲乘水势退军。陈军退至淮口，水势减弱，舟船被周军所设障碍阻止，不能行走，兵众溃散。这时王轨乘势挥军袭击，陈军大败，除萧摩诃率骑兵突围南逃外，吴明彻以下将士3万全被周军俘虏，军资器械也被周军缴获。徐州之战大败，使江南陈的势力更加削弱，完全无力与北周对抗，从此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周武帝在淮北击败陈军后，决定向北用兵，解决突厥骚扰的问题。宣政元年（578年）五月，周武帝征发各路大军，以柱国姬愿、东平公宇文神举为统帅，分5路北伐突厥。但在本月底，周武帝突然病重，北伐之事因而骤停。到六月初，周武帝去世，终未实现他的宏愿，即统一全国的大业。大象元年（579年）九月，继任帝位的周宣帝（578～579年在位）以大将韦孝宽为行军元帅南征。孝宽率军攻入陈淮南之地，进展顺利，连克广陵（今江苏扬州）、寿阳（今安徽寿县）等淮南重镇。至十二月，北周军队尽占淮南之地。从此，大江以北地区皆为北周所有。

陈朝自失去淮南广大地区后，其疆域与南朝初期相比，西方失去了巴蜀，中部失去了雍州、荆州一带，东部失去淮南地区，局促在长江中下游大江以南的狭小区域内，是南朝以来疆域最小，国

势最衰弱时期。从军事力量上说，吴明彻进攻淮北大败后，使南朝军事实力进一步削弱，从此不仅不能向北进攻，实际上已无力自保。而陈的统治者面对如此严峻形势，却不能从政治上改弦更张，发奋图强，反而更加腐败。陈后主（583～589年在位）即位后，唯知饮酒作乐，赏花赋诗，极尽享乐之能事，因而陈朝政治极度昏乱。百官只知贪赃枉法，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陈朝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反观北周，从疆域上说，占据了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中上游等广大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力物力大为扩充。在军事力量上，北周有着一支数十万战斗力很强的府兵及其他军队。此外，北周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迅速。虽然继武帝之后的周宣帝残暴荒淫，但他和他继任者静帝总共在位不到4年。大定元年（581年），外戚杨坚夺取帝位后，在政治经济方面基本上沿袭西魏北周以来的政策，国力继续增强，因而由北方最终统一南方，乃是势所必然。而这种结局形成的基础，则是由周武帝的锐意革新，及其统一北方的壮举所奠定的。

第五编

军事思想、战争谋略及名将事略

第二十八章　军事思想和战争谋略

第一节　主要军事家的军事思想

一、杜预事略及军事思想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祖父杜畿，曾任曹魏尚书仆射，父杜恕，任魏幽州刺史。预自幼博学多识，明于政治兴衰之道。

曹魏末年，杜预以尚书郎入仕，后曾任相府参军。西晋建立后，杜预历任河南尹、秦州刺史、度支尚书等要职。在朝中任职期间，贾充等人定律令，杜预为之作注解。又受诏，制订百官考课升降之法。他在度支尚书任上，曾“奏立籍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①。皆被武帝采纳。杜预在朝7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人称他为“杜武库”②，言其胸中无所不藏，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从政利国利民。

晋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密谋伐吴，当时赞同者只有羊

---

①②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祜、杜预、张华3人。咸宁四年（278年），杜预代替羊祜出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主持伐吴的准备工作。杜预在襄阳，"缮甲兵，耀威武"①，采用分化离间之计，使吴主孙皓召回名将西陵督张政，而换为刘宪，后巴蜀水师顺流而下，刘宪军成"倾荡之势"。杜预做好对吴的战争准备后，上表请求即刻进兵伐吴。晋武帝回答他准备第二年（太康元年，280年）进兵。杜预以为时机难得，战机不能贻误，如果形势一旦有变，伐吴之事将难以成功。他在一月之中，两次上疏，陈述利弊，坚决请求进兵，使晋武帝终于下决心伐吴。

太康元年（280年）正月，杜预率大军自襄阳向江陵一线进军，一路攻城略地，计无虚算，又出奇兵过江，配合沿江东下的王濬水师作战。杜预攻克江陵后，吴地方官吏望风归降，预加以慰抚。晋武帝在进军之前，曾令王濬水师在进至建平（今重庆巫山）后受杜预指挥。杜预深谋远虑，不争功贪利，闻知王濬水师东下进展顺利，便令其"径取秣陵（建康）"，不必受己节制。王濬不受牵制，果然一路径进，势如破竹，吴军节节败退。当晋军取得重大胜利时，大都督贾充建议暂时退军，以图后举，这显然是贻误战机的错误决定。杜预得知，一面急表朝廷，力谏不可退军；一面继续挥军东进，最后一举灭吴。

灭吴之后，杜预进封为当阳县侯，食邑增为1600户，继续镇守荆州。杜预在襄阳大修水利，引用滍、淯诸水，以灌田万余顷。又开通水道，"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②。史称："江汉怀德，化被万里"③。又说："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尊称他为"杜父"④。杜预忠于晋廷，"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⑤。他处事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⑥。杜预病卒于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终年63岁。杜预一生虽政事繁忙，仍不忘治学，曾专心研治经籍，著《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一书，留传至今，为研习《左传》经典之作。又

---

①②③④⑤⑥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撰《释例》、《盟会图》、《春秋长历》等书。杜预一生兼资文武，其功业昭著，是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儒将。

杜预高瞻远瞩，有明确的备战意识和边防思想。他说“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因而“勤于讲武”；平时“屯兵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①。并重视国家边防建设，向晋廷上奏安边之策及论军事的重要性，皆被朝廷采纳。杜预继承先秦兵家富国强兵的思想，认为兵战必须建立在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主张兴修水利，发展农耕，加强畜牧业生产，使“匹马匹牛，居则以耕，出则以战”②。杜预以足智多谋著称，主张以武力平吴，实现天下一统，以“开太平之基”③。他善于分析敌我情势，指出决策应因时乘势，当机立断，不可延误战机，凡事当以利害相较，利有十之八九即应用兵。如一旦错过战机，“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敌军转而生计，有所准备，则“城不可攻，野无所掠”④，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

杜预在指挥战争中，注重以谋略取胜，主张避开强敌，集中优势兵力，乘虚破敌。为准备伐吴，他选精兵袭吴西陵（今湖北宜昌）；用离间计使敌临阵易帅，遂成倾荡之势。在灭吴之战中，进攻坚城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却围而不攻，遣军计取江陵上游孙吴之地。并出奇兵渡江袭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居要害之地，虚张声势，夺吴军心。待江陵成为孤城，其军心动摇后，晋军发起猛攻，一举破城。同时杜预认为临战敌我双方军情常变化多端，不应拘泥于开始时的战争部署。而要随机应变，以适应战情的发展。当灭吴之战的关键时刻，有人主张停战退兵。杜预力主乘胜进兵，认为“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⑤，结果如其所料。军中歌谣颂扬他：“以计代战一当万”⑥。史家称赞杜预“振长策而攻取，兼儒风而转战”⑦。其军事论述和战争实践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宝库。

---

①③④⑤⑥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②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载杜预上疏。

⑦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史臣曰。

二、刘裕事略及军事思想

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祖籍彭城，后迁居京口。史称其“家贫，有大志”①。刘裕最初入仕，任北府将领冠军将军孙无终司马。

隆安三年（399年），孙恩起义爆发，刘裕为北府名将前将军刘牢之参军，进剿义军。刘裕领兵军纪严明，屡次击败义军，表现其善于用兵，深为刘牢之所倚重。隆安五年（401年）六月，孙恩率舟师10余万进逼东晋京师建康，刘牢之屯兵东上，来不及回救。刘裕率将士倍道兼程赴援，以寡敌众，击败义军，以功封建武将军、下邳太守。卢循领导义军后，刘裕又于东阳、永嘉等郡击败义军，加彭城内史。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与刘毅、孟昶、何无忌等27人在京口和广陵两地起兵，讨伐篡晋的桓玄。刘裕率将士1000余人进兵建康，沿途亲临前线指挥，并执刀奋战，又巧施计谋，屡次击败数倍于己的敌军，一月之间便顺利地攻占建康，随后派刘毅等军攻取桓玄盘据的荆州（治今湖北荆沙）。义熙元年（405年），刘裕彻底平定桓玄之乱，以功晋升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和徐、青2州刺史。刘裕旋镇京口，改授都督扬、徐、荆等16州诸军事，领徐、兖2州刺史。至义熙三年（407年），刘裕入朝任侍中、车骑将军、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控制了东晋军政大权。

义熙五年（409年）三月，刘裕率军北伐南燕。临行，他对南燕主慕容超“进据临朐，退守广固”②的战略布置，作了正确的预料和分析，从而抓住战机，一举突入大岘山，出奇兵袭击，攻占敌军事要地临朐（今属山东），将敌困于广固（今山东青州西北）孤城之中。随即采用政治瓦解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吸收对

①②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方人才为己所用，终于攻破广固，灭掉南燕。在战术上，他针对北方骑兵强大的特点，采用车战遏制骑兵的冲击，又以步兵与骑兵配合协同作战，大获成功，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此后，刘裕回师救援将被卢循、徐道覆义军围攻的建康。他利用义军在战略上的迟疑不进，组建军队，加强建康城防，稳住阵脚，待敌兵疲将老，然后开始反攻，并抓住义军多水军不善步战，及其以短兵器为主要武器等弱点，派朱龄石、索邈等人所领长枪大马的鲜卑兵与之交战，终于击退义军，保住建康，进而全部消灭义军。以后几年内，刘裕又成功地消灭了政敌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几股政治势力，强化了自己的执政地位。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 年），刘裕再次率军北伐，进攻后秦。这次作战，在战略进攻上分两步，首先以前锋各路军队分进合击攻占洛阳；然后自己率大军北上，集中全部军力进攻后秦京师长安。同时在战略具体指挥上，他根据当时水运系统对己有利的条件，发挥东晋水军强大的优势，采用水陆联合并进的战术方针。当占领洛阳，夺取潼关后，他采用奇兵沿渭水从正面进攻，而以偏师从南面侧击，自己率主力为后继进攻长安。这些战略战术在灭秦实践中，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刘裕为了在政治军事上孤立后秦，也为了集中兵力灭秦，他对当时北方另一强敌北魏采取友好和解的策略，尽力不使与北魏的矛盾激化，同时也以相应布置预防不测。经过约一年的艰苦战斗，晋军终于灭掉了后秦。

刘裕历次的军事胜利，加之他实行了打击士族豪强，整顿吏治，减轻赋役，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政治经济革新，更提高了威望，其政治军事地位也不断的提高。在进军北伐后秦之前，刘裕受封为宋公，进位为相国，总百揆。元熙元年（419 年），刘裕进位为宋王。到元熙二年（420 年）六月，晋恭帝司马德文见大势已去，禅让帝位。刘裕登上皇帝的宝座后，建国号为宋，史称刘宋，刘裕是为宋武帝。从此，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代。

宋武帝刘裕是南朝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他执政时期，东晋南朝所辖区域最广，国势也

最为强盛。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故，终年60岁。

刘裕深明战争取胜与政权巩固的相互关系，当政后首先“蠲除苛政”①，实行一系列政治革新，使封建政权巩固，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为以后军事斗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的战争观是“匡世拨乱，安国宁民”②，以及“超大江而跨黄河，抚九江而复旧土”③，即通过战争保卫封建政权，实现全国的统一。对内平息战乱，翦除异己势力；对外消灭北方割据势力，便是其对战争观的实践。刘裕北伐，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先近后远，先灭燕而后灭秦。

刘裕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善于用兵，有驾驭战争的非凡能力。在战略指挥上，主张把握全局，知彼知己，料敌制胜，出奇用诈，避实击虚。在作战部署上，思虑周密，对攻击目标的先后，作战进行的各个阶段，后勤供应，以及战情可能发生的变化，都有精细的考虑和安排，并根据战情的发展，随时调整战略和作战部署。在战机选择上，常乘敌之危；在兵力部署上，利用正、奇、偏师，分进合击，配合作战，使敌顾此失彼，陷于被动。

他很重视兵种的配合和兵器的使用，从而在战争中创造有利条件，克制敌之优势。为了对付北方骑兵的强大攻势，他利用骑兵、步兵、水军、车军联合作战，特别是启用当时很少使用的数千辆幔车（防敌箭矢），组成方阵，车内战士使用大弩彭排，有力地扼制了敌人强大骑兵的冲击力和杀伤力。在南方作战，除多治水军，大舰重楼外，适时地使用北方具装铁骑冲垮敌军，表明其战略战术根据不同战争形势，灵活多变。临战选准主攻方向，力避腹背受敌，对强敌来攻，主张先固守养锐，待其粮尽兵疲时伺机破之；对逃敌则穷追不舍，防其逃窜，捣其巢穴，务求全歼。注重以智取胜，如偃旗息鼓，佯装虚弱；多置旗鼓，张扬兵势；伪传讯息，混敌视听。在战争胜负的紧急关头，常出奇兵从间道或

---

①③《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②《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毁敌之辎重，或突破敌军要地，从而使战情迅速向有利己方发展。又善于凭借天时、地利等条件，施计用谋，如乘风纵火，以水灌城，迂回伏击等。发动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斗争，如释放战俘，“抚纳降附，采拔贤俊”①，利用降臣劝降，以瓦解敌之军心。

刘裕善于统兵和治兵，常“被坚执锐，为士卒先”②，以鼓舞士气。强调以法治军，恩威兼施，体恤部众，军纪严明。灭后秦后，将缴获的金玉珍宝，尽赐将士；战士“殒身战场，幽没不反者，赡赐其家”③。他主张选才用将，不重资历，只要才堪领兵，即使资浅名轻，亦委以重任。不求全责备，对犯有过失者，避短用长。在他的统御下，一批名将脱颖而出，在其指挥的战争中大显身手，因而取得了多次著名重大战役的胜利。

三、石勒事略及军事思想

石勒（274～333），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族人，家世为羯族部落小帅。石勒成人后“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常代其父统领所部羯胡，“部胡爱信之”④。石勒小时贫寒，曾被掠卖为奴，后经主人放免为佃客。西晋末年，石勒招集王阳、郭敖等号称“十八骑”，参加各族人民起义。

东晋永安元年（304年），匈奴刘渊起兵称汉王。次年，成都王司马颖故将公师藩以司马颖被废为名，自称将军起兵护颖。于是石勒与牧师汲桑率数百骑投奔公师藩，攻略晋各地郡县。不久，公师藩、汲桑相继兵败被杀，石勒转投刘渊。此后，石勒以刘渊部将的名义，利用与刘渊军协同作战的有利条件，凭借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转战于黄河中下游及江淮地区，屡次击败西晋军队，其部众发展到10余万人。永嘉五年（311年），石勒率军歼灭

①② 《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③ 《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④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西晋太尉王衍率领的晋军主力10余万人，晋军主力被消灭殆尽。随后，他亲率精骑3万，与刘曜、王弥等合军攻下西晋京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攻下洛阳后，汉国主刘聪任命石勒为征东大将军，石勒固辞不受。不久，石勒设计杀掉暗中图谋害己的王弥，将其部众收编于自己麾下，其势力进一步壮大。永嘉六年（312年），石勒听从汉人谋主张宾之计，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开始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当时，幽州刺史王浚派遣督护王昌率军与鲜卑段疾六眷等共5万大军来攻襄国。石勒几次派军出战，皆大败而回，其部众极为恐惧。这时采取张宾的正确建议，设疑兵之计示敌以怯，然后以精兵从突门直冲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段末柸营，结果大获成功，生擒段末柸，杀伤对方将士无数，获铠马五千匹。众将皆欲杀掉段末柸，石勒说："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用矣"①。随后，石勒以段末柸为质请和，并遣侄儿石虎与段疾六眷结为兄弟，然后放还段末柸。石勒此计大见成效，"由是段氏专心附勒，王浚之势遂衰"②。石勒此举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为消灭王浚作了准备工作。建兴二年（314年），石勒乘王浚势力渐衰，其内部离心离德之机，先示己之弱麻痹王浚，然后亲率轻骑远道奔袭幽州（治今北京西南）成功，一举消灭王浚，攻占幽州。建兴四年（316年），石勒又设计大破并州刺史刘琨所派箕澹军，并进而攻占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大单于、赵王，建立后赵政权。随后，石勒先后攻灭占领幽州的鲜卑段氏和割据青州（治今山东淄博临淄北）的曹嶷等势力，全据冀、幽、并、青4州，其势力获得巨大发展。

石勒在四处转战的同时，还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赵国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建兴元年（313年），石勒"以司、冀渐宁，人

---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② 《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纪十》怀帝永嘉六年十二月。

始租赋”①。次年取得幽州后，又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赀二匹，租二斛”②。石勒改变以前横征暴敛的作法，改用固定的封建租调制度，这有利于统治区内农业生产的恢复。另外，石勒对于汉族士人采用拉拢的政策，使其为己所用。在石勒起兵不久，他就将汉人张宾引为幕僚，对其言听计从，号为“右侯”。同时将汉人中的“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③。汉国建立后，以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僚首”，并“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④。又“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⑤。此外，石勒在建国前后，还实行兴办学校、劝课农桑等。这一系列措施的实行，大大有利于其国力的增强及政权的稳定。

石勒建立政权后，其国势的大发展，必然与前赵相冲突，双方的决战势不可免。东晋咸和三年（328年），石勒与前赵主刘曜在洛阳展开决战。两军接战，石勒以石虎率精卒3万攻击刘曜中军，另遣大将石堪、石聪各率精骑8千冲击其前锋，自己亲披铠甲，另率4万大军夹击刘曜中军。经过激战，石勒大破前赵军，生擒刘曜。经此一战，石勒消灭了前赵军的主力，统一北方已是大势所趋。咸和四年（329年），石勒乘胜进军，肃清前赵残余势力，最终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石勒在灭亡前赵后，改称赵天王，行皇帝事，不久正式称皇帝。咸和八年（332年），石勒病卒，终年60岁。石勒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位由奴隶当皇帝的人，他是十六国前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石勒以奴隶出身，参加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成长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事统帅。他在25年的戎马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在战略指挥上，明显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304～312年）军事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推翻西晋王朝。主要锋

---

①②③《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④⑤《晋书》卷一百零五《石勒载记》下。

芒是针对西晋洛阳朝廷政权。开始时由于敌强己弱，因而在战略上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采取流动的作战方式。遇强敌则迂回转移，以避其锋，遇弱敌则一战而歼灭之，逐渐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后期（312～329年）当西晋主力军被消灭，洛阳朝廷政权灭亡后，石勒步骑发展为10多万大军，敌强己弱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军事斗争锋芒主要针对西晋地方割据势力。这时在战略上有个大转变，即由流动式的作战，改为占领襄国（今河北邢台）为政治军事中心，逐步向四周扩展，每攻城略地，设置守宰，统领甲兵，巩固占领区。

石勒根据新的军事斗争形势，实行了包括战略和政略方针在内的4个要点：第一、不再进行流寇式的作战，建立以襄国为国都的军事斗争的根据地，然后“以保万全、制天下”；第二、“广积粮储”，即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以提供军事斗争所必须的人力和物力；第三、“西禀平阳”，即尊崇匈奴刘汉政权，结成反晋同盟，以扩大己方军事斗争的实力；第四、军事斗争的主要锋芒，针对西晋地方割据势力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逐步将其消灭。这个战略和政略方针中建立根据地即政权，是军事斗争的根本任务，也是为了军事斗争有稳定的立脚之地，以便于后方支持前方战事；广积粮储使军事斗争建立在雄厚的物质基础之上；尊崇刘汉是使军事斗争不致孤立无援，因而前3条都是为了保证最后一条，也即从军事上彻底消灭王浚、刘琨，以完成统一关东地区的大业。石勒在第二阶段战争中，正是在这个正确的战略和政略思想指导下，不断地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作战的胜利。

石勒在战争中，广泛争取和使用人才，集有识之士为“君子营”，利用其为军事斗争服务。重视军事教育，培养军事人才，他的部属中出现一大批谋士、将领，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人才基础。并注重军队纪律，争取群众拥护，史称：“军无私掠，百姓怀之”①。

在兼并战争中，石勒主张利用矛盾，分化敌人，避实击虚，声

---

①《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东击西，或击敌要害，诡道取胜。临战以谋制敌，变化无方，遇联合之敌，则以金宝间敌离散，各个击破；遇围攻之敌，则乘敌远来，兵疲力竭，用奇兵击其精锐；或卑辞骄敌，伪示怯弱，乘敌懈怠而奇袭之；或诱敌轻进，设伏夹击；或舍弃辎重，轻骑奔袭；如战争形势不利，则知难而退，保存军事实力，体现其根据敌情灵活用兵的思想。其劲敌刘琨推崇他："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①。石勒是少数民族出身的一位著名军事指挥家。

四、崔浩事略及军事思想

崔浩（381～450），字伯渊，清河东武城（今属山东）人，出身于北方高门士族清河崔氏，其父玄伯明元帝朝拜天部大人、白马公，居门下，掌机要，深得明元帝宠信。崔浩自幼"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②。20 岁时入仕为直郎，后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 3 朝。

明元帝时，崔浩任博士祭酒，始参军国大事。刘裕假道伐后秦，群臣以为"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③。崔浩反对说：纵使刘裕灭后秦，悬远难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两虎相斗而收长久之利，此为上策。明元帝迫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为裕将朱超石所败。明元帝恨不用浩计。刘裕前军至潼关，明元帝问浩："以卿观之，事得济否？"浩对曰："以臣观之，克之必矣"④。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虽灭后秦，但不能长守，"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边，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⑤。后终如浩所料，浩深得明元帝信任，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出浩手。刘

---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②③④⑤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裕死，明元帝欲南伐。浩曰："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明元帝不从浩言，议南伐"先攻城也？先略地也？"诸将请先攻城，浩曰："南人长于守城……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①。奚斤等率兵过黄河，先攻滑台，经时不拔，表请援军。明元帝大怒，亲自南巡，并拜浩为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太武帝即位，崔浩任太常卿，仍参决军国大计。自此以后，崔浩力主进兵，并亲随太武帝远征。当魏军与夏军在统万城外决战时，会大风雨从东南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②，劝太武帝退军，崔浩反对退军，主张"宜分军隐出，掩击不意"③。太武帝从其计，一战攻克统万。当太武帝谋划进攻柔然时，内外大臣又都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崔浩又力排众议，坚持立即进军，并为太武帝规划了以轻骑远袭、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具体作战方略。针对朝臣以刘宋会乘虚来攻为由，崔浩正确分析了南北形势，认为刘宋不会来攻，力劝太武帝按计划进攻柔然，后来事态的发展不出崔浩所料。神䴥三年（430年），太武帝准备进兵消灭大夏的残余势力，北魏群臣认为南朝刘宋军队正集结于黄河一线，如其乘虚北进，北魏将会失去东部地区，太武帝为此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根据敌军态势，认为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度意"④。太武帝听后疑虑顿消，出兵一举消灭大夏残余势力。事后，遂迁升浩为司徒。太武帝讨伐北凉时，大臣李顺、奚斤等30余人以凉州没有水草为由阻挠，崔浩凭借其丰富的学识，引史实予以驳斥。太武帝采纳崔浩之议进兵，一举灭亡北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而凉州正如崔浩所说：水草丰美。北魏正是利用凉州到河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建立了河西大牧场，发展畜牧业生产。

崔浩学识渊博，天文、历法、史学，无所不通。北魏初期，朝廷刑律和典章制度，逐渐吸收汉族封建文化，多为崔浩所谋，从

---

①②③④《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而受到保守的鲜卑贵族们的忌恨。当太武帝命浩率大臣高允等人修撰北魏《国史》时，鲜卑大臣们利用此事陷害崔浩。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以修《国史》“尽述国事，备而不典”①，即暴露鲜卑贵族前期“国恶”的罪名被杀，时年70岁。

崔浩在军事上运筹帷幄，为北魏统一北方大业立下了丰功伟绩。太武帝曾向人介绍说：崔浩“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②。又说：“朕……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③。崔浩作为军事家，其军事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天时、地利、人事三位一体而以人事为先的战争胜负观。他多次论述战争时，总是从天时、地利、人事三方面作综合考察，以论证战争的胜败，预测战争的发展规律。他讲天时，着重于季节转变、寒暑移易、风晴雨雪等气候变化，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对战争胜败的影响。关于地利，指出舟行利于南方水军，平原和水草茂美处利于北方骑兵，浩翰沙漠利于轻骑长途袭击等。崔浩认为战争的胜败，主要决定于人事。他说：“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④。主张命将出师，乘衅伐敌，如敌人“强臣争权，变难必起”，“刑政残虐，人神所弃，宜先讨之”⑤。灭北凉前，崔浩指出：“牧健（北凉主）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⑥，结果一战成功。可见崔浩所论人事，包括敌我双方政治的稳定和动荡，最高统帅的指挥才能，物力和兵力的强弱，以及民心的向背等诸多主客观条件。

在北魏国势发展过程中，崔浩提出先北后南的战略思想，主张先消灭北方割据势力，完成北方的统一，再向南发展。他在辅佐太武帝时期，北魏西有大夏、北凉，北有柔然，东有北燕，如轻率南伐，随时皆有两面受敌的危险。因而在北方统一前，他主张对南方应采取息民备边，不轻率冒进的方针。关于北魏对外用兵几次关键性的战略决策，如始光三年（426年）大夏、刘宋伐谁

---

①②③④⑥《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⑤《魏书》卷二十五《长孙嵩传》载崔浩语。

为先，崔浩极力主张先伐大夏，结果魏军占长安，平统万，大夏很快衰亡。又如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北凉，群臣皆反对，唯独崔浩赞同，结果魏军大胜，消灭北凉，统一了北方。当北魏统一北方后，崔浩谋伐柔然，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征柔然，结果大败柔然，使其元气大伤，以后北魏便集中兵力对付刘宋。崔浩先北后南的主张，不仅避免了北魏两面受敌，而且有利于集中力量统一北方，加快了统一北方的步伐。

在战术指挥上，崔浩主张充分发挥骑兵的战斗优势，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战术。对南方善于守城之敌，采取“分军略地”，使“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避免长期攻城不下，“挫损军势”①；对北方骑兵之敌，常采取轻骑远程奔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敌“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②。对北方柔然，针对其游牧民族迁徙无常的特点，或乘其冬季避寒，南来寇抄，设伏迎头痛击；或利用夏天柔然“散众放牧”③，采取闪电战突袭其畜群庐落，敌人必惊慌失措，从而歼灭之。此外，还采取坐观成败，使两虎斗而收长久之利；或拆散敌盟，攻其薄弱；或“击蛇先击其头”等战术方针。充分表现其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变化多端，以谋取胜的作战用兵原则。崔浩的军事论述，是继承汉族传统军事思想并总结北方少数民族骑兵战争实践二者相结合的产物，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④

五、宇文泰事略及军事思想

宇文泰（507～556），字黑獭，北魏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鲜卑族人。北魏末年，宇文泰随其父宇文肱参加起义军，后归降尔朱荣。永安三年（530年），宇文泰随尔朱荣部将贺拔岳至

①②③《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④ 参考黎虎《崔浩军事思想述论》，载《北朝研究》总第3期。

关中进攻关陇起义军。贺拔岳死后，宇文泰代统其众，后遂以这支军队割据关陇地区。永熙三年（534年），魏孝武帝元修西奔关中，宇文泰奉迎他迁都长安，建立西魏，自己以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的身份执掌朝政。

西魏建立后，与东魏东西对峙，二者之间进行了长达10年的兼并战争。东魏地大物博，军事力量雄厚，执政者高欢意欲吞并西魏，屡向西魏发动进攻。宇文泰以不足10万人的军队与东魏20万左右的军事力量抗衡，毫无畏惧。他利用东魏军骄傲轻敌的弱点，先后取得潼关、沙苑等作战的胜利，歼灭东魏大量精锐部队。由于西魏军事力量寡弱，宇文泰征召汉人为兵，由当地大族人物统领。为协调胡汉关系，密切主将与士兵的联系，提高士兵地位，以加强战斗力，宇文泰于大统十六年（550年）实行府兵制。府兵制采取拓跋部早期部落兵的形式，“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①。即统兵官不论汉人还是其他族人，一律赐以鲜卑旧姓，其所统兵士亦从主帅改姓。府兵的建制仿照拓跋部早期八部之制设八柱国大将军，宇文泰自己为八柱国之首，总领府兵，实为府兵统帅。另一柱国元欣仅挂虚名，实际统兵官为六柱国，这又是沿袭周官“六军”之制。六柱国之下设各种名号将军分统部众，总兵力近5万人。宇文泰创建的府兵制改变了北魏后期以来士兵地位低贱状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后来周武帝在此基础上扩大府兵建制，成为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的军事基础。而府兵这种军制，更直接为后来的隋唐所继承。

宇文泰在与东魏对抗的同时，又制定并实施了向西向南扩展的战略。魏废帝二年（553年），宇文泰派遣大将军尉迟迥率骑兵2万出散关（今陕西宝鸡市南），讨伐占据四川的南朝梁武陵王萧纪。是年八月，攻克成都。魏恭帝元年（554年）十月，又派遣柱国于谨、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韦孝宽等率步骑5万，征讨定都于江陵（今属湖北荆州）的南朝萧梁政权。十一月，西魏

---

①《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军攻陷江陵，擒杀梁元帝萧绎。此外，宇文泰还在魏废帝二年（553年）四月，亲率精骑3万西征，渡过金城河，一直打到姑臧（今甘肃武威），使吐谷浑深为震惧，遣使请和。经过一系列征伐，西魏的疆土向西扩至河西走廊，向南控制长江中上游。

宇文泰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锐意革新、励精图治的执政者。他初居相位之时，就“命所司斟酌今古，参考变通，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为二十四条新制，奏魏帝行之”①。他任用关中大族苏绰进行改革。苏绰起草的“六条诏书”，提出“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深受宇文泰的赏识，被他视为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纲领。宇文泰不仅将“六条诏书”常置于左右，而且“令百官习诵之”。并规定“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②。

在经济上，宇文泰在关中地区实行均田法，规定人丁给田100亩，有室者给田140亩。此外，还按照人口的多寡不同，每家给宅田5至3亩。在均田的基础上，还制定了赋役的征收标准，并规定“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征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③。此外，徭役也有所减轻。首先，服役人的年龄定为18至59岁，这比南朝男子服役年限有所缩短。其次，对每年服役期限也作了具体规定：“丰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凡起徒役，无过家一人。其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从役，百年者，家不从役。废疾非人不养者，一人不从役”④。这些措施及规定，对于发展生产，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无疑都有很大好处。

宇文泰虽然出身于六镇鲜卑，但他执掌西魏政权后，却能够热心于中原汉族文化，崇尚儒学。史载宇文泰“雅好经术，求阙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载，黜魏、晋之制度，复姬旦之茂典”⑤。他执掌朝政

---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② 《周书》卷二十三《苏绰传》。

③④ 《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

⑤ 《周书》卷四十五《儒林传序》。

后，立太学，并亲自把年幼有才学的汉人李昶送进太学学习。宇文泰还在行台省置学，“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务，晚就讲习，先《六经》，后子史”①。他还在学生中挑选德行淳美者，侍奉自己读书。薛慎、李璨、李伯良、辛韶、苏衡、夏侯裕、梁旷、梁礼、长孙璋、裴举、薛同、郑朝等12人都被选为奉读者。

西魏同东魏一样，都是六镇鲜卑酋帅南下中原建立的政权，因此，宇文泰也面临着如何解决鲜卑与汉族之间的矛盾的问题。在这方面，宇文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不仅用府兵制将鲜卑与汉人从制度方面联系在一起，而以其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有才干的汉人。如苏绰、卢辩，是帮助他制定国策的汉族人物，赵贵、李虎、李弼、杨忠、王雄、李远等是分统府兵的汉人将领。这些人在帮助宇文泰建立文治武功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病卒于北巡途中，终年52岁。他是北朝后期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宇文泰是西魏最高军事统帅，在同东魏著名军事家高欢的长期军事对抗中，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表现出驾驭战争发展规律的能力。他在起兵之初，便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战略和政略方针，其要点如下：第一、走秦汉统一天下的老路，逐步控制关中和秦陇地区，据其要害，作为军事斗争的策源地；第二，利用关中平原肥沃的土地，西南可扩展巴蜀之地，北进可发展畜牧业经济，积蓄物质力量；第三、招揽英雄，组成关陇军事集团，以观时变；第四、乘魏帝受“群凶”（指尔朱氏和高欢）挟持，迎其西迁，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与东魏高欢对峙，再待机实现北方的统一②。

宇文泰深知军事斗争的胜利，离不开政权建设和经济实力，因而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整顿吏治，“位不虚加，禄不妄赐”③，并严格推行均田制，使西魏政治清明，经济发展，人民生

---

① 《周书》卷三十五《薛善附薛慎传》。

② 按《周书·于谨传》谨献策与宇文泰向贺拔岳献策颇相似，故被纳。

③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活安宁，这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力量。他按照既定的战略和政略方针，在与东魏10年的战争中，运筹帷幄，胜多败少，从而使西魏由弱变强，其整体实力逐步超过了东魏，为北周的建立和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在作战指导上，他主张审时度势，因情定策，出奇制胜。对于数路进攻之敌，主张先击败要害之敌，挫伤敌人的士气，进而获取全胜。在敌强己弱的形势下，主张先避其锋芒，然后伺机歼敌。他善于利用敌之骄横、轻进，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或设伏克敌，或乘夜歼敌，从而以取得战役的全胜。对待俘虏，主张“释而用之”①。在沙苑之战中，即将俘获的东魏军选留2万以扩充军力，收到了“皆得其死力”②的效果。

宇文泰重视军队的建设和控制，以鲜卑原有的氏族制加强官兵关系，提高士兵地位，在实行均田制经济基础上创立府兵制，在形式上采取鲜卑八部大人制和周官“六军”之制，设立6个柱国大将军，他以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名义总领全军。同时，注意团结拉拢汉族上层，“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③，扩大兵源。府兵制一直延续到唐朝天宝年间，存在近200年，在中国古代兵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宇文泰重视以法治军，恩威并用，严格执行军令：“无贪财以轻敌，无暴民以作威，用命则有赏，不用命则有戮”④。史称其行军布阵，“法令齐肃，赏罚严明”，“狄毫无犯，百姓大悦”⑤。平侯莫陈悦后，“财物山积，皆以赏士卒，毫厘无所取”⑥，从而加强了军队的积极性和战斗力。宇文泰的用兵和治兵思想，是在汉族军事理论和鲜卑族军事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宝库。

第二节　战争谋略

由于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兼并战争十分激烈，因而这个时

---

①②③④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⑤⑥ 《周书》卷一《文帝纪》上。

期涌现的军事家较多，除上述5位著名者外，还有谢安、谢玄、王猛、拓跋焘、高欢、宇文邕诸人。他们在指挥战胜强敌的许多次重大作战中，展现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场面，无不体现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战争谋略，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值得我们去分析总结。

一、因势决策、料敌制胜的谋略

《孙子兵法·虚实》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作战中，交战双方都在争取优势和主动，战情常常瞬息万变，这就要求指挥者知彼知己和随机应变，从而因情定策，料敌制胜。如东晋太元八年（383年）的淝水之战，在开始时谢石等本"谋不战以疲之"① 的防御战方针。当朱序报告敌情，并提出不待敌军各路齐集，先发制人，攻敌前锋，挫其锐气，"可以得志"的策略后②，谢玄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改防御战为进攻战，转守为攻。晋军夜袭洛涧成功后，沿淮水西进，与秦军夹淝水而阵。这时苻坚亲临前线，秦军30余万，晋军8万，仍处于劣势，只能采用智取。谢玄为了制造有利战机，遣使向苻融说："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③ 谢玄面对强敌，何以如此从容镇静，指挥若定？因为他深知，秦军长年征战，兵士疲惫，敌前锋5万人大败，主将被杀，锐气受挫，有畏怯情绪，加之敌军将帅对伐晋意见颇不一致，因而在退却中易生变故，从而有可能出现战机。苻坚等则认为："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④。由于上述诸种原因，秦军听到退军的命令，便奔溃不可复止，战机果然出现。谢玄、谢琰、桓伊等抓

---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

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卷八十一《朱序传》。

③④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住战机，迅速引兵渡河猛击秦军，秦军自相惊扰，争着逃命，全线大溃。实际上，淝水之战是谢玄等统帅临战因情定策，制造战机，以谋略而取胜的。

东晋义熙十三年（417 年）七月，刘裕伐后秦第二阶段的战略指挥，先派两支偏师，进行两翼侧击，刘裕率主力从潼关直取长安。晋军南路沈田子军大胜姚泓军，而北路朱超石军却被秦军击败，退回潼关。晋军两翼一胜一败，使战争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此时，王镇恶向刘裕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愿乘敌不备，自率水军由黄河入渭水，逆水而上，直袭长安。刘裕当即采纳，王镇恶一路夺关斩将，进展顺利。刘裕大军也积极配合，从潼关向长安方向推进。王镇恶军至渭桥，舍舟登陆，所乘小舟被水冲走。镇恶激励将士，只有拼死杀敌，方可死里求生。晋军腾跃争先，奋力杀敌，大败后秦军，一战而夺得长安。在第二阶段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刘裕对原先的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使正兵和奇兵的任务发生颠倒，变成了以正军牵制敌人，而以奇兵进渭水，对敌进行突然袭击。这种战法，正符合《孙子兵法·兵势》所谓“以正合，以奇胜”的用兵原则。

北魏始光四年（427 年）进攻大夏京都统万城，太武帝以将军贺多罗率 3000 精骑为前候，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率 3 万骑兵为前驱，常山王拓拔素率 3 万步兵为后继，南阳王伏真率 3 万步兵运送攻城器具。当魏军抵达拔邻山（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后，太武帝以大夏京都统万城坚难破，决定采取诱敌出城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命诸军就地筑城，留辎重大兵和攻具于此，太武帝亲率 3 万轻骑先行。诸将认为：骑兵应与步兵和攻具等同进。太武帝说：如以步骑攻具俱进，敌军便会惧我而坚守不出，统万城坚一时难以攻破。不如改以轻骑直抵其城，敌军见我只有骑兵，便会松懈大意，我再示之以弱形，这样敌必出战。显然，太武帝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引诱敌人离开坚城，在野战中加以歼灭。魏轻骑至统万城，分军埋伏于山谷，以少数军队攻城。这时夏将狄子玉降魏，说夏主赫连昌准备坚守统万，以待援军。太武帝当即命令退

师，以诱夏军。赫连昌见魏军退走，又听说魏军粮尽，辎重在后，步兵未至，遂率3万步骑出击魏军。太武帝命魏军佯退，夏军分两翼追击。此时，崔浩建议分兵出敌后，击其不备。太武帝从之，分兵潜从敌后袭击夏军，双方展开激战，夏军大败，死者万余人，赫连昌败走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军一举攻克统万城，获大夏王公妃嫔万余人，马30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大夏从此走向衰落。

东西魏之间的兼并战争，高欢与宇文泰两雄相争，曾多次出现斗智斗勇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但在审时度势，奇谋妙算上，宇文泰要略胜高欢一筹。如东魏天平三年（536年）著名的潼关之战，东魏发兵10万进攻西魏。高欢以高敖曹率军攻洛州（治今陕西商州），窦泰率精卒万余直趋潼关，自率主力部队进屯蒲坂（今山西永济西）。次年正月，宇文泰出兵广阳，准备与高欢主力军对阵。高欢于黄河上架浮桥3座，作出准备渡河进入渭水的态势，目的在于制造假象，迷惑西魏军，以掩护窦泰军攻取潼关。宇文泰认真分析敌情后，识破高欢的战略意图，认为如在正面“久与（高欢军）相持，其计得行，非良策也”①。他决定对高欢主力军采取守势，而潜袭窦泰军。窦泰是东魏猛将，常为前锋，其部下士卒精锐，每战多捷。宇文泰利用其“屡胜而骄”的弱点，对其突然袭击，只要击败窦泰军，则高欢的战略意图必将破产。诸将皆曰：“贼在近（指高欢主力军），捨而远袭，事若蹉跌，悔无及也”②。泰回答说：高欢大兵屯蒲坂，且装作造桥欲渡，他必以为我当对付其主力，不会率兵远袭。他“又狃于得志（指欢消灭尔朱氏，挟持魏帝），有轻我之心。乘此击之，何往不克”③。泰于是声言退军长安，以保陇右，却亲率精锐潜出小关（今陕西潼关之东）袭击窦泰军。窦泰意想不到西魏军突然出现，仓惶应战，欲依山为阵，阵势未成，西魏军猛烈冲击，东魏军大败，尽俘其众万余人，窦泰自杀。高欢只好拆浮桥撤军，高敖曹一路也只得焚辎重退兵。

再如沙苑之战。东魏天平四年（537年）闰九月，高欢为雪潼

---

①②③《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关失败之耻，再次征伐西魏，命高敖曹将兵3万攻弘农（治今河南灵宝东北），自率大军20万从蒲坂渡过黄河，又过洛水，屯兵于许原（在洛水之南）。十月，宇文泰闻高欢20万大军压境，急速征诸州兵齐集迎战。诸将“咸以众寡不敌，请待（高）欢更西，以观其势”①。宇文泰认为，若高欢兵至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情骚动，对我不利，不如及其新至，立脚未稳，击之易于取胜。于是不等州兵齐集，主动出击，亲率轻骑，架浮桥渡渭水进至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渭二水间）。此时大将李弼向宇文泰建议说：敌众我寡，不能平地布阵，可往东10里渭曲处，据此以伏击敌军。宇文泰从之。西魏军进至东10里渭曲处，将军队编成左右两个方阵，分由赵贵、李弼率领，在渭曲背水布阵，令将士偃戈伏于芦苇之中，严阵以待。高欢自恃兵多将广，骄傲轻敌，当两军交战，东魏军见西魏军人少，争相竞进，行列大乱，西魏军伏兵乘势奋起攻击，左右两方阵将东魏军主力横截为二，东魏军大败，损失甲士8万余人，铠仗18万。当西魏军已击败东魏军后，各路州军方才陆续到齐。如开始时必等州军到齐迎战，便会贻误战机。高欢大军一旦深入腹地，人心震动，西魏军处于被动地位，战势的发展就很难逆料了。上述东西魏之间两次作战西魏的胜利，都是宇文泰知彼知己，奇谋妙算，及时抓住战机所取得的。

北周建德五年（576年）伐齐之战，周武帝决定主攻方向为晋州（治平阳，今山西临汾），扼其咽喉，齐军必来救援，周军好集中兵力一举消灭来援之敌，然后乘势东进，直指北齐京都邺城。当周军攻晋州时，北齐后主高纬果然率大军10万救晋州。当北周军迅速攻下平阳后，北齐大军已接近平阳。周武帝以齐军始至，其兵锋正盛，为避其锐气，便留精兵一万守平阳，命令全军退至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一带，以逸待劳。当齐军久攻平阳不下，兵士懈怠时，周武帝认为与齐军决战的时机成熟，便率大军8万返回平阳，两军经过激战，周军大胜，齐军大败，死者万余人，军

---

① 《周书》卷二《文帝纪》下。

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以后周兵节节胜利，北齐终于被灭。这次作战西魏军的胜利，乃是周武帝料敌制胜，避实击虚，以智取胜的典范。

二、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的谋略

《孙子兵法·始计》说：“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两军相战中，彼此都千方百计地想打败并消灭对方，因而临战要虚实相兼，出奇制胜。如西晋永嘉六年（312 年），石勒在指挥襄国保卫战中，当时强敌鲜卑段疾陆眷及其从弟段末柸率 5 万骑兵压境，石勒听从张宾的谋略，先向敌示弱，待其懈怠，并暗中在北城修凿“突门”20 余道，等敌靠近城墙而又列阵未稳时，石勒军出其不意，从突门杀出，径直冲杀鲜卑精锐部队末柸营，鲜卑兵毫无准备，结果末杯被擒，石勒军大获全胜。前秦建元六年（370 年），王猛灭前燕之战，前秦军 6 万，前燕军 30 万相拒于潞川（今山西浊漳河）。王猛面对 5 倍于己的敌人，沉着镇静，派奇兵 5000 乘夜从间道出燕军营后，烧其辎重，燕军恐惧。王猛乘势督师向燕军发起总攻，一战俘斩燕军 5 万余人，燕军怯退。王猛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乘胜追击，又俘斩敌军 10 余万人，燕军全线崩溃，主帅慕容评单骑逃回邺城，此战决定了前燕的灭亡。东晋太元八年（383 年）的淝水之战，当晋军决定改防守战为进攻战后，当时秦军梁成、王坚率 5 万大军进屯洛涧，并在洛涧入淮口（洛口）处树立木栅，封住淮水，晋军被阻在离洛涧东 25 里处驻营。晋军要进攻秦军，首先必须攻破洛涧，打通由淮水向西的通道。此时，谢玄派先锋刘牢之带领北府精卒 5000，乘秦军不备，夜袭洛涧，阵斩秦主将梁成，歼敌 1.5 万人。晋军在洛涧首战告捷，不仅打通了西进的水道，而且挫伤秦军锐气，为以后的淝水大捷创造了条件。

东晋义熙五年（409 年）刘裕灭南燕之战，双方大军在临朐（今山东临朐东）南数百里处展开激战，天已过午，胜负未分。在

此紧急时刻，刘裕参军胡藩献计说：燕军悉兵出战，临朐必然空虚，请以奇兵从间道袭取临朐，此乃韩信破赵之策。刘裕当即采纳，命胡藩、檀韶等潜师出燕军后，直取临朐，诡称自海道至此。临朐防守空虚，被晋军一举攻克。南燕主慕容超单骑南逃至段晖营，燕军知后方要镇临朐被晋军占领，惊恐万状。刘裕军乘势纵兵奋击，燕军大败，慕容超率残部逃回广固，困守小城，等待灭亡。北魏普泰二年（532 年），高欢同尔朱氏的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之战，高欢采取打蛇击其头的作战方法，集中兵力攻击尔朱兆军，又以精骑横冲敌军，在双方战斗异常激烈难分胜负之际，高欢派奇兵从间道绕到尔朱兆军背后袭击，尔朱兆防不及此，阵势大乱，高欢军乘势猛攻，兆军大败，其他各路军也随之溃散。

这 5 次作战胜利一方的指挥者，都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派奇兵袭击敌人的要害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①，从而最后战胜敌人。

三、“以十击一”、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谋略

《孙子兵法·虚实》说：“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这是讲，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如后赵太和元年（328 年），当石勒决定在洛阳与刘曜决战后，调集各路军队共约 10 万人，并亲临前线指挥。前赵刘曜将围洛阳金墉城的 10 万大军后撤至洛阳以西，布防在南北 10 余里战线上。石勒乘刘曜军久征疲惫，兵力分散的弱点，决定采取以优势兵力，实行中央突破的作战方针。他命石堪、石聪各率精骑 8000，攻击刘曜的前锋，命石虎率 3 万大军攻击刘曜中军，自己率主力步骑 4 万与石虎军共同夹击刘曜中军。石勒主力军与石虎的军队共约 7 万

---

① 《孙子兵法·始计》。

人，在数量上绝对超过刘曜的中军，而且石勒主力军为初战之锐卒，击刘曜久战之疲兵，就更加处于优势。石勒深知兵贵神速，其部队出战，不经过列阵，在行进间直接发起进攻，使敌措手不及，因而这一战役不仅前赵军惨败，被斩首5万余级，并临阵活捉前赵主刘曜。此后，前赵走向灭亡，后赵统一了北方。

前秦建元五年(369年)，王猛灭前燕之战，前秦两路大军，同时进发：王猛率主力，出上党（今山西长治东北），直趋邺城；镇南将军杨安率领一支偏师，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既牵制敌军，又掩护主力军的北侧，王猛军进展顺利，攻克壶关（上党郡西），擒上党太守慕容越，所过郡县，皆望风降附，前燕举国震动。但杨安一军，却在晋阳受阻，攻城月余未下。王猛恐北翼受到威胁，毅然留屯骑校尉苟苌守壶关，亲率主力增援杨安，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晋阳。王猛至晋阳后，两支大军很快攻破晋阳。晋阳的攻破，为下一步的潞川决战，解除了后顾之忧，保证了潞川决战的胜利。

东晋义熙六年(410年)，卢循、徐道覆起义军从广州北伐，分为两路，东路军由徐道覆率领，西路军由卢循率领。东路军节节胜利，当击杀晋镇南将军何无忌后，接着，晋抚军将军刘毅率重兵南下，决定与义军决一胜负。徐道覆闻讯，飞报卢循，建议他停止进攻江陵（今属湖北荆州），与自己会师，以优势兵力进击刘毅军。卢循采纳了这个作战方针，即日从巴陵（今湖南岳阳）顺江而下，两军会合，“有戎卒十万，舳舻千计”，声势浩大。义军与刘毅军在桑落洲（今江西九江市东北长江中）决战，在义军强大军力攻势下，晋军土崩瓦解，“死亡什八七”，刘毅仅带着数百名残卒逃走。

萧梁承圣元年（552年），陈霸先、王僧辩联军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附近石头城西北与侯景军的最后决战中，联军根据陈霸先提出的“我众贼寡，应分其兵势，以强制弱”① 的作战原则，在

---

①《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四《梁纪二十》元帝承圣元年三月。

石头城西北筑 8 城，以分散并牵制敌军。然后联军陈霸先军在前，王僧辩军居后，与侯景军在石头城西北展开激战，在联军的优势兵力攻击下，侯景军彻底失败，持续 4 年之久的侯景之乱终于被平息。

四、千里奇袭、一战成功的谋略

西晋末年，盘据幽州（治今北京西南）的王浚，为政苛暴，赋敛无度，境内民怨沸腾，鲜卑、乌桓也相继叛离，势力日渐衰弱。石勒深知王浚政治腐败，利用其想废晋自立的野心，上表劝进，盛赞王浚的“功德”，希望他早登帝位，自己愿竭诚拥戴。当王浚使者来到襄国，石勒大礼相迎，用老弱残兵和空虚府库让使者观看，随后又修书给王浚，声称自己将于三月中旬至幽州，尊王浚为帝。王浚使者回幽州后说：石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①。石勒制造这一切假象，意在迷惑王浚，使其判断失误，信以为真，从而使他放松了对自己的戒备。石勒于西晋建兴二年（314 年）春，从襄国率领一支轻骑兵，秘密地向幽州进发。三月，军过易水，守将告急，王浚部下劝其出兵阻击，王浚不允。四月初，石勒军至蓟城（在今北京西南），千里悬军，奇袭幽州，一战成功，俘斩王浚，夺取了幽州，为他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

又如北魏登国十年（395 年）冬，魏主拓拔珪指挥的参合陂之战，乃是一次最典型的千里奇袭战。当年夏，后燕主慕容垂遣其子慕容宝等率军 10 万伐魏。七月，魏谋士张衮向魏主献策说：燕军屡胜，倾全国兵力来犯，有轻我之心，应退师示弱以骄敌，然后可以取胜。拓拔珪采纳其计，“悉徙部落畜产，西渡河（指渡黄河河套西走）千余里以避之”②。燕军据五原（今属内蒙古），进军

① 《晋书》卷一百零四《石勒载记》上。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八《晋纪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七月。

临河（指河套地区），造船欲渡河追击魏军。至八月，魏主知燕军数月不得交锋，兵疲将老，且骄傲轻敌，便急速回军，准备反攻。并派略阳公拓跋遵率精骑7万，截断燕军归路。燕术士靳安劝宝急速退兵，否则将大败。宝不从，延误到冬十月，燕军方烧船夜遁。当时黄河水未结冰，宝以魏军必不能渡，不设后备。11月，暴风寒，黄河水结冰，魏主引兵渡河，知燕军已远去，留下辎重大兵，选轻骑2万急追。燕军至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东北岱海），在沙门支昙猛的固请下，宝遣慕容麟率骑兵3万"居军后，以备魏"。麟与宝有隙而欲宝兵败，故未作准备。魏军昼夜兼行，至参合陂追及燕军。燕军正向东撤退，突然见到魏军，士卒惊慌扰乱，魏主纵兵大击，燕军毫无戒备，争赴水死者以万数。略阳公遵截断燕军归路，"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擒"①，其逃走者不过数千人。慕容宝等单骑逃回。这次作战魏主拓拔珪先纵深千里撤退以示弱，诱燕军深入，并使其骄傲轻敌。当燕军将老兵疲撤退时，魏主又千里回军，派少数轻骑昼夜穷追，突然发起攻击。燕军毫无准备，全军覆灭。这正合《孙子兵法·军争》："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作战谋略。

再如北魏在统一中原的战争中，北方游牧民族柔然可汗，经常率大军南下骚扰，给北魏造成威胁。柔然军为快速骑兵部队，行动迅速，每当北魏军北上抗击时，它又向北远逃，魏军常无功而返。北魏神䴥二年（429年）四月，太武帝与长孙翰从东西两路夹击柔然。太武帝听从崔浩提出的"攻其不备……可一举而灭"②的战法，兵至沙漠，留下辎重，"轻骑兼马（每个战士两匹马）"③，进袭柔然。魏军远程奔袭至栗水（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南），柔然纥升盖可汗未设防备，民畜遍野，突见魏军，皆惊怖散去，可汗焚烧庐舍，狼狈西逃。可汗之弟匹黎主管东部柔然，闻讯率兵西进，欲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八《晋纪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十一月。

②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

③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救其兄，被长孙翰击败。柔然部落四散，躲入山谷，杂畜遍野，无人收管。太武帝分军深入山谷搜讨，进军东西5000里，南北3000里，斩俘甚众。柔然部落降者30余万，魏军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无数，柔然损失惨重，一时无力南下扰边。魏太武帝针对柔然行军的特点，运用闪电般的快速突袭战，千里远程奔袭，一战成功，大获全胜。

战争既是交战双方物质力量的竞赛，也是运用智谋的较量，上述长远整体战略方针或每次战役的胜利，都是军事家们正确军事思想和谋略在战争实践中的体现。在一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临战充分发挥将领指导战争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夺取战争胜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以上战略指挥角度分述的16次作战中的18例证，充分体现了两晋南北朝军事家们有关用兵作战的军事思想和谋略，归根结底，就是善于根据战场上错综复杂的变化情况，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审时度势，因势决策，料敌制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以众击寡，避实击虚，奇正相兼，应变出奇，千里奇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等一系列军事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从而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场面。他们不仅为古代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战例，而且有所创造和发挥。尤其是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骑兵的大发展，骑兵在战术上两翼包围，中间突破、侧击、伏击、横截外，轻骑千里奇袭的战例曾多次出现。这些都是在新形势下对战略战术的创新，可以说，这个时期杰出的军事家们为古代军事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十九章　各代名将事略

第一节　两晋名将事略

一、羊祜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人，其家累世高官。羊祜12岁丧父，事叔父甚谨。祜为东汉名儒蔡邕外孙，自幼深受儒学熏陶，长大后博学有文才。

曹魏末年，羊祜入仕为中书侍郎，后历任给事中、黄门郎、秘书监等职。魏景元五年（264年），出任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成为司马氏的亲信大臣，后迁中领军，统率中军，“入直殿中，执兵之要”①，深得司马氏信任。

西晋建立，羊祜以佐命之功，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随之迁任尚书左仆射、卫将军。泰始五年（269年），晋武帝密谋伐吴，以羊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率重兵8万出镇襄阳（今湖北襄樊）。羊祜在荆州，以灭吴为志，“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②。他暗地对吴人进行攻心怀柔政策，在边境减少戍卒，对吴人待之以礼，其降者去就从便，吴人悦服。祜与吴名将陆抗戍地相连，抗称颂祜之美德说：“诸葛孔明不能过也”③。羊祜派兵士垦田800余顷，最后军粮有10年之储，为灭吴作了经济上的准备。咸宁二年（276年），羊祜向晋武帝献灭吴之策，其主要谋略为利用步兵和水军联合作战，数路并进，突破长江天堑，然后合围建业，使吴国首尾不能相顾。他知彼知己，从分析晋、吴双方政治、

---

①②③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经济和军事形势出发，对灭吴时机、敌我军事优劣、战略计划以及战争必胜等，均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力谏晋武帝尽快进兵灭吴，统一全国。此外，为了对付吴国军队的水军，羊祜推荐王濬任益州刺史，大治水军，这支水军在灭吴战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西晋进兵一举荡平吴国，便是羊祜灭吴谋略的全面实施。咸宁四年（278 年）六月，羊祜因病入朝，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表示赞同。同年十一月，羊祜病故，终年 58 岁。他临终仍以灭吴为念，举荐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杜预代之。武帝知祜死，哭之甚哀。祜死后 2 岁（280 年）而灭吴，众臣祝贺，晋武帝举杯流泪说："此羊太傅（祜）之功也"①。

羊祜是西晋灭吴的关键人物，他在坐镇襄阳 9 年期间，做了伐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卓有成效。而且他制订了正确的灭吴用兵方略，可以说他在灭吴功绩中居于首位。而且他善于从政，在朝中掌管机要时，晋武帝对政事损益，皆咨访他，达官贵人凡"势利之求"②，都遭到他的拒绝。羊祜的军政业绩，为朝野所称颂。襄阳百姓为其建碑立庙，岁时祭奠，以表怀念。

二、祖逖

祖逖（266～321），字士稚，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其家世二千石，为北州大姓。少年时生性豁达，不拘小节，轻财重义，慷慨有志节，乡里宗族很看重他。后博览经史，精通古今世事，有济世之才。24 岁时，被举为孝廉、秀才，皆不应征。后与刘琨同为司州主簿，始入仕途。祖逖在司州（治今河南洛阳东北）时，与刘琨"情好绸缪"③，常同床而寝，夜闻鸡叫，祖逖便叫醒刘琨，一同起舞挥剑。两人皆有英雄之气，言及世事，中宵

①② 《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③ 《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起坐，想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后逖历任大司马掾、骠骑祭酒、太子中舍人等职。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祖逖率亲党数百家南渡避难，先后被琅邪王司马睿任为徐州刺史、军谘祭酒，居京口（今江苏镇江）。祖逖以“社稷倾覆，常怀振复之志”①，向司马睿请求北伐。睿便任命他为豫州刺史，让其招募人马。祖逖率旧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上，船至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②辞色壮烈，其部属闻之慨叹。祖逖渡江后屯兵江阴（今属江苏），铸造兵器，组建起一支2000余人的军队。祖逖认为，北方人民被少数民族贵族残害，“人有奋击之志”，只要东晋政权组织军队北伐，“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③，北伐有可能成功。他北上后，主张团结各种势力，首先调和北方流民坞堡武装之间的矛盾，并将其统一于自己麾下，共同对付石勒等军。同时，他重视敌情，多方探察敌人虚实，因而能多次击败石勒的强大军队，连克谯城（今安徽亳州）、雍丘（今河南杞县）等地。祖逖北伐军一时声威大振，各地响应，于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石勒不敢窥兵河南”④。祖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⑤。他勤俭节约，不畜资产，劝督农桑，发展生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从而深得部下拥护，愿为其效力，故每战必胜。后赵主石勒惧逖，命成皋县（今河南荥阳境内）为逖母修墓，并与逖书，请求通使交市。逖不复信，但“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丰赡，士马日滋”⑥。北伐形势一片大好。

当北伐形势很好，祖逖正准备挥军北渡黄河，恢复中原之时，东晋内部正酝酿着一场内战，元帝又派戴若思为都督控制祖逖兵权。祖逖深知宏图难展，北伐将功败垂成，感愤发病。祖逖“虽内怀忧愤，而图进取不辍”⑦，带病营建武牢城，该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远，以为夺取河北的后方大本营。武牢城尚未建成，祖逖于太兴四年（321年），以壮志难酬，悲愤去世，终年56

---

①②③④⑤⑥⑦《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

岁。祖逖之死，当地百姓“若丧考妣”，为之立祠，以志哀思之情，表旌其北伐功绩。

三、谢安和谢玄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为当时著名大族。谢安少年时便以才华出众，为王导、桓彝等名流所器重，闻名当世。及至成人后，接连被征辟为司徒府掾属及佐著作郎，皆不应征。寓居会稽（治今浙江绍兴），与当时名士王羲之、许询等放情山水，咏诗属文。后又被征召为尚书郎、吏部郎，皆为安拒绝，因而被禁锢终身，遂栖居会稽。

谢安40余岁时，因其弟豫州刺史谢万被废为庶人，始有仕进之志，被征西大将军桓温辟为司马。后为吴兴太守，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要职。

咸安二年（372年），简文帝死。次年二月，权臣桓温入朝，“大陈兵卫，欲移晋室”。孝武帝诏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于新亭迎接桓温。桓温疑安与坦之阻挠其篡晋事，欲于座将2人杀掉。王坦之惶恐不安，问计于谢安。谢安神色不变，回答说：“晋祚存亡，在此一行”①。两人拜见桓温时，气氛十分紧张，王坦之慌乱，汗流沾衣，倒执手版。谢安从容入席，不卑不亢，应对得体，桓温怒气渐息，遂与安笑语终日，捐弃前嫌。后桓温暗示朝廷加其九锡，以伺机代晋。谢安亲阅诏书，加以修改，故意拖延时日，历旬未成，直至桓温病死，司马氏因此才得以保住帝位。桓温死后，谢安升任尚书仆射，领吏部尚书，后又领扬州刺史。孝武帝亲政，进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后加侍中、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假节，总理朝政。

谢安当政后，在政治上反对权臣专政，维护中央集权；选拔文

---

①《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武英才，裁减政府冗员；改革税制，减轻人民负担，收到很好的成效。谢安在军事上深谋远虑，及时组建北府兵，其战略意图，一是内固根本，二是外御强秦，其结果这两个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谢安受命为征讨大都督，总领前线抗秦军事，以弟石、从子玄、子琰及桓伊等人率北府兵8万拒敌。秦军号称百万，进至淝淮一带，京师震动。谢玄为前锋都督，入问对秦作战方略。谢安神色坦然，毫无惊慌之色，答曰："已别有旨"①。随后谢安出游山墅，宴会亲朋，并与谢玄对弈，平时谢玄棋术略高，而当时由于恐惧，玄与安弈成平手。次日晨，谢安从容指授将帅，安排破敌方略，严令各当其任，井然有序。谢安总揽全局，运筹帷幄有方，特别是大敌当前，他镇静自若，指挥若定，对安定朝野人心，鼓舞战士斗志，争取必胜信念，起了重要的作用。淝水之战当晋军以寡敌众，击败秦军，捷报传来时，谢安正与人弈棋，看过捷报后，随手放置一旁，毫无喜色，弈棋如故。客人问讯军情，安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②。棋罢入内，过门槛时因惊喜，不觉将木屐的齿折断。这些说明他临危受命，深谋远图而方寸不乱的统帅风度。

谢安在淝水之战大胜后，进位太保，上疏请求北征，朝廷以他督扬、江、荆、司、豫、徐、兖、青、冀、幽、并、宁、益、雍、梁等15州诸军事，加黄钺，本官如故。但不久孝武帝之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掌握大权，谢安受到猜忌，请求出镇广陵（今江苏扬州）以避祸，后因病还朝。

东晋太元十年（385年），谢安因病去世，终年66岁。

谢玄（343～388），字幼度，是谢安兄奕之子。谢奕曾任豫州刺史。玄自幼聪颖，为叔父谢安所器重。及长有经世济国的才略，屡次被征辟，不应。后被桓温辟为掾属，始入仕途。于时前秦强盛，边境常被侵寇，晋廷求良将镇御北方。谢安推举谢玄充任，拜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谢玄奉谢安命募骁勇之

---

①②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

士，得彭城刘牢之等良将，组建北府兵，成为东晋劲旅。

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军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谢玄遣彭城内史何谦率军声援。次年，前秦在东线派彭超为都督东讨诸军事，率俱难、毛盛等大军共12万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谢玄率5万大军自广陵（今江苏扬州）赴援，采取声东救西的战略，扬言派人袭击秦军辎重地留城，秦将彭超舍彭城而援留城，使彭城晋军安然撤回。随后谢玄连败秦将彭超、俱难，阵斩秦将都颜、邵保等，收复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淮阴（今属江苏）等地，稳定了江淮的局势。

太元八年（383年），前秦大军攻晋，谢玄任前锋都督，抗御前秦军。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精兵5000直趋洛涧（今安徽怀远西南），乘夜奇袭秦军前锋梁成大营，阵斩梁成及其弟梁云，执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大败秦军。晋军取得初战胜利，鼓舞了战士斗志，使秦军气势受挫。及至苻坚抵达寿阳（今安徽寿县），两军依淝水（寿阳城东）布阵时，谢玄派人对秦军前锋统帅苻融说："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①。苻坚欲使晋军半渡，而以铁骑击杀之，遂挥兵稍退。两军严阵相对，"退者先败，此用兵之常势"②。谢玄正欲乘此寻找战机，以击败秦军。当秦军后退时出现混乱，不可复止，战机果然出现。谢玄、谢琰、桓伊等率精兵渡过淝水猛攻，秦军大溃，将士死亡不可胜计，其奔败者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停留，加以饥冻，死者十七八。苻坚率残部逃回北方。淝水之战自始至终都由谢玄在前线亲临指挥，随机应变，调度有方，表现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能。战后，谢玄以功进号前将军、假节，固辞不受。

淝水之战取得胜利后，谢玄仍任前锋都督，率军北伐，先后克平兖、青、司、豫4州。谢玄欲以豫州刺史朱序镇梁国，自己

---

①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五《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八年十一月胡注。

驻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①。但晋廷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②。谢玄在还军路上染病，回京口（今江苏镇江）疗养。后又被任为左将军、会稽内史。

太元十三年（388年），谢玄因病去世，终年46岁。

第二节　十六国名将事略

一、王　猛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少时贫寒，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③，有治平天下之志。王猛后隐居关中，待时而动。东晋桓温北伐进军关中，王猛身着粗布衣去见他，与之畅谈天下大事。桓温惊异王猛之才，请他共返江南。王猛认为桓温非可共事之人，没有答应。前秦苻坚准备废前秦主苻生自立，知道王猛的才学，便派人去召请他，王猛应召而至。苻坚与王猛"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之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④。从此，王猛投身到苻坚统治集团中，得以施展其出色的政治军事才华。

东晋升平元年（357年），苻坚杀掉苻生，自立为大秦天王，取得前秦统治大权。苻坚即位后，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使其辅佐自己成就大业。王猛初治事，针对前秦当时"豪右纵横，劫盗充斥"的现象，"明法峻刑，澄察善恶"⑤，对豪强的不法行为给予无情打击。苻坚对他更加重用，接连迁任为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朝政莫不由之"⑥。不久，又迁任吏部尚书、太子詹事、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等要职，一岁之中五次迁升，权

①② 《晋书》卷七十九《谢安传附谢玄传》。

③④⑤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⑥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倾内外。由于王猛深得苻坚宠信，宗戚勋臣极为忌恨，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等人几次诬陷王猛。苻坚大怒，罢黜仇、席 2 人，此后朝廷“上下咸服，莫有敢言”①。王猛辅佐苻坚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措施。首先，王猛实行打击氐族贵族豪强，加强中央集权力量的政策，杀掉横行不法的氐族勋贵大臣樊世、苻健妻强太后的弟弟强德等人，结果“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②。另外，在经济上，实行兴修水利、劝课农桑的政策，使得前秦政权辖区内“田畴修辟，帑藏充盈”③。同时，他大力选拔贤才，崇尚儒学，兴办教育，使前秦政权日益兴盛。王猛因功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又任司徒、录尚书事。

前秦国力强大后，王猛辅佐苻坚开始进行统一北方的战争。东晋太和元年（366 年），王猛率军攻略东晋边地。二年，又击破背叛前秦的羌人敛岐。太和四年（369 年），王猛率大将梁成、邓羌等步骑 3 万，进攻前燕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前燕主慕容暐命其将慕容臧率精卒 10 万援救洛阳。王猛命梁成率精锐万人轻装奔袭，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大败慕容臧。前燕洛阳守将慕容筑闻援军已败，被迫投降。王猛受降后，留邓羌镇守洛阳，率军还长安。太和五年（370 年），王猛率杨安、张蚝、邓羌等 10 将共步骑 6 万进伐前燕。临行之前，苻坚亲自送王猛到灞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王猛分兵两路，命大将杨安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自己率军进攻壶关（今属山西）。晋阳久攻不下，王猛率军与杨安会师攻破晋阳。前燕主慕容暐闻知前秦来犯，派太傅慕容评率 40 万大军救援，慕容评畏惧王猛不敢进，大军屯于潞川（今山西浊漳河）。王猛攻克晋阳后，进军潞川，准备与前燕军决战。慕容评认为王猛“悬军远入，利在速战，议以持久制之”④，坚守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晋纪二十二》穆帝升平三年八月。

③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④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

不肯出战。于是王猛派将领郭庆率骑5000乘夜从小路偷袭燕军背后，依山点火，烧其辎重，大火见于燕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之中。慕容暐恐惧，逼令慕容评出战。慕容评派使向王猛求战。临战，王猛整队誓师，激励将士奋勇杀敌，共立大功。秦军群情振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①。经过激战，王猛大破燕军，俘斩5万有余，乘胜追击，又俘斩10余万人。慕容评单骑逃回。秦燕潞川一战，燕军主力损失殆尽，已无法抵挡秦军的强大攻势。随后，王猛直逼燕都邺城。同年十一月，前燕散骑侍郎徐蔚等人见大势已去，开城迎纳前秦军。慕容暐与慕容评等人出逃，被秦军抓获，被迫率百官投降，前燕灭亡。苻坚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6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不久，苻坚召王猛入朝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后又任权势最重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从此，“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②。

王猛主前秦大政近20年，史称他“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③。王猛主政期间，前秦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发展，国力蒸蒸日上，并亲自带兵东征西讨，屡立战功。苻坚将他比作周代的姜太公、蜀汉的诸葛亮。

东晋宁康三年（375年），王猛去世。临终，他根据前秦内部及南北各方面的形势，劝苻坚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④。王猛请苻坚不要急于进攻东晋，而要着力稳定前秦内部，对暂时归附的鲜卑、羌人要存有戒心。苻坚在王猛死后，极为悲痛，对太子苻宏说：“天不

---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上。

②③④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①！但苻坚对于王猛临终的劝告，未能听从，不久就发动了淝水之战，终于导致兵败国亡。前秦历史的发展，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王猛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以及高瞻远瞩的谋略，他是十六国时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二、慕容恪

慕容恪（？～367），字玄恭，鲜卑族，前燕建立者慕容皝的第四子。慕容恪“幼而谨厚，沉深有大度”。15岁时，“身长八尺七寸，容貌魁杰，雄毅严重，每所言及，辄经纶世务”②。慕容皝见之大为惊奇，遂使其领兵，慕容恪的军事生涯由此开始。

慕容恪历慕容皝、慕容儁、慕容暐3朝，屡立战功。慕容皝世，慕容恪屡从其征伐，“临机多奇策”③。后“镇辽东，甚有威惠，高句丽惮之，不敢为寇”④。石季龙征段辽，怒皝不会师，以步骑数十万攻燕棘城（今辽宁义县西北）。皝遣恪率胡骑2000，晨出迎战，季龙“诸军惊扰，弃甲而遁”。恪“乘胜追之，斩获三万余级”⑤。东晋永和二年（346年），慕容恪与世子慕容儁讨伐夫余，儁“居中指授而已，（慕容）恪身当矢石，推锋而进，所向辄溃”⑥，“虏其王及部众五万余口以还”⑦。由于慕容恪“智勇俱济”，慕容皝在永和四年（348年）病卒前，特地嘱咐继位的慕容儁要重用他。于是慕容儁即位后，任命慕容恪为辅国将军，“弥加亲任”⑧。后累战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节、大都督、录尚书事。永和六年（350年），后赵主石虎死，冉闵篡赵建立冉魏，中原大乱。慕容恪率军随慕容儁进军中原。次年，慕容恪率军攻克中山（今河北定州）。永和八年（352年），慕容恪率军追击冉闵。冉闵骁勇善

① 《晋书》卷一百一十四《苻坚载记下附王猛传》。

②③④⑥⑧ 《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附慕容恪传》。

⑤⑦ 《晋书》卷一百零九《慕容皝载记》。

战，十战皆胜，燕军将士皆惧。慕容恪为此激励将士说："闵师老卒疲，实为难用；加其勇而无谋，一夫之敌耳。虽有甲兵，不足击也。吾今分军为三部，掎角以待之。闵性轻锐，又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诸君但厉卒，从旁须其战合，夹而击之，蔑不克也"①。于是慕容恪"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无刚者五千，方阵而前"②。两军接战，燕军果然大败敌军，生擒冉闵。慕容恪将冉闵送于燕都龙城（今辽宁朝阳），随即攻占常山（今河北正定南），又与慕容评合军攻克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消灭冉魏残余势力，为前燕势力进入中原立下大功。永和十二年（356年），慕容恪率军攻伐割据广固（今山东青州）的段龛。当时燕军强于对手，众将皆劝慕容恪急攻。慕容恪说："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有强援，虑腹背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自有事已来，卒不获宁，吾每思之，不觉忘寝，亦何宜轻残人命乎！当持久以取耳"③。于是指挥将士高沟壁垒，不久遂克广固。

东晋升平四年（360年），慕容儁病卒。临终，他请慕容恪继帝位，慕容恪坚辞不受，愿尽力辅佐少主慕容暐。暐即位后，慕容恪以太宰、录尚书事，行周公事，总摄朝政。东晋臣僚闻慕容儁死，皆曰："中原可图矣"④。桓温答曰："慕容恪尚存，所忧方为大耳"⑤。慕容恪辅政之初，政局不稳。慕容暐年幼，勋贵大臣慕舆根"骄傲有无上之心，忌（慕容）恪之总朝权，将伺隙为乱"⑥。不久，慕舆根果然与左卫将军慕舆干勾结，图谋杀掉慕容恪，废慕容暐自立。慕容恪虽协助慕容暐挫败其阴谋，杀掉慕舆根等人，但由于慕容暐年少新立，勋旧大臣叛乱被杀，朝廷"内

---

①③《晋书》卷一百一〇《慕容儁载记》。

②《晋书》卷一百零七《石季龙载记下附冉闵传》。

④⑤⑥《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附慕容恪传》。

外危惧"①。这时，慕容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还，一人步从"②。有人劝他不要如此大意，他回答说："人情怀惧，且当自安以靖之。吾复不安，则众何瞻仰哉！"③在慕容恪的感召下，朝廷上下"人心稍定"④。此后，慕容恪执政，"虚襟待物，谘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其百僚有过，未尝显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⑤。他自己平时上朝"谨肃，进止有常度"，"罢朝归第，则尽心色养，手不释卷"⑥。由于他的以身作则，镇以和靖，稳定了慕容儁死后前燕动荡的政局。在此期间，他还亲率大军讨伐叛燕投晋的吕护，又成功地使用缓攻围困的战术，逼迫吕护回头归降前燕。在政局稳定后，慕容恪率军南进，一度攻占洛阳（今河南洛阳东）。

东晋太和二年（367 年），慕容恪因病去世。临终，他向慕容暐推荐吴王慕容垂主持全国军政，说："吴王文武兼才，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之以政，国其少安"⑦。但慕容暐与主持朝政的慕容评皆未能采纳他的正确建议，反而猜疑吴王慕容垂，迫使其投奔前秦，终于导致了亡国之祸。慕容恪治军，"以恩信御物，务于大略，不以小令劳众。……营内不整似可犯，而防御甚严，终无丧败"⑧。慕容恪不愧为十六国前期的一位军事家。

三、姚苌

姚苌（330～393），字景茂，羌族，是后秦政权的开国君主。姚氏世为羌酋，至姚苌之父姚弋仲时，恰逢西晋永嘉之乱，于是姚弋仲自称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徙居榆眉（今陕西千阳东）。弋仲死后，其第五子姚襄代统其众。东晋升平元年（357 年），姚襄败于前秦被杀，姚苌率部投降前秦。姚苌是姚弋仲的第

---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晋书》卷一百一十一《慕容暐载记附慕容恪传》。

二十四子，“少聪哲，多权略”①，“诸兄皆奇之”②。他随姚襄征伐时，常参与军谋大策。姚苌投降前秦后，官至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屡立战功。前秦主苻坚在淝水之战前，改任姚苌为龙骧将军、督梁益2州诸军事。

前秦淝水之战败后，苻坚命姚苌跟随其子苻睿进讨鲜卑慕容泓，结果秦军大败，苻睿战死。姚苌在西州豪族尹详等5万余家支持下，于太元九年（384年）在渭北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与前秦公开决裂。随后，姚苌进驻北地（今陕西耀县），关中各族降者10余万户。同年六月，苻坚亲率步骑2万攻姚苌，姚苌大败秦军。不久，苻坚因慕容冲进攻长安，回救长安。姚苌面对当时北方大乱的形势，与手下将领计议进趋之计，有人建议“先据咸阳以制天下”③。但多谋善算的姚苌认为，慕容氏以前燕旧士起兵，如果功成事捷，战士会思东归，不会久在关中。因而他决定先置长安一带不顾，而使秦燕相攻，待“秦弊燕回”，自己便可“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④。于是姚苌命姚兴守北地，自己率军攻取新平（今陕西彬县）、安定（今甘肃平凉东）等地，所向皆克。太元十年（385年），苻坚在慕容冲的军事逼迫下，弃长安逃奔五将山（今陕西岐山东北）。同年七月，姚苌遣骁骑将军吴忠围攻五将山，活捉苻坚，不久将其杀掉。随后，姚苌大败慕容冲5万大军，收降其大将高盖。

太元十一年（386年）三月，姚苌在长安称帝，改元建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苌称帝后，先后击破前秦平凉太守金熙、逼降秦州刺史王统，占据平凉（治今陕西华亭西）、秦州（治今甘肃天水）2地，与前秦残余势力展开决战。当时前秦主为苻坚族孙苻登，仍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这年十月，姚苌与苻登战于秦州以西，姚苌战败，回屯秦州州治上邽（今甘肃天水）。太元十二年（387年）八月，前秦冯翊太守兰犊与苻师奴离贰，西燕慕容永乘虚向其进攻，兰犊向后秦求救。众将认为苻登在近，不宜轻进。姚苌谋划道：“登迟重少决，每失时机，闻吾自行，正当广集兵资，必

---

①②③④《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苌载记》。

不能轻军深入。两月之间，足可克此三竖，吾事必矣”①。遂率军一举击败苻师奴，尽俘其众，又擒获兰犊，收其部众士马，势气大振。太元十四年（389 年）七月，苻登率军来攻，逼近安定，众将皆劝姚苌与之决战。姚苌说：“与穷寇竞胜，兵家之下。吾将以计取之”②。于是留尚书令姚旻守安定，亲率轻骑 3 万乘夜袭击苻军辎重，大获成功。杀苻登毛后及其子苻尚，擒其名将数十人，俘获男女 5 万余口而还。众将劝姚苌乘胜进军，姚苌不许，说：“登众虽乱，怒气犹胜，未可轻也”③。主动止军不进。随后，姚苌使姚硕德镇守安定，与苻登对抗。太元十五年（390 年）四月，前秦镇东将军魏褐飞自称冲天王，率部众攻击后秦城戍，本已降后秦的前秦旧将雷恶地叛应之。姚苌决定亲率大军讨伐。由于当时苻登正威逼长安，群臣皆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④姚苌回答说：“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飞，东结董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⑤。乃亲率精兵 1600 人进讨。当时魏褐飞、雷恶地有众数万，而且氐胡赴之者络绎不绝。姚苌每见对方一军至，便面有喜色。部属奇怪而发问，姚苌回答说：“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胜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余也”⑥。魏褐飞等见姚苌兵少，尽其众来攻。姚苌命部下坚垒固守，示之以弱，同时暗遣其子姚崇率精骑数百，出其不意，袭击敌之后方。魏褐飞背后受敌，军士自相扰乱，姚苌乘机遣镇远将军王超、平远将军谭亮率步骑从正面攻击，褐飞部众大乱，后秦军阵斩魏褐飞以下万余人，取得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雷恶地势单力孤，再次投降，姚苌待之如初。雷恶地服气地说：“吾自言智勇所施，足为一时之杰。较数诸雄，如吾之徒，皆应跨据一方，兽啸千里。遇姚公（指苌）智力摧屈，是吾分也”⑦。姚苌经过连年的征战，至此，已占有关中大部分地区。

太元十六年（391 年）四月，后秦镇东将军苟曜暗中勾结苻登，

---

①②③④⑤⑥⑦《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苌载记》。

约里应外合攻击后秦。于是苻登率军来攻，军于马头原（在陕西长安以东）。五月，姚苌引兵出战，败于苻登，整军准备再战。这时大将姚硕德对众将说："上（指姚苌）慎于轻战，每欲以计取之。今战既失利，而更逼贼者，必有由也。"① 姚苌闻而解释说："登用兵迟缓，不识虚实，今轻兵直进，迳据吾东，必苟曜竖子与之连结也。事久变成，其祸难测。所以速战者，欲使竖子谋之未就，好之未深，散败其事耳。"②接着，姚苌进军与战，大败苻登。七月，苻登又率军进攻后秦新平，姚苌再次将其击败。十二月，姚苌又在安定大败苻登军，取得连战连捷的战绩。太元十七年（392 年）七月，苻登闻姚苌病重，率军来攻，至安定 90 里。八月，姚苌病稍有好转，率军出征。苻登出营拒战，姚苌使安南将军姚熙隆率军奇袭秦营，苻登畏惧而退。姚苌乘夜引兵旁出 30 里，袭秦军之后。次日天明，苻登见姚苌诸营已空，大惊曰："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③ 遂率军退回。由于姚苌屡次挫败苻登，沉重地打击了前秦军事力量，为后来姚兴消灭苻登奠定了基础。

太元十八年（393 年）十二月（394 年）初，姚苌病卒，终年 64 岁。其子姚兴继任其位，消灭苻登，统一关中，使后秦成为当时北方最为强大的政权之一。姚苌长于用兵，多谋善断，指挥作战机智灵活，临战常因势定策，出奇制胜，是十六国后期的一位军事家。

第三节　南朝名将事略

一、檀道济

檀道济（？～436），刘宋名将，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北）人，

---

①② 《晋书》卷一百一十六《姚苌载记》。

③ 《晋书》卷一百一十五《苻登载记》。

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道济少孤，与兄、姊共居，以谦让和睦著称。

东晋元兴三年（404年），道济与其叔父檀凭之，兄檀韶、檀祗、檀隆等，从宋武帝刘裕举义师讨伐桓玄。道济随刘裕攻占京口，为刘裕参军。后随冠军将军刘毅攻克桓玄余党盘据的鲁山（今湖北武汉汉阳），讨平桓玄从子桓振，以功除辅国参军、南阳太守，封吴兴县五等侯。义熙六年（410年），卢循义军攻逼京师建康，道济被授以扬武将军、天门太守等职，率兵攻灭聚众起事的郭寄生军。随后，受荆州刺史刘道规之命，与司马王镇之、广武将军到彦之等赴援京师，于路被荀林击败，返回荆州治所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当时荀林屯于江津戍（在今湖北荆沙市南长江中沙洲之上），趁机复起的桓玄从子桓谦屯于枝江（今属湖北），对江陵造成严重威胁。荆州刺史刘道规进兵大破荀、桓2军。在这次作战中，道济"率厉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①，建立奇功。接着，道济随刘道规迎战徐道覆义军，"战功居多"②，以功迁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后又任宁朔将军、参太尉军事，以前后功封作唐县男，食邑400户。

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道济率步军为前锋，所向克捷，诸城戍望风而降，进克许昌（今属河南），擒后秦颍川太守姚坦、大将杨业。道济进军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时，后秦兖州刺史韦华投降。随后，率军直逼洛阳，后秦平南将军姚洸归顺。道济前后攻城破垒，共俘获敌军4000人，其部下皆主张将俘虏全部杀掉，并以尸体垒成京观来夸耀武功。道济却说："伐罪吊民，正在今日"③，遂将俘虏全部释放。于是，"戎夷感悦，相率归之者甚众"④。这说明檀道济不但以骁勇著称，而且有政治头脑，懂得在战争中延揽人心的重要性。次年三月，道济进据潼关（今陕西潼关北），与北伐诸军会合西进，攻下后秦都城长安，灭亡后秦。道济以功为征虏将军、琅邪内史。后改任宋世子西中郎司马、

①②③④《宋书》卷四十三《檀道济传》。

持节、南蛮校尉，随世子刘义符镇江陵。刘裕建宋国，迁宋国侍中、领世子中庶子、兖州大中正。

刘裕篡晋自立，道济转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入卫京师建康，领石头（即石头城，建康军事要地）戍事，并兼入直殿省、宿卫宫阙，甚得刘裕宠信。并以佐命之功，改封永修县公，食邑2000户。

刘宋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死。宋廷为防止北魏南侵，派道济监南徐、兖之江北淮南诸郡军事、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景平二年（424年），权臣司空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等谋废宋少帝刘义符，召道济入朝。道济既至，废立前夜，道济宿于谢晦领军府，谢晦临事惶恐，忧惧不能入睡，而道济却安眠如常，谢晦以此叹服。次日废立，道济入守朝堂，迎立宜都王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道济以废立之功，进号征北将军、加散骑常侍，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阳、下邳、琅邪、东莞等郡诸军事，进封武陵郡公，食邑4000户。

元嘉三年（426年），宋文帝征讨荆州刺史谢晦，道济率军继中领军到彦之之后而进，到彦之军战败，道济军赶至。谢晦本以为道济与己同参与废立之事，必已被文帝杀掉，当听说道济率军来攻，既感吃惊，又惧道济威名，其军竟不战而溃。道济以平叛之功，迁都督江州及荆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阳、新蔡、晋熙4郡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增封千户。

元嘉七年（430年）三月，宋文帝以右将军到彦之为统帅，率安北将军王仲德等大举北伐。北魏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命金墉、虎牢、滑台、碻磝4镇戍兵回撤。因而宋军进展顺利，收复河南失地。八月，北魏军发动反攻，宋军节节败退，洛阳、虎牢等地失守，滑台岌岌可危，河南之地又将尽失。十一月，宋文帝以道济为都督征讨诸军事，命其率军北伐。次年正月，道济率军往救滑台，军至寿张（今山东阳谷境内），与北魏安平公乙旃眷军相遇，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力进击，大破乙旃眷。道济转战北进，北魏宁南将军悉颊库结率大军前后邀战，道济分遣

段宏及队主沈虔之等出奇兵击之，阵斩悉颊库结。道济率军进至济（济水，略同今黄河下游故道）上，连战20余日，与敌交战数十次，每战多捷。北魏军声势浩大，朱修之坚守滑台数月，终被魏军攻占。这时道济以军资渐竭，率军从历城（今山东济南西）退兵。当时宋军有人投降北魏，将道济军粮已尽的消息告诉魏军，魏军遂来追赶。道济将士众情忧惧，军心浮动。道济乃于夜间令军士以少数米覆于沙土之上，然后唱筹量沙以充军粮，以便欺骗魏军，并安定军心。次日天明，魏军见之，果然以为宋军粮食有余，杀掉投降宋军，停军不再追赶。道济兵众寡弱，而北魏军势甚盛，为避免退军时为敌所乘，道济乃命军士皆披铠甲，而自己身穿便服坐于乘舆之上，率兵徐徐西还。魏军见道济不穿铠甲，从容退兵，怀疑宋军设有埋伏，不敢逼近，道济遂全军退回。道济以北伐功进位司空、江州刺史，镇守寻阳（今江西九江）。此役之后，道济以他的骁勇善战威镇北土，魏军甚畏其名，竟画道济之肖像以驱灾禳鬼。

道济屡立战功，威名甚重，其左右亲信皆身经百战，诸子亦有才气，渐遭刘宋朝廷猜忌。有人甚至认为道济“安知非司马仲达（司马懿）也”①。因此，彭城王刘义康以宋文帝患病多年，担心文帝死后，道济不可复制。元嘉十二年（435年），文帝病重，刘义康召道济入朝。次年春，刘义康矫诏收杀道济及其子给事黄门侍郎植等11人，又收杀道济亲信将领薛彤、高进之。道济被收之时，脱帻于地，目光如炬，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②魏人闻听此讯，却高兴地说：“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③。

一代名将檀道济，竟死于刘宋王朝的内部争斗与猜忌之中。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军长驱直入，直至长江北岸。宋文帝登石头城观望敌军，慨然叹道：“若道济在，岂至此！”④但这时，距道济被杀，已经14年之久了。

---

①②③④《南史》卷十五《檀道济传》。

二、韦睿

韦睿（441～520），字怀文，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世为三辅（今陕西中部地区）大姓。父韦祖归曾在刘宋任职，官至宁远长史。韦睿少好学，与内兄王憕、表弟杜恽并知名乡里。但他的伯父韦祖征认为韦睿最有才干，曾对他说："汝文章或小减（谓与王憕、杜恽二人相比），学识当过之；然而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①。

刘宋景和（465年）时，韦睿被雍州刺史袁顗辟为主簿，始入仕途，后历任前军中兵参军、齐兴太守、右军将军等职。南齐末年，韦睿以朝廷腐败，不愿远离乡里，求为上庸太守，加建威将军。南齐永元二年（500年），齐雍州刺史萧衍于任上起兵，移檄四方。韦睿率所部将士2000人，马200匹，倍道赴襄阳（今湖北襄樊）。萧衍见之大喜，说："吾事就矣"②。此后，韦睿随萧衍攻克郢城（今湖北武汉）、鲁山（今湖北武汉汉阳）、加湖（今湖北黄陂东南）等地，"多建谋策，皆见纳用"③。萧衍大军继续东进，以郢州重地，留韦睿为冠军将军、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

南齐中兴二年（502年），梁台初建，萧衍征韦睿出任大理。萧衍代齐称帝后，韦睿升任廷尉，封都梁子爵，食邑300户。梁天监二年（503年），韦睿迁太子右卫率，出为辅国将军、豫州刺史。

天监四年（505年）十月，梁武帝大举北伐，以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军于洛口（古洛水下注淮水处）。韦睿都督豫州诸军北进。天监五年（506年）五月，韦睿先使其长史王超等率军攻小岘城（今安徽含山北），未能攻下。韦睿亲自巡视围栅，城中突然冲出魏军数百人于城外列阵，众将皆劝韦睿暂退。韦睿认为："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人于外，

①②③《梁书》卷十二《韦睿传》。

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①。众将仍犹豫不决，韦睿指手中之节说："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②。乃命令将士立即进攻。于是将士奋勇向前，大败城外魏军，并乘胜攻城，应时而破，一如韦睿所料。随后，韦睿率军转攻合肥（今属安徽）。当时，梁右军司马胡略久攻合肥不下。韦睿亲自察看合肥周围山川形势，命修筑堤堰，截肥水（古水名，流经合肥）以通舟师。韦睿身先士卒，亲自负土筑堰，不久堰成水通。梁军水师相继而至，向合肥发起猛攻。这时，北魏援军杨灵胤率5万之众骤至合肥，梁军将士以寡不敌众，让韦睿表请救兵。韦睿镇静自若，笑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临难铸兵，岂及马腹，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③。韦睿率部下与魏援军接战获胜，军心稍安。韦睿在淝水堰修成后，使军主王怀静于岸边筑城防守。魏援军攻破王怀静守城，梁守军全军覆没。魏军乘胜攻至韦睿驻守的堤下，兵将众多，声势甚盛。军监潘灵祐和诸将请求退军，韦睿大怒，说："宁有此邪！将军死绥，有前无却"④。魏军前来凿堤，韦睿亲自与之抗争，敌军稍退，他急令将士筑垒于堤自固，终于保住大堤，未被破坏。接着，韦睿命令修造大型斗舰，使其高与合肥城平，四面攻之，魏军计穷，相与悲哭。不久，魏城中守将被射死，梁军攻破合肥，俘斩万余人，获牛马绢帛无数。合肥既克，韦睿率军继进，至距魏军20里处，准备发起攻击。但这时梁军因统帅萧宏临阵脱逃，已全线溃退，梁廷命韦睿回师。由于韦睿军距敌甚近，诸将恐魏军来追。韦睿乃令全部辎重前行，自己乘坐小舆殿后。魏军畏其威名，不敢逼近，韦睿遂全军而还。

天监五年（506年）十月，萧梁北伐主力军溃败后，魏中山王元英率大军进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众号百万，连营40余座，梁北徐州刺史昌义之率军坚守。次年二月，韦睿受命率豫州军队隶征北将军曹景宗增援钟离。韦睿知兵贵神速，为争取时间，他率军自合肥取直道，经阴陵（在今安徽合肥东北）大泽而行，遇涧谷无路可

①②③④《梁书》卷十二《韦睿传》。

通，便架桥而过。众将士惧魏军兵盛，皆劝他缓行。韦睿说："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①！于是他率军疾进，十日至邵阳（洲名，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淮河中）与曹景宗军会合。韦睿连夜于曹景宗营前20里掘长堑、树鹿角，截邵阳洲为城垒，至天明营寨已立。次日，元英望见韦睿营寨一夜而起，以为神助。魏名将杨大眼率数万骑来攻，韦睿命将士结车为营，以强弩2000齐射，魏军死伤甚众，杨大眼右臂中矢，率军退走。次日，元英亲率大军来攻，韦睿乘木舆执白角如意指挥众将迎战，魏军不胜退回。至夜，魏军又来攻城，飞矢如雨，韦睿子韦黯请下城避箭，韦睿不许。魏军先于邵阳洲两岸修筑二桥，南桥以接元英之军，北桥以接杨大眼之军，并为跨淮通道。曹景宗攻北桥，韦睿攻南桥。韦睿装造大舰，命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等人率水军，乘淮水暴涨之机，大舰竞发，进逼敌军营垒。然后以小船载草，灌以油膏，焚烧敌桥。风急火盛，烟尘晦冥，敢死勇士继进拔栅砍桥。顷刻之间，魏军桥栅尽皆毁坏。韦睿部将冯道根等身先士卒，率厉将士与魏军展开肉搏战。梁军奋勇向前，呼声动天地，无不以一当百，遂大败魏军。元英见桥已毁，弃军而走。杨大眼也烧营而退。魏军趋水死者10余万，被梁军斩首者亦10余万，被俘者5万余人，缘淮百里间，尸相枕藉。梁军缴获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无数。这次作战，韦睿居功至伟，梁武帝亲遣中书郎周舍至淮上劳军。韦睿以功增封700户，进爵为侯，征为通直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天监七年（508年），韦睿迁左卫将军，不久出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次年，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还师，魏军随后追击，马仙琕弃城南退，梁边关惊扰。韦睿奉诏援救，督率诸军进至安陆（今属湖北），令增修城高2丈余，又命增宽壕堑，修筑高楼，严加守备。众将议论纷纭，认为韦睿胆怯。韦睿回答说："不然，为将当有怯时，不可专勇"②。魏将元英正急追马仙琕军，将要雪邵阳兵败之耻，闻韦睿至，不敢再进，退军北还。

---

①② 《梁书》卷十二《韦睿传》。

此后，韦睿历任江州刺史、右卫将军、太子詹事、丹阳尹、雍州刺史、护军将军、车骑将军等要职。梁普通元年（520年）八月，韦睿病卒于家，终年79岁。

韦睿身体素来羸弱，临战不能骑马，唯以乘舆指挥作战。他既具胆识，又富谋略，临敌之际，镇定从容，调度有方。每战常身先士卒，奇谋克敌，因而百战百胜，屡立战功，威名振于南北，魏人称其为“韦虎”，畏惧不敢与之战。韦睿虽屡立战功，但从不争利。当邵阳洲大捷后，曹景宗等人“争先启之捷，睿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①。韦睿不仅善用兵，而且善于带兵，平时“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②。韦睿是南朝难得的智勇双全的名将。

三、陈 庆 之

陈庆之（484～539），字子云，义兴郡儋山县（今江苏宜兴）人。从萧衍起兵，平定京都建康有功，除奉朝请，颇受亲赏。梁普通六年（525年）正月，魏镇东将军、徐州刺史（治今江苏徐州）元法僧降梁，以庆之为武威将军率军接应。庆之以军功被升为宣猛将军。随后，庆之率军2000人送豫章王萧综为徐州刺史，接替元法僧入镇彭城（今江苏徐州）。魏廷遣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率军2万来攻。延明先派其别将丘大千探察梁军虚实，庆之击破之。六月，萧综弃军降魏，众军溃散，诸将不能制止。唯庆之“临乱能整，异于诸将”③，率所部斩关夜退，全军而返。普通七年（526年）七月，梁郢州刺史（治今湖北武汉）元树率庆之等从北路出征魏扬州首府寿阳（今安徽寿县），进驻寿阳城东北。梁豫州刺史（治今安徽合肥）夏侯亶配合元树军沿淝水北上，进

---

①② 《梁书》卷十二《韦睿传》。

③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梁纪六》武帝普通六年六月胡注。

攻黎浆。魏军夹淝水筑城，亶与韦放击败魏军，又破黎浆，驻军于寿阳城南。魏豫州刺史（治寿阳）李宪欲先破元树、陈庆之军，遣其子长钧于寿阳城东北别筑两城。十一月，庆之攻破两城，宪力屈投降。庆之率军进寿阳，获男女7.5万人。梁廷以庆之为东宫直阁将军，赐爵关中侯。

大通元年（527年）十月，庆之随领军曹仲宗进攻魏南兖州治所涡阳（今安徽蒙城）。魏派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率步骑15万来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40里。庆之欲逆战，寻阳太守韦放认为，贼前军必是精锐，如战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以逸待劳。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去我既远，必不见疑，及其未集，须挫其气，出其不意，必无不败之理"，"诸君若疑惑，庆之请独取之"①。庆之自率500骑迎击，破敌前军，魏人丧胆。庆之急率军还，与诸将连营西进，背南兖州治所涡阳城，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经数十余战，梁军将士疲敝，魏援军复欲筑垒于梁军后，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师南还。庆之杖节军门曰："吾闻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须虏大合，然后与战。审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诏"②。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连筑13城，成犄角之势，庆之乘夜袭击，陷其4城，魏涡阳戍主王纬乞降。其余9城甲兵犹盛，韦放遣降者30余人，分报魏军诸营。庆之"乃陈其俘馘，鼓噪而攻之"③，韦放军也同时出击，9城皆溃，追击俘斩略尽，尸咽涡水，所降涡阳城男女3万余口。梁武帝手诏嘉勉庆之曰："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④。

梁大通二年（528年）四月，北魏内乱，魏北海王元颢降梁。十月，梁武帝封元颢为魏王，以陈庆之假节、飚勇将军，送元颢北还。实际上，这是梁廷借送元颢还魏所进行的一次北伐。陈庆之利用魏内乱之机，轻装乘虚径进，当时北魏发大军平青州邢杲之乱，京师空虚，因而北伐的战略目标是直接进攻洛阳。庆之选

①②③④《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择一条捷径，从铚城（今安徽宿州西南）直趋梁国（今河南商丘南），北上考城（今河南兰考），再西向大梁（河南开封西北），兵锋直指洛阳。从攻占铚县至进入洛阳，共约200余天。若从铚城四月初进攻梁国开始计，只有60余天便攻陷洛阳，行程3000余里，经47战，攻破魏32城。陈庆之智勇双全，善于指挥，充分重视战士的战斗积极性，注重战斗气势，深知兵贵神速，临敌随机应变，常以己之长，击敌之短，以少胜多，能攻善守，出奇制胜，所向无敌，创造了南朝战史上的奇迹。

元颢进入洛阳后，骄怠之志日生，日夜纵酒，不恤军国政事，朝野失望。他既要依靠庆之兵力在北方立足，又与魏宗室密谋叛梁，故与庆之外同内异，产生猜忌。而且梁军在洛阳不足1万，北魏地方势力多反对元颢政权，因而梁军实际上处于四面受敌的险境。陈庆之对这一严峻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提出要梁武帝向北速派援军，并要南人没魏者悉聚洛阳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些挽救当时洛阳政权政治军事危机的重要建议，却遭到元颢与魏宗室的反对，他们怕庆之军力强大后难于制服。庆之军副马佛念进计说："功高不赏，震主身危……今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元）颢据洛，则千载一时也"①。庆之认为这样做，违背梁廷委任之旨，坚决不从。庆之见梁廷援军不至，又受元颢猜忌，为了摆脱困境，意欲离开洛阳，南撤彭城为徐州刺史（治今江苏徐州），以便见机进退。元颢心惮庆之威名，惧其远离后不能依靠和控制，不准其请。

中大通元年（529年）闰六月，魏尔朱荣等率精骑号称百万，南下进攻洛阳，在洛阳城北黄河一线，双方展开激战。庆之军3天11战，杀伤敌军甚众。尔朱荣未能得逞，将退兵北还。黄门郎杨侃等说荣曰：若现时退兵，"民情失望，各怀去就，胜负所在，未可知也"②。他建议发民材多为桴筏，沿河强渡，一旦成功，势必

---

①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三《梁纪九》武帝中大通元年闰六月。

大胜。荣乃为桃夜从硖石渡江，与元颢战于河桥（黄河南洛阳西北），颢大败南逃被杀。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阵东还。洛阳复入于魏，梁军占领洛阳65天。尔朱荣虽亲率精骑追击庆之，但未能追及。庆之军速退至阳城西（今河南登封南），恰遇嵩高山水洪溢，梁军被水冲没，死散殆尽。庆之乃落发为沙门，间行至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州人程道雍等将其潜送出汝阴（郡治今河南商水西）。庆之回到建康，梁武帝知洛阳复失主要责任不在他，犹以功除右卫将军，封永兴县侯。

中大通元年（529年），出为持节、奋武将军、都督缘淮诸军事、北兖州刺史（治今山东兖州）。当时北徐州（今属江苏）"妖贼"沙门僧强起义，土豪蔡伯龙起兵响应，众至3万，攻陷州城。梁廷诏庆之讨平之。

中大通二年（530年），梁廷调庆之任都督南司（治今湖北黄陂东）、北司（治今河南信阳）、西豫（治今河南息县）、豫（治今安徽寿县）四州诸军事、南北二司州刺史。庆之至镇，遂北上围魏豫州治所悬瓠（今河南汝南）。魏颍州刺史（治今河南长葛）娄起、扬州刺史（治今河南沈丘）是云宝来援，庆之分兵打援，破魏军于溱水（古水名，注于汝水）。庆之又击败魏豫州刺史（治今河南汝南）尧雄、梁州刺史（治今河南开封市）司马恭于楚城。

庆之为了发展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省南司州，罢义阳（今河南信阳）镇兵，"停水陆转运，江湖诸州并得休息"①。并开田6000顷，二年之后，仓廪充实。

大同二年（536年），东魏遣侯景率军7万，攻破梁楚州（治今河南汝南以西），执刺史桓和。侯景进军淮上，梁廷派夏侯夔等率军赴援。援军未至，庆之已击败侯景军，时天寒大雪，景弃辎重逃走。梁廷进庆之仁威将军。这年豫州大饥，庆之"开仓赈给，多所全济"②。豫州人民李昇等800人，表请给庆之树碑颂德，梁廷恩准。庆之长年操劳萧梁北境军政，积劳成疾，大同五年（539

---

①②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年）病卒于都督北司、西豫、豫三州诸军事、北司州刺史任上，终年56岁。

陈庆之死后，梁武帝以其忠于职守，战功卓著，政绩斐然，赠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谥曰武。庆之为人恭谨慎行，性素节俭。射不穿札，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①。他长期征战，常设奇谋，以少克众，无论是北伐横扫河洛，或挥师驰骋边陲，均充分显示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综观其一生的指挥作战业绩，实为梁代一位名将。

四、羊侃

羊侃（494～548），字祖忻，泰山（治今山东泰安东北）钜平人。羊侃祖父羊规之，曾为刘宋任城令。北魏太武帝南征，规之随其入魏，拜雁门太守。羊侃之父羊祉，仕魏官至光禄大夫、假平南将军。羊侃从小长于北魏，少而雄勇，膂力过人，能用20石弓，马上可用6石弓。他雅好文史，博览书典，尤好《孙子兵法》。羊侃20岁时，随父出征，因战功升任别将。羊祉虽仕魏，但素怀南归之志，常教导诸子不可久留北方，应寻机归事南朝。羊侃后升任泰山太守，便准备投奔萧梁，以遂父志。

北魏建义元年（528年）七月，羊侃自泰山举兵降梁。他的从兄羊敦时任魏兖州刺史，探知此讯，据州（治今山东兖州东北）拒侃，侃不得过。八月，羊侃率精兵3万袭击羊敦不胜，遂于兖州筑城垒10余座坚守，并向萧梁乞降求救。梁廷乃以羊侃为侍中、司空，并遣历阳太守羊鸦仁等率军接应。魏廷遣使加升羊侃官爵，羊侃将来使杀掉。魏廷乃遣尚书仆射于晖率兵数十万进攻羊侃，又遣高欢、尔朱阳都等军相继而至，将羊侃军团团围住，内外十余重。羊侃军矢尽，死伤累累，萧梁援军未至，羊侃遂率将士乘夜

① 《梁书》卷三十二《陈庆之传》。

破围而出，沿路且战且走，经一日一夜，终于逃出魏境。

梁中大通元年（529年），羊侃到梁京师建康。梁武帝欲以侃配合陈庆之北伐，授以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瑕丘（今山东兖州）征讨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治今江苏徐州）等职。适逢梁将陈庆之败回，改授羊侃持节、云麾将军、青冀二州刺史（治今江苏连云港）。中大通四年（532年）二月，梁廷以羊侃为安北将军、兖州刺史。同年，羊侃率军随太尉元法僧北讨，旋因法僧被魏军击败而退军。中大通五年（533年），封高昌县侯，邑千户。中大通六年（534年），出为晋安太守。晋安闽越俗好为乱，前后太守莫能止息。羊侃到郡后进兵讨伐，斩其渠帅，郡内肃清。继后，羊侃任太子左卫率、都官尚书、衡州刺史等职。太清元年（547年），梁武帝因侯景来降，以贞阳侯萧渊明为统帅，大举北伐。诏以羊侃为使持节、冠军将军，随萧渊明出征。梁军进至彭城（今江苏徐州），羊侃监修寒山堰，两旬而成，大水直灌彭城。羊侃劝萧渊明乘水猛攻彭城，渊明不纳。东魏援军大至，羊侃屡言乘其远来之时攻击，渊明又不从。羊侃见梁军屡失战机，知其必败，遂率所部将士出屯寒山堰上。不久，梁军果大败，损失将士数万人，唯羊侃所部将士结成方阵徐徐撤退，敌不敢追，全军而还。

太清二年（548年），羊侃复为都官尚书。同年八月，侯景起兵叛梁，很快攻下历阳（今安徽和县），逼近长江。梁武帝问羊侃讨景之策，羊侃请以2000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袭取寿春。景进不得前，退失巢窟，乌合之众，自然瓦解”①。从当时形势看，这是极其关键的正确决策。但幸臣朱异等人认为侯景必无渡江之心，不用侃策。梁武帝只派宁远将军王质率众3000巡江防守。羊侃叹道：“今兹败矣！”侯景乘梁廷君骄昏而臣贪昧，不作全面战略防御和进攻部署之机，于同年十月下旬渡过长江，随即攻破建康，进而围攻台城。

---

①《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侯景围攻台城之时，台城中知名将领有羊侃、柳津2人。但柳津年老多病，唯羊侃胆力俱壮，智勇过人，于是城中军旅指挥调度，皆决于侃，太子萧纲深倚仗之。梁武帝在侯景将破建康之前，以扬州刺史萧大器为都督城内诸军事，以羊侃为副，此时全面负责台城防务。

太清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侯景从多处对台城发动进攻，城内人心浮动。羊侃假称得到城外射来书信，邵陵王萧纶等援军将至，城内人心稍安。侯景先用火烧台城大司马、东华、西华、东掖诸门。羊侃亲临战阵，命将士以水灭火，又命人凿门为孔，以箭射杀敌兵，侯景兵暂退，诏加侃侍中、军师将军。侯景又用木驴、尖头木驴等攻具强攻台城，羊侃分派军士，或用矢石，或用火炬，分别将其摧毁。侯景又命部下于台城东西修筑两土山，城中惊骇。羊侃命将士挖掘地道，从下撤散其土，其土山不能立。侯景又作登城楼车，高十余丈，准备临城以射城内，羊侃命令将士："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不劳设备"①。景军开动楼车果倒，咸服侃明断。侯景见久攻台城不下，士卒死伤惨重，遂设长围隔断台城内外联系。并将羊侃之子羊鷟抓至城下，用以逼羊侃投降。羊侃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辛汝早能杀之"②，不为所动。过几日，侯景又执其子至城下，羊侃大义凛然地对其子羊鷟说："久以汝为死，犹复在邪？吾以身许国，誓死行阵，终不以尔而生进退"③。说完拉弓欲将羊鷟射死，侯景兵将羊鷟带走。此后，天降大雨，城内土山崩塌，侯景军登城进攻，羊侃率军苦战不能退敌，乃急令士卒多掷火炬形成火城以拒敌兵，然后于内急将城修筑完好，终于力保台城未破。

十二月，羊侃坚守台城近两月，积劳成疾，卒于城内，终年55岁。羊侃死后，城内兵民益惧，侯景乘机猛攻台城，终于在次年三月将台城攻破。

羊侃文武兼资，谋略过人，忠于梁廷。当台城被围军情紧急

---

①②③《梁书》卷三十九《羊侃传》。

之际，梁廷才给予重任，最终死于国事，他是南朝后期的一位名将。

第四节　北朝名将事略

一、拓跋焘

拓跋焘(408～452)，鲜卑拓跋族人，北魏明元帝拓跋嗣之子。始光元年（424年），年17岁即帝位，是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时，北魏王朝经过道武帝、明元帝两朝几十年的经营，势力已有很大的发展，但北方尚未完成统一。当时，北方与北魏并存的有大夏、北凉、北燕、柔然等多股势力，南方还有刘宋政权与之对峙，当时北魏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拓跋焘即位后，志在完成北方的统一。他根据当时的形势，定下了各个击破，先强后弱的正确方针。

始光三年(426年)，拓跋焘不顾大臣长孙嵩等人的一再阻挠，毅然采纳军事谋略家崔浩的意见，亲率大军远攻大夏。后因大夏都城统万城坚难克，掳其人口、牲畜而还。次年，拓跋焘再率大军攻夏。鉴于统万坚城难攻，他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亲率轻骑诱敌，经过激战大破夏军，攻克统万，基本上平定大夏。神䴥二年(429年)，拓跋焘再次力排众议，采用崔浩提出的以轻骑奔袭柔然的战略方针，率大军远征柔然。五月，拓跋焘军至漠南，舍弃辎重，亲率轻骑突袭柔然。柔然为游牧民族，本以行动飘忽快速著称，但在拓跋焘轻骑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之下，柔然毫无戒备，竟然无力抵抗和转移，被魏军消灭殆尽，其可汗率少数部落逃窜。经此一战，使柔然元气大伤，暂时解除了柔然的威胁，为北魏统一北方免除了后顾之忧。神䴥三年（430年），拓跋焘转向北燕发动进攻，到太延二年（436年），北燕主冯弘在魏军的不断打击下逃奔高句丽，北燕灭亡。太延五年（439年），拓跋焘开始谋划进攻

北方仅存的北凉政权。当时大臣李顺因受北凉贿赂，与弘农王奚斤等30余人，以凉州没有水草为由反对进兵。拓跋焘再次摈弃这些人的意见不用，听从崔浩的建议，进军一举灭亡北凉。至此，拓跋焘凭借他的军事才能，紧紧依靠汉人崔浩出谋划策，统一了北方广大地区，奠定了北魏后来近百年的基业，使北魏成为与南朝刘宋南北对峙的北方唯一强国。

拓跋焘在频繁地进行北方统一战争时，还推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当时鲜卑族进入北方广大汉族地区后，受汉族先进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实行汉制为其必然趋势。拓跋焘为适应这种形势，在始光二年（425年）下令，将“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的汉字，进行统一：“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①。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下诏：为宣扬文教，整齐风俗，严禁私养沙门、巫师，信惑妖邪。并召集高级官僚子弟，进太学读书，以汉族士人通儒学者为师，使各族官僚子弟学习汉族文化，这是实行汉制的重要措施。六年（445年），下诏：“有疑狱皆付中书，以经义量决”②。这是指决狱量刑，以儒家经义为准，逐渐废弃了鲜卑落后刑法，而且在刑律上把礼制和法制结合起来。

第二，精选贤才，整顿吏治。始光四年（427年），拓跋焘访察民情，至中山（今河北定州），打击贪官污吏，守宰贪污被免官者10余人。神䴥元年（428年）正月，下诏以天下守令“多行非法，精选忠良悉代之”③。神䴥四年（431年）召用汉族士人勃海高允、范阳卢玄、广平游雅等，“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④。这批以高允为首的汉族士大夫，为北魏推行各方面的改革和汉化起了重大作用。延和元年（432年）正月、十二月接连两次下诏：“虚心求贤”，“搜扬隐逸，进举贤俊”。贤才“既至，当待以不次之举，随才文武，任之政事”⑤。这就使汉族贤能之士，大批进入北魏政权，为北魏政权实行改革和汉制提供了人才条件。延和元

---

①③④⑤《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②《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年（432年）下诏，北魏政权“蠲除烦苛，更定科制，务从轻约，除故革新，以正一统”①。并要求各级官吏“当深思效绩，直道正身，立功立事，无或懈怠”②。拓跋焘为了促使官吏廉洁，在太延三年（437年）下一道非比寻常的法令：“令天下吏民，得举告守令不如法者”③。魏廷最高封建统治者鼓励普通老百姓告发各级不法官吏，这在封建制时代是少有的，显然这有利于政治清明，以及减轻官吏对人民的压榨。

第三，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延和三年（434年）二月下诏：“今四方顺轨，兵革渐宁，宜宽徭赋，与民休息”④。同时还规定，将纳租赋民户按贫富分为三等：富豪之家交租赋如常；中产之家免租赋二年；贫苦农民免租赋三年。太延元年（435年）十二月，再次下诏：严禁州郡“妄遣吏卒，烦扰民庶”。官府征发赋役，“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⑤。魏廷为了保证此项措施的推行，对官吏进行考核，“抑退奸吏，升进贞良”⑥。太平真君四年（443年）下诏：“欲令百姓家给人足，兴于礼义”，免去民户资赋三年。并下令州郡牧守，“各厉精为治，劝课农桑，不得妄有征发，有司弹纠，勿有所纵”⑦。拓跋焘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并重视畜牧业生产。如神䴥二年（429年）六月，魏廷北征，柔然前后降者30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又降敕勒诸部数十万落，马牛羊百余万，以其建立漠南牧场。数年之后，“岁致献贡，由是国家马及牛羊遂至于贱，毡皮委积”⑧。平统万，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太延五年（439年）灭北凉，获牛马畜产20余万。北魏在凉州到黄河河套地区，建立河西牧场。这个牧场畜牧业兴旺时，有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头，牛羊则无数。⑨北魏初期畜牧业的繁荣，对实现统一北方和国势强盛关系很大。如

---

①②③④⑤⑥ 《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

⑦ 《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⑧ 《魏书》卷一百零三《高车传》。

⑨ 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载《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

战争戎马，驼牛运输，弓弦战具，毡皮等军用物资，以及皇室、官僚和人民生活的食用肉品、奶酪，穿用的毛皮等，都离不开畜牧业生产。特别是战马和耕牛，对于军事和农业生产至关紧要。总之，拓跋焘实行的改革措施，使北魏政权实行汉制初见成效，政治比较清明，政权逐渐稳固，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发展。这些不仅有利于黄河流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定，而且也为后来孝文帝迁都和全面改制奠定了基础。

拓跋焘是北魏初期在军事和政治上功绩卓著的一位皇帝，但不幸他在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大举反攻刘宋胜利回师后，军队损失过半，魏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正平二年（452年），拓跋焘被宦官宗爱谋杀，年仅45岁，共在位28年。拓跋焘崇尚节俭，受赐者皆是死事勋绩之家，亲戚爱宠罕有滥赏。临敌常与士卒同在矢石之间，左右死伤相继，而他神色自若，所以“人思效命，所向无前”。拓跋焘知人善任，拔士于卒伍之中，用人唯才，不分高卑贵贱。执法严明，“功者赏不遗贱，罪者刑不避亲”①。他在指挥战争中，对南朝刘宋步兵作战，善于利用骑兵的正面冲击；而对北方以骑兵为主的敌人，则充分利用轻骑长途突然袭击，出其不意地消灭敌人。或示弱以诱敌人出坚城而歼之；或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或先回师，待机后发制人，充分显示其审时度势，应变出奇的军事思想。他是北朝一位杰出的战略家。

二、高 欢

高欢（496～547），又名贺六浑，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世居北魏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西南），“遂同鲜卑”②。北魏末年六镇起义时，高欢曾参加义军，后来，又投奔契胡酋长尔朱荣。他

---

① 以上见《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

②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在帮助尔朱荣建立霸业的过程中，在镇压葛荣义军、邢杲叛乱等作战中，便表现其政治远见及指挥才能，受到了当时专擅朝政的尔朱荣的重视。尔朱荣曾问左右："一日无我，谁可主军？"众人都认为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可当此任，尔朱荣却说："此（指尔朱兆）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①。又当面告诫尔朱兆说："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②。意思是说，尔朱兆不是高欢的对手。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尔朱荣言之不谬。

魏末人民大起义失败后，魏孝庄帝不甘心作傀儡，杀掉了专擅朝政的尔朱荣。尔朱荣之侄尔朱兆随之杀掉孝庄帝，继续执掌朝政。北魏建明元年（530 年），高欢骗得尔朱兆的信任，以连岁霜旱，饥馑无食，去山东就食为由，率领 10 万六镇兵民至山东（今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地区）开创自己的事业。高欢至河北后，首先取得当地大族高乾等人的支持，又设计使六镇兵民怨恨尔朱氏而拥戴自己，待自己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与尔朱氏公开决裂。高欢与尔朱氏决裂后，公开打出"讨贼""拯时"的旗号。"讨贼"，即讨伐尔朱兆，因为尔朱兆杀了孝庄帝，是国之大贼。"拯时"即拨乱反正，拯救天下。这样，高欢就争取得了与尔朱氏斗争的政治主动权。普泰元年（531 年），高欢在广阿（今河北隆尧东）巧施反间计，使尔朱氏内部不和，然后以寡击众，大破尔朱兆军。普泰二年（532 年），高欢又在韩陵（今河南安阳东北 17 里）以弱胜强，凭借不足 3 万人的军队，大破号称 20 万之众的尔朱氏联军，打垮了左右当时政局的尔朱氏势力。随后，高欢乘胜进军，彻底肃清了尔朱氏的残余势力。高欢在魏末尔朱氏专权的形势下，以 10 万六镇兵民起家，经过艰苦奋战，终于消灭了势力强大的尔朱氏集团，成就了大事，表现了他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

高欢在其政治、军事斗争生涯中，还表现出治理军队的才干。高欢率六镇兵民往山东，一路上对部队约束很严，不许侵犯民间纤毫之物。在过麦地时，高欢还亲自带头下马，牵马步行，以免

---

①② 《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踏坏麦田。结果“远近闻之，皆称高仪同（指高欢）将兵整肃，益归心焉”①。高欢所率六镇之众，多长期居住塞北，放任不羁，很难约束。高欢深知，如果没有纪律约束，这些人马便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会有战斗力，不会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尔朱氏。为了让六镇之众服从纪律，他还巧妙地设计了一个谋略。他先以尔朱兆的名义发了一个假命令，说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使手下的六镇之众愁怨交集。接着又发一道假命令，说尔朱兆要征发高欢手下部众去讨并州稽胡。高欢假意要派出1万人，却又指使手下将领孙腾、慰景等人拖延滞留，给众人造成延误军期的假象。等到部队将要出发那天，高欢亲自送行，垂涕执别，这1万多人早已是“人皆号恸，哭声动地”了②。这时，高欢才对大家说：“与尔俱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乃尔征召。直向西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众人回答：“唯有反耳。”高欢又说：“反是急计，需推一人为主。”当众人表示愿推他为主时，高欢便向众人提出了要求，他说：“尔乡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百万众，无刑法，终自灰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不得欺汉儿，不得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尔不能为取笑天下”③。众人全都表示愿意遵守他的命令。高欢用这种办法，制定了部队纪律，又使众人乐于遵守，从而使部队提高了战斗力。

永熙三年（534年），高欢拥立北魏孝静帝元善见割据北方东部地区，以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为都，自己任大丞相控制朝政，开创了东魏、北齐的基业。当时的东魏北齐境内，六镇鲜卑族与中原汉族的矛盾非常尖锐。作为朝廷的实际掌权者，高欢敏锐地察觉到调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必要性，并多次试图解决它。如前所述，高欢在河北起事时，就向六镇人提出“不得欺汉儿”的要求。东魏建立后，高欢常对鲜卑人说：“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又对汉人说：“鲜卑是汝作客（意即佣作之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

①②③《北齐书》卷一《神武纪》上。

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① 高欢部将高昂是汉人，对鲜卑人欺侮汉人十分不满，与鲜卑对立情绪很重。高欢对他却很宽容，他每次申令三军都使用鲜卑语，但只要发现高昂在列，就改用汉语。这些事例反映出高欢力图调和胡、汉矛盾的良苦用心。当然，当时客观存在的胡汉矛盾不是高欢上述努力所能完全解决的，因此，高欢上述努力收效甚微，但它反映了高欢的政治敏感性。

知人善任，是高欢政治品格的又一方面。他临死时，对其子高澄说："景（指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厍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潘相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②。高欢这番话，不但向其子介绍这些属臣的人品，还教给其子如何使用他们，反映了高欢善于知人的特点。

高欢主东魏朝政之后，几次率大军进攻割据关陇地区的西魏，意欲统一北方。但由于西魏执政者宇文泰是一个更为出色的军事统帅，而且东魏实际上不具备消灭西魏的实力，因而双方多次交锋互有胜负。但高欢自恃东魏经济军事实力超过西魏，常欲并吞西魏，因而在对西魏的战争中，时因骄矜而失败。

东魏武定四年（546年），高欢亲率大军进攻西魏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但在西魏名将韦孝宽的坚守之下，东魏军猛攻50余日终不能克。高欢于征战之中患病，被迫回师，次年死去，终年52岁。高欢虽屡伐西魏无功，但从其起事及一生军事生涯看，他还是当时一位著名的军事家。

---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十三》武帝大同三年九月。

② 《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

三、韦孝宽

韦孝宽（508～580），本名叔裕，字孝宽，后以字行，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孝宽家族世为三辅大姓，父祖在北魏朝历任高官。韦孝宽“沉敏和正，涉猎经史”①。20岁时从军，因战功拜偶子博士，行华山郡事，后历任宣威将军、析阳郡守等职。后韦孝宽随宇文泰入关开创西魏基业，因战功先后任弘农郡守、尚书左丞、南兖州刺史等职。

西魏大统四年（538年），东魏将段琛、尧杰等占据宜阳，遣阳州刺史牛道恒引诱西魏边民。身任南兖州刺史的韦孝宽深以为虑，便遣密探弄得牛道恒笔迹，然后命人仿其笔迹伪造道恒给自己的投诚信件送给段琛。段琛得信后猜忌道恒，对“其所欲经略，皆不见用”②。韦孝宽乘段、牛生隙之时出奇兵突袭，生擒2人，西魏边境复得安宁。大统五年（539年），韦孝宽被封为侯爵。大统八年（542年），转任晋州刺史，移镇边境要地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大统十三年（547年），东魏丞相高欢率大军进攻西魏，兵锋直指地处冲要的玉壁，连营数十里，直至城下，声势甚盛。韦孝宽毫不畏惧，率将士坚守。高欢挥军昼夜猛攻，遍施攻术，先后以断水、起土山、挖地道、攻车撞城等办法攻城。韦孝宽随机应变，以相应办法拒敌。后高欢又命东魏军于玉壁四面穿地道20条，其中施梁柱，纵火烧柱，柱折城崩。韦孝宽命将士于崩处竖木栅以抵抗，东魏军仍不得入。高欢攻城之术已尽，而韦孝宽守城之方有余。高欢攻城50日不下，所率10万大军战死、病死者达7万之众。高欢在韦孝宽的坚守下智力俱困，因而患病，被迫撤军。高欢在久攻未逞之时，曾派人招降，孝宽回答说：“孝宽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③。高欢又命人悬赏格射入城中，称

①②③《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开国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①。韦孝宽见到后，在赏格背面写上“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②，射回城外。后高欢又将韦孝宽的侄儿韦迁锁至玉壁城下，声称孝宽若不投降，便将韦迁杀掉。韦孝宽慷慨陈辞，不以为念。士卒莫不深受感动，人有必死之心，因而玉壁在占有优势的对手猛攻之下，岿然不动。玉壁保卫战后，韦孝宽因功升任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郡公。西魏恭帝元年（554年），韦孝宽与燕国公于谨平定南朝江陵梁政权，以功封穰县公，拜尚书右仆射，赐姓宇文氏。

北周建立后，韦孝宽任小司徒，后出为勋州刺史，再次镇守玉壁。韦孝宽镇守边境重镇，“善于抚御，能得人心”③。所遣密探入齐境者，皆尽心竭力，加上齐人有受孝宽财物而遥通书信者，因而齐之动静，北周皆预先知晓。当时汾州之北，离石之南间居住着不少胡人，他们抄掠行人，阻断黄河水路。韦孝宽深以为患，但因其居住地连接齐境，历任皆难于解决。孝宽决定在其冲要之处修筑一城，乃征发役徒10万人，甲士百人，命开府将军姚岳监筑。姚岳领命后，认为兵士太少，恐怕齐军会来袭击。韦孝宽为其谋划说：“计成此城，十日即毕。既去晋州四百余里，一日创手，二日伪境（指齐）始知；设令晋州征兵，二日方集；谋议之间，自稽三日；计其军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辨矣”④。同时，韦孝宽又令军士在筑城地外围纵火疑惑齐军，以保万全。此城顺利筑成，一如其言。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韦孝宽进位柱国。当时晋公宇文护将东征北齐，韦孝宽认为不应贸然东进，宇文护不肯采纳，后周军果然无功而返。北周武帝归政后，志在灭齐。建德四年（575年），韦孝宽上疏陈灭齐三策。建议周武帝与南朝陈联合，假与北齐盟好，蓄锐养威，然后乘北齐“阖境熬然，不胜其弊”⑤之时，进军灭齐。周武帝依韦孝宽之计而行，果然一举灭齐。大象元年（579年），韦孝宽出任徐、兖等11州15镇诸军事、

①②③④⑤《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徐州总管。后为行军元帅，奉命攻略南朝淮南地区。同年十一月，韦孝宽分遣杞公宇文亮、郕公梁士彦攻下南朝陈黄城、广陵等地，自己率军攻占寿阳。至十二月，陈淮南、江北之地皆为北周所有。当韦孝宽初至淮南时，陈各地守将皆送密信表示愿意归顺。但淮南有所谓五门（指水堰闸门），素为险要，陈人如果开塘放水，则津济路绝。韦孝宽初至淮南，立刻分兵据守五门，以保水路畅通。不久，陈将吴文育果遣人决堰，但因周军防守严密未逞。由于韦孝宽制敌于先，保证了周军攻取淮南战略目的的顺利实现。

大象二年（580年），周宣帝死，外戚隋国公杨坚辅政。由于杨坚有取代北周之心，辅政后开始削夺忠于周室的势力。相州总管尉迟迥位望素重，并密谋起兵讨伐杨坚，因而杨坚命韦孝宽代尉迟迥为相州总管。当孝宽至距相州不远的朝歌时，发觉相州有变，便称病徐徐而进，同时使人去相州求医寻药，借以观察尉迟迥动静。不久，韦孝宽探知尉迟迥将起兵谋叛，遂转头西还。为防止尉迟迥尾随追击，韦孝宽将沿途桥道尽皆拆毁，并将驿站马匹全部带走，同时对驿站守将说尉迟迥将至，命他们多备酒肉、粮草准备迎接。后尉迟迥果然派人追赶，但因被各驿站相留款待，又没有马匹换乘，没能追及，韦孝宽安全西还。同年六月，韦孝宽受命为行军元帅，率大军讨伐尉迟迥。七月，军至河阳（今河南孟州西）。当时，尉迟迥所委任的仪同将军薛公礼等人围逼怀州，韦孝宽遣兵击败薛军。进至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之永桥城。永桥城地处要冲，城墙坚固，尉迟迥已派军据守。当时周军将士以此城当路，请求先将其攻占。韦孝宽回答说："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① 于是弃永桥城不顾，率军进至武陟，大破尉迟迥之子尉迟惇10万大军，乘胜追击至相州州治邺城。随后，韦孝宽在邺城城下大破尉迟迥军，尉迟迥被迫自杀，周军攻占邺城。接着，韦孝宽进军消灭各地反叛势力，关东地区尽皆平定。十月，韦孝宽凯旋还师，前后建功，仅

---

① 《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

用 3 个月时间。同年十一月，韦孝宽去世，年 72 岁。赠太傅、十二州诸军事、雍州牧。

韦孝宽在军旅数十年，长年驻于边境重镇，屡抗强敌，战功卓著。孝宽临阵指挥，“所有经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及其事成，方乃惊服”①。他虽在军中，却喜爱文史，政事之余，常孜孜以读。他所得俸禄，不入于私，亲族有孤寡者，必加以资助，以此称于朝野。韦孝宽可算是北朝晚期一位多谋善算、才德兼资的名将。

① 《周书》卷三十一《韦孝宽传》。